



日本文学丛书

小林多喜二小说选

封面木刻：颜 仲
插图：张守义

中华书局
PDG

(共两册)

书 号：10019·3402

定 价：2.35 元

译 本 序

日本二十年代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涌现出许多作家，他们的作品早已在日本现代文学中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其中小林多喜二的名字，更是灿烂夺目。这个作家，以他对党的文化事业的无限忠诚，以他在文学创作上呕心沥血、永不休止的探索与创新，赢得了当之无愧的名声。

—

小林多喜二(1903—1933)的一生，是自我鞭策的一生，是革命知识分子自觉地进行自我变革的一生。

小林出生于日本本州北部秋田县一个贫苦佃农的家庭。小林四岁那年，他的双亲在故乡实在无法生活，移居到北海道的港口城市小樽，投靠在那里开面包作坊的伯父。他的童年、青少年时期，都是在贫困、屈辱及令人怵目惊心的北海道“殖民地式”严酷社会环境中度过的。由于小林自幼勤奋好学，终于在艰苦的环境中，半工半读，读完了中学，又读完了高等商业学校，毕业后，在北海道拓殖银行小樽分行得到了一个职位。当然，小林并没有满足于这种庸碌的生活。北海道充满血泪的“开拓殖民”的现实，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民众运动的兴起，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工农运动的汹涌澎湃，所有这些时代的激浪，都推动着这

个青年很快地接近革命；加上他那贫苦出身的个人经历，他那对文学的爱好，对正义的激情，终于把他引上了革命作家的道路。他一方面通过秘密参加革命工会的活动，通过参加革命者举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活动，在思想上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又通过当时已经逐渐成熟起来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阅读了叶山嘉树等人的革命作品，接受了革命文学的感染与熏陶。他不但耳闻目睹了如火如荼的革命风暴，而且以亲身的体验，深化了作为一个革命作家的思想感情，扩大了革命作家的社会的、阶级的视野。为准备写作，他不知疲倦地对当时革命斗争的重要事件，作了周密的调查。事实上，他以后的成名作品，无一不是以这段宝贵的生活体验为出发点的。

一九二八年，日本政府发动了一次震撼全国的大逮捕，目的是为了对日本共产党及革命工会进行全面的镇压。仅在小樽市就有五百多人遭到逮捕，其中有不少人都是小林的朋友或同志。事后，他通过对受难者的调查，发表了一部中篇小说《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引起了无产阶级文学阵营内部及社会上的巨大反响。而小林的革命作家的地位，也立即得到了人们的承认。

小林发表上述作品后，又于次年发表了两部作品《蟹工船》与《在外地主》。这两部作品，显示了作家的优异才能，而统治阶级却对此又怕又恨。他不仅被银行开除，而且因《蟹工船》中描写了工人们对于天皇制的愤懑，犯了所谓“大不敬罪”，被囚禁了七个月，出狱后，在作家同盟第四次临时大会上被选为书记长，担负起领导革命作家组织的重任。一九三一年十月，他正式加入日本共产党，参加了作家同盟的党组。

一九三二年，日本统治阶级开始对革命文化团体进行大规模的镇压，小林被迫转入地下。在这严峻的日子里，小林担负了

领导整个革命文化团体的任务，并利用笔名写了许多评论，揭露敌人的阴谋，批评革命内部的失败主义倾向。同时他又利用一切可能，始终坚持创作。中篇小说《为党生活的人》、长篇小说《转折时期的人》，就是他利用地下紧张活动的间隙时间写成的。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当小林与同志进行街头联络时，遭到了敌人的袭击，当天在筑地警察署中被特务们严刑拷打致死。小林的死，引起了国内外革命团体的愤怒抗议。在我国，由鲁迅寄去了充满革命激情的悼词，强烈谴责了日本统治当局的暴行，为中日两国革命文学阵营的友谊史，写下了难忘的一页。

二

小林多喜二的创作生活是非常短暂的。他被敌人杀害时，只有三十岁。如果从他开始文学习作时算起，不过十年的光景，如果从他自认的处女作《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算起，只有短短的六年。本选集中所收的作品，除《防雪林》外，都是在这六年激烈的对敌斗争当中写就的。

纵观小林创作总的特点，首先应该指出的是他那巨大的艺术勇气。他可以说是一个敢于挺起胸膛，以笔为利刃，刺向天皇制国家机器的作家。

他的成名作《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是日本自有近代文学以来，第一部以如此怵目惊心的真实的力量，正面揭露统治阶级用以压迫人民的警察机构的凶残本性的作品。它通过“三·一五”对日本共产党及革命工会活动家的全国大逮捕事件，描写了在警察署中革命者遭受种种非刑拷打的场面，正如作者自己

所说：“当我写到作品的后半部（指拷打的场面——引用者），我的一字一句，都是在发出愤怒声中写成的。”又说：“说实话，我不过是将那些流了尊贵的血的同志们，想说而未能说出的愤怒之情，代他们写出来罢了。”^①由此可见作家是如何以炽烈的写作激情，来控诉敌人的暴行的。

顺便提一下，这部作品，决不单纯停留在对敌人的揭露上，作品还塑造了众多的革命者形象，力求刻画出每个革命者的鲜明个性。作者后来在回想写作这部作品时说：“说到当时无产阶级文学中所描写的人物，大多是在所谓‘目的意识论’的支配下，写成公式化的、概念化的人物，但我所看到的在‘三·一五事件’中被捕的那些人，则决非如此，他们各有各的个性，于是我想如实地描绘他们。”^②从作品来看，也的确如此，作者笔下的每一个革命者都对敌人有着共同的憎恶和愤怒，但他们每个人，又是他自己，而不是某种概念的化身。作者使用了多种观察的角度，来浮现他们的不同境遇所形成的不同性格。作者成功地塑造了这些真实感人的革命者形象，正好反衬出残暴成性的敌人可耻可卑的面目。

《蟹工船》这部作品，也同样具有对敌人的巨大揭露力量。这部作品，直接写北海道大渔业资本家拥有的一艘“蟹工船”（兼捕捞与加工的工厂船）上对劳动人民血淋淋的殖民地式的奴役。这种奴役与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开发美洲时奴役黑人的惨状，并无丝毫逊色。正如作者在这部作品的“附记”中所说：“本篇是

① 见《〈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的创作经验》一文，青木文库版《小林多喜二全集》第9卷，第13—14页。

② 见《〈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的创作经验》一文，青木文库版《小林多喜二全集》第9卷，第13页。

‘资本主义侵入殖民地史’的一页。”所不同的是，敌人在挥舞皮鞭与手枪的同时，还不断向受害的劳动人民头上，套上“为帝国效力”的枷锁罢了，这就更增加了统治者奴役人民的阴险性。作品在描写“蟹工船”上的“臣民们”一旦觉醒，奋起砸断奴役他们的锁链时，赶来镇压的，不是别个，而正是帝国海军，这就再也清楚不过地揭露出“帝国”的本质。日本无产阶级兴起后，以劳动人民在北海道遭受非人奴役为题材的作品，有江口涣的《诱拐劳动者》、神近市子的《雄阿寒山的寒风》等。这些短篇，虽然揭露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北海道劳动者的处境，但都是一个片断的描述，唯有小林的《蟹工船》，做到了以如此巨大的规模，进行全面的、本质的揭露，其难能可贵之处，正在于此。当然，这部作品在发表后当时就有人指出过它的不足之处：作者有意不写通常作品中惯于设置的主人公，而是以整个劳动群众为主要描写对象。这种写法，在渲染集体的心理、气氛的推移变化上，有它的独到之处；但也不可避免地削弱了打动读者的人物典型化的力量。

小林的《在外地主》，是继描写革命者及工人之后，以农民斗争为题材的作品。在这部作品里，作者所揭露的是，既是大地主阶级同时又是大资本家、一身而二任的统治阶级的本质。日本近代社会突出的性质，就在于它的军事的、封建的帝国主义的特点。这部作品正好揭示了广大农民身受封建地主阶级及资本家双重压迫与剥削的真实情景。作品不但暴露了“在外地主”这个备极凶残的、骄横恣肆的怪物，而且还揭露了近代化产物——大银行资本剥削农民的鬼蜮伎俩，揭露了“在乡军人会”①、“青年团”②以及僧侣这些半封建的统治机构的末梢组织和爪牙，如何起着压迫农民、阻挠农民斗争的作用，这样，就戳穿

了日本近代社会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补充以压迫人民的本质。作者由于在本书中对银行本质的揭露,结果被银行开除了,可见敌人是如何害怕本书的揭露力量。

以上是就小林作品中所具有的巨大揭露力量来说的,当然小林的创作才能决不只限于揭露。作为一个杰出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家,他的所有作品都反映了广大人民水深火热的处境,以及人民力图改变这种处境的强大意志与反抗精神。他之所以在这方面同样取得很高的艺术成就,是与他从幼年时期饱受贫困与屈辱的生活体验分不开的。在晚期的作品《转折时期的人》中,作者描写了革命者、典型人物龙吉对幼年生活的回忆,龙吉虽然并不等于作者,但作者用了两章的篇幅对龙吉的幼年贫困生活所作的生动细腻的描写,有很多点是带有作者自身遭遇的影子的。同时也可以说是大多数在内地无法生活的贫农们共同的惨痛经历,他们为了活命,为了逃脱内地地主们的残酷剥削,不得不抱着虚幻的希望,流落到北海道这个寒冷的不毛之地来。至于谈到作为“垦殖农民”到北海来后的生活,在天灾、人祸、战争等等的困扰下,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则更是小林在作品中所着力描写的。特别是在《防雪林》这部作品中,通过对源吉无视当局禁令,深夜到石狩河畔去捕鱼的场面,真实生动地刻画出青年农民对统治者的愤懑与炽烈的反抗情绪。总之,小林作为一个革命作家,不但写出了农民们的觉悟,而且也通过典型人物,写出了工人、农民走上斗争的必然性,精细地传出了他们的思想情绪与精神面貌。

① 所谓“在乡军人会”就是由非现役的日本法西斯军人组成的反动组织。

② 指当时反动的青年组织。

到了创作的晚期，小林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更加深化了，在创造典型人物上，更加富于光采。这具体体现在他的晚期作品《为党生活的人》中。

作者在这部作品中，通过“我”这个把全部生活献给党的崇高事业的人物，向读者展示了一个革命者的崇高的精神境界。“我”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者，在极端艰苦的地下生活中，为了保护党的事业不遭受敌人的破坏，必须经历一番克服残留在自己内心深处的小资产阶级感情与生活习惯的痛苦。痛苦固然痛苦，但“我”却敢于正视自己，自觉地迎接这个自我改造，自我变革。这部作品写“我”与老母关系的章节，是这部作品的压卷。“我”与老母，自幼在贫苦中相依为命，但情况变了，“我”已潜入地下。一个是为党的最高利益忍痛切断与老母联系的革命者；一个是虽不了解革命大道理、但出于劳动人民的本能，绝对信赖爱儿的老母。一个是毅然抛弃了小资产阶级的温情，坚持革命者的立场，要求老母能作为一个“革命的母亲”，在感情上向自己靠拢；一个是为了爱儿的安全，宁可忍受生离死别的痛苦。这种革命者母子之间的爱情与信赖、痛苦与割舍，使得母子两人的精神境界都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部作品，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所取得的动人力量，标志着战前无产阶级文学的最高成就。

上边已经提到，小林的这十来部长篇、中篇作品，是在六年的短暂时间内写就的。小林一方面担负着领导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繁重任务，一方面从不放弃写作。他的晚期作品，如《安子》、《为党生活的人》都标明是“前篇”，说明他计划还要续写下半部。特别是他晚期写的《转折时期的人》只写了一个“序篇”，已充分表明了他晚期在艺术上达到的高度。按他原来的计划，他深感

于以往的文学作品，缺乏厚重的描写，因此，他要写出一部“象在漫长的秋夜里娓娓谈到天明那样的作品，象大河缓缓流泻那样的作品”^①。对于内容来说，他要“写出整整一个时代”。但所有这些美好的愿望，都以他遭到敌人杀害而无从实现。这是日本革命文学中的最大损失，令人永远为之惋惜。

三

纵观小林多喜二的一生，他那为党的文化事业而献身的、始终不渝的革命气概与节操，他那自始至终保持的“贫农之子”的坚韧、淳朴、刚毅的性格，他那英雄般的死，都赢得文学界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景仰与尊敬。作为一个革命文学家来说，他一生留下的创作成果，作为战前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最突出最鲜明的一面旗帜，也是当之无愧的。这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作者在文学创作上永无休止的探索精神。他敢于大胆否定自己过去的文学成就，力求每一作品都能开辟出一个新的境地，这种深自谦抑，不断前进的精神，正象他对待革命立场、对待自我变革的问题总是严以律己一样，在当时的无产阶级作家当中，也是少有的，更不必说资产阶级作家了。

他早期的三部作品《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蟹工船》、《在外地主》问世后，不但使革命文学内部发出惊叹，使旧“文坛”为之黯然失色，而且立即被译成许多外国文字，赢得了赫赫的名声。但他并未为此而踌躇满志，停步不前。一九三〇年，他在狱

^① 见《〈静静的顿河〉的启示》一文，青木文库版《小林多喜二全集》第8卷第206页。

中读了许多古今文学名著,其中包括狄更斯和巴尔扎克的作品。他以惊喜的心情,向狱外的许多朋友倾诉了他对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们在艺术上的成就十分推崇的心情,说明他在创作上是如何地重视艺术性,并对自己作品的艺术成就始终抱着不满足的谦抑态度。他把已经闻名世界的自己的作品比做“小学生作文”^①,虽然不免陷于夸张,但他本人这样说时,却是严肃而率真的。同时他隐约地批评了当时无产阶级文学阵营里某些人对文学遗产采取的虚无主义态度。尽管他对当时日本的“文坛”作家,如对武者小路实笃写的内容有许多看法,但对这个作家所写的作品“真实不假”与“朴素”的风格,还是“深受感动”,从而主张“我们这些人,不管什么时候,都不应该人云亦云地全盘否定某一作品。”^②至于小林推崇志贺直哉,和志贺建立私人联系,更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以上这些,都说明小林这个作家,一方面坚持他的作品的革命内容,一方面又对文学遗产采取虚怀若谷的态度,不断从前人的作品中学习、借鉴,力争在创作的艺术性上精益求精。正因为如此,他的晚期创作,才不受他前期所取得的成就的拘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战后,日本文学界出现了许多有关小林的争论。这里,不可能将这些争论的内容一一列举出来。这里讲两点对小林的作品所持的不同意见:一则曰小林作品的政治性太浓,二则曰小林的某些作品人物形象不够丰满,有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对于后者,我们不否认当时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内部,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的确提出过一些不适当的、甚至错误的口号,如“主题积

①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三日从狱中致蒔田荣一的信。青木文库版《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1卷第209页。

② 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二日从狱中致村山肇子的信。同上书,第131页。

极性论”及“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等等，从而在无产阶级文学中造成某些人的作品流于公式化、概念化。小林的某些作品，也的确有人物不够丰满之处。但是对于一向重视人物刻画的小林来说，这种不足之处，主要并非来自错误口号的提出，而更多地来自日本整个近代文学的传统。日本近代文学的主流自然主义文学，在“破理显实”的口号下，根本就放弃了人物的典型化，这种文学机械地理解“写真实”，并逐渐为日本特殊的“私小说”传统开辟道路。这种“私小说”传统，擅长写作者本人的心境，对于写身边琐事则有余，对于写波澜起伏的社会现实，对于写站在时代前列的人物形象则不足。一个作者，即使是革命作家，也必须依靠本民族的文学传统，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前进。小林一生的创作，正是在本民族近代文学的传统土壤上做了最大的创新努力的。人们不难发现小林第一部革命作品《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在作品开端的人物塑造上，有许多志贺直哉手法的痕迹，如将他的晚期作品《转折时期的人》中描写日本军队演习的段落，与志贺的《记十一月三日事》比较一下，也会发现有非常类似之处。这说明小林非常重视从文学传统中吸取养分。但是，当小林一旦接触到巴尔扎克的犀利的笔锋，他就深感到近代日本文学给与他的，是太薄弱与贫乏了。虽然如此，他仍在严格地鞭策自己，写出了晚期的《为党生活的人》及《转折时期的人》那样的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品。至于说到《在外地主》等作品，有些地方插入了一些揭露性的说明，那是作者为了回答“文学大众化”的问题，有意使这部作品带上“新农民读本”的启蒙的性质。当然，这是革命文学没有做过的尝试，这里的经验与教训，就要仔细分析了。

现在回到责难小林的作品政治气味太浓的问题上，说小林

这个作家过分忠实于当时党的政策，从而妨碍了作家才能的发展。这种说法，我们不能苟同。如果抽去了小林作品中的思想内容，那也就没有革命作家小林了，这个道理不难明白，即使在今天，作者给予读者的巨大鼓舞力量，正在于他那发自内心的改变劳动人民地位的信念与决心；正在于他那大胆地对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的揭露；正在于他那对统治阶级强加给底层人民的“殖民地式”压迫与剥削的愤怒与谴责。而这些也正是当时日本共产党所奉行的政策。事实上，中国广大读者在读到小林作品中反映日本劳动人民反对侵略我国战争的描写时，都不禁对作者无限钦敬。

总之，作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涌现出的革命作家，小林是一面最光辉的旗帜。这个作家，以他作为一个革命作家必不可少的革命激情，以他深厚的生活基础及孜孜不倦进行调查的严谨态度，写出了前人所不敢写的重大主题；以他对文学的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精神，在艺术上取得了凌驾同时期其他作家的独特成就。

中国广大劳动人民，与日本的广大劳动人民一样，将以十分钦敬的心情，永远热爱小林的作品。

刘振瀛

一九八二年六月



小林
久
二

目 次

译本序	刘振瀛 (1)
防雪林	文浩若译 (1)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	楼适夷译 (85)
蟹工船	叶渭渠译 (153)
在外地主	李 芒译 (237)
工厂党支部	金 中译 (351)
转折时期的人	李长信译 (447)
沼尾村	李德纯译 (611)
为党生活的人	卞立强译 (683)

防 雪 林

——献给北海道

文 洁 若 译

本篇完成于1928年4月26日，遗稿于1947年被发现。
译文根据1954年岩波书店文库本译出。

十月底。

那一天，冰冷的雨雪朝着辽阔无垠的石狩平原^①斜刺里倾洒下来。

举目四望，毫无遮拦。一排电线杆连绵不断，到了远方，小得象火柴棍，终于消失了。到处都很平坦，一览无遗。时而有些象笤帚一样耸立着的白杨树在风雨下摇曳着。阴云密布，天色怪昏暗的。乌鸦不时惊慌地腾空而起，三三两两地朝着略有些亮光的地平线那边飞去。

源吉背着个大包袱，从三里^②开外的有车站的镇上回来了。源吉等人的房子，就散布在这饱经风雨的平原上，三户一丛，两户一簇，一共二十来家。有的沿着村庄小道排列着，有的一直缩到旱田里。除了当中的小学校而外，家家户户的屋顶都是稻草铺的。房顶东倒西歪，泥墙全部裂了缝，屋子里暗得从外面几乎什么也看不见。窗户小得只是做做样子，牛圈马棚就设在房屋后面或是对着门口。

农舍后边，那点可怜的土地朝着石狩河的方向一溜歪斜地延伸过去。那里虽已开成熟地，然而红土和沙子里面，到处还裸露着石头块儿。那是由于石狩河每年一定在五月里泛滥，到那

① 原文作石狩平野，日本北海道西部的一个平原，石狩河流经此地。

② 一日里约合三·九公里。

时这一带就全被淹没了。因此，直到五月里闹过大水之后才能在这里种庄稼。旱田尽头是杂草没膝的草原。再过去就是排列在石狩河堤岸上的杂木林。这里紧挨着石狩河。河面很宽，完全看不出水在流动，深得令人毛骨悚然。它蜿蜒曲折，悄无声息地流着。河对岸是沙堤，也是田地弥望。地平线上零零落落地浮现出跟这边一样的庄稼户屋顶，看上去宛如一块块的巧克力。有时候公鸡在对岸一打鸣儿，这边的鸡就遥相呼应。

源吉不知在想什么心事，闷闷不乐地回来了。他走过的家家户户好象都在烧柴禾，从窗户、门口和茅草屋顶的缝隙里全冒出炊烟。由于下雨，烟不能迳直升上天空，被压得擦着地面向四处蔓延。他走过自己家的时候，牛突然粗声粗气地叫起来。在地里牧放的牛，嘴巴不停地咀嚼着，抬起头望望他。源吉回到家来，只见屋里烟雾腾腾。从外面就能听到妈骂骂咧咧的声音。弟弟由儿走了出来，手里拿着油灯罩子，直揉被烟熏着了的眼睛，眼圈儿上乌黑。

由儿骂了一句：“呸，臭老婆子！”

源吉一声不吭地绕到屋后去。

由儿倚着满是裂痕、簌簌落土的泥墙，开始擦着灯罩。他用手心按住灯罩的一端，往里面哈口气，然后塞进报纸团儿来擦。一遍又一遍地这么做，手上沾了油烟，一股子煤油味儿。由儿顶腻味每天擦灯罩这份差事了。总得等妈妈阿关嚷上几十遍，而且还得饶上一个耳刮子，他才肯擦。

“呸，臭老婆子！”由儿边擦边想起什么来似的自言自语了一声。

“由儿，你要在那儿磨蹭到啥时候哇？”

“这就去！”他回答说，“呸，臭老婆子！”

妈蹲在堂屋^①灶前噗噗地吹着火。她头发乱蓬蓬的，每逢眼睛被烟熏了就用围裙擦。在黑糊糊的烟雾里，阿关看上去简直不象人了，恰似别的什么“动物”趴在那里。她那被灶火忽闪忽闪地照亮了的半边脸尤其显得可怕。由儿一进门，她说：“快把灯点上！”

由儿本来就不耐烦，再给烟一熏，都快哭出来了。他进了里屋，从橱柜上取下灯，鼻涕眼泪不断往外流。他摇摇灯，才发现没有煤油了。

“妈，油没啦。”

“笨蛋。没了，就到隔壁去一趟呗，脓包。”

“钱呢？”

“跟哥哥要！”

“……我怕隔壁那条狗。”由儿拿着灯，在妈身后打转转。

阿关把放在厨房里沥水的筐箩里的大米倒进锅中：“叫你去就去！”

由儿怕挨打，就走了出去，喊道：“哥哥——”

他绕到后门，又喊了声：“哥哥——”源吉正在挨着后门拾掇褐色的鱼网呢；按照一定的间隔安上铅坠。

“哥哥，钱——我打油去。”

源吉默默地从腰兜里掏出一张一角钱的钞票递给由儿。由儿稍停了一会儿，看着哥哥干活。

“哥哥，入江家的阿房说，道厅^②的人来啦。”

“啥时候来的？”

① 原文为“土间”，日本式房子，进门地上铺土或砖的地方。从土间上去，就是铺席子的居室，与土间高低约相差一尺多。

② 北海道的道政府。

“刚才，在学校。”

“他们住在哪儿？”

“不知道——”

“傻瓜，”源吉晃了晃身子。

“阿房说，所以他们家把网子都藏起来啦。——哥哥，要是道厅的人到这儿来，你也得这样啦。”由儿故意把手背在身后给源吉看。

“傻瓜。——去，去！”

由儿走后，源吉先是咧嘴一笑，然后又耸着他那壮实的肩膀，放声大笑。

天擦黑时，风稍大了些，也冷起来了。略一抬眼，就看到越聚越浓的乌云，正在那黝黑的、无边无际的平原和地平线上急速地翻腾。

天黑下来以后，源吉边用双手掸着沾在前襟上的尘土，边进屋来了。由儿趴在油灯底下，正在翻来覆去地看着那本仅仅剩下两三百页的小人书。

“姐姐，你替我读读这个，”由儿说着，就去拽坐在炉边衲布袜子的姐姐的袖子。

“混虫！”姐姐把手放在嘴上噤了噤，“混虫，针扎了我的手！”

“喂，姐姐，这只狗后来怎么啦？”

“姐姐可不知道。”

“说嘛——”

“讨厌死啦！”

“那我可要淘气啦。”

源吉边坐在台阶上洗脚，边问阿文：“吉村家的阿胜来过了

吗？”

阿文仰起脸来望望哥哥，一时没有吱声。

源吉也问了声：“干吗来啦？”就没再问下去。

阿文半晌才说：“来过。”

“哦……说啥来着？”

“啥也没说。”

“啥也没说？……没说今儿晚上要到哪儿去吗？”

“不知道。”

源吉进了屋，盘腿坐在炉边。由于经年累月地烧柴禾，不论顶棚还是板壁，家里到处都是乌黑油亮的。从顶棚上挂下来的好几条长长的烟尘，随着火势和风，直晃悠。

厨房的地是泥土铺的，隔壁就是马棚。所以马棚的气味随时都直冲进屋里。到了夏天，热气就腾得馊臭馊臭的。成群的马蝇子扑过来。——马不时地低声嘶鸣，偶尔还听到马往板壁上蹭，和用前蹄挠板子的声音。

房间里，只在正当中点着一盏灯。灯影映在用圆木构成的房梁上。灯焰一晃，影子就随着摆动。

妈妈阿关边端出桌子，边问道：“源儿，你找阿胜有事吗？”

“没事。”

“那么跟谁一块儿打网？”

“嗯……谁都成。”

“听说道厅的官儿来了。不要紧吗？”

源吉耸了耸肩，说了声“官儿……”就笑起来了。

“喂，哥哥，这只狗要干啥？”由儿这次把小人书拿到源吉跟前来了。“这回，这狗是要报仇吧？……”

“妈，替我准备一下褂子吧。”

“喂，哥哥，这只狗一定挺凶吧？隔壁阿庄非说这只狗没狼厉害。他是瞎说吧，哥哥？”

“咱们已经有两三个月没吃到鱼啦，妈！——真是太欺负人啦！”源吉恶狠狠地说。

“可你也犯不上担这样的风险……”

“简直是混帐！”

妈自言自语地嘟囔了些什么。

“来，吃饭吧。”妈从挂在炉火上的锅里给大家舀青菜酱汤。“喏，阿文也别缝了，吃饭啦。”

由儿喜欢学哥哥的样儿。吃饭的时候，大模大样地盘着腿，扎煞着胳膊肘——他不时地朝哥哥瞥上一眼，并纠正着自己的姿势。

“喂，哥哥，狗和狼，谁凶呀？是狗吧？”

“别说话啦，快吃吧！”阿关呼呼地吹着撵了白薯和小豆的粥，呵叱道。她忙不迭地抽噎了好几次鼻涕。

由儿吃罢一碗粥，就用筷子咣咣地敲碗，递给阿关去添。

“哥哥，阿芳来信啦。”阿文说。

“哦。”

“她说挺想念在这里度过的那些日子。瞎说一气，这里有啥可喜欢的！”阿文满脸露出不以为然的神色。

“哼！别这么说——她说的兴许是真心话哩。”妈插嘴说。

“简直是胡说八道。这儿有啥好玩的？朝哪儿看，都空荡荡的，大得没边儿；到隔壁家串个门，都象是去旅行一样。没有电灯，也没有电报，连火车都没见过——大伙儿全穿得那么邋遢，二流子似的……”阿文说。

“哥哥，还是狗凶吧？”

“她还说，越是看穿了城市是肮脏的，就越想念在石狩河边上干活儿的那些日子。”

“嗯哪。”

“嗯哪个啥？在这种地方，敲打着马屁股干活儿，熏得满身粪臭味儿——有啥意思？”

“喏，源儿，阿文这阵子闹得太不象话啦。”阿关看着源吉说。源吉没有吱声。

“我告诉她我也想去札幌，她说：这不是咱们来的地方——她可忘了是她自己死乞白赖要去的。”阿文说。

外面，雨一阵阵淌过来，宛如撒豆子般地山响。每逢这种时候，油灯就摇动，大伙儿的影子映照在后面纸门上也忽大忽小地跟着晃悠。

由儿吃完饭，叉开腿站在炉火前面看小人书，把小指尖那么大的小鸡头露在外面。

他说：“哥哥，你见过狼吗？”

“没见过。”

“在画儿上瞅见过吧？”

“嗯。”

“谁凶？”

“谁力气大谁就凶呗。”

“不行，不兴这么说。”

源吉放开嗓门笑了。

炉火里烧的是树根，大概燃到节子上了，火星儿噼噼啪啪四溅，有一点火星溅到由儿那“活象牵牛花骨朵儿”的小鸡头上。

“好烫！……”由儿丢下小人书，仰面朝天躺下来，啪嗒啪嗒地掸衣服。

“瞧，谁叫你把那玩意儿冲着火的，把火神爷惹气啦，傻瓜！”

“妈的，呜呜——嗯嗯。”由儿快哭出来了，直摇晃身子。

阿关和阿文在厨房里竖起一根蜡烛，正在洗碗什么的。雨点在窗户上拍打着，沿着窗玻璃淌下来。

“越下越大啦。”阿关说。

阿文搭碴儿道：“哥哥就别干算啦。”

“俺们乍来的那阵子，大马哈鱼随便你捉。下晚安静的时候，还能听见大马哈鱼把脑袋伸出河面唧唧地哭呢。”

阿文噗嗤一声笑了。

“傻丫头，是真的咧。这年头越来越不好过啦。”

远处，牛叫了，接着，旁处也传来了牛叫声，由于风向的关系，半截儿就听不见了。

由儿仰卧着，哼着什么小调儿。他问道：“妈，啥叫巫呀？来了个巫，给吉川他爹招魂来着。她说，吉川他爹在阳间给火烧得够苦的啦。——巫是个老婆子呗，都管她叫巫婆。”

“真的吗？”

“吉川家做油炸豆腐哪，说是做给巫婆吃的。”

“是狐仙^①吧。”

“狐仙就是狐狸吧？”

“嗯。”

“阿胜家的芳儿带着狗到吉川家去串门子，挨了一顿臭骂。”

“嗯哪。”

“哥哥，狐狸没有狗凶吧？”

源吉一声不响。

① 原文作稻荷。原是五谷神，他的使者是神狐。后来此词也指狐仙了。相传狐仙喜欢吃油炸豆腐，故民间多以此作供。

“吉川他妈直号丧，眼睛都哭红啦。”

阿文点上灯笼走进后面的堆房，把手伸进堆在靠门的角落里的草包，掏出土豆，用围裙一兜。老鼠窸窸窣窣地蹿到里边去。灯笼的圆影子在黑糊糊的堆房顶棚上晃动。

“喏，土豆。”阿文回来了，把围裙里的土豆倒在炉边。

“土豆吗？——呸，不好吃！”由儿四仰八叉地躺着，用脚尖把土豆东拨拉一下，西拨拉一下地玩。

“别造孽啦！”阿关用火筷子敲由儿的脚。由儿缩回脚去，吐吐舌头说：“吉川家吃的是白薯哩。”

“等着瞧吧，你这脚丫子不烂掉才怪呢。”

源吉把两只胳膊直直地往上边一伸，打了个哈欠，映在纸门上，活象鬼影子。

由儿缩着脖子看了看，说：“我怕！”

源吉回头瞥了一眼，说：“怕啥，傻小子！”他把两三个土豆埋在炉灰里。“由儿，呆会儿烤熟了，你可别又吵着要吃啊。”

由儿故意朝一边看，就势儿一歪身向旁一滚。

阿文把没缝完的衣服拿到油灯下，将自己那份土豆埋在灰里。她说：“下雪啦，冷起来了。往后，北海道的日子可讨厌了。就象进了洞的熊似的，大半年出不了房门——烦死啦。”

“烦又顶个啥呢，呃？”

“顶个屁。”

“那你就别吭声啦。”

阿文半晌才不服气地说：“不吭声就不吭声……”

由儿胡乱躺在那儿，手拿尺子，把它掰来掰去。这会儿又在姐姐身上戳着玩，淘起气来了。阿文满肚子气，起初没有理会，只是不在意地用手摸摸被戳过的地方。由儿觉得挺有趣儿，就

戳了好几次。后来索性把尺子的一头杵在姐姐的脖子上。阿文这回当真了，说了声：“别闹啦！”

由儿又杵了一下。他说：“哎呀，姐姐的脖子这儿有一块记。”对着那儿又戳了下去。

阿文猛地回过身来，一把夺下尺子。

在炉边盘腿坐着的妈，不知什么时候打起盹儿来了。灯光在她脸上清晰地照出了皱纹，这下子就显出她苍老了。

阿文望着妈说：“最好变得象妈这样。”

灯火照得房间里忽明忽暗。外面，传来人们穿着草鞋在泥泞里吧唧吧唧蹚着的声音。

发条松了的钟，走到八点那儿，却慢悠悠地打了四下。由儿背对着炉子睡着了。源吉到屋外去看雨势。

接着源吉动手做起准备来了。阿文做着针线活儿，时而望望哥哥，问：“行吗？”

源吉没有吭声。他准备就绪，背起鱼网就走出家门。雨停了，然而夜晚黑咕隆咚的。他好几回都意料不到地踩到洼坑里。那儿满是泥水，每回泥都溅得老高，甚至沾到脸上。天空出现了星星。从远处不断传来象是风穿过树丛般的瘆人的声音。四下里一团漆黑，只是远远地在东南方向，地平线上依稀有一点点光，那是岩见沼泽地。

源吉边走边想着自己就要开始干的事。他喃喃地骂了声：“畜生！”然后吐了好几口唾沫。他心里按捺不住，连自己这么走着，也觉得极不耐烦。“畜生！”那路拐弯了。

打那儿拐过去，在相距两百来米的前方发现了光亮。那是从一扇小窗户里透出来的灯光。突然，后边十几米的那个草丛上，哗地响起来了。又下起雨来了。顷刻之间，前后左右都给雨声

包围住了。唯有灯光照亮了的窗口那一小方块儿地方，可以看到雨丝。源吉走到那栋房屋跟前去，猛地听到狗在黑暗中低吠着。他忽然想起了狗的名字，就揣摩着方向，小声叫了叫。于是，吠声停了，有什么东西碰着他的脚——是给狗缠住了。他又叫了两三声狗的名字。

雨声稀疏下来，逐渐止住了。屏息一听，可以清清楚楚地感觉到雨声是从西边停下来的，如今正往东边移动。尽管源吉所呆的地方雨完全住了，却听见了石狩河那边还有下雨的声音。雨声沿着原野一路上停下来，越去越远，他听得很真切。

源吉绕到后门去，喊道：“阿胜！阿胜！”

源吉听见里屋有人站起来，走下堂屋，趿拉上木屐，走了过来。那个人鼓捣了一会儿门，咯嗒一声把门拉开了。亮光刷的一下射到外面，正照在站在门口的源吉身上。

“是阿源吗？”

“嗯，去不去？”

“去，稍等一会儿。”

“怎么样？”源吉压低了声音说。“你爹没说啥吗？”

“嗯哪。”阿胜含含糊糊地答道。

源吉咧嘴一笑，抽动着鼻子。阿胜害怕，不敢干；今天早晨是源吉硬让他应承下来的。源吉想到这里，直觉得好笑。他说：“那你就快点准备吧。”

过一会儿，他俩已经走在漆黑的道路上了。

“在哪一带干？”

“要往上游走一里来路。这样离北村就近了。不然的话，一旦给发现了，就麻烦啦。”

“听说道厅的官儿来啦。”

“可不是吗？所以就越发有意思啦。”

“……”

“凭啥要给道厅的小官儿发现呢。那些家伙提心吊胆的，再说这会儿也该睡着啦。”

源吉大声笑起来了。广漠的平原上连点回音都没有，使人发憊。笑声消失了。

源吉领先，象是拽着走在后面不大吭气的阿胜似的，硬是大踏步往前走。过了约莫五分钟，又下起雨来了。在无边无际的平原上，黑咕隆咚的，下着瓢泼大雨，连灯笼也不打，这么冒着雨走，阿胜毕竟觉得不自在。

“真糟糕。”

“嗯？”源吉掉过头来，压过雨声问道。

“我说的不大合适。”

“啥？”

阿胜不好意思地笑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向走在自己前面的、肩膀宽实的源吉问道：“官儿住在哪儿啦？”

“在北村。北村的旅馆里。——洗过澡，仰巴脚舒舒坦坦地躺着哪。离这儿有三里路呢，不会冒雨跑来的。”

“今儿个早晨我妈到河边去，说是有五六条大马哈鱼露出了脊背，朝下流游去了。”

“是吗，那可好啦。”

他俩默默地走了一会子，源吉跨着大步走，阿胜急匆匆在后面追赶着。

突然间，路旁一头牛粗声粗气地大叫一声。他俩不由得一惊。

“畜生，吓人一跳。这牛真讨厌！”

接着，远远地传来了另一头牛好象对答的叫声。旁边出现了一座房屋。路过那里的时候，阿胜好象忽然想起来似的向走在前面的源吉问道：“你听说阿芳的事儿了吗？”

阿胜知道阿芳去札幌之前曾和源吉之间有过什么样的关系。

“嗯。”源吉回答的声音露骨地表示出心头的不痛快。“阿文也真让人伤脑筋。”

“……”

他俩宛如顶了牛一般，都把话顿住了。

“阿胜，你净跟阿文讲些废话。”

“我？”

“嗯。你跟阿文是半斤八两。你腻味种地了吧？”

阿胜又不作声了。

“自从见到了札幌的市街，她光知道做梦啦。”

“当这份穷种地的，只有傻瓜才不会腻味呢！”

“哼——我就是傻瓜呗。”挡在阿胜前面的源吉说到这里，晃着肩膀笑起来了。“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

阿胜听了，不由得一怔。但他低声说：“这也没啥好显摆的。”

“阿胜，你知道阿芳在札幌干啥行当吗？”

阿胜吞吞吐吐地说：“听说干的事儿不大体面哩。”

“是卖淫吧？”

雨几乎不下了，只能听到在泥泞中走着两个人的脚步声。

“……可不愿意让她去卖淫啊。”源吉自言自语地说。

跟在后面的阿胜没怎么听清楚。

他俩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的原野里走了将近半个钟头。

“打这儿穿到河岸上去。”源吉停下步来，接着就从大路拐进了小岔道。“快到了。”

这是穿过旱田的一条小道。每迈一步，裤腿就碰上两旁给雨淋湿了的草，马上就弄得湿漉漉的，挺不舒服。

“喂，小心点儿。”源吉说着，把背着的鱼网向上颠了颠。“这样的雨天，当官儿的绝不会来的。”

“我……”

“嗯？”

“……”

“啥事？”源吉回过头来问道。“嗯？”

“给逮住，可就完蛋啦。”

“……咋的，害怕了吗？”

“……”

“怎么啦？”

“不大合适。”

“傻小子，鼓起劲儿来。”

他俩走进了一个相当大的树林子。透过树梢，可以看到天空。依稀看得到云彩掠过细小的黑色树梢飘去。树枝摇曳着，彼此碰撞，发出各色声响，汇成一片怪可怕的吼声。走了五十来米，稍微往下一瞅，就看见了石狩河的河面。暮秋，在这风雨欲来的黑夜，河水流动着，闪出令人毛骨悚然的黯光。就连白昼，它也是那么讨厌。河中央有两三个地方，水在静悄悄地打着转转。木片、碎纸之类漂过来，就在漩涡这儿转来转去，好象河底下有什么东西在拽它们，终于被“吸进”漩涡里去了。这情景就连在白天，让人看了也生厌。阿胜俯瞰着这悄无声息、怪阴森恐怖的石狩河，浑身打了个冷战。他向源吉身后紧赶几步，问道：

“这是渡口吧？”

他俩朝岸边走下去。源吉把背上的东西咕咚一声掼到系在岸上的小船里，然后他坐在船头上，往四外眺望了一会儿。

源吉掏出烟来，说道：“喂，阿胜，你放开嗓门儿唱支歌吧。”

阿胜觉得纳闷，叮问了一声。

“啥都行。——喏，我先唱吧。——啥都行，大声唱。”

本来是 你让我 常常来相见，
到如今 你却又 不肯随我的愿。
不愿意 你就该 把话说在前，
那我就 绝不会 跑来见你的面。

源吉可着嗓门儿嘎声唱着。歌声一下子就消失了，一点回音也没有。阿胜心里怪害怕的，直发怔。

“你怎么啦？”源吉突然笑起来了。他摇晃着魁梧的身躯，肆无忌惮地大笑着。他“嗯？”了一声，还是笑个不停。

“喂，别唱啦。”阿胜蹙蹙着鼻子眼，恳请般地伫立在那儿。

“哈哈哈哈哈。”源吉笑罢，说道：“再唱一个！”

鸟也飞不到……喔——喔

接着说了声：“哎，嗓子上不去。”又改唱道：

花看——樱花，
人看——武士……

源吉没唱完就止住了，他催阿胜沿着来路折了回去。走了五十几米，又进了树林子。于是他停下脚步，说：“就这样呆一会儿。”他留心观察周围的动静，屏息侧耳细听。他俩这样呆了有

二十分钟。

“好啦，不要紧。”源吉说。“喏，走吧。”

他俩又走下去，到了船那儿。源吉说：“上去。”

源吉让阿胜上了船，就使劲把船推到河面上，就势儿灵巧地跳上船尾。这样一来，船头就犹如烈马昂首似地翘了起来，船身直晃动。

源吉在鱼网上坐定后，阿胜说：“我还在闷葫芦里呢。”

“是吗？很简单。我故意试试当官儿的在不在。你是头一遭儿，所以不明白。大伙儿都这么干。”他又补上一句：“可是打现在起，就得放安静些了。”

阿胜浑身颤个不停。他暗自后悔不该跟源吉一道来。人家都说，石狩河闹“鬼”。他总觉得那漩涡会把他们连船给吞进去。在白天，会认为这是个荒唐的念头，可如今阿胜就不由自主了。事实上，不知怎的，在石狩河里淹死的人，尸体从来没有浮上来过。河比夜晚的海还要可怕。他一个劲儿地觉得水里会“突如其来地”冒出什么来。船顺着水势荡去，忽而船尾朝前，忽而船头向前。听见了水拍船底的汨汨声。两岸黑黝黝的，高耸处恰似陡峭的悬崖，也有低得一直可以看到地平线的地方。树林子延伸到岸边，树叶随风摇曳着。河上是漆黑一团，本来靠水面上微微反射出来的光还能辨认彼此的脸，经过这儿的时候就完全看不见了。

“喂，阿胜，你看着这边。要是有人，就招呼我一声。”源吉说。他自己盯着另一边看。

船朝着下游驶行了十分钟光景。一连下了两天雨，水涨了半尺，水流也湍急了。不久就来到石狩河缓缓地拐个大弯的所在。源吉想靠岸，于是拿起桨，逆着流得相当急的水势划起来。

阿胜也拿起桨这么划。两个人拚出浑身气力划着，小船一耸一耸地颠簸不已，橹弯得象弓似的。他俩用力过猛，直打趔趄。阿胜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两三次失去重心。尽管他俩使足了劲，船还是随时都会给冲到河湾当中去。源吉叉开两脚，金刚力士似的站着，边划边呜呜地哼着。不久，他俩的努力在船身上只不过显出了千分之一的效果。

“嗨哟！干嘛！”

阿胜也浑身汗涔涔的了。

当船划过河中心两米左右之后，好象靠着惯性作用，容易划了。

“这下子可好啦！”

船腾的一声搁浅在沙滩上了，源吉给捺得差点儿栽个跟头，他用衣袖揩了揩满脸的汗。

“开始干活儿以前，你先去放一会儿哨。”源吉对阿胜说，并从鱼网里找出一根象打棒球用的棍子，递给了他。阿胜好象很稀罕地接过来，苦笑了一下。

“好家伙！”阿胜把这棍子当玩具似地摆弄着，开始攀登沙崖。源吉拿着鱼网一端的绳子，跟着爬上去。他俩光把头伸到平地上，先四下里仔细打量了一下。黑魆魆的，看不大清楚。风从老远的地方刮来——他们对风移动的情况，了如指掌。天地连成一片，斜雨涌来，时而在眼前闪现出一道道白光。

“这种时候当官儿的才不会来呢。”

源吉让阿胜等着。于是，他把绳子捆在早就看中了树干上。树干给雨淋得滑溜溜的，源吉使劲一扎，树皮就哗啦哗啦地剥落下来了。扎结实后，他就用双手把住树干，站定了脚跟，拚命地摇撼。树叶随即沙沙作响，接着就唏哩哗啦地落下雨水来。

阿胜隔着一定的距离站着，这时候吃了一惊，跑到源吉这儿来。源吉也不由得感到紧张，掉过身来，压低了嗓门严厉地问道：“咋的？”

“刚才那是啥？”阿胜慌得结结巴巴地说。

“嗯？”

“沙沙直响。”

源吉说了声“原来是这么回事”，就笑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倒把我吓了一跳。”

“是啥？我吃了一惊。”

“我摇树来着。水流得太急，我摇摇树干，看经得住不。这会子你那根棍子屁用也不顶了。”源吉笑道。

他俩又回到船上，把鱼网在船上码好。于是源吉自己划船，让阿胜下网。他拚足了力气朝对岸划去。这样一来，船就沿着河湾到达斜对过的下游岸上了。

源吉边划边说：“来，干哪！”阿胜麻利地把鱼网抛到水里。到达对岸后，在阿胜的帮助下，源吉背着河，把鱼网一端的绳子搭在肩上，挣扎着不让网给流水冲走，然后将绳子扎在岸边的树上。凭着两个人的力气，他俩还不时被拖得向后边倒。后来把船拉到岸上了。

这样就完了。

他俩商量好第二天早晨四点来钟再到这儿来，于是就各自沿着田间小道回家去了。

源吉进门一看，已经熄了灯，大家都睡下了。他摸着黑儿到了厨房，从缸里舀了两三杓水咕嘟咕嘟地喝下去。马棚里传来吧嗒吧嗒的声音，马甩着尾巴在拍打自己的身子呢。

二

凌晨四点钟，黑得跟晚上九十点钟一样，但是天却略微发蓝，冷飕飕的。

河里涨了水。水势把扎着绳子的树冲弯了，在那里晃悠。虽然他俩离开家走到那个地方，一直都没下雨；着手干活儿的时候，却又下大了。

他俩马上去拉网。逆流拉网可不是件容易事！他们打了好几个趔趄，还差点就势儿给拽到河里去。两个人呼哧呼哧地直喘，约莫二十分钟后，就汗流浹背，冒出热气来。好不容易总算拽开了头，哪怕是一点，也足以鼓起他们的劲头，就嗨嗨、嗨嗨地边吆喝边拽。接着就越拽越顺手，用不着花那么大力气了。

源吉歇了口气，问道：“阿胜，有棍子吧？”阿胜嗯了一声，源吉就嘿嘿笑了：“真够呛！畜生，混帐东西！”

雨水疯狂地砸在地上，迸溅开来，哗啦啦地流走了——就象是在顶棚上打翻了水桶似的。由于下雨的缘故，在一片漆黑当中依稀露出白糊糊的光。

忽地听见了啪嗒啪嗒溅水的声音，马上又止住了。过一会儿，水又啪嗒啪嗒溅了起来，接着就溅得更欢实了。网逐渐拽过来了。

拽啊，拽啊，拽了个大姑娘啊，

嗨呀嗨，嗨呀嗨！

哼——嗨，哼——嗨！

源吉气喘吁吁地喊着号子，象跳舞那样摇摆着魁梧的身体。他略弯着腰，蜷起腿，全身有节奏地晃动着，简直象是个孩子。网越收越紧，大马哈鱼发出象是用板子拍打水面似的声音。

“阿——源！”阿胜喊道。

“嗯？”

“你看那个！”

四下里黑漆漆的，活象是用黑布蒙住了双眼。只见一道鳞光忽闪了一下，令人几乎怀疑自己的眼睛。紧接着就是使劲击水的声音。

“是大马哈鱼！”源吉大声说。“好大的个子！”水啪嗒啪嗒越溅越欢了，就象是小孩子打水仗似的。过了片刻，有两三条鱼似乎蹿上了沙滩，厚实的身子撞来撞去，乱蹦一气。源吉把网交给阿胜拉，自己拿起木棍向岸边走去。源吉忖度着里面有不下一条大马哈鱼。鱼抽冷子将尾鳍一甩，连沙子带水就弹到源吉的面颊上了。

“混帐东西！”源吉用给雨淋湿了的衣袖擦了把脸，估摸着方向抡起棍子，朝着大马哈鱼的鼻头揍去。

啪嗒一声，大马哈鱼尾鳍朝天，挺直了身子。不大工夫，尾鳍往下垂了，等尾鳍软瘫瘫地耷拉下来后，身子颤动了两下，接着就再也不动了。

源吉喊阿胜。待阿胜走过来，源吉一句话也不说，对准另一条大马哈鱼的鼻头就是一棍子。阿胜吓得心里扑通一跳，呆呆地伫立在那里。源吉闷声不响地笑着，用棍子挨个儿揍去。阿胜拽住鳃，把鱼拖走，装在船上的煤油桶里。一拽，有的哆哆嗦嗦颤动着身子，有的大概只剩一口气了，仅仅鳃还在动。

揍着揍着，源吉的心情变得怪狂暴的。每揍一条，他就咬牙

切齿地骂一声：“混蛋！”“畜生！”“混蛋！”“畜生！”脸上绷得紧紧的，忽而又抽起筋来。他象发狂了一样没头没脑地乱揍。

后来他又一边揍一边喊着平时痛恨的一些坏家伙的名字。他自己也弄不清为什么越喊越来劲。

冷不防一股温吞吞的东西溅过来，沾在脸上黏糊糊的，挺恶心。原来是血。源吉每揍死一条就挨个儿数着，数到“七、八……”大鱼跳动的声音就逐渐少下去了。数到“十”，就只听到源吉近旁有一条鱼在蹦。源吉想走过去，却一脚踩在大马哈鱼那滑溜溜的身上。连他都猛孤丁地吃了一惊，只觉得象是深更半夜在铁轨上踩着了一个被轧死的人似的。“十一条——啊。”源吉说着，侧耳细听。再也没有声响了，唯有雨声突然传到他的耳际。他想：是十一条。

于是他对阿胜说：“齐啦，十一条。”

阿胜把鱼装在两只煤油桶里，为了便于背着走，把它们拾掇好。

“网和船咋办？”

“船吗？——就撂在这儿吧。早晨汽船打这儿过的时候，替咱们拖走。网我背去。”

“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加上水，好沉哩。”

“这点玩意儿算个啥！”

*

*

*

他俩走上了田间小道。源吉没料到能捕这么多鱼，高兴得象个孩子似的。阿胜却总是提心吊胆的。回去的路上，会不会迎头碰见官员呢？他感到就象有人从背后掐住他的脖子似的。天还没亮，到处都黑洞洞的，牛在一旁猛地叫起来，阿胜差点儿喊出声音。

前面出现了灯笼。

“阿源，灯笼。”阿胜从背后向源吉打招呼。

“嗯。”源吉马上离开田间小道，走进庄稼地。走了将近二十米，就站住了。他俩就这样把灯笼躲过去了。到处是一团漆黑，极目望去，映入眼帘的唯有随着灯笼的移动，它所照到的部分——忽宽忽窄，忽左忽右。灯光在草丛上一晃，一会儿看到小道两旁庄稼地的一角，一会儿又是小道上的水洼子。”

灯笼过去后，他俩又回到田间小道上。

“当官儿的还打着灯笼呢。”源吉笑道。

“不然就更可怕啦。非跟他撞个满怀，才知道他来了。”

“那就给他个厉害尝尝。”源吉说着，把半截身子扭到后边，将方才那根棍子伸到阿胜跟前。“这个！”

阿胜闻见棍子发出一股子血腥味儿，不禁感到毛骨悚然。

“别瞎胡闹啦！”阿胜结巴得连自己都觉得好笑了。

“在这个村儿里，咱们已经有三个月连一条鱼也没捞着吃。象话吗？到后头去看看河，那鱼儿露着脊背儿游啊游啊，咱们却三个月吃不上鱼。混帐！真是岂有此理！可你瞧，下游那儿，渔场那些有钱的混蛋们，足逮一气。妈的也不要什么执照啦！”

阿胜一言不发。

每逢提到这个碴儿，源吉心里就冒起一股无名的怒火。这时候要是碰上官儿，说不定他就会将打大马哈鱼用的棍子朝着那家伙的脑门子揍去。

“要是认为我自己高兴干这种事儿，那就大错特错啦！”

阿胜知道源吉有那么一股子怪“可怕”的劲头，想到这里，不由得胆战心惊。但愿不要遇上官儿才好。他认为如果遇上了，源吉准会把官儿揍死，那是确凿无疑的。

阿胜想起他所知道的关于源吉的一档子事。说来有好多年了，源吉他爹打内地来到这狗熊出没的北海道，一直象虾似的弯腰曲背地拚命干活儿，好不容易挣下一份土地，却又押给一个财主了。到了期限，这块地注定归财主了。他爹颓丧得直嚷头疼。

财主啦官员什么的，噎噎地进来了两三个，让源吉爹在一份文件上盖戳子。他爹直发呆，进里屋去取戳子的时候，象是忘了什么东西似的在纸拉门跟前打转转。

源吉爹刚一按戳子，那个低下身子专心致志地注意文件的财主，忽然唔了一声向后仰去。大伙儿惊跳起来。他们看见，当时刚十一二岁的源吉抱着财主的脚，咬住了他那没有毛的小腿肚子。源吉浑身痉挛般地颤动着，眼神都变了，狠狠地咬着。他爹和官员大吃一惊，怎样拉他也拉不开。大块头的财主活象上了圈套的兔子，满地打滚，鬼哭狼嚎。

直到那一天，源吉只字也没提到过庄稼地的事，就连他爹着急的时候，他也一如往常，举止安详，反倒比平时话少了。他却干出了这样的事！这事就添枝加叶地在村子里传开了，阿胜也听说了。

要是发生了什么事，源吉总是不动声色。别人会发表意见，或是互相谈论什么的。源吉却不是这样。别人只是乱吵吵，其实什么也不做；源吉则不慌不忙地径直走去，独自完成谁也料不到的壮举，回来后也依然闷声不响——这种事例可多着哩。阿胜认为，源吉并不是由于迟钝才这样的，而是因为他是个有远见的、坚定的人。

阿胜想起源吉从前咬过财主的小腿肚子那档子事，寻思要是一头遇上了官儿，源吉准会拿那根棍子干一家伙。这个可怕的念头就象一只可怖的蝎子在他的心上狠狠地螫了一下。

他俩默默地走着，只听见泥泞道上啪嗒啪嗒蹚过去的声音。时而一脚踩进水洼子里，打个趔趄，才乱了脚步。阿胜边走边注意前边的动静（源吉当然也是这样）。阿胜来到自己家门口的时候，忽然感到浑身瘫软，一点气力也没有了，他这才发觉自己的神经绷得太紧了。他心想：这下可得救了。

“有一年没吃上啦。喏，让你妈高兴高兴吧。”

源吉说罢，就没了踪影。黑暗中只传来了他的脚步声，转瞬之间就消失了。大概是沿着草地上的一条路拐了弯。

阿胜绕到后门去，把背着的东西撂在门旁的堆房里。这时，听到有人沿着泥泞道走来的脚步声。刹那间阿胜感到自己简直吓呆了。

“阿胜！”

原来是源吉。

阿胜虽然明白过来，一时还是说不出话来。

“……是源吉啊。”

源吉嗯了一声，接着，身材魁梧的他就顺着阿胜声音的方向慢悠悠地走过来了。

“喏，天一亮，你就从这里到河堤上的那户人家，挨家挨户地发鱼——每家一条。就这么办。因为大伙儿都捞不着吃啊——你就说是买的好了。我呢，一直发到石田家。应该这么办！对不？”

“嗯哪。”

“明白了吧。那我就走啦。”

于是，源吉就回去了。

阿胜屏息静气地听着源吉离去的脚步声，心想：这个人每迈一步，是多么坚定而有力呵。

三

沉沉欲雪的天气，却又放晴了。

然后一连多少天就都是暮秋天高气爽的日子。

旱田、草原、稻田、树林，以及远远地呈现在西方的低矮山脉，都染成一片黄褐色，与万里无云的碧空形成鲜明的对照，无边无际地蔓延开去。庄稼人仿佛觉得这是一副难得见到的新鲜景致。

为了迎接即将逼来的冬季，村里的人们到庄稼地里去着手准备。四五个姑娘一大早就背着杂粮，套上大车出发，要到有车站的镇子去，在那一带叫卖。阿文也一道去了。她们叽叽呱呱在大车上闹腾，每路过一家庄稼户，就从车上打招呼。天黑下来后，姑娘们回来了，扯了些做内裙和汗衫用的布。一路上几个姑娘用美妙的嗓子唱着，呆在家里的人马上就知道了：“哦，刚刚回来啊。”

山货店的小伙计不时骑着自行车从有车站的镇子沿着乡间小道跑来。在地里干活的庄稼人每次都伸伸腰看着他。小伙计路过的当儿还经常跟他们打声招呼。

准备腌菜的妇女们走下石狩河的堤岸，用绳头做的炊帚刷洗刚刚拔来的、裹着土的萝卜。河在这里拐弯，由于水流的关系，形成了沙滩。妇女们唱的各色各样的歌儿，一直传到在堤岸上干活儿的庄稼人的耳际。

汽船为了载运山里生产的农作物——主要是青豌豆，发出嘟嘟嘟的噪音逆流而上。孩子们只要从远处略微听见这个声

音，就沿着岸边小路一股劲儿跑去。然后就坐在堤岸上，悠荡着脚，等待汽船经过。但凡是好天气，孩子们总是这样。溯流而上的汽船，光是听到声音，却总也不见踪影。由于河道弯曲，有时声音没到，船只反而会突然出现。孩子们高兴得直摆手，喊“呱呱叫”什么的。船上一个穿油垢的蓝衣服的人，偶尔挥挥帽子。有时孩子们不管怎样喊，船上也没有人搭理，于是他们就无精打采地默默目送着船的后影。汽船拖着载货的筏子，不停地嗒嗒嗒响着，使劲晃动船身，以几乎看不出是在前进的速度，打孩子们跟前经过。孩子们说：“哎呀，汽船出汗了。它呼哧呼哧地喘气哪。”

由儿把坐在旁边的那个伙伴的手抓过来按在自己的胸口上，说：“你觉得出这里在扑通扑通跳吗？我姐姐说过，汽船嗒嗒嗒响，就跟人的心跳是一样的。”

大伙儿七嘴八舌地说：“是吗？”于是，一个个都把手按在自己的心上。然后又异口同声地说：“真的咧。”

汽船驶过去以后，孩子们为了去帮在地里干活儿的爹妈，一溜烟都跑掉了。

过了两三天，特地从镇上请来的和尚在小学校布道。这一带的地主为了增进庄稼人的道德修养，一年必然举办两次这种宣讲。上岁数的庄稼人巴望着听，还感谢肯做这种事情的地主。地主让年轻姑娘也“务必”参加。因此，小伙子们有时也给拉去了。

到了那一天，干了几十年庄稼活儿，象包袱皮一样皱皱巴巴、犹如生了锈的弯钉子的老人，一早就互相吆喝着出发了。连出屋子去解个手都不方便的老太婆，也被认为非去不可，于是她们就由七八岁的小女孩或十七八的大姑娘搀着。人们身穿与黧

黑的面孔不相称的、以红为主的漂亮衣服，在田间小道上走着。

源吉妈自从居了孀，没缺席过一回。每次她都想把女儿阿文也带去，可阿文就是不理这一套。做妈的说：“你这个天打雷劈的。”

学校里的教室把桌椅都搬开了。宣讲快开始的时候就挤满了人。这些聚集一堂的庄稼汉由于经年累月的艰苦劳动全成了残废——个个都是畸形的。那些上了年纪的，宛如从土里爬出来的癞蛤蟆，尽管住在同一个地方，彼此见面的机会却不多。大家好久不见了，就东拉西扯地闲聊起来。也有拿出烟杆子来抽一袋的。一块儿来的孙男孙女们在淘着气，从老人的驼背上跳过去，吵闹着。教室里热气腾腾，发出那么一股馊味儿。

和尚照例是从离这儿四里来路的村子请来的——那个村子比这个东村齐整一些。他有时就穿着僧袍骑自行车，有时在带篷子的大车里铺个坐垫搭车来。这回因为刚下过雨，他是坐大车来的。和尚四十开外，个子矮矮的，两眼落了坑，眉毛浓重，脑袋光秃秃的。总是用沙哑的嗓门儿大声讲道。他有个毛病，边讲边不断用那双凹陷的眼睛心神不定地四下里滴溜溜打量着——上次来的也是这个和尚。

和尚每说一句话，村子里的老百姓就念一声“阿弥陀佛”，同时还用满是皴裂、皮肤粗糙的厚厚的手掌掂着念珠。

“什么都是如来佛的旨意——什么都是如来佛的旨意。不要忘记，明白吗？”

“……‘决不可怨天尤人。’——这是如来佛说的。一切都是如来佛的旨意。凡是在现世——在尘世上受苦受难的人，只有到了如来佛身旁，才能享受极乐。到了来世，就能端端正正坐在莲花上，打心里念‘南无阿弥陀佛’了。对什么事都不可怨天尤

人呀。”

和尚用熟稔的腔调这么说着。这一套，庄稼人过去已经听过好多遍了。可是不管听多少遍，他们总觉得很有道理。他们就仍象头一次听到似的低下头去，反复念诵“南无阿弥陀佛”。

上了年纪的庄稼人回顾一下自己那历尽艰辛的漫长生涯。当他们弄明白自己的确不曾怨天尤人后，就如释重负。他们曾忍受过痛苦，快要熬到下辈子了，那时就能到如来佛跟前了。老人们满脑子都是这样一些念头。他们想：尘世间的事，样样都得忍受。和尚又举出如来佛苦难修行的事例，来比喻庄稼人受苦的一生。这使庄稼人由衷地感动。

和尚讲完道之后，就在最虔诚的人家里过夜，然后挨门挨户去讲道。有老人的庄稼户，布袜子破了对付着不去添置，也要请和尚。他们认为要是不这么做，说不定“下辈子”就要遭殃了。这是比什么都可怕的事——庄稼人多年来一直被迫干活儿，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如果死后还得干活儿，可怎么得了！这一辈子，每个庄稼人都不得不过分地操劳。他们简直腻味透了。谁不想逃离这种世道呢。对庄稼人来说，这档子事比布袜子啦、黄酱啦都重要得多。尽管没有明确的概念，庄稼人心里却总怀着盼“下辈子”的念头。

和尚要来的日子，源吉妈从早晨起就在厨房里做吃的，和尚到了就端出来。

冷天一到，源吉妈就闹腰疼，脚脖子疼。多年来过度的劳累，使她的身子骨逐渐吃不消了。妈老是逼着由儿替她揉肩揉腰。和尚象煞有介事地念念有词，装模作样地念着经，喳喳喳喳地捻着念珠，又用它来搓搓阿关的肩膀，碰碰腰什么的。哪一家庄稼户都是这样。尽管看上去挺壮实，一到晚上，几乎个个都

腰酸肩疼，睡不着觉。因此，和尚只要一家家地兜个圈子，单这一项就能捞着不少钱。

和尚呆上两天，每户都转完之后，怀里揣上不少钱就回去了。

源吉打地里回来的时候，遇见了和尚。和尚宛如狡猾的商人一般向他寒暄了一下，但是他气鼓鼓地没有吭声。再走一会儿，就碰见了校长。

小学校长有三十七八岁，总是板着面孔，不大讨人喜欢。他既是校长，又是老师兼勤杂工。教室只有一间，里边排列着二十来张桌子。一年级到六年级的男女生都在一起。教室里既挂着地图，又摆着装有博物标本的柜子（里面有一只鸟的标本），靠近角落还有一架白色键盘已经剥落了的钢琴。校长最讨厌和尚了。谁也不知道这位校长是怎样到这个村子来的。尽管他绷着脸，不招人喜欢，据说却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因而备受尊重。也有人说，他是因为在城市的小学里跟校长闹翻了才到这种地方来的。教室对面，隔着走廊就是他的房间，里面堆满了书籍。

源吉对他说：“秃瓢回去啦。”他轻蔑地撇撇嘴说：“是吗？应该把他扔到粪坑里去。他每到村儿里来一趟，老乡们就越发变蠢，麻木不仁了。——畜生！”

庄上的庙会恰巧赶上了这一阵子好天气。

这种事儿照例是由入升^①的阿菊和丸山的主顾带头办的。他们在神社前面竖起又窄又长的大旗，上面写着“奉纳”二字，在孩子们的帮助下，凑合着搭起一座舞台。就有身穿簇新的号

① 日本旧式商店，常用一个图案做标记。这里的入升原文是“入”，“入”代表“入”，“𠂔”代表“桥”（即“升”）。

衣①、单把前面的头发留长一些、抹上了油的人，骑着自行车一会儿借来幔帐，一会儿又从有车站的镇子运来形形色色的道具什么的，东拼西凑的，总算有个庙会的样子了。四五个穿新衣服的孩子一早就在张罗着的小伙子旁边玩着。神社坐落在学校旁边的野地里，三面都是稀稀落落的杂木林。一到晚间，卖气球的商人就会背着打成包的商品前来，唱“法界调”②的那帮人也照例从有车站的镇子前来，在这个舞台上唱“安来调”③，还跳舞什么的。

为了逛庙会，阿文和妈做了些好吃的。她们一向认为庄稼人日子过得不论多么紧，也得这么做。

源吉躺在架着柴禾烧的大炉子旁边，用脚逗由儿玩。“嘿！”由儿紧紧抱住源吉的脚，一下就给绊倒了。

由儿不服输，脚底下使足了劲，扑过来；越扑就越乖乖地一骨碌给绊倒了。

“加油！”

“见鬼！哥哥，我咬你的脚啦！”

“傻瓜。”

妈从半明半暗的厨房里嚷道：“由儿，逛庙会去吧！”

源吉用脚逗着由儿，越来越松劲儿了。这样一来，由儿快赢了，就越发鼓起了劲头。源吉回忆起去年的庙会，就在那个夜晚，自己的意中人阿芳竟不辞而别，到札幌去了。打那以来，源吉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

① 日本旧式工匠穿的一种在领子上和背后印出姓名、店名的一种外褂。

② 十九世纪末流行的一种日本民谣，唱者头戴斗笠、身穿白色裙裤，边唱边拉着四弦琴。

③ 二十世纪初流行的日本民歌，发源于岛根县安来町，故名。

“呀——哥哥输啦，输啦！”

由儿终于把源吉的脚按在铺席上了。

源吉突然醒悟过来，回了他一脚；不料，用力过猛，由儿吃不住劲儿，栽了个跟头，脑袋撞在堆在炉边的柴禾上。由儿可着嗓门大声嚎了起来：“哥哥讹人！哥哥讹人！”

源吉苦笑着，用大手掌替由儿揉揉脑袋：“好硬的瓢儿。是这儿疼吗？——你听着，我给你念咒：吩咤啡啡啡唏咳啦妙之大明神。”

源吉反复念了好几遍，使劲揉着由儿的脑袋。由儿起初还老老实实呆着，一旦知道了哥哥是在耍把戏哪，就又哇哇大哭起来。源吉一把抓住由儿的头，摇晃着：“别哭啦！”

“瞧你这么大一个人，跟小孩子家闹腾个没完！”妈嚷道。

“哥哥，给钱，给钱。”由儿这会子这么说了。“给钱就成，给钱就成。”

“去你的，小滑头——拿到钱就好了吗？”

“给钱，给钱。”由儿兴头起来，跺着脚说。“哼，阿胜家的健儿拿到了一角钱呢。石儿也一样。——喏，哥哥，给钱，给钱，给我钱呀！”

源吉这回根本没去听由儿在说什么，他在闷着头儿想心事。他回忆起，当他听说阿芳到了札幌时，说实在的，从另外一个意义上也感到了“寂寞”。他想道：由于在村子里简直无法活下去，姑娘们只好进城去当佣人或是女工，连应该干庄稼活儿的男人也出去了。村子里人越来越少了。源吉心里很不是滋味。

“给钱，钱呀！”

由儿摇起源吉的身子来了。源吉不声不响地抽冷子一闪身，由儿一下子就摔倒了。这样一来，他哭得更凶了。

“吵吧，闹吧，脓包！”妈再也憋不住了，又嚷起来。

源吉不知怎地，只觉得心里一个劲儿地直冒火。

外面有两个孩子来喊由儿。

“喂，由儿，喊你哪。”

由儿一下子止住了哭声，用袖子把脸一抹，做出一副怪不好意思的笑脸出去了。

源吉仰卧着，呆望那被烟熏得黑亮黑亮的顶棚，寻思：今晚不去了。

到了傍晚，七八个人吵吵嚷嚷地从门外走过去了。他们是从有车站的镇子来的那伙跳舞的。背着鼓鼓囊囊的深蓝色大包袱、戴着有色眼镜的男人，脸上抹着粉、颧骨高耸的瘦男人，肩上吊着三弦、也戴有色眼镜的女人，厚厚地涂着粉的十七八岁的姑娘，还有约莫三个七八岁的女孩子。四五个庄上的孩子跟在后面。

源吉躺在那里发怔。阿文对着一面后边涂的水银已经剥落的镜子，挨着他坐着。她把不知从哪儿弄来的一只香粉瓶倒过来朝手心上甩，然后抹在脸上。从刚才起，源吉跟谁也没说过一句话。

“这回不知道跳什么舞？”阿文目不转睛地盯着镜子问道。

源吉兴许没听见，没有吭声。阿文并不指望得到源吉的答复。她嘴里喃喃地说着什么，却全神贯注在镜子上。她没期望听到回答，所以也就不曾理会源吉的动静。

“石田家的阿录说是要唱‘浪花调’^①哩……”阿文说。

“阿录的‘浪花调’不知咋样？一定挺可笑的。”过了一会儿，她又说。“妈到哪儿去了呢？——”

① 日本的一种以三弦伴奏的民间说唱歌曲，类似我国鼓词。

源吉依然净看着顶棚。他跷起二郎腿，不时心不在焉地把脚趾尖扭动一下。

“我还想去逛庙会哪，可妈怎么回事呢？——真是的。”阿文嘴里这么说，还是盯着镜子。“哥哥，去逛庙会吗？”

源吉慢条斯理地掉过头来看阿文。阿文把脸伸得几乎贴着镜子，嘴巴歪成一副怪相，拚命想挤破长在鼻子旁边的什么玩意儿。源吉把头转过去，依旧默不作声。

“真糟糕。”这回阿文又用手巾揩起脸来了。“我打算邀阿春一道去，可妈要是不在家，就出不去啊。——哥哥，去逛庙会吗？”

阿文这才把脸从镜子前边挪开，看着源吉说。他们家好久才烧一次洗澡水，阿文刚刚在后院洗过澡，脸上白净光滑了。阿文被源吉瞥了一眼，就微微羞红了脸，忸忸怩怩地问道：“咋办？”

源吉又掉过头去，这才象是朝别的方向说话似的，答了声，“去吧。”

阿文到后头去，换上衣服就出门去了。

“哼，畜生！”

源吉站了起来。但他自己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他隔着窗户朝外面望了望。屋里亮，外头一团漆黑，什么也看不见。源吉到厨房去，喝了两碗凉水。他回到炉边，拿不定主意是坐下好呢，还是干什么好。他在那儿茫然伫立了片刻。四下里万籁俱寂，油灯忽而亮起来，忽而又象被刮到什么地方去了似的暗淡了。挨着后门的马棚里的马都静悄悄的，既没甩尾巴，也没用蹄子叩地。这里离逛庙会的地方相当远，所以什么也听不见。源吉略感到莫名其妙的焦躁。有人从外面走了过去，不知在说些什么，起初源吉没有听清楚。

“瞧，星星飞过去了。”

“那儿有个窟窿哩。”

“那颗星星崩得粉碎，掉下来啦。——听说有时候还轰隆一声呢。”

对方不知回答了些什么。这当儿又传来十一二岁的孩子撒娇般地噘着嘴说话的声音：“要不快点去，舞就跳完了啊。”

“哎——催啥呀！”

“妈，迟到了哩！”

听那声音，都快哭出来了。

声音越来越远，一忽儿就听不见了，又恢复了寂静。

源吉发觉连自己呼吸的声音都听得见，这种奇怪的静谧使他感到畏惧。他想坐下来。这时偶然瞥见从化妆镜下面的小抽屉里露出半截信。他心想：大概是阿芳写来的吧。

信的大意是这样：

“想到我当时的景况，你渴望到札幌来，也是情有可愿……

“此地的生活却跟我原来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为了不使你失望才那么说的，请原谅。——说实在的，象这样讨厌的日子，有我一个人过，也就尽够了。

“当然，在此地，用不着象咱们那里那样整年肮里肮脏地拚命干活……另一方面，却有许许多多咱们那里怎样也不会知道的‘可怕的事情’……

“总之，要是你打定主意非来不可，我也没办法，只好等着你……我跟老板也谈了，他说人手不够，你来正好。”

最后加上一句：“请务必向源大哥问好。”

源吉呆呆地又把它从头读了一遍。——“请务必向源大哥问好。”读罢，手里拿着信，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妈回来了：“由儿他哥，干吗哪？去，逛逛庙会去。——俺刚

才碰见阿文啦。”

源吉没有回答。他把信放回原地就出去了。妈在堂屋地上一连擤了好几把鼻涕，朝着源吉的背影说：“等散了，可把由儿带回来！”

源吉一到外边，迎面袭来一股冷气。天高气爽，繁星点点。他无心去逛庙会，但在家里也呆不住。走了一段路，左边出现了一排延续十来米的高大的树。从树与树之间可以望见石狩河的河面近在咫尺。天上虽然有星光，周围却黑得厉害，只有河面发出暗蓝色的光，清晰地衬托出跟前黑魑魑的树干。他定睛一看，河面上映出无数颗星星。空气凉飕飕的，他打了好几个冷战。每逢举办庙会，年轻的男男女女就都不到神社前面，却在这个堤岸上聚会。源吉想到他跟阿芳在这里幽会过好几回，就厌恶地朝着河啐了唾沫。

道路打了个弯，拐过去，远远的前方露出庙会的灯光。从这里也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灯光照亮的部分。忽然人声鼎沸，还听到在打鼓，一阵阵夹杂着气球破裂的响声和笛音。半路上，一个老人站在自己住的农舍跟前，在看热闹。他在黑暗中向源吉打招呼道：“晚上好。”

源吉也回了一句：“晚上好！”

“逛去吗？”

“哦——”

源吉走过去后，他又说了声：“走好。”

庙会的舞台上点着十来盏灯，前面铺着粗席子。村民们坐在那儿看演出。主要是姑娘、孩子和老人。周围几乎笼罩在黑暗中，后边的道路两侧，排列着四个点着灯的卖气球的摊子。卖棉花糖的不断用脚踩着机器，把糖裹在木筷子上，伸到孩子跟

前，不知在唠叨些什么。

每个摊子前面都站着两三个孩子。神社后院有一个摔跤场，小伙子们在摔跤。源吉对什么都没兴趣。他双手叉在腰带上，离得远远地看着。舞台上有人在跳舞，一跺脚，板子就咯吱咯吱响。这种跳法只不过是节奏地晃动着手脚罢了。因为离得远，脸和服装都看不出毛病，源吉觉得在灯光映照下跳得挺好看。跳舞的女人偶尔喊道：“嗨！——嗨！”或是齐声插进一句歌：“俺可不知道——哇！”

源吉心里烦躁起来，看了一会儿就觉得无聊了。他从气球摊子后边走过，想穿到神社后院的摔跤场去。听到为摔跤伴奏的打鼓声。可是半路上他改了主意，又折回来，走出了神社。

四

又下起雨来了。天气渐渐变得阴暗了。寒云低垂，雨雪交加。大伙儿想，这下子冬天可真的要来了。早晨起来一看，积了水的沟里面结了一层冰。

庄稼人做好过冬的准备后，就钻进茅屋，在堂屋铺上席子，搓绳子，编草鞋。庄稼人整年弯着腰趴在地上干活儿，可还混不上吃喝。姑娘们背着豆子和其他庄稼，到有车站的镇子去卖。庄稼人种了各式各样的东西，自己也不知道是给谁种的，可是一半以上都一古脑儿给拿走了。佃户要给地主交租，自耕农要给拓殖银行^①交年息，这一项就够可以的了；此外还有肥料店和农

^① 北海道拓殖银行的简称。在日本明治年间，北海道处于刚刚开发状态时，日本政府为加快开发速度而创设的银行。

具店的账。庄稼人种水稻、豆类、玉米、茄子，可他们自己每天只能吃上干菜叶和白薯，别的吃不起。遇上吃米饭的时候，他们也舍不得净吃大米，就在米里兑上好几倍水，煮成糊糊，搀上白薯和豆子来吃。

夏天，庄稼人摘了老倭瓜就晾在房檐底下，一冬天都靠它糊口。因为天天接连吃老倭瓜，他们每个人的脸、手掌和脚就全黄了，连眼白都挂上了黄丝。

快入冬的时候，家里的老人就得补那些穿了一整年、已经破烂不堪的布袜子，打上好几个补钉，又凑合一冬。衬衣、汗衫、腰布都是这样。源吉妈从壁橱里拽出各种各样的破烂，在炉边堆积如山，把只剩下一个镜片的眼镜用线挂在耳朵上，就着灯光缝缝补补。

从秋收到入冬这段时间，好些个行商都指望从庄稼人身上赚些钱，一天几次找上门来。有时候叫花子也带着玩具一般的家什前来。然而庄稼人想到漫长的冬季眼看就要来了，连一片布也不敢轻易买。越中富山^①的卖药的也背着有许多小抽屉的桐木药箱来了。他们把药味扑鼻、画着马的广告单送给孩子们，这家人怎么说不要，他也坐在台阶上不动，然后撂下药袋就走。由儿把画着马的广告单珍藏起来，一有空就描摹。

庄稼人好歹套上车，到有车站的镇子去，买回黄酱、酱油和旁的日用品。这程子，车站前面山货店旁边的电线杆上，拴着好几辆庄稼人的大车。多半是客马^②拉车。偶尔经过一匹儿马^③，那客马就嘶叫着乱扑腾。这当儿就有个醉得满脸通红的

① 日本幕府时期的地名，明治维新后改为富山县。

② 客马即母马。

③ 儿马即公马。

庄稼人从山货店里跑出来，把客马拉到一边去。山货店进门地方摆着两三把椅子，庄稼人把冷酒倒在喝冰水用的杯子里，撕开鱼干，就着它呷起来。

有的庄稼人在这儿喝得烂醉，嘴里嘟囔着：“不管咋醉，那家伙见我也得发憊。”店里小伙计搀扶着这人，把他跟黄酱啦、酱油桶一道，象货物一样装上了车。被装上车后，醉汉还唱着年轻时候学会的歌儿，兴头正浓。马就自动地沿着来路把车拉了回去。

源吉可能是因为好久没喝酒，呷上两三碗就酩酊大醉了。他摇晃着魁梧的身子，象孩子似的比比划划地跳舞，又眯起眼睛怪声怪气地笑着，唠叨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八点来钟，源吉离开山货店，走到那匹拴在店旁的马跟前，跌跌撞撞地抓住马脖子，把身子靠着它，一边抚摸马脸，一边喃喃地自言自语，身体一直晃晃悠悠的。他离开马，伫立了片刻，随后就脚步蹒跚地走起来。街上已经没有行人了。他把双手斜揣在怀里，象喝醉酒以后常见的那样浑身发颤，边走边兀自嘟囔着。

“不管怎么干活儿，又能干出个啥名堂来呢？脓包。”他反复说着这句话。不一会儿就来到一家屋簷低矮的小面馆跟前。源吉咕咚一声撞在面馆门口的柱子上。他干脆倚着柱子，连眼睛也不睁，问道：“是谁？畜生，是谁？”有个擦了粉的女人在里面说：“大哥，坐一会儿吧。进来喝一杯。”说罢就走出来了：“哎呀，好快活。”

源吉把自己的脸凑到那个女人的脸跟前，强睁开惺忪的醉眼，望了望女人：“这娘儿们长得满俊哩。”

“喏，进来吧，暖暖身子……”

源吉脚步蹒跚地走进了小面馆。

源吉的马耷拉着长长的脖子，在山货店前面一直拴到第二天早晨。

*

*

*

漫长的秋夜，庄稼人把油灯放在堂屋，撙着稻草，编着草绳，回顾起自己走过来的一生。庄稼人就是这样打发秋夜的。他们低声哼小调来着，忽然不哼了，不知不觉忆起往事来了。

在内地那阵子，他们只吃得起白薯。地里结的东西不值钱，肥料和农具可贵一倍。租子欠多了，地主就扣押青苗，把地收回去。庄稼人寻思：要是到北海道去就好了。他们被迫背井离乡，满怀热望，到“有狗熊出没的”北海道来了。他们渡过津轻海峡，直奔北方。一家大小背着行李，在北海道那连月台也没有、极不象样子的露天车站上下了车，沿着漫无边际的雪道走了好几里——走到哪儿都是雪，到处都是一片平漠。风几乎连指头和脸上的皮肤都给刮掉了。等安顿下来一看，到处都插着橛子。能够弄到手的土地，连食盒的盖子那么一丁点儿也没剩下来。即便偶尔“弄到”便宜的土地，也没有本钱耕种，结果只好借款来种。过了两三年，荒地好不容易鼓捣熟了，却又抵了债，什么也捞不着——这里的日子也不好过。

“老家不知道咋样了？”

即使在北海道住上二三十年，这些庄稼人对内地也还是念念不忘。他们暗自想着，死也要死在内地的村子里，即使过去那里并没给过自己什么好处。他们时时刻刻都渴望着迟早要回老家去。他们在干活儿的间隙偶尔一开口，准会说：“老家不知道咋样了？”说也奇怪，每逢庄稼人勾起内地的回忆，总是伴随着一

种特殊的魅力，把它想象成又美好又快乐的所在。豆腐店的某人怎么啦，钩鳞^①的老金是不是还活着啦，角地的姑娘招了女婿啦，石店的老板到桦太去了什么的……他们把过去的自己跟这些片段回忆连结在一起，慢悠悠地谈论着。

这些庄稼人当初离开“老家”的时候，是想到北海道去大干一场，挣一大笔钱，回老家舒舒服服过日子。谁都是这么想的，源吉爹也不例外。然而没有一个庄稼人办到了这一点。闹了归齐，跟以前在内地没什么两样。可是他们完全不想弄明白这一点。说真的，他们“明明晓得”在现实生活里这终究是没有希望的，可心里的什么地方总是蒙蒙胧胧地想着要挣了钱回内地去。北海道的庄稼人都安然地这么想着。

偶尔遇到有人到内地去一个月（这是很难得的，除非是谁的家属生了急病，才兼程去探望），同乡就都聚到他家，托他给自己的亲戚捎个口信啦，带点东西什么的。还嘱咐他给打听一下村子里的情况。

据说源吉的爹妈乍一到北海道，在雪封的旷野当中走着的那次（源吉当时背在爹的背上），快进现在这个村子的时候，曾看到路旁立着一根木桩子。天擦黑了，木桩子在广阔无垠的野地里孤零零地立着。爹只当是路标，就在它跟前蹲下来，扒开雪，好看看还有几里路。只见上面写着：“××××死于此地，原籍越后国^②某郡某村。”爹把这事讲给妈听了，他俩顿时感到孤苦凄凉，浑身发冷。这档子事，源吉听爹妈念叨过好多次，他们还说：“不管怎样，也不愿落这么个下场啊。”

① 日本旧式商店，常用一个图案做标记。这里的钩鳞，原文是“𠄎”，“𠄎”代表钩，“△”代表鳞。

② 日本幕府时期的地名，明治维新后改为新潟县。

庄稼人就这样总是跟“故乡”的土地连结在一起。

农村逐渐进入了晚秋。

一到快入冬的时候，源吉妈就犯腰疼。她一边在堂屋地上搓草绳，一边叫由儿给她按摩腰背。由儿不愿意，想开溜，她就说：“给你一分钱。”由儿还不来，她又说：“那就给两分。”

由儿来到妈背后，按摩了两三下肩膀，马上就说：“拿钱来！”

“你这叫花子！”

“不是给你揉过了吗？”

“再揉一揉。”

“讹人，讹人！”

“傻瓜，妈说成了，才算数哪。”

“讹人，讹人，讹人！”

“脓包！”

娘儿俩认起真来了。

妈自己按摩着疼痛不已的腰，忽然说道：“喏，源儿——今年冬天，俺想回老家去一趟哩——源儿呀。”于是神色阴郁地看了看源吉。

五

打从庙会的晚上阿文逃到札幌去了，源吉妈不免显得衰老了。干着干着活儿，她总是抽冷子念叨起阿文来，随后就自言自语地咕哝个没完。妈一提起这个碴儿，源吉就一声不响地站起身，走出房门。

那是秋天一个宁静的深夜。从房后流过去的河上，不时有

鸟儿在啼叫。源吉和妈把油灯摺得低低的，在堂屋地上铺上席子，编起草鞋来。

源吉觉得好象有人在外面叫门，就尖起耳朵去听，并应了一声：“哎！”

“是我。”校长用身子扒开东倒西歪的门，进来说。“我太闷了，找你们聊聊。”

由儿没脱衣服就在炉边胡乱睡下了。油灯给拿到堂屋里去了，所以炉边暗得看不见。

“阿文呢？”校长猛孤丁地问了这么一句。

妈照例把说了多少遍的话重新讲给校长先生听。源吉没有吱声。

“为啥不把她领回来？”

“不管俺咋说，源也不干。他不想去——兴许是害怕札幌那地方。”

“源吉，咋的？”

“不行。”源吉说。“就是领回来，她也还是会去的。”

“你听他说的。”妈带着无可奈何的神色看了看校长的脸。

于是校长谈起他在札幌时的事儿来。他是这么说的：——一旦尝到了城里的甜头，在乡下简直就再也呆不下去了。有电话，不管离得多么远，立时就能跟对方说话。有好多辆汽车，还有电车。女人什么时候都象洋娃娃似的漂漂亮亮地扑着香粉，穿起长袖子的和服走着。每天都演电影，也可以看戏，还有音乐会啦，公园什么的。

——男人也打扮得跟外国电影里的人们一模一样，脚上穿着擦得锃亮的皮鞋，橐橐地走在街上。

“可了不起。”妈露出一副惊讶的样子。

“庄稼人咋样呢？”校长顿了一下。“一年到头埋在粪堆里，弄得黑不溜秋的，是男是女都分不清了。这一带的女人手上的皮呀，简直跟振布一样！起早贪黑还不算，深更半夜也得干。——就这么着，要是能剩下一大笔钱，倒也罢了。你说呢，大娘？”校长怪笑了一声。“城里的阔人，只要在漂亮的大楼里随便做一点体面、上等的工作，就打发了一天，挣下好多钱。太不象话啦。”接着问源吉：“咋样？”

源吉没有吱声。

“敢情！”妈钦佩地说。“城里的大老爷嘛，那还用说！”

“源吉，你懂得这个道理吗？”

“……”

源吉瞥了瞥校长的脸，什么也没回答。他含上一口水，喷到稻草上，随后就用木槌敲打。校长抽着烟，沉默了半晌工夫，又象忽然想起来似的说：“哦，阿胜进了苗穗的铁道工厂，你听说了吗？”

这话一下子引起了源吉的注意：“真的吗？到底还是进了，本来就是那么回事呗。”

“阿胜家的人说，他有得苦吃哩。”

“阿胜那家伙，阿文就是他挑唆的！”妈气冲冲地说。

“喏，源吉，庄稼人一个人干活，不但能养活自己一家人，还能让地主过上奢侈透顶的日子，靠地主过活的那些家伙也是分享庄稼人给他们的恩惠，真了不起呀。只有农民和工人才能够随意决定是不是叫人活下去。这话挺有意思吧。”轻易不露笑脸的校长，笑逐颜开了。接着半真半假地说：“真了不起。这么说来，世界上最伟大的就是农民和工人喽，哈哈哈哈哈。可是呀，源吉，就数这些农民工穷，最脏，最让人看不起，活儿干得最

多，多么荒唐呀！”

校长这个腔调把源吉引逗得不禁也笑了。妈泛出一副半懂不懂的神情。

“想到这些，就觉得挺有趣儿的。六月里地主不是把大家伙儿召集在一起，胡诌了一通吗？他说什么：你们受穷是因为自己的罪孽，穷神是附不到勤快人身上的。你们大伙儿还点头称是呢。——可是地主无非是借此让庄稼人拚命干活儿，然后把油水都乖乖巧巧地榨光了，多有趣儿呀。怪就怪在谁都不知道自己上了地主的当，总觉得还没干够，还没干够，拚死拚活地干。地主那家伙在背后把舌头伸得老长，兴高采烈哪！以前庄稼人也是清早四五点钟起来，一直干到晚上七八点钟；还只顾催逼着干，要是起得更早，收工更晚，象拉大车的马那样干，不出三天庄稼人就得累垮啦。哪有象庄稼人这样黑间白日不停地干活儿的呢？——什么干得不够才受穷，纯粹是胡说八道！”

“大先生，您扯到哪里去啦？”妈惊慌地说。

“好，你们娘儿俩也多卖些力气吧。越干，地主那粮仓里的米袋就堆得越高，你们的肚子里就越没得吃的。”校长爽朗地笑道。

源吉象是被推得栽了一跤似的，尴尬地绷着脸，时而停下手里的木槌。

“我一向纳闷的是，大伙儿这么穷，为啥谁都不知道自己受穷的原因？源吉，你听着：地主编出了那么一套；和尚呢，拿了地主不少钱，就说啥都是如来佛的旨意。庄稼人本来就不明白，听了他们的，脑袋瓜儿越发成了糊涂浆子啦。顺着藤儿一摸，就啥都清楚啦。说不定太清楚了，庄稼人不知道咋办才好，反倒为难吧。”校长说到这里又笑了，喃喃地加上一句：“嗯，为难呀。怕为难……就装作不知道。”

校长看了看源吉，似乎在等待他能有所答复。可是源吉还是板着面孔，双眉紧蹙。

“哎呀呀，大先生。您这话要是给地主老爷听见了，可就闯大乱子啦。”源吉妈说。

校长沉默了片刻，把话碴儿转了。睡在炉边的由儿象是被什么惊吓了似地跳了起来，站着发呆。大家都朝他望去。

“由儿，睡胡涂了咋的！”

由儿两眼滴溜溜地瞅瞅周围，一个劲儿摇晃着身子。他身上长了虱子。

“瞧，校长先生来了。”

由儿看到校长先生，就鞠了个躬。随后就一声不响地在炉边坐下来，膝盖顶着下巴，蜷作一团睡着了。

“给梦魇住了。”

过一会儿，校长先生搔着光头告辞了。他拉开房门，说声：“唔，好冷！”就把手揣到和服袖子里。关上门以后，听见他在房屋旁边解手的声音。

“晚上好！”有人打了声招呼，走过去了。

校长一边解手，一边照例嘎声说：“啊，晚上好！”

干完了活儿，妈把削好皮的土豆放在一口大锅里白煮。煮熟以后，捞到箩筐里，撒上盐，娘儿俩坐在炉边吃。这么一煮，香喷喷的土豆上面就“挂了一层霜”。妈盘腿坐在源吉对面，娘儿俩呼呼地吹着热腾腾的土豆，大口大口地吃着。过一会儿，妈打起盹儿来，往嘴里送土豆的手不听使唤了……那手刚一耷拉，妈又醒过来，好歹把土豆送到嘴里，可是嚼着嚼着……又顾不上咽了，含着满嘴土豆就打起瞌睡来。

添在炉子里的柴禾一阵阵噼噼啪啪蹿起火星儿。这个声音

使妈时而稍稍醒过来。源吉默默地吃土豆。他好象在想什么心事，只是机械地吧嗒着嘴。

挂钟缓缓地打了四下。妈吓了一跳，这回真正清醒过来了。于是把蜷缩作一团睡着的由儿摇醒了。由儿睁开眼睛，不高兴地扭着身子。

“瞧，校长先生！”

由儿大吃一惊，朝四下里望望。

“扯谎，扯谎！——扯谎！……”由儿终于认真哭起来了。

“这小子，快点儿到外面去撒泡尿。”

由儿怎么也不肯起来，催了三四遍，才走到门边，把门拉开一道缝，伸出小鸡头，哗哗地把尿撒到外面去。

“又不肯出去。瞧你这坏毛病。——撒完尿，臊死啦！——又不是小娃娃家。你等着瞧吧，呆会儿让你哥哥狠揍你一顿！”

“外边，我害怕。又冷。”由儿带着哭声说。

“好，好，就那样撒吧！”

妈铺开三副被窝，边铺边说：“喂，源儿，校长先生准是那个——没错儿。他说的话多可怕。你可别当真听他的。嗯？”

源吉吃够了土豆，就拿起火筷子凝视着炉火，用火筷子忽而把烧成炭的柴禾摆成各种样子，忽而又扒开来，鼓捣了好一会儿。

由儿和妈睡下了。

源吉把炉边的柴禾添进炉子里。他象一座烟熏火燎的青铜像一样坐在那儿，直到一炉旺火着完。灯里的煤油也光了，灯焰逐渐细微下来。

“源，还没睡哪。可惜了儿的柴禾……快睡吧。”

妈醒了，从枕头上略抬起脑袋，看着这边说。源吉发觉炉火

已奄奄一息，自己身上也冷起来了，他就嗯了一声，站起身来。

后窗上映出了源吉巨大的身影。他听见妈在喃喃地念诵着：“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六

漫长的冬天来到了。庄稼人必须把当年的歉收找补上。

源吉跟村里的五六个人约好，只要一下雪就进朝里山深处去打零工，剥菩提树皮。到二月底这个活儿就干完了，再到余市的渔场去打鲱鱼，然后大约在四月底回村。庄稼人差不多都是这么干的。——这样才能勉强糊口。

一连好多天，风雪交加。这些日子，庄稼人一步也出不了屋。扒着窗户往外瞧，一片银白，什么也看不见。有时候连房子都忽悠忽悠直摇撼。雪好不容易住了，一开门，堆积在门口的雪一下子就坍到屋里来。

雪后的石狩平原，四外一望，一片白茫茫，越发无边无际。农舍埋在雪里，稀稀落落地只露着屋顶。平时觉得很远的邻居，如今看上去清清楚楚，显得那么近，仿佛打个招呼都能听见似的。天空上残留着暴风雪的余威，低垂的乌云密布，与银白的大地汇合在地平线上。那边一片昏黑，大雪好象下得正紧。一阵阵的风呼啸着，扬起如烟似雾的雪花，打着旋儿从远处卷过来。旋风忽而在一个地方滴溜溜地转，一眨眼的工夫飞快地卷走了，一下子又转了向。风把雪刮到房屋拐角的地方，积起了一大堆。

寒气一重，更深人静的时候，屋子里就会有一种嘎啦嘎啦的响声，宛如什么东西裂开了似的。年迈的庄稼人马上就觉得腰

酸背痛，不能动弹了。

传来了一阵阵马铃声。那是被堵在家里断了粮的庄稼人到有车站的镇子去买东西的。清脆的铃声在仿佛凝冻了的空气里萦回了好半天，一直到走得老远还听得见。只见那雪橇在茫茫的雪原上弯弯曲曲地一溜烟疾驰而去。

雪已下了十来天，庄稼人渐渐盘算起怎么过冬来了。庄稼人见了雪，马上就转起这些念头来。即使揭不开锅了，也不能去动给地主的租粮，到镇上去买吧，钱又没了。庄稼人一见面就念叨起各自的日子，说总得想个办法才是。大伙儿都发愁，不知不觉地这些话就传开了。

阿胜爹到对岸的村子里去办事回来，见到源吉，说对岸也在议论这些事。石狩河上了冻，可以随便走到对岸去。由于交不起学费，小学生去上学的骤然减少，庄稼人说，还能花钱去让他们整天玩吗？

哪家的孩子都无精打采，有气无力地歪坐在炉边发怔。婴儿呢，肚皮象装满了沙子的口袋一样胀得鼓鼓的，一个劲儿哇哇地哭。就连还不懂事的婴儿也成天愁眉苦脸，唯独脑袋大得出奇，脖子直不起来，身子朝哪边一歪，脑袋就咕咚一下朝哪边耷拉过去。入冬以前，庄稼人在房檐底下挂起干菜；如今就拿它来熬酱汤，简直就跟清水没有两样。一连四五天——三顿饭都这么对付。此外就是老倭瓜和土豆。米饭呢，每天大概只能吃上一顿。干菜酱汤越吃越没味道，嗓子眼儿里直噁心。

庄稼人渐渐认真起来。

事情就在这种情况下开始有了眉目。源吉听说校长先生正在背后活动呢。但是直到村里有个庄稼人被地主逼着退了租以后，大家才突然积极起来。

从河对岸来了个小伙子，说要是让他们也参加进来，就更好对付地主了。于是定了个日子，在小学校开一次会，商量怎么办。

那一天风雪交加。旋风乱刮一气，把飘下来的雪花卷得一忽儿跟地面成了平行线，一忽儿从下边倒卷上来，一忽儿又形成斜线。结果，咫尺之间一片银白，什么也看不见了。只要一离开大道，雪就一下子没到膝盖。大衣的每一道缝都钻进了雪花，手背和指尖什么的，都疼得钻心。住得远的，离小学校有小一里地。

每一个庄稼人刚进来的时候都是一身白，恰似从面口袋里钻出来的。他们把两只冻僵的手放在嘴边直哈气，胡子、眉毛、甚至眼睫毛都冻成一根根白冰碴子。没有大衣的庄稼人头上蒙着用线衲过的褂子就来了。有的穿着几十年前当兵时穿过的、已经熏得发黑的土黄色大衣；有的穿着破破烂烂的和服外套；还有穿窄袖子大衣的，什么样的都有。一进教室，因为生着洋炉子，毕竟暖和一些，眉毛、胡子上结的冰碴子就都化成水珠，顺着腮帮子往下淌。

庄稼人个个都好像刚患过感冒，脸上浮肿的厉害，皮肤黧黑，毫无生气；有的弯腰驼背，有的身子骨倒还壮实，可就是说不上哪儿有些不匀称，有的须发乱蓬蓬的，有的脑袋都秃光了，一年到头晒太阳，简直晒成了个红葫芦；形形色色，不一而足。他们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只顾谈着各自的事。也有的老农用厚实的手掌托着烟袋锅里磕出来的烟灰，兀自闷头想心思。还有朝着五六个人指手划脚的，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时间一长，屋子里就满是农民集会常有的那种说不出的汗臭味儿。

在一个角落里，有五六个人鼓起掌来，于是在场的也跟着鼓掌。也有人一声不吭，呆呆地望着。鼓完了掌，有个姓石山的庄稼人走上了讲台。他是校长先生的亲戚，有二十五六岁，身材魁梧，眉毛浓浓的，一脸连鬓胡子茬。

“我代表大家说几句！”石山这样开了场。他口齿清楚，说话有条有理，这在庄稼人是很难得的（当然，他也使用了一些庄稼人表示郑重的时候常用的蹩脚汉语）。他接着说：“咱们从来也没偷过懒，可是咱们过的日子，连猪狗都不如。这是为啥呢？”于是他浅鲜易懂地向大家说明，庄稼人不管怎样死命地干呀，干呀，可还是穷得什么也混不上，实际上这都是地主造成的。最后又说：“象现在这样，还给地主交租，就意味着‘咱们自己要饿死’。此外，咱们这些种地的还受高利贷的盘剥，拓殖银行也来逼债，让咱们吃尽了苦头。饶着这样，又得上税！地里的收成，还不够买肥料和添置农具的。咱们已经被逼到这个地步，还能再闷声不响吗？所以决定把大伙儿请来，商量出一个主意。”说完就下了台。庄稼人每逢遇到没听惯的词儿，就望着石山，仔细琢磨着。石山指出了庄稼人的生活实际上有多么苦，庄稼人听了，“恍然大悟”，只觉得他把他们自己的惨状和盘托出，摆在眼前给他们看了似的。石山一下台，大家马上就嘁嘁喳喳起来。会场上到处议论着石山方才讲的那些话。石山下来的时候，听见坐在最前边的一个老农嘟嘟囔囔地说：“可了不得，他咋说这么可怕的话！”

石山下来后，紧接着又有个人走上台去。看上去只有二十一二岁，身体瘦削，留着短短的刘海。他简单干脆地说了几句，那声音意想不到地有力。大意是赞成石山的话，直截了当地提议马上全体签名，向地主“请愿”，要求减租。这个小伙子姓斋

滕，是从部队复员回来的。

接着，又有个喝得酩酊大醉的、四十来岁的庄稼人，刚一上台就比手划脚，醉眼乜斜地望着大伙儿，光说些什么“俺们……”“因此……”“就必须……”“应该……”之类的话。大伙儿全笑了。有人嚷：“把那家伙拉下来！”“下来！”那个庄稼人在台上亮了个相，就东倒西歪地走下台来。他以前参加过跑江湖的戏班子，一喝醉就表演一番旧戏，大家都认识他。

有个年老的庄稼汉上台说了一通。从牙缝里每迸出一个字，都发出噓噓的声音：“刚才听了大伙儿发表的各种议论，都是些‘不忠不义’的话。你们年轻人别忘了地主老爷跟咱们这些人，就象父子一样。冒犯地主老爷，可是万万使不得的。要是把地给你抽了咋办？”这时候后边有人嚷：“老爷子，知道啦！”老头儿说罢下了台，会场上又是一片嘈杂。

直到这时为止，大家都挺齐心，会议进行得很顺利。这个老农一席话却把大伙儿弄得犹如从暗处牵出来的牛，一下子又踌躇不前了。在这方面，庄稼人就跟牛一样。

“简直他妈的混蛋！嗯，畜生！”刚才那个醉汉又跌跌撞撞地上了台。“你瞎说些啥？老糊涂虫！照你那么说，咱们这份穷日子哪天才能熬到头？”

有人说：“对，对！”也有的嚷：“下来！”“可不是嘛！”……

这时候石山又站出来了，说：“咱们该咋办，已经决定下来了。不然的话，明天就没米下锅，咱们就只有死路一条！谁要是觉得咱们这些人简直还不如死了好，就请举起手来！”

嘈杂声安静下来了。石山挺身站了一会儿，又说：“谁也不想死，那末咱们就得活下去。咱们就按咱们的办法干！此外再没有别的路子！”

石山这种斩钉截铁的口气，又把大伙儿的情绪鼓动起来了。

石山把“斋藤方案”提出来，打算进一步讨论。他说：“谁对这档子事有意见，请举手，说一说。”

会场又活跃起来。有的骂地主，然而也有在某一点上拥护地主的，彼此乱哄哄地争论不休。还有人没头没脑地激动起来，舌头也不灵了，说话结结巴巴的。看来庄稼人尽管众口纷纭，但还是闹不清“到底该咋办”。石山就那么站在台上，一声不吭地听大家讲。他看见校长先生在尽后边靠柜壁站着。接着，又发现身材魁梧的源吉抱着胳膊站在不远的窗边。人群里，有个姓片冈的，起劲地打着手势说着。以前地主小姐到这儿来玩的时候，曾经摔进石狩河里，片冈跳下去救起她，自己差点儿送了命。大部分庄稼人却呆呆地张着嘴，入神地听别人挨个儿说。

“谁还有啥想法？”石山拉开嗓门儿问。

于是又安静了一会儿。接着，有个人说：“干脆一点儿也不给地主交租！”

可是，这个意见马上遭到大家反对。庄稼人都认为，这是根本办不到的，也不该那么干。

“那末，大伙儿的意见是减租、请愿吗？”石山问道。

下边又乱哄了一阵子。

“反对这个意见的请举手！”

谁也没有举。

“没有吗？”

稍停了一会儿。

谁也没有举手。

“那么，是同意‘斋藤方案’喽！”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似举不举地举起七八只

手来。

“难道这样就能从根本上解决庄稼人的贫困吗？”不知谁在后边粗声粗气地大喊一声。正赶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大伙儿就一齐回头看——原来是源吉。

“喏，源吉兄，你看咋办？”石山问。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把地从地主手里夺回来！”

全场顿时鸦雀无声了。紧接着，源吉的意见根本没站住脚，却让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给顶回去了。

打那以后，源吉再也没吭声，一直那么抱着胳膊呆着。

章程先定下来了。接着就合计该怎么办。因为两三天之内，地主手下的管家就要跟往年一样上这儿来，大家就决定把情况向他讲清楚，马上和地主办交涉。这时候，又有人提出来，说跟地主谈判期间，租米该怎么办。这又是个比较大的问题，意见很难一致。而且庄稼人不可能预料到事情的一切后果再去把握十足、万无一失地干下去。于是就去征求校长的意见。校长先生认为最好是把各自的粮食一古脑儿卖给镇上的粮商，然后背水一战跟地主打交道。但是只有在两种情形下才能这么办：第一、跟地主的第一次谈判谈崩了；第二、一旦谈崩，估计地主会强行扣押粮食。校长还说，粮食要是一家家地放着，一下子就会给扣押了，而且还有可能因而破坏团结。就是为了防备这一手，也有必要采取这个办法。对庄稼人来说，不下最大的决心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但大家已经被逼得走投无路，以至把这当成了理所当然的事。

定妥的计划由什么人去执行，以及细节、具体办法等等，说好由三四个带头的人（校长先生也在内）定下以后马上通知大家。那天的会就散了。

庄稼人仨一群俩一伙地边议论着今天的会，边往回走。外面风还没住，庄稼人拱着宽厚的肩膀，把脑袋缩进大衣领子往外走。

源吉正要走，刚伸胳膊穿大衣，校长的孩子跑来了，非要他进去玩不可，一把拽住他还没穿好的大衣将他拉到里屋去了。源吉没办法，只好陪他玩一会儿。源吉经常嘻嘻哈哈地跟孩子们玩，所以孩子们都喜欢他。可是他现在却丝毫没有那种招小孩爱的、无比爽朗而天真烂漫的心绪。他心中焦躁，坐立不安，应付了一番就出来了。他推开教室的门正要走出去，只见留下来的四五个人正在那里磋商呢。

“源吉兄，别走，一块儿商量商量怎么样？”有个小伙子说。

源吉嘴里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就出去了。

他心想：现在哪里是搞这些名堂的时候！

源吉寻思，也难怪大家对自己所出的主意见论纷纷。在他看来，庄稼人活象退缩不前的牛。明摆着的道理，也轻易说不动他们。他想道：那种没魄力、不彻底的办法顶什么用！为什么不能再前进一步呢？

源吉从小就模模糊糊地有过这种想法。当年，他爹携家带口来到北海道。那时节，到这儿来简直就跟朝死路上走没什么两样。他们在雪原上顶风冒雪，茫然不知去向，“死里逃生”，好不容易才给自己找到间小屋，住了进去。当时，狗熊就在附近大模大样地转悠。马不断丢失，庄稼也给践踏得乱七八糟。有一回源吉爹去洗马，半路上看见狗熊在石狩河河边上逮大马哈鱼呢！吓得他失魂落魄地跑回家来。狗熊最怕火。一到夜里，因为狗熊要出来找食，庄稼人家家家户户都把火烧得旺旺的。源吉

还记得小时候一到晚上就觉得狗熊在扒着窗户朝屋里偷看，吓得他直打哆嗦。——源吉爹这些人一直拚死拚活地劳动了将近二十年。

源吉听妈讲，那阵子，爹经常深更半夜拉开防雨板到外头去。起初妈只当他是出去解手，可是老也不回来，有时候甚至一两个钟头也不见转来。妈逐渐感到纳闷，就问爹。爹笑笑说：“上地去啦。”此外再也没说什么。

有个晚上，妈觉得太奇怪了，就跑在后面。只见爹大踏步进了黑咕隆冬的庄稼地。当时，妈只觉得身上一哆嗦。她蹲下来，透过黑暗望过去，只见爹站在庄稼地里一动也不动。过了十分钟，二十分钟。于是又到紧挨着的自己那块地里，还是那么站了老半天。接着，又踱到离这块不远的自己另一块地里去。妈简直闷在葫芦里。

后来，妈到底还是问起那天晚上的事来了。

“傻瓜！”爹笑着说。“俺呀，是心疼俺那庄稼地，真心疼，俺是怕庄稼地着凉呵！”

随后他就一本正经地说：“你呀，你要是醒了，不是也怕阿源、阿文着了凉，给他们盖被子吗？”

可是，曾几何时，他这命根子一样的庄稼地却到地主这家伙的手里去了。尤其是临死之前，爹真是满肚子牢骚，嘴里光唠叨这档子事。源吉虽然还小，可是每当听见爹念叨，就更加理解爹的心情。当年，源吉并不是盲目地抱着地主的脚，狠狠地咬住的。源吉虽然还没有逐字逐句明确地认识到“土地应该归农民所有”，可是根据爹的长期经验，他从十一二岁起就已经在这么想了。

其实，源吉也和别的农民一样，对这个问题只是懵懵懂懂

的，根本谈不上考虑过。但是，那个懵懵懂懂的想法现在却由于源吉的亲身经历逐渐成形了；而把这个问题再推进一步，那就如同校长先生所说的了。这样简单而且明瞭的问题有的农民要经过一辈子才懂得，或者还没来得及懂得就死去了。而且是没有懂得就死去了的居多。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把地从地主手里夺回来！”——源吉说这话，并不是摆大道理；他觉得爹的心情在促使他这么说。源吉一边走着一边想：随你们的便！我还是干我的。他打心里生那些庄稼人的气，他们既不明白这一点，自然也就不愿意干到这个地步。

七

源吉开了半截会就醉醺醺地回来了。上札幌去的阿胜来了信。

信上大意说：“札幌也下了雪，还是那么冷。我们最难熬的是冬天。早晨六点钟到工厂去。冬天的早晨六点钟，就连我们这些年轻人也冻得浑身关节痛。戴上油污、冰凉的帽子，缩着脖子，拎起饭盒就出了门。前前后后也都是这样的伙伴，无精打采地赶路。在工厂里，慢慢腾腾是不行的。从早晨六点到晚上五点，精神得象弓弦一样，绷得紧紧的。打我来了以后，已经有两个年轻工友被机器绞进去了。从滚筒里出来的人变成了一大片擀布般的肉饼。

“后来听说其中一个人的妻子只好靠卖身来养活子女。

“工厂里，大机器轰隆隆响着，刚去的一个星期左右，即使回

到家，脑袋里和耳朵里还是嗡嗡地响，就象在厂子里一样。连张报纸也看不下去。我想：照这样下去就会变成傻子了吧。

“到下午五点（现在已经天黑了），汽笛一响，就可以离开吃人的机器回家了。这时候，整个身心一点气力也没有了，累得连家也不想回，巴不得就地坐下来。我觉得，农民的生活虽然比在这样的工厂里干活儿的人还要糟糕，无聊，悲惨，可是在田野里劳动，不管多么劳累，空气还是新鲜的，就跟清水一样干净，连半点灰尘也没有。咱们一边劳动，一边还可以唱歌。中午，仰面朝天躺在田里，望着天空发怔，也能歇个晌。可是这里怎么样呢？我想让你了解这个厂子里的情况，然而我简直不晓得该怎么说好。好比是在郊外的一个肮脏的‘大垃圾箱里’干活儿。工厂里又黑又臭，尘土飞扬，心中发闷，震耳欲聋……真是没法儿！人们干完活出来，脸上漆黑，只剩下眼珠子还有点光，就象醉汉一样晃晃悠悠的。

“当个农民，虽说穷点，身子骨倒还结实。在这儿干活的人，脸色苍白，身体孱弱，老是不断地咳嗽。我一想到这些，心里就是一片黑。近来我总是发那个老牢骚：‘在石狩河的大平原上倒还强些哩。’其实我也知道，那里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我在村儿里的时候就跟你不一样，怎么也安不下心来。我一向认为会有不同于目前这种日子的、更好的、理想的生活。我也不知道那究竟是怎样一种生活，可老是这么想。如今我才明白，不管咱们走到哪儿，天下老鸹一般黑。是我的经历使我明白过来的。你一定要笑话我这么说。笑就笑吧，我也没法儿。可是我来到这里才开始晓得，我们大伙儿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在做着什么样的事，在这个社会上担负什么任务，又得到什么样的待遇。这些事，也应该让农民们知道。这里，有人在偷偷地研究这

个问题。我自从跟他们略微有过接触以来，也模模糊糊地开始懂得了一些。于是我大吃一惊。我这才知道，原来这个社会是由可怕的大骗局构成的。每明白一点，脑袋就开一点窍。

“关于这个问题，我打算改日再写信详细告诉你。你们那里过得怎么样？敬候来信。

“你妹妹也在抱怨不该到札幌来。我不愿意让你妹妹去当女招待，我打算给她找个地方去当女用人。”

源吉正在厨房喝水，从外边进来的由儿看见他就说：“哥哥，听说阿芳回来了！”

源吉舀了第二杓水，刚要往嘴里送，听了这话，停下手来，“嗯？”的一声回过头去。他的眼睛闪出了锐利的光。

“你问问妈就行了！”

“嗯？”源吉依然端着一杓子水，两眼恍恍惚惚地找妈。“上哪儿去啦？”

由儿朝后门走去。一开门，雪一下子就刮进来。源吉还把杓子举在嘴边，呆呆地站着。

“不在。到哪儿去了呢？”由儿回来说。

源吉好象忽然想起什么事来，嗓子眼儿里咕嘟一声，把水喝下去，就出门了。

可是还没过两分钟，他却回来了，站在堂屋，两眼惺忪地凝望着。他又朝房门看看，似乎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办好。接着就咂了一下舌头，进里屋去。他从壁橱里拿出一件脏得发黏的棉袄，连脑袋一蒙就睡下了。躲在屋角的由儿吃惊地望着哥哥。

晚上，妈说阿芳的事儿“让人吓了一跳”。这时，源吉又象平时那样沉默寡言了，一边吃饭一边悄悄地听着。

阿芳在札幌跟一个有钱的北海道大学的学生发生了关系。

那个学生刚一知道阿芳怀了孕，就要了个花招，把她甩掉了。那个学生是内地的一个大地主家的儿子。

阿芳曾经多次去找那个学生。结果那人却说：“谁知道是哪个的孩子！”这当儿，由于怀孕，在咖啡馆也呆不住了，就挺着十个月的大肚子回了家。

实际上十天以前，阿芳就“悄悄地”回来了。她爹不许她进家。对穷庄稼户来说，她只不过是个吃闲饭的累赘罢了。何况不久就又要添一口，实在开销不起。爹坚持说，家里不能收留这么个不正经的“骚货”。阿芳被踢了一脚，从里屋滚到堂屋，她瘫坐在地上，哭着央求：“给我个堆房角儿也行啊！……”

有一回，阿芳爹碰见了源吉的妈阿关。阿芳爹说：“那丫头把身子骨养得娇娇地回来了。手也小了，白白嫩嫩的，再也干不动庄稼活儿啦……真是添了个饭桶——这都是当爹妈的造了孽。”

源吉妈一边听，一边哎唷、哎唷地感叹。

阿芳爹问道：“你有啥好办法吗？”

源吉妈问他指的是什么。

他说：“那胎儿……”

源吉妈吃了一惊，说：“你呀！”

这么一来，阿芳爹慌了神，嘴里含含糊糊地说着“我简直不知道咋办好了”，双手抱着脑袋，不停地摇晃着，走回去了。

妈对源吉说：“可别闹出啥事儿来才好。照这样下去，是要出乱子的呀。”

源吉既没回答，也没作任何表示。

妈又压低嗓门说：“俺仔细一打听，阿芳并不是死乞白赖要到札幌去的。”

源吉瞅着妈的脸，问道：“嗯？”

“据说，阿芳留在家里得多一份嚼裹儿，她家又没那么多地好种，所以她在家里呆不下去了……”

“是真的吗？”

“阿芳家隔壁那个人，叫啥来着？——老石吧？——对，是老石。老石说是这么回事。”

源吉听到这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又扭过身去不说话了。

“怪可怜见的！没钱请产婆——再说挺丢人的，有钱也不能请啊！……阿芳兄弟说，她每天往札幌写信，邮递员快来了，就站在门口等着，可是一封回信也没有。”

妈慢慢吞吞地说着，她每念叨一句，源吉心里就感到一下一下地刺痛。

源吉乍一听说阿芳回来了的消息，很生气，紧紧地攥着拳头心里骂着“混蛋”，甚至想一狠心跑出去。

可是听妈那么一讲，源吉自己也说不上是憎恨她还是怜悯她了。他可以想见面容憔悴的阿芳站在门口等候邮递员的那副样子。阿芳那疲倦的、若有所思的眼睛，总是在源吉眼前晃。还挺着个大肚子……想到这里，源吉就痛苦不堪，他紧紧地闭上两眼，心里别提有多么烦躁了。

第二天，风传阿芳勉强喝药了。那药，开头她是死也不肯喝的。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写信，竟连一封回信也没有，考虑到今后的一切，才喝的。源吉心里很乱，只觉得象是自个儿的遭遇似的。可是他默默地忍受这痛苦的折磨，只说了句：“瞎说的吧？”

“是真的咧！”妈宛如亲眼看见了一般地说：“可怜呵！含着一包泪喝的呢。可怜见的，一喝下去，就一头扎在被窝里，偷偷儿哭起来啦。”

源吉莽莽撞撞、粗声粗气地骂了句“混蛋”，气势汹汹地从妈身边走开了。

吃晚饭的时候，源吉随口问道：“孩子打下来了吗？”

妈默默地看着源吉的脸，呆一会儿才问了声：“啥？”

源吉意识到自己问得没头没脑，就红了脸，慌慌张张地说：“阿芳啊！”

“阿芳？——哦！阿芳呀！”妈懂了。“还没打下来，但愿她别把身子搞垮就好了。”

* * *

庄稼人虽说开会作了决定，可是临到跟地主以及管家打交道，步子就多少有点乱了。不知不觉地就要打退堂鼓，心想：好歹忍忍算了。由于庄稼人过去已经习惯于长期在贫困的深渊里挣扎，说不定这样也能自自然然地把那种日子照旧熬下去吧。源吉更加沉默了，他在炉边盘腿坐着，心里嘲笑道：瞧吧！看你们搞个啥名堂出来！

住在河边的老泽由于交不起地租，眼瞅着就要被逼着退佃。过了两三天，地主的管家终于到他家来了，说是要处理他的地，等雪化了以后就得腾房。老泽给老婆孩子呜呜哭得六神无主，就去找原来一起开会的人念叨这档子事。带头的庄稼人马上就哄了起来，马上到学校碰头，象个新鲜事儿似的，又跟上次一样重新商量开了。

一个老年人说：“难道非干不可吗？”另外一些带头的庄稼人听到如今还有人这么说，非但不以为怪，反倒一起歪着脑袋沉思起来。于是大家决定：“啊，只好这么办了。”

随后又说了一些车轱辘话，决定“坚决干起来”，好不容易才散了会。

听说地主管家为今年地租的事已经进了村，住在本村的头面人物、略有积蓄的丸山家。带头的庄稼人当中年纪最轻又有股子冲劲儿的石山拿着“请愿书”就去了。这份“请愿书”是在校长先生授意下写成的，汉字多得很，措词和意思连石山本人也看不大懂。

管家一边吃着饭一边听石山红头涨脸结结巴巴地反复说着同样的话，随后就从袖筒里掏出眼镜，用袖口一个镜片一个镜片地仔细擦着，说：“干啥来啦？想蹲警察局吗？”

接着，他花上十来分钟把“请愿书”看了一遍，大骂：“混蛋！给我滚出去！”一下子就把“请愿书”朝石山膝头上扔回来。

“不知啥时候这些庄稼汉神气起来了。”丸山一边把指头伸进嘴里抠牙缝，一边插嘴说。

石山一听这话，说也奇怪，马上恢复了平素那股子冲劲儿，朝着丸山大喝一声：“你等着瞧吧！”

丸山皮松肉紧地说：“哎，种地的嘛，可不能那么着。地主是爹，咱们是儿，凡事忍耐着点儿，安分守己干活儿才是正经！你回去跟大伙儿这么说说。我替大家向管家老爷好好儿说说情！”

“瞎扯淡！”石山就那样走出了大门。

他走了几步，忽然发觉把帽子忘在那儿了。当时怒气冲冲地停下来，却并没回去，就撒开腿跑到等候结果的带头的人们那儿去了。

这么一来，庄稼人当中“好象终于出现了”一股子愤懑情绪，这种情绪自然而然地从带头的人们那里一个传俩、俩传仨地传开了。庄稼人尽管谁也没说什么，可是也有的为了听听结果，特地跑到石山家来。平时不爱言语的庄稼人，也愤怒地说上那么一两句儿就回去了。

已经冰封雪冻，到了源吉他们进山的时候，可是这档子事不了结是脱不开身的。而且现在群情激昂，谁也顾不上这些了。尤其是有些年轻的庄稼人，聚在石山家里，听大家讲这个讲那个，就开始掌握了理论根据，懂得了“地主不讲理”。那些起初还觉得“未必吧”而犹犹豫豫的人们也大骂起“坏蛋”来了。等人聚多了，校长先生就打着手势，摇头晃脑地给大家讲起“佐仓宗五郎①、茂左卫门②上磔刑”之类急公好义的故事来。他的话深深打动了身体象岩石一样壮实的庄稼人的心。接着，校长先生半开玩笑似地说：“哪怕一个也好，要是能从什么地方出个‘北海道的宗五郎’，倒也不错哇。”淳朴的庄稼人一本正经地沉思起来了。

大家明白了，跟管家交涉，反正也是白搭。再加上管家那副傲慢的态度激怒了大家，于是一个个鼓起劲头，决定立即去跟地主谈判。校长先生表示希望出现“北海道的宗五郎”，提得很及时，竟有三个庄稼人主动承担这项重任。

于是，另加上两个带头的，总共五个人，动身到坐落在有车站的镇子上的地主家去了。然后，留下来的那个带头的就跟两三个庄稼人到村子里挨家挨户串连，讲明到目前为止的情况，让大家紧密团结起来，一道跟地主拚，一个人也不许出卖大伙儿。

老婆婆只要一见到他们，就把他们拉住，向他们倒陈年老辈的苦水，并且央求说，对“地主老爷”，手下可要留点情。在另外一个人家，他们劈头盖脸地给嚷了一通：“别叫俺家的儿子参加

① 佐仓宗五郎(1604—1645)，日本江户时代前期的里正，因带头为贫苦农民向幕府请愿，而被处磔刑。

② 杉木茂左卫门(?—1682)，日本江户时代前期的农民，因代表苦于苛捐杂税的贫苦乡亲，准备向幕府请愿，而被处磔刑。

那些会，告诉他马上回家来！简直不学好！”在这种地方，怎么说也没用。也有人对大家做的事抱着怀疑的态度，说：“另外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还有人说：“要是失败了，就吃不上饭啦。”

他们当中有个人到了相好的姑娘家里，当着姑娘的面，被骂道：“二流子！”弄得他灰溜溜的。也有相反的情况，另一个人到这样一位姑娘的家，就借这个碴儿在台阶上一坐，闲扯了半天其他的话，别提多高兴了。——总之，回到石山家来的时候，大家都弄得筋疲力竭。

到地主家去的人，连台阶都没坐一下就象轰野狗一样被赶了出来。

大家走出来的时候，地主恨不得用大棍子揍他们一顿，跟在后面骂道：“这些混蛋，老子象串糖葫芦似的，把你们都串起来交警察局！——让你们尝尝挨饿的滋味！我带着官儿，把你们的家当一个个全他妈的没收！”

五个人把这经过诉说给大家听的时候，激动得满眶眼泪。

带头的庄稼人和校长先生商量了一番，决定及早把情况告诉村里的老乡，等群情极度激昂起来，就势如破竹地去干——这叫“趁热打铁”。同时，要紧的是让校长先生马上到镇上去交涉卖粮。

“团结！团结起来！一个不剩地团结在一起！”两三个庄稼人用从校长先生那里听来的“团结”这个字眼高呼着。

八

那天早晨，天刚蒙蒙亮，本村和对岸的庄稼人就把杂粮装在雪橇上了。

源吉把冻僵了的手放在嘴边哈着气，从马棚里拉出套着皮轡具的马。马用尾巴轻轻地拍打着身子走了出来，皮轡具沙沙作响；大概是因为冷，刚一走到外面，就三番五次往回缩，马蹄在地板上哒哒哒地蹭着。源吉拽了拽马嚼子。马光把长长的脸往前伸，身子却一个劲儿向后退，卷起舌头嘶嘶叫。地板咯嗒咯嗒响着。

源吉把马套在雪橇上，准备就绪后，进屋去等大伙儿。妈一面用手背揩拭那烂了的眼边儿、挂了血丝的眼睛，一面在厨房收拾饭后的碗筷。由儿站在炉旁，隔着敞开的门往外边看。

源吉一进去，妈就用快要哭出来的声音说：“俺寻思，这种事儿可别去干啦。”

自从决定下来之后，妈每天一有机会就念叨这句话。不论重复过多少遍，她还是当作新鲜事儿似的说：“顶撞地主老爷，干这样可怕的勾当，没啥好下场！”

几年——甚至几十年来，不论发生了多么大的事，不管名副其实地出了“什么事”，老农们也只是认为“没法子”。

因此，他们连想也不会想到要去干这种无法无天的事。

源吉却并没有跟他妈顶嘴，也没做什么不顺她心意的事。他只是闷声不响。自从这档子事发生以来，源吉的话比平时还要少多了。妈明白，只要源吉沉闷得厉害，准没有好事儿。干什么大名堂以前，源吉就象铁块儿似的默不作声。妈老是想：要是别这么做就好啦。因此，她又照例唠叨起来：“从前就没有过这种花样，真要干出可怕的事来呀。”

源吉在台阶上坐下来，烦躁地使劲搔脑袋。

源吉他妈接着说：“不会有啥好下场的，”

由儿冲着火叉开腿，瞅着妈和哥哥。他听不懂他们在说

什么。

“准不会有啥好下场的。”源吉他妈抽搭着鼻涕说。“真会闹得混不上饭吃啦。”随后就断断续续地嘟囔道：“源儿，可别太冲到前边去啊，嗯？”

源吉盯着老妈妈的背影。满是污垢的乱蓬蓬的斑白头发下，露出皮囊松泡泡的、干瘪的脖子。背完全驼了，腰也弯了，扎着一根细绳子来代替腰带。整个身子看上去仿佛只有拳头那么大。源吉好象刚刚发现似的，想道：“可真老了啊！”

源吉对这次的事并不主动。相反地，他甚至想，结果搞成这样极不彻底的局面，瞧着吧。

过一会儿，从远处传来了马拉雪橇的铃铛声。

“喏，哥哥。”由儿尖起耳朵听着外面的动静，说。

源吉挺吃力似地抬起腰来往门外走去。

他妈叹了口气，嘴里喃喃地说着什么。她直直腰，往外边望，朝着源吉的背影说：“可小心点儿啊。”

源吉回头瞥了他妈一眼，就带上门出去了。

听到了源吉拉缰绳时噜噜噜地吆喝马的声音。他跟后来的伙伴们谈着话。疾驰而来的马挺立起来，高高地昂着脖子嘶叫。陆续听到了铃声，好象停下了十二三辆雪橇。由儿扒着窗户往外看，逐一告诉妈来了几辆雪橇，都有哪些人。外面越来越热闹了。马嘶声，铃铛声，庄稼人呼喊般地跟前前后后的伙伴们聊着，这些声音汇合在一起，回荡着。由儿高兴得把脸紧紧地贴在窗户上，拚命望着外面。他妈自言自语地说什么“天打雷劈的”，“真是二流子”。她没有到外面去看。

不久，雪橇一齐出发了。在冷得好象空气都冻僵了似的寒空上响彻着清脆的铃声，听上去让人浑身打哆嗦。庄稼人呵叱

马以及用皮鞭啪啪抽打的声音，还有马嘶声，听上去仿佛立即会发生什么严重的、了不起的大事似的。好几辆雪橇过去了，有人朝源吉家打招呼。源吉妈这才打开门到外面去。这时人已经快走光了，铃木家的阿石望着她说：“喂，老大娘，俺们走啦！”

只见辽阔无垠的雪原上，好几辆雪橇排成一字长蛇阵，沿着蜿蜒曲折的道路雄赳赳地疾驰而去。从远处传来了雪橇上那悦耳的铃声。有时呼呼地迸起雪花。一会儿后面的雪橇把前面的挡住了，一会儿道路朝相反的方向拐去，前面的雪橇又出现了，小得跟玩具一样。那个行列活象是一根忽长忽短、忽直忽弯的黑线，清晰地浮现在雪原上。叮玲玲的铃声时远时近地传来。老妈妈象是失了魂似的呆呆地伫立在那里，凝望着。她忽然清醒过来，就念诵了几声“南无阿弥陀佛”。

已经约好，带头的庄稼人将在有车站的镇子上等候大伙儿。漫长的雪道越来越细，尽头就是一排防雪林。从这里可以看到好几根电杆象铅笔一样竖立着。炊烟缭绕，细得犹如香烟。快到了。

“咋样？挺威风吧？”源吉前面的老房回过头来问。“会顺当不？”

源吉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

不论哪一匹马，嘴啦，套着轭具的地方啦，都噗噗地淌着肥皂沫般的汗水。它们把舌头吐得长长的，张大了鼻孔，瘦骨嶙嶙的腿象柴禾棍儿似地挪动着。庄稼人没把它们喂饱。源吉的马已经筋疲力竭，只要一下子把脚往雪道里踩深一些，好象就会有气无力地栽下去。源吉心里想，过不上多久就得把马处理掉了，譬如卖给人家什么的。

在光天化日之下，十二三辆雪橇穿过覆雪的旷野，一齐响着

铃铛，前前后后互相呼应着，竭尽全力，堂而皇之地、飞快地跑啊跑啊。说也奇怪，本来眼光短浅的庄稼人，越来越豁出去了，不管是对付什么人，出什么事，都不怕了。连年近半百、平时挺老实的老房都大声对源吉说：“地主那家伙，要是出什么坏主意，咱大伙儿就围上去把他狠揍一顿！”

虽然心照不宣，这股子劲头已经使大家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了。要是有什么家伙跑到他们跟前来捣乱，不管那是谁，说不定他们也会一下子把他干掉——就象一支骑兵的队伍闯进敌人的阵营当中去，纵马横冲直撞一样。这么说一点也不夸张。

穿过防雪林，就是铁轨的道岔。

走在最前面的庄稼人一面拽住昂首摇鬃的馬的缰绳，把身子使劲往后挺，一面向扳道夫打听火车几时来。

“好家伙，这么多！咋回事？火车还来不了哪，过去吧。”面熟的扳道夫拿着一面卷在杆儿上的白旗，走了出来。

“那么就过啦！”

刚刚停下来的雪橇又一辆挨一辆地向前移动。越过道岔，沿着铁轨旁的路走了七八百米，就到了镇上。从前面一个传一个地捎来了这样一句叮嘱：“喏，可要拧成一股劲儿干呀！”

庄稼人看见，镇口站着七八个人。看不大清楚，走在最前面的就大声吆喝，还摆摆帽子打招呼。镇口那七八个人似乎在朝这边望着，也许没理会庄稼人朝他们打的招呼，看来什么表示也没有。

过一会儿，那些人好象一齐朝这边跑过来了。领先的两三个庄稼人不约而同地哎呀了一声。于是猛地刹住了马。后面的马吃不住劲儿，前腿碰在前面的雪橇上。后面的人问：“咋回事呀？咋回事呀？”坐在雪橇上的人们向前栽倒了，有的纵身跳到

雪堆上，朝着前边嚷道：“哎哟哟！”

“糟了，警察来啦！”

“哦！”

大伙儿吃了一惊，刹那间一声不响，呆若木鸡地伫立在那里，朝前方看。——没错儿，是警察！

警察怎么会来的呢？庄稼人不习惯于跟警察打交道，他们真正地害怕起来。十三个庄稼人还没搞清是怎么回事，就乖乖地由警察在两旁押着，扭送到派出所去了。那些带头的庄稼人已经被押送到那里了。坐在椅子上的地主一看见大伙儿进来，就放开嗓门大笑起来。庄稼人被关在派出所后边的小屋子里，一直关到当天晚上，冻得浑身发抖。有三个警察在场，所以彼此连话都不能讲。时而从外面传来好几匹马的嘶叫声和用蹄子刨地的声音。大伙儿把两臂深深地斜插在怀里，缩着脖子；怕脚趾尖冻得失去知觉，就象鹭鸶似的轮流用一条腿站着，另一条腿紧紧贴在这条腿上。

庄稼人一个个被叫出去受审讯。隔着门清清楚楚地听得见啪啪啪地打耳光的声音，以及魁梧的身子被推倒后直接撞在什么东西上所发出的钝重的声音。还有低低的呻吟和老鼠被踩着时发出的那样的尖叫声。每逢听到这些声音，大伙儿就不由得屏住气，但是他们唯有相互交换个不安的眼神而已。门粗暴地打开后，给折磨得站都站不稳的庄稼人，象是被推了一把似的跌跌撞撞地进来了。

有的庄稼人满脸淌着鼻血，宛如被火车轧死的人又站起来了一般；也有整个面部青肿，翻着白眼儿的；还有的进来时，嘴巴直抽筋。大伙儿一方面挺直了身子，一方面反而怀着极为茫然的心情等着轮到下一个。

源吉觉得他是突如其来地在脸上挨了一拳。他感到自己的身子转瞬之间象皮球一样地缩小了。

“是你这家伙煽动大家的吧！”

源吉不由自主地用双手捂住了脸。接着又是一拳。鼻子痛得刺骨，只觉得象是嗅到了烈性药水……一屁股坐在地下了。他头昏眼花，双手扶着地板，支撑着自己的身子。温吞吞的鼻血滴落到手背上。

“想不到这帮家伙都这么顽固！乡巴佬还敢这么狂……”

站在一旁的警察边说边用插在腰上的未出鞘的短剑，将源吉乱揍一顿。于是其他两三个警察也凑过来，连踩带踢。——源吉神志都有些恍惚了。警察稍微松弛了一下，问道：“怎么样？”

源吉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眼皮耷拉下来，眼睛几乎睁不开了。整个脸上都仿佛涂上了什么粘土，用手按上去发木，好象是在抓旁的东西似的。

“你得招认是你煽动大家的！”

他觉得警察这句话也是从隔得远远的什么地方传来的。

“块头倒不小，这家伙！”

话音未落，源吉的身体就腾空而起。“唉！”——警察在运气。源吉被摔在地下，哼了一声。他感到肺急剧地缩小，气闷得难受。只觉得自己的身体一个劲儿地往地板底下沉……接着就失去了知觉。

庄稼人在派出所蹲了三天，到了那天傍晚，放了十二三个人，他们就出来了。带头的庄稼人还留在里面，要被押送到札幌去。

马匹系在派出所拐角的地方，雪橇里业已空空如也。大伙

儿弓着背坐上去就出发了。挨揍的地方给寒风一吹，火辣辣地痛。正刮着的暴风雪，一到镇郊就施展出淫威了。大伙儿在大衣外面披上席子或草帘，尽量蜷起身子。在黄昏时分越来越凛冽的严寒之中，雪橇一辆接着一辆，响着铃铛，无精打采地回去了。谁都没吱声，连彼此的脸都没看上一眼，也根本无心去看。

走过道岔，前方给暴风雪刮得茫茫一片，挡住了视线，仿佛拉上了一块巨大的白幕。黑暗从东边一点点地逼过来。平原里那唯一的道路早已看不见了。从防雪林旁边经过的时候，劲风卷着雪片刮上去，那里发出凄厉的呜呜声。天地苍茫，朦朦胧胧地可以看到或浓或淡的防雪林，枝梢和树身都朝着同一个方向摇啊晃的。来到一无遮拦的平原上之后，唯有源吉的雪橇远远地落在最后面。源吉却仿佛连这一点都没理会。

他气得咬牙切齿。可恨哪！真是可气！恨啊，恨得不得了。他这才第一次明白自己这些“庄稼人”究竟是什么。他想：那帮混蛋！我就是死了，也得……他明白了谁是自己的敌人。是敌人！就算是把他们咬碎，用斧头将他们开了瓢儿，用镰刀在他们脸上乱戳一气，也解不了恨。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这样的敌人，也看清了他们跟警察这帮人勾结在一起的骗局！唔，可恨哪！混帐地主！源吉狠狠地咬着牙齿：“等着瞧吧！”

雪忽而从正面刮过来，忽而又从左面或是从后面刮来。马浑身都白了，撅起象老农那样骨瘦如柴的屁股，挪动着脚步。尾巴有时啪啪地打在身上，有时又顺着风甩过去；覆盖着白雪的鬃毛也随风摇曳。由于暴风雪的关系，只能看见两三辆走在头里的雪橇；再前面的，一会儿出现，眼看着又消失了。铃声也随着风向的转变，时而完全听不见，时而又意想不到地听得格外真切，仿佛近在咫尺。整个平原骇人地呜呜叫着，说不上是打哪儿

发出来的声音。天色越来越黑了。

“等着瞧吧！”

严寒隔着草帘子袭来，穿透下面的外套、衣服、衬衫，直接刺进皮肤。巴在外套上的粉末般的雪，闪闪发光，凝成一个个小小的结晶体。手指尖和脚趾头冷得发痛。鼻孔辣辣的。不论嘴、耳朵还是鼻子都冻僵了，只要稍微动弹一下，就刺痛得象是要裂开来一般，简直受不了。大伙儿的雪橇来到了杂木林绵亘的地方。那树林子沿着石狩河岸。庄稼人这才知道他们没有迷路。有时从镇上回来，半路遇到暴风雪，走迷了路，差点儿送了命，第二天早晨才发现走的是完全相反的方向。因为到处都一样平坦，摸不清方向。

杂木树发出就象是有人故意装出来的尖叫声，颤悠着。声音一停，就听出风夹带着雪，怒吼着，朝着平原中央席卷而去。紧接着，更强烈的风袭来了。走在源吉前面的那辆雪橇旁边，暴风雪象龙卷风那样形成了可怕的、大理石般的圆筒形大漩涡，一眨眼就跟另一个方向刮来的烈风汇合在一起，掠过雪橇而去。那个庄稼人披着的草帘子一下子就给刮得腾空而去。狂风恣意地越刮越猛。

“等着瞧吧，混蛋！”

源吉的心犹如暴风雪般翻腾个没完。

源吉朝前面望去。看到在雪橇上蜷缩作一团的、犹如一个个包袱似的庄稼人，他觉得从这里就看出了他们的全部生活。他看得很清楚，这些日子过得象蚂蚁、蝼蛄一样悲惨的庄稼人，过去并不了解螳螂般的敌人，也不想去了解。可是如今，就连他们也明白了谁是敌人，敌人都是什么样的畜生了吧。被打趴下去的这些善良的庄稼人，还能咬咬牙再一次——这一次可要拿

起镰刀和镐头——站起来吗？还能朝着敌人的脑袋瓜儿狠狠地砍进一镐头吗？

源吉想道：不行，不行，兴许不行吧。可是，哎！多么气人！“等着瞧吧！”源吉咯吱咯吱咬着牙齿。他象是喝醉了酒一般懵懵懂懂的。

九

回到村里以后，源吉躺了两天。

村子宛如这儿那儿丢在雪里的垃圾箱，显得那样怯弱而疲倦。这场飞来横祸，使大伙儿都发呆了。源吉心情激动得躺也躺不住。他妈把饭端到他枕边来，照例唧唧嚷嚷地诉一通苦，然后象是忽然想起来似地说：“阿芳来过哩。”

“那种玩意儿，就欠揍死她！”源吉连脸都没转过来，粗暴地说。

“她好象有啥话要跟你说哩。憔悴得厉害，脸上青肿，站都站不稳啦。”

“谁叫她巴结有钱的白面书生的……”

“她到这里来说会子话，简直都得用手扶着门支撑着身子……”

于是，他妈断断续续讲起阿芳的事儿来。

阿芳并没有完全死心，还指望大学生会来信呢。她有时梦见信寄到了，不由得喊了一声，把自己吵醒了。等信的心情却逐渐不同于过去了。以前呢，首先还是想念那个男人，所以才等他的信。可她一旦知道了那个人怎样也不肯回信，就开始为娶

儿——为那个不管怎样吃药、念咒也打不掉，非要生下来不可的婴儿而盼信了。

阿芳临月还拚命干活儿。开始阵痛了，就跑到堆房去，象大虾米似的蜷起身子哼哼。因为有一次她在屋子里时突然阵痛了，她按着肚子趴在那里哼哼，嫂子就骂她：“丢人现眼的！”有时正干着活儿，就开始发晕，只觉得房子歪了，忽拉一下吊到半空中，简直是天旋地转。阿芳替一家人准备饭，做熟，摆好，自己就一动不动地坐在角落里。等大伙儿吃完，如果有剩的，就悄悄地打扫几口。

那是个寒冷的日子。正在干活儿的阿芳停下手来，呆呆地想心事。这时候嫂子从外面拎进满满一桶水来。十冬腊月去打水，是件苦差事。嫂子一进门，看见阿芳在发怔，就抽冷子往她身上浇了一杓水：“呸！吃闲饭的浪货！”

“你干啥！”阿芳气冲冲地转过身来。

“浑身软古囊囊的，还能干啥活儿？饭桶！”

……源吉听他妈谈着阿芳诉说的那些话，反而怀上了一股子仇恨，想道：这还是轻的呢！他一向对阿芳的那番情意一古脑儿都消失了。

“找我干啥？”

“她问你啥时候回来。俺说不知道，她啥也没说就回去了。”

源吉一个劲儿地想：得先把阿芳干掉！他感到脸上还是又肿又痛，不象是自己的脸了。她不折不扣是个叛徒，偏偏把自己的身子卖给自己的敌人啦！得把那个淫妇赤条条地倒挂起来，把她当根麦芽糖那样拧死。首先干掉她！

过了两三天。

村里流传说，由于发生了这次的事件，地主要退平素不听话的庄稼人的佃。看来管家在到处散布这个消息。庄稼人一度给狠狠地揍下去，惊魂未定，弄得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要是再给收了佃，那可就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了。按说是应该团结起来，对抗地主。可是带头的庄稼人已经给押起来了，又遭到了残酷的打击，乡亲们完全束手无策了。

阿芳在半明半暗的屋子里洗碗。家里的人都出去了，有的到镇上，有的到邻居家守灵去了。

阿芳在回味她爹临出门时说过的这句话：“去守夜嘞，大伙儿净议论你，弄得俺没脸见人。”

“唔，好疼！”阿芳不由得屏住气，绷紧着脸，撇撇嘴。她一想到又疼起来了，心情极为沮丧。她把正洗着的碗放下，强忍着，扶住厨房的一角，弯着腰直哼哼。每逢一阵阵地作痛，她就感到头晕目眩，黏糊糊的汗顺着额头淌下来。阿芳用胳膊托住前额呆了一会儿。疼痛完全没有要消减的样子，而且一阵比一阵加剧。

“啊——嗯，嗯——嗯。”阿芳下半身已经麻木了，不由自主地坐了下来。她清清楚楚地觉出胎儿在肚子里蠕动着。刹那间，她有了预感。她惊慌得象个瘫子似的拚命满厨房爬。由于疼得厉害，黑眼珠儿直瞪瞪的，她连自己身边的东西都看不清。

“啊，好疼——嗯——啊，好疼。”阿芳咯吱咯吱直咬牙，就象痉挛似的，她从厨房爬到紧挨着的堆房去。

堆房里漆黑一团。一堆堆稻草的甜酸甜酸的气味，土豆和豆子的味儿，和那象是腐烂了的腌萝卜和腌鲱鱼所发出的一股子茅房般的臭味儿混在一起，阿芳直想呕吐，恍惚觉得老鼠窸窸窣窣地从她身边跑过去。阿芳就象被丢在那儿的毛毛虫，蜷起

身子，等着把疼痛挨过去。过去的好多事儿走马灯般匆匆地在她的脑海里转……

不久，阿芳的哥哥嫂子打着灯笼沿着夜晚的雪道从镇上回来了。房门半开着，家里一个人也没有。他们知道爹到人家守灵去了。按说阿芳是在家里的。嫂子咂了一下舌头，露出“真叫人没办法”的神色。九点来钟，爹回来了，问道：“阿芳咋啦？”

“俺们七点来钟回来，她就不在了。”

“七点来钟……”

三个人都感到不安起来，就到家里到处找。还点上灯笼，一道到茅房去找，也查看了马棚，都没有。由于冷，又因为有一种不寻常的预感，嫂子的牙齿直打战，紧紧跟在另外两个人后边。

除了堆房以外，其他地方都找遍了，因此打开堆房的门时，三个人不禁感到毛骨悚然。他们把灯笼伸过去，往地下照了照，光圈落在地板上。没有。那里堆着腌菜桶啦稻草什么的。

“再往里一点吧？”

爹这么说着，刚一走进堆房，就一头撞上了吊在那里的什么沉甸甸、软糊糊的东西。

“哎呀！”他一句话也没说，活象是猛孤丁挨了一记耳光一般呆立在那里。因为只顾把灯笼往地下照，上半截空间就看不清了。三个人挤作一团，就象是被别人猛力推了一把似的，蹒跚地退到门外去。

哥哥和嫂子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隔壁去，又托那家人去通知别的乡亲。过一会儿，就聚集了十二三个村民。

源吉也来了。大伙儿七嘴八舌地说着什么，点上了好多灯笼，走进了堆房。

阿芳是在离门口不远的地方上吊的。可能是由于她爹刚才

撞着了一下，悬挂着的沉重身子在空中沿着垂直线缓慢地画着看不见的弧线，一左一右地摇来摆去。

庄稼人都捂着嘴，只把灯笼伸过去看着，由于尸体微微晃动，引起了他们的恐惧。阿芳的脸上发紫，完全走了样，身上沾着好多稻草末儿。

后来在家里找到了两封大概早就准备好的遗书。一封是写给她爹妈的，另一封是写给源吉的。想不到再也找不到第三封了。阿芳没给跟她发生过关系的那个大学生留下信。听到这个消息时，源吉感到心上一阵发紧。

信上写道：“我对财主怀着满腔憎恨而死。……我有时曾想过，我活着不对这帮财主报够了仇，就死不瞑目啊。我认为自己想得很对。然而我是个女人（仅仅这一点倒还没什么），又是女人当中最下贱的叛徒。看来我是报不了仇啦。我要是跟你在一起，该有多么幸福啊——事到如今，我悔恨自己为人卑鄙，做错了事。……”最后一句是：“我朝着札幌那个大学生啐口唾沫再咽这口气。”

阿芳也跟我们是一样的。受骗上当的毫无例外地都是我们！——源吉想到这里，只觉得浑身激动不已。

十

源吉终于打定主意要动手干了。警察的事件和阿芳吊死的这档子事，使他这个念头比过去更坚定了。尽管警察的严刑拷打把庄稼人吓得发抖，另一方面他们却从骨子里看穿了警察是在怎样折磨他们。这是一点也不含糊的。如果有个意志坚强的

人不容分说地不断鼓动庄稼人的情绪，他们就可能再一次——而且比以前更顽强地挺身而出；因为庄稼人在他们的命根子——土地的问题上，如今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现在带头的庄稼人不在了，起初源吉想自己揽下来干。要是干得顺利，该有多么了不起啊。他想：那样一来，我才不会做得那么不得法，那么不彻底呢。自从发生上次那件事以来，他就打定了主意：放火烧掉地主的房子，把那些吸别人的血喂肥了的虱子般的家伙——不，就是“地地道道的虱子”——活活地打死！

然而源吉等不及把局面开展到这个地步。他明知道那样比自己一个人干会更有效果。然而在目前的情况下，源吉觉得连那样做也是不痛不痒。严格说来，源吉并不去想将来会怎样。连他自己要干的事，甚至于干得成干不成都不知道，他就准备去干。上次偷偷儿去打大马哈鱼也是这样，大伙儿两三个月都吃不上鱼，正饿得够呛，源吉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痛痛快快地自己把鱼打来了。“爹和阿芳的遗言，还有我的主意——我就凭这三点来干。”

另一方面，源吉并不认为自己所做的是徒劳的。他甚至想象到：自己毅然决然做出的事，一定会给呆在黑暗中迟钝得象牛一般的庄稼人一个震动，这就开了个头。大伙儿就会很快地把劲儿拧成一股绳，“干呀！干呀！”地喊着，拿起镐头和镰刀站起来。那样一来，说不定咱们庄稼人就能干脆把土地完全夺回到自己手里。可是，多么可恨哪！源吉边抚摸那还有些肿、隐隐作痛的脸颊和身子，边喊道：“畜生，等着瞧吧！”

当天晚上，源吉把装水果糖那么大的洋铁罐里装上煤油，用破棉垫子一包，就出去了。他对妈说，要到石田家去商量进朝里山去剥菩提树皮和开春打鲱鱼的事。那是个漆黑的夜晚，天上

连颗星星都没有。雪道冻得硬梆梆的。源吉浑身不禁微微发颤，上牙床一下子就不由自主地咯吱咯吱磕着下牙床了。源吉急匆匆地赶路。他走得怪不耐烦的，心里焦躁不堪，就终于小跑起来。凝冻的空气分成两股向后边流去。他来到空旷的地方。不知什么时候，他已恢复了平时的速度。回头一看，黑魑魑的平原上，几点稀疏的灯光微微地闪烁着，好象马上就要熄灭似的。源吉突然若有所思地撒腿就跑。呼吸急促，冷气直冲鼻孔。过一会儿，他又走起来了。

在夜路上，他没有遇见任何人。

遥远的前方，暗得犹如拉上了一块黑幕，影影绰绰地可以看到有车站的镇子上的电灯光。走到这里，源吉忽然站住了，他感到精神振奋，象是要猛地对抗什么似的。

进了镇子，源吉谨慎地避开大街，专挑僻静的小巷子走。路上已没有行人，家家户户几乎都熄了灯。源吉小心翼翼地沿着积雪堆成马背似的、狭窄而凸凹不平的路走去。有时咯嗒一声门拉开了，在坐落于平原中的、万籁俱寂的街上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回音。

源吉好几回给这种声音吓了一跳。

有人大声喊叫着，慌慌张张地跑过大街。两三户人家的大门咯嗒咯嗒拉开了。

邻居们用手按着棉袍的前襟，互相打听：“啥呀？”突然间，街上一片嘈杂，有两三个人一边喊着：“着火啦！着火啦！”一边直奔向车站。

站在街上的居民们一齐朝那边望去。黑暗的天空略微透出些亮光。一眨眼的工夫，喷起了一丈高的火柱，还传来了噼噼啪

啪着火的声音。转瞬之间，全镇的房屋和树木，半边都被摇曳的火光映照得红彤彤的，轮廓鲜明。从街上跑过去的人们那一张张紧张的脸，就象泼上了红墨水一般。

全镇的人都从家里跑出来了。妇女和孩子牙齿咯吱咯吱直打战，肩挨着肩，站在那里望。

“是哪儿呀？”

“唔——车站吧。”

“车站的话，方向不对啊。还要靠右边一点儿呢。”

“哪儿呢？”那个人向住在对门的人问道。

“是地主吧？”

“兴许是的……”

“哎哎。”

他们问了问正在跑去的人。那个人边大声嚷着：“地主，地主！”边跑去了。

“地主的话，就别去管他啦！”有人悄声说。

“现世现报。”

“可不是嘛。”

“……是放火吧！”有人情不自禁地大声说。

人们沉默了片刻。

“哎呀，可要闹大啦。”

报火警的吊钟突如其来地在大家的头顶上发出破裂了似的报警^①的声音。空中的回音阴森可怖，人们不由得脊梁发凉。

地主家和车站之间有一段距离。那一带热得发焦，边烧边发出耀眼的白光，连消防人员和站着观看的人们脸上每一条皱

① 日本民间发生火警时敲钟不对着钟敲，而是擦着钟敲，声音破碎难听。

纹、每一根胡子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每逢火车开进车站，就长长地拉汽笛，活象是动物临死时发出的不祥的悲鸣。地主家的房子是花不少钱盖的，很讲究，因为不屑于跟镇上那些俗气的、快要烂掉了的房屋挨在一起，是特地离得远远地盖起来的，而且又没有风，没有延烧的危险。

消防人员说，火着得太快，全家人大概都烧死了，没看到谁出来。

当那栋堆得满满的粮仓——前不久从北滨村的佃户手里没收来的杂粮也在里面——被烧掉时，大伙儿不禁喊出声来。粮仓发出惊天动地的声音烧塌下来后，熊熊烈火和恶魔般的浓烟旋转着，咕嘟咕嘟地喷上天空。

从冰封的河里引来的水已经起不了作用了。消防人员和青年团的人们嚷嚷着，打着灯笼跑来跑去。

“已经烧了一大半，没办法可想的时候，说是从房子里传出了一阵喊叫的声音，一听就让人发抖，那、那——简直没法形容！听到的人说，那个声音总是留在耳边，真糟糕，声音就象是勒鸡的时候，喉咙里一边流血一边还使劲勒那样。”有个妇女悄悄地告诉站在她旁边的那个看来跟她认识的人。

对方用更低的嗓门说：“准是活报应。”

于是，她俩都沉默下来了。

源吉神不知鬼不晓地一直跑到铁路沿线那排防雪林那儿。火光把防雪林照亮了大半边。回头一看，整个天空都染红了。闹火灾的房子对面的房屋，和站在房顶上似乎正摆着手的人，还有电杆什么的，每一个黑影都看得很清楚。不知怎么一来，喧嚣的人声听起来仿佛离得很近。警钟宛如呻吟一般，遥远地嗡嗡

响着。

“这还是轻的呢。”源吉喃喃地自言自语着，在黑魑魑的石狩平原上迈开了坚定的步伐。“妈的，这还是轻的哪！”

(1928年4月26日)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

楼适夷译

本篇原名《一九二八・三・一五》，发表于1928年《战旗》杂志十、十一月号。译文根据1954年岩波书店文库本译出。

阿惠对这种事情很难习惯。虽然已经有过好几次了，她却还跟第一次一样，慌慌张张地吓得心头直跳，而且每次都被丈夫龙吉讥消了。可是对于一个女人，这总是太强烈的刺激。

——工会的人到家里来开会讨论问题的时候，阿惠端着茶走上楼梯去，有好几次听见丈夫说话的声音：

“对老婆做思想教育，可不容易……”

“革命从厨房开始——这是一定的公式，小川，你太好说话了，太好说话了。”

“的确，我老婆就是教不会。”

“跟太太做理论斗争，总是要失败的。”于是，大家就取笑他了。

丈夫嘴里支吾着，窘得双手不由得抱紧了自己的身体。

早晨，龙吉正在刷牙，阿惠在一旁把热水给他倒进厨房水槽上的洗脸盆里。

“你知道罗莎^①吗？”丈夫把牙刷在嘴里抽动着，忽然想起似的问了。

“罗莎？”

“罗莎。”

“列宁，我倒知道……”

① 罗莎指德国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1870—1919)。

龙吉低低地说：“你简直是个笨蛋。”

阿惠从来不想知道这些，也从来没在这方面下过工夫。她觉得那些事记不住，记住了也没有用处。列宁和马克思的名字，还是从女儿幸子那儿听来的。自从知道了这两个名字，就常常留意，到家里来的工藤、阪西、铃本他们，跟自己的丈夫老是谈到列宁、马克思。因此有一次，不知怎样说起，她对丈夫说：“马克思好象是工人的菩萨呐。”丈夫吃了一惊，看着她说：“你从哪儿听来的？”阿惠虽然受了赏识，却也没有觉得高兴。

虽然如此，阿惠对于丈夫和工会里的人们，跟他们所干的事，并没有什么反感。开头，她见了那些工会里的人，样子不大整洁，神色有点严厉，心里就有些害怕。在她的印象中，有一个时候，感觉这是一些很难接近的人。可是跟他们谈起话来，却比那些一味傻笑、分外殷勤的学校里的先生（丈夫的同事），反而合得来。他们一点也不拘拘束束，拐弯抹角，却象孩子似地老把阿惠他们逗笑。他们第一次在她家里吃饭还有点不大自然，后来，就自己要饭吃，要洗澡钱，要买烟卷的钱。而且都那么单纯，一点没有虚伪。渐渐地，阿惠对他们发生了好感。

码头上大罢工的时候，阿惠在外边听到各色各样“可怕的谣言”。开头她还想不到工藤、铃本他们所领导的罢工，就是那么“可怕的”事。

“罢工对谁可怕呢，对有钱人，还是对穷人？”

听丈夫这样说，她思想上还是搞不通。

“不是讲道理呀。”

报纸上每天用大号铅字发表罢工消息，说罢工会使整个小樽市变成黑暗；罢工的工人要烧资本家的房子，又说工人跟警察冲突，有好些人被捕了（其中就有渡和工藤）；又说这罢工受全市

人民的咒骂……阿惠想到丈夫龙吉也完全忙着罢工的事，晚上差不多都睡在工会的办公处，不觉皱起了眉头。当龙吉带着一张睡眠不足的青肿沉郁的脸回家来的时候，她问他：“没有出什么事吗？”

“路上被特务钉上了，好不容易才甩掉了。”他说着，就钻进被窝里去，说：“五点钟叫醒我。”

阿惠在他的枕边坐了一会。她对丈夫所干的事，从来没有说过什么话。可是，心里偶然也想：多么受罪呀，把什么都牺牲了，到底有多少用处呢。大家那么兴奋地叫唤着的那种社会——无产阶级的社会，也不见得那么快就会到。还有幸子，真的，不要出什么意外的事才好呀。有时她又觉得丈夫所干的事，不过是特意弄得吃不上饭，心里就引起了一种女性特有的不满。

可是，阿惠听工会的人讲过工人的种种事情，知道工人的悲惨的生活。他们受苦，苦得再也受不住了，因此对那些无理剥削他们的有钱人抱着很大的仇恨。阿惠也知道，工会的人领导他们，把斗争扩大开去。她虽然不明白丈夫他们所干的事什么时候才有希望，但觉得是很“大的”、“了不起”的事情，这甚至使她有一种近似“骄傲”的感觉。

龙吉在第三次被捕之后，被学校解聘了，不得不依靠开一个小杂货铺勉强过活。那时候——阿惠虽然早有一种朦胧的预感，知道这样的事情总有一天一定会到来的，却还是象受到意外的打击似的感到一阵晕眩，可是她已差不多不再为这件事向丈夫嘀咕了。

龙吉自从摆脱了职务的拘束，更加积极深入到工作中去了。从此特务就常常上门。阿惠瞅见铺子门前转来转去的陌生人，心里就发凉。仅仅这样倒还好。有时这种人瞅着门牌跑进屋

里来，“请到警察局去一趟，”这样说着，就把龙吉带走了。丈夫被两个便衣押着走出门外去，这情景是非常难受的。丈夫走了之后，屋子里就永远留下一股特别凄清的空虚的感觉。也许阿惠的心脏比别人脆弱，在这样的时候，她的心总是跳个不停。她用手按着自己的胸口，脸色白得象一张纸，在屋子里楞生生地走来走去。

阿惠对这种事情实在很难习惯。虽然已经有过好几次了，她却还跟第一次一样，慌慌张张地吓得心头直跳，而且每次都被丈夫讥诮了。可是对于一个女人，这总是太强烈的刺激。阿惠就是这样。

三月十五日天还没亮的时候，在睡梦中被人拉起来，屋子里全被抄过，也不让家人说一句话，丈夫就被五六个法院和警察局的人带走了。那时阿惠却茫然地坐在床上，一直不动，过了好久，才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那天早晨，幸子突然被一种声音惊醒，霍地睁开眼睛，懵里懵懂向屋子里扫了一眼。几点钟了？她以为天亮了，因为隔壁屋子里有五个人吵闹的声音。假使在半夜，就不会有这样的事。可是电灯还开着，天当然还没有亮。怎么回事呢？席子上有谁在不断地咯吱咯吱走来走去。

“再抄一抄隔壁的屋子。”纸门外边有一个陌生人的声音说。

“那是寝室，什么也没有。”是妈妈的特别放低的嗓子。

“要抄就抄吧！”爸爸说。

“会把阿幸吵醒的……”

幸子只断断续续听清这几句话。她想，有人进来，她得假装睡着。

从架子上搬下东西的声音，翻报纸的沙沙声，把席子翻起来的声音，打开柜子抽斗的声音，一只，两只——一共七只，全部都打开了。她在心里数着。接着，在厨房那边，食橱也打开了。她浑身感到一阵寒气，瑟瑟地哆嗦起来。不管怎样把身子缩成一团，不管怎样翻身，总是感到发冷，身子直哆嗦。忽然，牙齿跟牙齿碰得咯咯地响起来了。慌忙在下巴上使一下劲，才停止了。没有听见爸爸妈妈说话，怎么回事，说话的尽是陌生人的声音。

家里常常有许多人来，可是她立刻觉得，这回来的人跟平常不一样，是完全另外一种可怕的人。

纸门打开来了。一大片刺眼的光线立刻斜射进屋子里来。幸子慌忙把眼睛闭上。心怦怦地跳起来。她假装翻身，微微睁开一点眼睛偷看。妈妈两手叠在胸口，瞅着自己的睡脸。妈妈的脸上白得没有一点血色。爸爸站得远一点，在瞅看那些陌生人抄查的动作。爸爸的脸显得特别严厉，也许因为正在电灯旁边的缘故。

有五个不认识的人。其中一个长胡子的大概是他们的上司，手里提着一个很大的黑皮包，对那些正在抄查的人不知说了些什么话。抄查的人就照他的命令行动。两个是警察，另外两个是穿便衣的。——爸爸干了什么事啦？这些人到这儿来干什么？那些陌生人动手翻幸子的书包，把书一本本倒过来抖动；又一点不客气地把许多玩具在席子上打开来。这使幸子特别动了感情，眼睛里涌出泪水。

“这些都是孩子的东西……”妈妈站在旁边，轻轻地说。

陌生人嘴里含糊地说了什么，可是并不停手。

抄过一通之后，那些人又在屋子里望了一圈，走出去了。纸门关上——屋子又黑了，幸子差一点哭出声来。

爸爸开始和拿皮包的人低低说着什么，后来嗓子渐渐高起来，幸子听清了他们说的话。

“总之，跟我走就是。”拿皮包的说。

“总之，什么总之？”

“不必在这儿多说，你走就是了。”谈话渐渐粗暴起来。

“什么理由？”

“不知道。”

“那末，我认为没有去的必要。”

“不管你认为怎样，我就是要你走……”

“你这样不讲理吗？”

“什么不讲理，不是说过，去了就明白了吗？”

“又玩你们的老手段了。”

“不管什么手段不手段——总之，你得去。”

爸爸突然闭了嘴，使劲把纸门拉开，走进屋子来。妈妈从后边跟进来。那五个人站在隔壁屋子里，脸冲着这边的屋子。

“裤子。”爸爸生气地对妈妈说。

妈妈默默地把裤子拿出来给他。爸爸一条腿伸进裤管里，可是再伸进另一条去时，身子失掉了平衡，几次都伸不进去。爸爸的脸，激动得直跳。他又穿衬衫，又打领带，总是碍手碍脚，不是绷住，就是缠起来——特别是领带，总是结不好。妈妈见了，从旁动手帮助他。“不用，不用！”爸爸恶狠狠推开，显出特别慌乱的样子。

妈妈迟迟疑疑地对爸爸说了什么话。

“不许说话。”隔壁屋子里，拿皮包的把他们的谈话打断了。

幸子睡觉的屋子黑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走下土间去——外边大门打开了，脚步声在那儿停住，又听见说话的声

音。幸子再也耐不住了，穿着睡衣就跳起身来，身子一阵哆嗦，从头顶到脚尖感到一股寒气。她把纸门拉开一条缝向外张望。爸爸正坐在席沿上弯着腰结皮鞋带，那些陌生人站在土间里，妈妈依然把手按着胸口，身体靠在屋柱上，苍白着脸。大家都奇怪地沉默着。

忽然——忽然幸子心里明白了，她觉得她完全明白了。她想：“列宁！”她知道，这些事情都是从列宁来的。爸爸的书房里有许多书籍，还挂着好几张照片，照片中列宁的脸，很清楚地映到幸子的眼睛中来了。那是一位秃头，脸跟学校里的校役吉田一样。还有，每次工会的人来时，常常同爸爸一起唱各色各样的歌，因为小孩子对歌的敏感，幸子比谁都快就学会了《红旗歌》和《五一歌》。她虽然不懂歌的意思，却在学校里，在家里，跟《枸橘歌》、《金丝雀歌》一起到处唱。因此，工会的人好几次摸摸幸子的头。——幸子知道爸爸决不是坏人，绝对不会干坏事。所以她想到这只是为了“列宁”和《红旗歌》的缘故。——对啦，一定是这个缘故。

爸爸站起来了，幸子象遇到失火的晚上一样，牙齿咯咯地响起来。大伙儿走出去了，这时候妈妈的苍白的脸动了一动，嘴唇也好象要说什么似的动了一下，可是没有说话。也许说了什么，不过幸子没有听见。她瞅见妈妈托在屋柱上支着身体的手，用了一下力。——爸爸把帽子拉一拉正，瞅着妈妈的脸，然后把背心的一个已经扣上的扣子解开，又重新扣好，不安地瞅一瞅妈妈的脸。——爸爸半身走出门外去了。

“好好照顾阿幸……”爸爸嗓子干巴巴地说了这句话，勉强咳嗽了一声。

妈妈跟在后边走出去。

幸子跑回床上，扑倒身子，把脸埋在枕头上哭起来。她哭着哭着，心里立刻恨透了那些把爸爸带走的陌生人。“这些家伙真可恨，这些家伙。”这样想着，又哭起来了。幸子害怕得哆嗦着身体，嘴里叫着“爸爸”、“爸爸”，尽情地哭着。

二

充满在天空中的大气，好象苍白地冻结了。没有一点声响，也不见一个人影。——深夜，冷气刺进骨髓，那是天亮前三点钟的时候。

五六个人的脚步声，急急地在冻结着冰雪的路上嚓嚓走过，他们是从一条阴暗的胡同里走出来的。在静寂的街上，脚步声显得特别响亮。脚步声走到稍稍宽一点的路面上，那儿的电线杆上亮着一盏没有罩子的电灯。——啊，原来是下巴颏底下扣着帽带的警察。他们怕腰上的刀子弄出声来，用一手把刀柄握着。

一阵橐橐的脚步声，——皮鞋也不脱，警察一窝蜂地闯进联合工会的楼上！

工会干部在一小时前刚刚睡下。他们决定十五日举行打倒反动刺刀内阁^①的讲演会，这晚上全体动员在市内贴了标语，又交涉了开会的地点，后来又开了常务委员会——直到两点钟才把所有的事情料理清楚。那时候，警察就冲进来了。

七八个工会干部，身上的被子突然被人揭开，被穿着皮鞋的脚踢起来，大家象木头一般站起身来，不知怎么一回事，摇晃着身体直发楞。

^① 刺刀内阁，意思是靠刺刀维持政权的内阁。

铃本想：完了！原来他想到过也许会出什么事。言论自由已经完全被剥夺，在这种时候，他们还坚持举行对主要敌人——田中内阁的倒阁运动，他思想上准备，这一天，警察一定会一次又一次地喝令中止演讲，把讲话的人象棋子一样吃掉^①；说不定在开会之前，还会来一个总检举（这些混蛋什么都干得出来），这是他们的老手段。这时候，铃本想：果然就来了。

绰号叫“工会毛驴”的阪西，身上只穿一条裤衩。

“什么事啊？”他向一个熟面孔的特务问。

“我不知道。”

“不知道？不要胡弄人。——我困得很呢。”

接着上来的便衣警察，在一旁开始抄查文件。

“你们这些家伙，混在这种地方干不出什么好事来的。”

一个警察眼睛盯住了做出很倔强的架势、样子象“关公”的铃本，用恶毒的口气让大家都听见地说了这么一句。铃本可不是受这种嘲弄的人。

“去干点正经的活儿，就不会胡思乱想了。”

——让他独个儿去说吧，谁有工夫听！

“请你帮忙介绍个活儿干干吧。”

阪西发出他那照例的和气的笑声，故意逗了他一句。——工会的人对阪西是不大满意的，他到哪儿都不顶事，做起工作来总是拖拖拉拉。可是人很和气，叫人没法讨厌。

这时，渡慌慌张张想跑下楼梯去。但是警察马上拦住了他的去路。

“到哪儿去？”

^① 日本左翼运动举行公开讲演会时，旁边有警察监视，讲话人说到语气激昂的时候，旁边的警察就喝令停止，并把讲话人逮捕起来。

铃本看到渡这种态度，不禁纳闷起来。还不只是态度而已，他的脸上也变得没有一点血色。平常，作为一个年轻的工会干部，他实际上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带头干，这样一个无比坚实，象“铁板”一般的渡——此刻却一点也不象他的为人了！铃本对他产生了一种奇怪的预感。

大家前后左右被警察看守着，一个个走下楼梯去，除了渡之外，每个人都是精神饱满的。他们早已习惯这样的事情了。耳光一下、两下向他们的脸上飞来。

那位斋藤，平时，碰到什么事情，不管对谁，总是说：“我们得战斗”，这次仍旧是第一个精神抖擞的，他走到铃本的身边说：“是要阻碍明天的讲演会吧，我们要坚强呀。”

“嗯，当然要坚强。”

斋藤还想说什么。

“喂，喂！”一个警察突然用手抓住他的后领，把他扭过去，从铃本的身边拉开。

红旗——人民的旗子……

前面有人突然唱起歌来。——啪！打耳光的声音。

“你敢打人，狗！”把身子猛扑上去的声音。这时又听到指挥刀打人的声音，夹杂着耳光声。

大家前前后后，一齐把胳膊挽起来，故意有力地踏着脚步向前走去。

“太不讲道理啦！”斋藤用尽短小身体的全部力量，发出大声的喊叫，停下了脚步说。“喂，大伙儿，我们反对不讲理由随便把我们带去。喂，问问他们！”

“对，对！”大家赞成他的提议。

铃本只把眼睛瞅住了渡。要是在平常，一到这种时候，他就会象失去了控制的弹簧一样猛地蹦跳起来；可是现在，他却象一根木桩子似的直立在那里，一动也不动。警察一窝蜂围住了矮小的斋藤。别的工会干部就用自己的肩头在警察们的肩膀中间楔子似的硬挤进去。许多身体和身体纠缠在一起，引起了一个小小的波动。

“他妈的，说出理由来！”

“去了就明白了。”在这儿，也是这一套。

“光说去了就明白，就让你们拉到臭地方去吗？”

“侵犯人权呀！”后面的人也叫起来了。

好象有一个警察打了斋藤。人圈剧烈地动荡起来。工会干部们握紧了拳头，拚命想从圈子外边挤进去。混乱立刻扩大了。

“你们这些狗……这些狗！”大伙听见斋藤的断断续续的声音，他的嘴好象被掩住了，还是拚命地挣扎着叫嚷。“你们这些狗，尽管胡闹吧，你们以为这个运动……就会消灭了吗？见你们的鬼！”

大家兴奋地发出喊声。

这时候，刚才好象在想什么心事的渡，也用他肩膀宽阔的结实身体，冲入人堆里去。看到他这副样子，铃本想道：原来什么事也没有，就放下心来。

“不说明正当的理由，我们死也不走！”是嘶哑的有分量的低沉的声音。渡的这个低沉的声音，对大家永远有一种奇异的巨大的力量。

离开人堆站在一旁的石田，默默地瞅着强打起精神大声吵闹的工会干部们，象平时一样，心里闷闷地想。他认为吵闹不吵闹，要看什么情况。弄清了情况再采取行动，并不是没有战斗

性。石田看斋藤这种人，简直象给疯狗咬了的人一般，他知道在这运动中，斋藤这样的人很多。他瞧不起这些人，认为对于他们，连用“幼稚病”那种侮辱人的字眼，也都太可惜了。“在这种时候，这样吵吵闹闹有什么用处呢？哼，好英勇的无产阶级战士！”石田在自己跟前吐了一口口水，伸出鞋尖去在地板上擦了一擦。

渡加入以后，大家的团结更有力了——可是这时候门外又冲进七八个警察来。警察们添了生力军，把一伙人的团结冲散了。大家散成一股巨大的漩流，向门外冲出去，把大门挤得轧轧地响。

从门外流进一股跟剃刀一样的冷空气。是天快亮时的一种出奇的寒冷，零下二十度的气候。尤其因为大家都刚从睡眠中起来，特别冷得发抖。大家在下肢和肩头上憋足了劲，忍住了身体的战栗。

天色还没有一点微光，黑暗的酿雪的天空下，街道上好象从地底深处发出静寂来。冻雪的道路，踩在脚底下仿佛踩破东西一般咯吱咯吱地响。石田和斋藤只是在灯芯绒外衣内穿一件垢腻不堪的衬衫，直接在皮肤上感觉到冷气，冷得一阵阵发痛。过了一会，手指头和脚趾头都麻木起来了。

大家一个个被警察拖住胳膊，拉到外边。

一星期前刚参加工会工作，还不到二十岁的柴田，一开头就一句话也没说，脸色十分紧张。当大家叫嚷的时候，他也想跟着叫嚷，可是他那张象半干的泥土一样的脸，只是抽搐了一阵，不听他的使唤。他早想到总有一天会碰上这样的事情，必须早一点习惯了才好。可是现在事情第一次突然碰到他身上，仍然是一个猛烈的打击，仿佛一下子被人扔出去了。他的身体并不是为了寒冷，却一个劲儿地哆嗦——牙齿咯咯地发响，怎么也制止不住。

大家挤成灰扑扑的一团，从这条街向那条街走去。为了防御寒冷，身体跟身体紧紧地挨在一起，互相拉扯着，故意在脚下使足了劲。在静悄悄的街道上，响着二十来人的脚步声，嚓嚓……地走去。

工会的人们谁也没有吭声。可是，这时候每个人心里都很奇怪地活动着一种同样的感觉，仿佛纸上泼上了墨水，渐渐地渗透到全纸似的，渗透到每个人的感觉中。一个集团，望着同一个方向，做着同样行动的时候，其中各色各样的差别，就必然会融解、消灭，而变成同一的感情。“关公”铃本、渡、“毛驴”阪西、斋藤、石田，还有新手的柴田，跟另外四五个各有差别的、因此也各有特性的工会人员，就深深地走进到同样色彩、同样情调的强度的意识中去了。“这个”是常常会在这种时候产生出来的一种奇异的——但是不能不有的感觉，正因为有“这个”，使无产阶级的钢铁一样的团结成为可能。这不是单纯地抹煞各种差别，而是当差别本身发展到一定高度时，必然会被扬弃的（因而更加强固的）——一种忘我的、被大手一把抓起来的感觉。

现在，这九个工会干部，已经不是九个各别的个体，而变成一辆唯一的坦克了。他们互相紧紧地胳膊挽着胳膊，肩膀挤着肩膀，用他们的阴暗而尖锐的眼睛盯住前方——好似面向着他们唯一的目标——“革命”前进。

三

阿惠从丈夫被那样带走以后，在空洞洞的屋子里，好象少了些东西，再也呆不住了。她想到常常上自己家来的工会书记工藤

家里去看看，同时打听一下工会的人们的情况，这次事件的内容，和牵连的范围。可是，工藤也被捕了。

——警察闯进工藤家里的时候，屋子里是漆黑的。警察一边吆喝着：“喂，起来呀！”一边用手探摸挂电灯的地方。三个孩子被吓醒了，一齐大声哭起来。探摸电灯的那个警察，做着好象跳“保名舞”^①似的手势，在空中探摸着。黑暗里响着啪嗒、啪嗒开电灯开关的声音。“嗨，怎么回事？”

“电灯不通电呀。”一直没有吭声的工藤，跟警察们慌张的神情相反，用非常镇静的声音说了。

工藤家因为缴不出电费，两个月前已经被剪了线。可是也没有钱买蜡烛和洋灯。一到晚上，让孩子上邻舍家玩去，工藤的老婆阿由就上工会里去，整整六十天就是在黑暗中度过的。所谓“光明的电灯，光明的家”^②，对于连阴暗的电灯都没有的他们，当然只是屁话。

“不会逃的，放心好啦！”工藤这样说着就笑了。

阿由安慰着哭泣的孩子：“不要慌，是常常来的人呀，没有什么可怕的，不要哭呀。”孩子一个个停止了哭声。工藤的孩子对警察是习惯了的，工会里的人们半开玩笑地称赞工藤的老婆，说她能够对孩子进行正确的“阶级教育”。可是阿由也不是根据什么理论才这样干的。——她是秋田县一个贫农人家的最小的闺女，只念过两年小学，就上地主家去看小孩，一直看到十四岁那年的春天。她在那里一直受着罪，背在背上的坏脾气的孩子，和在她身上到处乱打的男主人，还有比男主人更凶的女主人，谁都要欺侮她。整整五年，一天也没有休息地被使唤着。好不容易从

① “保名舞”是日本歌舞伎中的一种舞蹈。

② 这是日本电器公司广告上的标语。

那里回到自己家里，就上地里去干活。整天象龙虾似地弯着腰，血冲到脑袋上，脸腮和眼睑都发肿。十七岁的时候，嫁给了邻村的工藤。从新婚的第三天起——那时恰巧是割完庄稼的时候——就不得不同工藤两人出去给附近的土厂推土车，累得精疲力尽回到家里的时候，家里的活儿就跟山一样地堆积着。阿由象受了伤的人一样，拖着劳累的身体，忙碌在土车和厨房之间。有一次，正在猛烈的阳光底下推土车，因为初过夫妇生活的疲劳和恰巧来了月经，突然昏过去，仰面朝天倒在地上。

自从有了孩子，生活担子重了，日子过得更苦。那时，工藤没法活下去了，就和阿由俩人背上一捆行李，在天黑的时候走出村子。这是一个黑暗的大风大雪、连山岳都吹得鸣响的晚上。他们渡过海，到了北海道。

两人在小樽进了一家铁工厂。北海道跟内地，并不象人们所说的那样的不同。在这儿，依旧不是阿由他们容易过活的地方。那末，上哪里去好呢，难道还有什么可去的地方么？穷人无论到哪里，就象鲱^①粕和豆饼放在榨床里一样被人榨干。——阿由的两手仿佛大得跟蟹身不相称的蟹钳，挂在两个肩头下，跟树根一样粗糙，被污垢染得漆黑，看来是一辈子也洗不干净的了。孩子背上发痒的时候，她不是用指甲而是用手掌给他搔，孩子被她这么一搔，就觉得非常舒服。

阿由因为自己这种长期的生活经历，痛切地认识“谁是自己的敌人”。特别是从丈夫参加了工会活动以后，阿由的脑筋更加清楚了。

从那时以后，不说工藤没有工做了，常常因为工会的工作，整个星期不回家。阿由就不得不自己一个人干活，还要照顾

^① 鲱是鳞鱼，日本人也用来榨油。

孩子的生活。但她现在干活的心情跟过去不同了。她到海边去挑煤，在仓库里缝装淀粉和装杂粮的口袋，上拣豆的作场去拣出口的青豌豆，什么活儿都干。最小的孩子在肚里时，怀着十个月的大肚子，还跟大家一起，从驳船里把木炭包挑到仓库去。连来巡逻的警察见了也大吃一惊，把工头骂了一顿。

家里的格子门只剩下了木格子，冷风吹进屋子里，没有买裱糊纸的钱，向工会里要来了旧的《无产者新闻》^①和《劳动农民报》，贴在格子上。一些带鼓动性的罢工新闻，火一样热烈的大字标题，有的斜贴着，有的倒贴着，有的半截被贴没了。阿由闲下来的时候，就断断续续地念着。孩子们问“这是什么”、“那是什么”的时候，就念给他们听。屋子里的墙头上，胡乱贴上一些选举时使剩的招贴画、传单和杂志上的广告。渡和铃本到工藤家来的时候，总是叫声“嚯！”一次次向四边走着瞧看，很高兴地把它称做“我们的家”。

……工藤从铺上起来，穿上衣服。一边穿衣，一边想，这一回时间一定很长。家里一个钱也没有留下，往后日子怎样过呢。这样想着，心里觉得沉重而难受。这是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时，都同样感到的心情。虽然好多次都有同样的感觉，即使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不是一种平常人，也决不是能习惯这种事情，要走就走的。这是一种阴郁的心情。在工会里跟大伙一起兴奋工作时还好，可是，在别的时候，一想到老婆孩子的生活，心里就是说不出地难受。无产阶级运动完全不是开玩笑的随随便便的事情！

阿由帮他准备，说：“这就去吧！”

① 《无产者新闻》是一九二五年九月日本共产党主办的合法机关报，一九二八年八月被迫停刊。一九二九年“四·一六”事件后，重建共产党，改称《第二无产者新闻》。

“嗯。”

“这回是什么事，心里有底吗？”

他没吱声，停了一会说：“怎么，过得下去吗？这回也许要长呢。”

“家里的事吗？——放心吧。”阿由用素来的明快的、精神饱满的声音回答。

最大的一个孩子，虽然还有些茫然，却已经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说：“爸，您去吧。”

“走到这种人家来，简直叫人受不了，”警察诧异地说。“好象例行公事一样，一家人异口同声说去吧，去吧！”

“碰到这种事情，就要哭哭啼啼，还能干咱们的运动吗？”工藤为了驱除心里的暗影和难堪的滋味，就恶狠狠地顶了一句。

“混蛋，不要胡说八道，看我揍你。”警察特别鼓足了气，吆喝了一句。

“当心。”

“嗯。”

他想给妻子留几句话，可是口齿笨，不知说什么好。想到妻子又得受苦（当然，受苦的不仅是自己的妻子），不觉感到小腿上失掉了劲儿。

“真的，总有办法过日子的。”阿由望着丈夫，又说了一次。

丈夫默默地点了一点头。

门关上了，阿由站下来，听一听外边那群人的脚步声。

阿由知道，在自己的社会到来以前，这样的事情再发生数百次还不够。为了使这样的社会到来，我们就得给后来的人当“垫脚石”，说不定还得用脑袋去换。她听过这样的故事，蚁群搬家的时候，前边遇到必须渡过的河，走在前面的蚂蚁就一个个跳进

河里淹死，把尸体堆起来，让后来的蚂蚁把它们的尸体当做桥梁渡过去。我们应该是这种走在前面的蚂蚁，工会的青年们常常说这样的话，而这是必要的。

“早着，早着呢！”阿由对阿惠说。

阿惠脸色阴沉地、同时又兴奋地向阿由点了点头。

四

阿惠从阿由那里知道：这一回的检举牵涉的范围是出乎意外地广。××铁工厂的工人，还没有脱下工作服就从厂里给带走了；码头上的散工跟仓库里的工人，每天五个十个地被带去审问；好象还进去了两三个学生。

每星期二晚上到龙吉家里来参加研究会的公司职员佐多，过了两天也叫警察给带走了。

佐多常常跟龙吉他们谈到自己的家庭情况。——他家里只有一个跟佐多相依为命的母亲。他母亲知道儿子参加了革命，伤心得“身子直哆嗦”。为了让儿子一直受到高等商业学校的教育，母亲拚着命，整整干了八年活，干得把身体都累垮了。他好象喝母亲的血，吃母亲的肉长大的。可是母亲只是一心巴望着等儿子在学校毕业，当上一个银行行员或是公司职员，就可以得意地享受儿子的薪水，整天舒舒服服喝喝茶，跟邻居们聊聊天，至少每年一次到家乡去玩玩；若是分到了红利，也可以偶然上温泉去休养休养……不必象目前那样，每月碰到要付账的时候，日子就难过，得向人家求情，上当铺，或是被人家没收东西。她觉

得那简直跟洗过一个澡，披一件浴衣躺在廊檐下那样，是最大的幸福。母亲在长年的（实在，这日子是太长了）劳苦中，只有想到这种未来的日子，只有靠这一点希望，才熬得住那样的苦难。

每天上公司去，——到月底领到薪水——这是多么美好安静的生活！当佐多从学校出来，找到了职业，把第一个月的薪水“连原封”交给母亲的时候，母亲把它搁在膝头上，木然地不动。过了一会，母亲的身体轻轻哆嗦起来。她把封袋一次一次贴到自己的额角上。佐多也同样感到出奇地兴奋，心里却相反地想：“又是那样子，老一套，老一套，”走到楼上去了。刚过一会，听见楼下佛坛前的铃子响了。

看书看到吃晚饭时下楼来，餐桌上已经放上跟平时不同的好菜。佛坛点着蜡，供着那个薪金袋。“供供你爸爸呀！”母亲说。

到这时候为止，一切过得很顺利。

可是母亲留意到佐多楼上的屋子里，渐渐贴上从来没有见过的相片。

“这是什么人哪？”

母亲指着佐多桌前墙上那张象虾夷人一样长着一堆大胡子——从大胡子里露出脸来的相片。佐多含糊地笑了一笑。

“你没有去多管闲事吧？”

她不知道从哪儿听来的，可是不很明白，有时就那样问他。她又留意到红封皮的书渐渐多起来了。有一次，送来了一封封套后面印着劳农党^① × × 支部的信。母亲着起慌来，把它揣在自己怀里。等佐多回家，好象什么秘密的危险品一般，掏出来交给

^① 即劳动农民党，一九二六年成立，曾在工农运动中起过进步的作用。一九二八年田中义一反动内阁对进步力量实行“三·一五”大镇压时，该党被迫解散。

儿子。“孩子，你可没有加入什么党吧？”

佐多瞅见母亲脸色阴沉的时候渐渐多起来，知道她有时整夜翻身子睡不着觉。从公司回家，好几次瞅见母亲坐在佛坛前面流眼泪。他知道这都是为了自己。佐多是在特别的情况下长大起来的，瞅见母亲这副神情，心里仿佛十字镐砍进去似的难受。他常常跟龙吉和阿惠商量这件事情。

佐多在楼上的时候，母亲常常走上来，这种次数渐渐多起来了。每次母亲总是唠叨着同样的一套。——靠你一个人热心，成得了什么事，万一有个三长两短，那叫我吃什么呢。你不是那种干危险事的人。不知是什么把你迷住了。妈妈每天为你向菩萨许愿，向你过世的爸爸祷告……佐多心里烦起来了。

“妈，你不懂呀。”他半带着哭音吆喝了。

“是呀，妈就是不懂你的心思。”母亲畏缩地、怯生生地说。

佐多感到厌烦了，就把母亲撂下，走到楼下去了。到了楼下，心里还是很难受。就是妈，她折磨我的志气。“想不到母亲倒是我们的敌人。”他心里很激动地想。

后来又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佐多气鼓鼓地站起身来。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够了，你说得太多了！”他突然大声嚷着。“以后不干了，听妈的话，以后不干了。这就行了吧，不干就是，不干，不干，烦死人啦！”

他几乎把母亲一把推开，就走出门外；一走到外边，心情又回转过来了。

“妈妈就是不懂呀。”

在十六那天，佐多从朋友那里知道龙吉跟工会里的人全给抓去了。可是那朋友也不知道他们是因为什么被捕的。佐多回到家里，把各种文件整理了一下，包起来，寄放到邻居家。这一天，

平安过去了。他安心了一点，就想上工会探一下动静。这时，那位朋友来了，告诉他，工会和党的办事处，有许多便衣警察在等着，去了就危险，不小心上工会去的人，不管有没有关系，都被抓去了。工会里那个矮小的小林，十五日下午偶然走到工会里，便衣警察就气势汹汹地跑出来，将小林一把抓住。小林吃了一惊，立刻说，我是印刷所的收账员，来收账的。警察说，现在工会里没人，你来也没用，就把他赶走了。他当然就一家家跑到会员的家里去，叫他们小心。朋友告诉佐多这事，他想，幸而自己沒有去。

可是警察上他家里来抓他，是十七的晚上，佐多正在看晚报。到了紧要关头，出于自己的意外，佐多心里立刻有了底，表现得很镇定。

他在电影和旧戏中常常看见“魂不附体”的滑稽表演，觉得好笑。可是，当他从楼上取了大衣下来，却看见母亲倒在屋角落里，手脚不住地抽动！她的嘴唇哆嗦着，好象拚命地想说话，可是什麼也没有说出来，脸上恐怖得一点血色也没有，只有两眼不住地闪动。手跟脚好象想攀住什么东西似地舞动着，身体却一动也不动。佐多刚把纸门拉开了一半，就象木头似地站住了。

佐多被三个警察押着走到门外，一路上只是想母亲，他不让警察看见，偷偷流了好一会眼泪。

阿惠从工藤家回来，走过市中最热闹的花园町大街。天色刚刚昏黑，冷得还不那么厉害。街上跟平常一样，行人很多，挂着铃铛的马拉爬犁、汽车、公共汽车，络绎不绝地来来往往。在一家商店的光亮的陈列窗前，有一对好似新婚的男女，凑近了脸在说话。——穿着暖和的外衣、披着方围巾的女子，身上裹着厚厚的驼绒大衣的男子，出差的商店学徒，身上挂着老大的空饭盒的工人，孩子……这些人，肩挨着肩，互相谈话，有的急匆匆，有

的慢腾腾地走着。阿惠心里觉得奇怪。现在，同在这个小樽市，发生了那样重大的事情。可是这里的这些人，却好象一点关系也没有，这是应该的吗？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完全献出了自己的身体，从事于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劳动人民的事业，难道跟这些人一点关系也没有吗？——阿惠心里闹糊涂了。在这里，好象连一点小小的余波也没有流到。也许这是因为政府用了封锁新闻的狡猾手段。好狡猾的手段！看吧，每张脸，每个人的神气，都那么快乐，那么满意，大家都忙着走自己的路。

丈夫他们是为着谁干的呢？阿惠感到出奇的寂寞和不平。丈夫他们是上了当了！呸，这是什么念头！可是，这种阴暗的心情，总是跟马蝇一样，紧紧地缠在阿惠身边，没有离开。

五

十五日拂晓，在警察局里，好些下巴颏底下扣着帽带的警察，一群接一群，急急忙忙地进出着。蓝漆的汽车时时在门口停下。一听到汽车的马达声，警察局大门就猛然打开来，跑出一手把着指挥刀刀柄的警察。汽车的马达发出更高的声响，车身晃动着，车轮子陷进雪沟里，向着就在门外的一条下坡道滑下去，一会儿就不见了。过了一会又回来，乘上别的人，立刻又出发了。

拘留所装满了人。

先进来的人，一听到门上铁锁声响，马上停止刚才的谈话，把视线集中到那儿——等着新人进来。一看见进来的是渡、铃本、斋藤、阪西他们，不由地一齐发出了欢呼。担任看守的警察，

面孔愤怒得象鸡冠一样发红，挺起腰来大声吆喝，可是一点儿效果也没有。被关在一起的十四五个人，都是日常见面的站在最前线上斗争过来的人。

他们各人找到自己的对手，大声地、激动地谈论这种非法的逮捕。十七八张嘴把屋子里闹得沸腾翻天。因为大伙集合在一起了，他们就想大闹一场。

斋藤一下子把身子缩得象一个球，一句话也不说，全身撞到板墙上去。他紧噙着嘴唇，脸色憋得通红，象斗牛场的牛似的歪着脑袋，反复地撞了几次：“呸！”

他知道瞎撞没用，就改变了姿势，跟马一般使劲用后脚踢。大家也学他的样，开始向板墙敲的敲，踢的踢。石田（只有他）把两只胳膊叠在胸口，断续地自言自语着，在屋子中间踱来踱去。

门又打开来了。可是这回是把铃本和渡叫出去了。“怎么回事？”——大家见走了两个头儿，就失掉了劲儿。敲板墙的，一个，两个，陆续地停下来了。

石田瞅见龙吉在屋角里伸开两腿，半闭着眼睛。心里想：小川君也来啦。他觉得这回的事可闹大了。同时因为一种对龙吉的亲切的感情，觉得多少有了一点依靠。

“小川君。”石田走过去。

龙吉抬起头来。

“这回究竟是什么事啊？”

“嗯，我也不知道呀，正想问渡。”

“是不是为了今天要举行倒阁运动？……”

“也许是——如果是为这个，那末今天拘留一天就没事了——不过……”

大家围住了他们两个。对于不说明什么原因，跟对付小狗

小猫一样，抓进来关在这儿这件事，表示很大的愤慨。龙吉也一样：

“法律上有规定：在日出以前到日落以后之间，除非认为对生命、身体、财产有迫切的危害，或是有赌博、卖淫的现行，不能违反居住人的意志——明白吗——不能违反居住人的意志，侵入居民的住宅。可是这一回，他们在深夜睡觉的时候冲进来！也不提出什么理由就随便捕人！警察局干的就是这种事。”

工人们注意地听了他们的谈话，就畜生、混蛋地嚷起来，跺着两脚。

龙吉又激动地说：“而且，宪法上规定，宪法上：——日本臣民，非依法律，不受逮捕、监禁、审问及处罚。可是咱们怎么样，难道有一次是经过正式的法律手续才被逮捕、监禁和审问的吗？——这些骗子，胡说八道的东西！”

因为大家这会儿亲身落进这种非法的陷阱，听了他这些话，正好象直接碰上了蛀牙中的神经，感到切身的疼痛。

“喂，咱们大家把这牢门打破，去问问是什么理由！”

“干啊！”另外的人兴奋地表示了同意，“咱们大家闹起来，跟他们干！”

“不行，不行。”龙吉摇摇头。

“为什么？”

斋藤跟在工会的时候一样，耸起了肩头向龙吉走去。

“已经到了这儿，干什么也没有用，反而会多吃些苦头——我们的运动，一切要靠外边，靠群众的支援！五个十个人逞英雄，大吵大闹，是没有用处的。我们要坚持原则，连做梦也不能忘记原则。”

“那就老老实实呆在这儿吗，好大的理由！”

石田在一旁想：又是老一套来了。四个警察跑进来了。

大家楞了一楞，就照原来的样子木然不动。一个满脸芝麻胡子、身子矮壮的警察，在拘留房里骨碌地扫了一眼：

“你们这些家伙，应该明白这儿是警察局呀，吵成什么样子！”

他伸手把每个人的肩头按下去，走到斋藤跟前时，斋藤顺势把肩头一闪，警察扑了一个空，手和身体就向前一晃。警察恶声吆喝一声“混蛋！”猛地把自己的身体扑向斋藤。斋藤的身体被摔到半空中，咚的一声，跌到龙吉身边的板墙上。

警察气呼呼地用肩头喘着气，发出略带沙哑的嗓音说：“大家记好，谁敢吵一吵，就得准备受罪。”

随着进来的一个警察，瞅着一张单子，一个一个叫唤名字，命令被叫名的人都到走廊下去。被叫名的人嘴里嘀咕着，一个个躬着身子从矮门里走出去。屋里只留下六个人了。

刚才倒在地上的斋藤，正象毛虫似的拱着身子准备坐起来，那警察又用皮靴连连踢了他两下。

过了一会，又来了别的警察，留在屋子里的六个人，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警察看住，连话也不能讲了。

龙吉坐在一扇开得很高的小窗子底下，昏沉沉的电灯光，茫然地映出了人们的轮廓，气氛是这样阴森，好象是只有影子在动。过了五分钟——又过了十分钟，刚才还是昏沉沉的电灯，好象渐渐地变得更加阴暗了——四周变成苍白色，而且渐渐地，屋里变成象深海底层一样的颜色。脑袋的一角一阵阵发痛，龙吉想：天快要亮了。黎明前的彻骨的寒气，刺进身体里来。屋角落里谁打了一个睡眠不足的短短的呵欠，接连着别的人也一个个打起呵欠来了。龙吉也皱蹙着鼻子眼，打了一个呵欠。可是，总

觉得有什么渣滓似的东西，很不好受地塞满在脑袋和胸口。

院子里静悄悄的，是一种冻结一样的寂静。走廊下，常常有穿着皮靴、咯吱咯吱急步走过的声音。脚步声停下，打开了门，就好象是一种把冰打碎的声音。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有人被拉住了胳膊，嘴里抗议着在屋子前面经过。这声音一静下来，重新恢复黎明前的分外的寂静。又有人打着短短的呵欠，在外边走过去了。

“要睡觉，也不让睡么？”屋角里有人这样嘀咕。

“是天亮的时候了，天亮啦。”

警察也都是一副睡眠不足的、浮肿和迷茫的脸。

龙吉把身体靠在板墙上，闭上了眼睛，身体和神经感到极度的疲劳。人一静下来，觉得身体好象坐在船上，轻轻地振幅很大地摇晃起来。他每次被捕后有一种老习惯，当种种没有穷尽的空想、想象和回忆使他疲劳的时候，他照例背诵曾经看过的重要的书本，把书本中提出的问题，在脑子里作理论的分析。或者把在工会与党内引起争论的意见，重新整理一遍。现在他又开始这样做了。

龙吉记起上次开研究会时关于马克思价值论与奥地利学派的界限效用论的讨论，想把自己的想法，从看过的书中找出一些材料来，重新思索一番……

他完全被骇住了，一边穿裤子，一边踉踉跄跄的，身子站立不稳了。对于这样惊惶失措的神情，连自己也感到有点害羞。但他还是提心吊胆的，生怕隔一道纸壁，外边等着自己的警察的刀子碰撞的声音，会被幸子听到。他知道幸子听到这声音，幸子的“心”就会破碎的。

“爸爸要同学校里的人一起出门去哩。”

幸子睁开黑油油的大眼睛，向他望着。

“你带些什么礼物来送给我呢？”

他很难过，勉强地说：“好，好，好东西，好多好多的。”

幸子一下子把脑袋转到纸壁那边去了。他立刻用两手抱住自己的头。咣的一声，他好象听到瓷器打破的声音。他从心里发出一声惊叫，连忙跑过去打开幸子胸口上的衣服。在葡萄干似的两个乳头中间，一颗象瓷碟一样的心破了——一看，这心上已有了一条头发似的裂痕……啊，啊，啊！……龙吉连续地发出闷声的叫唤……

他睁开眼睛，屋子里已经清晰地射进了鱼肚色的曙光。大家都是很困的样子，有的把大大的脑袋耷拉在胸口上，有的半躺着身子，有的在板墙中腰上闪烁着茫然的空灵灵的眼睛。龙吉把自己的脑袋在板墙上轻轻地碰撞了几下。脑袋左边的一部分，还是在一阵阵地发痛。他觉得刚才做过的梦，还在心里好久好久地留下一些不愉快的真实的感觉。

但是，龙吉自己也明白了，他已经能够逃出那种伤感的绝望情绪了，那是每次被关在这种地方时照例会产生的，也是一种每个人都会遇到的——有些人说不定把自己弄得跟发狂一样——难受而无法解脱的阴郁的压迫。龙吉见到过好些人，仅仅因为这种情绪，脱离了革命。龙吉自己也只是仿佛走钢索一样，好容易才通过了这道关口的。一次又一次受到这种非法的残暴的压迫，每受一次，留在他身上的大部分的末梢神经，就迟钝一分，他感到跟蛀牙中露出来的神经一样，碰到一点点东西就立刻发痛。他的（用轻蔑的口气所说的娇嫩的）心已渐渐锻炼得跟钢铁一样了。可是在龙吉，这是名副其实的“连续的熬刑”的生活。象龙吉那样“知识分子”出身的人，要真正不单用头脑而“用身体”

投进到革命中去，这是一种当然必须受到的“训练”过程。这不是一条简单的道路——是象被人抓住头发拖着跑路那样，崎岖不平而且峻险异常。

龙吉知道知识分子由于阶级的中间性，常常摇摆不定，面对着从农村和工厂中到来的健康的脚音，只有一条没落的道路。或者虽然参加了革命，可是总有些地方觉得不合脾胃；又由于他们具有知识的缘故，容易对资产阶级的文化，或浓或淡地偷偷带一些迷恋的情绪和眉来眼去的关系。——一般地说，知识分子总是觉得革命这件事太激烈了，常常故意“自己骗自己”地说，我不行，我不行，结果什么事情也不能干，什么事情也不干。他想，什么事情也不干，却拚命找理由替自己辩护，这是最无聊的行为。认真地、一心一意地去想这种理由，是很危险的，为此去徒然地浪费时间，无论如何是不对的。他认为我们只要一步一步找到立脚点，脚踏实地走上这峻险的道路，最后，还是可以“做”一点事的。因此对于那些总是闷着头胡思乱想的人，他觉得不可理解。

光在头脑中胡思乱想，分明象飞进屋子里的小鸟，用脑袋在四边的墙上乱撞。想得太多了。你们的理由多得太讨厌了。没有光靠理由造成房子的道理！

龙吉现在对于蹲拘留所，已经不知不觉地习惯了。东京来的同志，借用资产阶级的口气，把被捕、坐牢（现在名称好听些，叫刑务所）称做“上别墅”。纵使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也不会把“上别墅”当做高兴的事，坐牢对于一个普通人不能不算是一件相当重大的事情，可是他们却已经习惯到把它说得这样轻松了。为了参加革命，老是坐在牢里受罪，连打一个喷嚏也不能随便。这运动，可不比游戏性质的体育运动。

——为了要从脑子里赶走莫名其妙钻进来的幸子的影子，龙吉大声打了一个呵欠。墙角上的斋藤，狠狠地用两手象钉耙似的向上拢一拢长得很长的头发。

换班的时间到了，分别看守每一个囚犯的警察走出去了。常常到龙吉家去的、因此已经相识的叫须田的警察，在走出去的时候，向他说：

“喂，小川，老实说，这种事情可受不了啦，——也没有上班下班。身体可真吃不消哩。”他的话有一种奇异的真实感。他样子还和气，不象是一个打人踢人的警察。也许这正是他的本质，叫人觉得出于意外。

“真是，太辛苦了。”

这样说，并没有讽刺的意思。

斋藤望着这警察的后影，冷冷地象戏台上的道白一样，道了一声：辛苦。

当别的警察都出去之后，须田低声问：

“家里有什么口信要捎吗？”

龙吉一下子没有做声，不觉向须田脸上望了一眼。

“不，没有什么事——谢谢你……”

须田点一点头出去了。他那微驼的穿着制服的圆形的肩膀，显出一股出奇的寒酸相。

“唉，真想抽一支烟。”有人自言自语地说。

“啊，天亮了……”

六

跟龙吉关在一个屋子里的斋藤，在上厕所去的路上，正走到走廊尽头的一间拘留房面前。

“喂！”他听见那拘留房里有谁叫他。

斋藤停下脚来。

“喂！”是渡的嗓音。从里边把脸贴在小窗口上，果然是渡。

“渡吗？是我呀！——怎么，一个人吗？”

“一个人。大家都好吗？”还是平常的、低而有力的嗓音。

“好。——你是一个人吗？”听见是一个人，斋藤心里一跳。

看守他的警察跟上来了。

“好好干吧。”说着就往前走去了。

一边走，一边心里想，这是怎么回事，看情形有点危险。回到屋子里，斋藤把这事告诉了龙吉。龙吉没吱声，咬住了下唇，这是他的老习惯。

石田又在厕所里见到了渡，两人不能讲话，可是看他那神气还很镇定，跟钢铁一样结实。

“喂，你知道不知道潘克洛夫德？”石田问斋藤。

“潘克洛夫德？不知道，是共产主义者吗？”

“是电影演员呀。”

“哪有时间记住这些玩意儿。”

石田见到渡的时候，偶然想起在电影《黑暗的街》中见过的扮强盗的潘克洛夫德。渡，——潘克洛夫德，两个人奇妙地结合在石田的脑海里。

渡被关进单人房的时候（跟警察刚冲进工会那时候一样），想到这一定是以他们为主体的地下活动给发觉了。一刹那间，觉得脸上刷的一下失了血色。但只是一刹那，立刻，他又恢复了平常的神情。特别是在单人房坐定下来的时候，他象出了远门刚回家的人那样，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不管是渡或是谁，每天早晨睁开眼睛，工作就跟等着他们一样，把他们拉走了。拿着传单四处奔走；跑到厂里的同志那里和市内的支部去，听报告，商量问题，交代任务；中央的指示来了，就得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执行；委员会开会了，连续着跟扔石头吵架一样的讨论；油印机；工会会员的教育；讲演会——准备工作、传单、奔走、讲演、被捕——他们的身体象拴在轮转机上一样，忙得团团乱转，没有一天例外。接连着，接连着，无论到哪里，总是好象无限的循环小数一样地连续着。——真够呛！几乎要这样说了。而且在所有一切的时间，他们的心总得不断地紧张到最高的限度。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中，“上别墅”对他们是一种休息。所以“上别墅”这句话除了幽默，同时也含有资产阶级所谓“休养”的意思。可是谁也不说出“休养”这一点，大家明白，假使这样说，就会被人批评没有战斗性。

渡伸着两条腿，从大腿、膝头、小腿、脚胫顺次地揉着，以后又倒过来揉；用手掌的侧面敲敲头颈和肩膀，跟做深呼吸一样，又深又缓地打了一个呵欠。忽然想起从来连呵欠也没有舒舒服服打过一次，不禁独自觉得好笑，就笑起来了。

四五天前听到铃本唱，不知不觉记住了“太阳出来又落山啊，监狱永远是黑暗”那首歌，他小声地、快乐地哼了起来，一句一句体会着，一边唱，一边在小小的单人房里踱起步来。渡的头

脑里，现在可说什么也没有了。可是一想到准备今天在全国各地普遍举行的打倒反动内阁讲演会，现在开不成了，我们的运动不得不暂时停顿一下，心里又有点懊恼起来。不过，说实在话——很奇怪地，对现在的渡说来，这样的事情好象只是一种不愉快的感觉，在快要睡着的时候，断断续续地、淡淡地飘浮起来，一会儿就会消失掉的。

渡吹着口哨，踱着步，用指头敲摸着板墙。他的心情是平静的。有些人一进牢狱就变成消沉和忧郁，这样的心境渡是不了解的。他向来和这种心境无缘，他没有女学生那样娇嫩的高贵的神经。而且更重要的，因为自己勇敢地担当了正确的历史使命，所以被投进牢狱里这一事实，在渡的身上，和因受不住痛苦而非反抗不可的愿望，是不用什么解释就能完全一致的。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的主义和主张会象长在身上的瘤一般，妨碍自己的自由行动，因而感到拘束，不断地受到良心的责备。渡一点也没有想过自己牺牲了什么，也没有想过我是在为社会的正义而斗争。只是一种天生的“仇恨心”，很自然地干他所要干的事情。这就是他从心底发出来的感觉，而且他还有坚强的意志。他这种表里一致的完全赤裸裸的坚强性格，有时跟柱子一样成为大家的依靠，也有时引起其他工会干部的疯狗一样的剧烈的反感。工藤在许多地方跟渡相象，却不象他那样永远是直肠子似的把“心思”完全暴露在外面。因此大家开玩笑地说，工藤是必须跟在渡身边的“恩格斯”。——渡是没有“两条心”的人，他绝对没有那种一条心干事、另外一条心却想来想去的优柔寡断的情形。这在外边看来，也许就是一种“钢铁的意志”。他永远就是那么痛痛快快地干下去。

他甩一甩脑袋，把掉到额前来的头发甩向后面，在单人拘留

房里来回地走着。他的又短又粗的腿，象打拳的人一样向外弯着。因此他的身子，看去好象放在一个结实的座盘上。他有一种一步一步把气力用在脚跟上慢慢走道的习惯。他的皮鞋跟就象那些习惯不好的人使用的墨，先在后跟外侧斜斜地薄下去。他一边走，一边想那些同志不知怎么样了。他最担心有人会对这一次的弹压感到害怕，假如时候一久，这种害怕的情绪就更加不好。他打算想出对付的办法。

墙壁上，有用指甲和铅笔之类所留下的各色各样的题壁。渡闲着没事，就留心一条条瞧看。

“我是小偷呀，嗨。”“这儿警察局长的脸相，是要死在刀下的。——骨相家。”“火灾，火灾，火灾，火，火（这是用未来派的字体写的）。”“不良少年是生活最严肃的人，哈哈。”“社会主义者呀，请替我想办法吧。”“你应该成为社会主义者。”“我没有饭吃呀。”“局长，令媛已经有了一个有名的情夫了。”“什么，这种地方，谁怕你。”“工人们，强大起来。”“告一切到这儿来的人，题壁颇不雅观，请勿再题。”“放你的屁。”“在此被强迫丧失自由的人，题壁是唯一自由的乐园，告一切到这儿来的人，请放手题壁吧。”“工人现在骄傲起来啦。”“混蛋，你再说，打死你。——工人。”“有妻有子，没有饭吃，我恨这个社会。”“对，实在可恨。”“劳动吧！”“劳动？你以为这个社会，劳动就有饭吃吗，混蛋。”“社会主义万岁。”

渡每次来，总得题上几句。从来没一次不题。

“我终于来麻烦警察了。悲哀的人。”“在小樽，有八个警察的老婆，因为生活困难在卖淫，每次三圆。穴知生。”

渡就在这两条题壁后边的空墙上，用指甲深深地、一心一意地刻起来。因为贯注了整个精神，可以不知不觉消磨许多时间。

这跟绘画一样快乐，一心想题得长些。他用肩头使了劲开始工作，照他每逢精神贯注时候的习惯，把舌尖歪在嘴角上，一个字一个字刻下去。

喂，大家听！

这个拘留所是专门为关我们穷人而设立的。

警察是住在高墙大院里的有钱人为了捞大钱雇来的看门狗。

你见有钱人进过一次拘留所吗？

一次也没有。那末，我们就应该用那发愁发闷的工夫去团结自己的力量，打倒那些没用的有钱人和他们的走狗官府，打倒那种不合理的政治。

你发愁发闷，只是白花眼泪。

你害怕，就得一辈子受罪。

喂，弟兄们！

第一，我们要握起手来，紧紧地握起手来。

警察的锈铁刀，想打散我们的团结吗？好，打打看！

我们工人，劳动，劳动得倒在地上，还是一个穷，天下有这样岂有此理的事吗？

我们要创造劳动人民的世界——工人和农民的世界。打倒靠利润吃饭，把人脑袋抛着玩儿的有钱人的世界。

我们要建设这样的社会。

喂，伸出手来！

紧紧地握！

喂，你，喂，还有你！

大家，大家！

渡花了很长的时间把那些字刻好，又从头读一遍，感到很满意，就吹着口哨，把手插在灯芯绒裤子的兜儿里，走远一点瞧瞧，又走近点瞧瞧。

天亮起来了。电灯灭了，可是眼睛还没习惯，屋子里立刻黑起来。墙上的题壁看不见了。苍白色的晨光，从四方的窗框里

射进来，向下形成三四十度的斜角。渡忽然放了一个响屁。他一边走，一边在肚子里使劲，接连着放屁。因为他有痔疮，一放就是连珠屁，臭得要命，连自己也受不住。“见鬼，见鬼！”渡骂着，把腿抬一抬，就是一个屁。

大概八点钟左右，门口钥匙声响了，门打开来，一个腰上没有挂刀的警察，在分趾袜子^①上套一双草鞋，走进屋子里来。

“出来出来。”

“我不是动物园的野兽呀！”

“不要胡说。”

“让我回家吗？谢谢你。”

“提讯。”

他这么说着，忽然叫着“好臭，好臭！”连忙跳到走廊里去。

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大声笑起来。越笑越好笑，笑得捧住肚子直不起腰来。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好笑，就是忍不住地笑。

七

十五日一天中，又带来了五六个工人。那屋子太窄了，大伙被转移到练武厅去。练武厅一半铺着席子，一半铺着地板。屋子三边几乎全是玻璃窗，光线很强烈，刚从阴暗的地方搬过来不习惯，开头时大家都眼花了。屋子中心安着一个大炉子，见面的人有许多都是相识的，就围住炉子谈起话来。大概有四个看守警察，他们也跨开大腿靠近到炉子边。

开头，大家对警察还有些顾虑，没有吱声。可是憋得慌了，

① 日本人的一种袜子，大拇趾另行分开，用以套木屐或草履的鼻纽。

就一边留意着警察，一边断断续续谈起话来，准备被警察吆喝的时候立刻停止。可是警察对他们的谈话，却一会儿表示同意，一会儿又催促他们。原来警察也憋慌啦。

到了傍晚，大伙被叫到外边去。从后门排队出去，在警察局的院子里绕了半个圈子，又从前门带进屋子里。原来是被“秘密转移”^①了。大家的脸上立刻显出不安。脚步声杂乱地走进练武厅里，大家靠近了脸说：这是怎么回事呀。每个人立刻感到这回逮捕一定还有别的原因。喝着没有一点菜料的又咸又苦的汤，吃过了没有粘性的又粗又黑的麦饭，大家又围到火炉边，可是谈风已经健不起来了。

过了八点钟，工藤被叫出去了，大家紧张了一下，眼看着工藤走出去的背影。

夜渐渐深起来，烧着象在冒烟一样的廉价煤的炉子已经不大暖了，人们的背脊感到一阵阵的寒气。龙吉到阴暗的屋角去取棉袍子，石田从他的后面跟上来。

“小川君，这件事我不知道当大家的面说出来好不好，所以没有说。”他低声地说。

龙吉胃又痛起来了，他蹙紧了眉头，努力忍耐着。

“唔？”他反问了。

练武厅外边有人走过，发出咯吱咯吱的脚步声。

——刚才石田到洗脸房去。这儿只有一个公用洗脸房，分关在各个屋子里的人，在那儿可以互相见面，碰上运气，还可以讲几句话。大家上洗脸房去，都希望碰上这样机会。石田走进

① 日本法律规定，被捕的人在二十四小时内须确定罪名，在三十天之内须送法院受审，否则，到时候就得释放。但警察局对政治犯施用“秘密转移”的方法，往往在拘留的第二十九天内转移一下拘留地，就算没有到期了。

洗脸房去时，看见正面板墙上挂着的横长的镜子前，正有一个肩膀宽厚的汉子背冲着他在洗脸。那时石田也许正在心不在焉地想着旁的事情，走到那汉子的身边——这时候那人忽然抬起脸来，正和石田无意中望着他的目光碰在一起。“啊！”石田确实发出了一声惊叫，从头到脚迅速地瞥了一眼。他觉得自己的身体象纸片一样轻轻地飘起来，一只手托住洗脸房的架子，一只手不自觉地眼到脸摸了一把。脸！——这是人的脸吗？象烂茄子一样肿成紫色的，是名副其实的“阿岩”^①脸，这不是渡嘛！

“挨打了，”用手指一指自己的脸，笑了一笑，好怕人的笑脸。

石田一句话也没有说，他楞住了，心窝的下边好象痒呵呵的，哆嗦起来了。

“可是，没有屈服。”

“嗯……”

“不要让大家害怕。”

那时候，只有机会说了这样几句话。

“我看事情一定很大。”石田气愤地低声说。

“嗨……事情也不是猜不到的，可是最要紧的还是不要害怕。”龙吉望一眼炉子边的伙伴和警察。

“那是不错，不过到了警察局里，还要虚张声势，认为不胡闹就不算战士，这种想法要叫他们停止才行。到了警察局老老实实呆着，也不一定就是害怕。”

“对的，嗯。”

“斋藤那种人，”他望一望在炉子边指手划脚谈论着的斋藤，“上次居然说，有些人给警察抓去，判了最轻的罪名，还不害臊得

^① 阿岩是戏剧《四谷怪谈》中的女主人公，被丈夫虐杀，投入河中的。

去上吊，这种人不是无产阶级的战士！”

“……唔，干革命的人，多少会有这种心情……说起来，这也是一种感伤主义。那时候，他觉得对不起同志。当然，这应该利用每一个机会来改正。”

石田瞅着对方，想插进嘴来，可是没有说，做出沉思的脸色。

“不过这是很困难的，过于严厉地批评他们是幼稚病什么的，说不定会把他们最主要的优点，热情这一点都完全否定了。当然幼稚病和热情完全是两回事。”

石田瞅着自己的脚趾头，就在那里踱起步来。

“最重要的是要把热情直接纳入正轨。——不管怎么说，我想热情到底是最主要的、根本的东西。”龙吉不知想到什么，突然把话打断了一下。“你也知道，有一句有名的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可是我想，光有理论到底还不够，在这句话当中还省略了一件当然要有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热情。”

“象线香火花一样的热情是错误的。象牛一样，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总是一步一步走去，决不停止。特别在咱们这样需要长期坚持的运动中，就得要这样的热情。”

“对，不过表现热情的形式各人不同。因为咱们这运动，并不是两三个情投意合的朋友可以干得了的，这就得把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结合在一个巨大的感情里，——能够把什么都团结起来的更高一级的感情里，尽可能地融和一切的差别。——这在个人来说，有时也会感到不愉快。可是只计较这种事，当然是不对的。比方我对渡的某些方面，也有讨厌的地方，不但对渡。但决不因此就离开他，咱们的运动是一个组织的整体，离开了整体就什么也做不成了。”

“嗯，嗯。”

“而且我们的工作还会碰到种种的困难，那时候，说不定为了这种小事，会引起意外重大的分裂。因此我想，咱们对于这种瞅不见的、好象没有多大关系的事情，必须特别认真地留心才好。”

“嗯，嗯。”石田嘴里连连答应。

他们走到炉子边，大家正在跟警察一起谈猥亵的话。有两三个莫名其妙被带来的工人，开头的时候战战栗栗的，从旁人看来简直委靡得不得了，可是在猥亵的谈话中，却不时插进嘴来，笑着。当谈话中断，大家沉默下来的时候，在他们的脸上，就好象流云投下了阴影，忽然又暗起来了。

斋藤指手划脚地谈论着女人的事。他是一个健谈家，把大伙儿都吸住了。他讲完了话，向那个正听得出神的、头发稀薄的肥胖的警察伸出手去：“喂，石山先生，拿支烟卷来。”

石山警察下流相地嘻嘻地笑着，从上衣的内袋中，拿出一支皱得快要断了的蝙蝠牌^①，递给斋藤。

“好极了，好极了，再谈一个更精采的吧。”

斋藤用狡猾的眼光，向对方瞥了一眼，笑了一笑，拿烟卷仔细地在手心上搓直，涂上口水，使它湿透了，可以保留得更久一些。

“不，太可惜了，以后慢慢儿再抽吧。”他把烟卷搁在耳朵上。

“……快点处理我们吧。”屋角上有谁自言自语地说。

“唔。”大家听了这句话，好象心头被电棒照亮了一样。

“我是从码头上给抓来的，家里的人不知怎样在着急，我不干活，老婆孩子就没有吃的。”

“咱也一样啊。”

① 蝙蝠牌是一种廉价烟卷的牌名。

“……这种活动，实在够呛，真怕人。”一个很久前就参加工会的工人，带着深切的同情说。

“为什么？”斋藤插进嘴来。

被斋藤一说，那工人就不吭声了。斋藤用显然生气的口气追问了：

“唔？”又催了一声。

“得啦，得啦。”石田眼睛瞅着警察那边，在斋藤身后捅了一下。

这个叫木村的工人，在工会里已经很久了，对外并没有做过什么工作。他老是嘀咕着——他在仓库里的工作实在太苦。他知道工会是帮助工人改善生活的，所以他参加了工会。可是因此得被警察抓起来，他实在觉得苦恼。他不明白，为什么硬要做这样的“坏事”。他又觉得可怕。他认为工会应该好好工作，不该做这种坏事。他转错了念头，他以为他得找一个机会退出工会才好。他就好象被人家从后面推着，不知不觉地推过来的。只要碰到什么跌撞，就立刻借此从轨道上滚下去。他对工会的工作，从来没有积极过，就跟傀儡一样，做一些分配给他做的事。

总选举的时候，因为撕了敌党候选人的宣传招贴，劳农党必须推出一个人来让警察抓去。渡叫木村去，告诉了他许多应该注意的事情，说：“说不定会挨几下揍，你得好好忍受。”

“我不干！”一句话就拒绝了。

渡想不到他会这样回答，“啊？”反应地叫了一声，就默默地瞅住木村的脸。

“我这样干，给警察关上一两天，就没有饭吃了，我不干！”

“你对咱们的运动还不明白呀。”

“你们当干部的，给警察抓去了，就会更加出名，以后声望更

大，我可不同呀。”

渡把一口气憋在肚子里，马上不言语了。那时在旁边的龙吉觉得“这空气不好”，工会干部不能为“这样的事”跟一个普通会员闹别扭。

“那末，叫别人去也可以。”

龙吉只好这样说了。——对于木村这样的人，目前这件事，正是最好的“撒手”的机会。他下了决心，放出去之后干脆不干。

“没出息的家伙。”

斋藤想起好久以前木村的那回事，故意掉过脸去。

“木村，工会会员就得象一个工会会员，特别碰到这种时候，咱们就得坚强。”

龙吉一边搔着因烤了火发起痒来的大腿，一边说。可是木村没吭气。龙吉忽然想到，在这样名副其实的战斗的左翼工会里，出乎意外，有大多数是木村这样的人，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最近由木村介绍入工会的柴田，正抱着两个膝头望着大家。他跟木村睡在一条被子里，因此知道木村已经从心底里消极了。柴田自己开头也有些挺不住，特别是睡在工会里被警察冲进来的时候，就吓得脸无人色。但他在平时已经想过，知道这种事当然是非忍受不可的。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没用的人，在这些地方做得很不够，还应该比别人加倍努力地干。因此他细心地瞅着渡、工藤、龙吉——那些人的一举一动，一向甚至“过分用心”地监督着自己。这次事件对各种各样的人是一面严格的筛子，眼看着从筛子眼里一个个掉下去的同志，心里很难受。但这也许是一个必要的过程。——柴田想：我虽然是一个后来的新人，可是，妈的，决不能掉下去呀。

炉边的谈话，因这件事打了岔子就沉默下去了。可是一会儿，不知由谁开头，又谈起女人来了。

到八点钟，在席子上铺开了被子，每两个人盖一床棉被睡下了。“只要能够睡得着”，睡觉就是唯一的乐趣。

好些人一齐解带子，脱袜子，发出索索的声音。

“早点睡着做一个梦吧。”有人这样说。

“拘留所里的梦，可不好受。”

“他妈的。”

对方嘻嘻地笑了，好象远足旅行的学生到了旅馆里，不断地吵闹着。警察一次一次吆喝着“轻点”，“轻点”。

棉被的沿口沾染过几十个人的体污，象乌贼干一样，滑腻腻地碰在脸上很不好受。

“啊啊，简直到了天堂啦。”被口掩着嘴喃喃地说。

“地狱里的天堂吗？”

从相隔很远的地方，有人突然说：“真想做一个好梦。”

“睡吧，睡吧。”

不时地，东一句，西一句，发出这样的对话。调子渐渐松懈下来，间隔的时间也长起来了，约莫过了二十分钟，偶然听到象说梦话似的声音。——就完全静下来了。

练武厅外边，是冷落的漆黑的街道，不大有人行走，可是这会儿，却时时听到木屐咯吱咯吱拖过冰冻的雪路。警察局的院子里有人远远叫唤，听起来好象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睡着了吗？”

龙吉睡不着，悄悄向睡在一起的斋藤问。斋藤没有动，睡着了。已经睡着了，这真象斋藤，他独自笑了一笑。龙吉一只手象揉摩似地按着一阵阵从底里发痛（痛得不怎样厉害）的胃，一边

想着种种事情。

“喂喂，”听见这声音，心想是谁呀，自己正在读那么难读的书，不觉冒起火来。“喂，喂。”有人用力抓住他的肩头。妈的！想转过身来瞅一瞅，勉强睁开眼睛，人还非常想睡。在这刹那间，象一张照重了的相片一样，他瞪了好一阵眼，分清了梦和现实的境界。对罗，眼面前有一张肮脏的毛胡子的警察的大脸。

“喂，喂，起来提审呀。”

龙吉一惊，不自觉地坐起来了半个身体。

迷迷糊糊地把人拉出去，这是他们的老手段，钥匙锵啷锵啷在寂静的四周发出不祥的声响，龙吉跟着警察走出去。

约莫过了三十分钟，工藤被警察带回来，脸色苍白得怕人，收拾起留在练武厅里的行李，立刻又被警察催促着走出去了。那时候，他向房子四边大家睡着的地方望了一眼，想说些什么话，可是把身子转了一圈，就显出结实的背影走出去了！锵的一声，锁上了。从走廊上，好久好久传来两个人的不一致的脚步声。

屋子里，象淤泥里吹臭泡似的发出睡梦中翻身的声音，唉声叹气的声音，和含糊的梦呓声。

八

警察局里，一星期工夫，胡七乱八的，象赶猪一般赶进二百来个工人运动者、工人和有关系的知识分子，也有跟运动毫无关系的来探监的兄弟，被扣留起来的。挨了打，一个星期还不释放。但这样的事情，还不过是插话中的百分之一罢了。

审问开始了。

对于渡，即使没有这次共产党事件，警察局也老早准备非收拾他“不可”了。他们象楔子似地硬钻在合法的政党和工会运动里，想把他拔出来。可是在那种情形之下，他却名副其实象豹子似的活跃着。现在被他们抓住了，他们都很高兴：“这家伙，这回可以揍个半死了。”

渡在审问中一句话也不回答，光说：“随你们的便吧。”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司法主任和特高警察越来越感到棘手了。

“你说什么意思都行。”

“要动刑呀。”

“那也没有法子。”

“瞧你现在硬装着天野屋^①的样子，等会儿可别变成龟孙子。”

“想不到你们眼光那么差，你们早该明白，我是不是那种人，挨挨揍，揍个半死就会说的。”

他们“真正”觉得棘手了，知道“渡这个人”就是这样的，就发起慌来。因为如果他们从这共产党的“首恶”口里搞不到一点“口供”（他是首恶，又不能随便把他治死），相反地，自己的前程就难保了。——主要就是为了这个。

渡的衣服给剥光了，马上一句话也不说，就用竹板子从后边打来。这是用力打上来的，竹板子发出呼呼的声音，每打一下，就向下面弯曲一下。渡嘴里唔唔地哼着，把浑身气力都使在身体的外部，熬住了疼痛。大概打了三十分钟的样子，他就跟被火

① 天野屋利兵卫是德川时代的义士。

烤过的乌贼鱼一样，蜷曲着身体倒在地板上。最后的一下竹板子(?)重重地落在他的身上，他象一条中了毒的狗，手腿僵硬地伸向空中，哆嗦地抽搐了一阵，就昏过去了。

渡有过长期受刑的经验，学会了跟运气师一样能够毫不在乎地让铁针刺进胳膊，或是用手抓住烧红的铁筷。因此一说要受刑，心里就来了一种紧张——这种紧张也许正是不知不觉中养成的运气术——越紧张，刑罚对他越没有效果。

在这儿，石川五右卫门^①、天野屋利兵卫受过的那种残酷的私刑，并不是几百年前的老话，而是眼前的事实。当然，文字上是这样写的。——刑法第一百三十五条：“对被告人必须态度温和，使其有机会陈述有利本身之事实。”(!!)

洒了冷水，呼吸恢复过来了。现在，开始用诱骗的战术了。

“任你们怎样揍，也是白费气力的——我绝对不会说什么的。”

“你的事情我们已经完全知道，你说出来只是减轻你的罪。”

“你们已经知道就行啦，我的罪可不用请你们费心。”

“老渡，你这样子，可没有法子呀。”

“我也没有法子呀——我对受刑是免过疫的。”

后面站着三四个拷问员(!)。

“这家伙!”一个拷问员从渡的身后伸出两条胳膊，勒住了他的脖子。“就是你这家伙一个人，把小樽市闹得乌烟瘴气。”

这样，渡又第二次昏过去了。

渡每到警察局来一次，心里总要苦笑：就是这些家伙，地方上的居民称他们叫“警察先生”，把他们当作保护“安宁”、“幸福”和“正义”的了不起的人物。资产阶级教育的基本方法——就是

^① 石川五右卫门是丰臣秀吉时代的义盗，传说被秀吉逮捕后，用大铁锅煮死。

把“错觉法”当方法论。他们巧妙地把内容跟外表弄成两回事，叫人人都相信，一点不落形迹，实在叫人佩服。

“喂，我告诉你，不管对受刑免没免过疫，东京有指示，必要的时候，揍死个把人也没有关系呀。”

“这是一个好消息，真的么——给揍死了也没有关系，如果我给揍死了，无产阶级的运动从此消灭，那我倒要考虑一下，可是我们的队伍是越来越大的，这一点，我很放心。”

接着，渡又被赤条条地吊起来，脚趾头离地只有两三寸。

“喂，你就认输了吧，怎么样？”

从下面，一个懂得柔道三段^①的警察，用手背轻轻叩着悬在空中的渡的脚。

“我才不认输呢。”

“真是笨蛋，这回是新式的呀。”

“随你的便吧。”

“唔。”

这一回，渡可有点受不住了。这是用席匠使的粗铁针刺进身体里，每刺一针，他就好象触着强烈的电流，身体咕一下跟逗点似的缩住。他扭曲着吊在空中的身体，咬紧了牙齿，大声地吼叫起来：

“杀吧，杀——吧，杀——吧！”

这比用竹板子、手掌、铁棒和绳子鞭打更加难受。

渡越是在受刑的时候，越产生一种不需要理论的仇恨，对资本家的火一样的反抗。他觉得拷问正是无产阶级从资本家那儿所受的压迫和剥削的最具体的表现。当渡对自己的“战斗意志”

^① 柔道是一种武技，分为九段，第三段是相当高的功夫。

特别觉得没有自信,情绪上有点犹豫不定的时候,他就想起拷问。每次受到非法逮捕,被打得走起道来都头昏眼花地回来,渡就意识到在他的身体中不可抑制地涌起一种“新”的阶级仇恨。这种感情,只有渡那样的人才_有;那些懂得马克思、列宁的理论,抱着“正义”感参加运动的知识分子和学生_们,是做梦也不能有的。“真正的仇恨难道能从理论中象虱子一样爬出来吗?”渡和龙吉常常为这个问题引起剧烈的争论。

铁针每刺一下,渡的身体就向上一蹦。

“妈的!人要长着神经干么呀。”

渡咬紧了牙齿,在意识中模糊地意识到自己的脑袋突然耷拉到胸口上去了。——“等着瞧吧!”这是最后的一句话,渡又第三次死过去了。

第三次回过气来。渡感到自己的身体象纸片一样飘摇不定,意识上仿佛包上一张皮似的模糊不清。人到了这样的情况,就决心“随便你们去摆布吧”。人的意识变化到这种情况,对于所受的打击就有麻醉剂的效果。

主任拿出警察局编造的共产党组织表来,说“问题都已经弄清楚了”,想瞅一瞅渡的表情。

“嗨,了不起,果然是……”他象喝醉酒那样地说。

“啊呀,承你这样佩服,还是没有办法呀。”

审问的人差不多已经把所有的手段都使尽了。

最后,警察又胡乱殴打,用底上钉铁钉子的皮鞋乱踢。这样继续了一小时的样子。渡的身体跟芋头口袋似的任人转弄。他的脸变成“阿岩”了。结束了连续三小时的拷问,渡跟猪下水一样被掬在拘留房里。他一动不动地哼着,一直到第二天的早晨。

接着，工藤被提审了。

工藤用比较直率的态度应付了审问。他能够克制自己，不在这种场合光凭勇气，对不同的场面，灵活运用不同的方式，很好地来适应。

警察对工藤的拷问，大体跟对渡的差不离。只是他赤着脚立在地上，拷问的人从后边用皮鞋猛力地踢到他的脚跟上，踢得他突然往上蹦起来。这一踢，嗡的一下一直刺激到他的脑顶心。他受了这样的拷问，接连在审问室里旋转了两三圈。脚颈以下麻木得跟木杵一样。从脚后跟流出来的血，在地板上画下一个圈圈。工藤发出尖嗓子（他的嗓子一向是尖的）叫嚷着，跟瘦马一样地蹦跳了。最后他精疲力尽地坐在地上。

受完了这个刑罚，警察又把他两只手掌心向上摊开，放在写字台上，用力把铅笔钉在上面。以后就照常常使用的方法，在指缝里夹着铅笔捏紧他的手指。——这样连续使用着这些刑罚，每次所受到的强烈的刺激，使他的神经陷入极度的疲劳，变成暂时的“痴呆状态”了。弹簧松了劲，失掉了弹性，一切就“听其自然”。警察抓住这个时机，使受刑者供出他们所需要的供状。

紧接着审问铃本，用的也是同样的手法。从某种意义说，他受到的是更危险的刑罚。他没有挨打挨踢，只是连续八次（八次！）被扼断了呼吸。从开始一直到完毕，警察医（！）按着他的手腕试脉搏。扣紧他的脖子让他断气，立刻又使他回过气来，不到一分钟又重新使他断气，然后再使他苏醒过来，一次又一次……连续了八次。到第八次，铃本完全跟喝醉酒似的昏头昏脑了。他完全麻木了，不知道自己的脑袋还在不在脖子上。只有司法主任、特高警察、拷问警察、屋子、家具的影子，在他眼睛里忽聚忽散，显出表现派的图画一样的形式。在这样意识朦胧的情况中，

好象被大人抓住肩头摇晃的孩子似的进行了审问。铃本想到：这好危险。到底他怎样回答一句一句的审问，他自己也不知道了。

佐多被关进去的那间拘留房，有四五个以各种罪名被抓进来的人。这是那排拘留房中最尽头的一间，斜对面不远就是审问室。

他被警察抓来的时候，一次又一次地想：我们所以受这样的罪，是因为英勇地担当了伟大的历史使命，企图以此来说服自己。可是他的精神却完全相反地从心里瘫痪下去了。当他走进拘留房的时候，他感到“此生休矣”的黑暗的感觉。好象汽车疾驶到悬崖的顶边，再也不能操纵，心里啊哟一声，用手掩住脸。他所感到的正是这一刹那间的心情。在这种心情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以前读过的列宁和马克思的书也都没有了。“此生休矣，此生休矣。”只有这一句话，象海带卷一样，一重又一重地卷住了他全部的身心。

再加这个跟垃圾箱一样的拘留房，使他那绝望的心情，加深了两倍三倍的黑暗。屋子里没有日夜早晚的分别，始终是昏暗的，到处发出霉蒸气，中间铺着两张抹布似的席子，如果揭起来，底下一定会爬出大堆的蛆子、昆虫和腐烂发霉的尘土。空气凝滞不动，发出厕所的气味，是一种吸进去好象有渣似的留在肚子里，胸头会翻腾上来的臭水沟似的空气。

他因为在公司里办事，虽然没有出头露面，却也真正学了一些革命理论，跟大家一起参加了实际工作，可是从各种环境生活的习惯来说，跟处在低生活水平的工人，究竟不能不有所不同。在平时，没有感到这一点。当然只要他努力，这种事情也决不能

成为他参加革命事业的障碍。——拘留房的空气，不到两天之中，已经在他高贵的身体上发生了深刻的反应。他不时恶心，可是没有吐出东西来。在家里的时候，每天早晨上厕所，现在也不上了。食物恶劣和运动不足，立刻在他的身体上引起了变化。第四天早上强制自己到厕所去，可是努力了三十分钟，只拉出了硬巴巴的老鼠尾巴那样细细的三段。

在拘留房里他独自一人象孤岛似的离开着别人。他总是了解：那些人到了这种地方还能够那么舒服、高兴（看样子是这样的），大家谈这谈那。可是佐多一动不动地呆着，马上又觉得受不了。他站起来在屋子里毫无目的地踱着。有时偶然靠在板墙上，就那么一直沉思起来。他想到妈妈一定比自己还伤心。妈妈所说的那种“小康的、幸福的生活”不是已经实现了吗。可是自己把它毁了。从此长时期的生活，就只有牢狱和苦斗！一辈子将永远过一种没有休息、栽倒在地下、昏昏迷迷的阴暗的生活。他好象历历在目地望见了自己的一生。他甚至想，我正是“枉费心机”了。他好象浸透了水的海绵，从心里沉溺在感伤中了。

一个眼光很尖的近六十岁的汉子，据说已当了三十年“小偷”的，对他说了：“真可怜，这儿可不是你这种人来的地方啊！”

这句话，意外地使他胸头忽然发热，差一点哭出来了。可是他不但克制这种感情，却迷迷糊糊自溺在这种感情中，甚至以此自慰。要不那样他可受不了。

第一次的、而且是突然到来的对他的过于强烈的刺激，稍微有一点习惯之后，佐多已能够从这种思想中一点点摆脱出来了。我们的运动不可能没有一点牺牲就能成功。有一种人，光是兴奋着，自己什么也不干，单想一脚跨到（一定有人代干了的）革命成功的世界，对于他们，眼前的这种经验，正是最好的警惕。——

佐多终于有这样想的余裕了。中间阶级所特有的，认为自己不白费心思去管闲事，就可以过小康日子的意识，总是时时露出头来。工人们干这运动，是因为自己生活太苦，并不是为谁而是为自己。可是象佐多这类人，只要心里放松一下，好象是“为着别人”的那种感情，就跟脱出链子的狗一样，马上自然地跳出来。他知道自己已经开始陷入过去常常想到的、认为危险的陷阱里了。他对自己的糊涂大大地惊心。

但佐多的这种思想，并不是很有力量的。每天或是一天之中，这两种相反的情绪在他的心里反复交替。每交替一次，他就一会儿变得忧郁，一会儿变得快活。时间长得可怕，没有什么事情干，不得不老呆在一间屋子里。除了这件事，他没有别的可想了。

晚上，也许已经过了十二点钟，佐多被睡在身边的一个“不良少年”摇醒了。

“喂……喂，你听见吗？”在黑暗中，很低很低的声音，就在他的身边。

开头佐多不明白是什么事情。

“你静静地听。”

两个人屏住了呼吸，全神贯注在耳朵里，耳朵里有一种深夜中常有的嚤然鸣叫的声音。佐多从迷糊中清醒过来了。

“听到了吗？”

远远地象击剑似的竹板子的声音（确实是竹板子的声音），传进他的耳朵里来了。不但竹板声，其中还夹杂着皮肉声那样的声音，可是不很清楚。

“听，听……听，哪。”那声音每高一次，不良少年就这样提起他的注意。

“这是什么？”佐多低声问他。

“动刑啊。”

“……！？”咽喉里好象突然吞进了一根铁棍。

“你再仔细听啊，对不对，喂，喂，那是受刑的人在叫唤，哪？”

佐多不知道在叫唤什么，可是这是一种悲痛的叫声，只要听过一次，就刺进心里，一辈子也忘不了。当他凝神静听的时候，仿佛半夜里发生火灾，听到悲凉的钟声时一样，身体哆嗦起来了。“牙齿龈”再也合不拢来。他不自觉地一只手抓紧了被口。

“听出来了！好象在叫，杀——吧，杀——吧！”

“是叫‘杀——吧’吗？”

“哪，你仔细听。”

两个人又屏住呼吸倾听。叫声从远处，象提琴的最高音一样又细又尖，针尖似的刺进他们两人的耳鼓。杀——吧，杀——吧！不错，真是这样在叫。

“哪，哪。”

“……”

佐多双手掩住耳朵，脸埋在汗臭的油腻的棉被上，耳朵和脑髓的深处，却还听见那个叫声。过了一会，这声音停止了。听到审问室的门打开来。两人把脸凑近小窗子向走廊上望。听到杂乱的脚步声，有人被拖出来了。瞅见前面有两个人走过来。电灯很暗，瞅不清是什么人。只听见哼哼的呻吟，和被压抑着的又低又粗的喘声，在静寂的走廊下传过来。当两人走过他们跟前的时候，他们听见警察的声音：“你这人太倔强了。”

佐多这一夜怎样也睡不着，脑袋一阵阵发痛，终于起来了。

他想到“受刑”，光是想一想，脊梁肉就抽搐发痛，膝头自然地哆嗦起来，甚至想软塌塌坐在地上，嗓子眼干得难受。

以后又过了两天，值班的看守把佐多叫起来。他想：来了！站是站起来了，可是他的身体跟木头一样，不是照自己的意志来行动的。他想对看守说话，可是他的下颏忽然掉下去，意外地“噢呜，噢呜，噢呜”发出婴儿一样的声音。

看守不懂他是怎么一回事，把一直在口里喷着的烟圈停下来，问道：“怎么啦？”

龙吉的审问又是另一种情况。当初，他还在学校的时候，曾经被捕过三次。不过，那时候，在他看来，倒是警察方面对他还有点畏惧。他们从不对他称“你”或“你这家伙”，而称他做“您”。他们的态度，倒似乎是向龙吉请教的样子。可是从龙吉离开了学校公开投身运动以来，就渐渐变化了。“你”和“你这家伙”有时也混用起来，而且过去的态度露骨地改变了。不过对付知识分子的他，跟对渡、铃本、工藤他们不同，究竟是客气得多了，龙吉觉得好笑。渡曾经说过：“假如在警察局里狠狠地挨过一顿揍，小川先生一定会变成更厉害、更有希望的人物。”这种话，渡常常随便说的。

“我的感受性比你敏锐，结果还不是跟你一样。”

到现在为止，他不过碰到个把带威胁性的耳光罢了。可是，这回的案件，他跟渡他们同样受到警察的注意。这样，他就碰到“厉害”了。

审问室屋顶的横梁上装着一个辘轳，辘轳两边挂下两个绳头。龙吉的两脚被拴在绳子的一头上，人就倒吊起来了。然后跟“打夯”一样，把他的脑袋在地板上咚咚地撞。每撞一下，全身的血就跟打破了闸口的急流一样，全涌到脑袋上来，他的头脸成了一个真正的火球。眼睛又红又肿地暴出来。

“救命啊!”他叫了。

做完了这个刑罚之后,又把他的手放在滚水里。

龙吉知道有好些同志,在警察局里受了非刑拷打,结果“遭了杀害”,有的是直接在自己周围的人,有的是在报刊上间接见到的。这些人变成遍体鳞伤的尸体从警察局引渡出来的时候,警察局一定说他们是“自杀”的。明明知道绝对没有“这个道理”,可是你到哪儿去控告呢?——法院吗?不管外表怎样,它跟警察局是串通的。因此在警察局里不管遭到什么,总是没有办法的。这还不是一套把戏吗。

“这是这次案子里的大家伙。”拷问员说。他在头脑里恍恍惚惚听到了这句话。

接着,龙吉被剥光了外衣,用一条三股麻绳抽打。呼的一下,整个身体缩成一团。鞭子的一头反拨过来用全力卷到他的胸脯上,一直嵌进肉里,这使他更加受不了。他的棉毛衫裂成一条一条的。——当他把大部分失掉感觉的身体,好容易斜靠在警察的肩上,踉踉跄跄地沿着走廊走回去的时候,他才知道,没有受过“拷问”以前,想到“拷问”,感到残酷,心里害怕,但实际受了“拷问”以后,原来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想到自己终于身当其境,受到拷问的滋味,才知道人身中有一种想不到的“抵抗力”。那时嘴里虽然嚷着:杀——吧,杀——吧,实际上在这一刹那间一点也不感到残酷和痛苦,这只是一种“极度”的,是的,一种极度的紧张。“人是不容易死的”,这句话果然不错。龙吉心里这样地想。可是当他被送进关着流浪人和乞丐的拘留房的时候,他忽然意识到已经关进屋子里,就突然昏过去了。

第二天早晨,龙吉发了高烧。看守他的老警察,用湿手巾按在他的额上给他退烧,他一直说着呓语。过了一天,他醒过来

了。那流浪人说：

“你的胡话说得真厉害。”

龙吉吃了一惊，不让对方说完，就着急地问：“说了什么？”他慌张了，是不是在看守的警察跟前，说出了不该说的话呢。他从一本什么书里看到过，在外国，甚至有一种混账办法，在审问的时候，注射一种使人说呖语的药水，来盗取口供。

“你说：‘不是那么容易死。’过了一会，又说：‘不是那么容易死。’不知怎地，光说这一句，说了有几十次。”

龙吉浑身紧张地屏住了呼吸，听了这话，才透出了一口大气，立刻不自然地大笑起来。可是笑声震动了伤口，不觉叫起痛来：“啊唷，啊唷……”

在练武厅那边，听说斋藤受过拷问之后，发神经病了。原来斋藤在受审问中，当“照例”准备开始用刑的时候，突然“哇！！”的叫了一声站起来，在屋子里手舞足蹈地乱跑，嘴里大声嚷着：“哇——，哇——，哇——！！”开始，警察们楞住了，跟木头一样站着不动。大家觉得害怕，认为当“拷问”这一个念头传达到他脑子里的一刹那间，他突然奋昂起来，发起神经病来了，因此谁也没有动手。

“假装的，动手啊！”

司法主任倒拿着铅笔，在记录纸上旋转着，冷冰冰地低声说。警察象舞台上笨拙的跑龙套似的，围住象受惊的马一样发起疯来的斋藤——乱打乱揍。一动手打人，大家就恢复了平常的“拷问意识”。有一个警察用竹板横扫过去，扫到斋藤的脸中心。鼻血跟火光一样“灿烂”地喷出来，一下子就染红了斋藤衣服的前襟。他发出“哇——，哇——”的叫声（其中带着一种奇特的空虚的感觉）跳起来。他的脸染红了，好象刚从血水中捞出来

似的。

“这家伙现在问不出什么来了。”司法主任说。“停止。——以后再审。”

为了毁灭证据，警察没收了他的血衣。

这样，斋藤有十天没有再受审。其中三天留在练武厅，后来就移到拘留房去了。可是经过拷问之后，斋藤的神气看来比以前更加精神了。但这种精神饱满的神气，跟普通不同，有不自然的地方。人家对他说话，他常常发楞。偶然安静起来，就一个人喃喃地自言自语。

很多工人，连工作服也没换掉，接连着被抓了进来。每天——接连十天、二十天，继续着这次的大逮捕。不值班的警察，没有例外地每天发五毛钱加班费被派出去抓人。从早晨到夜半，东奔西走，身体累得跟鬼头豆腐^①一样。他们由于疲劳过度，轮到来拘留房当看守的时候，马上就打起瞌睡来；连对自己亲手抓来的人，也念叨起警察生活的苦经来。那些受警察拷问，并且从各种机会明白警察都是反动的人们，发现了这样的警察，完全出于“意外”。啊，对啦，原来在“这一点上”也是一致的。他们只是被人用种种方法蒙住了眼，被催眠术巧妙地迷住罢了。那么，应该怎么办呢？谁应该去拿开遮蔽他们眼睛的东西，谁应该让他们从催眠术中醒过来？——出乎意外地，原来他们不是咱们的敌人。龙吉和其他的人都这样想。

终于，被捕的人们对那些受强迫劳动的警察，不胜同情了。无论怎样恶劣的工厂，也不会这样“剥削”人。

“反正什么都行，只希望快点得出一个结果。”一个头发稀

① 一名菟藟，一种有软体块根的植物。

薄、脸色青苍、长着许多胡子碴儿的警察对龙吉说。“喂，连孩子的脸也有二十天——嗨，二十天——没有见了，这不是说着玩的。”

“啊唷，真难为你了。”

“不值班的时候上班——不，给拉来上班的时候，给五毛钱加班费，吃一顿午饭一顿晚饭就没有了，结果就是白干。——实际上连饭钱也不够，把人不当人嘛。”

“喂，水户部先生（龙吉知道他的名字），对你说这样的话也许不合适，我们干的事情，也都是为了你所说的情形呀。”

水户部警察马上放低了嗓子说：“对呀，老实说，你们干的事情，我们心里也明白，不过……”

龙吉故意象开玩笑似地说：“不过，你这个‘不过’实在是可以用不着的呀。”

“嗯。”警察想了一想，没有吱声。“……总而言之，这日子实在不是人过的。你是当过教授的人，对你说句体己话（龙吉苦笑着点一点头）。昨天，无论如何，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在看守的时候不管一切就睡着了。正想：这样也好。却又来了逮捕令，真要命。四个人还是勉勉强强出发了，在路上，有人说：‘咱们也来罢一次工吧。’”“嘿，警察罢工。”可是警察说得很认真，他就马上停止了开玩笑。

“这时候就有人说：‘讲到罢工，精通这门的先生可多着呢，只要请教一下就行。而且，这回的事件是全国性的，到处都忙得不亦乐乎，罢起工来，决不会失败，保证胜利。’”

龙吉对这谈话开始感到很大的兴趣了。

“其中也有人说：‘我呢，只要把局长打倒，伸开手脚，舒舒服服，呼噜呼噜睡一个大觉——就是一次也行。’”也有人说：‘局长

那家伙精神为什么那样好，原来这回的事件，本市的大地主、大资本家都捐了赞助金，把他的荷包装满了。’……”

龙吉竖起耳朵来，注意地听。

“事情可闹大了。大家都说：‘不愿意再干啦。’说着，故意把步子放慢。又说：‘咱们到那儿去休息休息吧。’结果，就跑到H派出所聊起天来了。”

“后来呢？”

“就是这样，没有别的了。”

“……”

“说一句体己话，袒开肚子来看，哪一个警察都是一样。只不过因为自己是警察，在长时期的警察生活中，改变了本性，一下子不是那么容易办。”

龙吉显然兴奋了。他想：“这实在是重大的事情。”他好象第一次见面一样，重新望了望水户部。这个警察坐在橘子箱搭成的台子上，面对着走廊，有一个又厚又宽的圆圆的向前微屈的肩头。在龙吉看来，这形象特别有一种亲热的感觉，真想同他紧紧地握一握手。心里热切地感到一种冲动，想拍拍他的落满头皮屑和尘土的、钉着肩章的旧洋服的肩头，叫一声：“不错呀，老兄。”

九

这是龙吉从练武厅隔离两三天以前的事。在那一日的四五天前，有一个从前在工会里认识的叫做木下的工人，审问的结果被隔离到一号拘留房去了。大概晚上十点钟左右，这人同警察

一起到练武厅来。两个人动手收拾留在那里的木下的行李。龙吉醒过来了。

“喂。”龙吉低声叫他。

木下向龙吉那边一望，好象把脑袋轻轻地动了一动，低声说：“解到札幌去。”

龙吉只说了一声“嗯？”心脏好象突然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抓了一把。解到札幌去，这就是说十之八九，不能不断念了。

龙吉记得木下离开练武厅的时候，头发很长，现在发见他已剪短，露出青青的头皮，就问：“头怎么啦？”

木下脸色阴沉了一下：“老被抓住头发不好受，剃光了。”

把行李收拾好，警察催木下走。正要出去的时候，木下迟疑地向警察说了什么。警察就走到龙吉跟前，用不耐烦的口气说：“木下说，你有烟卷给他几支。”

对啦，想起来了。——在工会里，木下也老向大伙一支两支要去了烟卷，抽得很有滋味。龙吉很高兴，对解到札幌去的木下，还可以送几支烟卷，这真是求之不得。他象发了慌似的，走到自己行李包那儿，连忙拿出蝙蝠牌的盒子。可是，怎么回事，只有一盒，而且那么轻！不如意的时候什么都不如意。三支，盒子里只有三支，他好象无心中干了坏事的孩子一样。

“朋友，只有三支了。”他满心不安地说。

“行，行，够了，谢谢你！”木下好象孩子接到人家的赠品一般，两手半叠着伸出来。

“一支够了！”

站在旁边的警察，一下子就拿走了两支。在一刹那间，两个人默然地楞了一楞。

“让他抽烟，已经过分啦！”

什么“啦”不“啦”的！龙吉激动得浑身哆嗦了。可是他说：

“对不起，只有三支，木下对烟卷特别……”

警察不让他说完：“没有人说只有三支呀。”

木下做出石头一样呆木的表情，没有吱声。放着只有一支蝙蝠牌的手掌微微颤动。——两人出去之后，龙吉想象着木下的情绪，心里都想哭出来，把警察交还给他的蝙蝠牌，捏得粉碎。

“嘿，他妈的，他妈的！”

三天，四天，十天过去了，可是日子那么长，不是这么计数目那样简单，——它好象是无穷无尽的。渡、工藤、铃本，对于拘留所中的“沉闷”生活，倒有一点习惯了。即使习惯的程度各人不同，但他们的神经较比龙吉和佐多要粗一些，所以还能够受得住。特别是佐多，他是悲惨地垮台了。

佐多的屋子离渡的地方不远。一到晚上，佐多坐立不安地闷着声，心里焦躁得象中了毒变成半“白痴”似的糊里糊涂的时候，隔着几道门的对面，听到低低唱歌的声音：

太阳出来又落山，
监狱永远是黑暗；
看守不分昼和夜，
站在我的窗前。

这是渡的歌声。值班的看守，对渡似乎不再去干涉了。

愿意监视，你就监视，
反正逃不出牢监；
我多年想望着自由，
挣不脱千斤锁链。

最后“挣不脱千斤锁链”两句，一听就知道是渡用他特有的深沉有力的嗓子唱出来的，而且单把这两句，几次几次重复地唱。佐多觉得渡的心情直接传到了他的胸头。

这是佐多时刻等待着的娱乐。时间每次都在黄昏。从前佐多对于这样的歌，常常用轻蔑的口气称为“通俗艺术”，现在也完全改变了。不但对于歌声，就是外边行人的单调的脚步声，雪地上的木屐声之类的声音，仔细听来，也第一次感到其中包含着复杂的音阶；从不知何处传来的听不清的喁喁的谈话声中，也感到奇怪的音乐美的调子。他一小时、两小时地倾听雪花落在屋顶上的轻微的窸窣声，引起各色各样的幻想，把自己的心从沉闷中解救出来。他什么都不需要，只需要“声音”。如果要证明他的心还是“活着的”，那也仅仅是每个对“声音”的反应罢了。关在一起的不良少年谈怎样勾引女子，流浪人谈悲惨的生活等等，每次都能引起佐多的兴味，可是，听了两三天，也已经腻味了。

小樽有一种有名的东西，是专门替商店做广告的人。他们受市内商店的委托，扮成小丑的样子，站在十字街口用滑稽声调念广告词句，还加上打鼓吹笛。有一次，这种做广告的人恰好在拘留所附近。梆子声象震裂了冻结的空气，很响亮地传进来，接着就听见滑稽腔的广告词。

“啊哟哟!!”这真是名副其实的“啊哟哟!!”拘留所里所有的人，象“攻城”一样全都涌到小小的四角的高窗子那儿去，后边的人用力一跃，跃上别人的脊梁，再后边，又有别的人叠上来。——对于“声音”的饥渴，可不仅是佐多一个人。

晚上，他好几次梦见母亲。特别是母亲来探望的那天晚上，迷迷糊糊睡过去，就梦见了母亲；再睡着，又梦见了母亲……一直到早晨，接连梦见无数次。

“你瘦了，脸色不好呀。”

来探望的母亲，一见他的脸就哽咽着说。

“我每天都求告先人，让你快快出来。”母亲拿出又皱又脏的手绢，掩住了脸。母亲所说的“先人”就是死了的父亲。喜欢干净的母亲，使着这样脏的手绢，他见了心里真难受。可是母亲喋喋不休地说着莫名其妙的话，抽抽噎噎地哭起来了。他脸冲外站着，这时候母亲伸过手来，弄平他衣襟上的皱褶。他很窘迫地耷拉着脑袋，直接在脸上感到母亲的气味。

回到拘留房里，打开母亲送来的包裹。在别的许多东西中间，发见一瓶紫色小方瓶的眼药。佐多在家里的時候，每晚上睡觉以前有点眼药的习惯。

“究竟是妈妈呀，来看你的是你妈妈吗？”在旁边看着他打开包裹的不良少年，见了就插进嘴来。“我也有妈妈呀。”

过了四五天，佐多从警察局出去了。

他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外面。——可是，确实，这是外面。不错，是明亮的雪光“照耀着”的外面。他走到外面，觉得一阵眼花。总之，这是“外面”呀！有某某的家，有××店，有×××桥，什么都是熟悉的。天空，还有电杆柱子，狗！连狗都真的在那儿。孩子，人，“自由”行路的人们，比什么都自由！

唉，终于回到这个世界里来了！

他感到一种冲动，想跑过去对那些走过的人，不论男的、女的、小孩子，谈谈，笑笑。这是一点没有夸张的情绪。他的胸头激动着，抑不住从内心中发出来的欢喜。“终于，终于，终于出来了！”他不禁哭出来了。一哭，眼泪象心跳一样，滴滴答答地接连着流出来了。他也不管行路人停下脚来诧异地望他，却抽抽噎噎地哭出声来了。他什么也没有想，除了自己，再也想不到别的。

什么人和事！他没有那样的余裕了。

“终于出来了，终于，终于！！”

——佐多出去这件事，一传二，二传三，传到各个拘留房里去了。

渡对于这件事，没有引起什么特别的感触。他觉得佐多没有必要关在拘留所里，出去了也好。他不大熟悉佐多，虽然参加同一的运动，对于公司职员——知识分子出身的人，总觉得不合脾胃。也不是什么讨厌，就是不关心罢了。

可是工藤却跟龙吉一样，认为这种知识分子，接连地投身到运动里来，就会带来他们所没有的各方面的知识，给他们因为没有经验，容易急躁冒进，简单从事的运动，加上了厚度和深度。当然，象佐多那样，虽然有他的许多缺点，可是留在队伍里，只要遇到非他不可的任务时，能够好好地完成就行了。特别是工藤，想到自己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应该要做的工作。

审问，在警察们使用疯狂的方法，创造出在这里写不完的（也许这就可以写成一本书）许多残酷故事中，接连地进行着。那些“事实”已经确定的人，就解送到札幌的法院去受预审。

在被押解之前，各个担任审问的司法主任、特高警察就自己“掏腰包”（？）请大家吃盖浇饭和饭卷^①，自己也陪着吃，立刻象拉关系一般向大家表示亲切。

“总而言之，”谈话中顺便（顺便?!）用轻松的口气说。“总而言之，照在这里审问时候的口供说就行，口供不同，法官就会说

① 日名“寿司”，一种用紫菜包的饭卷，中间夹入鱼肉之类。

你们态度不老实，反而对你们不利……”

以后，就随便闲谈着，重新用不在意的口气，反复说同样的话。

“你们这样请客，当不起呀。”渡、工藤、铃本他们明明知道他们的意思，故意嘲弄他们。

“明白了，明白了，我们什么都不说，就照原来的口供。”半开玩笑地向他们点点头。

斋藤和石田，吃到这样好的东西，开头还有些莫名其妙，不明白这是特高警察和司法主任的“手段”。因为他们一手造成的“口供记录”假使在预审时全部叫被告给推翻了，就有被撤职的危险，或是给上级留一个不好的印象，对以后的升级和发展大有关系。渡他们完全抓住了这个弱点，就反过来利用它，在去札幌的路上，要押解的特高警察，在车站上买盒子饭^①和馒头请客。

“可怜，不要逼得太厉害呀。”特高警察这样地诉苦了。

到四月二十日为止，拘留在小樽警察局里的全部人犯都被押解到札幌去了。警察局立刻空了。只有墙上的题壁，在无人的屋子里显得特别引人注目。大家住过的屋子的墙上，几乎不约而同地、仔细地刻着：

不要忘记三月十五日！

共产党万岁！

记住三月十五日。

日本共产党万岁！

^① 日名“辨当”，用木片盒子装入饭菜，在车站等处出售，可以代餐。

一九二八,三,一五。

打倒田中反动内阁!

共产党万岁!

劳动农民党万岁!

全世界工人团结起来!

记住三月十五日。

不要忘记三月十五日。

建立工人农民的政府。

日本共产党万岁!

(1928 年 8 月 17 日)

船 工 蟹

叶渭渠译

本篇原名《蟹工船》，发表于 1929 年《战旗》杂志五、六月号。译文根据 1954 年岩波书店文库本译出。

“喂，下地狱喽！”

两个渔工凭倚在船栏杆上，了望着函馆市街。它象蜗牛伸展身子似的，坐落在蜿蜒的海湾边上。一个渔工把短得快烧到手指的烟蒂，连同一口唾沫从嘴角吐了出来。烟蒂以各式各样的调皮姿势飘舞着，顺着高大的船身落下。这位渔工浑身散发出一股酒味。

有的轮船鼓起红色大肚子，浮在海面上；有的象在装货，船身倾斜得很厉害，宛如一只袖管正被人从海里使劲往下拽；黄色的大烟囱；大铃铛似的浮标；跟臭虫一样从船缝间匆匆穿行的汽艇；波浪翻腾、冒起寒气的海面，漂浮着煤末、面包屑、烂水果，活象一幅别致的花布……煤烟趁着风势，掠过海面，飘来一阵阵熏人的煤臭气味。吊车的响声不时顺着波浪嘎嘎地直传过来。

一艘油漆剥落的帆船，从船头象牛鼻孔的锚洞里抛下了锚链，停靠在“博光号”蟹工船跟前。两个叼着大烟斗的外国人，象机器人似的在甲板上转游。好象是艘俄国船。这准是艘“警备船”，来监视日本蟹工船的。

“我身上连个子儿也没有了。妈的，你瞧。”

一个渔工说着，移动了一下身子，把另一个渔工的手，拉到自己腰间，按了按劳动服下面的粗绒布裤的裤兜。里头好象有

个小盒子。

另一个渔工没吱声，瞧了瞧这个渔工的脸。

“嘻嘻嘻嘻……”他笑着说，“是花牌^①呀！”

在上甲板上，一个“将军”模样的船长，抽着烟踱来踱去。口里吐出的烟雾，绕过鼻尖急速地飘散开去。一个船员，拖着木底草鞋，提着装食物的铁桶，在前舱急匆匆地跑出跑进。——一切准备就绪，马上就可以启航了。

两人从上边往杂工住的舱口窥望下去，看见一群孩子正在阴暗的底舱舱铺上嬉戏打闹，就象一群小鸟从窝里探出头来唧唧喳喳叫着一样。他们都是些十四五岁的少年。

“你是什么地方人？”

“××街。”少年们异口同声地回答着。都是函馆贫民窟的孩子，因而都挤到一块了。

“那边舱铺上的呢？”

“南部。”

“这边的呢？”

“秋田。”

他们分别挤在不同的舱铺里。

“秋田什么地方？”

那个拖着两条黄脓鼻涕、眼眶烂得象翻开了眼皮似的孩子说：“北秋田呗。”

“是种地的？”

“是。”

空气沉闷，散发着一股烂水果般的酸臭味。因为紧隔壁的

^① 一种赌具。

舱房放着几十桶腌菜，所以又夹杂着“大粪”一般的臭气。

“这回得老子搂你睡罗！”渔工嘻嘻地笑了。

在阴暗的拐角地方，一个身穿劳动服和扎腿裤、头上裹着叠成三角形的包袱皮、象个女苦力模样的母亲，正在给趴在舱铺上的孩子削苹果吃。她一边看着孩子吃，一边自己嚼着削成串儿的苹果皮。嘴里象在说着什么，一次又一次地把孩子身边的小包袱，解开了又包上。类似这样的人就有七八个之多。从内地来没人送行的孩子们，不时地偷望着这边的情景。

一个全身沾满水泥粉的妇女，从牛奶糖盒里拿出糖块来，递给身旁的孩子每人两三粒，一边说：“和俺家的健吉一块好好干吧，嗯。”

她的手象树根一样难看，又大又粗。

有的人给孩子揩鼻涕，有的用手巾给孩子擦脸，还有的嘁嘁喳喳地同孩子说话。

“你的孩子身体真结实呀。”

母亲们聊开了。

“嗯，还凑合。”

“俺家的呀，身体可不好了，本不想让他去的，可是……”

“唉，大伙儿都一样呀！”

两个渔工把脸从舱口转向甲板，吐了一口气，带着不快的心情，默默地离开杂工住的舱口，跑回靠船头自己那梯形的“窝”里去了。每次起落锚链，大家都被震荡得互相碰撞起来，仿佛被扔进了水泥搅拌机里似的。

在昏暗中，渔工们象猪一样地滚在一起。而且这里就跟猪圈一模一样，散发着一股臭味，叫人恶心。

“真臭，真臭。”

“当然喽，咱们这些人沤得都快烂了，还能不臭！”

一个脑袋长得象红石臼子的渔工拿起一只只能装一升^①烧酒的瓶子，直接往缺口的饭碗里倒酒，贪婪地嚼着鱿鱼干，喝着酒。他旁边有个人仰卧着，一边吃苹果，一边翻看一本封面残缺的《讲谈》杂志。

四个人正围着喝酒，另一个没喝够的又挤了进来。

“……是呀，在海上要漂四个来月哩，我想往后再别干这玩意儿了……”一个身体健壮的汉子这么说着。他不时地习惯性地舔着厚厚的下唇，眯缝着眼睛。

“喏，钱包变成这个样子了。”他举起扁得象柿饼一样的空钱包，在人们的眼前摇晃着。

“那个婊子，个子虽小，可真有两下哩！”

“喂，别说了，别说了！”

“好哇，好哇，继续往下说呀！”

对方嘻嘻地笑了。

“喂，你瞧，真叫人羡慕。唔？”一个渔工的醉眼正好落在对面的舱铺上，将下巴颏儿朝那边一扬，“嗯！”

那个渔工正在把钱交给他的老伴。

“你瞧，你瞧，喂！”

这对夫妻把皱巴巴的钞票和一堆银币摊放在小箱子上，一块点数。男的舔了舔铅笔头，在小本子上记些什么。

“瞧啊，唔！”

“别小看我呀，我也有老婆孩子了。”方才谈论过婊子的那个渔工，忽然气冲冲地说。

① 一日升约合我国二升。

“我呀，本来打算这回就不再上船了，可是……”在离这边不远的舱铺上，一个留着平头的年轻渔工，由于酒还没醒，浮肿的脸显得苍白，大声地说，“被荐头拉着到处逛，结果落得身上一个子儿也没有了。只好又来过几个月的地狱生活。”

大概是从同一个地方来的一个汉子，背向这边，跟他悄悄地在说些什么。

舱口舷梯上出现一双里八字脚，一个背着老式大布口袋的汉子，晃晃悠悠地从梯子上走了下来。他站在舱板上，举目四望，找到个空铺，就马上爬了上去。

“你们好。”他说着，向旁边的人点了点头。他的脸象涂上了什么似的，黑黝黝的。

“让俺也搭个伴儿吧。”

后来才晓得，这个人上船以前，在夕张^①煤矿当过七年矿工。这次瓦斯爆炸，差点送命。虽然这样的事，以前曾经历过多次，但这次他却忽然害怕起来，离开了矿山。瓦斯爆炸时，他正在一条坑道上推着矿车。就在他把装满煤块的矿车，推到别人的掌子面去的当儿，突然觉得好象有百只镁光灯在眼前倏地闪亮一下，不到五百分之一秒钟，自己的身子就好似纸片一般飘了起来。好几辆矿车，由于瓦斯的压力，腾空而起，轻得象空火柴盒，嗖地飞了过去。后来，他就不省人事了。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自己才又在呻吟声中苏醒过来。工头和壮工为了防止爆炸蔓延到其他地方，在坑道里打上堵墙，封闭巷道。这时候，他“清楚”地听见墙后有人呼救。这种声音，矿工只要听过一次，就会象用针扎进心窝一样，永生难忘。要救还是能够救出来的。他

① 北海道的一个煤矿城市。

急忙站起来，发狂似地冲进人群，叫喊起来：“不行呀！救人呀！”

（虽说以前我自己也打过这样的墙，但那时并不觉得什么。）

“混蛋！火势蔓延过来，损失就大了。”

可是，呼救声不是渐渐低下去了吗？他似乎想到了什么，就振臂呐喊，猛地冲出坑道，摔倒了好几次，额头磕在坑木上，全身沾满泥和血。中途，他又被矿车轨道的枕木绊倒，象被抛了起来跌到小铁轨上，又昏厥过去了。

年轻的渔工听完以后说：

“哎，咱们这儿也差不多呀……”

矿山来的渔工，他那矿工特有的、怕光的、没有神采的黄眼珠，直盯盯地落在年轻渔工的身上，沉默不语。

从秋田、青森、岩手来的“农民渔工”，有的盘腿而坐，双手交叠垫在屁股下面发楞；有的抱着膝盖靠在柱子上，眼睛直盯着大家喝酒；也有的在悉心倾听别人闲聊。他们都是从早到晚下地劳动，还是忍饥受饿，才被迫跑了出来的。家里只留下大儿子一个人，老婆到工厂当女工，二儿子、三儿子也不得不外出干活。即便这样还是不够糊口。过剩的人口就象热锅里炒豆子给崩出来似的，纷纷从农村流入城市。这些人都是想“积蓄点钱”再回老家。但是，出海干活的人，一旦上岸，就会被函馆、小樽的花花世界迷住，象落在树皮胶^①上的小鸟被粘住脱不开身了。这样七搞八弄，最后落得跟刚出娘胎时一样，赤条精光，然后被撵了出来，连家乡也回不去了。他们要在举目无亲的冰天雪地的北海道“过年”，不得不廉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就象擤下来的鼻涕一样不值钱。尽管他们年复一年被迫这样做，可是跟考试成绩不好的

① 用细叶冬青的树皮熬成的胶，可以粘鸟儿。

孩子一样，到了第二年，他们又无所谓地(?)重走着老路。

背着点心簍在码头做小买卖的女人，卖药的，还有卖日用品的小商贩，上船来了。他们在船舱正中划出一块如同孤岛的地方，把各自的商品摊出来。大家从四周的上下舱铺，探出身子，边起哄，边说笑。

“点心好吃吗？嗯，大姐？”

“嗳呀，不害臊的。”做小买卖的女人大嚷着跳了起来，说，“乱摸人家的屁股，讨人嫌啊！这个臭家伙。”

一个满嘴鼓鼓地咀嚼着点心的汉子，看见大家的目光都落在自己身上，难为情地痴笑说：“这个大姐真可爱啊！”

一个醉汉，用手扶着舱壁，拖着蹒跚的脚步，从厕所走出来，路过这里，顺手摸了摸这个女人黑里透红的胖脸蛋。

“干吗！”

“别生气，大姐。我搂你睡觉吧。”说着，向这个女人做了个怪样子。大家都笑了。

“喂，馒头，馒头！”一个汉子从远处拐角的地方大声叫唤。

“是……”一个女人用在这种地方所罕见的清脆娇滴的嗓音答应着，“要几个？”

“几个？要有两个不就成了怪物了吗？——肉馒头，肉馒头！”

大家顿时爆发出一阵笑声。那个年轻的醉汉缩缩脖子，也笑了出来。

他冬天在橡胶工厂当工人，每逢春天没活干了，就外出到堪察加去做工。不论哪种活儿都是“季节性劳动”（北海道的活儿差不多全是这样），一加夜班，就没完没了。据说这样干下去，“能够活上三年，就谢天谢地了。”他的皮肤跟粗糙的橡胶一样没有血色。

在渔工当中，有曾被卖到北海道荒僻的开垦场或铁路建设工程队当“猪仔”的；有无法谋生四处奔走的“流浪汉”；还有酒迷心窍的酒徒。被青森一带善良的村长挑选出来的“愚昧无知”、“木头疙瘩一样”憨厚的乡下人，也混在当中。对雇主来说，招募这种从四面八方来的人，是最合适不过了。（函馆的工会拚命想派一些工作人员到开往堪察加的蟹工船上做渔工的工作。同青森、秋田等地的工会，也取得了联系。——资本家对此比什么都害怕。）

侍役穿着浆洗得笔挺洁白的短上衣，端着啤酒、水果、酒杯子，在“船尾”的餐厅来回地奔忙着。在餐厅里，有“公司大亨”、船长、监工，还有在堪察加担任警备任务的驱逐舰上的要人、水上警察局的局长、海员工会“挟皮包的”^①。

“他妈的！就知道咕嘟咕嘟地喝，真没见过。”侍役噙起嘴嘟囔着。

渔工的“窝”里点着象玫瑰果的小灯泡。烟雾和人气使空气变得混浊、发臭。整个“窝”恰似一个“粪坑”。在隔开的舱铺上翻来覆去的人们，看去就象蠕动着蛆虫一样。渔业监工领头，船长、工房代表、杂工头子随后，从舱口走下来了。船长很珍惜自己那两撇翘起的胡子，不时用手绢去拂弄它。过道上扔满了苹果皮、香蕉皮、湿漉漉的长统雨靴、粘着饭粒的木纸^②之类，活象一道堵塞了的脏水沟。监工翻了翻眼珠，朝这些东西瞥了一眼，轻蔑地啐了一口唾沫。这帮人都象喝过酒，脸颊通红。

“我来给你们讲几句话。”监工的身体象壮工头那样结实，一只脚踩在舱铺边上，不时地用牙签把塞在牙缝里的东西剔出来。

① 指御用工会的办事员。

② 把木料刨成柔软的薄片，用以包卷食物。

他张口说道：“我不用说，有的人大概已经明白了，蟹工船这行事业，不应单看作是为一家公司挣钱的活计，这是国际上的一个大问题。我们，是我们日本帝国国民强呢，还是老毛子强？这是一场一对一的格斗呵！而且如果，如果呵，当然这样的事儿是绝不会发生的，但如果万一打输了，日本男子汉大丈夫就只有切腹，跳堪察加海了。我们个子虽小，但绝不输给粗笨的老毛子！”

“还有，我们堪察加的渔业，不仅蟹肉罐头，大马哈鱼和红眼鱼也是世界上有名的，占有优势的地位，这是其他国家没法比的。而且它还担负着解决日本国内人口过剩问题、粮食问题的重大使命。我说的这些个，你们也许不明白。但无论如何也要让你们知道：为了日本帝国的伟大使命，我们可要豁出命来冲到北海的怒涛去干它一场啊！正因为这样，我们到那边去，帝国军舰也会始终保护着我们。……如果有人想学现在老毛子的那种时髦，煽动别人胡作非为，那他就是出卖日本帝国的奸贼。当然这样的事儿是不会发生的，但你们可要好生记住……”

监工打了几个醒酒的喷嚏。

那个醉醺醺的驱逐舰的要人，象上了发条的洋娃娃，一溜歪斜地走下了舷梯，去乘坐等候着他的汽艇。水兵们把这个舰长连头带脚抬了起来。他重得跟装满石块的麻袋一样，几乎抬不动。舰长手舞足蹈，大喊大叫，好几次从嘴里喷出唾沫星子，溅到水兵们的脸上。

“表面上气壮如牛，实际上就是这副熊样。”

水兵们把舰长送上了汽艇。一个水兵站在舷梯的踏板上，解开了缆绳，冲舰长那边瞅了一眼，低声地说：

“干掉他吧！”

两个人咽了一口气，一齐笑了起来。

二

从右舷透过海面一片迷蒙的灰雾，望见祝津灯塔来回转动的闪闪亮光。当灯光转向别的方向时，一道长长的神秘的银色光柱，倏地射向几哩以外。

蟹工船经过留萌海面，天空下起蒙蒙细雨。渔工和杂工不时地把冻僵了的手，象蟹钳似的斜揣在怀里，或是团起双手，放在嘴边嘘嘘哈气，然后还得继续干活。如丝的细雨，不停地落在同样颜色的混浊海面上。船驶近稚内，雨点大起来了，密密麻麻地下着。宽阔的海面，起伏翻腾，象一面飘拂的旗子。风吹着桅杆，发出不祥的声音。不知在船上什么地方，不断地响起嘎吱嘎吱的声音，象铆钉松了似的。这艘近三千吨的蟹工船驶进宗谷海峡的时候，跟打嗝儿一样，颠簸起伏。船身仿佛突然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擎起，忽而浮到空中，忽而又沉到原地。每次下沉，船上的人犹如乘着电梯下降的那一瞬间，小便几乎要流出来似的，痒得难受。杂工似乎是晕船了，面色焦黄，翻着眼珠，哇哇地呕吐着。

从那被浪花溅得朦胧了的圆形舷窗望去，隐隐约约地看见库页岛上积雪的群山轮廓。但是，一个阿尔卑斯冰山般的巨浪，涌向挡风玻璃窗，山影很快就被隐没了。前面又仿佛出现一座幽邃的深谷，眼看迫近了，浪头嘭的一声劈头砸在窗上，碎裂成无数水星子，哗哗——哗地洒了下来。海浪就这样滚滚地擦过窗边，象跑马灯似的往船后边流去。船身象小孩儿摇晃着身子那

样，猛烈地颠簸摇摆。船上发出从舱铺上掉下东西的声音，折断东西的声音，和浪头打在船腹的嘤嘤声。这当中从机房传来机器的轰鸣，震得各种器具也微微抖动，哐当乱响。船身不时地被冲到浪峰上，螺旋桨打着空转，桨叶拍打着水面。

风越刮越紧。两条桅杆被刮得象钓鱼竿一样弯垂着，呼啸鸣叫。海涛象暴徒迈过一根棍棒那样，轻而易举地从船的这边涌上来，又从另一边泻下去。顷刻间，海水流出的地方，急泻成瀑布。

蟹工船有时象玩具船似的，孤零零地横卧在那可怕的浪山的大陡坡上，随即又跟打翻了似的，一下子掉进浪谷底里。眼看就要沉没了！可是，浪谷底里立即又涌起另一个浪头，嘤的一声击在船腹上。

船驶进鄂霍茨克海，海水显得更灰了。杂工正在干活儿，阵阵冷气，穿透衣衫，冻得嘴唇发紫。天气越冷，盐块一般干硬的雪粒呼呼地刮得越凶。雪粒象玻璃碴子，扎在匍匐在甲板上劳动的渔工和杂工们的脸上、手上。浪波一经溅过甲板，马上结上一层冰，变得滑溜溜的。大家只好从甲板这边到甲板那边拉上缆绳，象晒尿布那样把自己拴在上面，继续干活。监工手持打鱼棍，到处大声喝骂。

从函馆同时启航的其他蟹工船，不知不觉地各自分散了。可是，当船忽地象抛上了阿尔卑斯山顶峰的时候，间或望见远远有两根不停摇晃的桅杆，活象溺水的人伸举着的两只手。宛如纸烟烟雾一般的煤烟，贴近海面轻轻飘散开了。……从浪声和喊声中，可以隐约听见那只船象拉回声一样，间歇地鸣着汽笛。但是，过了这一瞬间，这边的蟹工船又战战兢兢似的掉到浪谷底里去了。

蟹工船上装着八只川崎船^①。船员和渔工为了把川崎船拴紧，不让好象几千条毗着白牙齿的鲨鱼追逐过来似的大浪所吞没，不得不把自己的生命作“廉价”的赌注。——“你们这号人的一两条命算得了什么！如果卷走一只川崎船，那可就不得了哩！”监工用日本话毫不含糊地这么说道。

堪察加海展现在面前了。海浪宛如等待了好久似的，说了声“来得正好”，就张开大口，象一头饿狮一样扑了过来。蟹工船简直比小兔子还胆怯。漫天飞雪，看去好似一面大白旗子，呼啦啦地随风飘着。天快黑了，但海上的暴风雨仍没有停息的样子。

收工之后，大家挨个儿回到“粪坑”里去。手脚冻得失去知觉，象几根萝卜垂挂在身上一样。各人都跟蚕似的爬进自己的铺位，谁也没有开口说话，揪住铁柱子，便一摔身躺下了。船身颠簸得很厉害，就象一匹野马猛晃着身子，要赶走背上的牛虻一样。渔工茫然的目光，时而落在熏黄了的白漆天花板上，时而又投向几乎没进海里的黝黑舷窗……有的渔工象发呆似的半张着嘴。大家什么也没想，只感到一种茫然的不安，把脸沉下来。

一个渔工仰起脖子，就着酒瓶咕嘟咕嘟地一口气把威士忌喝个精光。瓶角在褐黄的昏暗灯光下，闪闪反光。他从舱铺上用劲把威士忌的空瓶子扔到过道上。酒瓶骨碌碌地打着滚儿，划出两三道“之”字形的亮光。大家都转过脸来，把视线追向那个空酒瓶子。在拐角那边，有人在愤愤地喧嚷着。在暴风雨中，话声断断续续的，只听到片言只语。

“离开日本啦！”那人用臂肘擦拭着舷窗。

“粪坑”里的火炉，奄奄一息地冒着烟。“活”人被当作大马哈

① 蟹工船上带的一种捕蟹用的帆船。

鱼和红眼鱼似的扔进了这个“冷藏库”，索索地直打哆嗦。一个巨浪从覆盖着帆布的舱口上呼啸掠过。每当激浪扑打在“粪坑”那象大鼓的内壁似的铁板壁上，就发出猛烈的回响。仿佛有个汉子在渔工舱铺的紧旁边，不时地用宽大的肩膀猛撞过来，弄得咚咚作响。蟹工船现在就跟垂死的鲸鱼似的，在惊涛骇浪里痛苦地挣扎着。

“开饭啦！”厨师从伙房门口探出上半身，用手圈在嘴上喊：“今儿起了风暴，没有汤喝。”

“什么？”

“臭咸鱼！”说话的人把头缩了回去。

大家都爬起来了。个个吃起饭来就跟囚犯一样贪婪，都是狼吞虎咽的。

他们盘腿坐着，将咸鱼碟子放在两腿中间，一边吹着热气，一边把热饭塞进嘴里，不停地咀嚼着。“最初”的一阵热气扑向鼻头，鼻水不断地往下流，差点儿落到饭碗里。

正在吃饭，监工走进来了。

“别跟饿鬼那样一个劲地猛吃啦！不能好好出活儿的日子里，还撑开肚皮穷吃，受得了吗？”

他瞪眼扫了一下上下舱铺，把左肩往前一晃，走出去了。

“这小子凭什么说这种话？”一个学生出身的、由于晕船和过度疲劳而骤然消瘦了的渔工嘟囔着。

“要说浅川这小子，他可是攥着咱们蟹工的命运哩！”

“天皇陛下高高在上，同咱们关系不大。可浅川却不好惹啊！”

“别那么小里小气了，一两碗饭算得了什么。他妈的揍死他！”另一边有人噘着嘴说。

“好样的，好样的。你要敢当着浅川面说，那就更有你的了！”

大家余愤未消，却无可奈何地笑起来了。

夜更深了。监工披着雨衣走到杂工住的舱铺去。船颠簸着。他一手抓住舱铺的柱子，支撑着身子走过去，一手把提灯举到杂工中间，一个个地照着。然后，又随手使劲把挤得满满的南瓜般的脑袋挨个翻过来，再用提灯照着查看。这些人睡得很死，就是踩上去，也不会醒过来的。全部查看完毕，他站了片刻，咋了咋舌头。看他那个样子，好象没辙了。但是，他还向紧隔壁的伙房走去。带青色的提灯跳曳着扇形的灯光，在部分杂乱的舱铺上、长统雨靴上、挂在柱上的油布雨衣和劳动服上，还有部分行李上，忽闪忽闪地晃动着。灯光在他脚下晃了几晃停住了，霎时间，在伙房门上就投上一个象幻灯的光环。到了第二天早晨，大家才知道有一个杂工去向不明了。

大家想起头一天的过度劳动，认为“那个杂工一定是被大浪卷走了”，心情分外难过。可是，杂工们一大清早就被赶去干活了，相互间还来不及议论这件事情。

“这么冰冷的海水，谁愿意跳下去。准是藏起来了。杂种，老子找到了，非狠揍你一顿不可！”

监工象耍玩具一样转动着手上的棍子，不停地四下寻找。

海上风雨的高潮已经过去了。蟹工船迎着汹涌的波涛驶去。一个浪头扑上来，犹如迈过自己的门槛那样毫不费力地越过了甲板。经过一昼夜的奋战，船儿好似遍体鳞伤，发出不均匀的声音，向前行驶着。烟雾般的浮云，在似乎伸手可及的上空飘荡；擦过桅杆，急速地流动过去。微微的冷雨，仍下个不停。周围的浪波一涌上来，就清楚地看见打在海面上的雨点。这比迷

入原始森林遇上了大雨还可怕。

麻绳冻得硬梆梆的，抓在手里如同抓住铁管子似的。学生出身的渔工，担心滑脚，抓住这条绳索，小心翼翼地走过甲板，正好同三步并两步地从舷梯走上来的侍役碰了面。

“喂，”侍役把他拉到背风的角落，告诉他说，“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儿呢！”

今早两点钟左右，一个大浪盖过甲板，片刻之间，哗哗地象瀑布一样急泻着。浪波在朦朦夜色中，象露出了牙齿，不时发出青白的光芒。因为外面刮着暴风雨，大家都没入睡。这件事正是发生在这个时候。

一个无线电报务员慌里慌张地跑进船长室，报告说：

“船长，不好了，发来了紧急求救信号啦！”

“紧急求救信号？是什么船？”

“是‘秩父号’，同我们这条船并行的。”

“嗨！那是条报废船！”浅川穿着雨衣，叉开双腿，坐在角落里的一张椅子上，漫不经心地用一只靴尖笃笃地踩着，嗤笑了起来，“当然喽，哪一条船不是？统统都是报废船！”

“再也不能拖延了！”

“唔，那可了不得呀！”

船长急得连衣著都来不及舒整一下，就要开门到舵机室。可是，还没等门打开，浅川就一把抓住船长的右肩：“叫船绕远道走，是谁下的命令！”

谁下的命令？不是“船长”吗？船长一下子楞住了，弄得呆若木鸡。但是，他很快又恢复了船长的尊严。

“是我以船长名义下的命令！”

“以船长名义——啊？”监工叉开双腿，拦住船长，带着侮辱

的口吻，提高尾音说，“喂，你知道这只船究竟是谁的？是公司出钱租的。只有公司代表须田先生和我说话才算数。你摆什么船长架子，其实你连张揩屁股纸都不值呢。明白了吗？你要是去援救，一个礼拜的时间就算报销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敢耽误一天的活儿，就等着瞧吧！况且‘秩父号’订了很高的保险费，沉了一条破船，反倒有赚头呢。”

侍役以为“立即”会大吵起来，事情不会这样了结的。但是(!)船长却好象被一团棉花塞住了喉咙，呆立不动。侍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窝囊的船长。船长说话不顶用，世间哪有这样的事？但是，这样的事却发生了。侍役怎么也想不通。

“在这个时候讲人道，还能跟外国搏斗吗？”监工恶狠狠地撇歪着嘴，吐了一口唾沫。

在无线电报室里，收发报机急促地响着，不时迸出青白色的小火花。大家都走到无线电报室去，好歹要探个究竟。

“请看，电报打得这么急，而且越打越急！”

报务员回过头来，向正在背后关注着的船长和监工作了说明。大家的眼睛象做针线活儿似的，紧紧盯住报务员那只不停按动着各种机器电键的灵巧的手指，心情不由得紧张起来，屏住了呼吸。

装在舱壁上象个脓包似的电灯，随着船身的摇晃，忽明忽暗。隔着铁门也可以听得见重重地拍打在船腹上的浪声和不断响着的不吉祥的警笛声。笛声随着风势，时而很远，时而又近在咫尺。

滴——滴滴——收发报机拖长着尾音，火星四散。响声戛然止住了。在这瞬间，大家都吓了一跳。报务员一忽儿慌忙按动电键，一忽儿又连连摇动收发报机，但是，声音中断了，再没有

来电了。

报务员扭动身子，把旋椅转过来：“‘秩父号’沉没了！……”

他从头上摘下耳机，轻声地说：“来电话，乘务员四百二十五人，面临绝境，求救无望。接着连呼了两三声S·O·S^①、S·O·S，联络就中断了。”

船长听了这个报告后，透不过气似的用手扯了扯衣领，然后摇摇头，伸了伸脖子，用茫然的目光，不安地向周围环顾了一下，再按按领带的结子，便转身向门那边走去了。船长的表情叫人看了很难受。

.....

学生出身的渔工被这个故事吸引住了，说：“哦，真有这样的事儿！”他的心情郁闷起来，把视线移向海面。海面仍然翻滚着激浪。一忽儿把船推上浪峰，水平线犹如甩在船底下；不到两三分钟，船又掉进浪谷，好似从山谷仰望狭窄的天空。

“真的沉了！”他自言自语地说。心里老惦记着这件事，因为自己也是在一条破船上！

蟹工船全都是报废船。丸之内^②的大老板对工人死在北鄂霍茨克海是不当一回事的。资本主义按老路子去追求利润，已经行不通了。游资过剩，利率下降，他们就的确确什么事都干得出手，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要拚命杀出一条血路。就拿蟹工船来说，凭一条船就可以赚到几十万元。他们当然是梦寐以求了。

蟹工船是“工船”（即工厂船），不是“航船”^③。因此，航海法

① 海上轮船遇难的紧急求救信号。

② 东京的银行和大公司云集的区域。

③ 日语“工”字和“航”字同音。所谓工船，是把捕到的螃蟹，在船上及时加工，制成罐头，由交通船在海上取走，运往国内销售。

对蟹工船是不适用的。这些船破烂不堪，跟得了“梅毒”一样，除了让它沉没以外，别无用途了。但是，停放了二十多年没人理会，现在却又毫不知羞耻地在外表乔装打扮一番之后开到函馆来了。在日俄战争中“光荣”地成了瘸子，如同鱼肠一样被扔到一边的医疗船和运输船，现在也象幽灵似的出现了。蒸气稍微强烈一点，管子就破裂冒气。俄国警备船追来，一开足马力（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整个船身就嘎吱嘎吱的响，跟中风病人一样痉挛地颤抖着，仿佛就要肢解成一片片似的。

但是，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这个时候”，一切都应该动员起来，为日本帝国效劳。而且，蟹工船既是一间纯粹的“工厂”，却又不受工厂法的约束。因此，剥削工人再没有比这更合算更方便的了。

狡猾的老板，把这个活计同“为了日本帝国”的口号联系起来。大量不义之财全装到老板的私囊里去了。老板驱车兜风的时候，也在考虑为确保这种利益，要亲自出马去当“国会议员”。然而，大概在同一个时间里，一分钟也不差，“秩父号”的渔工们，却在远离几千哩的北方海面上，面对象玻璃碴子一样锋利的风浪，进行着殊死的搏斗！

……学生出身的渔工，在下舷梯去“粪坑”的路上，心想：
“这可不是别人的事儿呀。”

他从舷梯走下了“粪坑”，迎面看见一张别字连篇的布告：

如有寻到杂工宫口者，赏给蝙蝠牌香烟两盒、手巾一条。

监工 浅川

这张布告用饭粒当浆糊，凹凸不平地贴在墙上。

三

霏霏小雨，仍下个不停。在茫茫的雨雾笼罩下，模糊不清的堪察加海岸线，象八月鳗鱼一样绵延伸展。

“博光号”在离岸四哩的海面上抛了锚。因为三哩以内是俄国领海，“规定”不得入内。

鱼网已经解开，准备工作就绪，随时都可以去捕蟹了。在堪察加，两点钟左右天就亮了。渔工们全都穿着衣服，套上齐膝的长统雨靴，钻进木箱里，倒头就睡。

被荐头骗上船来的东京学生出身的渔工嘟囔着说：“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的呀。”

“什么可以单独睡，说得好听！”

“没说错呀，可不是单独睡吗，倒头就睡嘛。”

这样的学生有十七八个。当时讲妥每人可以预借六十元，可是扣除火车票、住宿、铺盖，以及荐头的介绍费等费用，七扣八扣，结果到上船的时候，每人还倒欠七八元（！）。当明白过来的时候，他们感到比自己手里攥着的钞票忽地变成枯叶更为震惊。起初，他们好似被妖魔鬼怪包围着的亡魂，在渔工们中间蜷缩作一团。

大概是从函馆启航的第四天开始，每天总是吃粗米饭，喝一种汤，学生们的健康每况愈下。他们爬上舱铺，跷起腿来，互相用手指在上面按了又按，瞧瞧洼不洼下去。每次按下去，心情随着好坏的变化而变化。有两三人一触摸到小腿，就觉得有点麻木，象轻微触电似的。有的人从铺沿垂下双腿，用手掌边敲打膝盖，

试看下肢弹不弹跳起来。更糟的是，有人已经四五天不通大便了。一个学生向医生要泻药，回来的时候，气得脸色铁青，说：“船医说什么没有这种贵重药。”

“哼，船医嘛，就是这个样！”在旁的一个老渔工听了以后说。

“哪里的医生都一个样。我们矿上的医生也是这个样哦。”从矿山来的渔工说。

当大家横七竖八地躺下的时候，监工走了进来。

“都睡着了吗？大家听着，刚才收到电报，说‘秩父号’已经沉没了。船上人员生死不明。”他习惯地撇撇嘴，啐了一口唾沫。

学生的脑海里立即浮现侍役方才讲过的那番话。他想，那四五百名工人实际上是监工这个家伙亲手杀害了的，但他却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真是把他扔进大海也不足以解恨！大家猛地抬起头来，彼此很快谈论开了。浅川只讲了这么一句，就向前晃了晃左肩，走了出去。

那个去向不明的杂工，是在两天以前从锅炉旁爬出来的时候给抓住的。他藏了两天，肚子饿坏了，无奈才又爬了出来。抓住他的，是个已过中年的渔工。年轻的渔工对此非常气愤，说要狠揍这个渔工一顿。

“讨厌的家伙，连烟都不抽，哪能知道烟的味道？”

这个中年的渔工把两包蝙蝠牌香烟弄到手以后，津津有味地抽了起来。

那个杂工被监工剥得剩下一件衬衣，关进两间厕所中的一间里，从外面上了锁。起初，大家都害怕上厕所，因为隔壁的啼哭声听起来实在令人难受。第二天，声音嘶哑了，只听见噓噓的抽泣。后来，喊声也变得断断续续了。渔工们心里老惦着他，当天傍晚收工后，马上赶去厕所，但已经听不见从里面叩门的声音

了。任你从外边怎么叫唤，也不见应声。宫口已经扑倒在厕所里，一只手搭在便池前档，脑袋栽到手纸箱里，当晚被抬了出来。他的嘴唇好似涂上了蓝墨水，简直跟死人一样。

早晨的天气冷飕飕的。天虽发白了，但才三点钟。渔工们把冻僵了的手揣在怀里，蜷缩着身子爬了起来。监工走到杂工、渔工、水手、生火工的舱房一一巡视，不管伤风或害病，全都硬拉出去干活。

风停住了，但在甲板上干活儿，手脚冻得象木槌一样完全失去知觉。杂工头子吆吆喝喝地把十四五五个杂工赶进工房里去。他手中的鞭子，鞭梢上带着皮条，可以隔着机器抽打工房里磨洋工的人。

“宫口昨晚被抬出来的时候，连话都不会说了。监工今早说什么也要让他去干活儿，方才还用脚踢他呢。”一个身体虚弱、跟学生比较要好的杂工，一边注视着杂工头子，一边悄悄地告诉学生说，“后来见宫口实在动弹不了啦，才作罢的。”

这时候，监工从后面连推带搯地将一个浑身哆嗦的杂工，从锅炉房赶了出来。这个杂工由于被强迫淋着冷雨去干活儿，害了伤风，后来得了肋膜炎。即使不是冷天，身子也直打哆嗦。眉宇间已浅浅地刻上了皱纹，显得不象个孩子样儿。薄薄的嘴唇，老撇歪着，没有一点儿血色。眼神象惊风抽搐似的。因为经不住寒冷，到锅炉房里去转了转，就被发现了。

渔工们正用吊车降下川崎船，准备去捕蟹。他们默默地瞧着监工和这个杂工。一个四十开外的渔工，好象不忍心看的样子，背过脸去，闷闷不乐地连连摇头。

“花那么多钱雇你，不是叫你来害伤风，来睡大觉。——妈的，不关你们的事，你们瞧什么！”监工用棍子咚咚地戳着甲板。

“就是监狱也没见过有这么坏呀!”

“这种事儿,回到内地说破了嘴,人家都不会相信的。”

“本来嘛,世间哪有这样的事儿!”

蒸气发动的吊车嘎嘎地转动。川崎船开始在半空摇摇晃晃,一齐降下去。水手、生火工也都被赶上甲板,他们担心滑倒,小心翼翼地奔忙着。监工活象一只竖起红冠的公鸡,站在他们中间监视着。

活计告一段落,学生利用这个间隙,在货堆后面坐下来避风。矿山来的渔工,突然从拐角处走了出来,团着两手,放在嘴边嘘嘘地哈气。

“简直是卖命啊!”这种从内心迸发出来的体会,不由地打动了学生的心弦。“跟矿山没有两样儿。不豁出命来,是活不下去呀!瓦斯可怕,浪头也够吓人的啊!”

过了晌午,天空有点变脸了。海面罩上一层薄雾——似有似无的淡淡罩上一层。海面上掀起无数三角浪波,恰似拎起无数摊开的包袱皮。风急促地刮着,吹得桅杆嗖嗖发响。盖着货物的雨布垂下的边儿,啪啪地打在甲板上。

“兔子跳起来了,兔子!”有人走到右舷甲板,亮开嗓门大喊。这喊声很快被强风吹散,成了一阵毫无意义的叫喊。

海面激起的三角浪波,飞溅着白色浪花,好象无数只白兔在大平原跳跃着似的。海底的涌浪^①突然加速了,这正是堪察加海面“狂风”快来的征候。船身开始倾斜,方才在右舷看到的堪察加,不觉地却移到左舷去了。留在船上干活儿的渔工和水手慌张起来了。

① 风暴将要来时,一种很急的底浪。

警报呜呜的响声，在上空回荡。大家在原地停下活儿，仰望着天空。因为正好站在烟囱脚下，觉得烟囱好似往后倾倒，显得特别粗大，如同一只大木桶，在不住地摇晃。从烟囱半腰中象德国帽似的汽笛发出的警报，在狂风中听起来，格外凄厉。远离本船去捕蟹的川崎船，正靠着不断长鸣的警报声，迎着暴风雨归航。

渔工和水手聚拢在阴暗的机房舷梯口，骚乱起来。船身一晃动，就从上方斜射进来一道淡光。渔工们一张张愤怒的面孔，一忽儿浮现，一忽儿又消失在昏暗之中。

“发生什么事儿啦？”矿工挤进人群里。

“浅川这个混蛋，该揍死他！”人群里一片杀气腾腾。

原来，监工今早就已经接到在离本船十哩海面上停泊着的“××号”发来的狂风预报，电报上还附上一句：若川崎船已放出，需立即唤回。当时，浅川却说：“连这点小事儿，也吓得这个样子，还专程来堪察加干吗？”

报务员向渔工透露了这件事。

头一个听到这件事的渔工，就把报务员当成浅川似的，愤愤地骂道：“你想过没有，这是有关人命！”

“人命？”

“是啊。”

“可是，浅川并没有把你们当人呀。”

渔工还想说些什么，可是气得把话又忍回去，涨红了脸，跑到人群里去了。

大家一动不动地站着，脸上泛起了无法抑制的愤怒表情。一个他父亲乘川崎船出去的杂工，站在人群外边直打寒战。汽笛不停地响着。一听到上空的汽笛声，心里就急得象被撕碎了

似的。

快到傍晚，从船桥那边响起了一阵大声叫喊。底舱的人三脚两步从舷梯飞奔上来。——两条川崎船驶近了。这两条船是用缆绳系在一起驶回来的。

川崎船靠过来了。可是一个巨浪仿佛把川崎船和蟹工船分放在翘翘板的两头，一高一低地激烈摇荡着。浪头一个接一个在两船中间高高地挤了上来，船身猛烈地左右摆动。虽近在眼前，但怎么也合拢不到一起。真叫人着急。从甲板上把缆绳抛了过去，没有抛中，白白地掉在海里，溅起了一朵浪花。缆绳象海蛇似的被拽回来，接着又抛过去，这样反复了好几遍。蟹工船上的人们齐声呼喊，但川崎船没有应声。渔工们的面部，好似戴上了假面具，一动不动。霎时间眼珠象盯住什么似的，一眨也不眨。这种目不忍睹的凄惨情景，深深地印在渔工们的心坎里。

又一次抛去缆绳。开头象螺旋形——接着象条鳗鱼似的落下去。绳头横打在一个正举起双手准备接绳的渔工的脖颈上。大家哎呀了一声，那个渔工就应声倒地。但是，缆绳给接住了！缆绳被拉成一条直线，绷得很紧，水点滴滴嗒嗒地落下。船上的渔工看见了，不觉松了一大口气。

汽笛不停地响着，借着风势，一阵高一阵低。直到傍黑时分，除了两条以外，全部川崎船都返航了。川崎船上所有的渔工，一登上甲板，就都昏厥过去。没有回来的两条船，一条进满了水，抛了锚，船上的渔工上了别的船回来了；另一条，连同船上的渔工一起失踪了。

监工气得鼓起腮帮子，几次下到渔工的舱房，又走了上来。每次大家都用恨不得把他烧死的无比愤怒的眼光，默默地目送他走出去。

第二天，蟹工船启航去追捕蟹群，就便去搜索川崎船。因为“五六条人命算不了什么，可是丢了一条川崎船才心疼呢”。

大清早，机房就忙碌起来。起锚的震动，把背靠锚房的渔工，弹得好象在热锅里炒豆子一样蹦跳起来。船舷的铁板，已经锈蚀，每次震动总有些碎片掉落下来。“博光号”在北纬五十一度五分的海面上搜索抛了锚的第1号川崎船。冰块在缓慢滚动的海浪中，常常生龙活虎般地露出身子流动着。有时，从四面八方流来的冰块，汇成茫茫一大片，冒出了水泡，眼看船就要被围困在当中。冰面冒起一股水蒸气，一阵阵寒气象吹电扇似的袭来。船的各个部位突然嘎吱嘎吱响了起来。被浪水泼湿了的甲板和船栏，都结上一层冰。船腹犹如撒上一层白粉，结满了晶莹的霜花，闪闪发光。水手和渔工捂住脸颊，跑过甲板。船破浪前进，在后面劈出一条长长的水波，宛似在无边的原野上铺上了一条路。

川崎船仍旧没有找着。

快到九点钟，从船桥上望见前面漂浮着一条川崎船。监工得知以后，高兴得在甲板上连蹦带跑地嚷着：“他妈的，费了好大劲儿才找到了！妈的！”他马上降下机动船，去拉回这条川崎船。但驶近一看，才发现并不是他们要寻找的那条第1号船。这条船比第1号船要新，上面标着“第36号”的字样。很醒目地结上好像是“×××号”的铁浮标。看样子是“×××号”往别处移动时，为辨认原来的位置而留下來的。

浅川用指头咚咚地敲着第36号船的船身。

“哎呀！这条船真不错呀！”他嗤笑地说，“把它拖走！”

就这样，第36号川崎船被吊车吊上“博光号”蟹工船的船桥

上了。川崎船在半空摇晃着船身，水珠滴嗒地落在甲板上。监工神气十足，望着吊起的川崎船，自以为“立下功劳”似的自语说：

“好一笔洋财呀，好一笔大洋财！”

渔工边收拾鱼网，边瞧着监工，心想：“嘿，小偷！要是吊链断落下来，砸在这个王八蛋的脑袋上就好了。”

监工用尖刻的眼光俯视着一个个正在干活的渔工，打他们的身边走过。然后，他用急躁粗野的腔调呼唤木工。

木工从另一边的舱口探出头来问：“什么事儿？”

监工唤错了方向，听到应声马上又回过头来，气冲冲地说：

“什么事儿？——混蛋，把号码刨去。刨子，快拿刨子来！”

木工楞住了。

“笨蛋，拿刨子来！”

矮子木工把锯子往腰间一插，手里拿着刨子，象瘸子似的拖着踉跄的脚步，跟在宽肩的监工后面，走过甲板。——川崎船第36号的“3”字被刨去，变成“第6号”川崎船了。

“这就行了，这就行了。——哼，活该！”监工把嘴噘成三角形，伸腰哈哈地笑了。

即使再往北驶去，也没有希望找到那条川崎船了。为起吊第36号船而停泊下来的蟹工船，开始缓缓地掉过船头，准备返航。天空放晴了，象洗涤过一样，蓝得透亮。堪察加群峰，如同在明信片上所见过的瑞士群山，耀眼夺目。

失踪的川崎船没有回来。渔工们在象水洼似的空荡荡的舱铺上，收拾失踪的伙伴留下的行李，打听家属的地址，以备万一出了事可以及时处理后事。这是令人难过的事。渔工们难受得真似被人刺到自己的痛处一样。从他们的行李中找出来的包裹

和信件，上面收件人都写着同姓的妇女名字^①，大概是等交通船来时托捎回去的。从其中一个人的行李里找出了一封混杂正、草字体的信。这封信是舔着铅笔头写成的，在渔工的粗笨手里互相传阅着。他们好似拣豆子一样，逐字地仔细读完了，有点不忍心的样子，摇摇头传给别人了。这是孩子的来信。

一个身体魁梧，在北海道荒僻的地方干过各种活计的汉子，看完信后，抬起脸来，抽抽鼻子，低声斥责说：“这是浅川的罪过，如果真的死了，就要为死者报仇呀！”

“一个人就能把这个家伙推下海去。”一个肩膀耸起的青年渔工压低嗓音说。

“唉，看了这封信真难过呀，不禁使人回想起很多往事儿啊。”

“喂，”最初讲话的那个渔工又说，“如果再糊里糊涂下去的话，连咱们也会被这个家伙折腾死的。这可是关系到咱们每个人的事儿呀！”

一个汉子跪坐在一个角落里，咬着大拇指甲，翻着眼珠，瞧着大伙说话。这时刻，他嗯嗯地连连点头说：“一切交给我办吧。到时候，我只消一下，就能把这个王八蛋干掉的。”

大家都不言声了。虽然没有言声，但却舒了一口气。

“博光号”回到了原地。过了三天，那条去向不明的川崎船，突然（！）平安无事地回来了。

川崎船上的渔工，从船长室一回到“粪坑”，就象卷到漩涡里一样被大家团团围住。

原来，川崎船遇到了“特大暴风雨”，马上操纵失灵，比被拽

^① 日本人的习惯，妻子用丈夫的姓。

起衣领的孩子更无力抵抗了。这条船离本船最远，又正好顶风，所以大家以为没有生还的希望了。环境迫使渔工们都“习惯”于做好随时“无辜”死去的思想准备。

但是，象这样的事情是罕见的。第二天早晨，川崎船灌进了半船水，被冲到堪察加岸上。大家被附近的俄国人搭救了。

这个俄国人，全家四口。对于渴望有个“家”养妻抱子的渔工们来说，这个家有着一种难以形容的魅力。而且，这家人待人非常亲切，照顾得十分周到。不过，这些外国人说话听不懂，肤色又不同，起初大家还是有点不大自然。

但是，大家很快就明白过来：“嗨！他们还不是和咱们一样的人么。”

村里许多人知道有船只遇难，都聚拢来了。这里离日本渔场很远。

他们在那里呆了两天，恢复健康后才回来的。“真不想回来啊！”又有谁愿意回到这个地狱里来呢！但是，他们的话并没有说完，“有趣的事儿”还在后头。

事情正好发生在他们回来的那天。

大家正围拢在火炉旁，一边整理行装，一边聊天的时候，走进来四五个俄国人，还有一个中国人。一个宽脸、满腮短胡、有点驼背的汉子，突然比手划脚地大声说起来。船头^①连忙摇摇手，表示他们都不懂俄国话。于是俄国人讲一句，在旁边望着他说话的中国人就给翻译一句。他翻译成的日本话，象醉汉说话似的，颠三倒四，东一言、西一语，使人听起来摸不着头脑。

“你们，钱，一定没有吧？”

^① 每条川崎船上有一个船头，管理渔工。

“对。”

“你们，穷人，是。”

“对。”

“那么，你们，就是无产阶级。明白吗？”

“嗯。”

俄国人笑着，在他们身边踱来踱去，不时停下脚步，看看他们。

“有钱人，把你们这个（做着卡脖子的手势）。有钱人慢慢大起来（比作大肚子的样子）。你们干死干活的，也不中用，到头来还是个穷人。——明白么？——日本国，不行。干活的人，这个（皱眉，装成无精打采的样子）。不干活的，这个，嗨嘿（大摇大摆地走着）。 ”

这番话引起了青年渔工的兴趣，“对呀，对呀！”说着便笑了起来。

“干活的，这个；不干活的，这个（重复着刚才的动作）。这个不行——干活的应该这个（这回反过来挺起胸脯，装作神气的样子）。不干活的，应该这个（装成老年乞丐的模样）。这样才好。——明白？俄国，就是这样的国家。只有干活的，干活的人，这个（装作神气的样子）。俄国，不干活的人，没有。耍滑头不干活的，没有。卡人脖子的人，没有。——明白？俄国一点儿也不可怕。那些人净是到处造谣。”

大家茫然地想着：这大概就是“可怕的”“赤化”了吧？如果这就是“赤化”，那也是非常“正当”的呀！而且这比什么都吸引人。

“明白！真的明白！”

两三个俄国人自己嘀嘀咕咕地谈起来。那个中国人听了以

后，象口吃一样，用日本话逐字吐了出来：

“不干活而赚大钱的，有。无产阶级，永远，都是这个（做着卡脖子的手势）。——这样不行！无产阶级，你们，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一百个人、一千个人、五万个人、十万个人，大家，大家都这样（学着小孩子手拉手的样子），就强大，就有力量（拍拍胳膊）。不管谁，不会输的，明白？”

“对，对！”

“不干活的，逃跑了（装作逃跑样子）。有力量，真的。干活的，无产阶级，神气哩（学着昂首阔步的样子）！无产阶级，最伟大。——无产阶级没有，大家，面包就没有。大家就会饿死——明白吗？”

“嗯，嗯！”

“日本，还、还不行。干活的，这样（弯腰屈背）。不干活的，这样（装作逞威风打倒对方的样子）。这样，不行！——干活的，这样（装作愤怒地站起来，冲上前去，打倒对方，踏上一只脚的样子）。不干活的，这样（装作逃跑样）。——日本，只有劳动者，好国家。——无产阶级的国家！——明白吗？”

“对，对，明白了！”

俄国人发出怪声，象跳舞似地踏着步子。

“日本，劳动者，干呀（站起来，模仿挥刀的样子）！幸福，俄国，大家都幸福。万岁！——你们，回到船上去。在你们船上，不干活的，这样（装作神气的样子）。你们，无产阶级这样，干吧（先做拳击的动作，尔后又做手挽手向前冲的姿势）！顶好，必胜！——明白？”

“明白了！”青年渔工不由地兴奋起来，立即握住中国人的手说，“干呀！一定要干的！”

船头认为，这就是“赤化”，是要让渔工们搞恐怖活动。俄国人用这种手法，巧妙地蒙蔽日本人。

俄国人说完了，又大声嚷着什么，紧握他们的手，拥抱他们，亲吻他们，硬毛胡子刺着他们的脸。日本人被弄楞了，把头往后直仰，不知怎么才好……

大家的眼睛不时地盯住“粪坑”的入口，催促他们继续讲下去。他们又谈起了在俄国人那儿的见闻。这些话，好似吸墨纸吸水一样，把每个人都吸引住了。

船头见大家听得入了迷，就推了推正在讲得带劲儿的青年渔工的肩膀，说道：“喂，该住嘴了吧。”

四

雾霭弥漫。蟹工船上一整套严密而机械地装配着的通风管、烟囱、吊车的巨臂、吊起的川崎船、船栏等等，在蒙蒙的夜雾中，依稀地现出它的轮廓。看到这种情景，从未感到这么亲切。微风轻轻地迎面拂过。这样的夜晚，实在难得。

靠船尾的舱口，扑来一阵浓浓的蟹腥味。堆积如山的网堆之间，伫立着高矮二个影子。

一个因为劳动过度得了心脏病、脸色青黄、身体浮肿的渔工，由于心脏扑扑直跳，久久难眠，就从舱口走上了甲板。他靠在船栏上，怅然地望着象混浊的泥浆似的海浪急速流逝，凝神沉思着：自己这样的身体，早晚会被监工折磨死的。但是，在这遥远的堪察加，而且连陆地也没踏上就死去，未免太凄凉了。

报务员截获到别的船只交换捕获量情报的电报，都一一报告了监工。监工看了电报以后，知道自己的船无论如何输定了，心里焦急起来。于是立刻在渔工、杂工身上打主意，增加好几倍的劳动强度。无论何时何事，受罪的终归是“他们”。监工和杂工头子，特地在船员和渔工、杂工之间组织起劳动竞赛来。

同样干剥蟹的活儿，渔工和杂工要是“输给船员”（虽然多干活对自己并没好处），就不服气，认为是“活见鬼”。监工高兴得“拍手称快”。今天赢了，今天输了，下回一定得争回来。这种渗透工人血汗的竞赛，一个劲地继续下去。同一天的劳动量就比过去增加五六成。过了五六天之后，双方的精力几乎都消耗殆尽，劳动效率便逐渐下降。他们常常一边干活，一边打盹。监工一声不响地向他们打将过来。他们冷不防地挨了揍，禁不住哎呀一声惊喊起来。大家好象成了互不搭话的冤家对头，只顾默默地埋头干活，紧张得连说话的“闲工夫”都没有了。

然而，监工这回开始向得胜的一方颁发“奖品”了。已经低落的劳动情绪，又重新被刺激得振作起来。

“这些家伙好摆弄嘛。”监工在船长室同船长一起喝啤酒。

船长象个胖女人，手背也现出窝儿。他使金嘴香烟^①轻轻敲着桌子，用难以捉摸的笑脸回答监工。船长觉得监工总同自己唱反调，心里很不愉快。直想渔工们骤然闹起事来，把这个家伙扔到堪察加海去才痛快呢。

监工除了颁发“奖品”外，还出通告声言对于干活最少的人，将施以“烙刑”。这是将烧得通红的铁棒，烙在人身上的一种刑罚。“烙刑”就象自己的影子似的紧紧跟着干活的人们，往哪里逃总

① 一种带过滤嘴的香烟。

也甩不掉。就这样，生产指标很快又回升了。

一个人的体力究竟有多大的限度，这点监工比干活的人更清楚。大家收工后，就象圆木棍似的横七竖八地躺倒在舱铺上，“不由自主地”哼哼开了。

一个学生回想起小时候随祖母到寺庙去，在阴暗的庙堂里见过的一幅“地狱图”，就跟这里一模一样。童年的他看见那幅“地狱图”，就好象看见一条巨蟒在沼泽地里蠕蠕爬行那样可怕。这里的活恰似巨蟒，叫人生畏。过度的劳动，反而使大家不能成眠。过了午夜，在黑漆漆的“粪坑”里，到处发出象擦玻璃一样难受的磨牙声、梦呓声，以及梦中的惊叫。

常常有人在睡不着觉的时候，喃喃自语：“居然还活着呢……”居然还活着，他们就是这样地嘀咕着。

一个学生出身的渔工最“忍受不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①啊！从这里来看，也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这个学生已经便秘好几天了，不用手巾紧扎脑门，就偏偏睡不着。

“可不是嘛！”对方跟喝药一样，用舌头一点点地舔着从函馆带来的威士忌酒，边说，“不管怎么说，这是件大事业呀。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去开发资源，当然是件了不起的事喽。这条蟹工船，如今算是好多了。听说，开始创业的时候，既不能观测气候和潮汐变化，也不能实际掌握天时地利，不知道沉没过多少船呢。就是被俄国船击沉、俘获或杀掉，咱们都不屈服，再接再厉艰苦奋斗到今天，这大片资源才变成咱们的……嗨，没法子呀。”

“……………”

① 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死屋手记》，描写西伯利亚的监狱生活。

他觉得，事实也许就跟历史常记载的一样。可是，淤积在他心头的闷气，却并没有因此而解消。他默默地抚摸着自已硬得象薄木板似的肚子，拇指尖如同触到微弱的电流似的发麻，心里觉得难受。他把拇指伸到眼前，用另一只手去抚摸。——大家吃过晚饭，围拢在“粪坑”中央的一只破炉边。炉壁龟裂得象地图一样。大家稍微暖和一些，身体就直冒热气。一阵蟹腥味，冲鼻子扑来。

“不知为什么，总不愿让人整死啊。”

“是呀！”

忧郁的心绪，象雪崩一样扣压在心头。都快要被折磨死啦！大家虽没有明确的对象，却变得动不动就莫名其妙地发起脾气来。

“咱、咱们，什、什么也得不着，妈、妈的，难道就、就这样叫人整、整死，谁、谁能容忍得了呀！”

一个结巴的渔工，自己也焦急得涨红着脸，气呼呼地大声说道。

大家陡然静下来，仿佛感到有什么东西“突然”涌上心头。

“真不想死在堪察加呀……”

“报务员说交通船已经从函馆出发了。”

“真想回去啊。”

“哪能回去呢。”

“听说常常有人乘交通船逃跑的。”

“真的？！……能逃跑就好了。”

“还听说有人假装出去捕蟹，逃到堪察加陆上同俄国人一起搞赤化宣传呢。”

“……”

“什么为了日本帝国，说得倒漂亮。”

一个学生说着，解开胸扣，胸口袒露，现出象阶梯般的一条肋骨。他边打哈欠，边搔痒痒。干巴巴的体垢，象薄云母片一样簌簌地脱落下来。

“哼，全给公、公司的老板，剥、剥削光了。”

一个已过中年的渔工，从象牡蛎壳一样皱纹起伏的松弛的眼皮底下，射出茫然暗淡的目光，投向火炉，吐了一口唾沫。唾沫落在炉壁上，马上焦成一个圆点儿，象炒豆子似的毕毕剥剥地蹦跳着。眼看圆点儿越来越小，等变得象煤末那么一丁点儿的时候，蓦地消逝了。大家楞楞地望着。

“那也许是真的吧。”

可是，船头边翻出水袜子①的红毡里子，在火炉壁上烘烤，边说：“喂，可不能造反呀。”

“……”

“这是我们的自由。妈的！”结巴的渔工把嘴唇噉得象章鱼一样。

水袜子的胶底烤着了，散发出一股难闻的臭味。

“喂，老头子，胶底烤着了！”

“哎哟，烤焦了！”

船舷微微发响，好象起浪了。船身象摇篮似的摇摆着。随着象腐烂的“红姑娘”②般的五烛灯光的摇曳，围着炉旁的人们映在背后舱壁上的身影，一伸一缩地动起来，幻化出各种各样的图案。这是一个寂静的夜晚。从炉口喷出的红色火光，在人们的小腿上闪闪跳动。突然，简直是突然，而且只在一瞬间，使人

① 带胶底的日本式布袜子。

② 一种茄科植物，夏天结红色浆果。

回忆起自己不幸的一生。这是一个分外寂静的夜晚。

“有纸烟吗？”

“没有。”

“没有？……”

“没有了呀。”

“妈的。”

“喂，拿威士忌来。”

对方将方瓶子倒过来，晃给大家看。

“噢噢，别糟蹋了东西！”

“哈哈……”

“真是鬼地方。可是，大家都来了，我也……”曾在芝浦^①的工厂呆过的这个渔工，接着谈起他们工厂的事情。北海道的工人都把“工厂”看作是想象不到的“好地方”。据他说：“在那边，只要有这边百分之一的情况，早就罢工了。”

这句话，引起了大家的话题，彼此喋喋地讲起自己过去的经历。“筑公路”、“修水利”、“铺铁路”、“填海建港”、“开新矿”、“垦荒”、“搬运”、“捕青鱼”等等，这些活计差不多都有人干过。

在内地，工人們的“力量大”，来硬的一套已经行不通了。资本家将大部分市场都开发了，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就把魔掌伸向“北海道、库页岛”。他们在这里，如同在朝鲜、台湾等殖民地一样，可以为所欲为地“虐待工人”。别人说不出口的事，资本家也干得出手。在“筑公路”、“铺铁路”的工程队里，打死一个土工，就比捏死一只虱子还要随便。有的人不堪虐待，逃跑了。这些人一旦被抓回来，就被缚在木桩上让马用后蹄踢，或推到院子里

^① 东京的工业区。

让狼狗咬。而且拿来示众。“非人”的土工，有的听见别人胸口响起折断肋骨的喀喀声，不由得捂住脸孔。挨打的人昏死过去了，他们就用水泼醒，这样死去活来好几次。最后，象包袱一样，把人挂在狼狗粗壮的脖颈上，给活活拖死。然后，一古脑地把尸体扔到广场的一个角落里。这时，尸体上的一些肌肉还在抽搐着。用火钳子肆无忌惮地烙屁股，或者用棱角棒把人打得直不起腰杆，这更是“司空见惯”的事了。正在吃饭的时候，突然屋后响起了一阵凄厉的叫声。接着，冲出一股烧人肉的腥臭气味。

“不吃了，不吃了。这种饭怎能吃得下呢。”

大家扔下筷子，脸色阴沉下来，互相对望着。好些人积劳成疾，患脚水肿病死去。死了也“没工夫”埋葬，就那么搁上好几天。在工棚黑压压的角落里，有人看见随使用草席子包裹着的尸体，在席边露出两只黄黑黄黑的没有血色的脚，干缩得跟小孩子的脚丫一样。

“尸体脸上落满了苍蝇，打旁边走过，嗡地一下子全都飞起来了！”

有个人一边不停地用手拍着脑门，一边走进来说道。

天还没亮，大家就被撵到工地去，一直干到黑得伸手不见掌，刨一镐闪出一溜火星的时候为止。现在大家反而羡慕起关押在附近监狱里劳动的囚犯来了。特别是朝鲜人，受到了老板、工头，还有伙伴中的日本壮工的“非人”待遇。

离那儿四五里地的村派出所的警察，经常拿着记事册跑来调查。有时到傍晚才走，有时则在那儿留宿。可是他从没在土工面前露过面。他回去的时候，满脸通红，走在马路当中，象消防队放水似的向四处撒尿，嘴里还喃喃自语地不知说些什么。

在北海道，铁道上的一根根枕木，名副其实都是一具具工人

青肿的“尸体”！在填海建港的工地上，患脚水肿病的土木工人象“人桩”一样，被活活掩埋。人们把北海道这种工人，比做“章鱼”。章鱼为了活命，吃掉自己的肢体。他们不正是这样吗！资本家在那儿，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原始的剥削。利润就是这样子源源流进资本家的腰包。而且，资本家将这种剥削巧妙地同开发“国家的”资源结合起来，使之合理化了。这是一种非常精明的办法。为了“国家”，工人就得饿肚皮，就得被活活折磨死。

“能够从那儿活着回来，真是靠天神的保佑，谢天谢地！唔，可是，要是在这条船上被折磨死了，还是一个样儿的啊。真他妈的！”

一个渔工满不在乎地放声大笑起来。过后，眉宇间又泛起忧郁的皱纹，将脸扭了过去。

矿山的情况也一样。——资本家在新矿山开掘坑道，为了要调查清楚哪里会冒出什么瓦斯，会发生什么意外变化，以确定开发方针，使用乃木军神^①曾用过的办法，随便将比买“豚鼠”还便宜的价钱雇来的“工人”，一批批地驱去送命。这简直比使揩鼻涕纸还随便！工人的皮肉，宛如金枪鱼的生鱼片，一层又一层地粘在坑道壁上，把坑道壁都粘结实了。因为那里远离城市，更可以随心所欲地干出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来。在用矿车运出来的煤块里，常常夹杂着断了的拇指和小指头。连妇女和小孩对这种事情，都不以为怪，因为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们毫无表情地将矿车推到下一个工段。这些煤块就是为资本家攫取利润而去发动大机器的。

每个矿工都跟长年关在监狱里的囚犯一样，挂着一张枯黄、

^① 日俄战争期间，日本陆军大将乃木希典曾以大量牺牲士兵生命的战术攻下了旅顺口。乃木死后，当时的日本反动政府封他为“军神”。

浮肿、没有血色、总是木呆呆的面孔。由于阳光不足，煤尘飞扬，空气充满有毒瓦斯，以及温度和气压失常，身子眼看就垮下去了。“当七八年矿工，大概有四五年连续在黑洞洞的坑底干活儿，一天也见不到阳光。整整四五年啊！”可是，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资本家随时都可以雇到大量工人来接替，所以对工人的死活更无所谓了。冬天一到，工人仍旧源源不断地涌向矿山。

此外还有“外来农民”——北海道有一种“移居农民”。资本家利用放映电影的办法，宣传“开发北海道”，“奖励移民、解决人口粮食问题”，以及日本少年式的“移民发财致富”的好处，鼓动那些快被剥夺土地的内地贫农，去移民开荒。可是，在那些肥沃的土地上，资本家早就立下自己的界标，贫农们全被赶到挖下四五寸深就尽是粘土的荒地上。这样的事情不知发生过多少次：一家子被大雪封住，连土豆也吃不上，第二年春天全饿死了。直到冰化雪融，相距一里地的“邻居”来到那儿以后才发现。有的尸首嘴里还含着吃剩半截的稻秆。

侥幸没有饿死的，在这块荒芜的土地上，花了十年的时间，好不容易侍弄得刚有点象熟地，马上就变成“别人”的了。资本家——放高利贷者、银行家、贵族、大财主，发放了一些骗人的贷款（放贷几年），荒地就变成肥沃的土地，象胖黑猫的长毛一样黑黝黝的。一些会赚钱、眼光敏锐的人，模仿这个办法，也涌到北海道来了。农民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受人欺凌剥削的。他们结果仍旧象在内地一样，是个“佃农”。这时刻，才明白过来：受骗了！

他们本想多少弄到点钱就返回老家，所以才渡过津轻海峡，来到冰天雪地的北海道。在蟹工船里，有好多人是被“别人”从自己的土地上撵出来的。

搬运工的情况，跟蟹工船的渔工很相似。他们一挤进有人

监视的小樽客栈，就被人用船送到库页岛和北海道的穷乡僻壤去了。干活的时候，脚跟稍微一滑，摔在轰隆隆滚来的木材底下，就会被压得比薄煎饼还扁。吊车嘎嘎地将被水泡胀了树皮的木材吊上船来，人的脑袋一不小心碰了上去，就比跳蚤还轻地栽进海里。

在内地，不甘心默默地被人折磨死的工人，加强了团结，反抗资本家。可是，这种消息，对殖民地的工人是完全封锁着的。

熬呀，实在熬不住了。可是，痛苦还象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越来越沉重地压在身上。

“往后怎么办呢……”

“还不明白吗，被人杀害死呗。”

“……………”大家刚想说什么，但又把话咽了回去，沉默下来。

“被、被他害、害死之前，咱、咱们得先弄死他！”结巴的渔工，很突然地冒出这句话来。

开花浪缓缓地拍打着船腹。好象上甲板什么地方 的导管漏了气，宛似水壶里沸水，不断轻轻地发出嘶嘶声。

就寝之前，渔工们脱下肮脏得象干鱿鱼一般的油污斑斑的汗衫和绒衣，在火炉上扬开。围在火炉旁的人们，两手提起衣衫烘烤，犹如放在被炉^①上一样。烘热后，虱子、臭虫吧嗒吧嗒地落在火炉上，吱吱发响，冒出一股象烧人肉似的腥臭味。一烤热了，虱子就呆不住，拚命蠕动着细毛足，从衣缝里爬出来。捏起来看，虱子长得圆乎乎的，简直象皮肤上的脂肪粒。有的肥得象

① 日本的一种取暖设备，将火钵放在木框中，覆以棉被，上边可以烘物。

螳螂头，看了浑身起鸡皮疙瘩。

“喂，给我拉住这边。”

这个渔工让别人拉住一边裤管，张开来抓虱子。

渔工将虱子放在嘴里，用门牙叭的咬死，或用两只大拇指指甲掐死，然后好似小孩在衣服上抹脏手一样，把沾了血的指甲，往劳动服的底襟上一擦，又开始抓起来。就是这样抓，也还是没法睡好。通夜受到虱子、跳蚤、臭虫的袭击，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不管怎么抓也抓不完。在阴暗潮湿的舱房里一站，马上就有几十只跳蚤蠕蠕地爬上小腿。莫非自己的身体什么地方腐烂了？难受得似乎自己已经变成了被蛆虫和苍蝇缠住的腐烂的“尸体”。

起初是隔日洗一次澡。身体又腥又脏，刺得难受。但是，过了一周，改为隔三天洗一次。过了一个月左右，又改为一周洗一次。而且最后变成一个月洗两次了。说是为了避免浪费水。可是船长和监工天天都洗澡，那就不浪费了？身体被蟹沫弄脏，连续几天不洗澡，还有不长虱子、臭虫的？

解开兜裆布，一片片黑色的体垢就簌簌地掉下。腹部系带子的地方，现出一圈红红的勒痕，那里痒得要命。睡下以后，到处响起喇喇地乱挠身子的声音。好象有一个小小弹簧在下身蠕动似的，刺得发痒。这时，渔工缩了一下，将身子翻了过去。可是，很快又刺了一下。就这样一直闹到天明。皮肤好似长了皮癣变得粗涩了。

“快要被虱子咬死了。”

“唔，死了倒好。”

大家无可奈何地笑了。

五

两三个渔工，慌慌张张地跑过甲板。

他们在拐角的地方急转弯时，差点儿摔倒，连忙用手抓住船栏。在餐厅甲板上干修理活儿的木工，直起腰来，冲着渔工奔跑过去的方向望去。寒风迎面扑来，刺得眼睛直淌泪水。开始还看不清楚。木工侧过身子，使劲地擤了一把“鼻涕”。鼻涕随风划出一条曲线飞走了。

船尾左舷的吊车嘎嘎响着。这时间，大家都捕蟹去了，吊车怎么会开动呢？吊车象悬吊着什么东西，摇来摆去。下垂的吊链在空间缓缓地打着旋儿。“这是什么东西呢？”这时，木工吓了一跳。

木工有点惊慌，扭过头去，又擤了一把“鼻涕”。因为顶风，落下的清鼻涕飞溅在自己的裤子上。

“又出事儿了。”木工不时地用胳膊揩擦眼泪，定神望着。

从这边望去，伸展出去的吊车巨臂悬吊着一个全身被捆住的杂工，在雨后银灰色的海面的映衬下，清晰地托出一团黑影。巨臂上升到吊车的顶端，好似挂上一团抹布，在那儿吊了好一会儿——大约二十分钟，然后又降下来。杂工蜷缩着身子，直蹬两脚，犹如一只落在蜘蛛网里的苍蝇，在拚命地挣扎着。

不大一会儿，杂工的身子被跟前的餐厅挡住，看不见了。只见拉得直直的吊链，摇摇摆摆的象打秋千一样。

木工簌簌地淌着清鼻涕，仿佛泪水灌进了鼻孔里去似的。他又擤了一把鼻涕，然后从裤兜里掏出一把锤子，开始干活儿。

木工忽地侧耳静听，打那儿传出噗通噗通的沉重而难听的声音。他就又回头望了望，吊链摆动得很厉害，活似有人在下面晃动。

悬吊在吊车上的杂工，脸色全变，嘴唇紧闭，嘴角边冒出白沫，活象一具死尸。木工下工房的时候，正好看见杂工头子胳膊窝里夹着一根木棒，耸起一边肩膀，站在甲板上冲海里撒尿，显出一副狼狈相。木工朝那根木棒瞅了一眼，心想：这家伙就是拿这根玩意儿打人的。尿被风吹着，哗哗地落在甲板上，飞溅起来。

渔工们连续好几天过度劳动，早晨越发起不了床。监工拿着空煤油桶走进舱房，在酣睡着的渔工耳边敲打着，一直敲到渔工们睁开眼睛爬起床来。患脚水肿病的渔工，半抬起头喃喃地说着些什么。听不到话声，只见他的嘴唇象金鱼浮上水面呼吸空气般地微微颤动着。但是监工装作没瞧见，仍敲个不停。

“怎么回事，敲了半天还不起来！”监工足敲了一阵之后，疾言厉色地嚷着，“起来！起来！为国家干活嘛，就如同打仗，死也得干！他妈的狗东西！”

病人全被从被窝里提溜出来，推到甲板上。患脚水肿的病人，一只手扶着梯栏，歪着身子，用另一只手把自己的腿搬起，挪上阶梯，脚尖一步一颤地登着。每登一步，心脏简直象被人踢了似的急跳起来。

监工也好，杂工头子也好，对病人就象后娘对前房的孩子那样狠毒。病人被赶出去后，有的去装蟹肉罐头，有的到甲板上剥螃蟹脚。干了不一会儿，又被唤去贴罐头商标。在冷飕飕的阴暗工房里，大家生怕滑倒了，小心翼翼地站着干活。可是，站不多久，下肢麻得简直象条假腿，毫无知觉。突然间，膝盖的关节

象脱臼一样，不知不觉地软瘫瘫的，几乎要倒下去。

一个学生用刚剥过螃蟹的脏手背，轻轻地拍了拍脑门，突然整个身子就失去平衡，仰倒在地上。堆在他身旁的空罐头，轰隆一声，向他身上倒塌过来，随着船身的倾斜，闪烁着亮光，滚到机器下面或货物的空档中去。伙伴们慌忙把学生抬到舱口，赶巧迎面碰上监工吹着口哨下工房里来。他一瞥见，就嘶叫起来：

“谁叫你们把活儿撂下的！”

“谁？……”突然冲进一个人，急喘喘地说。

“是谁……？狗东西，你敢再说一句！”监工从衣兜里掏出手枪，象玩具似地放在手里摆弄着。然后，噉了噉嘴，挺起腰板，摇晃着身子，猛然大笑起来：

“拿水来！”

监工接过满满一桶水，恶狠狠地向学生的脸上泼去。那个学生已象一节枕木一样被扔在地上。

“这就行啦。——不中用的东西，有什么好瞧的，快干活儿去！”

第二天早晨，杂工们一到工房里，就看见昨天那个学生被捆绑在车床的铁柱子上，恰似被拧断了脖子的鸡，脑袋耷拉到胸前，脊柱骨上端高高隆起一块骨节。胸前挂着一块象小孩的围嘴似的纸板，上面写着：

此人捣乱成性，假装害病，严禁解此绳子。

很明显，这是监工的手迹。

杂工们伸过手去，摸了摸他的脑门，简直比摸在铁块上还要冰凉。他们原先是熙熙攘攘地走进工房的，可这会儿谁也不言声了。直到他们听见后面传来杂工头子走过来的脚步声，才赶

忙从绑着学生的机器两旁分别散开，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去。

捕蟹一忙，事故就接踵而至。有的磕掉门牙，整夜吐血水；有的因劳动过度，在操作中晕倒过去；有的眼睛出血；还有的挨了狠狠几记耳光，耳朵都听不见声音了。大家疲惫不堪，比醉了酒还要懵懂。好不容易熬到收工的时间，才抽了一口气：“总算熬到点了。”语音未落，霎时感到一阵头晕眼花。

大家刚要收工，监工走过来了。

“今天要干到九点钟。”他骂着，“你们这些狗东西，只有收工的时候，手脚才勤快起来！”

大家活象电影的慢镜头，又慢腾腾地站立起来，已经是有气无力了。

“听着，这个地方决不是两次三番可以再来的，而且也说不上什么时候才能捉到蟹儿；只管一天干十个钟头，十三个钟头的，一到钟点就收工，还了得？活儿的性质不同嘛！要知道，捕蟹淡季的时候，还不是让你们悠闲自在地呆着。”监工下到“粪坑”，说了这番话，“只有老毛子才不管眼前有多少鱼群，一到时间，一分钟也不差，把活儿全撂下。所以嘛，就因这个作风，俄国才变成这个样子。日本男子汉大丈夫绝不学他们！”

“放屁！他妈的，骗子！”有的人心里暗地想着，不去理睬他。但是，大部分人听监工这么一说，觉得日本人还是了不起的。于是便把自己每天所受的残酷而痛苦的煎熬，看作似乎是一种“英雄”的举动，总算聊以自慰。

渔工们在甲板上干活儿的时候，经常看见舰艏飘着日本旗的驱逐舰，穿过水平线向南驶去。他们激动得热泪盈眶，摘下帽子频频挥动。心想，它是来保护咱们的啊。

“妈的，一见到它，不由得就掉眼泪。”

他们目送这些舰只渐渐远去，直到最后消逝在烟雾迷蒙之中。

收工后，一个个象抹布的碎片散开了似的，摇晃着疲惫的身子，回到舱房里，不约而同地骂了一声“他妈的！”在阴暗中，这种骂声象满肚子仇恨的公牛的嗥鸣，尽管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骂谁。但近两百人每天同在一个“粪坑”里，直来直往地交谈，不知不觉地，大家所想的，说的，和做的慢慢（纵然慢得象蛞蝓^①在地上爬行）变得一致起来。当然，就是同一个队伍中，也有的人象沉淀物似的裹足不前；也有的走到别的方向去，例如那个中年的渔工。然而不管是谁都是在不知不觉中起变化的，而且阵线也逐渐分明了。

大清早，矿山来的汉子，一边缓慢地走上舷梯，一边说道：“实在支持不下去啦。”

头一天一直干到十点，累得他全身关节象一台破机器咯吱咯吱作响。他一边登着舷梯，一边打起盹来，后面的人“喂”地喝了一声，他才赶忙移动手脚，不料一脚踩空，身子向前扑倒了。

干活儿之前，大家下到工房，蹲在一个角落里。每个人都挂着一张泥人般的脸。

“我得磨洋工了，我干不了哩！”矿山来的渔工说。

大家都不吱声，只点了点头。

过了一会儿，有人说：

“要挨火烙的呀……”

“又不是故意磨蹭，实在是干不了啊！”

矿工把袖管卷到胳膊上，把手举到眼前，打着凉棚迎亮

① 一种软体动物，身体象蜗牛，但没有壳，爬行很慢。对农作物有害。

瞧着。

“再活不长了。我又不是故意偷懒的啊。”

“对，对！”

“……………”

这一天，监工象一只涨红了冠的斗鸡，在工房里巡视，嘴里连声怒喝着：“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可是，慢吞吞地干活儿的，不仅一两个人，这里那里——几乎全都是这样，气得监工直团团转。渔工们和船员们都是头一回看到监工的这副模样。在上甲板，好多螃蟹从网里钻出来沙沙地爬着，比比皆是。活儿如同淤积了的下水道，越堆越多。然而，“监工的棍棒”再起不了什么作用了！

收工后，大家用湿毛巾擦着脖颈，一个跟一个地回到“粪坑”里，彼此对望一下，不禁笑了起来。不知笑什么，只觉得好笑就是了。

这种情况，在船员那边也发生了。当船员们醒悟到这是监工在肆意捉弄自己，让他们同渔工闹对立，豁出命来给他干，也就不时磨起洋工来了。

“昨天干得累极了，今天要磨磨洋工啦。”

开始干活儿的时候，有人这么一说，大家也就这么干了。虽然所谓“磨洋工”，也只不过是少使点劲儿罢了。

谁都感到身体实在支不住了。但事情逼到头上来，无可奈何只好凑合着干。大家都是这种心境，反正走哪条路都免不了被折磨死。——只是已经忍受不住了。

“交通船来了！交通船来了！”

上甲板的叫声，传到了下舱。大家穿着破衣，就这样连忙从

“粪坑”的舱铺上跳下来。

交通船比“女人”还要让渔工和船员着迷。唯独这条船没有咸臭味，却带来了函馆的气息，一种已经几个月、几百天未曾踏上过的原原本本的“乡土”的气息。交通船还带来了许多发信日期不同的信件、衬衫、内裤、杂志之类的物品。

他们象老鹰抓小鸡似的，慌忙用蟹腥的粗手一把抓过邮包便走下“粪坑”，大模大样地盘腿坐下，把邮包放在大腿中间打开，拿出各种各样的物品。有由母亲口授小孩子执笔、写得歪歪斜斜的家信，有毛巾、牙粉、牙刷、手纸、衣服，在这些物品当中还出乎意料地发现一封被压得平整的密封着的妻子来信。他们渴望从这些物品中嗅到一些“家乡”的气息，嗅到孩子的乳臭和妻子肌肤的芬香。

有人自暴自弃地大声哼起“斯东小调”^①。

接不到任何东西的船员和渔工，双手跟木棍似的直插在裤兜里，转来转去。

“趁你们不在家，大概勾了野男人了吧。”

大家跟他们逗趣。

有一个渔工不理大家的吵闹，把脸扭向阴暗的角落，屈指盘算着。他接到交通船带来的信，才知道他孩子的噩耗。孩子是在两个月以前死去的，但这以前却一无所知。据来信说，是因为没钱，发不起电报，不能及时告知。这个汉子一直闷闷不语，甚至让人怀疑他哪里象个渔工！

但是，也有同这种情景相反的。有一个人收到信里附来一张胖娃娃的照片，这个娃娃象泡胀了的小章鱼似的。

^① 大正末期在关东地方流行的一种淫荡曲调。

“这就是他吗?!”这个人突然发出惊喜的喊声，然后笑嘻嘻地特地把照片递给每个人看，“怎样？这是刚生下来的宝贝。”

在物品中还夹杂着一些不值钱的东西，但若不是妻子，是不会想得这样周到的。这个时刻，无论谁都会立即哄哄地动起心来，恨不得马上插翼飞回家去。

公司派来的电影放映队也随交通船来了。把成品罐头全部装上交通船的那天晚上，他们就在船上放映电影。

两三个打扮一样的青年——斜戴着鸭舌帽，打着蝴蝶领结，穿着宽管裤，抬着沉甸甸的箱子，上船来了。

“好臭呀，好臭呀!”

他们说着，脱了上衣，一边吹着口哨，一边张挂银幕。在一定距离的地方，开始支起放映机。渔工们觉得这几个青年，不象“海上”的人——不象自己人，于是被他们深深地吸引住了。船员和渔工显得特别高兴，帮助他们布置起来。

一个看来年纪最大、长相俗气、戴着宽金边眼镜的人，站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擦拭着脖子上的汗珠。

“解说员，你站在那儿，跳蚤会跳到你的大腿上的啊!”

“哦唷!”解说员仿佛踏上烧红的铁板，跳了起来。

渔工们瞧见他这副样子，哄然大笑。

“你们这个地方太糟糕了!”他用干哑的嗓音，嘎嘎地笑着说。他毕竟是个解说员啊。

“你大概不会知道吧？你猜猜看，公司每次到这儿来搞这路买卖，能赚多少钱？赚大钱呀。六个月赚五百万元，一年就赚一千万元啦。咱们嘴上说千把万元，说说就完了，其实是好大的数字呀。每个股东分到二分二厘五的相当高额的红利，这样的公司在日本也是少有的。听说这次总经理要当议员了，那没得

说的。要不是这样糟糕，他也赚不了那么多啊。”

天擦黑了。

为“庆祝完成一万箱生产任务”，分给大家日本酒、烧酒、鱿鱼干、红烧肉、蝙蝠牌香烟、奶油糖。

“喂，到老子这边来吧。”

杂工活象风筝，被渔工和船员你拉我扯着。

“你坐在我大腿上，我搂着你看吧。”

“不行，不行，到我这边来。”

这样吵嚷了一阵子。

坐在前排的四五个人骤然鼓起掌来。大家也莫名其妙地跟着鼓起来。监工在银幕前出现了。他挺起腰板，反剪双手，什么“诸位”喽，“兄弟我”的，平时没有说过的词儿都搬了出来。还有那套什么“日本男子汉大丈夫”啦，“国家财富”之类陈词滥调。大部分人都没有听他讲，只动着太阳穴和下颏骨在啃鱿鱼干。

“够了！够了！”后面有人大声喊道。

“有解说员在场嘛，还用得着你吗？住嘴吧！”

“还是挥动你的棱角棒去吧！”大家哄堂大笑，一个劲地鼓掌，吹口哨。

监工万没想到在这儿逞不了能，涨红着脸，说了几句什么（因为闹哄哄的，大家也无法听清），便下去了。接着，开始放映电影。

开头是纪录片。宫城、松岛、江之岛、京都……一幕幕地映过去。常常断片。忽而二三张画面重叠，令人目眩；忽而一闪，又刷成白幕。

接着，放映西方片和旧本片。画面都发花了，简直就象“下雨点”。还有好些地方仿佛把断片拼凑一起似的，人物形象经常跳

动。即使是这样的片子，也无关紧要，大家也都看得出神。银幕上一出现健美的外国女人，就有人吹口哨，哼鼻子，象猪一样。有时气得解说员暂停解说。

西方片是美国片，内容是“开发西部史”。开发者尽管受到野蛮土著人的袭击，或是遭到大自然的磨难，但仍然坚持把铁路一段一段地铺过去。一夜间，新建的“小城镇”出现了，活象长在铁路边上的瘤子。随着铁路不断地往前延伸，小城镇也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影片采用时而隐晦，时而明朗的手法描写在工程过程中经历的各种苦难，还穿插了一个工人同公司经理的女儿的“恋爱故事”。到了最后的场面，解说员拉开嗓子说：

“依靠许多富有牺牲精神的青年的努力，终于修成绵延几百公里的铁路，象一条长蛇，穿过原野，越过峻岭。昨天还是一片荒芜的土地，如今却已变成国家的财富。”

映到公司经理的女儿和突然变成绅士派头的工人拥抱的镜头，就终幕了。

中间穿插放映了一部只是逗人发笑的毫无意义的西方短片。

日本片描写一个贫穷的少年从卖豆豉、卖晚报，到擦皮鞋，进工厂，当上模范职工，受到提拔，最后成为一个大财主的故事。——虽然字幕上没有说明，但解说员却补上一句：“诚然，勤劳乃成功之母也！”

这话引起了杂工们一阵“热烈的”掌声。但不知在渔工还是船员中间，有人大声嚷道：

“胡扯淡！照这么说，我也该当上公司经理了。”

这话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后来，解说员对他们说：“这是公司命令要在这种地方反复

着力解说。”

最后放映的，是公司所属各厂和办公室等的纪录影片。片中出现许多“勤劳”干活儿的工人。

放完电影，大家就猛喝起完成一万箱生产任务的赏酒。由于很久没有喝酒，加上过度劳累，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在暗淡的灯光下，烟雾如浮云般凝聚着，空气又热又臭。有的人光着膀子，有的人头缠手巾，还有的人撩起下摆，盘腿而坐，彼此天南海北地大声闲谈。不时出现争吵打闹。

一直闹腾到午夜。

患脚水肿病长期卧床不起的从函馆来的渔工，叫人把他的枕头垫高一些，望着大家打闹。同一个地方来的伙伴，倚着他旁边的柱子，用火柴棍嘶嘶地剔着塞在牙缝里的鲑鱼干。

过了好大一会儿，有一个渔工，跟滚麻袋一样，从“粪坑”的舷梯翻滚下来。他的衣服和右手沾满了鲜血。

“刀，刀！给我拿刀来！”他趴在地上叫喊着，“浅川这个狗东西，溜到哪儿去了。他溜掉了，我也要宰了他。”

这个渔工曾被监工殴打过。他变了眼神，拿着火钩子，又冲了出去。谁也没有阻拦他。

“瞧着吧！”函馆来的渔工，抬头看了看他的伙伴说，“当渔工的，不会永远象个木头人。好戏还在后头呢！”

第二天早晨，大家透过监工的玻璃窗，瞧见监工桌面上的东西全都被砸坏了。只有他本人逃之夭夭，才侥幸没给“砸个稀巴烂”。

六

天空灰蒙蒙的。一直到昨天还下着大雨，今天刚开始变小，快要停下来了。同天空一样灰暗的雨点，落在同样灰暗的海面上，不断激起的水纹，一圈套一圈地缓缓扩展开去。

过了晌午，驱逐舰驶过来了。闲着的渔工、杂工和船员凭栏远眺，纷纷议论着有关驱逐舰的事。这事儿，他们觉得很新鲜。

一群军官乘上从驱逐舰放下的小艇，向这边的蟹工船驶来。船长、工房代表、监工、杂工头子，站在斜吊在船舷的舷梯踏板上等候着。小艇靠拢过来，他们就互相举手施礼，随后由船长领着登上船。监工往上一瞧，挤了挤眼，嘴角一歪，挥手示意：“瞧什么，走开，走开！”

“有什么了不起的，混蛋！”渔工们你推我挤下到工房里去。甲板上残留着一股腥臭的气味。

“好臭呀。”一个留着两撇端端正正的小胡子的青年军官，文雅地皱了皱眉头。

尾随着的监工慌忙迎上前去，连连点头哈腰，不知说了些什么。

大家从老远望见，军官们每走一步，那带穗子的短剑就碰在屁股上弹跳一下。大家认真地议论着哪个官大，哪个官小。最后争辩得竟象吵架似的。

“在这些大官面前，浅川就数不上喽！”

说话的人学着监工胁肩谄笑的样子，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这一天，监工和杂工头子都不在现场，大家干起活儿来，自

在多了。有的唱歌，有的隔着机器高声交谈。

“这样干活儿，倒不错呀。”

大家收工后，走上甲板。打餐厅前面走过，听见里边喝醉了酒的人，乱哄哄地放声嘶叫着。

侍役从餐厅走出来，里面乌烟瘴气。

侍役通红的脸蛋冒出一颗颗汗珠，双手抱满空啤酒瓶，将下巴颏儿朝裤兜扬了一下，示意说：

“帮我擦擦汗。”

渔工从他的裤兜里掏出手绢，一边帮他擦汗，一边直瞧着餐厅那边问道：“他们在干吗？”

“哎哟，真够呛！他们在大吃大喝呀。你猜他们扯些什么。原来是东拉西扯女人的事儿。害得我疲于奔命。他们都喝得醉迷红眼，就算农林部的官员来了，也要把他从舷梯上滚落下去。”

“他们来干吗？”

侍役摇摇头，似乎表示不知道，急忙跑回伙房去了。

渔工们吃饭了。他们吃的是难以用筷子夹起来的粗米饭，和又咸又涩的黄酱汤，酱汤上只飘着几片纸屑般的咸菜叶。

“那些从没尝过，连见也没见过的西餐，全都送到餐厅里去了。”

“妈的！”

食桌旁边的墙壁上贴着几条标语：

- 一、挑剔饭食，嫌三道四者，不成大器。
- 一、大米乃是血汗的结晶，粒粒皆须珍惜。
- 一、必须吃大苦耐大劳。

这几条标语，字迹蹩脚，旁边还标着字母。标语下边的空白地方，跟公共厕所的墙壁一样，涂满了猥亵的字句。

饭后，在就寝前的片刻空闲时间，大家围拢在火炉旁，从驱逐舰谈到军队的事儿。渔工多半是秋田、青森、岩手等地的庄稼汉，很多人当过兵。所以一提起军队的事儿，不知怎么地总谈个没完。现在，他们回忆起当时军队的严酷生活，反倒觉得留恋了。

大家都睡着了，餐厅的闹声清晰地越过甲板和船舷传到他们这边来。有人偶尔醒来，就听到这种闹声，心想“他们还在闹呢”。天都快亮了。有人，大概是侍役吧，还在甲板上劳碌奔波，鞋后跟发出咯咯的响声。果然，他们一直闹腾到天亮。

尽管军官们好象已经返回驱逐舰，但舷梯仍旧吊着。舷梯上有五六级踏板吐满了粘糊糊的饭粒、蟹肉和茶色的脏物。呕吐出来的酒酸臭味，浓浓地冲进鼻孔，使人作呕。

驱逐舰好似一只收起翅膀的灰色水鸟，浮在海面上，微微地晃动着身子。看去整条舰只仿佛昏昏沉沉“睡着”似的。天空没有一点风丝儿，烟囱冒出一缕比香烟的烟雾还细的轻烟，活象一丝毛线，直飘上去。

到了晌午，监工和杂工头子一帮子人仍未起床。

“放肆的杂种！”一个渔工边干活儿边嘀咕着。

在伙房的一个角落里，杯盘狼藉。到了早晨，连亲手给他们端过酒菜的侍役，也为之一惊；想不到这帮家伙竟能填得下这么多饮食。

侍役因为工作的关系，了解到许多渔工和船员们无法知道的有关船长、监工、工房代表等人骄奢淫逸的生活，同时也熟悉渔工们的悲惨遭遇（监工一喝醉，便把渔工叫做“猪仔、猪仔”的），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说句公道话，上层人物傲慢，为了挣大钱，可以不择手段。渔工和船员很轻易就上他们的当。实在

叫人看不下去。

侍役常常这么想：还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好。他似乎有某种预感，觉得一定会出事的，不可能不出事。

大约下午两点钟，船长和监工等穿着叠得皱巴巴的衣服，让两个船员带上罐头，坐上机动船，到驱逐舰去。正在甲板上剥蟹的渔工和杂工，一边不停手地干活儿，一边象瞧“送嫁队”似的望着他们。

“谁知道又搞什么鬼名堂啦。”

“咱们做的罐头，就这样随便拿去送人，简直连手纸都不如了！”

“可话又得说回来……”一个快到中年、左手剩下三个指头的渔工说，“人家特地打老远来保护咱们，送一点礼也是应该的嘛——嗯？”

这天傍晚，驱逐舰的烟囱，忽然冒出滚滚浓烟。水兵们急匆匆地在甲板上来回奔跑。大约过了半个小时，驱逐舰开动了。舰艏的旗子哗啦哗啦地迎风招展。船长站在蟹工船的甲板上，带头呼喊“万岁”。

晚饭后，侍役下到“粪坑”。大家正围在炉旁聊天。有人走到昏暗的灯光下，抓衬衫上的虱子。每逢有人在灯下走过，就在被煤烟熏黑了的涂漆的舱壁上，投上一个斜斜的巨影。

“听军官、船长、监工他们说，这回就要偷偷潜入俄国领海去捕蟹啦。所以驱逐舰将形影不离地跟着护送咱们。大概给他们送了这个啦（说话的人用大拇指和食指比成一个圆圈）。

“听许多人说过，遍地黄金的堪察加和北库页岛一带，将来总要划归日本的。不仅中国和‘满洲’^①，这里对日本的‘那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咱们公司好象和三菱^②一起，就这件事正在同

政府加紧勾结。总经理这回要是当上议员，就会进行得更顺当了。

“所以嘛，出动驱逐舰说是保护蟹工船，其实并不尽是这样。主要目的是为了详细测量打这儿到北库页岛、千岛附近一带的海域，以及搜集气象资料，以备万一发生了那个，好有个周密的准备。这可能是机密的话，据说已经悄悄地把大炮和汽油运到千岛群岛最北端的岛屿上去了。

“我刚听到这些话儿，大吃了一惊。据说过去日本的每场战争，说穿了都是在两三个财主（或者说大财主）的授意下，牵强附会地找了各种借口发动起来的。总之，这些家伙只要看中一个有发展前途的地方，就非千方百计把它弄到手不可。这些家伙，危险呀！”

七

吊车嘎嘎作响，川崎船降下来了。吊车的钢臂短，降下来的川崎船得有四个渔工在下边往外推，才能降落到海面去。这种活计，常常发生危险。破船的吊车，象患脚水肿病人的膝盖关节一样咯吱咯吱地响。有时，铰链的滑轮出了毛病，剩下的一边链条，就象瘸子似的滑下去。吊着的川崎船，宛如一条熏青鱼，完全偏着往下降。这当儿，在下边的渔工，一不留神，就会受伤。这天早晨，就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只听得一声“啊，危险！”说时

① 指我国东北。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占领我国东北，翌年建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

② 日本垄断资本集团之一。

迟，那时快，川崎船从顶上猛撞了过来，下边的一个渔工的脑袋，便跟木桩似的撞在自己的胸口上。

渔工们把他抱去船医那儿。其中有几个人恨透监工他们一伙，决定要求船医出张诊断书。因为监工恰似披着人皮的毒蛇，一定会赖账的。将来要向他抗议，就得拿出一张诊断书作为证据。而且过去船医是比较同情渔工和船员的。

“这条船上，被殴打或折磨以致受伤害病的人，远比工伤、生病的人要多得多啊。”船医暗自吃惊。他说过，要把这些情况一一记在日记上，以便日后作证。因此，他还比较亲切地照顾伤病渔工。

“请写张诊断书吧。”一个渔工张口说话了。

“嗨，诊断书嘛……”船医起初好象有点吃惊的样子。

“请你照实写就成。”渔工的话有点不耐烦。

“这条船规定不准写这种玩意儿。好象是他们自己随便规定的……大概是怕日后出问题吧。”船医回答说。

一个急性子的结巴渔工，咋了一咋舌头，呸了一声。

“上次有个渔工被浅川搥聋了耳朵来找我，我顺手给他写了一张诊断书，这就不得了啦。——成了告浅川状的一个根据了……”

他们走出船医室，心里想：到了紧急关头，船医也不是“咱们”自己人了。

说来奇怪，被撞的那个渔工总算保住一条命。然而，他躺在那连白天都黑得经常叫人绊跤的暗角里，整整辗转呻吟了好几天。

等他快痊愈，再听不见哼哼吟声的时候，早先卧病不起的患脚水肿病的渔工，却一命呜呼了。他才二十七岁，是由东京日

暮里^①的荐头介绍来的。一块儿来的约莫有十个人。监工说怕耽误第二天的活计，只准出不了工的病号去守灵。

解开衣服给死人净身^②，尸体浑身发出一股熏人的臭气。饿得干瘪瘪的虱子，一个接一个慌慌张张地爬出来，令人毛骨悚然。尸身长满鱼鳞般的污垢，简直象一段倒在地上的松树干。胸口露出一根根肋骨。他打脚，水肿病情恶化以后，再不能自由走动，好似也就地大小便了，弄得臭气熏天。短裤衩和衬衫都变成褐赭色，仿佛洒过硫酸，一抓起来就一块块散落。泥垢把脐眼填满，肚脐也瞧不见了。肛门旁边粘着象干土一般的粪便。

“真不想死在堪察加啊。”据说，他临终前曾这么说过。可是，当他断气的时候，大概身边一个人也没有。恐怕谁都不愿死在堪察加的。渔工们想到他临终时的这种心境，有人禁不住放声哭了起来。

“太可怜了。”渔工去打净身开水的时候，厨师说，“多打点吧，他的身体一定很脏了。”

渔工提着开水，在回来的路上，碰上了监工。

“把开水提到哪儿去？”

“净身用的呀。”

“不许那么浪费！”监工还想说些什么，但没说出口就走过去了。

那个渔工回到舱房，气得身子直打哆嗦，愤愤地说：“当时我真想冷不防把开水冲他的后脑勺泼过去呀！”

监工不时跑来察看动静。但是，大家已经决定：不管明天干起活来打盹、摔跤子也好，或照例“磨洋工”也好，都要全体去守灵。

① 东京的一个地名。

② 佛教规定在死人入殓以前，要用热水擦净身体，谓之净身。

约莫到了八点钟，大家好不容易才准备妥当，点上香烛，坐在死人前面守灵。监工终于没有来。船长和船医总算来呆了个把钟头。有个渔工，象小孩咿呀学语一样，会断断续续念几句经文。他拗不过大家劝说“凭这点就行，心诚则灵”，于是就念起经来。在念经的时候，一片肃静，只听见有人在啜泣。快到最后，哭的人就多起来了。

念完经，每个人都烧了香。散开后，大家东一群西一堆地谈论开来：从同伴的死来看，自己是活着了。但若仔细深思，自己活着也朝不保夕啊。船长和船医离去以后，结巴的渔工走到尸体旁那张点着香烛的桌子前面，说道：

“我不会念经。我不能念经告慰山田兄在天之灵。但是，我反复地想，山田兄怎么也不愿意死的。不，说得确切点，是不愿被折磨死的。可是，山田兄却终于被折磨死了。”

在场听着的人，心情沉重，变得一片肃穆。

“那么，是谁把他折磨死的呢？不用说，大家心里都明白！我不能以念经告慰山田兄在天之灵。但我们可以向杀害山田兄的人报仇，要拿报仇来告慰山田兄。我们现在就应该在山田兄灵前发誓……”

最先表示同意的，全是船员。

在充满蟹腥味和人气的整个“粪坑”里，荡漾着象香水般的线香香气。到九点钟，杂工们回去了。疲倦得打盹的人，象装上石头的草包，站不起来了。过了一会儿，渔工们也三三两两睡着了。海上起浪了。烛光随着船身摇晃，时而细得快要熄灭似的，时而又明亮起来。盖在死人脸上的白布索索地好象就要掉下。终于掉下来了。大家一瞧见这个，就不禁毛骨悚然。——船舷响起浪激声。

第二天早晨，劳动到八点过后，只有监工指派的四个船员和渔工下到底舱去。让头天晚上那个渔工念完经以后，就由指定的那四个人，加上三四个病号，动手把尸体装在麻袋里了。船上虽然有许多新麻袋，但监工说，马上就要扔到海里，还使什么新的，太浪费了。结果，没让使新麻袋。船上的线香也用完了。

“可怜啊！这么潦草，难怪死者生前说不愿死在这儿呀。”

大家好不容易把尸体僵硬的手叉着放在胸前，眼泪落到麻袋里。

“不行不行，眼泪一落到尸体上可就……”

“不能设法运回函馆去吗？……你瞧他那副面孔，仿佛在说不愿被扔进堪察加的冰水里去呀。扔到海里，孤魂无依啊……”

“虽说同样是海，可是堪察加海却是异乎寻常的凄凉。到了冬天——一过九月，整个堪察加海冰封雪冻，连条船的影子也没有。这是最北边啊！”

一个渔工“呜呜”哭着说：“就这么潦草地装进麻袋了，船上有三四百人，可是只许咱们六七个人送葬！”

“咱们死后，也不会有什么好发落的……”

大家要求办完丧事后放半天假，但前一天捕了很多蟹儿，监工没有同意，说是“不要把私事同公事扯到一块儿”。

“准备好了没有？”监工从“粪坑”舱口探下头来问道。

大家无可奈何地回答说：“好了。”

“那就抬出来吧。”

“哦，抬出去前，船长先生还要致悼词呢。”

“船长？还要致悼词？”监工嘲笑着说，“笨蛋！还能有那闲工夫吗？”

是不会有那闲工夫了。在甲板上，螃蟹堆积如山，蟹爪搔得

舱板索索作响。

于是，很快地将尸体抬了出来，跟包装大马哈鱼和红眼鱼的蒲包一样，胡乱装上靠在船尾的机动船上。

“行了吗？”

“行——啦……”

机动船吧嗒吧嗒地开动了。船尾的螺旋桨拨动着海水，推涌起浪涡。

“那么……”

“这……”

“永别了。”

“太凄凉了……委屈点吧。”一个渔工慢声细语地说。

“那就拜托你们啦！”船上的渔工委托给机动船上的人。

“嗯，嗯，明白了。”

机动船渐渐离去，驶向海心。

“那就，拜托啦！”

“走远了。”

“仿佛听见麻袋里呼喊：我不愿走呀，我不愿……”

渔工捕蟹回来，一听到监工这样草率处理，满肚子的气憋在心里，好象自己的身子也变成一具死尸，被扔进无底的堪察加海里去似的，觉得全身一阵寒战。大家默默地挨个走下舷梯，脱下了被咸水浸透的劳动服，嗓子眼里嘟囔着：“明白了，明白了。”

八

大家表面上不露声色，只在神不知鬼不觉中把活儿放慢了。

尽管监工到处嘶声吆喝，或者拳打脚踢，渔工们都沉住气，装作很“顺从”的样子。这种情形，每隔一天重复一次（起初，大家还有点提心吊胆），“怠工”就这样坚持下来了。自从发生海葬那件事以后，大家就齐心了。

劳动效率眼看着下降。

已过中年的那个渔工，一干活儿，身体就支持不住，可是对“怠工”却又有难色，内心（！）非常怀疑怠工的成败。但是，他担忧的事并没有发生，反而见到“怠工”正在产生效果，也就听青年渔工的劝告，开始怠工了。

最为难的是川崎船的船头们。他们对川崎船负有全责，地位居于监工和普通渔工之间，每天的捕蟹量得直接对监工负责。这是他们最为难的地方。结果，他们中间三分之一的人“不得已”站在渔工一边，余下三分之二的人，是监工的小小“代理人”——小小狗腿子。

“干这活儿，当然是累喽。但也不能跟工厂那样按部就班安排活计呀。螃蟹是活的，不会随着人意，要它什么时候出来就出来。这是没法子呀！”一个船头这么说着。他完全是监工的传声筒。

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就寝之前，大家在“粪坑”里，天南海北地闲聊起来。这时，一个船头偶然说话狠了一点，其实也不算太厉害，却惹得一个有点喝醉的“普通”渔工发了火。

“你说什么？”他突然大声申斥，“你是什么东西，放明白点，不要那么狂了。出去捕蟹的时候，我们四五个人把你扔到大海里去，那是易如反掌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这里是堪察加，谁能晓得你怎么死的！”

过去没人讲过这种话，现在他却声色俱厉地嚷出来。谁也没吭声。刚才闲聊的话声，也戛然止住了。

这可不是信口开河。万没有想到有一股巨大的力量，从背后推动着迄今只知“顺从”的渔工。渔工们受到这种推动，开始有点踌躇徘徊。因为他们还没认识到，这就是自己的潜在力量。

这种事咱们能成？当然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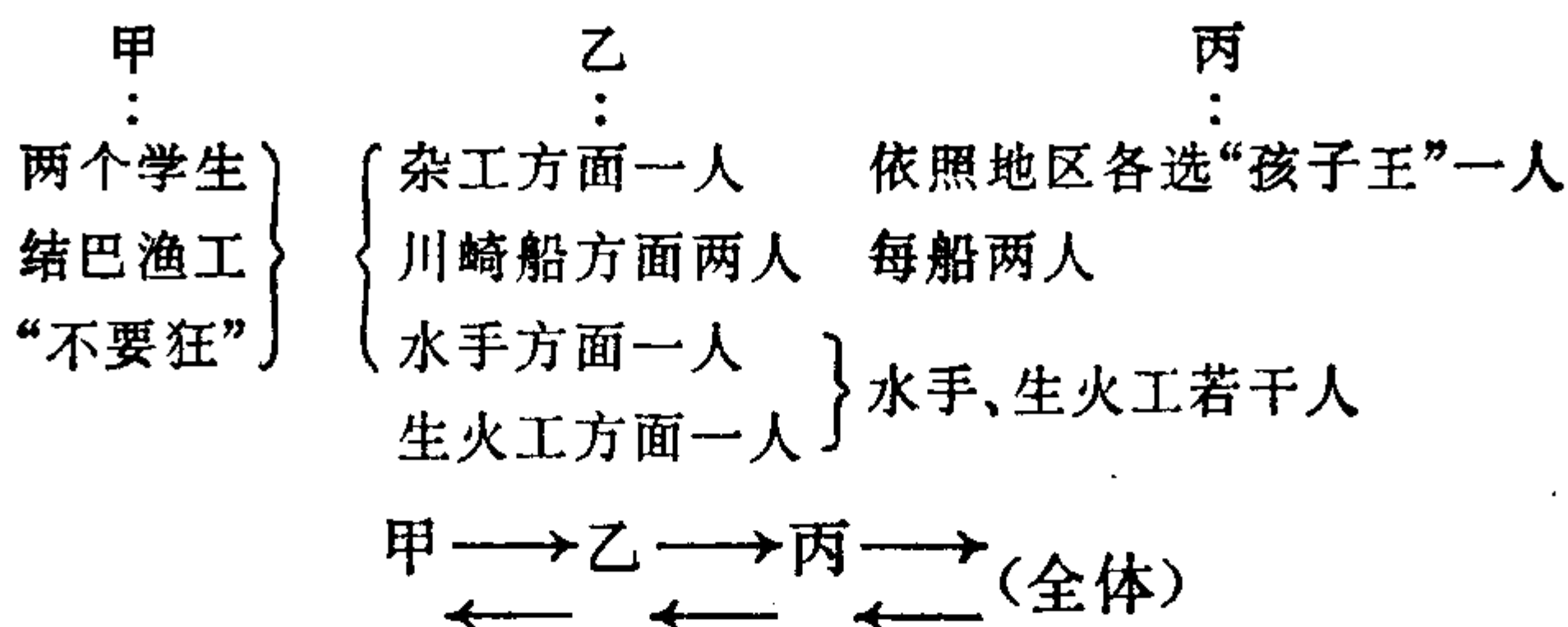
这回，他们一经觉悟过来，就产生了一种想象不到的力量。反抗的情绪在大家的心坎里燃烧起来。他们深受极其残酷劳动的剥削，因此，这种反抗情绪就有了无比坚实的思想基础。只要这样干下去，还怕什么屁监工！大家豁然开朗了。一旦抓住大家的这种情绪，就象忽地打亮手电，使大家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过着的是蛆虫般的非人生活。

“你这个东西，不要那么狂”，这句话在大家中间流行起来。即使碰到别的事情，也动不动脱口说出：“你这个东西，不要那么狂。”当然，在渔工中间没有一个人是狂的。

类似的事情不止发生过一两次。每次都提高了渔工的“觉悟”。在这样重复的过程中，渔工们一碰上什么事情，中间总是固定三四个人出面。这不是由谁推选的，实际上也没推选过。只是发生什么情况，或得干什么事了，这三四个人的意见同大家一致，所以大家也跟着他们行动了。这四个人，两个是学生出身的，一个是结巴，另一个就是刚才说过“不要狂”的那个渔工。

学生整夜伏着身子，不时舔着铅笔在纸上写什么。——原来学生是在起草方案。

方案(负责人分工表)



学生得意地自言自语：这个方案不错。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从甲发生或从乙发生，都可以比电流还迅速而准确无误地发展成“全体的问题”。大致上就这样决定了。但实际做起来并不容易。

“不愿被宰割的人们，联合起来！”这是那个学生的得意的宣传口号。他以毛利元就^①的折箭故事和在内务部的宣传画上见过的“拔河”为例，向大家宣传说：“咱们四五个人把一个船头扔到大海里还不易如反掌，要振作起来！”

他还说：“一对一太危险，不行。可是，对方连船长都算在内，还不到十个人，而咱们却近四百人。四百人齐心的话，胜利就是属于咱们的。十个人对四百人，要较量，就试试看吧！”于是他最后提出：“不愿被宰割的人们，联合起来！”这个口号。现在，不管是“呆子”或是“酒徒”，都认识到自己过着半死不活的生活（也看到眼前就有同伴被折磨死），而且迫不得已才搞起来的一次又一次的“怠工”，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所以，大家也就很相信

① 传说日本战国时代的武将毛利元就临终前唤三个儿子至床前，令他们各人将一枝箭折断。接着，又叫他们把三枝箭绑在一起折，结果都折不断，以此教育三个儿子团结一致，使他人不敢来犯。下面说的“拔河”，也是说加强团结才有力量的意思。

学生和结巴的话了。

一周前起的大风暴，把机动船的螺旋桨给刮坏了。杂工头子同四五个渔工一起乘船，拿去陆上修理。一个年轻的渔工，偷偷带回来很多“宣传赤化”的日文小册子和传单，还说“许多日本人参加了这项活动”。大家看见上面写着自己的工钱、劳动时间长、公司牟取暴利、罢工等等，很感兴趣，互相传阅着，议论着。但其中有的人对上面的词句起了反感，说“日本人”怎么能干这种恐怖的事呢。

“我认为传单上面说得对，但……”一个渔工拿着传单到学生那里问道。

“虽然说得有点过火，但说得对呀。”

“嗯，不这么干，改变不了浅川的本性哟。”这个渔工笑着说，“何况这帮家伙，还要叫咱们受更大的罪，当然要这样干罗！”

渔工们虽说这件事不得了，但对“赤化运动”却开始产生了好奇心。

跟起风暴一样，下大雾的时候，蟹工船长鸣汽笛，催促川崎船返航。在茫茫的浓雾中，粗犷、牛啤般的汽笛声，持续了一两个钟头。但是，有的川崎船还是没有听命返航。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已干得精疲力尽了。有的故意佯作迷航，漂流到堪察加去了。他们常常秘密闯入俄国领海捕蟹，老早就看准着陆点了，所以很轻易就漂流过去。这班人有的听过“赤化”的宣传。

公司招募渔工，总是谨小慎微的，委托招募点的村长老爷和警察局长大人保送“模范青年”来。他们专门挑选那些对工会漠不关心的、“唯唯诺诺”的工人，自以为“高明”，万事大吉了！可是，恰恰同他们的愿望相反，蟹工船的劳动，促使这些工人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了。再怎么“高明”的资本家，也万万没有注意到

这个难以想象的动向。好象是资本家特意招募这些无组织的工人和无可救药的“酒徒”，来教育他们怎样团结似的。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啊！

九

监工着慌了。

捕蟹量跟往年渔汛期相比，显著下降了。从打听到的情况来看，别的蟹工船似乎都比去年丰产，唯独本船比别的船少产二千箱。按照过去“阿弥陀佛”那套办法，已经行不通了。

蟹工船开始移动了。监工让报务员不停地偷截无线电报，掌握别的船的下网情况。一碰上别的船的鱼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叫拉上来。南下约二十哩，最初拉上来的，满网都是螃蟹。蟹爪钩在网眼里，拚命抓着。这些鱼网的确是“××号”撒放的。

“多亏你啦。”监工不象往常那副架势，拍拍报务员的肩膀。

有时正在拉网，被人发现了，机动船就仓皇逃窜。因为碰上别的船的网就拉，活儿越往后越忙了。

工房入口处贴了一张大告示，上面写着：

凡稍事磨蹭者罚火烙。

凡结伙怠工者罚做堪察加体操①。

受罚者，扣除工资。

回函馆后扭送警察局。

如有违抗监督者，格杀勿论。

浅川监工

杂工工长

① 把人扔在海里。

监工随身带着实弹手枪，有时乘大家正在干活的时候，出其不意地朝海鸥或船上什么地方打枪，好象发出“警告”似的。他瞧见渔工被头上的枪声吓了一跳，就嗤嗤地笑了。这使大家感到一阵寒心，好象自己动不动“真的”被枪毙了似的。

水手、生火工全都被动员起来，供监工任意支使。船长对此一言不发。他只要装装“门面”，就算很好地尽到了责任。从前也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监工强迫船长把船开入俄国领海捕蟹，船长依照国际公法的规定，坚持不让侵犯别国的领海。

“随你便吧！”“用不着求你！”监工说罢，自己一伙人就亲自转舵，把船驶入俄国领海了。可是，当俄国警备船发现，追了上来，受到盘问时，却瞠目结舌，“畏缩”后退，硬推船长出面，说什么“在船上一切这类事情，当然由船长去应付……”因此，有这样的“门面”装潢装潢还是需要的，只要这样就够了。

这件事发生以后，船长几次三番想把船开回函馆。无奈有一股阻力——资本家的力量，终究控制着船长。

“这条船一切都是属于公司的，明白吗！”监工把嘴噘成三角形，伸直腰板，放声哈哈大笑。

结巴的渔工，回到“粪坑”里，翻了个筋斗就仰面躺下，懊丧极了。渔工们看见他和学生们的样子都很同情，但也没言声，个个都灰心丧气的。学生设想的组织，也象废物一般，不顶用了。尽管这样，学生还是比较有信心地说：“一有个风吹草动，咱们还是可以行动起来的。问题在于要善于抓住‘时机’。”

“还能动得起来吗？”说“不要狂”的渔工问道。

“吗什么哟？傻瓜，咱们人多，怕什么呢。他们越胡作非为，大伙儿的不满情绪就越大。这种不满情绪填满胸膛，比火药还

要厉害哟。咱们就靠这个。”

“打算得倒不错呀。”“不要狂”向“粪坑”里环扫了一下，满腹牢骚地说，“依我看没有这种人，谁都……”

“连咱们都发牢骚，那就完了。”

“你瞧，就是你有信心。今后再闹起事儿来，恐怕要出人命的呀。”

“对呀……”学生沉下了脸。

监工带着他的喽罗，一夜巡视三次。一发现三四个人聚在一起，就厉声哄散。这样还嫌不够，又偷偷派他的喽罗睡到“粪坑”里，进行监视。

无形的锁链，只是肉眼瞧不见就是了。每当大家迈步的时候，沉重得就跟拖着一条粗大的锁链似的。

“我啊，准保不住这条命了。”

“嗯，等知道保不住，咱们就干！”

“傻瓜！”从芝浦来的渔工在旁边愤愤地说，“等？还等到什么时候呀，现在不正要你的命吗？只不过逐步来就是了。这帮家伙诡计多端，总带着手枪，装作随时要开枪的样子，但他们绝不会轻易干这种蠢事的，那只不过是一种‘手段’罢了。明白吗？这帮家伙要是开枪打死咱们，他们自己不上算。他们的目的，真正的目的，是要让咱们拚死地干活儿，把咱们放在榨油机上，让他们压榨，让他们发财。如今，咱们每天就是这样受他们榨取的。这是多么狠毒啊！他们简直跟蚕吃桑叶一样，正在一点一点地把咱们吃掉呀。”

“对呀！”

“什么对不对的。”一个渔工晃动着在他粗硬的掌心上的烟火，说，“走着瞧吧，狗杂种！”

船直往南下，捕捞到的多半是小雌蟹，便又开回北方去。因此要大家加班加点，偶尔（很难得）才提前收工。

大家回到“粪坑”里。

“一点劲儿也没有了。”芝浦来的渔工说。

“喂，当心你的脚底，这样趔趔趄趄的，下不了梯子呀。”

“太可怜啦。可是还说要拚着命去干。”

“谁愿意干！那是没法子呀。”

芝浦来的渔工笑着说：“人家要你的命，你也没法子吗？”

“……”

“唉，这样下去，你可活不到四五天了。”

对方听这么一说，皱了皱眉头，焦黄浮肿的脸上露出了不高兴的神色。然后，默默地走到自己的舱铺上，从铺沿放下小腿，用手掌边敲着膝盖的关节。

芝浦来的渔工在下铺挥手说话了。结巴晃着身子，随声附和着。

“……想想看，就算资本家出钱造了船，但没有水手和生火工，船能开动吗？海底有几万万只螃蟹，就算资本家花钱做好种种准备，把船开到这儿，但是咱们要是不干活儿，螃蟹能落到他们的手里吗？大伙儿想想看，咱们在这儿干一个夏天，究竟能有多少收入，而资本家光仗这一条船就可以实赚四五十万元。喏，这就是资本家发财之道，无本生利嘛。明白吗？那都是咱们的血汗啊。因此，咱们不应再愁眉苦脸，束手待毙了。咱们要更加振作起来。我不是瞎说，说到底，资本家怕咱们，咱们用不着怕资本家。

“没有水手和生火工，船就开不动。没有工人劳动，资本家连分文也挣不到手。方才谈到的买船、买渔具，以及各种准备费

用，也是吸吮别的工人兄弟的血汗挣来的。资本家的钱，是靠剥削咱们挣来的啊！没有咱们工人也就没有资本家……”

监工进来了。

大家有些手忙脚乱，不知如何是好。

+

空气冷飕飕的，明亮得象一面一尘不染的镜子。两点钟，天色已经放亮。堪察加的群峰，洒上了紫金色，比海面高两三寸沿地平线往南绵延伸去。海面掀起一簇簇微波，朝霞映照在波面上，天光海色相映生辉。这些冰冷的浪波，腾起又破碎了，破碎了又腾起，耀眼夺目。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海鸥的阵阵啼鸣。天气晴朗而寒冷。盖在货物上沾满油污的雨布，被吹得吧嗒吧嗒直响。不知什么时候，起风了。

渔工象稻草人一般，将双手拢在劳动服的袖口里，迈步走上舷梯，从舱口探出头，象松了弹簧似的蹦出话来，

“啊，兔子跳起来了。快要起风暴啦。”

海面涌起三角浪波。熟悉堪察加海脾气的渔工，知道马上就要起风暴了。

“太危险了，今儿停工吧。”

过了一个钟头的光景。

渔工们在要降下川崎船的吊车底下，三个一堆、五个一群地聚拢起来。每条川崎船都降下一半，在半空中摇摆着。渔工们晃着肩膀，眺望海面，互相交谈着。

过了一会儿。

“停工，停工！”

“见他妈的鬼，呸！”

大家仿佛憋着股劲儿，等着有人说这么一句话。

渔工们彼此凑在一块说：“喂，把川崎船拉上来吧！”

“好！”

“好，好！”

有一个人眯着眼睛，抬头望望吊车，迟疑地说：“可是，我说呀……”

另一个人耸耸一边肩膀，蓦地迸出一句煽动性的话：“想找死的，就自个去吧！”说罢就离去了。

大家都蜂拥着走开了。有一个人轻声地说：“真的这么做能行吗？”还有两个人踌躇地慢步跟在后头。

在另一台吊车底下的渔工，站在原地不动。他们瞧见第2号川崎船的伙伴冲这边走过来，也就会意了。有四五个人挥手叫喊：

“停工，停工！”

“对，停工喽！”

两股人合在一块，勇气就来了。那两三个踌躇不前、落在后头的渔工，收住脚步，漠然地望着。大家走到第5号川崎船的地方，又聚拢一起。落在后头的人，看见这种情景，嘴里嘟囔着从后头跟上来了。

结巴扭过头来，大声呼喊：“大伙儿加油干呀！”

渔工的队伍，就跟堆雪人一样越来越壮大。学生和结巴不停地在人前人后来回奔忙。“大伙儿记住，最重要的是不要掉队！现在大伙儿干得很出色。现在……”

围坐在烟囱旁边修理缆绳的水手们，站起来大声问道：“喂，

你们怎么啦！”

大家向他们挥手，高声呼唤。水手们从上面望下去，一双手挥动着的手臂，活象一片林海。

“好啊，咱们也不干了！”

水手们赶紧收拾缆绳：“正等着你们哩！”

渔工们心领神会，再次高声呼唤。

“先回‘粪坑’去，走。——狠心的家伙，明知要起风暴，还要咱们出船，简直是刽子手嘛！”

“谁甘愿让那些家伙白白杀死！”

“这回等着瞧咱们的厉害吧！”

几乎全体回到了“粪坑”。其中也有的是“无可奈何”地跟着来的。

睡在暗角里的病号，看见大家哄地涌进来，吃了一惊，忙支起薄薄的身板。大家将原委告诉他以后，他眼窝里噙着热泪，连连点头。

结巴和学生，从绳梯般的舷梯走下机器房。因为不习惯，又着急，几次脚踩空了，好不容易用手抓住扶手攀了下去。机器房里黑压压的，而且锅炉散发着热气，闷得发慌。他们立刻汗流浹背，经过汽锅炉的铁隔板，又走下一层舷梯。下边有人高声讲话，发出嗡嗡回响。好象头一次下到离地面几百尺的地狱般的竖坑里一样，令人寒心。

“这种活儿也够呛呀。”

“嗨，要是再把你揪上甲、甲板，去剥、剥蟹，也是忍受不了呀。”

“放心吧，生火工也是咱们的人！”

“嗯，放心啦！”

他们从锅炉旁走下舷梯。

“好热呀，好热呀，受不了啦，简直把人都烤熟了。”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呀。今儿没升火，已经这么热了，升了火还得了！”

“唔，那是呀。”

“据说，过印度洋每半小时换一次班，这样还把人烤得软瘫瘫的啊。又听说一等轮机手稍不注意露了一句责怪生火工的话，就被他们用煤锹乱砍一通，最后竟被扔进锅炉里烧成灰了。也难怪他们要这样干呀！”

“是呀。”

在锅炉前放着的一堆掏出来的煤渣，好象刚浇上了水，腾起了蒙蒙的煤灰。光着膀子的生火工们在旁边抱住膝盖，边抽烟，边闲聊。从昏暗中望去，就跟黑猩猩蹲在那儿一模一样。煤仓半开着口子，里面黑咕隆咚的，令人望而生畏。

“喂！”结巴唤了一声。

“谁？”有人抬头看着上边喊。“谁——谁——谁——”四周连续回响了三声。

他们俩向那边走下去了。一个生火工认出他们俩，就马上拉开嗓门喊道：“走错路喽！”

“罢工啦！”

“白什么工？”

“不是白工，是罢工。”

“罢起工来了吗！”

“好啊，咱们快升火，开回函馆去怎样？真有意思哩。”

结巴心里想：“好极了！”

“对，大伙儿集合一起找那帮家伙提抗议去。”

“好呀，好呀！”

“不是好呀，好呀，是大伙儿一齐干吧，干吧！”学生插话了。

“哦，哦，我说错了。大伙儿一齐干吧，干吧！”生火工搔了搔沾满白煤灰的脑袋。

大家笑了。

“你们这方面，全部归你们自己去组织啦。”

“是，明白了，放心好啦。咱们这儿的伙伴随时都准备好干他一场哩！”

生火工方面就这样组织起来了。

杂工全部都站在渔工一边。大约过了一个钟头，生火工、水手也都参加进来了。大家在甲板上集合。结巴、学生、芝浦、“不要狂”合计拟好“要求条件”，并决定当着大家的面向监工一伙提出。

监工一伙知道渔工们闹起来，就不敢露面了。

“真可笑啊。”

“这真是可笑呀。”

“这么一闹，就是拿手枪也不中用了。”

结巴的渔工走上稍高的地方，顿时响起一片掌声。

“伙伴们，咱们等待好久好久的日子，终于到来了！咱们尽管被整得半死不活，可还在等待着。心想：你走着瞧吧。现在这天终于到来了。

“伙伴们，首先咱们要团结一致。不论发生什么情况，咱们都不能出卖同志。只要咱们牢牢记住这点，捏死这些家伙，那比捏死小爬虫还不费劲儿。还有，其次是什么呢？伙伴们，其次还是要团结一致。就是说不让一个人掉队，不让出一个叛徒，出一个变节分子。咱们要知道，只要出一个变节分子，就会使三百人

的性命遭殃。只要出一个变节分子……”（顿时响起一片喊声，“明白了，明白了。”“放心吧。”“别担心，干吧。”）

“咱们这次抗议行动，能不能打倒他们，能不能完成任务，全靠大伙儿的团结力量啦！”

接着，生火工代表和水手代表先后站起来讲了话。生火工代表讲了一些过去从没讲过的话，自己都发愣了。一愣就面红耳赤，忽而用手拉拉衣襟，忽而又将手插进劳动服磨破了的窟窿里，显得有点慌张。大家看到他这副模样，不由得跺着甲板笑了起来。

“……我的讲话就要结束了。伙伴们，可要把那帮家伙全部打倒啊！”他讲完就走下讲台。

大家有意使劲鼓掌。

“就是这句话讲得好。”后边有人打趣地说。于是，大家又哄然大笑起来。

生火工汗流浹背，腿也发软了，赛过盛夏时在锅炉旁使长把煤锹干活。他走下讲台，就问他的同伴：“我方才讲了什么呀？”

“讲得好，讲得很好呀。”学生拍拍他的肩膀笑着说。

“就是你不好，有那么多人了，为什么还偏叫我……”

“伙伴们，咱们一直盼望的日子到来了。”一个十五六岁的杂工登上讲台说，“大伙儿知道，咱们工友在这条蟹工船上，是怎样受苦挨整，弄得半死不活的？每到夜晚，钻进薄薄的被窝里，就想家，常常想得哭了。试问在座的每一位工友，有哪一个晚上不暗自落泪，又有哪一个人身上不带上新的创伤。有的人再连续三天经受这样的折磨，就非死掉不可。象咱们这个年纪，要是家里有点钱，还不是在学校里蹦蹦跳跳，哪儿会到这么老远……（他声音嘶哑，讲不下去了，象屏住呼吸似的，顿了一会儿）不过，

现在好了，不要紧了，有大人们的帮助，咱们一定能够向那些可恶的，可恶的家伙报仇……”

杂工的讲话，激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那个年过中年的渔工拚命鼓掌，用粗憨的指头悄悄地擦着眼角上的泪花。

学生和结巴拿出一张写上大家名字的声明，让大家盖章。

大家当即决定派两名学生、结巴、“不要狂”、芝浦、三名生火工以及三名水手，拿着“要求条件”和“声明”，到船长室去递交给船长；与此同时，全体渔工在船长室外示威。由于住得不象在陆地上那样分散，加上基础牢固，所以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出乎意料的顺利。

“奇怪呀，那鬼家伙不露面啦。”

“他何尝不想跳出来开他那支得意的手枪呢。”

三百人由结巴领头，一齐连呼三声：“罢工万岁！”

学生笑着说：“监工这个混蛋，听到这喊声，一定会发抖吧！”

大家摩肩接踵来到船长室。

监工手里拿着手枪，迎接了代表。

船长、杂工头子、工房代表等，看样子好象预先商量好了，都出来迎接代表。监工若无其事。

大家进入船长室后，监工冷笑地说：“干起来了呀。”

外面，三百人围得水泄不通，高声呼喊，使劲跺脚。监工低声说：“真讨厌！”但是，代表们却毫不介意，只顾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监工听了个大概以后，勉强地接过“要求条件”和三百人的“声明”，随便浏览了一眼，然后败兴似的慢条斯理地说：“不会后悔吧？”

“混蛋！”结巴霍地冲监工的脸叱喝了。

“那，好吧，这么说是不后悔喽。”监工这么说后，又稍微改变

语气，“那你们听着，明早以前给你们称心的答复。”

可是，说时迟那时快，芝浦猛然打掉监工的手枪，冲他的脸给了一拳。监工吓了一跳，连忙捂着脸。这时结巴抡起蘑菇形的圆凳子，朝他的脚上横砸过去。监工的身子，扑到桌边，不由自主地倒下了。桌子被碰翻，四脚朝天，压在他身上。

“什么称心的答复？你这个混蛋。这是生死攸关的大问题，不许你再愚弄咱们了。”

芝浦激动得气呼呼的。水手、生火工、学生拦阻他们俩。船长室的窗子啪的一声，给砸碎了。这时刻，从外面立即清晰地传来一阵响亮的呼喊声：“宰了那个兔崽子！”“揍死那个混蛋！”“揍死他！揍死他！”不知什么时候，船长、杂工头子、工房代表吓得缩到一个角落里，一个个呆若木鸡，脸色都煞白了。

门砸坏了，渔工、水手和生火工象潮水般涌进来了。

过了晌午，海上起风暴了。快到傍晚，才渐渐平息下来。

“打倒监工！”这种事过去总认为是不可能的。可是，如今自己却亲自把他打倒，连平时拿来吓唬人的手枪不也见鬼去了吗？大家欣喜若狂，欢腾起来。代表们聚在一起，商量今后的各种对策。大家认为要是得不到“称心的答复”，就叫他们再尝尝这个滋味！

天色发暗了。在舱口戒备着的渔工，看见驱逐舰驶过来，慌忙飞跑到“粪坑”里去。

“不好啦！”一个学生象弹簧似的蹦跳起来，脸色唰地变白了。

“你别想差了。”结巴笑出声来，“咱们把咱们的情况、观点以及要求，向军官们详细解释，如果取得他们的帮助，反而会使这

次罢工得到有利的解决。这是明摆着的嘛。”

“那是呀。”在旁的人也附和着。

“咱们帝国的军舰嘛，当然要帮助咱们老百姓罗。”

“不，不……”学生摇摇手，仿佛受到很大的冲击，颤动着嘴唇，说不出话来。

“帮助咱们老百姓？……不可能，不……”

“傻瓜！帝国的军舰哪能不帮助老百姓的，有这种道理吗？”

“驱逐舰来了！”“驱逐舰来了！”大家的兴奋情绪，硬将学生的话儿完全给压下去了。

大家闹哄哄地从“粪坑”拥上甲板，忽地齐声呼喊：“帝国军舰万岁！”

在舷梯口上，结巴、芝浦、“不要狂”、学生、水手、生火工们，跟脸上、手上都缠上绷带的监工和船长面对面地站着。天色昏暗，看得不十分清楚。驱逐舰放下三艘汽艇，每艘汽艇装上十五六个水兵，挤得满满的。汽艇向蟹工船开过来，横靠到船边，水兵们一下子走上舷梯来。

你瞧！枪头上了刺刀！帽带都扣在下巴颏儿底下！

“坏了！”结巴心里暗暗叫了一声。

第二艘汽艇又是载来十五六个士兵。第三艘汽艇也一样，士兵们还是枪头上了刺刀，帽带扣在下巴颏儿底下！他们跟闯上贼船一样，气势汹汹地冲上船来，立即将渔工、水手、生火工团团围住。

“坏啦，他妈的，干起来了。”芝浦、水手、生火工的代表也叫起来了。

“活该！瞧见了吧！”监工开腔了。

大家这才明白，罢工以来监工何以总是那副鬼鬼祟祟的态

度。但是，已经晚了。

士兵们不由分说，破口大骂：“破坏分子”、“叛徒”、“学老毛子的卖国贼”。骂着就用刺刀威迫九名代表，把他们押送到驱逐舰上去了。在这一瞬间，大家摸不着头脑，迷惘地张望着。简直不容申辩半句。大家毫无抵抗，就好象眼巴巴看着一张报纸被火烧掉一样。

局面就这样简单地“收拾”了。

“我现在才明白，咱们只有依靠自己，再没人帮助咱们了。”

“什么帝国军舰，叫得倒漂亮，其实还不是大资本家的走狗。什么帮助老百姓，真笑话，去他妈的吧。”

水兵们为防备万一，在蟹工船上驻了三天。这期间，军官们每天晚上在餐厅同监工他们一起喝得酩酊大醉。“他们就是这样一帮家伙呀。”

不管渔工们多么愚昧，这一回，也只有这一回，才亲身体会到“谁是敌人”，而这些敌人（完全出乎意料的！）又是如何勾结在一起！

按每年惯例，在渔汛快过的时候就要特制“贡品”蟹肉罐头。可是在特制时，是“很不恭敬”的，从来都不特地斋戒沐浴。往常渔工认为监工这种作法是对天皇的不敬。但是，这回的想法却完全不同了。

“这是榨取咱们的血肉制成的啊！哼，吃起来味道也许很鲜，吃下去可不要闹肚子呀！”

大家都是抱着这种情绪去制作的。

“放些石子进去！管他呢！”

“咱们只有依靠自己，再没人帮助咱们了。”

这句话深深地刻印在每个人的心窝里。——“走着瞧吧！”

但是，重复一百遍“走着瞧吧”能顶个什么用呢？罢工惨遭失败以后，劳动也变得更加苛刻了。监工仿佛说：“畜生，该明白老子的厉害了吧。”本来迄今的劳动就已经够繁重的了，再加上监工的报复，就更加苛刻了。这种苛刻，已经大大超过了限度。现在已经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

“咱们错了。咱们不该把九名代表全部推上第一线，这不等于把咱们的头头全给暴露了吗？咱们应该全体一起出面，这样监工也就没法给驱逐舰发电报了。他总不能把咱们全体都抓走呀。都抓走了，谁给他们干活儿呢。”

“说得对呀！”

“是呀。按现在这样干下去，咱们就真的要被折磨死的啊。为了不让一个人牺牲，咱们就要用以前的同样办法，全体一齐‘怠工’。结巴不是说过吗，最重要的是团结一致。大家应当懂得，只要团结一致，什么事情都能办得到的。”

“假使他们再叫来驱逐舰，大伙儿就要团结一致，他们要抓就一个不剩地让他们全部抓走。这样做反而对咱们有利。”

“也许是这样。大伙想想看，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在公司面前，首先感到惊慌的就是监工。他想要从函馆找替工的来，一时也来不及。产量一定减少得不象样儿……只要大伙儿好好干，就会赢得胜利。”

“一定会赢得胜利的。大伙儿满腔仇恨，谁也不去瞻前顾后了。”

“老实说，后果如何，咱们现在管不了啦。因为摆在眼前的是你死我活的搏斗啊。”

“好，再来一次！”

就这样，他们站起来了。再一次开始新的战斗！

作者附记

有关其后发生的事，附记两三件如下：

一、第二次全体“怠工”完满成功了。监工万没想到会发生第二次“怠工”，慌慌张张地跑去电报室，可是到门口却止住了脚步，进退维谷，不知所措了。

二、渔汛过了，回到函馆才晓得搞“怠工”和罢工的蟹工船，不仅是“博光号”。在两艘船上，还发现“宣传赤化”的小册子。

三、此后，公司以监工、杂工头子在渔汛期惹起罢工之类的不幸事件，使生产蒙受莫大的影响为由，把这些忠实的走狗“无情地”解雇了，甚至连退职金也分文不给（比渔工还糟）。有趣的是，据说那个监工后来叫嚷说：“啊，真后悔！他妈的，我过去受骗了！”

四、还有，渔工、青年杂工等第一次取得了“组织”、“斗争”这个伟大的经验。他们走出警察局的大门以后，就分别深入到各劳动阶层中去。

——这是“资本主义侵入殖民地史”的一页。

（1929年3月30日）

在 外 地 主

李 芒 译

本篇原名《不在地主》，发表于 1929 年《中央公论》杂志十一月号。译文根据 1953 年青木书店文库本译出。

此篇作为《新农民课本》，献给全国各地的佃农和贫农。请大家就象读《荒木又右卫门》或《鸣门秘帖》^①那样，在劳动的余暇躺下来读读。

① 两书均为当时一般群众中流行的通俗小说。《荒木又右卫门》作者长谷川伸，《鸣门秘帖》作者吉川英治。

第一章

一 “出出，出！”

墙壁裂了缝，象张地图，靠上去就簌簌地直掉土。由三哭丧着脸，动手擦灯罩。他用手捂住灯罩的一端，往里哈一口气，里面就挂上一层雾；然后把报纸攥成一团，擦着里面。擦上几遍，就弄得满手煤油味，老是去不掉了。

从已经倾斜了的草屋顶的缝隙，从装得不严实的窗户，都冒着烟。天阴欲雨，气压低，那烟不能一直升上天空，就贴着地面，缓慢地向四周飘散。

每天擦灯罩，真使由三讨厌极了。“哼，臭老婆子，这玩意儿摔碎了得啦！”他仿佛是忽然想起似地又哽咽着哭了起来。脊背碰得墙上簌簌地直掉土。不知什么地方的牛粗声粗气地叫了一声，跟着，仿佛回话似的，近处的牛也叫了起来。天上下起了雾一般的冷毛毛雨。

“阿由！你要在那儿磨蹭到啥时候哇！”母亲在屋子里喊叫起来。

“就来啦！”

母亲正蹲在潮湿的堂屋地上，把脸贴近灶口吹火，烟一钻进眼睛就用围裙擦擦。天天下雨，劈柴都湿了。灶里的火一霎时照得她的半边脸闪闪发光，一霎时又暗下去。

“赶快点灯！”

整个屋子简直就象一个灶膛，烟雾迷蒙，没法睁眼。由三摸索着从橱柜上取下灯座。

“妈妈，没油啦！”

“说啥？”母亲忽地从堂屋地上站起来。“没啦……那就到钩鳞去打！”

“钱呢？”

“有啥钱，去赊！”

由三拿着灯座，在母亲身后打转。

“叫你去，就去嘛！这个脓包！”

“拿钱呀！”他把背贴紧橱柜。“人家不赊了呀！”

“管它赊不赊呢，反正是没钱！”

“不行，不——行，不行！”

“叫你去，就去！”

由三以为要挨打，就往后躲闪着，习惯地用手遮住头，慌慌张张地拖着一只木屐跑出后门。“哼，臭老婆子！”

由三站在门口观察了一下屋里的动静，又悄悄地爬进堂屋，取出另一只木屐。一股湿土的霉味直冲鼻孔。

他抄小道向大路走去，小道两旁被雨淋湿的杂草擦在小腿上，怪难受的。路旁，隔着一定的距离，躺着许多粗略地砍去节子、发散着新木头香气的电线杆子。不久，这个村子就要安电灯了。电工每天都带着工具从“有车站的镇子”到这里来。电线杆子一根一根地安到村边来了。孩子们每天都从头到尾数一遍，谈论着还剩几根就要安进村里来。大家整天站在工人干活的地方瞧着。

“你们当中，哪个小子家里有姐姐呀？”

孩子们羞怯地笑着，互相推挤起来。

“这小子有哇。”一个孩子说，“是吧？”

“嗯，嗯。”

“啊，漂亮吗？回去跟你姐姐说，晚上我来玩儿，记住了吗？”

大家一齐哄笑起来。孩子们无论什么时候就是喜欢这样逗着玩儿。太阳快落下去了，大家才吹着口哨，不停地用木棒拨开路旁的杂草，顺着小道回到村子里来。

顺大路走上三百多米，就到了市街区，街道两旁排列着杂货铺、邮局、理发馆、农具店、种籽店、文具店等二、三十家商店。由三跑着，他的和尚头和双肩都给毛毛雨淋湿了。

房檐下围着三、四个孩子在玩画片。由三拿着灯座凑上前去。

“出出，出！”

“出出，出！”

“中校吗？我赢啦，是少将啊！”

对手用舌头舔舔上嘴唇，骂了一声：“妈的！”

“出出，出！”

“出出，唉，等等！”一个孩子好象想起了什么，一骨碌转过身去，调换了一下手里的画片的顺序。

“出出，出！”

“出出，出！”

“中将！”

“我是元帅！怎么样？”赢了的孩子马上手舞足蹈地欢呼自己的胜利。

“啊，你，输了中将吗？”旁边的孩子探望输者手中的画片。
“剩下的还有啥牌呀？”

“别作声！——咱能输吗！”

“唉，阿由，不入伙吗？”赢了的孩子叫道。

“叫他入一伙，行啊！”

由三想玩儿，可是从来没有人给他买过画片。他一声也不吭。

“没画片吗？”

“阿由家的姐姐，说是要到札幌去哪。”

一个孩子正站在房檐下，把衣襟擦到肚子上来，朝着下着雨的地上撒尿。

“谁说的？”

“都这样说嘛。是的，说是要去当窑姐哪。”

“是啊，当窑姐呀！”

“当窑姐呀，这么回事儿呀！”大家嚷嚷起来了。

由三不太明白说的是怎么回事儿；尽管不明白，也好像给人拧了一把似的，满脸涨得通红。

“晚霞红，红半边，太阳落了山……”远处传来了三、四个女孩子高声歌唱的声音。

由三忽然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别哭啊，啊，这个哭鬼！”

给人家猛然一推，灯座掉在地上了。剩下的一丁点煤油洒在给雨淋湿了的地面上，形成了紫色的波纹扩散开去。大家一下被吓住，都一声不吭了。

“唉，唉，这不是我呀，不是我呀。”一个孩子往后退缩着说。

“也不是我呀。”

“不，是你，不是你吗？”

“也不是我呀。”

“也不是我，啊，啊！”

“告诉妈妈去!”由三大声地哭嚎着,顺着大路跑去。

半路上脱下一只木屐拿在手里,他边跑,边反复地嚷着:“告诉妈妈去!”

母亲正抱着最小的孩子蹲在屋后菜地边上把尿。鸡迈过菜地垅沟,在急切不停地寻觅食物。

“喂,小鸡呀,来呀! 小鸡,这里来呀! ——啊,撒尿呀,妈妈喜欢呀!”母亲接着又唏唏地催着。

孩子使劲地蹬着腿,嚷着:“啊,啊,妈,妈,妈……啊,啊!”

“好啦,好啦! 来,撒尿,撒泡尿!”母亲按住孩子蹬动着的两条腿。

这时,只见由三一只手拿着木屐,一瘸一拐地晃着身子,顺着田塍跑回来了。当他的身影消失在屋子后面望不见了的时候,象是立刻绊在堂屋的门槛上猛然摔了一跤,传来木桶和铁桶从架子上落了下来的一阵震耳的响声,跟着就听见由三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狗崽子! 又跟人打架啦! ——啊,尿完了吗?”

孩子的小拇指般的小鸡头湿漉漉的,象是浮着一层露水。

“好啦,好啦! 乖宝宝,乖宝宝!”

由三仰面朝天躺在潮湿的堂屋地上,一望见母亲,就猛然打着滚,嚎啕大哭起来。

二 S 村

“哥哥怎么还不回来呀! ……”由三用筷子敲着空饭碗,鼓起嘴唇来嘟囔着。

哥哥阿健大概是从地里到市街区的“青年训练所”去了，晚饭的时候没回家来。他今年受过征兵检查。如今这样还没法活下去，万一被抽去当兵，那就更不得了。听说，上“青年训练所”总可以缩短当兵年限。他只是怀着这一线希望，尽管已经累得疲劳不堪，仍然不休息就到那里去。

母亲把光屁股的孩子贴肉背着，颠摇着身子走到门外去张望。孩子在背上挣动着被捆紧的胳膊、腿，那柔嫩的皮肤蹭着脊背，痒得怪招人爱的。

“好孩子，好孩子。”母亲晃动着身子。曾经有一次，就这样背着，孩子竟然嗤溜一下子滑到庄稼地里去了。

野外一片苍茫，天快黑了。寒气袭人，背上都起了鸡皮疙瘩。

阿健一家人住的这个S村，正处在风吹雨打的石狩平原。这里三家，那里两户，总共大约有一百来户人家分散地居住着，有的紧挨着从“有车站的镇子”伸展开来的一条村路，仿佛是一根绳子上结的一些疙瘩，有的又深深地缩进田地里去。市街区刚好位于这些居民点的中央，大约有五十来户人家，聚集在村路两侧。

从平原上刮过来的风，一冲进市街区，就把门板吹得啪啪地响起来，卷起飞尘，又向着平原地带刮过去。人在水田地里干着活，只望见尘土高高飘扬，沿着村路一直向那最远的地方飞去。

任凭你朝哪一面望去，都是一无所有，能够看得见的，只是茫茫一片。冬天，就更荒凉。只有一排电线杆子漫无边际地伸向最远的地方，看上去仿佛是摆着一排火柴棍儿；一直到它远得望不见了，那里依然是平原，没有什么东西会挡住人们的视线。

几处白杨树的防雪林，仿佛是倒立着的一排排扫帚；再就是一些杂木林晃着身子，犹如包袱皮的皱褶一般匍匐着。

从S村边缘走出半里地，有一小块土地略微朝石狩河上流方面倾斜下去。沿河一带就是种南瓜和老玉米的旱地。旱地的垅沟里有不少大石头，同褐土与沙子混在一起，裸露在地面上。这是因为石狩河每年五月都要泛滥一次，这一带就变成一片大沼泽的缘故。走过这块旱地，是一条腰带那么宽^①的尚未开垦的草地，再走过去就是河堤了。孩子们常常摇着钓鱼竿，拨开齐腰高的杂草，下到河里去。

河对岸是砂堤，一片被划成各种形状的旱地，好似一块补缀过的包袱皮铺展在那里；还望得见一些同这边一模一样的农家倾斜了的屋顶。

三 《移民指南》

“在内地府县，自耕地固无待言，即新租土地亦实属困难。反之，如移居北海道，即可租得特定土地。五年之内如能开垦所租土地之六成以上，即可无偿获得该土地，顷刻之间成为拥有五町步^②至十町步土地的地主。再者，如资金充足，仅以八百圆即可购得二十町步荒地。故此，凡勤劳者，移居之后，生活概无困难……”

——《北海道移民指南》，北海道厅拓殖部编。

“……经过数年，开垦事业完成之后，谷物蔬菜均获丰收，生活渐趋富裕，草房改建为木房^③，庭前果树亦见结果等等，其乐无穷！此田必传诸子孙万代，后人将称颂此田乃吾祖先所开垦，此树乃吾祖先

① 日本妇女装饰用的腰带一般约有一、二尺宽。

② 町是日本的面积单位，约合一公顷地。町步是以町计算面积时的用语。

③ 原文为“桎屋”，桎是中国的杜仲，北海道多产，一般用作建筑材料。

所种植。其功绩必与世长存!”

——《开垦及耕作指导》，北海道厅拓殖部编。

“……老实说，在我国人口和粮食问题已感到如此难以解决的今天，我认为北海道、库页岛的开发乃是当前的急务。为此，我们必须把个人的利害得失置之度外，抱着与战时士兵同样的心情来从事国家的事业——开垦土地，以增加国富。这就是我的一点浅见。”

——某先生之就任辞。

那些被“扣押青田”①、“禁止下地”②、“要求退还租地”和被“苛刻的地租”束缚得无法动弹的内地农民，怎么能够对于这些宣传置之不理呢？这些宣传可真是抓到了要害。

S村自开垦以来将近三十年了。那么，S村的农民是不是都成了拥有五町步到十町步土地的“地主”了呢？再看看草房是不是改筑成木房了呢？

四 “不要在路上碰见什么人才好哪！”

阿健一家也是读过这种《移民指南》，才迁到冰天雪地的北海道来的。他们也是“佃农”，连留作食粮的大米都被扣押了，眼看着堆在屋檐下，可就是一动也不能动。阿健还模糊地记得跟着双亲离开村子那天的情景。那已是十四、五年前的事了。那天，他背着很重的妹妹玩了一阵子回来，就感到家里有些异样。他的胸前被带子绑成十字形，只能象小乌龟似的，艰难地伸着脖子。

① “扣押青田”是在佃农交不起地租时，地主叫法院在田里立下“扣押青田”的牌子，不准佃农下地收割。

② “禁止下地”是地主叫法院收回佃农租种的土地，不准佃农下地耕种。

“妈妈，行了呀！”他说。

母亲手里拿着麻绳，板着面孔在屋子里打转。父亲盘腿宽坐在那里抽着烟，望着别处。母亲一见阿健，脸上就现出异乎寻常的可怕神情说：

“再到外边呆一会儿去！”

父亲没有作声。

阿健把快要溜下去的妹妹往上颠着，就又出去了。他快要哭出来了。大约过了一个钟头，等他再回到家里来，只见屋子里空荡荡的，中间放着打好了的行李和大包袱。父亲和母亲坐在已经没有火亮的地炉旁边，一声不响。在变成红褐色的昏暗的电灯光下，父亲的双颊显得深深地陷了进去。

“天快点黑下来才好哇！”父亲自言自语似地叨咕着。

等天黑下来，他们背着行李走出了家门。跨过山头的时候，回头一望，村里的灯光好象就在脚底下一样。阿健昏昏沉沉地给父亲拉着走。幽暗的山谷底层似乎在刮风，发出阴惨惨的吼声，仿佛那里就是地狱。这情景宛如幼年听过的可怕的童话一般，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起来。

“不要在路上碰见什么人才好哪！”还没走上十步路，父亲就反复地叨咕着同样的话。

将近五十岁的父亲怀里就揣着一本《移民指南》。

北海道厅所说的“开垦其六成以后，其全部土地即可无偿赠与”的土地，竟然远离火车站二三十里。从那里，任你生产出什么谷物来，单是加上运到车站去的费用，那就无法按市场价格出售了；更不消说，在这北海道的腹地，一到冬季，就比鲁滨逊^①还

① 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1660—1731)著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的主人公。鲁滨逊乘船遇难，流落到一个荒岛上，经过二十八年才回国。

要无依无靠。有的人因为没有充裕的力量预先储备一冬食用的粮食，临时又弄不到手，到了第二年春天，才发现全家已饿死在积雪之下。原来是石狩、上川、空知一带土质肥沃的地方，都被道厅借了筹备“开垦资金”的名义，简直是以白送的价格几百町步一份地卖给了华族^①和大财主了。至于“外来垦荒农民——移住农民”所能得到的，就只剩下这钏路、根室一带白送也没人要的泥炭地了。

“开垦补助费”虽然照章发了三百块钱，可是除去一家人的旅费，顶多只够开垦一年的费用。结果，就只能借“低利资金”，好歹维持下去。等到花了五、六年的工夫，好不容易把荒地开成旱地或水田的时候，一屁股债务已经把农民紧紧地绑住了。

那些买到几千町步土地的大地主，就招佃农开垦，尽管满口答应把全部土地开好以后，就把其中的一半免费送给他们；可是到时候，又玩弄手腕，并不履行诺言。

阿健的父亲只干了两年，就从荒地里逃了出来。《移民指南》中荒唐的美梦，就是这样在他眼前破灭了。走投无路的父亲，当了“岸野农场”的佃户。他说：

“没去打短工，总还算是不错啦！”

五 村里没有地主

无论哪一个村庄都没有例外，在佃农们快要倒塌的小草房中间，只有地主那洁白的粉墙显得特别耀眼，仿佛是鸡群里的仙鹤。那里穷人和财主清楚地分成两类。不过，这已经是“从前”

^① 华族是日本近代实际上的统治阶级，他们由旧封建大地主、大财阀、学阀、官僚、军阀构成，由政府给予公、侯、伯、子、男等爵位。

的事了。

北海道的农村没有地主——不在村里住。这里完全没有文化的享受，有的只是发散着肥料和马粪的臭气，和一些弯腰驼背的肮脏农民。象这样的地方就根本不必偏要住下来，象那种愚蠢的老式地主是一个也找不到了。代替的办法是地主在村子里指派了“农场管理人”。这么一来，他们只消住在东京、小樽和札幌计算“收益”就够了。S村也是这样的村子。

岸野农场的大门口，只有一幢铁皮屋顶的木板房，那就是管理人吉本的家了。吉本在套头毛线衣上面披件西服上衣，总是穿条马裤走来走去。

“在这个村子里，一定要把我当地主看待！”初来的时候，他把佃农召集起来，说过这样的话。

S村土地所有权分布情况表：

二百町步——S村所有田

一百五十町步——大学所有田——“学田”

一百二十町步——吉冈(旭川)

五百町步——岸野(小樽)

二百町步——马场(函馆)

二百一十町步——片山子爵(东京)

三百町步——高桥是善(东京)

此外，自耕农五户——共一百五十町步。

六 “巡警”和“钩鳞的老爷”

市街区有S村青年团和S村处女会，它们在小学校隔壁设立了“修养俱乐部”，在那里举行各种集会和演戏活动。俱乐部

会长由校长担任，副会长是现任“在乡军人分会会长”的钩鳞杂货店老板和巡警。此外，岸野农场的主人还担任名誉顾问。阿健他们上的“青年训练所”，也是每晚七点钟在这个“修养俱乐部”里开课。

巡警隔日就骑自行车到“有车站的H镇”去一趟。他是一个老实的青年巡警，在佃农中间名声也不错。他常常中途把自行车扔在路旁，不解佩刀就撒尿。这情景，在田里干活的佃农们都望在眼里。得空，他还到佃农家来聊天。然而，自从岸野的佃户们一度为了地租的事，去向镇长请愿以后，他就断然不到佃农家里来聊天了。这件事引起了很多议论，有人说：“必定是得了岸野的钱啦！”

阿健的母亲从前跟巡警特别要好，听了这话感到恼火，就嘀嘀咕咕地说：

“这可够势利眼的啦！——石田先生可决不会有那种事！”

从那以后，人们就开始看到巡警石田跟钩鳞老板、管理人吉本等人并肩在村路上走着了。

无论啥样的佃农，都在钩鳞杂货店赊账。

一年到头，只在一定的时期才能进钱的农民，就只能赊账。再加上一年结两次账，这也被当作可乘之机了。本来现钱卖五角的东西，赚头已够多的了，赊账就要卖上五角七、八，而且哪样东西都是这样卖。佃农们尽管明知吃亏，也是无可奈何，还是非从那里买不可。不到三年，钩鳞就眼看着“肥”起来了。

这叫人想到仿佛是一面蜘蛛网，哪个农民都免不了给钩鳞的网丝粘住，被蜘蛛抓过去吃掉。

自从村里开办了“信用供销合作社”以来，就跟钩鳞之间发

生了矛盾。因为能够以从未有过的贱价买到东西，佃农们都纷纷转到合作社方面去了。钩鳞也没有沉默，而开始扬言：“如果有人忘恩负义，要转到合作社方面去，那他以前欠的账可就要讲话啦！”老实的佃农们给他这么一说，倒是觉得人家从前那样叫咱随便赊欠，这回可真是有点忘恩负义了。

钩鳞老板说过，佃农没钱还账，用大米和杂粮还也成。农民就到街上，按粮栈收买的价钱抵还了账。这样一来，钩鳞既收回了欠款，又可以把米谷倒卖出去，再捞到一次利润——赚了双重的钱。

要作一个有着什么“在乡军人分会会长”、“卫生部长”、“学务”等等头衔的象钩鳞老爷那样的人物，已经成为佃农们的“理想”。他们在路上遇到钩鳞老爷，就立刻让路行礼，比见到村长和校长还要恭敬些。

在“青年训练所”里，钩鳞老爷担任“修养讲话”。

七 夜 路

阿健他们上完军官训练之后，轮到钩鳞老板的“修养讲话”时，都困倦得开始打起瞌睡来。什么“青年的任务”，“引导思想向善”，“农民的荣誉”等等，他那套一成不变的老话，已经没人在听了。

下课走出门来，睡得迷迷糊糊的，给寒气一袭，冷得直打寒噤。细雨停了，高筒胶鞋踏在路上，直往里陷。天空暗得什么也瞧不见，却低得好似压在头上。给雨淋湿了的草丛时而闪闪地发着光。

“头遍草薅完啦？”七之助在身后开了腔。

“不，还没有呢，没人手啦。”阿健困得没法。

有人故意放声打了个大呵欠。

“阿健当兵的事怎么样啦？”

“唔，也许不去啦，——不过，万一要是……”

“你这样身体是不会去的，就是不到‘青训所’来也没事。”

这么一说，一直没开腔的武田插了嘴：

“要是为了缩短当兵的年限来受‘青训’，那就大错特错啦！”

“又来了。”七之助心里想着，觉得可笑。

“那是因为他们说，光是去当兵的人受到各种训练，不去的人都安闲自在的，这样不成，所以才设立的。这是因为不当兵的人也有必要受一下集体纪律的训练呀。”

“况且‘现在的农村青年又轻浮’，是吧！……”

七之助一边解手，一边嘲笑他。一直憋到这会儿的尿，猛烈地滋在草丛上发出哗哗的响声。

“是的！”武田认真地点点头。

农民恐怕是比一切工人起得都早，整天弯着腰干活，他们的生活却比在市郊搭窝棚过活的朝鲜人还要惨。这难道还能说农村青年“轻浮”吗？还要让他们干更多的事，究竟要把他们怎样呢？阿健心想：“别胡说八道了！”

“阿七，还得过些日子到小樽去吗？”

“唔，就要去啦。”

“就去？”

阿健一想到跟七之助也要分手，心里感到有些凄凉。他所爱的阿绢也已经到札幌去了。她本来是给制麻厂招去当女工的，可是不到一年，阿健就听说“她当了酒馆的女招待”。

话头一断，就只有踏着泥路脚步声传到耳朵里来。稻田

的水面，看上去仿佛是昏暗的玻璃板一样，闪着光。

七之助一面漫不经心地用口哨吹着各种歌曲的开头部分，一面走着。他也在想什么心事。

“三吾的稻子长得不好哇。”七之助蹲下来，薅了一把稻茎。

“三吾也老是倒霉啊。”

三吾千方百计想把并不属于自己的泥炭地侍弄成一般的稻田，而不顾劳累地干活，两次受到“村政府”和北海道厅的表扬，说他“勤劳力行，足为农民模范”。这个表扬是岸野向北海道厅申请的。

自从把这个镜框挂在没有顶棚的熏黑了的屋子里那天起，不到两个月的工夫，三吾就得了风湿性神经痛，打一躺下，一直痛到天亮。人瘦得活象一捆唰唰作响的干草，动弹不得，整天只是望着那张“表扬状”了。

不过，还不单是三吾一个人如此。住在东三线^①的伊藤老婆，由于在北海道冰凉的稻田里泡得太久，腰痛了三个月。往后，腰就老是吃不住劲，走起路来直摇晃，象瘸得很厉害似的。

有事聚集在管理人吉本的家里，他们一个个都是筋骨结实，人人有一双厚实的手掌，可是腰不是歪扭着，就是佝偻着，总有点残疾，大家都是这样。

武田在市街区尽头和大伙分手，走上了田塍。

“阿健，听说武田这个混蛋果然是常到钩鳞那里走动呢！”

七之助停住吹口哨，马上就这样说。

“是吗？……”

“还有那岸野，特意从小樽跑到这里来，很为‘青训所’和青

① 东三线是街名。

年团下功夫,你还不知道哪!”

“是吗?……”

“阿部和伴都这么说呢,说这一定有什么企图。”

“嗯?”阿健尽管并不十分了解内幕,但觉得似乎也有所领悟了。

八 “烫, 烫! 烫!!”

阿健绕到房后去洗脚, 堂屋里潮湿的土地直粘脚板。听到响声, 母亲在里屋问道:

“阿健吗?”

“唔!”他嘴里一面回答, 一面卷起衣服下摆, 坐在进屋的踏板上。马圈里传来了垫草蒸发的臭味。

由三伏卧在洋灯下, 吧嗒吧嗒地蹬动着两条小腿, 正在频频地用手指蘸唾沫翻着破烂得只剩了五、六页的小人书。

“姐姐, 给念念这儿。”由三拉了一下姐姐的胳膊。她正在炉边作针线活。

“混蛋!”姐姐颤抖了一下, 拿着针线活, 把手指放进嘴里吸吮着。“混蛋! 针扎了我的手!”

由三把脖子一缩, 望着姐姐的脸问: “喏, 姐姐, 这条狗要怎么啦?”

“姐姐怎么知道!”

“啊……”

“讨厌!”

“啊, 要你告诉我。不说, 我就闹啦!”

阿健盘腿宽坐在炉边, 把手指当耙子咋咋地挠着头皮。

屋里长年烧火，不管顶棚、板壁，都熏得直闪黑光。架在房顶的大梁和圆木椽上垂着一串串长长的尘穗，下面烧火的热气一熏，或者风一吹，就都摇晃起来。屋子当中吊了一盏油灯，在屋顶裸露着的梁上投射着一个光圈。油灯一动，那光圈也跟着摇曳。人打油灯旁边走过，那黑影给拉窗的格杈弄得变了形，扩大开来，从拉窗上扫过去。油灯老是发出吱吱的响声，吸燃着煤油。常常是刚刚觉得亮了，又倏地暗下来，仿佛给吸墨纸吸去了光似的。

“刚才呀，阿部和伴来过啦。”

“嗯，来干啥？”

“唉，哥哥，狗跟狼哪个厉害？狗吧？”

“为了修路的事儿呀，说是今年村里也不出钱哪。”

“今年还不出！那为啥叫‘村费公路’呢？简直是拿人开心！秋天运米又该花一笔大钱哪！”

“哥哥，还是狗厉害吧？”

“那么，他们说怎么办？”

“他们说没有啥法子，只好找点闲空，佃户们去修呗。村里没钱哪。”

“是狗厉害吧，哥哥……”

“讨厌！”阿健猛然喝了一声。“又是敲诈佃户！钻空子！这帮家伙看准了，撇在一旁不管，到头来作难的还是佃农。这样一来，就一定会自己出钱来干啦，他们就在那里等着咱们这么干。什么村会议员，全都是地主。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从前，S村的佃户曾对村政府发起过争议。北海道各村镇都拥有不少土地，租给佃农耕种。因此，常常发生针对村政府的争议。然而，由于S村的村会议员全都是地主，他们一来是为将

来着想，二来也是怕火很快就烧到自己头上来，所以一直顽强地同佃农们对抗，佃农们因而遭到过惨败。

“他们说明天到吉本先生那里集合，跟他商量一下。”

母亲说着，只见她剥落了黑齿铁浆^①的歪歪扭扭的牙齿中间，还残留着白色的米饭粒。

“……………”

阿健着急地把咸鳕鱼片烤得吱吱直响，然后又往黑黑的麦饭里倒些开水，唏哩呼噜地吞食着。

似乎是起了风，油灯的光焰轻轻地摇晃着。大家映在背后土墙上的巨大的影子，也跟着一伸一缩地动起来，就象被什么摆布着似的。

由三支起两腿靠近炉火，坐在那里打盹。

“妈妈，巫是啥呀？到山利家来啦，说是今天给山利的爸爸念咒啦，因为他爸爸在阴间给火烧得够苦的啦。”

“真的吗？”

“巫是个老太婆，才叫她巫婆呗。山利家做了些油炸豆腐，说是给巫婆上供的呀！”

“是狐仙吧。”

“狐仙就是狐狸呀，是的呀！”由三忽然大声嚷嚷起来了。

“嗯。”

“是的呀，啊！”他自己肯定地叨咕着，“阿胜家的阿芳把狗带到山利家去玩，山利家的人狠狠地说了她一顿哪！”

“是呀，真是罪过！”

“山利的妈妈说他爸爸可怜，把眼睛都哭得通红的。”

^① 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妇女往往用酒浸铁浆汁把牙齿染成黑色，作为装饰。

“是么，是么，真可怜哪！”

“喏，哥哥，狐狸……”正说着，炉里的火噼噼啪啪地猛然一炸，火星子腾地一下子飞到了由三那小葫芦形的小鸡头上。

“烫，烫！烫！！”由三突然扔掉小人书，往后一仰，叭叭地拍打着衣襟，放声哭了起来。“烫！烫！！”

“哼，瞧吧！把那东西对着火，这是火神爷罚你啦！傻蛋！”

姐姐阿惠一边用尺子挠着自己的脊背，一边逗他说：“把头儿烧掉啦，那才好呢！”

“你说啥！放屁！姐姐是个窑姐！”

由三撇着嘴就骂起姐姐来。大家一听这句从未说过的脏话，都不由地望着由三。

母亲立刻用巴掌叭叭地打着由三那又小又硬的脑袋。

“哥哥，阿由这一程子不知道从哪学来的，光说这种话！”

阿惠还没把插在背上的尺子抽出来，就忽然变了脸色，眼看着越来越凶，接着就倏地抽出尺子不停手地打起由三来。她咯咯地咬着牙，一声也不吭，每打一下，尺子都发出嗖嗖的响声。打着，打着，她自己哇地一声哭嚎起来。

明天三点半就得下田，薅完已经比别人迟了一步的头遍草。但是，阿健却睡不着。大门外，有人发出吧唧吧唧的脚步声走了过去。阿健爬了起来。熄了灯，堂屋地漆黑，他用脚尖探索着下到厨房里来，从缸里捧起水来咕嘟咕嘟地喝了几口。马圈里传来马用尾巴拍打着身子的簌簌的声音。

重新盖上棉被，不一会儿，就听见因螺丝松弛、而走得不准的挂钟，慢腾腾地打了七下。

第二章

一 “S互助会”成立典礼

“修养俱乐部”的正面墙壁偏高的地方悬挂着“天皇陛下”的照片。

此外，墙上还挂了些“乃木大将”、“西乡大先生”^①、“日俄战争”、“血染的破旧团旗”等等镶了镜框的照片。讲台左边摆设着三支架在一起的政府处理的老式旧步枪。关于乃木大将的故事，农民们是百听不厌的。

讲台上贴着“S互助会”成立典礼程序单。两边不远的地方还贴着表示这个会的宗旨的标语：

开发海、田、山、林，首先要开发人的心田！

养成强韧的独立心、服从的美德与合作的精神！

预先通知会后可以喝一杯，因此到会的农民比哪次都多。“有车站的H镇”也有人来。一般佃农，大都借过市街区的老爷们和H镇的老爷们“一年”和“二年”为期的债，所以得在会场上向他们一一致意。

当佃农们过去致意时，粮食店老板大模大样地点点头，问道：

“今年怎么样啊？”

^① 即西乡隆盛，是西乡从道之兄，故称为“大先生”。他是明治维新运动的首要人物，狂热地鼓吹侵略朝鲜。

“是的，现在看来，还好，托您的福啦……”

佃农们弯着腰，说一句话行一个礼。这情景从阿部和阿健坐的地方看得清清楚楚。阿健也是借了债的，在这种场合应该过去寒暄一下。况且，如果今年被征去当兵，家里就只剩下卧病的父亲和女人们，总还要他们照顾。阿健装作偶然从旁边走过的样子，向他们打了招呼。可是打了招呼之后，自己的脸却羞得通红。由于他是“模范佃农”，连钩鳞老爷也殷勤地还了礼。

会场里，各个农场的人们自然而然地坐成一堆堆的，围在那里谈得很热闹。佃农们很难有这样的机会聚集到一起来。他们粗大的晒黑了的手掌和脖子，跟那只是偶尔穿穿的作客衣裳显得很不相称。他们在满是裂口的粗硬的手里转动着香烟头，无所不谈地议论着娶媳妇、稻苗长势、青豌豆、小豆、天气、生活和老爷的事等等。

那些认为开这种会的时候最好是抽香烟的佃农们，都用不自然的动作抽蝙蝠牌香烟。

那些晚上骑自行车到镇子上去玩，或者老是跟村子里的姑娘们闹恋爱的小伙子们，又另外聚集在一个角落，旁若无人地拉开大嗓门，没完没了地谈笑着。此刻正在谈论女人。他们有的戴着眼镜，有的围着黑色绸巾。然而，他们遇到青年团的工作，或是筹备“赛神开庙”的时候，因为可以跟姑娘们在一起玩闹，就都争先恐后地一个劲儿地干。

孩子们在捉迷藏，到处乱跑。有的跳过大人的肩头，扑倒在人堆的中间，仿佛是拨开草丛似地在人群中穿来穿去，乱嚷乱叫。尽管不时遭到大声的呵斥，但过不了多久就又哇哇地叫着乱跑起来。香烟的烟聚集在屋顶中间，宛如飘浮着一层云雾。

二 “阿 部”

“我决定上小樽去啦。”

和阿部坐在一块儿的七之助，见了阿健就说。

“去进工厂。小樽还有我的姑妈在……不过，阿健，我这样做，并不是不愿当农民，也不是想有什么出息。我跟阿部谈得很清楚，我是有我一点点想法的……”

“嗯。……”阿健知道他的想法。

“这是因为离开村子，反而更能看清村里的事！”阿部用他惯常的低缓的声调说了。

在这个农场里，一发生什么事情，从生了孩子啦，死了孩子啦，直到租种土地、交涉地租等一类事情，都必定要求“阿部”，请他跑跑腿。他今年四十刚过一、两岁，是一个既没有粗暴的举动，又不粗声粗气，简直是个温和得叫人着急的人。

他说话的时候，经常是连嘴唇都不动的。

“阿部要是坐在屋角里，包管一整天也没人会发觉，他也会一声不响地坐着。”七之助常常这样取笑他。

村子里，那些靠一双手干活来养活一家四、五口的四、五十岁的佃农，比起那些贪图玩乐的糊里糊涂的小伙子来，他们对生活有着更坚定的信心。当佃农向地主作斗争的时候，除了在农民协会工作的小伙子们以外，无论哪里，站在最前面坚持工作的都是这些年长的佃农。阿部就是其中的一个。

阿部从田里上来，脚也不洗，就蹭到切开地板安装的火炉旁边去，阅读旭川^①农民协会送来的《协会新闻》和《无产者报》。他

^① 北海道的第四个中等城市，是北海道的交通枢纽。

看一张报纸，要费好几天的工夫，仿佛是拣豆子似的，一个字一个字地仔细读下去。只有在这时候，他才戴上那副坏了的、用线缠上的眼镜。

每逢看到他戴一顶变成褐色的、帽檐歪扭了的麦秆帽子，略微弯着腰，一跳一跳地在田塍上走着，管理人吉本不必说了，别人也都万万不会想到“这样的家伙竟然会反抗！”

三 模 范 青 年

“瞧，武田这小子，把红布条挂在胸脯上，正在得意洋洋地干着哪，干着哪！”

七之助用下颚向讲台那边一指，阿部默默地笑着。

“瞧，阿健，真是怪事呢，什么青年同盟呀，互助会呀，偏偏是由武田这样的小崽子跟一帮子娘儿们气的小白脸子，挂上红布条跑来跑去地干，不是挺可笑么。要让阿健这样的模范青年来干就好啦。”

阿健脸上忽然露出不高兴的神气。

“说笑话，说笑话，哈哈哈哈！”

阿健曾被村公所表彰为模范青年。他还记得那时身子骨还很结实的父亲，拿到表彰状竟然不知怎么办好，直在屋里打转。阿健也觉得自己的努力得到了报偿，而感到高兴。

可是过了不久，一个在村公所当差的小学同学对阿健说穿了。原来是那时候，农村里的青年动辄就染上“过激”思想，弄得拥有成百町步土地的地主毫无办法。有一天，吉冈正跟来到村里的岸野商量此事，恰好那个小学同学在村公所当侍役，全都听到了。

“如果不表扬一下，从感情上控制住，叫他们高高兴兴地干活，那就该不好收拾啦！”吉冈这么说。

“稍微豁出点钱去，发一张漂亮的描金表彰状么。发颁奖典礼也要故意不厌其烦，搞得隆隆重重的。那帮子乡下佬还不轻而易举地就给治住啦！”据说，岸野是这样说了的。

“真会是这样！？”

阿健相信校长，就马上找他谈了这件事。

“哪里会有这种荒唐的不合情理的事，那是因为你既孝顺父母，又加倍干活的缘故呀！”校长这么说。阿健自己也觉得恐怕是这样吧。

只有阿部说这是地主及其走狗村政府极其巧妙的诡计。

“过些时候，没吃的啦，就会清楚地知道模范青年究竟是怎么回事啦。”

“大家都在忌妒我！”阿健那时甚至对阿部也这样猜疑过。

然而奇怪的是，阿健看到父亲身体有了毛病，干活少了，无论怎样拚命干，（歉收的年头也是这样！）到头来收成全都被地主拿了去。尽管他从前丝毫不是这样，但如今却感到泄气、寒心，而使他觉得这样下去是没有尽头的。“模范青年究竟是怎么回事！”阿部说的话逐渐应验了。

从那以后，一有人说他是“模范青年”，他的脸就涨得通红。

四 “武 田”

开会了。

武田出来致开会词。他本色毕露地，活象士兵木偶一样，直挺挺地站在讲台上，用郑重其事的声调开了腔，仿佛是在做讲

演。一连串听不惯的叫人讨厌的成语，钉尖儿似地刺着农民们的耳朵。

“……面临着目前的危机，我们大家要同心协力，外要同过激思想、城市颓风作战，内要培养刚毅、互助的气质，以此谋求我们S村的健全发展，这就是我的微意。

“……再者，这次承蒙旭川师部派遣渡边大尉光临，农场主人方面又有吉冈几三郎先生的代表松山省一先生到会，佃农方面则由鄙人出席，我们在此协力一致，以求得到全村美满的结果。”

七之助一边听，一边吹毛求疵地抓住武田的每一句话，诙谐地嘲笑着。

“武田家的阿作也了不起啦。原来可是个无赖哩！”

“用了不少功吧！”坐在阿健前面的一个佃农说。

七之助听见“用功”这个词，禁不住噗嗤一下子笑出声来。

“可是用了大功啊！钩鳞老板跟地主先生都喜欢么。真是圆满圆满，天下太平。”

七之助跟阿健不一样，早就有这种作风，说起俏皮话和讽刺话来，简直不象个农民，尖刻得使人感到痛快。

五 “地主代表”

地主代表出乎意料地用小孩子般细弱的声音开了腔，再加上动辄就把手伸到鼻子旁边去，就使得农民们很瞧不起他这个“人物”。“瞧，七下！……瞧，十一下啦！……瞧，又是一下……”七之助数着，引人发笑。

“……人们说，地主和佃户是‘父与子’的关系，其实并不是

那样分得开的，而是亲密得象‘头脑和双手’一样。彼此若不是亲密无间地共同劳动，就不能生产养活整个日本的宝贵的大米。别的地方，近来常常发生‘佃农争议’之类的不幸事件。希望这个村子不发生这类事件。仅仅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希望这个新成立的互助会做大量的工作。”地主代表常常在半路上失去条理，吞吞吐吐地说了这些话。

“明白啦，既然是这样，就要把地租减低一些呀！”

不知是谁诙谐地说了这么一句，大家都回过头去，哄然大笑起来。

六 “佐佐老爷子”

每逢开这样的会，就能够喝上“一杯”。专为这个目的来的酒鬼、东三线北四号的“佐佐老爷子”，又在嘟嘟囔囔地抱怨起来了。

“一点屁趣儿也没有，好不好快点拿酒来呀！”

“是呀，是呀！喏，佐佐老爷子。”七之助看着有趣。

“真腻死人啦！”

佐佐老爷子总是把凉酒倒进破口的木碗里，一颗颗地嚼着干玉米粒，就着喝。这是他喜欢的吃喝，一喝醉了，就用抑郁而格外响亮的声音，专门拣歌曲里猥亵的段落唱，一边唱，一边摇摇晃晃地顺着笔直的干线路走回家去。只要佐佐老爷子一来，谁家都要拿出酒来。碰巧赶上没酒，佐佐老爷子就象小孩子一样，脸上明显地露出失望的神情，孤寂地晃着肩膀走回家去。

有时候，佐佐老爷子晚上一出去，直到第二天早晨也不见回家。原来是喝醉了，就象一根腐朽的木桩埋在田里睡着了。去

寻找的人把他拉起来，他还睡得挺香。

“看他那神情，真象是钻进窑姐的被窝里去啦！”

但是，佐佐老爷子却是村里第一个通晓政治的人。这里订阅东京《朝日新闻》和《北海时报》的，除了市街区的人以外，就只有这个佐佐老爷子了。他对滨口、田中、床次、鸠山等人^①，比对自己的街坊知道的还要多些。这回床次怎样做，于是，田中就会这样做。他仿佛是看穿了似地到处宣讲着。他本人是拥护政友会^②的。

“老爷子，你为啥喜欢政友会呢？”阿部这样一问，他就回答说：“不论怎么说，我总喜欢政友会呀。政友会么！农民非靠政友会不可么！他们一上台，市面好了，活也就多啦。”

“这个会要是支持政友会，你老爷子也得加把劲支援一下呀！”

七之助跟他开玩笑。

“支持政友会？那当然要加劲干嘛，当然罗！”

七 “也必须广泛地渗透到农村里来。”

接下去是渡边大尉讲话。

他把军帽挟在腋下，把闪闪发光的齐膝皮靴上的马刺，踏得嘎嘎直响，走上讲台。喧闹的声音就仿佛受到压抑似地静了下来。可是过了一会儿，又哇哇地闹起来。孩子们谈起肩章上有

① 即滨口雄幸，一九二九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义一，陆军大将，政友会总裁，一九二七年任内阁总理大臣。床次竹二郎，政友会总裁，曾任邮政大臣。鸠山和夫，政友会头目之一。

② 即立宪政友会，日本资产阶级政党。一九〇〇年由代表当时官僚势力的伊藤博文发起成立，一九四〇年解散。

几颗星，谈到佩刀，引起了争论。农民们呢，平日偶尔有军人过路，他们就忘记了庄稼活，长久地望着他们走过。一谈到军人，他们跟孩子一样的起劲。

《关于在农村的军人精神》，这是渡边大尉讲话的题目。他举出各种例子，阐明了军队里的严格的秩序、严正的纪律和服从关系等，大意是说：正是这种精神造成了日本军队具有决不受外国欺侮的强大力量。因此，这种精神应该不只限于军队内部，也必须广泛地渗透到农村里来。特别是在外来的坏思想动辄就抓住有前途的青年、企图破坏我们宝贵的社会秩序的时候，在农村里更是非要有健全的军人精神不可。

武田等人一直在机警地等待着，听到话音一落，立刻就带头鼓起掌来。

“阿部！”一个佃农从背后向他喊话。“说的外来的啥思想，是怎么回事儿呀？打一开头，每一位都这么说……”

“是啊……”阿部想了一下。“咱们村里大概没有那玩意儿吧……”

接着，他装作谈别的事，开玩笑似地说：“不过，若老是减租减租的，叫得太厉害啦，地主先生们也许就会大为恼火，说是中了过激思想的毒啦。”说完，只是嘴里笑了一笑。

武田再次上台，说明了互助会的性质、目的、入会条件、事业等。跟着就是游艺节目，有萨摩琵琶^①和相声，还有《小樽新闻》派来的年老记者的修养讲话《一日谈》，然后，终于拿出酒来了。

“真他妈的叫人等苦啦！”

“咱们又不是狗，是吧！”

① 在萨摩地方发展起来的一种琵琶及其曲调，音调悲壮，乐器及弹法与一般琵琶不同。

一想到滚烫的酒热辣辣地浸透到胃囊里去的滋味儿，给太阳晒黑了的农民们的喉咙就如饥似渴地直咽动。他们平常任谁也没有这样喝酒的机会啊。

“听说今儿没有姑娘斟酒哇！”

“是吗？”

“又是假装正经，武田干的事儿！”

话虽如此，当妇女们和胸前戴着花的干事们把酒端进来的时候，大伙立刻就欢腾起来了。

武田搬了一架梯子来，在大家都瞧得见的高处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为了庆贺本会成立，下列各位先生慷慨捐赠礼品如下：

酒	壹斗	校长先生
现金	叁拾元整	岸野老爷
啤酒	壹打	钩鳞老爷
啤酒	壹打	吉冈老爷
手巾	壹百条	H镇镇长老爷
现金	拾元整	相马老爷
	谨此	

致谢！

干事

“喝！”

“真阔气，到底是啊！”

“真难得！”

酒杯和酒壶不停地撞击着，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

干事、来宾和讲演的人们都退席，到管理人吉本家里去了，在那里开始了没有外人参加的“酒筵”。用汽车从H镇接来了七、

八个侑酒的女人，一直闹到将近天亮。侑酒的女人那天夜里都没有回去。

阿部和阿健等人先出来了。高高的碧空里，闪烁着颗颗星斗。在离门口稍远的暗处，两三个人在并排撒尿。他们正要从旁边走过去，只听到：

“哦，阿部！”

声音爽朗，原来是伴。阿健和七之助点头致意。

伴凑过来，压低声音对阿部说：“怎么样？他们这个阴谋！请你马上给那边报个信儿。”

阿健默不作声地跟在后面走着，心想：不管怎样，这几天要去找阿部谈谈。

第三章

一 阿节感到悲哀

“那么说，你？……”

“……”

阿节一句话也不说了。

阿健也不作声，默默地走着。

从白天晒热了的稻田里呼呼地刮来潮湿的热风，撞到双颊上，又往后刮去，使人怪难受的。走到哪里，那里的蛙鸣就立刻停住，接着又从后面顺次地叫起来。

“怎么啦？”

“……”

“啊？”

“.....”

阿节仍然不作声。阿健侧目一瞧，在黑暗中只看到一张白脸。

“到河边去走走吧？”

“.....”

往河那边一拐，她还是跟着来了。阿健逗着玩，轻轻地撞了她一下。往日，她都是用身子反撞着，吃吃地笑个不停；可今晚却仍然是绷着脸，一副假装正经的神情。女的一不开口，男的就受不住了。这是一个闷热的夜晚。他们走过的家家户户都敞着窗子熏蚊子，只见一个光穿了内裙的妇女，袒胸露臂地躺在席子上翻腾着。

拨开杂草，向河堤走去，细长的草叶刺得脸上直痒。什么地方传来了悄悄的谈话声，大概足有两三对。拔完了二遍草，眼前正是有点闲空的当儿。

走上河堤，就听见脚底下有人在大声说话，还有那大概是洗马的唏哩哗啦的声音。两人一脚深一脚浅地踏着往下直陷的沙滩，走到河堤尽头，只见河滩上燃着野火。钓鱼的人似乎想把鱼招引过来，不时地把燃烧着的残枝抛到河中间去。这些残枝啪啪地爆散着火花，在黑暗中画出一道鲜明的红色弧线，一落到河面上，就嗤地一声熄灭了。这光景也辉映在河水里面。

“多好看呀！”

这回是阿健不作声了。

“生气啦？.....”沉默了一会之后，阿节说。

到底还是阿节。这短短的话语，充分地表现了她的性格。阿健忽然觉得她可爱起来，仿佛生气似的，粗暴地把她的肩膀拉过

去，猛然抱住。他一用力，脚底下的沙子也跟着窸窣地陷了下去。

阿节象往常一样，咬住牙，紧闭了嘴，但还是稍微凑了过来。她的嘴唇上微微发散着煮鱼的腥味。

“吃了啥呀，擦擦嘴吧。”

阿节仍然是一本正经的神情，孩子似地用衣袖擦了擦嘴。

他们把草拔倒作垫子，坐了下来。河滩上的野火映照在对岸的杂木林，一明一暗，清楚地闪现着暗红色。

“阿健，你喜欢阿部吗？”

“你是想说，叫我少上阿部那里去吧。”

“……”

“一定是的。你也去跟阿部和伴他们谈谈看。起初，我也觉得……”

“他们俩可都是好人呀，可是……为了上次的会，他们见人就给一张传单。就是这件事……”

传单的标题是《佃农们，不要受骗！》上面写着建立“互助会”的目的，暗地里有什么人活动，表面上虽然装得满有道理，骨子里却是黑幕重重等。

“……都在发火呀，说人家那么出力，还撒传单，真是忘恩负义哪。”

“谁？”

“……”

“也有你吧？——没错。”

“大伙都是这样么。”

“傻蛋！”

两人僵着，谁也不吭声了。

“我说，阿节。”阿健的声调有了变化。“阿节，是不是这样，

认为我还是当个模范青年好吧。”

阿健有时称阿节“你”，有时称“阿节”。称“阿节”的时候，那必定是心里有什么正经事了，这点阿节是知道的。

“因为是你阿健，我想总不会胡来的。可一想到人家会说‘把阿健看错啦，看错啦’，我也有点难过啦！”

“阿节，话是那么说，可是在这个岸野农场里，谁也没有说阿部和伴的坏话呀。”

“那是没有的，因为他们都是好人么。……可是人家总是有点怕阿部呢。”

“那不是佃农，可咱们首先是佃农啊。”

“真是变啦……”

“你是说，没想到从模范青年嘴里会听到这样的话吧？”

阿健反过来用“模范青年”这个词来嘲笑自己了：“模范青年！模范青年！”

阿节不禁抬起头来。

野火一灭，四周顿时暗下去，也沉静下去了。河面上，不时传来啪啦、啪啦的水声，似乎是鱼在腾跃。

“你就会明白的……晚啦，回去吗，啊？”

阿健站起来，挺了挺腰。潮湿的草味扑进鼻孔里来。过了一会，阿节还坐着不动。“啊？”又催了一遍，才好不容易站了起来。

“这就回去呀？”

阿健拨开杂草，向前走去。

有人用口哨吹着《这里远离祖国几百里》这支歌曲，从对面走过去了。

“吹口哨的该不是武田吧？拐弯吧，给人家瞧见啦，该是多

棒的模范青年哪。”阿健说着，纵声大笑起来。

“什么模范青年，模范青年，请你别再说它啦！”阿节发着悲哀的声音。

阿节感到悲哀。本来，跟阿健会面，她每次都由于心里怀着一种期待而感到喜悦。但是，每次分手，都莫名其妙地使她感到似乎是留下了一种不满足的心情。她觉得阿健好象什么地方有些冷淡。使她感到悲哀的，正是这个。

拐过进村子的角上的竹丛，只听见对面黑暗的地方，一个女人被人呵着痒似地在憋着气格格地笑着。可是，两个人的脚步声一响，那笑声就立刻停住了，接着就传来拨开杂草的声音。

“我说，阿节，这一阵子大家都这么胡闹，警察也不吱声，你知道为啥吗？”

别人为啥这么开心地在夜里会面呢？阿节看到这般光景，引起了感情上的冲动。

“这是因为地主们嘱咐过警察不要管得太严啦。”

“这人真是迟钝，究竟在想啥呢？”阿节想着，根本没听阿健说的话。

“他们说，这里既没有影院，也没有饭馆，更没有窑子，这样，年轻人就太可怜啦。你瞧，怎么样？”阿健说着，独自呵呵地笑起来。“真是难得的地主啊……”

“可是，阿部说啦，——一提阿部，你就摆出讨厌的神气来啦。——他在小樽工厂的时候，工人只要拣了掉在工厂角落里的一根线头带出去，就得被开除。可他们随便把女工的肚子一个个弄大了，也没有人吱声！”

“不见得吧？……”

“别吱声，听着！——据说，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理由，要是

不让这么干，大伙就会互相发火吵架……”阿健的话未说完，阿节就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混蛋！”

阿健骂完就住了口。可是，一会儿又开了腔：

“喂，活儿太累啦，所以，一有点事情就立刻拿到工会去。这么办，是为了不让他们那样干的。”

“啊哟，啊哟，你可想的真多啊。既然这样，那么管理人出头主办的处女会又是怎么回事呢？”

阿健回过头来，猛然大声嚷起来：

“是呀，内情就是复杂么。表面上搞得冠冕堂皇，表扬什么节妇呀，孝子呀，把人捧起来，——也就是把人控制起来。妙就妙在这里呀。”

“我可不明白哪。”

一辆车篷嘎嘎直响的旧汽车，摇晃着苍白色的灯光，象两根长长的触角似的，一直从“有火车站的且镇”沿村路向市街区伸进来了。一进街口，就连续地鸣笛招呼乘客，那声音响遍了整个沉静的市街区。从钩鳞杂货店里，有人哗哗地拉开店门，慌慌张张地奔到街上来。

他们避开市街区，走上了田塍。

“往后，也不能老是这样在一起啦。”分手时，阿健这样说。

阿节默默地咬着嘴唇。

阿健回家钻到被窝里，正要朦胧入睡的时候，只听到街门吱吱地响着被打开了。

“阿惠吗？又是这么晚，到哪儿串到这会儿才回来！”

热得尚未睡着的母亲，睁开眼睛嚷了几句。阿惠一声不响

地走进房去。黑暗中，只听到从她被窝旁边传来解衣带的窸窣窸窣的声音。

第 四 章

一 “撒 谎！”

同是一条石狩河，这里却是离中游较远的上游。为了运输杂粮和大米，偶而也有汽船发出唠唠的响声驶来。有些日子，这响声能够传到很远的地方去。“喝，汽船来啦！”到处都有佃农们伸直腰杆来听一听。

由三在路上拚命跑着，腰带上的结扣移到旁边，前襟敞开来，露出给污泥溅脏的肚皮，只顾向前跑。原来是听到了汽船的响声。别的孩子也顺着田塍跑来，他们的身体远看着都很小。不一会，都会合在村路上，一齐跑向前去。

大家都坐在河堤凸出的尖端上，摇晃着脚。河流弯弯曲曲，一片沉静，瞧不见它“流”，但是却在流着。水太深了。

有了响声，但很久还没看见汽船的影子。忽然间，完全是忽然间，那蓝油漆的汽船出现了。它发出唠唠的响声，把一个个透明的烟圈，均匀地喷射到蔚蓝的天空中去，轻轻地摇晃着身子，以似进非进的速度驶了过来。后面还拖了一条驳船。孩子们手脚一齐挥动，小麻雀似地齐声高喊：

“万岁！”

船员们在驾驶室和机器房里摇晃着帽子，在喊些什么。大家更是兴高采烈，又喊了一回“万岁！”

“听，那个嘎嘎的响声……”由三抓住身旁一个小家伙的手，按在自己的胸口上。“我的胸口在扑通扑通地跳吧，那响声就跟这个一样啊，那是轮船的心脏啊，我姐姐说的呀。”

“是吗？”

“撒谎！”第三个孩子摇起头来。“那叫发动机。”

“发动机？发动机不是那个往灌溉渠里抽水的玩意儿么？不对呀，别装懂啦！”由三也不服输地说。

“是的，是的！”坐在边上的孩子同意了。

这引起了小小的争论。

突然，村里放起了焰火。

在盛夏高朗的青空中，两下清脆的回声响彻四周。

“啊！”由三一伙人欢呼着跳了起来。

“快，晚了就糟糕啦！”

大家顺着来路跑开去了。落在后面的人，在半路上脱下了木屐。

原来是岸野农场的主人，今天要带着太太和小姐来参观农场。

住在东京的那些有爵位的大地主们，时常也到北海道来猎熊，让佃农和村里的人们给他们当“家将”。

在S村，从村长到钩鳞老爷、校长等人，就象来了大臣似的，惊慌失措，忙乱不堪。

二 地主、太太、小姐

两辆汽车，扬起大片烟幕般的尘土，沿着笔直的村路疾驰而来。岸野农场大门两旁，有一百七八十个佃农排在那里等候着，

连到镇上去做一两天短工的也都歇了工前来迎接。

天热，大家不停地用挂在腰间的土布手巾擦脸。

“再呆几天，等咱们大忙的时候来，就好啦。”

“要在干活的时候给他看看多好哇。”

“嗯，嗯，是呀。”

“听说太太还是女人的大学毕业的哪。”

“大学？女人的？喝！”

“听说可是了不起的漂亮人物哩。”

“女人，大学毕业？别撒谎啦！哪里有女人的大学？……胡说八道吧，难道会真有女人进……”

“是呀，多么了不起也不会的！”

这一堆、那一伙的，谈论着不同的话题。

“喏，老爷要再好一点点，咱们就会拚命干活呀。”

“他没干过活，不懂得这个。”

“这回太突然，来不及啦，象这种时候，咱们应该大家先商量好了，来时向他提出请求呀。”

阿部在听着大家说的话。管理人蓄意把地主来“参观”的事一直拖到头天晚上才告诉大家。阿部清清楚楚地知道他这个阴谋。大约两年以前，管理人就因为通知太早，出了岔子。大家把平日受的气集中到一起，等岸野老爷来时，向他申诉，几乎因此闹出大乱子来。所以，这回被管理人瞒住了。

四、五个足穿草屐的孩子，吧哒吧哒地在飞尘中跟着汽车奔跑。汽车开慢的时候，大家就都象铃串似地挂在汽车后面。开到农场大门口，汽车就喷吐了一阵子汽油味，停了下来。

太太轻轻地摀着袖口，提起长衣下摆，以熟练的身段飘然走下车来。

“啊哟，这车子坐得可真难受极啦！”她高雅地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接着，就是那位农场主人，手里拿着平顶草帽，身上穿着白地起花的长衫和黑罗外套，现出了他那高高的身姿。跟着下来的，是穿着淡黄色西服的小姐。后面那辆汽车里坐的是前来迎接的村长、校长、管理人，还有H镇的警察署长。

佃农们纷纷按照自己的方式鞠躬致意。

“是，是呀，真难得您，一路平安……”

佐佐老爷子用手巾使劲地擦着脸，低头行了好几遍礼，浑身上下，酒气熏人。他有个习气，每逢有什么集会，不喝酒就说不出来。

“你们也都结实，再好没有啦。哦，希望大家加劲干活。”

他每说一句话，大家就弯一次腰。佐佐老爷子把他那小红脸儿皱得象一个拳头似地谄笑着。

“真是叫大家受累啦。”

太太环视着辽阔的稻田，轻轻地吸了一口气。

佃农的老婆和女儿们只是对着太太和小姐发呆。她们唛唛拉拉地跟在后面走着，纷纷谈论起太太和小姐穿的是什麼。可是，那些东西都是呆在北海道偏僻农村里的佃农妇女们从未见过、从未摸过的。衣料的花样也是如此。她们除了在破旧的妇女杂志上看过照片以外，对于这些人的事是一点也无从知道的。然而，不管怎样，看到“自己的太太”竟然是这么体面的人物，她们也都有点得意起来了。

“傻瓜，你怎么带头看呆啦？”

伴从后面捅了自己的老婆一下。

“怎么样，今年？”岸野蹲在田塍上，摆弄着稻穗问管理人吉

本。跟从前的地主不同，岸野对于庄稼事很生疏，只知道一年能够收多少租子。

“哦，只能说是普通年景吧。拔二遍草的时候还好得很，可是到了这个月初就闹起虫子来啦。特别是去年全都糟蹋啦，今年就是再好，佃户也得受累呀，因为已经都差不多是筋疲力尽啦……”

“嗯，那么说，看这情形怎么样呢？……”

“哦，现在看么——还是要到秋天才能……”

两人说话的声音低下去了。

“你可要当心哪！”

“那个么，早就……”

“嗯。”

老实说，岸野感到一种犹如受胁迫似的恐怖。他时刻都在担心突然会被人从后面推到田里去。好几次一有点动静，他就吓得胆战心惊。没走到一町远，就已经是汗流浹背了。然而，他必须保持着外表的尊严。

“该不会象上次那样把请愿书塞给我吧？”

“这一点，这回可保险没错。”

“嗯。这就放心啦。”但下面的话，他却没说出口来，只大模大样地点了点头。他把手里的稻穗往田里一扔，激起了小小的波环，那波环被稻茎划破，又叠合起来扩展开去。

“我说呀，农民们整天都下到这水里去干活吧！”

“是的，小姐。”

在隔着两三块稻田的地方，只见一个和她年龄相仿的姑娘，用毛巾围着头，戴着斗笠，穿条束脚裤，正站在齐膝的水里干活。脸上溅了泥，就用袖子擦去。

“那样，手呀，脚呀，整个身体也都够受的呀！”

“喂、喂，那算不了什么。”吉本谄笑着。

“我要在学校作参考，想带两三棵稻子回去……”

佃农的老婆们争先去拔了。管理人吉本心想：“这个干得可满漂亮。无论怎么说，总是了不起的。”

妇女们微微弯着腰，把稻子递过去。小姐说了一声“谢谢”，无意中看到伸出来的手。手？然而，那是手吗？小姐叫了一声“啊！”不觉地用手背掩住了嘴。

他们把田地看了一遍，就带着“很是满意”的神态，回到管理人家里去了。

三 “伴”

晚上，全体佃农都可以喝上“一杯”，大家都三三两两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

“啊，阿部君，出汗了吧！”

伴用爽朗的声音豪放地说，听起来不象个农民。

阿部跟往常一样默默地笑着。阿健绷着脸，在稍后一点的地方跟着走。另外还有经常跟伴和阿部来往的四五个人也在一起走着。他们后面的一伙人正在高声地谈论着地主和太太们的事。

“那群家伙身上的哆哆嗦嗦的衣裳，都是咱们供给他们穿的。这点道理，现在该是明白的时候啦。”

伴这么一提，走在前面的佃农回过头来接着说：

“碰上伴，那就够他受的啦。”

伴也跟他一起哈哈大笑起来。

伴不管什么都爱随口就说，因而最受地主“仇视”。管理人常常绕着圈子说，愿意用多少钱一坪^①收买他的佃耕权，使他感到随时都会被客客气气地撵走。另一方面又同他谈判，说只要稍微老实一些，就可以叫他做管理人。然而，每次都被伴用毫无忌惮的“哈哈”大笑给制止住，给顶回去了。

“喂哟，我说胜见呀，你要是糊里糊涂的，可连胯裆里的毛都得被人家拔了去呀！”

他对前面的人大声喊着，又哈哈地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对方也笑了起来。

一直没作声的阿部说：“伴，晚上到管理人家去的时候，先到我家来一下好吗？”

“嗯，嗯。”

伴掀起衣襟，露出树桩一般给太阳晒黑的毛茸茸的小腿，有时好玩地晃荡起两只脚来，有时又把石子踢开去。

四 “蛮汉子老源”

“怎么样，阿健？”高个儿的蛮汉子老源从后面叫了一声。“娘儿俩哪个都成，要是搂着睡一夜么！”

“啥话呀，你一直在想的就是这个吗？”阿健第一次生气地说了。

“那样的人儿别处没有喽！”老源一阵傻笑。

S村的佃农们对蛮汉子老源，比对常常下山来的狗熊还要怕得厉害。他一喝了酒，就啥事都干得出来。使起傻劲来，哪个佃农也对付不了他。有一回想制住蛮汉子老源的胡闹，结果是

^① 一坪约等于六平方尺。

五六个人都被他摔到满是泥浆的田里去了。他还调戏妇女。

酒醒了，他就把毛巾缠在头上，一躺一整天，嘴里还一定要哼个不停地说着：

“我啥也没干呀。我呀，光我一个人啥也没干呀！”

奇怪的是，他跟阿健可很要好。每天都是这么单调，活又这么累，无论到什么时候都被迫过着贫困的生活，这样，随便哪一个年轻人，就都会变成蛮汉子老源的，想不变也办不到。每个人心坎深处多少都有一点蛮汉子老源的成分。阿健这么想，也就不象别人那样怀着恶感了。实际上，无论哪个村里，都曾有过，也必然有这样的二流子。

但是，如果二流子老是这样反复地产生下去，又该怎么样呢。不是二流子不好，是有使人成为二流子的根源，可是谁也不晓得这个道理。阿健近来开始这么想了。

“喂，还好哇，今晚有酒喝啦！”

“老源，酒……”

蛮汉子老源只是摇着头，仿佛在说：“知道啦，知道啦。”伴逗他说：“怎么啦？”

“一碰上模范青年哪……”蛮汉子老源挠挠头皮，眯起了眼睛。

“谁是模范青年？”

阿健不高兴地问这么一问，他就不作声了。

阿部只是抿嘴笑着。

五 “野地里的羔羊”

妇女们为了准备酒宴，从三点钟就到管理人家里去了。每

逢娶媳妇、做斋打醮或是喜庆节日，一有这些活动，阿惠她们就欢欢喜喜地互相邀着去参加。管理人家的厨房烟囱少见地冒着浓烟。妇女们用布带挽起大袖子，露出粗壮的胳膊，有的抱了筐箩，有的拿了葱，匆匆忙忙地在后门出出进进。

小姐感到轻微的头痛。从火车窗子望见过，也从各种小说里读到过，那巧克力色的房顶苫了草的农家，一直使她怀着一种牧歌式的、令人沉醉的天真，幽美的想象。但究竟是怎样呢？小姐望了望两三家小屋，黑暗的屋子里冲出阵阵腐烂了的马粪和稻草的臭味，一群苍蝇嗡地一声从暗处飞起来，撒豆似地猛然撞在小姐脸上，吓得小姐“啊哟……”地大叫了一声。一个只是肚皮胀得很大、两眼贼亮的孩子，手里抓了把炉灰，正在要往嘴里塞。板炕沿上扔着吃了还没刷的饭碗和盛着吃剩下的咸鳊鱼的碟子，上面黑压压地聚满了苍蝇。鸡在胡乱堆置在屋角的被窝上咯咯地叫着，一边四下张望，一边走下来。……小姐一回到管理人家里，就把湿手绢放在额头上，躺了一阵子。

到了晚上，点上了油灯。小姐看见真正的油灯这还是第一次。她看惯了城市耀眼的电灯光，直觉得暗，简直太暗了。然而，点油灯的这种气氛，却使她愉快起来。

“妙极啦！”

她想，一定要用图画明信片把油灯的事告诉小樽或东京的朋友们。

太阳要落的时候，佃农们渐渐地聚拢来了。在堂屋地里铺上席子，竹竿上高高地挂了好几盏灯笼。一见到小姐，佃农们都跪坐起来，恭恭敬敬地行礼致意。在常常出入教会的小姐看来，农民就象“野地里的羔羊”一样纯真，而且觉得他们和父亲在小樽开的S工厂里那些傲慢的工人们比起来，是截然不同的。

六 “只是这样，只是这样就见完了”

武田和两三个同伙一道到得稍微早些。见了岸野，他说：为了对平素的种种照顾，略报大恩，想乘此机会举行一次摔跤大会，恳请赏脸。岸野表现出罕见的笑容，非常高兴。

岸野快活极了。他站在院内稍微高一些的地方，简单地向佃农们作了“训话”，然后马上就进屋去了。吉本告诉他非这样做不可。

“说是叫大家按照顺序一个一个地到屋里去见见面。”吉本对大家说。

“吉本先生，吉本先生！”伴听他这么一说，就从大伙当中挺起腰来叫了一声。“我们有好多事要跟地主老爷说，也有好多事要他告诉大伙，一定要在这里……”

“那办不到。”

大家立刻哇哇地说开了。

“啊，你们这怎么成！安静一下！”吉本拚命地制止着。“他这次来一概不谈那种罗嗦事情，等另外有机会再说吧。请协助这样做。”

“是呀，是呀，伴，还有酒席哪。”佃农里也有人这么说了。

“瞧！阿健，明白了吧！”很少动感情的阿部也兴奋起来了。

“上他妈的当啦，阿部，等见面的时候再干还成吧。”

“见面的时候？一个人一个人地去谈吗？不成，不成！因为那就搞得太分散啦。”

“.....”

阿健有点不服气。所谓“见见面”，只是望着你的面孔说一声“喂，好好干活”罢了。阿健心想，那么，就抓住这个机会吧。

一见地主安然自在地盘腿宽坐在两张叠在一起的坐垫上，阿健觉得这跟在外面看到的完全是两个人。岸野的存在似乎把屋子占得满满的，使人感到一种强烈的压抑。地主一见阿健，只把下巴，而且只是下巴尖儿轻轻动了一下，肉眼几乎是看不出来的。

“这是田口健。”吉本介绍说。

“唔，是这个吗？”

他看了管理人一眼，然后朝坐在旁边的太太和小姐说：“这就是咱们农场里唯一的模范青年哪。”

“唔，要加劲干活。往后我依靠的首先就是你们啦。……好啦，好啦。”

他说着又只动了动下巴。管理人已在吆喝下边的人了。

只是这样，只是这样就见完了。

阿健浑身都给汗湿透了。他没脸去见阿部，突然感到十分恼火，恨不得把怯阵的、没出息的自己象破纸片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一样，一下子踏个稀巴烂。

蛮汉子老源已经喝醉了，他把两只眼睛凝视着周遭，仿佛是想找个对手。

“阿健，阿健，阿健我叫你哪！”

阿健没有回答。

“阿健呀，干吗那么丧气的样子！”

阿健一句话没说，就跑到黑暗的门外去了。

第五章

一 土 工

大陆特有的太阳炽热地烘烤着光秃秃的地面。那辉耀着的阳光犹如白热的火焰熊熊地燃烧着。胡乱铺设起来的推土车的小铁轨，弯弯扭扭，看上去活象一条条鳝鱼。土堆上蒸发着的热气熏人。

土工只系了一条兜裆在干活。全身被太阳晒得比挖出来的土还要黑。汗水在沾了泥土的脊背上流成了许多道道。土工里面有将近一百个朝鲜人。

推土车一驶到急转弯的地方，外侧就突然翘起，车轮打起空转来。阿健他们五六个人在假日前^①到这里来干活。活是很危险的。

这工程是开一条蜿蜒二十几里的大灌溉渠，把空知川的水引到江别、石狩一带。开成以后，包括它的支渠在内，可以得到几千町步良田。这样，北海道的产米量便能一跃而直线上升了。

以村长做招牌，有关的大地主充任委员，成立了一个“土工合作社”，从北海道厅取得了“补助金”和“低利资金”。拓殖银行又用特别低利给与“分年偿还的贷款”，说这是为了开发北海道。

^① 每年阴历正月十六日及七月十六日，一般雇佣于旧式商店、工厂或家庭的劳动者都可以回家休息一天。

这个工程，交由“猪仔馆”^① 承包。雇用一般土工，一天怎么也得三四圆，而包给他们只合五六角。这就从中剥取了两三倍的钱。

这样，大地主就用几乎白赚的价钱，新开垦了等于这价钱几十倍的稻田。只要开成了稻田，那点“低利资金”，光用地租就可以很快还清了。

这些阿健也明白。单拿这件事来看，究竟是谁来肩负这些重担呢？佃农和土工！他觉得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了。

“啊呀！”有人大叫了一声。

推土车卷起烟尘翻倒了。车底朝天，只有四个轮子随着惯性还在哗哗直转。车上的土工都被压在土底下，然而谁也不去过问。只有做临时工的阿健他们不觉屏息站住了。

后面的推土车也看不过去，稍微停顿了一下，工头就吆喝着“不准停，不准停”哪！

S村附近有陆军演习，阿健这些人家里都住了军人。

“要是不给部队吃米饭，那可丢脸！”

给母亲几次三番地这么唠叨，阿健才来打短工的。可是，同村来的谁也没干上三天，就都半路上停止了。

“喂，咱们还算好哪，可以半路上不干，可那些土工又该怎么办……”

回村的路上，他们全身都作痛，肩膀也肿了，出了脓。

“土工不是人哪，不是有一首歌就唱的是土工和人打架的事么……”

“佐佐老爷子说过呀，无论怎样，开发北海道也得使用土

^① 原文为“监狱部屋”，指劳动条件极坏、待遇极低的工人招募所或厂房。

工么。”

“是吗？”

“别胡说八道啦。”

阿健发火了。

“进工房子的时候，要把衣服脱个精光，在门口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地点数。窗户还都钉上哪！”

阿健心想从明天起不干了。部队也好，跟咱们一样给他们吃黑饭，谁又管得了这许多？没有必要装什么好看。

第二天早晨三点多钟，同伴们在门外喊他。

“我不去啦！”

他本来觉得，一定要去还是能去的，但一睁眼，感到浑身痛，只能趴着了。

“你说啥？”母亲蓦地抬起头来。

阿健一声不响地又把被子蒙在头上了。

“阿健，我说阿健呀，再挺两天吧，啊，还有两天啦！”

“干不下去啦，浑身直痛，痛啊！”

他没有耐性，而且很想睡，话头就此打住了。

然而母亲还不死心，在枕头边上叨咕了半晌。他心想真讨厌，听着听着，不知不觉又睡着了。

二 “啊，是部队啊！”

“日本胜啦，日本胜啦！俄国败啦……”

“日本胜啦，日本胜啦！俄国败啦……”

由三蹲在房后庄稼地旁边，用断枝捅着蚂蚁窝。

“红蚂蚁，是老俄，黑蚂蚁，是日本国。这个混蛋，要咬死日

本蚂蚁哪。这个畜生，这个畜生！”

他当真地用断枝把红蚂蚁捅了出来。

“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

远处传来枪声。由三一哆嗦，就抬起头来。枪声接着又响了。由三把断枝一扔，就奔向大门外，瞪着眼睛跑上街去了。

“啊，是部队啊！”

三 “干啥呀，稻子！稻子！”

中午前后，军人和村政府的人来决定每家分住士兵的人数。阿健这些人，为了见习，必须随“青年训练所”去参加一天，说是要养成与军人共甘苦、能克服任何困难的精神。危险，真危险！阿健现在已经不想去了。这只是表面上说得动听，“克服困难！”究竟要克服的是什么困难呢？要看看“内幕”！不管怎样缺吃少穿的，佃农都得乖乖地忍受着。难道不是要演习这种精神么！

一清早，远处就响起了枪声。飞机轰鸣着飞过晴朗的高空。银色的翅膀迎着太阳闪闪发光。佃农们站在各处，因为有点晃眼，都把手遮住前额，仰望着天空。孩子们看得都着迷了。

阿健被由三缠着走出门外。阳光照在身上，灼热得很。站着不动，腋下也都给汗水粘得挺难受的。由三吹着好不容易刚学会的口哨，一会吊在哥哥的胳膊上，一会又缠在哥哥身上，独自乐得乱蹦乱跳。

一进市街区，只见邮局前面系着一匹毛儿整齐的军马。一个腰间挂着小皮包的士兵，正在电报纸上写什么。

“跟咱家的比起来，是多好的马啊！”

由三不离马的左右，走到前面去，又绕到后面来，最后蹲下

去望着。

“哥哥，明年你去当兵，就要骑马啦，多好哇！”

街上每家门口都贴着分住士兵的纸条。走出市街区，就瞧见三个士兵，肩上扛着枪，胸前解开两个钮扣，帽子下面垫块手绢，咋咋地踏响鞋底的铁钉，迈着缓慢的步子走过来。

“S村，就是这儿吗？”一个士兵手里拿着地图，指了指市街区。

由三不等哥哥开口，就急忙抢先回答说：

“是的。”

只说了这么一句，由三觉得这已是无上的光荣了。

枪声从东边响起来了。他们俩就由干线路拐进殖民区七号路，没走多远，就看见路上到处都落着不常见的新马粪。

“那儿！那儿！那儿呀！瞧呀！”

由三发了疯似地叫了起来。他望见了庄稼地对面，远远有七八匹马一队的骑兵走着，时隐时现。由三已经着了迷，走到河堤，只见村里的二三十人聚在一起瞧热闹，由三甩开阿健的手，领先跑上前去。只见他钻进人们腋下，使劲拨开人群，挤到最前面去了。

那里有一百来人的队伍，架起枪在休息。热汗和汗浸的皮革发出的气味，直冲到大家站着的地方。两三个士兵光着膀子，仰面躺在太阳的阴影里。其余的士兵，个个都把头垂到胸前，或是躺在地上，已经是疲惫不堪了。然而，只是脸上红得厉害，似乎很兴奋的样子。汗水浸透了上衣，湿漉漉地粘在肌肉突起的脊背上。大家对他们这个样子都有点担心。

“怎么回事呀？”

“给人家追下来的呗，瞧，那丧气的样子！”

忽然间，就在不远的地方响起了枪声。一群小鸟仿佛被喷射出来似的，从杂木林中飞了起来。枪声又响了。于是，一个长官模样的人走出队伍来，发了一声号令。只听见咔咔响起一阵子铁器声，但是，士兵们已经筋疲力尽，不能再做什么动作了。

“不准磨蹭！不准磨蹭！”长官哑着嗓子喊。

“到底是部队呀，真好！一听喇叭声，脊梁骨都立刻会感到发冷呢。”

谈话的是在阿健身旁的一个“在乡军人”。他在青岛把右手弄成残废，不能劳动，过着一半是叫化子似的生活。

“打仗这玩意儿并不象想象的、或是旁观的那么可怕，只要哇地一声冲上去，也就……”

他存心提高了嗓门，好叫大家都能听见。

部队现出泥人似的笨相，在难走的沙地上一脚深、一脚浅地开步走了。他们一声不响，空虚的眼睛只是盯着前面一定的地方，仿佛他们走路并不是自动的，而是有什么外力强迫一样。硬叫病人站起来，着人从旁架着肩膀，叫他在中间走。然而，病人只是吊在架着他的两人中间，脑袋没劲，每走一步就摇晃一下。

看热闹的人们也纷纷地离开了河堤。就在这时候，杂木林中突然掀起一阵呐喊。另一支帽子颜色不同的队伍，上了刺刀，“哇哇”地喊叫着，眼看就朝原先那支队伍的后侧面猛扑过来了。原先那支队伍出乎意外，都未来得及整顿，就溃不成军，拐向路旁，噼哩叭喳地窜进正在秀穗的稻田里去，眼看着稻子被踩倒在皮靴下面了。

“喂，喂呀，喂呀呀！”

只见聚集在稻田对面看热闹的佃农们，挥着手飞快地跑过

来。阿健他们也不知不觉地跟着跑过来。这对农民们来说，真不啻是眼望着自己孩子的手脚被扭掉一样，心痛极了。

“干啥!?”

“干啥呀，稻子！稻子！”

但是，这些都被部队的哇哇的呐喊声压住了。长官虽然听到了，却并不撤消他的号令。这时，农民们只好象木桩子一样呆立在那里了！

“休战喇叭”好不容易才吹响了。

尽管已经造成了这种结果，但士兵们仍然避免踏坏稻子，一跳一跳地走出稻田来。

长官擦着汗，气冲冲地说：

“军需官一会就过来，你们向他申报吧。”

那是知道的！然而，如果申报了受到的损失，每次都会得到这样的回答：“是想借机会来赚一笔钱吧！”“作为日本国民，受了这一点损失还来申报，有这样人么？”有时还这么说：“有的农民，人家说是为了帝国军人，不来申报啦！”贫穷而老实的佃农，究竟怎么办才对呢？到了交地租的时候，地主对这种情形是一点也不考虑的。

士兵们站在离得稍远的地方听着这些话，似乎有点过意不去的样子。阿健心想，这里面也还是有佃农的儿子吧。

被踩坏稻田的邻近农场的佃农，下田扶起被踩倒的稻茎，仿佛是在拼凑砸破的磁器一样。阿健不忍看下去了。

四 “也许是预备演习呀！”

部队住在家里的第二天早晨，由三起得比谁都早。他先是

吃惊似地睁大了眼睛，滴溜溜地满屋子望了一下，就一骨碌爬起来了。他坐在头天晚上擦完架在那里的枪、刺刀和背包前面，自言自语地抚弄着，仿佛鱼儿在啄着饵食。

母亲起来了，她大吃一惊，连忙揪着由三的耳朵，拉他站起来：

“这小子，你敢动人家顶要紧的东西！”

阿健睁着眼睛躺在被窝里。头天晚上，他从仓房里往外取劈柴的时候，听到就在旁边用井水哗哗洗脚的士兵们正在说话：

“这家可够呛啊……”

“嗯，没啥好吃的呀！”

“不过……”

后面的话听不大清楚，只听他们屏着气息在笑。

“倒是个美人呢！”

“而且……看来，还有点风流劲儿哪。”

“那个吗？真是乡下罕见的……”

“……想填补一下空白吗？”

他们齐声笑了起来。

阿健在阴暗的仓房里，气得满脸通红。

打昨天起，阿惠那种轻浮的慌乱劲儿，就使得阿健很恼火。

士兵们一起来，由三就一会儿给他们往铜盆里打水，一会儿又把他们的木屐摆齐，挺机灵地跑在前头干活儿。阿惠在晒黑了的脖子和脸上都擦了水粉，看上去白一块黑一块的。

吃饭时，由阿惠坐在旁边盛饭，不一会儿，由三就提高嗓门儿说：

“娘儿们不能伺候部队呀，俺来，姐姐走开！”

士兵们不禁苦笑起来。

母亲又象昨晚一样，反复唠叨着没啥好吃的。

过午，下起了倾盆大雨。六点钟前后，士兵们满身是泥地回来了。他们累得话都说不出来，只要轻轻一绊，就会顺势倒下去。母亲看到这光景，简直已经哭出一半来了。她马上联想到阿健也许会被征去当兵的事。

这天晚上是最后一夜，而且据说部队又有充裕的时间，母亲就叫阿健在房后宰了一只母鸡，又到钩鳞那里，说是“给部队喝的”，好不容易赊来一升酒。

士兵们喝得有些醉意以后，就跟他们谈起部队里各种有趣的事来，由三一边嘴里叨咕着“不困，不困”，一边揉着眼睛，一直没睡。

“小弟弟，你长大去当兵吗？哈哈哈哈哈！”

“俺也是个农民哪。”另一个说，“我的堂弟在内地一个团里当兵的时候，他的村子发生了佃农争议，后来闹成大事啦。吊钟响起来了，锣也打起来了，几千个佃农全都……喂，就说是暴动吧，闹起来了。弄得地主们一点办法也没有。他们请求衙门，衙门去找军队，终于闹到出动了军队的地步。可是，士兵们的父母、兄弟和亲戚就在那个农村里住着，并且他们自己在农村的时候，天天也都在吃地主的苦头。所以尽管出动军队，也是毫无办法，听说弄得他们好苦哩！”

“喂，喂，是的呀……”母亲莫名其妙地点着头。

“因为你们太款待我们了，才想起这件事来。——我想别说款待，说不定到时候咱们彼此还是敌人哪。”说着，他大声笑起来。“这一带怎样？象我们那个村子附近，年年都闹佃农争议呀！”

无论到哪儿，农村都很困难，而且光是越来越困难呀！喂，真说不定啥时候，我们也会插上刺刀，哇哇地冲进这个村里来哩！”

“该不会吧！”大家都不觉笑了起来。

后来，阿健偶然对阿部说起这件事。

“这话可是真的呀。”阿部深思熟虑地说，“内地到处都闹农民暴动，就拿这回的演习来说吧，也许就是对付农民的预备演习哩！”

第二天中午，听到喇叭声，大家就都跑到村路上去了。

阿惠把头发重新梳得漂漂亮亮，带着由三出了门，就象跳绳一样，从田塍上一跳一跳地小步跑去。

部队走出村子，喇叭声使大家分外激动。一听这声音，心里就感到一阵子难受。尘土随着嚓嚓响着的整齐的步伐飞扬起来。虽然只在家里住了两天，但是大家见他们走过去的时候，都摇着手。

“瞧，瞧呀，在咱家住过的！”

眼快的由三发现那个士兵，就扯着姐姐的手喊。

那个士兵稍微扭过脸来，现出笑容。阿惠的脸红到耳根，把手扬了起来，可是，却只扬到齐胸的地方……

喇叭声离得远了。

队伍走了。

大家一直站在部队留下来的皮革气味和尘土中，望着他们走向远方。

第六章

一 “那是有两张嘴的吸血鬼呀”

“到家里来喝喝茶吧，旭川的人也来，另外还有两三个人哪。”

阿健早就知道伴和阿部家里常有四、五个人集会，但阿健却是头一次去。

干完活，脱去沾着稻草屑的衣服，换了一件，就出去了。由三正一边自言自语，一边用手在墙上映出狗和狐狸的影子玩。

“哥哥上哪儿去？我也去。”

他缠着阿健一直跟到门口。

已经象是秋天了。满天星斗闪闪发光，清凉如水。田里，穗儿秀得并不饱满的稻子，发着轻微的簌簌声响。

市场上，预料政府将要“收购大米”和年景可能不佳，米价直线上涨。然而，哪怕是一点点好处，也落不到农民头上来。现在手里有米的都是什么人呢？反正农民手里没有。他们已经都在米价最低的十一、二月里，连草口袋底儿都抖落干净了。无论哪一个农民都明白，政府“收购大米”，对他们是屁也不顶的。

“可这是政府做的事呀！还是有它很深的考虑的呀！”

当阿健认真地贬低政府“收购”的作用时，佐佐老爷子就拍拍手里拿着的报纸说：

“喂，喂，喂，你连东京的报纸也不好好看，你说你知道个啥呀！就凭象你这样的家伙，那小小乡下佬的笨脑袋瓜儿，究竟知

道个啥呀！这是比你棒一千倍的有学问的东京人，再三考虑之后才决定的事情。要看东京的报纸！看完东京的报纸再来说话。懂吗！”他把脸皱得满是褶子。

今年，往后要再下雨，就是个“事儿”了。

阿部家门前黑暗的地方，突然有狗叫起来。屋子里有人唤着狗的名字。小窗子掠过一个大影子，门被打开，阿部伸出头来。

旭川的人还没来。

屋子里聚集了八个人，都是携家带口、在农场里也是很正派的中年佃农，年轻的只有阿健一个。这真出乎意料之外，阿健还漠然地以为都是年轻人呢。可是，一见到这些人，便使他想到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他感到，一根茁壮的根子，避开人们的耳目，已经牢牢地扎在农场的最深处了。

“庄稼”的年景，在这里也成了话题。

无论佃农们怎样请管理人吉本看了庄稼，并且求他，他也不肯把真实情况告诉岸野。背地里，大家都是“蛇吉，蛇吉”的叫他，而没有人叫他本名的。因为他是管理人，没人作声，其实谁家有丧事，他就克扣地主送来的“奠仪”，私自重新写过，再送到佃农家里去。每逢有修补道路或水渠之类的工程，他就一方面叫地主出一份临时工的工资，一方面叫佃农们白干，把工资全都放进自己的腰包，做得挺巧妙。有时又吓唬佃农说，要重新规定地租，而去割人家一坪稻子；其实这全是扯谎，只不过是给自家养的几百只鸡、鹅和火鸡弄些饲料的借口罢了。

这个“蛇吉”还同H镇一家饭店的女招待有来往，如同他的小老婆一样。

“比地主老爷还厉害，地主老爷还没那样坏，顶坏的就是吉

本呀，那个蛇吉呀！”

佃农里面有人这么说。

“那家伙就是个吸血鬼呀！”

“长着两张嘴的吸血鬼。”阿健面红耳赤地说，“一张嘴舔地主的剩汤剩饭，一张嘴吸佃农的血。”

“嗯。”

“地主身上么，还是有剩汤剩饭可舔的……”

阿健的话还没说完，伴就用他那爽朗而高亢的声音接下去说：“正是这样。这正是重要的地方呀！”

“一旦有啥事儿，就先干掉他。”

二 “血 书”

“阿健，征兵挺不错哩，真是太便宜啦。”说这话的是住在阿健邻近的一个佃农。他正在用纸捻通着烟袋。“石山家的阿信不是给征去啦。”

“嗯，嗯，真是可怜哪。”

“可是，人家阿信可高兴着哪。说是去当了兵，每天就不要光吃白薯和倭瓜啦，就是活儿，也不会比庄稼活更累呀，所以呀，去当兵就更好啦……”

“不见得吧……”

“话是那么说，家里却抽走了一个干活儿的人啦，所以他爹说，要是能行的话，爷儿俩真想一块儿去哩。”

“光是抽咱们笨庄稼人去当兵哩，听说抽的最多啦。”

“可不知道是真，还是假……”阿部开了口。“听说有这样的事呢，咱们村长在去受征兵检查的人里面，挑那些还不知道能不

能检查上的，偷偷地叫他们写下血书，用这个办法来提高咱们村的名望……”

大家都沉默了一会儿。

“喝！”

“是吗？”

“不见得吧。”

“我想是会这样干的。”阿部还是老习惯，望着自己的手指尖，在角落里慢条斯理地说。“这还不是村长一个人的主意，还有牵线的家伙哩。说啥农村青年的思想恶化啦，这帮家伙脸都吓白啦，所以在拚命要花招哪。看看这一程子的《北海时报》和《小樽新闻》的农村栏吧，什么农村美谈啦，什么某某村的节妇孝子啦，什么某某青年团的美举啦，什么某某纪念事业等等，不是把个农村吹捧得天花乱坠吗？可是，实际上农村是怎样的呢？这些家伙简直是发了疯啊。为了叫咱们农民永远老老实实在地卖力气干活儿，不管是报纸啦，杂志啦，纪元节^①啦，征兵检查啦，‘青年训练所’啦，机动演习^②啦，学校啦，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一个目的，拚命加以利用。而且干得很巧妙，叫你一眼很不容易看得出来，真可以说是滴水不漏。这就危险啦。啥也不懂的农民，就会一下子掉进他们的圈套里去。”

“真复杂呀！”伴夸张地皱起他那给太阳晒黑了的脸。“非常复杂，非常……”

“尽管叫人着急，但咱们这里也只能象拣豆粒似地一个一个发展呀。”

“无论怎么说，一个人的力量总是不大的。”只晓得种田的掉

① 纪元节是日本的国庆节。

② 机动演习，是日本旧陆军的秋季野外演习。

了牙的四号住户老茂开了腔。

三 农民协会的荒川

门外传来了狗叫声。

“荒川来啦。”阿部出去了。

“啊，对不起，对不起！”

荒川说着，噗通一声扔下一个帆布包。他是一个瘦削的二十二、三岁的青年，左肩有些耸起来，留着长头发。

“你辛苦啦。”

“不，不。”

荒川走进屋里，说了一声“早来啦”，精神饱满地向大家点头致意。然后，用脏得发黑的手巾使劲地擦了擦脸和脖子。

“庄稼长得不好哇，今年这可要成大问题啦。”

“岸野先生将会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他象是开玩笑似地边笑边说，“这种事，既然在岸野农场当过十年佃农，也该会知道了吧，啊？”

大家都笑了起来。

荒川用畅达的语言，时时逗人发笑，谈了各种事情。

秋田有一种“卖青苗”的办法。这是佃农的一个新战术，每当感到地主要“扣押青田”和“禁止下地”啦，佃农就先下手，在夏季估算一下收成，把青苗卖给商人。只要变成钱拿在手里，那就是自己的东西了。“怎么样？不想来它一下吗？”荒川笑谈似地说着。

在附近的农村走走，就会知道农村的生活水平在逐步下降，越降越低。不管村长和警察署长怎样抬出“农村美风”来大肆宣

传；如果连饭都没得吃了，就无论如何也必然要反抗地主老爷。

而且，这么一来，受苦的并不只是贫穷的农民，就是好歹有十町步、二十町步田地的“地主”，如果按段^①计算，把灌溉费、排水费、地捐、其他赋税和生活费等加起来，单靠从地里收到的六、七斗地租，就发生不合算的情况了。假若想改造田地，多少提高一点收益，那就无论如何也得把田地作抵押，从拓殖银行借取“分年偿还”的贷款。但是这么一来，那就更加不上算了。大地主的存在，慢慢地，但沉重地压迫着他们，他们比佃农还要苦恼。尽管如此，“我是地主老爷”这种意识，却永远不会消逝。无论受到多么沉重的打击，他们总还是觉得，一旦被看作跟佃农们同样的人，那怎么受得了呢！

和阿健家隔河相望的从越后搬来的广濑，就是这样。尽管已经满身是债，土地也不是自己的了，他却仍然不喜欢自己的孩子跟由三他们一起玩耍，说是“再败家，也……”

荒川喝着给硫磺质弄成墨水般的黑茶，谈起内地农民的生活。

在内地，搞起佃农斗争来，就打“秋千”。他们硬把地主拖了去，倒吊起来，一会儿浸到水渠里，一会儿提出水面。不过，象北海道这样，没有跟佃农住在一个村里的地主，“可惜的是，不能打‘秋千’啦。”

“要是给岸野也来一家伙，该怎么样啊。”一个人逗趣地说。

“岸野么，是啊……”

^① 一段合九九一·七平方米。

“那样粗暴的搞法，岸野先生再厉害也……”

荒川默默地听着。

“那家伙也许要硬顶吧。”

“那样一副长相么。”

“哪有的事……瞎说……”

“岸野再厉害，可咱们的人数总比他多呀。”

“哈哈，哈哈，往后可有机会搞搞实验啦。”

荒川愉快地笑了。

荒川因为从事这方面的运动，经常遭到警察钉梢，几次被关进监狱。这是阿健也听说过的，然而，他为什么还能这样从容而愉快呢。这是阿健所不明白的。

听他说到，俄国革命前和革命后，俄国农民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变化又是怎样正好符合农民原来的愿望，阿健就明白了自己的实际生活中所发生的、可是谁也没有留心的事情。

阿健因为第二天要早起，家离得又远，就中途退了席。

“我去小便。”

阿部也跟着走到外面来。

“阿部，我也要好好干，有啥事儿，不能叫我干吗？”

阿健极力抑制住兴奋的情绪，把视线避开阿部的脸说。就这么几句话，说起来声音也直颤抖。

“噢，噢，是吗？那就要你帮忙啦。”

阿健灼热的双颊接触着夜晚的凉气，只觉一阵清爽。已是秋天了。阿健真想说些什么。

“等着吧，等着吧，我也要……”

他反复地自言自语着。

四 寡妇阿胜

拐过马路，就是寡妇阿胜的家。一间长年风雨侵蚀得破烂不堪的摇摇欲坠的小草房，因为风一大就有危险，在房后撑了两三根木柱。自从四、五年前死了丈夫，就一个人干活。打那以后，竟然一年一个，连生了三个面孔互不相似的孩子。不晓得谁是他们的父亲。各种各样的男人都偷偷地到阿胜家里来，她靠这个生活。村里的姑娘们，一到了相当的年岁（例如阿绢等人），就跑到札幌或小樽去。她们不愿意象自己的母亲那样一辈子滚泥巴，干那种不上算的庄稼活。因此，村里的小伙子长多大也很难娶到老婆。这样的人当中，不能带了钱特意到H镇去的，天一黑，就上阿胜家来了。

阿健无意中瞧见一个男人走出阿胜的家。门里射出来的灯光正照着他的半边身体，从阿健这里刚好望得见，原来是武田！说的可漂亮呢！阿健发现了武田的这种行径，真是开心极了。

瞧着吧，畜生！

第七章

一 七之助的信

阿健从地里回来，母亲正在生气。

“瞧哇，说没贴够邮票，没有钱，还给罚去了六分！”

信是七之助寄来的。阿健连脚上的泥也没洗，就直奔火炉

旁边，躺下去把信打开。

早上五点起床，六点到工厂去。戴一顶油渍得冰凉的、不成样儿的帽子，弓着背，把饭盒挂在腰间去上工。前后左右，都是跟我一样的人，没精打采地忙着赶路。在工厂里，可不能大意，从早上六点一直到下午五点，都得象绷直的弓弦那么紧张。

打从我来啦，已经有两个年轻工友被机器吞进去了。他们被压成肉饼，象大块抹布似地从轮子里吐出来。其中一个的老婆，后来听说靠卖淫来养活孩子。另一个据说是青森的佃农的三儿子。这事真叫人脊梁骨发抖。

整个工厂都是轰隆轰隆的大机器旋转声。起初一星期，回到家里，耳朵、脑袋还都轰隆响，身子摇摇晃晃，连张报纸都读不下去。我心想，照这样下去，说不定会变成傻子呢。现在习惯啦。

前几天见到阿绢啦。她在岸野经营的大饭店里干活。岸野在这里经营着杂粮、海产、肥料、饭店、××工厂和精米股份有限公司。他还是交易所、拓殖银行等的股东，商业公会委员，市议会议员。此外还有几千町步的农场和牧场。

岸野有一批青鱼饼^①，因为是经年的货底子，检验不合格，无法处置，就送到咱们农场来，用检验合格货的价钱卖给咱们，想你已都知道了。不过，对岸野说来，这还不算什么大不了的坏事哩。

这是阿绢说的：他的饭店里有将近二十个女招待。岸野每星期要去两回，每回都叫女招待到他的房间里给他揉肩膀。大家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等着轮到自己头上。不愿意，就走开！然而，要是“有钱”走得开的姑娘，就压根儿不会到这种地方来了。她们都是为养家糊口，才走出农村来的。说起来，也是跟咱们一样的人。她们里面也有沉住气，捋着头发走出门来，但是大都是一走出门外，就哇地一声哭起来。据说，真是叫人不忍看下去呀。岸野每来一回，就一定要这么干。

岸野到底在干些什么，农民们一点也不知道。到这里来，才知道啦。阿部介绍来的人们，正在这里研究劳动问题等等。我原来一点也不知道他们的这些活动，后来给他们一劝就参加了。还是参加了

① 青鱼饼，是用青鱼榨油后剩下的渣滓做成的饼，可作肥料。

的好。我在这里懂得了不少东西。

关于农民的事情，他们特别给我讲了些。现在我知道了，农民这种人在如今这个世界上，无论走到哪里，总归是越来越苦。

农民要是自己有田地，不用交地租，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全都自己做，既不卖，也不买，也许这样是幸福的。可是，任凭你找遍全世界，也没有这样的地方，这是十分明白的事。

住在城市很容易了解，大工厂在源源不断地做出生活必需品。这些东西，就象洪水一般朝着农村，朝着那里的每个角落流进去。这样一来，还是那样放低油灯在堂屋地上打绳子，或是织布，那就来不及了，根本没法赶得上。在北海道，无论到哪里，除了出外干活的，冬天在家里搞副业的，不是都没有了吗？

所以，农民不管啥东西就都非买不可。这样，需要的就是钱哪！农民进钱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出卖地里长的东西。可是，拿卖东西来说，世界上最笨的就是农民啦。

阿健，你知道吧，秋天卖东西的时候，要考虑到城市商品市场的变化，估计到会怎样变，才卖，或者不卖，难道会有一个农民这样干的吗？这又是为什么，为什么呢？

三年前，青豌豆的市价，曾经没完没了地涨过，你知道吧。那时大家都说是因为荷兰歉收，伦敦来向我国大批订货的缘故。可是，这回到小樽一问，并不是那么回事。实际上那是小樽的大批发行、大贸易商行钩龙，为了抬高售价，大批地囤积起来以后，才这样宣传的。山里的农民哪里知道这些事情啊。

第二年，你种青豌豆，我也种青豌豆，每个农民都种上了青豌豆，惨淡经营一年，梦想发一笔大财，可是到了秋天怎么样？价钱暴跌！这回又说是荷兰大丰收了。其实，这也是七分谎话。大批发商叫它落多少就落多少，用最便宜的价钱囤积起来。这种投机取巧并不是一下子可以看得出来的。真不知道那一年因为这个上吊的，或者连夜逃跑了的，究竟有多少人啊。城市掌握着一切的控制权力。

农民要把头伸到这样的世界来，是不会行得通的。住在山里面，脑袋里根本不会有什么市场的情况。在工厂里，昨天买进原料，明天就能造成可以卖到市场上去的東西。一年到头都能够毫不间断地这样干，每天都可以按照卖出的情况来自由地增减产量。可是农

民怎么样呢？买进一回原料，到造成第一批产品就需要一年！这有多么死板哪！单是这一点就明白了。

进工厂来，叫人惊讶的是“机器”。一个男人假使每天白日晚上干，需要干上一年的活，在工厂只要一天就干完了。工厂就是用这样的机器构成的。我们只需要跟在机器旁边动动手就成了。可是，假如用这种眼光来看农村，农村里那股悠闲劲儿和古代遗风，不都使人打瞌睡吗？这哪能赶得上呢。

因此，就是住在城市的地主，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里，单靠当地主，也是竞争不下去的。所以，他们只要尽量多从农民身上榨取地租就成，其余一概不管，而拚命干别的事，正象岸野那样。打个比方来说，就象一条“人鱼”吧。

他们光上半身是“地主”，下半身却是“资本家”。而且，据说，现在的倾向是，下半身的资本家正在侵蚀着上半身的地主。因此，现时的地主，他们丝毫不能作为地主考虑什么佃农可怜呀，什么稍加改良使之适合当前的社会呀等等的事。相反的，倒是他们觉得自己的地位并不稳定。因此，他们都认为从佃农身上，能多挤就多挤出些来，才算便宜。

事到如今，佃农要是还指望地主老爷会为他们做点什么好事，而老是等待下去，即使等上一百年，结果也得不到什么。研究会的人谈到了农村。他们说，要是不改变当前世界的社会组织——结构的话，无论做什么，农民都越来越苦。当然，也可以改良一下，使他们适合于这个乱糟糟的社会的制度，比如说，也有这样的办法：因为农民七零八落地分散劳动，终究会吃大亏，就组织合作社，共同耕种，共同经营，不叫狡猾的商人从中牟利。不过，这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不会搞得好的。所以，无论说啥，都得大搞佃农争议，来提高佃农的生活水平。除这以外，没有别的办法。总而言之，如果不象俄国那样，由工人和农民来治理国家，就搞不好。这是大家的意见。给他们这么一说，你瞧，每一句话不都打动咱们的心坎吗？

农村成过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吗？农村成过娱乐、外交、时尚和艺术的中心吗？单是这么想，就是荒唐的。早先不过只有五、六个“城市”，在很短的时间增加得多么快呀。从人口来说，已经有半数以上集中到城市来了。只要看到这一点，也就够明白了。然

而，无论在哪里，“城市”和“农村”也并不是什么敌人和同盟者的问题，只是现今世界的结构使它们成了这样，所以，只能说它们看起来是这样罢了。

关于岸野的事情，他们谈得很有趣。假定一年从S村收入五千元，那家伙首先就拿来存入拓殖银行。（“银行”这东西，装得一派高贵、不管世事的样子，其实它正是勒着农民脖子的大头子的总管。可是农民中哪有一个人是这样看法呢！）随后，这笔钱又从拓殖银行作为农业资金，以分年偿还的方式贷出去。直接借这种贷款的，不是自耕农就是钩鳞一类的商人。你知道钩鳞为啥常常到H镇去吗？那家伙就是用一分年利把钱借出来，然后再用月利三厘或四厘借给贫苦的佃农。所以，钩鳞只是把别人的钱右手借进，左手借出，按月利三厘计算，一年就是三分六厘，这就等于白赚了二分六厘。（二分六厘！）这笔钱就是先前从S村作为地租收来的。这样一看，同一个佃农，一笔钱就被剥削了两回。

此外，岸野还从拓殖银行分取股票的红利。这笔钱不是从什么别处，也是从农村搜刮来的。三层剥削！他又用这笔款子的一部分，例如说投资到我们工厂里来，驱使我们生产尽量多的产品，又用高价卖给S村，在那里又会发生同样的情况。这样，一个佃农就得受好几层剥削。那些家伙们干的事，都是这样互有相联的。

并且，为了永远能够顺利地干这种“好事”，岸野既当上了商会委员，又当上了市议会议员。紧急的时候，跟警察和道厅也有密切的配合。只要保持着这些头衔，就可以反过来利用职权来干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假定说，S村的事怎么弄也不顺手啦，岸野就会指示他那个党派的议员，叫公家在S村铺设铁路，修建车站。这么一来，附近的地价就要上涨。把稻田变成住宅用地，收入上的差别可就大了。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

农民们还不明白这种种事情。

将来恐怕也不会很快就明白吧。可是，阿健，无论多么困难，需要多么长的时间，咱们如果不站在前面领头干下去，那就没有谁会干了。听阿部说，咱们村也有旭川农民协会的人来开过会。我想，假如阿健也去参加，彼此配合起来干该多好哇。

阿绢说她要回村去了。详细情况，我不大了解，据她说恐怕是不得不回去了。经仔细问过以后，才知道她也是可怜的。这并不只是她一个人不好，农民的生活就是这样么。往后，村子逐渐地陷入绝境，象阿绢这样的妇女，就只会一天比一天多起来。

她很想知道阿健的情况，听来好象与阿节有关，所以我没告诉她。

“小樽”和“S村”，单从表面看来，也可以清楚地明白前面说的这些了。这里有的是制罐工厂、开发大楼、第一流的银行、××工厂、运河、仓库、公园、大公馆、汽车、轮船、现代化码头……这些东西仿佛大漩涡似的，惊心动魄地纷扰着、吼叫着。走在这拥挤的街头上，就会使人怀疑，世界上什么地方还会有那满身污泥、弓背弯腰的农民呢？山、河、草、稻、肥料，农村就只有这些！可是，说不定小樽人的眼睛，连一次也没有看到过真正的农民。

以后再写吧。

不过咱们也不能老是“农民”、“农民”的说自己，给人家欺骗一辈子，这一点是要紧的。请代问大家好。

信上写的就是这样意思的话。阿健一面吃饭，一面又仔细地读了一遍。然后，就带着信到阿部家去了。

第 八 章

一 “不想再当农民啦”

雨连续下了两个多星期。

起初下的是玻璃管似的大雨，响雷时时发出爆炸般的声音。连平常阴暗的屋角，也因为雨水的反光而觉得发亮。

雨，一直没停，就这样变成了淫雨。本来乌云一度裂了缝，

大家以为有了指望，但又合了起来。雨又连续下了三、四天，说真格的，都叫人厌烦了！到了第五天，佃农们慌了起来，简直是坐也不安，站也不宁，哪一家的屋檐下，都有农民站在那里望着那泡透的、快要霉烂的、一片水泊似的田野。

“庄稼人可真是够可怜啦！”

佐佐老爷子已经读腻了东京的报纸。他闲得打转，直妨碍年轻人的手脚。“真可怜哪，毫无办法。真急死人啦，急死人！”

正是稻子秀穗的紧要关头，竟然下了二十来天雨。佃农们的孤零零分散在各处的房子，活象被弃置的垃圾箱一样，死气沉沉。

一次买进的原料，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制成产品。这使七之助感到惊讶。然而，又何止这样呢！连这一年好不容易得到的东西，不也是眼前这个样子吗？照这样子，是要被那瞬息万变的城市的各种产业工业抛在后面的，农村必然要被掐着脖子，一落千丈，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了。

“不想再当农民啦！”阿健对聚集到家里来的朋友们说。

没有办法了，大家就在纸上画棋盘下军棋。母亲把皱得象包袱皮似的干瘪的奶头，塞进婴儿嘴里含着，从小窗户洞里呆望着正在下雨的外面。她按着太阳穴说：“唉，唉，一听见雨声，脑袋瓜子就痛！”

“咱们S村的佃农，象青鱼干似地排成一排吊起来的日子快到啦。那才好看哪。”

然而，谁也没跟着笑。

五、六个人打着伞，去看近处的稻田。有人提议就便到“蛇吉”家里去试试，也许先谈谈，会有点什么用处。大家都觉得，要是特意去，就会给人家说“谁上这样的管理人家去啦”。

吉本坐着拉开糊纸的木格子拉门^①，伸出他那张浮肿的大黄脸来，一看是佃农，马上露出讨厌的神情。

“有什么事吗？”

（可是声音挺温和呢！）

“是的，倒没什么大事……”

有客人在，是H镇的警察署长。阿健他们看见是他，不由得感到畏缩起来。可是，吉本却似乎有些慌张。

“有事吗？这会儿我有点……以后再说不成吗？”

“不，这雨下成这样子，是的，我们刚从田里看了来……”

“嗯。这场雨，我也在考虑。以后再说吧。”

“庄稼伤得太厉害啦，请先向岸野先生那儿，打个……”

阿健刚刚开口，就被吉本不耐烦地“嗯、嗯、嗯”说着，拦住了。“我不是照你们的指示办事的。我知道啦。”

警察署长和管理人！有什么活动吧？阿健往回走着，有些担心。在S村里，还有人把新上市的芋头、萝卜和鸡等，送给派出所的巡警和校长。然而，那些了不起的老爷们暗地里却同村子里有钱有势的人们勾结得很紧。这些事，任凭阿健怎么说，佃农们也还是无从明白的。

一到晚上，住在邻近的佃农们，常常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一个人呆在家里，闷死啦。”

“怎么办才好哪？”

“岸野先生会怎样对待咱们哪？”

也出现了一些自暴自弃的佃农，常常喝醉了酒出来走动，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说些前言不搭后语的胡话。

① 木格子拉门，是外室靠外面的上半截糊纸的轻便拉门。

二 “这种人，就叫狗！”

牵了马到三井公司的砂川煤矿去拉斗车的，上H镇去当筑路工人的，上水渠去做挖土临时工的，还有牵了马到山林里去搬运夏季出山的木料的，……这些人一过九月中旬，就都回来了。

稻粒虽然霉黑了，还是得收割回来，碾成“白米”。从那时起大约一个月时间，佃农们从早晨三点钟一直干到晚上七、八点钟。收成减了“一半”。

一半！那么佃农到底是为了什么干活的呢？

阿健给呛嗓子的稻草灰弄成了土人。

“不干啦！不干啦！”他气冲冲地把活儿一扔，一屁股坐在进屋的木板台阶上。

“阿惠，踩一会儿！”

阿惠一看哥哥来势很凶，便无可奈何地站了起来。母亲在厨房里没有作声。

“一半，真好啊。干了一年活，只收了一半，刚好交地租。原封不动地全送给岸野，还怕不够呢。咱庄稼人干了一年，哪怕有一升米，仅仅一升米，可以自由自在地填到自己嘴里去，也不会遭到恶报吧……”

“去年又是那个样子，还不知道岸野先生会怎么说呢！”母亲抽着鼻子说，“不光是你，庄稼人都是这样拚死拚活地干了五十多年啦！”

“老是叨念着，总会有一天好起来，这回可要好起来啦；可到最后，来了个实在对不起，真棒！”

母亲不作声，仍在抽着鼻子。

从田里割来的稻子要捣成一粒一粒的米，可这米却一粒不留地送到岸野家去。大家都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一点，尽管知道，还是要拚命地把稻子脱下粒来，去皮捣成白米。庄稼人竟是心肠多么好的大傻瓜呀！

武田忽然露面了。

“干得真有力哪！”

“说啥呀，您瞧这稻谷。”母亲抓起一把堆在席子上的稻谷，搓着给他看。

“刚才，我们还正说该造反啦。”

武田假惺惺地大声笑起来。

“我说阿健，有点事要跟你商量，干完活到我家来一趟吧。”

阿健没有作声。

“今年收成不好，总觉得好象要闹事，这对咱们村子可不体面，对互助会来说也不大好……”

“你家打了多少？”阿健冷冷地岔开话头。

“刚刚一半么。”

“交了租，怎么样？”

“嗯，没吃的啦。不过，这一点么，我想，总要想法子好好对付过去。”

阿健心想，这家伙也许是受了吉本的指使才来的。

阿健讽刺地说：“伴说了这样的话，也不知是真是假。他说是蛇吉说的，明年春天，H镇选举议员，岸野先生要出马，不能叫他的地盘受到破坏，所以无论如何今年也要把佃农对付过去才成。是真的吗？咱们没有吃的，也许因为选举的关系，总会给咱们想想办法吧！”

“……………”武田沉默了一会儿说，“不见得吧。”

武田把话岔开就回去了。只听他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在门外说了一句：

“明天又是个好天气呀。”

“这种人，就叫狗。——狗东西！”

别的农场减了租，或者正要减租的消息，立刻就传到岸野农场里来。大家每次听到这类消息都要波动一阵子。

伴、佐佐老爷子、武田等几个常任交涉委员，上管理人吉本家里去了好几趟。

“蛇吉这混蛋知道得清清楚楚，还从头到尾给岸野撑腰。如今，这兔崽子夹在中间，胡搅蛮缠！”

回家的路上，大家到了阿健家里。伴当着佐佐老爷子和武田的面，气愤地这样说。

现在只剩下岸野的回信了。一回信就可以决定下来。只等回信就行了。

三 是啊，都过去十年了。

夜长起来了。

在厨房里用手捧着水喝，都冰牙了。长期过度的劳累，佃农那硬梆梆的腰板，现在该一跳一跳地酸痛起来了。母亲答应给由三钱，好歹哄他给自己搓腰。夜静悄悄的。大家把土豆埋在炉灰里，或是加盐煮了，一边吃，一边趴在席子上谈着各种各样的事情。由三也钻到大家中间去，睁大了眼睛，用手撑着脸蛋儿听着，他喜欢听。母亲对早先的事记得清清楚楚。

钻进被窝里，身子骨还是痛得睡不着。一直到天亮，要翻好几次身。过去的生活在记忆中浮现出来。他们本不想在这样的

北海道住下去，只想干一阵子，赚了钱就回内地去过安乐的生活。顶多呆上两三年吧。大家这样想着，渡过津轻海峡来到这里。然而，都已经过去十年了。现在，怀着感慨，重新环顾一下自己的周围，是啊，都过去十年了。真是啊！那么，别的不说，死总想死在内地的村子里吧。

只要有人说要回内地的村子里去一下，同乡们就聚拢了来，托他带信，或者带东西给留在本村的亲戚朋友，或者请他打听村里的情况。

大家老是想，总有一天一定会回内地去。从前仿佛是被赶着离开的村子，现在回忆起来却总是怀着一种奇特的依恋。

夜一长，半夜里就要起来小便好几次。半睡半醒地打开屋门，身子就冷得直抖，缩成一团。深秋清冷的野外一片沉寂。苍茫的澄空，高挂着冰盘似的月亮。就连年轻的妇女，也都是蹲在门口就哗哗地解手。

四 “独杯酒”^①

收割一完，只要天好，每天都有各种商人前来做生意，想赚农民的钱。有的是背上驮着一只挂了许多照片的佛龕的老人，手里摇着铃铛站在门前。有的是带了绸缎布匹的行商。也有越中、富山地方的卖药商人，打开有好些小抽屉的桐木箱子，喋喋不休地叨咕着，老是不肯离开。最后，把画着马的带有药味的广告单送给小孩，硬把一些人家并不需要的药粉袋放下才走开。可是，农民想到北海道漫长的冬天正在等待着他们，就连做内衣的

^① 指的是买一次酒装在杯里，喝完不添。

布料都不敢轻易买。

为了要过一个稍微象样的正月，佃农中也有人出去干活。姑娘们天还没亮，就用大车装了萝卜、土豆、老玉米等等，咕咚咕咚地打门前的路上向H镇走去。她们坐在大车上，把灯笼吊在车旁，嗓子好的就唱起流行歌曲来。到达H镇天刚好发亮。

有的赶晓市去了，有的出去挨家从后门口问“太太要啥”。这样，到了中午时分，又坐上空车，嘻嘻哈哈地逗着趣回村来了。卖了多少钱，就用来买做内衣和衬裙的布料，有时也到糕饼店里买些豆沙包吃了回来。

蛮汉子老源到H镇卖菜，一抓到钱，就把马拴在电线杆子上，钻到车站前面的杂货铺里，撕着鱼干，用玻璃杯喝“独杯酒”。

农民们回家以前差不多都到这里来灌一杯“独杯酒”。店前拴着农民的好几套大车，多半是母马。偶尔一遇到公马走过，这些母马就嘶叫着跷起前脚来闹腾一阵子。从店里立刻跑出喝红了脸的农民来，把母马牵到旁边去。

蛮汉子老源在这里喝得烂醉以后，就直接跑到有妓女的卖面条的饭馆去。女人们都知道蛮汉子老源，很讨厌他。因为他一喝醉了，就用椽子似的胳膊打她们。有一回，女人们给打得挤开纸榻扇^①，碰翻小餐桌，撞倒木格子拉门，象一口袋芋头似地从楼梯上滚跌下来。

蛮汉子老源的马，在冷清清的马路上，一直拴到第二天早晨，也没人管。

① 纸榻扇是内室纸糊的轻便拉门。日本风俗，侍女都跪坐在门边，侍候客人吃饭。所以挨打时，会挤开纸榻扇。

五 “来 生”

照例每年都要从小樽请个“高僧”来，在S村龙德寺讲四、五天经。龙德寺前面并排挂着岸野、吉冈等大地主和钩鳞、吉本等捐款的“芳名牌”。岸野捐款“壹千元正”。从小樽请和尚来，也是岸野找人介绍的。

老年人等待这一天的到来，比小孩子盼望节日还急切。

这一天，老年人穿上收藏着的硬梆梆的土布衣裳，叫小孙女拉着手赶去。他们走在田塍上，仿佛是一根根生了锈的弯铁钉。阿健的母亲也是年年必到。

“……现世是苦痛的，到处都充满了不顺心的事、悲哀的事、叫人流泪的事和凄凉的事。可是，这都是前世注定的，万事都是因果报应。大家都必须这么想，并且忍受下去。我佛释迦就是这样说的。”

和尚这么说着，老年人们每当他说一句，就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

“……可是，只有到了弥陀佛面前，才算到达了极乐世界。佛爷会告诉你：啊，啊！你活在人世吃了苦头，可是，你对一切事情，都能恪守佛爷的教训，没说一句不平的话，决心忍受下来啦。这回可好啦！好，合起掌来吧，这样合起来，只要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彻底安心啦，就可以坐上莲台啦……”

“真是难得的话呀。”

“啊，啊！真难得，真难得呀！”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农民们连自己都莫名其妙地在心里想着“来生”的事。漫长的生活真是太“苦”啦，无论到什么时候，也都是无法解脱的。假如能到另一个世界去该多好……他们一上了年纪，就只能这样想了。

“无论什么事情，无论什么事情，都得老老实实地，老老实实地忍受下去！”

和尚反复地说了这几句话。

六 阿 绢

有人告诉阿健说，阿绢回来了。

“到底还是小樽哪，瞧她那个样儿！简直是大户人家的小姐么，乡下的狗看不惯，都叫起来啦。村里的青年团，这回也该乱一阵子啦。”

阿健连笑都没笑。

阿绢的事并没有特别让他动脑子。回来了，又该怎么样？又该怎么办？事到如今，已经是今非昔比了。

“阿绢回来啦呀？……”

阿节只向阿健说了这么一句，还有点口吃。她用眼睛观察着阿健的脸色。

“傻瓜！”

阿健用手指弹了一下阿节的嘴唇。

“是吗？那，我可真高兴！”

阿节沉默了一会儿，说完就忽然象跳绳似地跳着跑开了，连头也没有回。

两三天后，阿健听到了一个不愉快的消息。阿绢怀了孕，据

说对方是个什么大学生。因此，她在饭店呆不下去，才悄悄地回来了。

父亲气得不让阿绢进屋，把她从屋里踢倒在堂屋地上。尽管这样，她还是把手按着潮湿得发粘的泥地，流着眼泪哀求着让她留下来：“就是仓房的一个角落也成……”

阿健还听到了各种传说。

阿绢那样的身子，还挣扎着干活。她那双手变得白嫩、纤细了，在农家只能是个碍眼的累赘。她烧好饭，摆在桌子上，就一声不响地坐在屋角，等大家吃完，还有剩饭，她才一个人悄悄地吃下去。听到这话，阿健心里还是觉得难受。

一天深夜，阿健从伴那里回来，只见母亲的脸色都变了。

“说是阿绢上吊啦！叫你去哪。”

阿健一句话没说，就跑出去了。

他一到外面，心想“完啦！”那是一个月夜，跟阿绢之间的种种往事，闪电般掠过脑际。

阿绢吊死在仓房里。阿健来到的时候，已有七、八个人提着灯笼在那里了。父亲说是去找她时，无意中撞了她一下。所以仔细看，现在还可以看出吊着的死尸在轻微地摇动。用灯笼照着看上去，真叫人毛骨悚然。

“唉，这给全村丢脸的家伙，总算有下场啦……”

父亲面无血色地说着，直打转。

不知为什么，阿健却认为阿绢的死不只是阿绢这样一个人的问题，并不只是这些。他总觉得这里面还有更多的种种别的东西。

S村和小樽，这正是阿绢叫人们思考的问题！

第九章

——“我说，咱们的内掌柜们呀！”

岸野来了回信。

吉本派人到伴家里来叫他。阿健正要给阿绢去送葬，在半路上遇见了他。

“不用问，也知道哇。”伴说。

“岸野的事么。我回头上你家去。”

阿胜家门前，几个异父同母的孩子正在堵住灌溉稻田的水沟，捞鲫鱼。他们满身都给泥水弄得精湿，溅在肚脐上的污泥已经结成了白疤。

“爱子！”男孩子喊了一声。

“啥呀？”

“爱子爱呀，爱呀爱呀，呆里呆气，呆屎橛子。”

女孩子也不示弱地喊：“源呀源呀，源呀源呀，软里软气，软屎橛子。”

终于到时候啦！阿健感到了一种类似恐惧的心情，仿佛心脏被人搔着痒似的。

管理人吉本一见伴的面，就说：

“看看吧！”他把信扔到伴眼前来。“因为你们说了那样的话，瞧，反而使他别扭起来啦。所以我说你们可真是胡涂哇。”

老狐狸！鬼才相信你这家伙会照实把我们的话写进去了！你固守自己的立场，总是说佃农们在胡闹，所以不管事情有没有，

你不是都胡说八道地写进去了吗？我们是按程序办事，才让你这样的家伙夹在中间了。

伴把信放在怀里，连招呼也没打，就走出来了。

“要闹起来，可就得吃亏，明白吗？嗯？”

临出门的时候，听吉本这么说，伴也没理他。

这么一来，吉本的尴尬处境可以说到了可怜的地步。活该！

伴的家里聚拢了五、六个人。阿健也在场。他遇见了伴以后，心想这不是送葬的时候，只到阿绢家里露露面，就上这里来了。他自己也觉得变了，心想，阿绢会原谅他的。

伴回来了，大家都望着他。

一瞬间，只感到一种特别的紧张气氛，强烈地压抑着每个人的心。

“哈哈，哈哈！”

伴站在门口，一言未发，就先大声笑了起来。然后从怀里掏出信来晃了一晃，仿佛是在示意：“你们来看。”

“不成啦！”他斩钉截铁地煞住话头。

大家都象被牵动起来似地纷纷跟着说：“不成吗？”“到底是不成啦！”“是吗？”“不成啦！”一个个都感到肩膀一下子失去了力量。

“那么，这个玩意儿就不去读它啦，现在是要考虑第二步！”

伴在大伙中间盘腿坐着。

阿部取出眼镜来，仔细地读起信来。

“第二步，咱们要选出代表，上小樽去直接跟岸野详细面谈。吵架还早，往后再吵也来得及。”

“对呀，你先去跟他吵一架就好啦。”一个年长一些的佃农逗趣地说。

伴夸张地双手捧着头，哈哈大笑起来。

“那样干合乎程序，好么。”

“好的。”

“不过，象老伴这种爱吵架的人，当代表可不行。”

“就我这个样子，轮到讨价还价的时候，也还是有两下子的。”伴有点难为情的样子。

“为啥要走这些多余的弯路呢？”阿健独自这么想。“事情不是很清楚吗？”

“一旦吵起来，仍然还要考虑是跟他吵，还是不吵。我们要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到才成。”

连阿部也这么说。

为这事担心的妇女们，有的把孩子抱在怀里喂着奶，有的背在背上，这样那样地议论着，三三两两地聚拢来了。孩子在背上哭叫着，直蹬母亲的屁股。门口那里嚷嚷起来了。

这样聚到一起一瞧，佃农的妇女们都是很脏的，就象从地里拔出来的牛蒡一样黑，满身土腥气。然而，无论哪一张脸，都在为“有得吃”和“没得吃”抽搐着。

“我说，咱们的内掌柜们呀！”

伴每说一句，都伸一伸下巴。他又照平日的习惯，一说话就把眼睛闭了起来：“请大家听着：这一年来，咱们连觉也没睡好，拚命干活，现在就是托了这个福，这真是难得的福，连吃的都没啦。咱们只是恳求他们好歹叫咱们活下去。他们又怎么对付咱们呢！请大家看这封信吧。什么混蛋啦，疯子啦，当心把你们关进大牢啦等等，都来啦。还说什么地主跟佃农是父子关系哪，天大的谎话！这难道不是天大的谎话吗？象这样，还算什么父子关系！”

“喂!”

“喂,喂!”

妇女们只能说这句话。

孩子们忽然大声哭了起来。母亲的巴掌立刻啪啪地落在孩子那土豆般的头上。“不许哭!这个饿鬼!”母亲真是生气了。

为了岸野的回信,佐佐老爷子和武田突然露了面。

“怎么啦?怎么啦?啊,怎么啦?”

佐佐老爷子晃着东京的报纸,用干巴巴的嗓音嘶叫着。

二 “你们想要我的命吗?”

交涉委员上小樽去了三天,就寄回一张明信片来。是阿部写的:

他没有诚意会见我们。早晨七点钟,到了他那从大门到二门之间有山有水的大公馆,等了半个钟头,才告诉说他到“店”里去了。走到他那个“店”,用了四、五十分钟。在那里又叫我们等了二十分钟,才又满不在乎地说他上工厂去了。照他们指的路,有时走错,有时走过了头,转弯抹角,绕来绕去,千辛万苦地好不容易才找到那个工厂。我是找到了,可又不晓得从哪里进去,进去了又怎么走,怎么说,才能见到他。求了不知多少人,每求一次,农民就流一次冷汗。人们的回答都是一个:到饭店去了!

到饭店一问,又说在商会。叫人真想哭出来了。晚上十一点多钟,他才在家里会见了我们。他喝得醉醺醺的,坐了一点声响也没有的汽车回来了。

“你们想要我的命吗?钉了我一整天梢!”他一开口就吼叫起来。

佐佐老爷子完全不行,说些什么“老爷说的极是,喂,笨头笨脑的庄稼人就是太任性,不讲道理……”简直是莫名其妙。

“你们要再在小樽赖着不走，当心送你们到警察署去！”最后，他说了这么一句。

尽管这样，第二天又同他谈了大约三个钟头。

“这件事，不止是你们，背后还有捣乱分子在煽动，所以不能答应你们的要求。”

所谓“捣乱分子”，据说指的就是“农民协会”。

终于谈崩了，简直不成话。如果肯定谈不成，我们很快就回来了。

阿健第一次受伴的委托，到每个佃农家去走了一趟。目的是这件事的发展趋势既然肯定了，就不要有一个人掉队。转了一圈儿回来，他已经疲劳不堪了。

“嗯、嗯、嗯！”

隔壁一家听了他的话，这样应着，脸上的神情却在说：“干啥来的呀。”

“困难是真困难，可这样干也不妥当吧。将来不好办哪。”也有人这么说。

“岸野先生么，应该结结实实地干他一家伙。”

可是，无论他走到哪里，人们都感到奇怪地说：

“喂，阿健，阿健也干起这样的事啦。”

一听到这话，阿健就连耳根子都红起来，有点心慌。

但是，只干了这一点点事，阿健就觉得似乎得到了一种强大的信心。

三 “是放在仓房里的吗？”

阿健正在房后摘老玉米，准备晚上吃。

“阿健！阿健！！”从屋里传来母亲的喊叫声。

喊声尖利，使人感到出了什么大事，阿健心想必是给人使劲揪住了脖子。

他跑进屋里一瞧：

管理人吉本！佩刀！警察！村政府的人！皮包！一样样闪电似地突然把阿健的眼睛冲昏了。

“对不起，小樽来了命令，要扣押你们的地租米。”

吉本朝着站在门口的阿健，用沉着得叫人憎恨的低音，慢条斯理地说。

阿健一声不响地向屋后走去，众人一个个跟在后面。母亲惊慌失措地跟在吉本和那个经常接触的巡警后面，反复地诉说着同样的话。

“老大娘，这实在是没有法子呀。”

巡警不耐烦地回答说。

第 十 章

一 “佃农调停裁判”

又是按照程序！

这一来，阿健也渐渐不耐烦起来了。这回说是申请“佃农调停裁判”。

“明知道白费腿脚，为啥还走这条路？”阿健的想法明确。他甚至认为，无论怎么说，阿部和伴还是年纪大了些。

然而，这次终究跟以前不同，无论如何也要“表面化”了。所

谓有社会地位的人，却出乎意料地讨厌表面化，因此有必要刺刺这一弱点。阿部和伴都这样想。

自从被扣押了地租米，佃农们也发生了变化。“还有啥父子关系呀！”连最老实的佃农也都这么说出口来了。

佃农连每天吃的米都发生了困难。但是仓房里却堆积着一袋袋米，甚至有几十袋。堆积着几十袋米也还是吃不上饭。

“只要动一点，就是犯法啊！”

巡警常常走来看看，仿佛是岸野传话过来了。佃农一听“犯法”，脊梁骨就会打颤。

从H镇回来，刚好赶上天黑了，母亲和由三一路上从别人的地里偷了些芋头 and 老玉米来。母亲一撒开揪着围裙的手，芋头、老玉米和萝卜就一齐咕咚咕咚地落到地板上。

“不要跟哥哥和阿惠说！”

一走进屋里，母亲竟然累得筋疲力尽。她想，到头来也做了贼。

“……叫咱们做贼的是岸野！……好哇，好哇，管他呢……”

她把身子一歪，就茫然若失地呆了好久。

“妈妈，我们放学回来，每天都弄点来好吗？阿由拿多少都不会给人家瞧见。”

“混蛋！”母亲突然骂了一声。

没有饭吃的佃农们，虽然没有人去叫，也都自动地分批到伴的家里来聚会。因此，“佃农调停”的事情很快就有了头绪，比原来想象的更快。

武田和佐佐老爷子老是嘀咕着：“有没有别的办法呢？”“再想想……”

伴和另外一个人被推为代表，“口头”向村长申请进行“佃农

调停裁判”。村长马上提报到旭川地方法院去。法院受理了，地租米的扣押也立刻解除了。佃农们好似一下子解开了“铁索”，感到一阵轻松。

“哎呀呀，可好啦！”

地租米立刻存入H镇的农业仓库，换成“仓库证券”^①。这证券任何时候都可以兑成现款。

二 “佃农官”

道厅里派来了“佃农官”。他那挟着折叠式黑皮包的胳膊把左肩往上抬起一点来，并且只晃着这个肩膀走路。走进伴家的屋里，他一心惦记着草垫子上的尘土和西服裤子的膝盖，很谨慎地坐着。他一边听，一边吸着朝日牌香烟，接连抽了不少支，不一会儿，烟蒂就象一根根粉笔插在炉灰里。

阿部代替伴，把经过情形从头开始按照顺序详细地讲了一遍。

“嗯，那岸野先生可有点儿过分啦。”

“什么‘有点儿’！”

“佃农官”走后，伴学着他说话的神气，逗得大家都笑了。“看他那副软弱的样儿，懂得什么庄稼人的事呀！”

“通晓实情”的当地“有名望的人”，象相马农场的老管理人、H镇镇长、S村小学校长等，被选为调停委员。

法院推事担任调停主任。

“真叫人担心，没有一个人了解佃户们的真正心情……”

^① 仓库经营者根据存粮人的请求而交付的一种有价证券。

阿健到佃农们家里走动时这样一提，就听到有人说：

“可都是些了不起的大人物呀，总会为咱们干点好事呀！”

这使阿健大吃一惊。

第一次出庭的传票来了。

因为要上法院，伴穿起并不常穿的衣裳。

“一点也不合身。怎么样？合身吗？”

“倒象是狗熊穿上了衣裳哩。”

“狗熊？真可怜，哈哈，哈哈！”

“说起来，庄稼人就没穿过好衣裳，就是穿上也不会合身的。”

临走时伴说：“这回再闹不好，那就得来最后一着啦！”

三 谁跟谁有联系呢？

“‘忘恩负义的畜生！居然到这种地方来丢我的脸，随你们怎么办好啦！’在法院的大厅里，岸野突然向咱们这样吼叫起来。

“‘不信就试试看，我要揍得你们站都站不起来！’不管他是怎样的地主，难道这是该对佃农说的话吗？我活了四十三岁这把年纪，当面给人家这么骂，还是第一回哩。

“三天之内，见了五次面，每次都被他痛骂一通。我们不是为了挨骂到旭川来的，是为了请他们进行调停。

“可是，你们想想‘调停委员’究竟干了些什么？‘喂喂，我说岸野先生！’就是这样。如果这也算调停的话，那谁都会干。

“后来，农民协会的律师跟咱们说：

“‘调停裁判’这东西名称虽然好听，其实不过是为了冠冕堂皇地压制越来越多的佃农斗争，在未扩大以前，就把它消灭，归

根结蒂，设置这个法律，就是为保护地主的安全。可是，因为外表上好看，不知底细的庄稼人出于他们善良的心愿，就以为真是成立了一个难得的东西，感到格外高兴。这一点，他们做得有多么巧妙啊！

“是的，这回我们懂得了这一点。今年整个北海道收成都不好，到处都要发生佃农斗争。只要一个地方点着火，那就不得了。所以，连别处的地主也都希望咱们这次事件能够蒙混过去，偷偷地在后面盯着调停委员哩。

“‘佃农官’却说：‘要是撤销这件事的申请，我可以请岸野先生出慰劳金给你们。就是从社会影响着想，这样做也好。’

“听见没有？他们都是同伙。

“剩下来的只有咱们这些人啦。这么一来，大家看吧，要么，咱们就窝窝囊囊地一声不响，准备上吊，横竖连一天也没得吃的啦；而且，岸野还扬言要用武力来对付咱们。要么，咱们不愿意死，同他们干到底。走哪条路，已经到了非作决定不可的时候了。走哪一条呢？

“是啊，要走哪一条路呢？”

伴述说着，自己也哭了起来。

接着，农民协会的荒川跟大家说：要成立斗争委员会，即刻准备战斗，“要趁热打铁！”

外面下着寒雨，已经快到冬天了。后来，不知不觉之间，又下了一阵雹子。就连（在阿健看来的确是“就连”）佃农们的脸上也都明显地浮现出兴奋的神色。

“竟干出这种事情来啦，畜生！”

大家冒雨回家去了。在门口撑起伞来，立刻就听到哗哗的雨声。有的人只顶了一块草垫子，肩膀都淋湿了。大家为了不

被雨声淹没，高声地谈着话回家去了。

阿部、伴、阿健、荒川和另外三个佃农，还有农民协会的两个会员，这几个人，在两天之内只睡了三个小时，为成立“岸野佃农斗争委员会”到处奔走。他们写传单、刻蜡版、印刷……阿健因为这些初次的体验感到兴奋。

人数逐渐凑足了。阿健从前曾经不问效果地到各家去奔走，出乎意料地起了作用。

去访问佐佐老爷子和武田时，他们劈面发了一通莫名其妙的议论。斗争委员会的人们搞不清楚他们说的是什么，以至无言应对了，他们就嘲笑说：

“就用这么一套反抗地主吗？”

有人反映，武田同管理人吉本勾结起来，在离间佃农的队伍。

荒川用铁笔搔着头皮说：

“这么一来，咱们对佐佐老爷子、武田、还有蛮汉子老源这些人，不能不提防啦。因为金钱在驱使着他们呀！”

寡妇阿胜叫孩子背着芋头和老玉米来到伴家。

“……！？”

阿健无法控制自己激动的感情：

“咱们流了泪，可无论如何也不能收下。”

“明白啦！只要有这个意思也就够啦！”阿部也跟平日不同，似乎有点慌张地辞谢说。

对于任何事情都容易激动的伴，一直在抽着鼻子。

“我说，阿部，咱们可一定要打胜仗啊。”

“真没想到！本来应该咱们送东西给她的，可她倒送来啦。到了她那个地步，尽管不讲话，毕竟还是理解咱们干的事情的真

正意义。”

阿健兴奋得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

在伴的家里，伴的老婆和阿部的老婆都出马了。她们爽爽利利地做完家里的一切琐事，一有工夫，就到佃农家去串门儿。“妇女团结妇女”，把妇女们也紧密地团结起来了。

死去的阿绢的妹妹也自动前来帮忙。她跟伴的老婆很合得来，干得爽利，有时还帮助写传单。她的面貌长得跟阿绢一模一样。可是她总是那么骄矜的样子，阿健觉得有些讨厌，心想：“这家伙，摆啥架子！”但一想到如果阿节这时候能来参加的话——就泛起一种孤寂的感情。不过，当有人告诉他，这个可爱的阿节，正在祈念着他这个阿健能够尽快地回复到从前的阿健去的时候，他又感到了失望。

自从开展佃农争议以后，钩鳞老爷就宣称对参加争议的佃农决不赊帐，结果就等于绝对不卖给佃农东西了。他还恫吓说，要他们立刻还清几年来的赊欠。

“你们做了社会主义者的尾巴，是玷污了日本高尚遗风的叛徒！”佃农们在店门口遭到他的辱骂。

“你们要认识到，凡是在乡军人的佃农们，如果参加了争议，就是对不起天皇！给军人丢脸！”

他还到处走动着，对青年团和“青年训练所”的人们说了同样的话。

“可是，钩鳞先生，我们没吃的，实在没办法呀！象你们这些人，也许就这样下去也成啦。”

佃农们被钩鳞一说，还是有些踌躇。可是，无论怎样，实在没法活下去。

然而，阿健知道，尽管钩鳞到处说这种“漂亮”话，却跟管理

人吉本紧密地勾结在一起，他曾为了这次斗争的事情同吉本在H镇饭店里见过面。

“这是个可怕的家伙。”

“是个可怕的家伙。单看表面上说的和做的，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有什么关系。”荒川听了阿健的话就这么说。“顺藤摸瓜，就可以发现：万万意想不到的家伙们，竟然会混在一起。”

在学校里，由三他们也受到市街区学生的欺负。

“真是不幸事件！不幸事件！”关于佃农斗争，那位“敦厚而品格高尚”的校长（阿健尤其是这样认为！）一有机会就这么说。“要是你们的父兄，有干那种坏事的，就应该使劲劝他们不要干啦。”

凡是老师讲的任何事情，由三都信以为真，回到家里就哭着央求阿健。由三在学校受人家欺负，就常常旷课，也到阿健他们这里来帮着送送信、撒撒传单。他说：

“这比上学去强多啦。”

阿惠常常跟头发搽得亮亮的时髦男人在一起游逛。

“人家都说哥哥了不起哪。”

阿健很晚回到家里的时候，阿惠趴在席子上在读小说，头也不抬地用轻浮的口吻说。

“不要脸的东西！”

“所以才说是了不起么。”

阿健不作声了。

就是因为妹妹和母亲的事，在阿部和伴面前，他真说不出有多么不光采。

第十一章

一 “开一千回会吧！”

第一次“岸野农场佃农斗争问题讲演会”是在镇上的小电影院开的。专靠各个农场谋生的市民们，还有别的农场的佃农们，也都提着灯笼远道赶了来。

屋子里挤得都要爆炸了。

阿健第一次登上讲台。他一上去就突然兴奋起来，讲到半路上忘记了都说了些什么，慌了。他只记得时时掀起的掌声，跟一些奚落的片言只语：“明白啦，明白啦！”“别说下去啦！”“是那样！”他下来走到后台时，阿绢的妹妹说：

“讲的不错呀，阿健！”

讲演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会后不到一个星期，别的农场在未掀起斗争以前，就减了租。（尽管减的数目只不过是敷衍一下而已）

然而，岸野的回答却是：“你们就是开上一千回讲演会，对我来说，还不如给跳蚤咬一口，全然不痛不痒。希望你们加把劲，再多开上几回！”

吉本带着一副“瞧你们，活该！”的嘴脸，把岸野的信送来了。

讲演会一共开了三次。然而，“可惜”的是开多少次也都没有具体的效果，总得想些办法。事实上，荒川和阿部都逐渐感到事情干不下去而有些着急了。

二 改变策略

阿健不止懒得提笔，而且从未写过信。这回他忽然想起给七之助写封信，把这次斗争的经过情形告诉他。

七之助马上来了回信：

我把这件事跟小樽工会的人谈过了。他们叫你们到小樽来。他们说，地主住在小樽。你们在那里怎样闹腾，对岸野说来，比起隔着一百里地观望对岸的火灾还不可怕。没有城市工会的支援，不跟他们一起搞，斗争就决不能取得胜利。因此，叫你们斗争委员会尽快到小樽来。

仅仅一张明信片，没想到给行不通的策略，带来了新的转机。

“是啊！要这样干！真没想到。”

斗争委员会又活跃起来了，做了一次新的整编。

他们决定分设“斗争委员会常驻小樽委员”和留守农场的“联络委员”；为了使这次斗争不局限于岸野农场，也要争取其他农场一齐行动起来，那就要顽强地进行宣传和动员工作；并且主要由农民协会S村支部根据小樽的斗争形势的变化，随时举行包括报告、示威、揭露等内容的讲演会，等等。

阿健想上小樽去，但他必须留下来担任联络委员，工作一下子忙起来了。

大家决定，把存在“农业仓库”的大米用“仓库证券”卖出去，充作斗争资金。

伴、阿部等十三名斗争委员会小樽常驻委员，由佃农们打着农民协会的会旗等旗帜送上火车。吉本和武田知道了人们要上

小樽去，就慌了手脚，兜着圈子传话说要进行调停了。

雪，从四五天以前就下起来了。满目荒凉的石狩平原，刮着玻璃碴似的寒风，把地面上冻得干硬的一层雪吹卷起来。

第十二章

一 携起手来！

情报之一：

为了同吸血鬼地主岸野进行斗争，S村岸野农场的十三名代表，远道来到小樽。

他们立刻同“农民协会联合会”、“斗争委员会”、“小樽联合工会”等，共同成立“工农斗争联合委员会”，在工人与农民紧密合作的基础上开展这次斗争。

只有城市工人阶级的力量，才能使农民们从过去的封建农奴生活中解放出来，走向光辉灿烂的社会。

农民们来到城市，成立坚强的“工农斗争联合委员会”，用这种形式反抗地主，在日本全国来说，尚以这次岸野佃农斗争为首创。值此农民运动正处于改变策略的时期，处于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而发生“地主资产阶级化”，从而住在城市的地主——不住在村里的地主逐渐普遍化的时期，这次斗争就不能不说是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情报之二：

三日晚六时，佃农代表十三人被派来小樽，在车站上受到

“小樽联合工会”大约二百名会员的欢迎。下车后，他们立刻到岸野的店铺、工厂、饭店和商会等处举行示威游行，精神焕发。

七之助来信：约有二百名工人拥到车站，阿部和伴似乎都很惊讶，眼里含着热泪。有趣的是，咱们这些人终究是农民。工会的人们也说：“我们极为激动，哇哇地欢叫起来，可佃农们却仍然一声不响。心想是他们不高兴吗，好象又不是。我们说了十句，他们却只是叫人着急，慢条斯理地说上两三句。”真的，就连伴那爽朗的声音和“哈哈”的笑声也都听不见了，只是局促地跪坐在工会二楼的屋角里。一个工会会员说：“要是有人问农民是啥样的人，那就可以回答说：那些在工会二楼尽可能靠屋角局促地跪坐着的就是。”这话引起人们的哄笑。

情报之三：

每天挎着红布带上岸野的店铺前面去游行，单凭这一点，小樽的市民已经没有人不认得“岸野的佃农”的面孔了。

六日，散发了叙述事情详细经过的传单《告市民书》一万张。

农民辛苦地“劳动”，每年还要欠几百块钱的债。写得很详细的传单，在市民中间引起了越来越大的反响。

七日，开了“第一次真相报告讲演会”。讲演的人接二连三地被勒令“中止”，立即“逮捕”送进警察局的已达五人。然而，听众却是意外地拥挤，到处发生了格斗，市民逐渐表示同情。

七之助来信：伴不熟习什么“中止”、“注意”这一套，在警察喊了“中止！”之后，还接着说了两三句，因此，立刻被拖下了讲台。

工会的竹畑立即被捕。对此，太田书记长刚一提出抗议，就被警察大骂“摆什么架子，这个混蛋！”当场挨了一顿毒打。回到工会，伴和阿部都仿佛有些消沉，这也许是奇怪的。

“我说阿七，照这样子下去，究竟会怎样呢？”伴这么说。

工会的人说，他们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凶劲儿”，所以有点害怕啦。

“虽是这个样子，可是他们并没停下来不干。”伴似乎并不了解工会方面的力量。

小樽来了指示，斗争委员会要尽快成立“青年部”和“妇女部”。“妇女部”由伴和阿部的老婆、还有阿绢的妹妹带头干起来了。

开了第一次“形势报告”讲演会。阿健对于复杂的工作逐渐有了信心。

“为啥不叫阿节也来参加工作呢？”

阿绢的妹妹开始提出了这个问题。

情报之四：

岸野的公馆、店铺和其他地方急剧地增加了看家狗。这些看家狗都戴着帽子，挎着佩刀。这样一来，事情就很清楚了。陪着佃农代表前去交涉的工会的武藤君挨了狗咬，当场被捕了。

对于交涉问题，岸野始终拒绝“正式交涉”，不承认“交涉代表”。

副警佐对武田说得很明白：“就象你们所说的，警察的的确确是资本家的走狗。你就这样看待我们好了。”

一天开两次联合委员会议，针对时刻发生的情况，讨论对付

的办法。

情报之五：

捐赠情况如下：

大米 五包 日本农民协会××分会外三单位
我们不能来参加，请以工农团结的胜利昭示天下！

大阪农民协会总会电

你们要彻底打倒岸野剥削鬼

日本农民协会××分会电

伍元捌角

市内四十一名搬运工人

貳分邮票四十张

某工人

鸡蛋柒个

某工人

阿部来信：请动员捐赠支援经费，不怕少。这样做，不但使我们在工会和农民协会联合会的人们面前面上过得去，而且更能鼓舞我们斗争委员会这伙人的斗志，请大家商量一下，赶快办。

七之助来信：阿部含着泪花跟我说：他不理解为什么跟咱们农民毫无关系的小樽工人（且不说工会会员），宁肯放下活不干，甚至给抓到警察局去挨打，也还要支援咱们。他还说：跟咱们一样穷的工人，几乎每天都捐款给咱们，这也是很奇怪的事情。

“因为都是穷人哪。因为大家的对手虽然有地主和资本家的区别，但是在受有钱的家伙们剥削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

“那倒是的，不过……竟然象这样……”他还是很不容易理解。

总之，工人们为咱们进行斗争的那股劲头，连我也感到惊

讶。这真是新鲜的事。归根结蒂，工人和农民，在最根本的地方，是血脉相通的。

斗争据说可能得延长，你们送来的五草包土豆，都使工会会员们流出热泪来啦。他们说，不是大米，而是土豆！就连饱一顿饿一顿的工会会员，也都不把土豆当饭吃。由此可见，所谓农民，他们的生活水平有多么低；而且这样下去，还不知要怎样挨饿呢！

武藤他们也说：单为了土豆这件事，也必须斗争到底！

情报之六：

到小樽来已经两个星期了。斗争委员会里的佃农，起初有不少人采取观望态度，但经过每天的交涉和集体活动的锻炼，以及劳农党主办的“社会问题讲座”（这是在百忙的空隙中举行的，收到了显著的效果），逐渐在思想意识和阶级立场上受到教育，无论是散传单，或参加其他活动，都积极起来，“动员工作逐渐发生作用了”。

斗争委员会已派了两个委员参加“工农联合委员会”，并派人参加到“交涉”、“访问”、“文书”、“会计”等部门里去，从事有组织的活动。

阿健根据情报、寄来的详细信件和每天的报纸，大体上掌握着斗争的进行情况。不管那里每天发生着多么可怕的事情（阿部来信说，我们总是吓得捏着半把汗，鼓起劲头来，由工会的人们带着干，从那以后大家都骤然瘦了下来。事情可不象在S村时所想象的那个样子），阿健也还是认为，自己没有机会接受这样的锻炼，是可惜的。

情报之七：

根据发动斗争以前申请的佃农调停，旭川法院传了伴和另外一名代表出庭。

（出庭人员：佃农官胜见、推事、调停申请人伴及代表一人、地主岸野）

推事：你们是想诚心诚意、老老实实在地来解决呢？还是要吵吵嚷嚷地来解决？

伴：我们从来没啥不诚心诚意的地方，不诚心诚意的是地主。

推事：那为什么在小樽一带搞讲演会？如果硬要吵闹，那你们就撤销调停好啦。

佃农官：要是靠吵闹得胜，那所有佃农都该不听话啦。你们这么干，我们不是很不好办吗？你们说什么没有钱，没有酱，那又为什么能到小樽去呀？

伴：是协会分会支援我们的。

这是一字未改的记录，并且只是抄了极少的一部分。

读了这个记录，就应该知道“调停裁判”实际是怎么回事了。

整个北海道都成立了“地主协议会”，暗地里援助岸野。他们也联合起来了。××支厅长给管区内“有势力的人们”发下了“不可使佃农获胜”的秘密指令。这个指令被协会分会的一个佃农弄到手了。

既然如此，那好吧！我们就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

情报之八：

每次会见，岸野都支支吾吾，或者派个代理人作不负责任的会见，毫无诚意。

他信口开河地说：“要是佃农们放肆起来，不干活啦，对北海

道的开发，就会损害很大。因此，即使不是从我一个人的立场，而是从这样一个大问题着眼，也断乎不能答应你们的要求。”

“为了北海道的开发”，说得冠冕堂皇，其实背面写的是：“因为我的收益要减少了。”

几乎每天都散发向全体市民申诉的传单。市民明显地对佃农寄予同情。这样，眼看就要发展成一个“社会问题”，就要越过“岸野与佃农之间的问题”的界限了。

我们必须自觉地、勇猛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前进。

决 议

此次岸野农场佃农远道来樽，请求减免地租。鉴于前年以来的歉收，其要求不能认为有任何不当之处，故特敦促台端迅速做出努力，加以解决。

台端如不表示诚意，加以解决，当即坚决拒绝搬运台端一切货物上岸，并决定缔结同盟，在台端工厂内实行罢工，拒买台端贩卖之商品。

以上决议，专致
岸野先生

全小樽陆地产业工人会议

这个决议挫伤了岸野的锋芒。

七之助的信上说，“工厂”也开始行动起来了。

情报之九：

二十四日晚举行“揭露警宪讲演会”，警宪表现了疯狂的丑态！会场内外布置了一百个佩刀挎得很低（以备情况不妙，随时拔出）的警察。会场周围的各个交通要道都围上绳索，隔断交通（奇怪的是，这并不算妨碍交通）。到会的听众，都要逐个盘问姓名，搜查身体，进行威吓。

印刷厂里也派了密探，阻碍传单的印刷，还抢先到各个会场去威胁说：“如果租给那些家伙，会场就要遭到破坏！”这真是明目张胆地妨害“正当的营业”。

然而，这些弹压反而使我们的斗争更加坚强，团结更加巩固。

在一起工作的过程中，阿健逐渐被这“骄矜”的姑娘吸引住了。

“阿节呀，她说阿健着了迷啦，看来似乎怪难过的。”

阿绢的妹妹对阿健说着，格格地笑了起来。她很要强，做起工作很利索。

第十三章

“妇女同情妇女”

“向地主太太请愿，

五位背着孩子的农妇昨日到达小樽！”

《小樽新闻》用这样的大字标题写道：“岸野农场十多名佃农，自三日来樽后，几经艰苦斗争。留在家中的农妇也不能安闲度日。她们说是‘妇女同情妇女’，而欲向地主太太请愿。五位农妇留下老人和儿童，背井离乡来樽。她们身穿发硬的衣服，脚穿积满灰土的鞋子，露出红呢子裹腿，背着幼儿……”云云。

阿健跟另外一个“联络委员”换了班，也到小樽来了，只是比

妇女们迟了一步。

“‘有什么脸来！’

混蛋东西！’

妇女们尽管受到痛骂，

但仍坚持不见太太不回家。”

《小樽新闻》消息：怀着悲痛的决心来樽的农妇们，立即赶到岸野公馆求见夫人。她们得到的回答是：夫人有病，不能接见。农妇们便说：不论什么地方，请允许她们住下来，宁愿每天等候会见。但后来决定暂时撤回斗争委员会总部去了。孩子们久别重逢，一见父亲的脸，就直叫“爸爸，爸爸”，被爸爸抱了起来，出现了一种很有戏剧性的场面。

农妇们又于二十一日前往岸野先生公馆求见。

斗争委员会妇女部成员之一、伴君的妻子告诉记者说：“我们想见见岸野先生的太太，详细地谈谈当年开垦农场时的艰苦情况，和如今过着多么悲惨的生活。可是，岸野先生却对我们说什么‘你们是觉得小樽好玩才跑来的吧？你们有什么脸来小樽呢？’还说什么‘变成正经人再重来吧’等等。‘变成正经人！’这是啥意思，我们真是一点也不明白。

“可是，妇女同情妇女，心想太太一定会了解我们的痛苦。好不容易才见到，就跟她说啦。你瞧怎么样呢？‘我连你们的脸都不愿意看！’我们受到了大声叫骂。

“这可真是没想到的。在我们离开家的时候，还跟家里人说，我们一定会把太太的温暖的话带给大家呢。

“‘就是你们搅得我这十天来夜里连觉都睡不好。你们这群忘恩负义的东西！’

“我们就回答说：‘不，太太，您说您夜里连觉都睡不好，不过，那光是睡不好的问题吧。对我们来说，却是每天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是多少条人命的问题。’

“可是，她最后说，不再见我们，也不再听我们说啥，随我们便啦。”

这样，岸野农场的佃农斗争，作为“社会问题”，已愈益达到了极为深刻的地步。

第十四章

“解散！解散！！”

开“讲演会”，阿健跟工会的人们、阿部、伴等一起从剧场后门走进去。在门口，巡警逐个地搜查了他们的衣襟和袖子。

“行啦！”巡警说着，就在背上推了一把。

“什么‘行啦’！”阿健突然冒起火来。

“你们可辛苦啦！”工会会员用嘲讽的口吻说着，大踏步地走进会场。

从二楼往下一瞧，只见那积雪的广场，在弧光灯耀眼的、青霜般的寒光照射之下，冻成了硬梆梆的一片。拉下帽带的警察，森严地排成一队，正在阻拦着没来得及进场的群众。眼前的近处，帽子的圆顶和黑色制服星散地在雪地上蠕动着，看上去分外鲜明。到处发生着小型斗殴。哪里发生，哪里就忽然骚动起来，就有群众从骚动的漩涡中拥出来，巡警也纷纷按着佩刀跑过去。

足有将近两千人在会场外面焦急地拥来挤去，不肯离开。

“不许站在这里！”

“不许聚在一块儿！”

“他妈的！可恶！”

巡警到处喊着同样的话。

群众喊话的声音和怒吼的声音，听来仿佛融成了一片，不时有格外尖锐的声音从人海中迸发出来。

“谢谢！谢谢！谢谢！”阿健情不自禁地反复叨咕着。

冷极了。广场上响起咚咚的声音，大家在不停地跺着脚。木屐的屐齿发出爆裂般的响声。

讲演会打一开头就充满了战斗气氛。

“那伙横暴的警宪……”

“中止！”

立刻就换一个人上去。

“资本家的走狗……”

“中止！”

凡是上场讲话的人，谁也说不到两分钟，都被勒令“中止”。

阿部和伴都讲的好多了。瞧，听众心灵的深处不是都给阿部和伴那粗放的一言一语撼动着吗？阿健的眼角里越来越多地流出热泪来，他心里想“这样不成”，而睁大了眼睛，会场就仿佛是在海底一样，看上去一片模糊。

伴的老婆也登上了讲台。这位给太阳晒黑的梳着垂髻的农妇一上讲台，单是这点就足以引起一阵雷鸣般的掌声。接着，就象受到压抑似的，马上安静下来，听众都不想放过开头的第一句。

伴的老婆兴奋得哭了起来。她努力控制着哭声讲出来的话，深深地刺进听众的肺腑。到处响起擤鼻涕的声音。

“……象这样，还能说我们的话不对吗？可是，岸野先生，他却骂我们不如畜生。”

掌声久久不绝，仿佛在要求她再讲一遍。有人在提高嗓门

喊叫着。

“这么热烈，从来没有过！”

工会的人拍拍阿健的肩膀，马上又跑开了。“这么热烈，从来没有过！”

接着上台的是工会的武藤，只讲了三句就吃了“中止！”当场遭到“逮捕！”

巡警们踏响长筒皮靴，拥上讲台。武藤敏捷地用讲桌挡住巡警，转身跳进了蜂拥而起的工会会员中间去。人群的漩涡就在那里动荡起来。听众也全都站了起来，武藤不见了。

“解散！解散！！”特务主任提高嗓门喊了一声。

听众的洪流一下子冲到了门口。阿健被拥挤到门外的時候，武藤正被七、八个巡警揪着仰面朝天地扔到捕人用的雪橇上去，就象一草包芋头，给用细麻绳一道道地捆在雪橇上。他仰面躺在那里，嘴里骂着巡警。眼看着雪橇被拉走了。大约有一百个工人聚在一块，为了把武藤夺回来，一面和警察厮打着，一面跟在雪橇后面追去。

会场前面，还站着没有入场的群众。他们同出场的人们汇合起来，发出了呐喊声。然后，形成有整条街道那么宽的黑色人流，朝警察署的方向冲去。阿健知道，是工会的人指挥着那条洪流。

阿健从后面挤开群众，摇晃着、跌撞着冲向前方。这时候，无论发生任何情况，他也都不在乎了。

他的右手不知不觉地握紧了拳头。

第十五章

一 事情起了变化

事情起了变化。

秘密成立的“地主协议会”里，逐渐有人看到几乎整个社会都对地主起了反感，这时，如果再这样顶下去，将会“成为很大的问题”。这些人劝说岸野妥协。

岸野的工厂也有发生罢工的动向。七之助正为这个拚命活动。工会会员打进工厂里来。一千名工人开始进入怠工状态，狠狠地打击了岸野。

斗争委员会为了把这次斗争发展成“社会问题”，又采取了叫全部上学的佃农子弟一起罢课，也到小樽来的战术。这消息在报纸上登出来了。注重体面的H镇和小樽的教育会开始活动，请求岸野要“防范此种不幸事件于未然”。

凡有工会会员的工厂里的工人以及港湾、陆地两方面的搬运工人们，都明显地表现出要发动“同盟罢工”的趋势。

过去一直暗暗地支持岸野的资本家，也开始劝告岸野“必须设法加以解决”。

事情迅速地起了变化。

调停委员会组织起来了。参加的人是：市议会议员五人、警察署长、律师、工会代表、农民协会代表、佃农代表、有势力的新闻记者、岸野方面的人。虽然经过几次反复，但还是连续会见了三、四次。

这样，经过小樽三十七天的艰苦斗争，地主岸野终于屈服了。那是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晚上九点四十分。

当天的传单，由工会会员向城市工人散发，由全北海道的农民协会向佃农散发了。

……现在已经证实，佃农能够从过去没有生存权的农奴，变成战斗的工人阶级的真正的同盟者。

为反对封建剥削而斗争！

为确保耕作权而斗争！

参加日本农民协会！

工人和农民团结起来！

工农联合斗争伟大胜利万岁！

二 “还有五站……”

斗争委员会在小樽工人们欢送之下，离开了小樽，一个多月以来他们在这里“豁出性命”进行了斗争。（伴时常说，后来想起这次斗争，脊梁骨都发凉，难得咱们坚持过来啦。）

还有九站就是H镇车站！……还有七站……还有五站……四站……三站……这时，大家都感觉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心情。离家越近，佃农们反而绷着脸不作声了。

伴那又宽又厚的肩膀忽然激烈地抽搐着，他哇地一声哭了起来。那张冻伤的黑脸膛，由于长久未刮而长满胡须。伴把脸伏在自己的胳膊肘上，抑制着哭声。

高兴啊！只有高兴！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

妇女们也不知不觉地用围裙掩住了面孔。

第十六章

“天天想，天天想，都想了一个月啦。”

“我说，阿健……”阿节起初仿佛是很难开口的样子，“……我爸爸，他说啦，我要是不马上结婚，就叫我到城市里干活去……”后来终于说出来了，“我，……我不能同你在一块儿啦。”阿健感到了痛苦。

“……!?”

天色虽然很暗，但阿健感觉到阿节的脸立刻象化石一样僵住了。

“……我有我的打算，我打小樽回来以后，天天想，天天想，都想了一个月啦。……想到后来，终于下了决心。……我打算上旭川去。”

“……去干啥?”

“嗯?”

“问你去干啥呀?”

“以后你就会知道啦。……”

“……”

阿节不知什么时候把她绕在阿健背后的手缩回来了。

阿健怀着坚定的决心到旭川去了，阿绢的妹妹来给他送行。

从此，他就在农民协会工作了。

(1929年9月29日)

工厂党支部

金 中 译

本篇原名《工场细胞》，发表于1930年《改造》杂志四、五、六月号。译文根据1953年青木书店文库本译出。

张着铁丝网的窗槛上攀着两只手，他那手指一使劲，窗户上露出了一张男人的脸来。

这是中午下班前一刻。在“H·S制罐厂”里，排成五行的剪刀车、冲床、卷边机、卷筒机、漏气试验机震得连水门汀浇成的底盘都在微微抖动，从铅皮房顶上传来震耳欲聋的回声。架在铁梁上的天轴的飞轮，由许多条皮带把各部机器连结在一起，从各个角度把车间的空间切成一块一块，啪哒、啪哒、啪哒老是一个调子转个不停。在这闷热晦暗的车间里，从这台机器通过传送带运到那台机器的空罐头显得格外光亮。女工们似乎故意跟机器声对抗似的大声歌唱。谁也没注意到窗台上有人在张望。

“啊！——”

“田中绢代”^①叫了一声。这个女工的长相很象电影明星田中绢代，因此厂里的人谁也不叫她的原来姓名。她朝着窗户走去。站在传送带跟前检验铁罐头的的一个男工盯着她的背影看。——窗外的那个男人已经爬上了窗台。他正把卷得很细的一卷纸从窗孔中塞进车间里来。

女工走过去，男的认出是她，脸上突然显得有精神起来。她从铁丝网中接过纸卷，把耳朵贴在窗户上。男的轻轻地叮嘱她：

“别让工头看见，分给大家。这件事就拜托您了。”

① 田中绢代(1909—1977)，日本著名的电影女演员。

说罢，他“咚”的一声跳下窗台。立刻他那矫健的后影翻出围墙去了。

中午下班的汽笛响了。机器的噪音顺着次序象被吸干似的渐渐低落下去。——顿时，女工们尖声怪气的歌声显得特别嘈杂。

“这是啥呀？阿绢！是情书吗？”

“是情书的样本吧？这么粗一捆！”

刚才瞅着她的男工凑近来说：

“写这么多情书，传明^①要哭啦。”

“真的吗？不是鼓眼^②的小伙子就不爱，阿绢的好奇心真特别啊！”

大家都哈哈大笑。

田中绢代把传单一张一张分给大家。

“嘿！这是什么玩意儿呀，一点恋爱的滋味儿也没有嘛。”

“是工会的传单嘛。”

失 业 工 人 大 会

- * 向市政府请愿！
- * 给我们工作！
- * 要求市政府保障失业工人生活！

森本他们走出低矮而昏暗的钳工车间，踏着斗车小铁道，用手巾使劲地擦着脖子，裤兜里胡乱地塞着同样的传单。

“瞧！臭铁匠来了！”

制罐部的工人一碰见他们，又照例取笑几句。

“什么？你这铁罐头！”

① 传明即铃木传明(1900—)，当时电影界的男明星，常和田中绢代合演。

② 鼓眼原文为“出目”，发音和“传明”的日本音相近。此处作双关语用。

这边的人也不示弱。

“老是削铁，当心别把自己削成干木鱼一样！”

制罐部和钳工车间的工人之间老是互相排斥。原因是一边是熟练工，另一边是跟着机器走的普通工人，双方谁也瞧不起谁。平时倒还看不出，一遇到事情，大家自然地站到自己的一边。譬如，钳工车间里，假如有一人弄不清“欢迎”和“观迎”^①究竟哪个对，于是全车间就象发生了“一件大事”一样哄起来。他们对于这么点小事总是瞎起劲。然而，大家的脑袋都一般高，谁也不比谁强多少，争论了一番还是得不出结论。这时，他们宁愿到隔一条路的办公室去请教那些打领带的职员，决不去问制罐部的工人。

下了班，工人们互相爱说些刺痛对方心坎的挖苦话，彼此嘲笑，吵吵嚷嚷地登上楼梯去食堂。楼上，椅子在地板上拖着，发出吱吱的响声，女工们哗啦哗啦的嘻笑声，再夹着咸鱼的腥气味，闹成一片。

这一天，Y市“工会联合会”给“H·S工厂”送来了大约三百张传单。连各车间里的工头手里也拿着传单。可是，在吃饭时，谁也没有提起传单的事。

吃完饭，森本等大家都走了后才走出食堂下了楼梯，一看，楼梯的阶梯上，车间的各个角落里，刚才散发的那些传单，有些乱揉成一团，有的给擦了鼻涕，扔得满地皆是。——他脸上不禁露出了尴尬的神色。

① “欢”和“观”在日语中的发音都是“kan”。

二

“H·S 制罐公司”坐落在运河边。——Y港靠西的地方是铁道部的工地。在这一带开凿了一条运河。运河的水面上浮着一层油和煤烟。机动船和扁口鱼一般平的驳船钻过水闸的桥梁下，在运河里穿梭般地来来往往。

位于河岸上的一个角落里，“H·S工厂”象一艘灰色的超级战舰似的巍立着。那样子活象一艘兵舰。罐头从产品仓库运送到岸边，直接就可装运。

Y市的人都管把“H·S工厂”叫做“H·S王国”，或“Y市的福特工厂”。——厂里年轻的工人们一到下班回家时，就脱掉工作服，换上铜钮扣的矮领学生装。中年工人和工长们都穿着衬衣，还打上领结。——Y市车站月台上的“近郊名胜介绍”牌上还写着：“H·S工厂——离此约十八町^①。”

Y市是一个海港，因此担任海陆运输的工人——码头工人和搬运夫占绝大多数，其中朝鲜人占百分之三十。在Y市所谓“工人”大凡就是指这些人。他们几乎都处于半失业状态，生活非常贫困悲惨。“H·S工厂”的工人讨厌人家叫他们“工人”。——在这一带一提到谁在“H·S工厂”工作，单凭这一点，就算是一种骄傲。

森本站在工作台旁边，却没有心思做活。——他知道厂里今天散发了传单，他需要把“H·S工厂”散发传单后的内部动

^① 一町等于〇·一〇九〇九公里。

态，在“碰头会”上向组织汇报。可是，你瞧瞧！刚才那种景象他能够厚着脸皮去汇报吗？不但工人们谁也没把它当一回事，甚至连警察出身的守卫和厂长都满不在乎。假如散的不是传单而是偶然钻进一只牛虻或马蜂的话，大家的骚动也许还要大些。然而“牛虻”和传单，这怎么能相比呢？想到这儿，他觉得这工作再努力干也是白费劲。

车间的角落里安装着一台十马力的电动机，一刻不停地发出阴郁的达达声响，肉眼虽看不清楚，却微微地摇撼着底盘。它的近旁放着一台汽油发动机，是准备停电时用的。——这地方便是工厂的心脏。从这里，一条条皮带好象干线动脉，横断车间房顶，架在主动轴滑车上；又从这里作为起点，各式各样的横皮带把不同的机器连在一起，令人感到真象人体内的动脉网。钻床、车床、冲床……尖声地切削着铁块，钻着孔眼，闪烁着火花。

在这里干活的工人们，看去仿佛他们的身体被绑在机器上，正在和机器拚命地挣扎。他们用力叉开双腿，挺直腰板，耸起宽肩，把全身的气力巧妙地集中到推动着钢凿子屁股的手腕上。好象要锉掉自己血肉骨头一样的一种不快之感，立刻传到手腕上。被切下的铁屑象水沫一样从刀口上四处飞溅。锻压车间的打铁声一阵一阵地象机关枪似的响了起来。

钳工车间发出的响声不象制罐部那样有一定的节奏。在这儿粗壮的响声和尖细的响声交杂在一起。汽锤的咚——咚——咚的震天动地响声和铁墩子上的刺耳的尖叫声混成一片……使整个工厂都处在轰隆轰隆的响声中。锻压车间的炉火给鼓风机一吹，火焰熊熊燃烧，把钳工车间工人的半片脸照得通红通红。

一架起重机吃力地吊着一只大飞轮，正通过纵断房顶的两条铁轨，从工人头上轰隆隆地开过去。这只飞轮刚从翻砂车间

铸出来，比火车头的车轮还要大三倍。此刻它被吊去放在横钻孔机上，准备在轮上开索沟。

“小心呀！咱的命可值钱啊！”

下面的工人赶紧闪过身子，对着上面喊了一声。

“躲开！别叫唤了。我要结果你的性命才痛快哩！”握着起重机操纵杆的工人，从上面向他口沫四溅地说。

“他妈的！”下面的工人装模作样地向旁边一跳。

“从上面朝下看，你们一个一个都象小黑鬼！”

“你他妈的真可恨！稍微爬高一点，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就露出来了。”

“嘿！我真想把你们拨弄着玩一玩。”

在横钻孔机旁边，四五个工人和戴着鸭舌帽的工长凑在一块儿，瞅着吊着大飞轮的起重机慢慢地移过来。

“得啦！”

调度工长举起了手，驾驶起重机的工人一看见手势立刻将操纵杆用力往后一拉，起重机停住了。大飞轮乘着余力依然在空中摇晃，起重机的铁链条跟着吱吱嘎嘎地响。四周的工人乘着它摇晃的幅度伸手扶住，顺势让它落在预定的位置上。

“过来点！过来点！”

工长做着手势，叫大家把飞轮再移过来一些。起重机的铁链条又吱吱嘎嘎地响一阵，往前伸去。大伙儿跟着嗨啊嗨嗨、嗨啊嗨嗨唱了起来。大飞轮落在两只滑轮上，它的轴和翼子扣在钻孔机的轴上，紧紧固定住了。这时，起重机又发出喧闹的响声卷起铁链条。耳朵上夹着粉笔的工人人们在刚装好的机器周围走来走去，用手去摸摸机器，流露出了松了一口气的神色。

从森本站着的地方看来，这光景就象蚂蚁聚集在搬也搬不

动的食物旁边，大伙儿七手八脚地拖呀拉的一样。人站在如此庞大的机器跟前，就象铁末子一般渺小。森本正把制罐部的涂胶机上损坏了的零件夹在老虎钳上，用锉刀锉着……倘若大飞轮的落脚的位置差了一分，而这时起重机的铁链条已经解下来了……他想：那么大飞轮就一声不响地往前倾倒下去，顷刻之间，站在跟前的四个工人的肋骨就会象窗架子一样被压得粉碎。只消差一分！为了一天挣出不到两元的可怜工资，工人们就这样拚着命干。——可是，正是这些工人却把传单擦了鼻涕扔掉了。

他把沾满机油的脏手在工作服的屁股上擦了擦，嘟哝了一声：“这样也好！”接着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三

下班的汽笛响了。大家从车间一窝蜂拥到洗脸间去。从薄薄的水泥墙壁里传出来象女澡堂一样的喧闹声。工人们脱光上身，站在只能照半个脸的破镜子跟前，满脸搓着肥皂捧着水洗脸，水花和泡沫溅得到处乱飞。只见宽阔的肩膀和胳膊上的肌肉随着手的揉搓，一起一伏地抖动。

“混蛋！照你这样洗法，肥皂要哭啦！干脆拿刀锉吧！”

“咱想和田中绢代亲近亲近哩！”

“哎呀，哎呀！你这家伙！”

另一个家伙想从人缝中挤进来，两人把屁股凑在一起不让他钻进来。

“干吗？谁想瞧你这大屁股！看我把你的屁股割成两半。你这家伙！”

“喂，对不起。这又不是阿笑姑娘的屁股。”

“是阿笑姑娘的屁股又怎么样？不能摸一摸吗？哈——哈……”

后来的人把手巾围在脖子上，有的站着，有的把肥皂块在手里抛着玩，焦急地等待着他们。

“你这混蛋！咱不吭声，你就洗起来没个完。咱又不是木桩子钉在这儿不能动了。”

被骂的人一面向脸上涂肥皂水，一面却把方向弄错了，对另一个人说：

“嘿！你什么时候变成人的？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工人’哩！”

隔着一道有名无实的板壁，就是女工的洗脸室。从这一边蹲下身来，女工们腰部以下的部位被看得清清楚楚。男工们已经惯于从腰身的形状，分辨出哪个女工是谁。他们装着洗脸的样子老不肯走，不住地向隔壁偷看。

“你瞧！数过来第三个是‘蒙那米’^①阿彩呀！”

厂里的男工老是把Y市有名的咖啡馆和酒吧间的那些稀奇古怪的名给漂亮的女工起绰号。

“怎么样？你瞧那腰身，够多美！”

“这妮子近来简直成了大人了！哼！”

“这腰身会招揽人的呀！”

“这边是谁？”

“哎——你瞧，在动哩，脚交叉在一起了。真够劲！妈的！”

“噢——”

① 法语“Mon ami”的译音。原意为：“我的朋友”。日本咖啡店常以此类字样为名。

站在后面等着的人发现他们在偷看，马上用手把并在一块儿的两颗脑袋“咚！”地一声互撞在一起。

“色鬼！”

女洗脸室里不知说了些什么，哗地一声笑起来，这边也故意提高了嗓门。

从洗脸室出来，男工和女工都从一个出口处走出去。等到回家时女工们都面目一新，和上班时完全换了一个人了。

“你是谁呀？”

一个干烟筒和汽罐铆钉活的老工人，年纪六十上下，耳聋眼瞎，简直把她们分辨不出来。

“呸！老爷子，您老恐怕连女人也不想了吧！”

一个女工在他背上捶了一下。

“别把咱当成老太婆啦！”

“这小丫头！”

下班回家的时候，女工们爱把自己打扮成“小姐”也好，象咖啡店的“女招待”也好，男工们把自己打扮成“学生”或“职员”，厂方从不加过问。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余力，对厂方并没有什么妨碍。厂长经常说：你到Y市看一看，哪儿还有工厂肯给工人如此优厚的待遇啊？

从洗脸室出来，大家在狭窄的走廊上拥挤着往二楼的更衣室走去。两旁是废品仓库，箱子象几十层大楼似的堆得老高，周围黑漆漆的一片。——喔唷，一个女工突然叫起来。一跑到这里，男工们经常跟女工开玩笑。

“你这个不得好死的家伙！”

“喂，今天上哪儿去？……”

“今天我有约会。”

“真的吗？什么约会？跟谁？”

“早就约好了。”

“这家伙！”

他们经常在这儿眼明手快地打交道。

工人们在车间里，常常一面干活，一面跟下一道工序的女工约会。男工在传送带上送过来的罐头上写上：“桥、六。”这时他光用两只手忙活着干，两眼却看着罐头顺着传送带送到女工跟前。女工一看，连忙把字擦掉，对着那个男工嫣然一笑。字的意思是：“六点钟，桥边的老地方。”象这样约会的就有好几对。

森本把眉头一皱。在这些人中间能有几个人加入自己的工作呢？他想到这里，心里异常不安，沉不着气。

更衣室的门口贴了一张布告。森本一看“嗨”地怔住了。大伙儿一边把手伸进衣袖，站在布告跟前看。

布 告

众所周知，今日有人在本厂内散发“失业工人大会”的传单。最近由于市面萧条，不少失业者被抛弃在街头，见之实于心不忍。我厂由于诸位工友之勤勉努力，幸而丝毫未受影响。诸位一出工厂就可一目了然，本厂实不负“y市的福特工厂”之盛名，无论从工作时间，工资条件，我厂之待遇均十分优厚。为此，希我厂工友切勿附和此种宣传。此布。

厂 长

森本看着这张告示，不知怎地心里很着急，匆匆地把它看完了。

“哼！想的真周到！”

话刚出口，就觉得自己竟然按捺不住认了输，不禁吃了一惊。他胡乱地戴上了沾满油污走了样的鸭舌帽。

工厂前的小街上挤满了人群。男工们和女工们向着同一方向流去。他夹在他们中间，心里却感到孤零零的，有些寒意。

过了运河的铁桥，就是海关、码头、水上警察署、轮船公司、货栈等排成一长串的码头大街。搬运夫踏着一抖一抖的跳板，从驳船上往下搬货物。可是有好几处地方，却有大堆大堆的人佇立在那里。他们都是工人。有的把饭盒叠成一叠放在地上，有的挎在手上，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在干活。——这些人都是“找不到活干”的失业工人。

夏天水枯的时候，码头上没有象样的工作。向市政府请愿的就是这些人。靠在岸边的驳船一条条象死了的扁口鱼。靠近栈桥的路口，那些卖苹果和桔子的小孩儿瞅着路上行人的腿，坐在那里发呆。

那些“找不到活干”的人们瞅着“H·S工厂”的工人们从铁桥上走过去，脸上明显地露出非常羡慕的神色。“H·S工厂”的工人们也摆出“与众不同”的架子大摇大摆地从他们的跟前走过。即使没有那张贴在更衣室门口的布告，他们平日的态度也是如此。

搬运夫——这些运输工人受着“把头制度”“现场制度”等各种各样残酷的封建剥削，过着抬不起头的受压迫的生活，一有机会，他们就闹罢工。Y市的“工会联合会”就是以这种工人为主体的。“H·S工厂”的工人可以说没有一个加入工会的。

森本在这些搬运工人中看到了好几个熟人，都是曾经在工会中见过面的。但是现在，他和本厂职工们走在一起，已失去了和搬运工人们说话的勇气。

四

父亲还没有回来。——六十多岁的父亲每天比儿子早一个钟头出门，晚两个钟头才回家。他在“山三货栈”做工，耳聋眼花，电话也听不清，规定的工作还不能做完一半。把头每天没有好脸色给他看。可是因为他已经干了二十年的活，把头也拿他没有办法。

“真够呛……”

父亲唉声叹气，每到早晨，总不愿意出去上班。

“干活倒不要紧，只是把头的脸色真叫人难受啊……”

天还摸摸黑，父亲穿起干活的衣服站在台阶边，伸着懒腰，骨头格格作响。森本一听到这声音就感到难以忍受的痛苦。可是，他突然又想到父亲将来也许还会有更悲惨的遭遇。

屋子里因为整天暑热，翻腾着湿气和尿臊味儿。湿漉漉的铺席皮已经鼓起来，脚踏在席子上直发粘。

森本只穿一条裤衩坐在矮桌跟前。这时，来了一封信，是“中野英一”寄来的，她是厂里的女工。这个女工是森本好不容易才找到的。他要通过这唯一的“立足点”和女工们建立联系。他从工会的河田那里，已得到了关于工作方针的指示。信写得很简单：“详情面谈，明日八时在石切山下等你。”因为曾经告诉过她，所以自己的署名和收信人森本的名字都没有写。

夏天天黑得很晚。不知什么时候刮来一阵阵象从扇子扇出来的微弱的风。那些住在杂院里，白天穿着一件白汗衫在小胡同里蹒跚的人，此刻也回到蒸笼一般的屋子里去。一群小孩儿

拿着小棍子，露着胸膛，在阴沟板上啪哒啪哒地跑来跑去。在残照犹存的蓝晶晶的天空里响起一片叫闹声：

“你们这些饿死鬼投胎的小鬼们！天黑了，还不回家？”

父亲回来了，在大门口咯隆咯隆咳嗽着。

“爸爸，你那儿怎么啦？”

“嗯。”

他知道父亲一向反对“工人大会”和“工会”这一类活动。这也许是父亲干活能干了二十多年的原故。如今，饭碗虽然象吊在一根头发丝上那么危险，但仍以为自己不是个“零工”，如果卷进这种莫明其妙的圈子里去，那就糟了。

“事务所门前的气势真不小，都是那些找不到活干的家伙。”

“那些人都是工会里的！”父亲好象是在谈新闻一样毫不关心地说。

“爸爸！这不是别人的事，你要是被裁掉的话……”

父亲没有回答，在昏暗的“土间”里来回地摸索着走。天稍黑，父亲昏花的眼睛几乎什么也看不清。他绕到屋后去了。在厕所旁边，父亲七歪八倒地搭了一个棚，上面放着三盆花，可是厕所仍臭得要命。父亲一出去总要在夜市上买一些便宜货的花回来。

“你这败家精，饭还吃不上，还买这种东西！”

每次买花回来，母亲就发脾气。要是别的事情，两口子早就吵开架了。可是为了这几盆花，父亲也真怪，总是笑嘻嘻地从不回嘴。父亲看重这几盆花儿已到了可笑的程度。一回家来，不进屋子，一定先去浇花。有时自己没有空浇，才托给别人。倘若别人给忘了，他可要认真地发火的。——森本笑他，真可怜，这是奴隶根性在找出路哩！

“天这么热，花都萎了。”父亲独个儿在屋里嘟哝。

就是在“H·S工厂”里，也有不少年纪稍大一点的工人，有的喂个小鸟，有的弄些各种各样的花草，一丝不苟地按时照料它们。有的每到休息日，就在家里修理细巧的小家具。有一个工人还拿一盆花到厂里去，放在自己干活的地方。

“人家说，花一般的美人，我这个却是美人一般的花。咱就看着美人似的花过活吧。”

放在车间里的花，由于机器油臭味的熏染，铁屑和尘土的飞扬，以及机器轰隆声的冲击，人们发现它搁不到一个星期就枯萎了。

“嘿！”大家都睁大了眼睛。

“要是人会怎么样呢？”正好在一旁的森本插上了一句俏皮话。——他说了之后，意识到自己这句话有很大意义。

冲床工武林轻蔑地说：

“到夜市上换一盆来就得了呗。可是工人呢？不是说有选择职业的自由嘛。哈……”

武林是个无政府主义的工人。在报社里有几个印刷工人的朋友。

不知父亲在屋里嘟哝些什么。声音听不清楚。只从沾满油污的玻璃中看见他的嘴在翕动。

“有没有一毛五分钱？”他不好意思地说。

“又来了。”——森本想。“唔。”他答应了一声，父亲脸上立刻露出了孩子般喜悦的神色。

“那儿有盆好花。每次上街去我就想买下它来……”

五

他等着天黑。因为这个“碰头会”必须秘密地进行。

“我出去看场电影。”

他对家里人这样说。

屋子里还有白天的余热，杂院的人们在家里坐不住，一吃过晚饭就敞开大门，把凳子搬到门外来乘凉。小街上阴沟里虽说是臭气扑鼻，但比起家里仍凉爽得多。好多人都赤着膊，近邻的人们正在高谈阔论。青年男女便蹲在离得稍远的暗角落里，只见圆圆的白扇子在黑暗里挥动。森本边走边跟他们打招呼，穿到大街去。在这条街上住着工厂里的工人、码头上的工人和“打零工”的人们，各自的心情都不一样。

这一带是Y市的尽头。虽然是尽头，但属于Y市。可是住在这T街的人们有事上市中心去的时候，老说“到Y市去一下”，他们好象是从老远的乡下进城去似的。就连公共汽车、出租汽车、人力车等要开到T街来时，都和市郊一样另外加钱。——这一带很暗，又非常潮湿，四处臭气熏天，又被煤烟熏得漆漆黑，是一条工人街。这些象压扁了的羊羹盒似的连檐杂院里，都是在简直无法落脚的湿地上安放睡觉用的草席板。

森本拣黑的地方走，只有拐弯的时候稍停一下。“碰头”的地点特地选择在一家面向热闹明亮街道的房子里，从后门进去。他按照预先约定的方式先在房子跟前来回看了两次，然后转到后门。一开门就是一张很陡的楼梯逼在眼前。他用脚尖摸索着阶梯一级一级爬上去。粗木做的阶梯在他脚下就象只吊桶似的

发出轧轧的响声。他弯下他那稍微有点驼的宽肩膀，局促地往上爬。头“咚”的一声撞在楼板上。

“谁？”

灯光和河田的声音同时传了下来。

“森！”

“啊！是你，辛苦了。”

屋子里烟雾腾腾，蝙蝠牌的烟头和纸制的烟嘴在烟灰缸里堆挤不下，乱七八糟地撒在铺席上。看来好象已经讨论好了别的什么问题了。河田站着，等森本进来以后，亲手关上门。他的脑袋大得象石臼一样，头发剃得很短，再加上又高又大的身材，看上去真象一个“凶僧”。他说话态度生硬粗鲁，也许使人们觉得他有点傲慢。可是工会里的人说，正因为这样，他才有一种稳如泰山的气魄。

石川仰卧在铺席上，用香烟锡纸做着银杯，一看见森本，就抬起头来打了个招呼。

“唷！”

石川原来在“R翻砂工厂”做过工，老早就跟他很熟，他认识河田也是经过石川介绍的。石川加入工会以后，森本从他那里接受了这方面的种种教育。在这以前，森本和其他工人一样，嫖娼妓女，看看电影，吃吃零食，再不然跟别人打架。自那以后，青年团的演说会也干脆不去了。

另一个叫铃木，森本以前只和他见过一次面。这个人似乎有点神经质，在这些人中间他的脸色最难看了。他老是有点不高兴的样子，说话很少，因此森本还觉得他不好亲近。他抱着膝盖，摇晃着身子。此刻他站起身来打开窗户，让屋子里的烟散出去。顿时，一阵波涛般的响声传了进来。楼下的柏油马路上，人

流陆续不断地来回地走着。刚才的响声就是他们的脚步声。铃兰花形的电灯从两旁伸出了长长的臂膀，照耀着下面各色各样的夜摊：卖树苗的，卖旧书的，卖钢笔的，卖水果的，还有中国人，大学生……人流象两条宽幅的传送带从两侧向相对方向流去，好象永远也不会停止。

“闲着的人真多啊！”

“铃木君，别伸出头去，危险！”河田正在排列油印文件的号码，抬起头来说。

“伸出头去危险吗？哈……简直跟坐火车一样啦！”

“那么，我们谈吧！”

四个人围着烟灰缸坐定，河田皱起眉头，急忙忙地抽着烟说：

“我们跟森本君只见过两次面，也许对我们的态度不太清楚……简单地说，我是这样考虑的……以前日本的左翼运动可以说相当活跃。特别是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领域内都很落后，但由于战争以及其他各种原因，使得资本主义急剧发展起来。在外国需要十年功夫，日本五年就完成了。这就是说日本的无产阶级也迅速地成长起来。这回又加上了战后不景气，因此，日本的工人运动才会这样活跃起来。可是问题就出在这个‘活跃’上。为什么会活跃？问题就在这里。拿我们来说，这还是‘三·一五’事件以后才开始弄清楚的……简单地说，为什么会活跃呢？是因为运动在工厂里没有扎下根。也可以说是因为我们在大工厂和重工业工厂里根本没有插手进去。就拿Y市的情况来说也是如此。这里，工会的实际势力是码头工人，而这些人零碎分散的，实际上是半失业工人，没有固定的工作岗位。正因为如此，诚然在有事的时候很好动员，表面上看去确是

轰轰烈烈。所谓日本的工人运动很活跃也就是从这里来的。但从组织上来说，那就等于零了。我们开始时是从三三两两、零零碎碎起的头，等到事情一完，也就复归到三三两两、零零碎碎。从统计数字也可看得出来，在运动期间，大工厂象睡着的牛一样一点也没有动。工厂动不起来当然有其原因，那些只有几架小机器的小厂子且不说它，而有几千几万工人、高度发达的大工厂，要他动起来可不容易。——虽然不容易动，但是除了‘组织大工厂’以外，我们的运动就绝对开展不起来。这话现在说也许早些。与其让附近小厂展开几千次小斗争，还不如夕张、美呗两大煤矿罢一次工，那日本的重要产业立刻就得停止。这决不是说大话，要罢工就得向这个方向进行。——象现在这样的罢工干脆别搞。因此……哎呀，说着说着就象老师上课啦……”

河田摸了摸“石臼”似的头。

“总之，详细的事情以后有机会再慢慢的谈。现在还来说这件事情也许会觉得奇怪，无论怎么说，‘三·一五’事件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付出那么多不必要的牺牲呢？这是一个问题。其原因在于我们的前辈们搞惯了刚才所说的那种轰轰烈烈的运动，老毛病改不了。这本来应该是秘密运动，但他们有时却象金鱼那样把身体浮到水面上来。换句话说，在工厂里没有扎下根，没有深入到最底层处去工作。——按理说，我们的工作必须深入到工厂最底层去，必须好好地把自己隐蔽起来干的。可是我们却误认为要搞工人运动，便是站到讲台上，大喊其诸位……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拿着传单到街上到处散发。——事到如今，日本的工人运动已经很明确了……”

“可是，老实说还是一点也不明确。真可怕。”石川打断了河田的话，把锡纸做的银杯竖立在空香烟盒上，脸上带着一向那种

似笑非笑的样子，亲热地对森本说。

“我们就象掌着破船上的舵，把舵柄转了一个钟头，好容易才听话了。我们过去在运动中的错误实践也留下影响，这影响是很大的。再加上在厂子里的工作做得很保守。本来呢，在厂里工作愈做得保守愈好……因此这就太难啦——”

“这是真的，为什么我们一开口就口口声声说‘在工厂里要有隐蔽的组织’呢？其原因就在于此。比方说，象Y市这样，我们组织一千次浮在上面的工会，假如有一千次‘三·一五’事件，那么这工会也会一千次被搞垮的。这样一来，什么革命，什么暴动还不是一下就完蛋了。这话听起来好象是惊人之谈，但实际上确是如此。最近，战争危机似乎日益迫近了，市面虽然萧条，可是官办的兵工厂好象还在暗地里增加工人。M市的S工厂等已经从三千人增加到五千人。如果我们在这些工厂里建立起组织，当然表面上不但不‘活跃’，不‘轰轰烈烈’，而且是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一旦战争爆发了，这个组织就可行动起来，举行罢工，反对制造武器。武器制造就会立刻全部停止。假如这一斗争发生在大阪那样的地方，而且不止是一个工厂，那么战争不就马上停止了吗？可是这些话拿去对Y市的工会讲，谁也要说我是在说梦话。然而，今后我们的工作必须拚命地按照这一方式去做，否则一朝有事，就象召集一帮叫化子一样，什么事情也办不成。”

“我们正想这样干，因此我来……”

“这事情弄糟了。”石川说。“我不应该离开工厂，是不是？河田君！”

“可是当时的情况是：好象不到工会里去刻蜡板，散传单，就不能算是搞‘运动’似的！”

“是啊！说实话，那时候呆在工厂里什么事儿也不干，良心上也说不过去啊！”

森本插了一句话：“但是工厂里的工作也真难开展啊！大工厂里已经没有‘猪仔馆’了。”

他把今天工厂里发生的事详细地说了一遍。河田很用心地倾听着。

“一点不错。”河田说。“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老是不去发动工厂，那是错误。”

六

河田要森本把“H·S工厂”的地图画出来。河田的手头还有市内其他各种各样工厂的地图。他摊开Y市的全图，在“H·S”这个地方打上了一个红印。

“水上警察署离开工厂很远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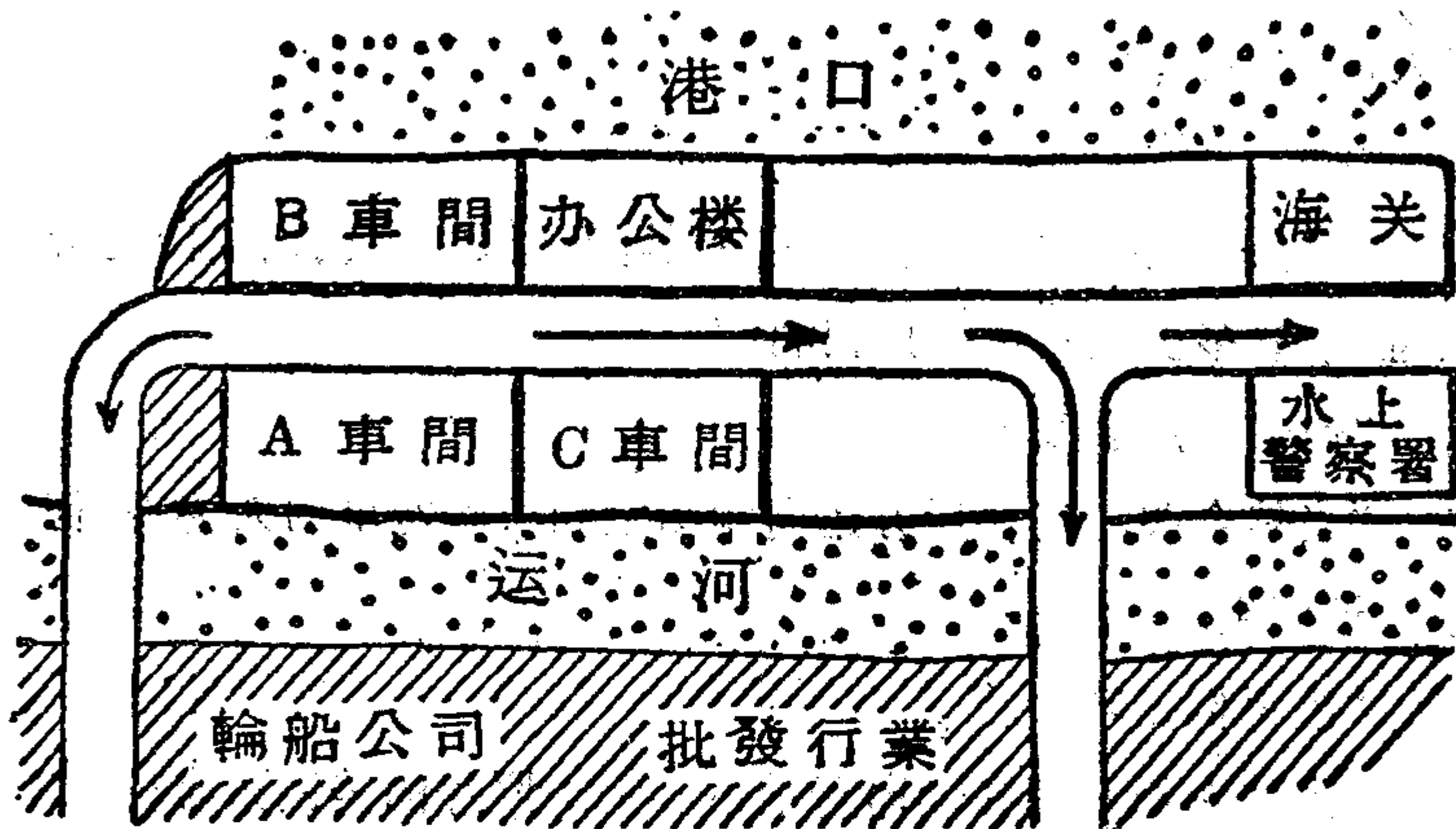
“大约有四……四百米左右。”

“四百米？”

“刚好在一个不好的地方。”

石川抬起头来说：“这个市的水上警察可厉害。”

森本把工厂的情况说了一遍。“A车间是制罐部，它分成制造罐身和罐盖两部分。制罐身这部分工作是把马口铁剪开，卷成圆筒，盖上罐盖，然后试试漏气不漏气。这一部分的机器有剪刀车、冲床、卷边机、卷筒机和漏气试验机。制盖部分有压马口铁的冲床、弯形的剪刀车和盖口上涂橡胶的涂胶机。B车间楼下是涂漆车间，把罐头涂上漆，操作是保密的。楼上是制造罐头



木箱的木工车间，做着横板和竖板。空罐头和空木箱做好之后，就汇集在二楼的装箱间里，装好运出去。C 车间就是森本所在钳工车间。”

“此外还有什么附属机构？”河田问。

“还有实验室，专门研究橡胶和涂料的。实验室里有一个人对我们很了解，据说是被什么大学开除的。”

“恐怕是自由主义者吧！”

“还有一个制图室，研究什么‘产业合理化’的。”

“噢！‘产业合理化’？”河田说话的声调有点变了。

“‘H·S 工厂’首先变成完全的传送带系列，据说是靠了这个制图室的人。那时候，曾经一度要裁掉很多工人，终于发生了罢工。工人们半夜里冲进工厂，把守卫揍了一顿，然后把传送机上的皮带统统弄个稀烂。因为一个操作接着一个操作，中间一点空隙也没有。每个人专等着传送带慢慢地把空罐头送到自己跟前，各人赶紧得把自己份内的工作做完，这是谁也受不了的。

还有卷边机等机器过去都有工人管着，现在因为自动化了，一个工人也不要了。”

“唔。”

“现在厂里搬运马口铁板还在用斗车，假如这也改成传送带装置，该有多少人被撵出厂门啊！”

“他们一定会改的。”

“当然会改。现在厂方还向制图室和实验室里的人悬赏征求设计图纸。”

“搞得倒挺巧妙。”

“那些人经常都在读印着马达和锅炉照片的美国杂志。”

“今后我们进行工作的时候，除了工人以外，还必须有一种象厂方所谓的‘高级政策’。我们也要利用这些上层人物。这一点请大家考虑考虑。”

森本点点头。

“关于工厂的情况，我所知道的真是少得可怜。”

“我想也是如此。……那么……”河田眼睛瞟了一下手表。

“是啊！”

石川打了一个小小的呵欠，好象有点累了。

“唔。其次工厂里有没有对立关系？……我想一定会有的。”

“是的。车间与车间之间是有的。钳工车间都是熟练工人，而制罐部的活儿，那是连女工都能干的。因此……”

说到这里，森本用手搔搔头皮。河田第一次看到他那羞怯的脸容。一向使人觉得是一张四方形粗鲁的脸，一笑起来，轮廓就松开了，眼角露出一种对人亲热的温柔。这倒是出乎人意料之外的。

“象我们这些人，动不动就说自己是金属工人，是闹对立的

大将。再就是打零工的和搬运夫之间的工人关系不好。对办公室里的职员也不好，这恐怕到处都相同的吧！女职员大多都是女学校毕业的，首先服装就大不相同。有时候，她们有事情到车间里去，女工们吵吵嚷嚷可厉害哩！”森本说着笑出声来。

“男工们一看见衣服穿得笔挺的职员大人，就羡慕得不得了。厂方有这么一个规定，凡是勤奋的工人都可以提升为职员。厂方把这条规定确实使用得很巧妙。好久好久以前，他们无可奈何地提升了一两个人。就这么一次，以后再也没有了，可是这种做法好象很起作用。”

河田比谁都听得仔细。铃木一直到最后都没有吭声。他一会儿啃啃大拇指的指甲，一会儿又搔搔头。有时也抬起头来听几句。

森本从河田那里接受了到下次“碰头”为止的调查事项，那就是“工厂调查表”一号、二号。

河田就用这样的方法，先对Y市内的“重要工厂”充分地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他打算在这些工厂里建立组织，把工厂的代表召集在一起，建立一个“组织”和“联络机构”，即所谓“工厂代表会议”。——河田是抱着这样巨大的意图进行工作的。假使一个工厂发生了问题，马上通过这个机关，就可作为Y市所有工厂的问题。这个工作要隐蔽到地下去，踏踏实实地一步一步地向前进行！只有这样才能抗得住敌人的任何“镇压”。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根基雄厚的各产业工会。——河田眼睛里闪烁着光辉，把他的意图对大家说了。

“这样的事，资本家早就做着哩！工厂老板的什么‘三三会’‘星期三聚餐会’，就是在这些名称之下，互相通气，互相联系的。”

森本双手攀住两旁的扶手，挺着身子走下黑漆漆的楼梯来。河田也跟着下来了。

“你是重要人物，绝对不能让警察发现你。”森本的面颊上感到河田吹过来的一股热气。

“你要把自己当作一个细胞，到工厂里去进行工作。”

他的右手在楼梯下漆黑一团中被河田紧紧握住了。

他走到外面，心里仍然贯注在刚才的那番话上，虽然拣着小街上阴沟板小心地走，但仍然绊了好几次。

“细胞！”

他重复地念着这两个字，说着说着从心底里感到一阵兴奋。

七

“碰头”的时候，来也好，回去也好，大家都不走在一起。因此森本和铃木就各自分头回去了。

“我即使被‘凌迟’了，也得把这个工作干下去，也许是要拚上这条老命的。可是……”

河田为了跟先回去的人保持一定的间隔，晃动着宽宽的肩膀等在一旁，说道：

“听说警察这样说过，我也好，你也好，铃木也好，都是露了面的人，一点也不可怕，今后要注意的是还是没有露过脸的家伙。这些警察已经掌握了我们的运动的方向，所以他们的特务政策也改变了。对于那些在特高科①那里挂了号的人，他们已经

① 特别高等科的简称，日本警察机构中的特务机构。

不重视啦。”

“哼，好厉害。”

“这和搞合法活动不同，搞地下工作，当然会有这样的奸细钻进来的。但是最可怕的是还是自己人当了奸细，或者是中途被人家收买去当奸细。当然，提到收买，现在还为时过早……”

“喂！喂！别扯了！”石川不耐烦地说。

“哈……你要是已经被收买了的话，就把今晚上的话都泄漏出去好了。对特高科来说，我不过是搞工人运动的，和明目张胆的合法主义者一样，再可怕也有限。因此可怕的不是外部而是内部。”

“你又在说那些吓唬人的话了。”

河田懒洋洋地搔了搔自己的石臼头，笑了一笑，又加上了一句：“我说的都是真话。”说罢看了一下手表。

“好吧！今天我先回去了。”

河田离开他们，绕到百货店门前的柏油马路，一只手拿着一块手帕往前走去。一蹲腰就可以看得见小杂货铺的挂钟，此刻正指着八点。他在这一带来回走了两次，他要在这儿会见一个吸着“敷岛”牌香烟的人。从那个人信上所写的日子算起，今天刚好是第十天的晚上八时，正是他们约好的时间。他一边注意着正面，一边买了一张三分钱的邮票。——这是他们会见时候的记号。他刚从小店出来，就注意到迎面来了一个穿西装的人正吸着“敷岛”牌香烟。他把他的服装打量一下，感到有点踌躇。可是那人的眼睛明明是在找人。他不由主地使劲握紧拿着手帕的那只手。

那个人走近来了。他也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和那个人向同一方向走去。他突然开口了。

“我是山田。”

那个穿西装的人马上回答：

“我是川村。”

“山”和“川”对上了。两个人便顺着行人稀少的河边往下走去。走不多久，那个人就问：“有没有可以休息的地方？”

“这个……”

河田向两旁找了一找，最后上了一家小饭馆的二楼。

两个人在桌旁坐定。那个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三分钱的邮票，那印着“三分”的地方，“三”字已经用墨水涂掉了。河田也把刚才买的那张三分钱邮票拿出来。那个“分”字已经涂掉了。这才完全证明两个人是“同志”——那个人是党中央派来的组织员。

河田把Y地区的情况和发展党员的数字向他作了汇报。

八

铃木只要跟河田、石川他们在一起呆得稍久一点，自己就感到很痛苦。他心里觉得一点也不愉快。说得一点也不夸张，他感到自己跟所有一切东西都是隔绝的。他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摆脱这种感情。——这样的感情不是无产阶级应有的！自己究竟是相信“革命”才参加革命的呢，还是相信“人”才搞革命？不管河田和石川对自己有什么看法，但决不能因此使自己对革命的“心情”有所改变，而且也不应该有所改变。对！这一点他是懂得的。然而接着就会浮起一阵“寂寞”之感，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他知道自己已经踏上了迷途了。

无论从理论上，实践上，或者从个人感情上，自己都还在挣扎着，却眼看着别的同志们大踏步地赶到自己的前面去了，这使他感到比拷问还要难受的痛苦。别的同志似乎一点也没有自己这种迷途之感，他觉得很羡慕。——可是他又知道他们搞的这个无产阶级运动，并不象外表上看的那样那么壮烈，那么纯真，而是充满着丑恶的勾心斗角和比小商人还要坏的讨价还价。他失望了，简直到了可怕的地步。

“说起革命，你还是河田他们的老前辈呀。”

这句话的后面就是说“你这还不觉得难受吗？”——这是那一次因为散发传单在拘留所关了“二十九天”时警察对他说的话。当然，他知道这是特高科惯用的手段。

“你这个人真迟钝，你跟他们一起工作，却还不知河田和石川他们早已不把你当自己人了。”

他不吭声，脸孔朝着外面。——可是他的意志却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他感到脸上“刷”地发白了。

“你一定以为我们在‘离间’你们吧？”特高科主任轻轻一笑，又说：

“老实告诉你，这种手法我们是经常使用的。可是这是不是‘离间’？我想你比我们知道得更清楚。那一天，我也曾和石本君说过，铃木真可怜，老是一个人吃闷气。但他还跟他们一起搞革命，可真有度量啊！要是咱们，这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

“……”

“实话对你说吧！”

特高科主任突然低下了头。他的话还没有说下去，铃木不由得感到一阵毛骨悚然的恐怖。

“这些话我们是不轻易说的。我们用了一个策略——这也是

咱们号称世界第一的警察网的力量——已经得到确凿的证据，知道河田他们已加入共产党。可是，你却没有加入。正因为你没有加入，所以才对你说的。是实是虚，你自己应该知道……”

“……”

“说来也奇怪。当我们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不知是喜还是悲。你也许要说，听到没有加入共产党，高兴不高兴那随你的便。好，这且不管它。反正我们吃的这行饭是不会讨人喜欢的。不过我们想，所谓‘同志’，应该有一种我们这种人无法理解的互相信赖的深刻的感情。可是你却被他们出卖了。当我们知道了你的处境，对你真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凄凉和暗淡哩！”

“别胡说！”

他心里一团东西涌到了喉头，很想一下子把它倾吐出去，所以大喊了一声。可是心里却压住了满腔眼泪。

特高科主任把铅笔逗在手里玩，眼睛盯住他的脸看，沉默了一会，又说：

“这还不算，此外还有什么交涉费啦，斗争费啦等等，他们拿到手的钱，分配给你时，你也不知道受了多少欺骗。我们也有充分证据，证明河田他们把这笔钱都拿去吃喝玩乐了。——这也算甘受清贫吗？……”

这些话不管是真是假，可是正一点一滴地说出了他内心怀疑着的事情。

不去管它，不去管它，可是一这样想，却使他的思想歪向一边了。今后，他再也不能坦坦白白地跟河田说话，再也无脸去见河田他们了。一方面他心里慌张，眼花缭乱，连自己都觉得可笑。另一方面觉得心里没有着落，对河田所说的话神经过敏得象剃刀一样。

这是不久前的事。一个经常到自己住所来的便衣警察在街上看到他，就走近来笑嘻嘻地说：

“你的房租欠了不少了吧！”

“啊！原来是你啊！”

他站住了。那便衣警察哈哈大笑起来。原来四五天以前，有一个自称是铃木的朋友，到他住宿的地方把他欠的房租都付清了。

“我付了也一样嘛！这种事彼此都得帮忙，并不是要你领我的情。”

接着，他说有一点小事要向他打听。这个嘴边留着四四方方红色小胡子的家伙，向四周围看了一下。

两人找到了一家从大街进出的“蒙那米”咖啡店，推开弹簧门一直登上了二楼。——便衣警察给他要了啤酒和牛排。

“我先声明，你要请客那是你的事，我可不……”

话还没有说完，便衣警察就挡住他。

“我懂得了。你不要太死板了。偶然一次我们随便谈谈嘛……我们当警察的也得交朋友嘛！”说罢，他嘻嘻地狞笑起来。

铃木想：这下糟了，受了警察的影响了。那天他竟然喝了个烂醉。

这一夜在“二楼”碰头的时候，河田似乎急着要先走，但结果还是铃木先离开了。他再也忍不住阵阵逼来的心头上的压迫。——他回到住所，说是有人给他留下一包书。他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拿到二楼解开来一看，是一本没读过的武侠小说。他拿起书脊一抖，两张叠得好好的十元钞票落在变成茶红色的铺席上。

他的脸色“刷”地变了。这倒并不因为落下来的是两张十元钞票，而是突然注意到自己身不由主地拿起书来抖的这个动作。

他拿着钞票走下楼梯向大街走去。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

九

“阿君！阿君！君丫头！”

二楼的装箱车间里，男工和女工站在传送带的两旁，把空罐头装到箱子里去。钉好了的木箱从二楼的自动电梯送下来，直接装进靠在运河码头边的船上。——将近中午的时候，罐头装完了，工人们用手巾拂掉身上的灰尘，从昏暗的楼梯走下来。这时候，从“成品仓库”黑漆漆的门洞里，有人在低声轻唤着。阿君把围裙稍稍整理一下，“嗤”的笑了一下，急忙向四周围一看，也不出声。

“君丫头，别叫人着急呀！”

阿君又嗤的笑了一声，一纵身跳进了仓库。

“哟，真黑！”

她故意提高嗓门说，两手捂住眼睛。好象是捉迷藏找人的样子。

“在这儿！”

“……”

男人的手搭在她的肩上。

“讨厌！”

女的闪过身子，躲到一边去。

“讨厌，你，撒手啊！”

“……”

阿君感到男人的胸膛贴在她身上，却把身子躲躲闪闪的，不敢往跟前凑。

“快撒手！呐，嗯？”

女的被男的抱着，心里却奇妙地感到兴奋和有趣。男的硬把她的手推开，另一只手绕到她的身后，把她紧紧地搂抱过来。女的在男的胳膊弯里，身子扭来扭去，仰着脸故意躲来躲去，避开男人的嘴唇。男的便在她的面颊上、额角上亲吻。

“不行！有人来啦！”

男的焦急地在喉咙里哼一声。阿君终于大声地笑了起来。她踮起脚来，把一只手搭在男的肩上。

“你倒挺内行。”男的说。

“当然罗。别叫你以后养成了习惯。告诉你，咱们俩就到此为止。”

阿君看到男的被自己弄得团团转，心里觉得好笑。——她说罢，一转身，兴奋地从楼梯跳着走下去了。

然而，过了中午，阿君就不这么兴奋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女工们照例在饭厅里吵吵嚷嚷，让伙伴们给自己占地方。阿君被自己要好的女工叫了去，坐在她旁边吃饭。

“喂，我跟你说——”

那个特地把阿君叫到自己身边的多嘴多舌的女工悄声地说：“真把我吓一跳！”

这个女工昨天下班后因为要收拾东西，比大家晚走了一步。车间里已快黑了，她才从更衣室走下楼来。楼梯口正好有一间“谈恋爱”的小屋子。她走到这里不知不觉地停了一下。她觉得

小屋里有入。她从站着的地方稍稍弯下身，从镶着玻璃的高高窗口中，有一对男女的影子在晃动。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

她说到这儿，又放低了声音。

男的背朝窗口，正在束裤带。女的脸向窗户，低着头用手整理头发。男的束好裤带后，抄过手来搭在女的肩膀上，另一只手伸进裤袋好象在掏什么东西。

“在摸钱呀，男的把钱放进女的腰带里啦！你相信吗？”

“……”

“你知道那女的是谁？”

她那两只眼睛不怀好意地滴溜溜地转，盯住阿君看。

“你知道是谁吗？”

“那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还不是常有的事嘛！”

“……？”

“是阿芳！”

“别胡扯！”阿君本能地反驳她。

“哼！你不相信就算了。”

那女工耸了一下肩膀。

阿君沉默了一会。

“对方是谁？”

“对方？那是挣钱的事儿，还不是每天换一个，谁都行。”

那个整天哆哆嗦嗦嘴唇上没有一点血色的阿芳，一个人养着四口之家。——阿君想起了这件事，她对那个嘲笑人的女工，不由得动起火来。

“可是你想想，我们一天能挣多少钱？五毛到七八毛一天，一个月挣多少？你算算！——你以为她愿意干这种事吗？要是

喜欢干，她就不要钱啦，白让人家……”

阿君吃好饭站起来，狠狠地训了那女工一顿，抢先走出了食堂，心里还有气：“真欺侮人！”

十

下午据说有女学生来“参观工厂”，男工们都骚动起来了。

“才怪哩！穿工人服的和女学生凑在一起真合适！”

女工们一听此话显然露出反感。

“很难受吧！女学生一来，这儿的小姐们的眼色都变了。真厉害！”

“说起眼色，到底是谁的眼色变了？”

“喂！不要太糟蹋人啦！也许会有大学生来参观的呀！”老是喜欢说些讽刺话的工人说。

“来了又怎么样？大学生和女工配成对，现在倒很风行！”

“难道还等聂赫留朵夫^①来吗？”被称为“艺术家”的工人插了一句嘴。

“女学生来参观后，奇怪的是小姐们的脾气都和气多了，还是偶然来一次的好。”

老年的工人有点听不下去，说道：

“别‘狗打架’了。连君丫头都不吭声了。……不管你们说三道四，她就是不作声……你们也该完了吗？”

“完了？……”大家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① 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中的男主人公，贵族出身的大学生，曾到监狱探望过他过去的情人。

“Y市的福特工厂”为了宣传它是一家设备完全、拿到什么地方去都不会丢脸的工厂，欢迎外界参观，因为这是不要广告费的广告。“H·S公司”相当地垄断了日本的“制罐业”，因此能有这么优良的工厂设备和优厚的职工待遇，在它来说并不是什么负担。而它欢迎外界来参观的效果又可以反过来在工人中起作用。工人们常常用这种口气说：“我们的工厂如何如何……”，“我们的公司如何如何……”。要是有人说了自己工厂的坏话，他们一本正经地替它辩护，差不多到了可笑的程度。在“三井”工作的职员在其他公司的职员面前常常是很神气的。这些人决不会做不利于“三井”的事。“H·S公司”的总经理很懂得这一点。

传达员来了，是一个童工。

“参观的来了！其中还有美人哩！”

“君丫头，听见没有，有美人哩！”

“是哪一个？咱也去侦察侦察看。”

同在装箱室里工作的一个性情温和的女工，脸上显出消沉的神色。

“阿君！我真不愿意她们来，既然是女学校的学生，当中一定有我小学里的同学。”

“那怕什么？”阿君象男孩子似的说。

“要是到这儿来，我就上厕所去！劳驾你看着点。真是的，别人家做工又有什么好看的呢！”

“你害什么羞？把空罐头朝小姐们的脸上打过去不就得了吗？妈的！简直把咱们这儿当成动物园啦！”

“哟！哟！”

“哟什么呀！要是用自己劳动的钱装小姐，那就没有什么说

的。你这算啥！”

“嘿！君丫头也神气起来了，怎么样？今晚上请你看电影，去不去？月形龙之介演的什么斩人斩马剑，人来杀人，马来斩马！瞧！杀过来了！就这么一手。去不去？”

“别胡缠了。咱们这个阿君姑娘偶而也有个约会呀！”

“君丫头可是越来越厉害了。”

今晚上阿君为了“工作”，必须和森本会面。

楼梯上响起一阵脚步声。

“参观的来啦！”

十一

那天中午，森本邀了笠原，两人在公司旁边修得很整齐的草地上伸长了身子躺下。经常一有这种机会，他就得利用。笠原是厂长的助手，甲种商业学校毕业，好象多少读过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书。

从草地上望过去，正看见穿白衬衣的职员们在办公楼前练习接垒球。球使劲地扔过去，扔进对方的皮手套时，发出一种好象打穿什么东西的声音，在中午那令人怅然的空气里，听起来格外痛快。站在旁边的女事务员，看到有时球没接住，就拍手取笑。

在厂房口挂有遮阳伞的地方，一些年纪稍大的女工摊开胸口，把吃奶的孩子放在自己膝盖上。这样东一群、西一群，有四五群。

森本望着蓝晶晶的天空，仰卧在草地上。天空显得更加蓝

了。——这时候，他胸头格格地打起噎来，他把胃里反刍上来的东西放在嘴里咀嚼。

“噉——”

躺在旁边的笠原突然把头抬起来盯住森本看。

“……你怎么啦？反胃吗？……讨厌的家伙！”

森本怪难为情地嘻嘻笑了。

关于公司里的各种各样情况，森本是从笠原那里打听来的。

公司现在对“产业合理化”问题进行了非常周密的调查。合理化政策本身没有多大问题。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来执行这一政策。——就是说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实行，才能使工人不觉得，不引起他们反感。伤脑筋就伤在这里。

“H·S 工厂”新录用的工人，必须是现在厂里工人的子弟……总经理考虑把整个工厂变成一个大家庭。——真正的目的却是建立一个眼睛看不见的“连环保”，使任何工人都不能随随便便乱来。除此以外，还要使工人觉得，好象公司对于工人并不单单只是工资雇佣的冷酷的物质关系，而是对他一家人都是“照顾”的。最重要的是使工厂罢不起工来。在目前推行合理化政策时，厂方的手段就起了作用了。

公司对于现在充斥在市内的失业工人和眼前被迫干着比动物还不如的活的半失业工人——搬运工人，也并不是袖手旁观的。他们也考虑到，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在被称为“Y市的福特工厂”的“H·S 工厂”的工人中就越会引起微妙的反应。厂方可以把半失业工人的恶劣劳动条件在必要时适当地刺激一下工人，使职工们硬不起来。——因此，“H·S 工厂”一朝有事，厂方总是掌握主动权的。

合理化的条件之一，比如说延长工作时间吧！如果一旦实

行，必定会引起工人们正面反对。但也有象制造军需品的S市的制麻公司，M市的制钢所那样的例子。他们把延长工作时间宣传为不单是为了“营利”，而是一种伟大的爱国义务，于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工作时间延长了。“办法到处有”，只要厂方巧妙地掌握各自的特点，事情会意外地顺利进行的。——“H·S工厂”也是如此。

在堪察加的寒空下，
我们的人拚着命在制罐头。
他们不能缺少空罐子呀，
是咱们制罐厂的女工在做呀，
这决不是自己夸奖自己。

真堪羡慕呀！
制罐厂的女工人，
制出不可缺少的空罐子，
把它送出了港口，
换回钱来既富国来又富身！

这决不是自己夸奖自己，
制罐厂的女工终日不停手。
为了公司，为了国家，
只怕用力用心还不够，
对不住那活命的罐头！

（载于“H·S公司”发行的《罐头俱乐部》杂志上）

象这样的歌词和文章投了来，公司就在《罐头俱乐部》上特别加以优待，甚至偷偷地请人写这类文章登在刊物上面。

“H·S公司”输出的罐头，到堪察加的有五千八百万罐，到蟹工船的有七百八十万罐，到千岛、北海道、库页岛的有九百八十万罐，比较起来，堪察加占绝大多数。

笠原在厂长指示下，有时读读《科学管理法》、《泰勒制度》^①之类的书，有时又作各种各样的统计。因此，他很具体地了解公司里的计划。他在方格纸上不但画下了日本工资的涨落，也画着世界各国工资的涨落情况。——从世界范围来看，名义工资下降了，再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作一比较，实际工资当然更加下降了。“H·S工厂”也不能经常是例外。而且为了加强工人的劳动强度，现在的机器组织的分工是不是还要分得更细？能不能不用工资高的熟练工，而用女工来代替呢？传送带是不是可在别的什么地方再加以利用？工人们是不是还有功夫“磨洋工”、“喘口气”？能不能改成计件工资等等。正当工人们关在这狭小的厂房里，埋着头什么也不问不闻的时候，厂方却在制定方案，跟上“世界”的步伐。

从“H·S工厂”五年的统计来看，生产量提高了，而工人的人数却减少了。这件事包含着两种意义。——一是工人所受的剥削比以前更多了；二是与此相应的许多失业工人被抛弃到街上。自从传送带装置完备以后，“搬运工”和“杂工”显著地减少了。熟练工和非熟练工的人数差额以及工资的差额大大地缩小了。而令人吃惊的是“女工”一下子增加了很多。自从女工增加

① 英文为 Tailor System。这是美国泰勒拟定的强迫工人加强劳动的制度。

以后，厂里的工资总额却不知不觉地下降了。厂长说，使用女工，不仅在工资方面占便宜，而且她们也不会去入什么工会组织，抵抗力弱，肯听话。

可是，以上这些都不过只算是“提高效率”和贯彻“工厂管理法”的结果，在大声喊叫“产业合理化”的呼声中，这仅仅是厂内“秘密”的一小部分。“产业合理化”的真正目的还并不在此。它的目的是“企业集中化”。就是说“调整”各种各样的中小企业，使大企业越来越大，数目越来越少，这便是他们的企图。因此，它的最终目的就是使留下来吃得肥肥的大企业轻而易举地攫取垄断利润。在这“产业合理化”的背后实际牵线的是“银行”。

比如，银行把大量资金贷给许多铁工厂，单从它本身的利润来考虑，它不希望他们相互之间竞争。因此，银行尽可能限制和停止各企业之间的竞争，这样做，对银行是有利的。银行由于自身的需要，凭借自己是债权者的威势，迫使这些同类产业签订协定和合同，结成一体，把本来还处于竞争时期的经济发展阶段导向垄断地位。所谓“合理化政策”显然是追随“大金融资本家”的利益。

笠原每月都要写一次“业务报告”交给三田银行，所以他很了解“银行和公司”的资本关系是一种什么关系。——“H·S工厂”的监督权、监察权和支配权都掌握在三田银行手里；银行常常对公司的营业成绩提出意见；总经理几乎每天都要到三田银行跑一趟；说得夸张些，总经理就好象三田银行派到“H·S工厂”的特派员一样……这种关系，将来可能会出现有趣的事哩！……笠原把这些事都告诉给森本，森本听着听着，渐渐把视线离开了蔚蓝的天空。

产业合理化政策还表现在供销方面。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建立了“统购”和“统销”公会，“统制”原料价格和贩卖价格。这样做，他们一方面剥削工人，榨取更多剩余价值，另一方面价格有了“保证”，可以获得双重利润。由于他们这种垄断的价格协定，不能买到便宜东西而吃苦头的是谁呢？还不是占人民绝大多数的工人。

“那些没有用的一群小工厂倒闭了，工人一个个被抛到街上。幸而还保住饭碗的工人在愈来愈科学化的剥削方式下被熬尽了油。这不是别人的事情。资本主义本身就伴随着残酷的摩擦，向着巨大的社会化组织即垄断阶段推进的。因此，所谓产业合理化，不论从哪一方面看，结果都是把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给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有利条件，可是，不论其中哪一项结果也都是强迫工人作出牺牲来实现的。——就拿‘H·S 工厂’来说，不久就会……呐……”

笠原眯起眼睛对森本说。

“你的意思是‘Y 市的福特工厂’也不能老是‘福特’下去是吗？”森本说。

十二

上班的汽笛响了，两人“嚯”地站了起来。笠原啪哒啪哒地拍去裤子上的灰，向办公楼的方向跑去。

汽锤咚咚的惊天动地的响声震得脚掌心直发痒。森本走到晦暗的车间门口，正想往里走，忽然从窗户里瞥见总经理正出去打高尔夫球，仆役背着高尔夫球棒跟在后面。森本暂时停住了

脚，正巧碰在从里边走出来的佐伯身上。

“对不起！”

“冒失鬼！”

佐伯？——他为什么跑到这儿来？——森本想，这家伙不是个好东西。

“怎么？你瞎了眼啦？”

“你说什么？瞧外面！”

佐伯往外膘了一眼，脸上显出厌恶的样子。

“你瞧那样子，简直是‘昭和时代的老风流’嘛。打高尔夫球，不那么打扮不行么？”

“唔，可怎么说好呢……”

森本的回答不着边际，佐伯感到很难受。

“是这么回事，安部矶雄^①这回到这儿来游说，想请他在市内讲演完毕后，到厂里来讲一个钟头。听说，总经理也赞成的……”

“谁主持呢？……是你们去请他吗？”

“别胡扯，是总经理呀。”

“总经理？”

森本轻轻地笑了笑。

“嘿！胆子倒不小哇！”

“确是了不起！”佐伯不了解森本的真意，认真地说。

森本曾经听说过“社民党”要提名总经理竞选市会议员。这话也是佐伯说的。当时森本问他：

① 安部矶雄(1865—1949)，福冈人，曾留学美国，日本著名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九〇一年曾参与社会民主党的建党工作；一九二六年组织社会民众党；一九三二年是社会大众党的领导人之一。

“那么，社民党是谁的党呀？不是‘工人的党’吗？”

佐伯的脸上显得有点吃惊，说：“当然不是共产党罗！”

公司方面为了不让工人们加入左倾的工会，暗地里帮助佐伯这伙人，看到厂里稍微有点“危险”的工人，就让他们加入“劳工总同盟”^①。森本他们也知道这件事。可是反过来说什么总经理很有自由主义者的作风啦，什么他了解工人啦，还特地让他们去加入工会等等——借此把这个策略巧妙地掩盖起来。因此，很多工人都不知道其中的奥秘。厂方的策略是，只要把工厂中的重要份子都送进“社民”^②系统的工会里去，那么厂里要干任何对工人不利的事，苛刻的事，也就畅行无阻了。——这是显而易见的。森本看透了厂方的重大用意。一句话，公司方面已经在对工人采取积极的态度了。这应该用什么办法来对付它呢？——他感到事态越来越严重了。

他还不具体地了解“工厂党支部”的任务是什么。可是他根据长时期工厂生活的经验，以及最近才慢慢地了解的各种各样的情况，知道自己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所以趁这个机会想在厂里建立社民党的基础……我已经跟钳工车间都说了。——就是这个打算，请多帮忙。”

佐伯说罢，沿着手推车的小铁道走了。他一边走，一边伸手去摸一个推着装满洋铁皮车子的女工的屁股。森本从这边看得清清楚楚。那女工“哇”的一声跳起来，在佐伯的背揍了几拳。“啪！啪！啪！”

佐伯油腔滑调地弯着腰走了。

① “劳工总同盟”是当时的右翼工会。

② “社民”即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简称。

佐伯在工人街的 T 街上组织了一个类似青年团的“中心会”，其中百分之七十的会员都是“H·S 工厂”的工人。他会柔道，“中心会”的一半目的是为了练习柔道，会里还有练柔道场。据说还从“H·S 公司”领得一部分补助金。假如什么地方发生了罢工，他们就以“为了一般市民利益”的名义，跑去阻挠捣乱。又假借“精神修养”、“磨练心神”的名义，扶植明目张胆地破坏罢工的“暴力团”。公司里举行“武术大会”时，就是以这班家伙为核心。

森本一面向自己车间走去，一面感到自己的工作步骤和目标已经明确地摆在眼前了。

那一天，他回到家里，看见河田送来的小册子用旧报纸包着放在他的矮桌上。小册子的封面画着齿轮，约有四五十页，上面写着：

“工厂新闻”

“工厂党支部的任务和它的活动”

封面上用铅笔写着：“速读”，那笔迹是河田的草字。

十三

河田经常这样说：

“要是有了女的参加进来，就得好好注意，因为她们会把运动弄得不三不四的！”

森本和阿君见面的时候，就紧紧掌握这一条。

森本让阿君在采石山边等他，然后两人边走边谈。

阿君挺着胸脯，走起路来象男人一样。女工们在工厂中整天整天站着干繁重的工作，早就忘了日本“女人式”的步法了。无政府主义者武林曾经说过：“要是工作稍微合理一些的话，也许女工是日本女人中穿西服最合适的。”——这句话多么象武林的口吻。

在车间里，森本也经常跟女工们打打闹闹，说说笑笑。可是此刻他跟阿君两人走在一起，他连谈工作都张不了嘴了。刚一开口，就结结巴巴的不知说什么好。这跟他经常嫖妓女完全是两回事。当两人穿过小路，必须横穿灯火通明的大街时，森本那惊慌失措的样子简直叫人好笑。阿君在后面格格地笑了起来。原来他一个人先大踏步跑过去，然后在对面的小路上等她。阿君泰然自若地挺着胸脯，好象穿惯西服的人穿和服似的，豁开下摆走近来，只把眼睛瞧着森本直笑。两个人又并肩走了。

“森本君，你真老实！”阿君说。

“啊！出汗啦！”

“男人们都象你这样吗？怎么回事？……”

身披薄薄的浴衣，丰腴圆滑的线条全显露了出来，有时肩膀碰着肩膀，森本吓得缩回来。

“我口渴了，想喝点冰镇的汽水，找个地方歇会儿再谈怎么样？”

再走过去一点，有一家冷饮店。玻璃珠子串成的门帘摇来晃去发出清脆的声音。小小的假山上玩具般的喷泉，象梦境里似的往上喷起水烟。在用水泥笨里笨气做成的池子里，两三条金鱼在游动。

“掌柜的，来一瓶冰镇汽水，你呢？”

“来杯冰水吧。”

“哦，掌柜的，再来一杯冰水。”

姑娘领着头，痛痛快快把这事处理了。森本发觉她做事干脆、麻利，心里很高兴。此刻他就要和她谈论工作，感到有一股意想不到的“劲儿”涌上心头。

“我跟你说……”

咕噜咕噜地一口气喝完了汽水，又是她先开口。

“刚才在路上听你说了不少，可是我是这样想的……公司方面不管它宣传得多好，但女工终归是女工。你知道女工一天究竟拿多少工资呀？光是这一点就马上明白了。”

阿君把从朋友那里听来的关于阿芳的事讲给森本听，但没提阿芳的名字。

“我那朋友说她生性淫荡，可是既然是淫荡就不该要钱了！过错不在她，因为她一个人得养活一家四口人，而公司一天只给六毛钱。你也知道，有的女工辞去了厂里的工作，去干酒吧间的女招待，或者去干暗娼什么的。可是她们并不是先辞掉厂里的事，再去干那种事，而是厂里拿的钱实在养活不了家口，先去干那种事才辞掉厂里的。——可是厂里的人呢，却反过来说什么她们堕落了啦，什么安安心心在厂里干下去该有多好啦等等。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森本吃惊地盯住她看，她说得很对，而且又说得这么尖锐。这也是个女工呀！

“女工们真惨。她们是很可怜的，一聊起天来，老是什么电影明星一个月挣几千元啦！女招待怎么啦，艺妓又怎么啦。”

“是吗？”

“再就是为一分钱、二分钱的工钱发牢骚。别看‘工厂委员会’在别的方面不起作用，他们甚至还瞧不起女工。”

“女工不是有两个人参加‘工厂委员会’的吗？”

“那只是旁听，象木头人一样插在那里，根本没有发言权。”

“唔。”

“要不要再喝一杯冰水？”

“唔。”

“你在钳工车间拿的钱比我多一倍，你请客吧？”

阿君爽朗地笑起来，露出了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森本看见阿君这样无忧无虑的自由自在，觉得自己的“拘束”也渐渐消失了。阿君说话的时候，常常用：“……问题就是这些。”的一种口吻来结束她的每一段话；在回答人家的时候，又老是“对！”“唔”地答应。光从这一点，森本感到她和自己过去对女人的看法完全不同。他想：象她这样子，不就是在工厂生活里养成的吗？而过去日本妇女都没有想过要进工厂。

“你到公司外面跟大家聊聊，就可以了解不少情况。大家都是满肚子牢骚。你不要以为这工厂被称为‘福特工厂’，你就悲观了，其实呢，象我这样在各科里找一两个伙伴并不困难的。女工的情况怎么样？”

阿君噗嗤一声笑出来。

“女人本来就是一种怪物，一旦认定了方向，干起来比男的还要齐心。也许是一种变相的歇斯底里吧！”

“说得好，变相的歇斯底里。”森本也跟着笑起来。

他把从河田那儿听来的“方法”详尽地说给阿君听。阿君不象刚才那样活泼，很注意地一本正经地听他说。

“干吧！大家互相鼓励着一起干吧！”阿君把半月面颊涨得通红的脸抬起来说。

他俩走出了冷饮店，前面不几步就是铁道和马路的交叉口，

安全杆正好静悄悄地放下来。一列客车轰隆轰隆地开过去了。明亮的车窗从眼前掠过，掀起一阵温和的风，留下锅炉上散出来的余热。涂着白漆的安全杆在黑暗中轻轻举起。对面有五六十人从他们身旁通过，一个个都朝这边看。

“瞧，那女的真漂亮！”

森本感到有点悚然。他想人家一定把他们当作一对情侣了，脸刷地一下涨得通红通红。

“你嚼什么舌头！”阿君回了那人一句。

她一边走，一边谈起厂里的事。

……什么脸蛋长得不好看没人理睬，再加上长年累月枯燥无味的工作，几乎已变成中性的年龄稍大的女工，偷偷地存点钱，以防被厂方解雇啦；什么有些女工决不同其他女工来往啦；什么脸蛋长得漂亮的女工工资长得快啦；什么有一个男工被两个女工爱上，一个失恋了，这个失恋的女工过后和另外一个人结了婚，立刻梳着“娇滴滴”的大红圆髻到工厂里来招摇过市啦；什么有的女工为了长工资，下了班和工头一起去看电影，看完电影还一起去吃面条啦；什么有一个职员把女工的肚子搞大了，偶然看见一个男工逗着这女工玩，就借口说她跟男工有暧昧关系，把她扔掉了等等。

两人下了坡，来到码头边。几个乘凉的人在望得见海港灯火的码头附近来回散步。

“苹果，桔子，梨，要吗？”

路旁卖水果的小贩沙哑着喉咙叫卖。

“想吃个苹果。”阿君自言自语地走过去。

阿君和其他女工一样，一到外面就好买零嘴吃。她一面走，一面用衣袖擦了擦苹果的红皮，就这么皮也不削一口咬去。在昏

暗的夜色里，森本看见她雪白的牙齿闪了一闪。

“真香！你吃不吃？”

这苹果和这女人是多么惹人喜欢。

“好吧！给我一个。”

“一个？我只买了一个呀。”

阿君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这人真坏！”

“好吧，你在这边咬一口！”

她又用衣袖擦一擦苹果，递到他跟前。

他被她弄得不好意思起来。

“那末，咬这一边？”

她故意拿他开心，把自己咬过的一边转过来对着他。

“……”

“没有这个胆量吧！那末还是在这边咬一口吧。”

他没有办法，只得胆怯怯地咬了一口。

从这儿可以望见“H·S 工厂”。这座灰色的庞然大物真象一艘偃旗息鼓的“战舰”似的停在那里。

头一个晚上跟她见面，森本就被她迷住了。过后，他一有空就想起阿君来，觉得自己干起工作来格外有劲。一想到这个干劲是从阿君那儿来的，好象见不得人似的。难道自己已经掉进河田所告诫的陷阱里了吗？——他想。

十四

说什么工人没有一个有“出息”的，都是些麻木不仁的家伙，

又说什么从外表看起来都是这个样——这种说法不对头。工厂虽然号称是“福特”，但工人终究还是拿工人一样的待遇。工人对市面不景气不摸底，只得无可奈何地在厂里干着活。他们也被“毕竟是Y市的‘福特’呀”之类的谎言迷住，自己骗自己，就象吃了鸦片中了毒。

“出了工厂大门，谁都是满腹牢骚。”

阿君曾经这样说过，看来这话是真的。可是，即使如此，他们谁也不会先作声，而是等待有人带头。

过去，森本跟好朋友在一起时，从来也没有谈过工厂里的事和政治上的事。他的这一变化是从老朋友石川参加工会以后才开始的。在这以前，他不过是刚学徒满师的五金工人罢了。一天除了上班以外，只会钉钉女工的梢，宿宿暗娼，一张嘴就只会谈论女人。可是现在，他自己思想变了，再和伙伴闲聊，奇怪的是，他们的回答也不是成天光谈女人了。单从这一点看，也可以知道过去一直没有人去启发他们的觉悟。他们对自己的生活都是精打细算的。一分钱买条干鱼，公司的消费合作社要贵五厘，就为这点小事就可以争论半天。

每个月都付保健费，可是保健医生对工人如此冷淡、漠不关心，使得他们对“健康保险法”不满。不但如此，自从实行“健康保险法”以来，本来规定非因公负伤由厂方负担三分之二医药费，因公负伤由厂方全部负担，可厂方巧妙地蒙混过去了。“既然是健康保险，当然应该由公司全部负担！”工人们都这样说，这话谁也没有教过他们。

“工厂委员会”在工人们的眼里只不过是“骗人的把戏”。他们对于这个由厂方随便指定几个“老实的”、“听话的”工人作委员，只是徒有形式的“工厂委员会”，不抱一点希望。

过去不用女工的冲床工作，现在据说也许要用工资低廉的女工，工人们一听到这消息都变了脸色。

表面上不管如何太平无事。可是光是这一点，森本就感到工人中间正产生着一股促使他们愤怒的力量。

每天早晨上工的时候，森本发觉自己的心情在不知不觉之中起了变化。在寒冷的早晨，弓着背，缩着头，一脚一脚踏着雪走出家门时，他感到自己简直是个悲惨的奴隶。在早晨睡得暖和和的被窝里，他真想伸开腿再睡上一个钟头。——一清早，当看到跟他一样没有生气的工人踏着积雪，就象白布上的斑斑污点，蜿蜒蜿蜒成一大长列，向着同一方向走去时，他心里想什么时候这些人也能象“俄罗斯”那样团结成一个巨大的力量呢？这一长列的人群只差没有用锁链罢了，看去真象一长列死气沉沉的犯人。

所以，他对厂里的活儿也没有心思好好地去干。过去，为了出头，他曾经拚命地干活，想当个职员。可是无论他怎样干，也当不上一名职员，从十九岁那年起他就泄了劲了。特别是在这个厂里，不是人开机器，而是机器整天把人粘住，挣也挣不开。人跟着机器团团转，谁受得了呢？他想还是吊儿郎当磨洋工合算。他常说：就和养猫的老太婆的脸到头来也会象猫脸一样，咱们工人不定哪天也都变成了机器。他们在轰隆轰隆的车间里说话，就象砂轮上磨铁飞起火花那样大声喊叫，否则是听不见的。他们的腰部的动作也象机器那样一板一眼；他们毫无表情的脸黑得象铁块；他们的手指头的关节硬得象钻头，而他们的意志坚决得象汽锤。要是在工人的脖子上套上传送带，他们就会在车床上切削地轴，在钻床上钻眼子，在刨床上刨铁板，在铣床上铣齿轮。握着操纵杆的工人，究竟哪一部分属于机器，哪一部分属

于工人，谁也很难分清。

在这里，决定人的动作已不是人自己了。在自动化的制罐部的工人们，每一分钟手要动多少次，机器一天转多少转，他们要用什么速度，只能在什么范围内走动，都不能自己随便决定。这一切都由机器的转数和传送带的速度毫不留情面地决定下来。常常说工人在厂里“干活”，这种说法太过于人道主义了，说得并不恰当，实际上“干活”的是机器。站在传送带旁边的女工，就是月经来了也不能离开一步，因为她已变成机器的一部分，是安装在机器上的“女工”部件罢了。

在森本看来，照这样下去，工人们不是变得象机器，而是工人本身就成了机器，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机器人”大概就是从这里想出来的。工人们一说起“机器人”就厌烦。哪一个愿意变成机器呀！谁都愿意做个人。

森本开始了自己的“工作”以后，了解了种种情况，对于厂子更感到一种不可思议的魅力。

每天早晨上工的时候，就决定今天跟谁谈。他一边走出家门，一边考虑对象的趣味，脾气和工作，应该用什么方法，用什么话去接近他才好，还是到他家去串门呢，还是……在路上他看到自己前前后后穿着油污的工作服、急急忙忙往前走的工人们，觉得总有一天这些人都将成为自己的“伙伴”时，把他过去那种阴郁的忧虑情绪都给赶跑了。

他在河田和石川的领导下，把男工和女工分成两个组，男工由他负责，女工由阿君负责。他（她）们的代表在“二楼”上同河田他们取得联系，决定重要的活动方法。

各组为了获得立刻就能用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基础知识，

组织了小小的“会”。

在第一次“会”上，河田向森本读了一篇中央领导同志写的短文，是领导人用通信方式写给某地方一小都市的同志的信。

“……来信说，你已经在贵地组织了工人研究会，我很高兴。而且××铁工厂有七个工人参加，那实在太好了。××铁工厂是贵地最大的工厂，这件事很了不起。只有七个人，谁敢小看这件事？我们如果在拥有几千工人、而且在怀柔政策和镇压下坚固得象铜墙铁壁般的工厂里，能够交上一个敢于反对资本家剥削的工人做朋友，即使一个也好，这对于我们来说就等于争取了这个工厂的一半。——问题是如何去争取这一个人。假如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话，道路就会迅速打开的……

“你的这个研究会，我以为该不是单单把‘知识’灌输给这七个工人吧？如果是的话，那就不要采用那种早就‘出名’的、陈腐的老方法，就是说先让他们了解工人运动、社会运动和马克思的经济学，然后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斗争。这种方法的结果使运动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失败，耗费精力。你应该了解贵地工人对资本家有哪些不满？特别是××铁工厂的劳动条件如何？现在工人的不满，应该结合提出什么要求鼓动他们起来斗争？这样做的话，你的研究会就会从现在单单灌输‘知识’的集会完全转变成另一种样子，就会对现实生活产生兴趣，变得生气勃勃起来。”

“我们不也是已经把一只脚踏进那早已‘出名’的失败里了吗？”河田念到这里，就插了一句，说。

他接着又念下去。

“例如，为了在××铁工厂掀起斗争，要送鼓动传单到工厂去，这时如果叫这七个工人去做，决不是好办法。这样一做，就等于工作还没开始，就把我们在工厂里的幼芽先被敌人砍掉了。

这种工作应由工厂以外的人去做最合适。工厂内的工人所担任的任务是把传单在厂内发生什么影响，有多少人共鸣的情况，向晚上的研究会反映。然后大家再商量对于今天工厂中工人发生的动摇，今后应该用什么形式作进一步鼓动；对于新的产生共鸣的人如何去争取他们，怎样进行组织工作……这样一来，研究会就活跃起来了……”

“完全正确。”河田说。

“真险呐！今后我们也得按照这个路线去做。”

十五

不管有多大困难，首先必须出版《工厂新闻》。无产阶级的报纸不仅是“宣传、鼓动”的机关，同时也具有团体“组织者”的作用。

《工厂新闻》的任务是把厂内工人自己所体验到的日常经验，工厂内所发生的事件，和厂方的欺骗政策等等，用最浅近易懂的文字具体地揭露出来，并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逐步提高工人的觉悟。——但是，它的最根本的意义还在于通过报纸把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影响深入地渗透到工人群众中去，从而在工厂的基础上建立党。河田所努力的真正目的就在这里。可是这事谁都不知道。

根据“H·S工厂”的情况，《工厂新闻》就决定出一份油印的《H·S新闻》。河田根据许多先辈的例子，知道象自己这样脱离工厂的人，是不了解工厂中的具体情况的，因此对某一工厂进行活动时，老是写些公式化的抽象句子，工人谁也不愿意看这种报

纸。这次他就根据森本和阿君搜集来的情况来办报。河田对于其他的铁工厂、橡胶厂、印刷厂也按照同样的计划进行。

出一份《H·S 新闻》，哪怕是小型的也好，首先要让工人贪婪地读它、爱它、亲近它。报纸上插进些漫画和人像画，使工人容易接受。要是把厂长的脸画得一模一样，那该会受多大的欢迎啊。那些又长又噜嗦的论文不能再写了，工人们也读不进去……河田幻想着这份报纸，仿佛自己的孩子就要诞生一样，高兴得摩拳擦掌地一桩一桩数着将要做的工作。

《H·S 新闻》刊行后，森本和厂里许多工人之间的关系就不是象以前那样漠然不清，软弱无力了。同时也可在他们之间建立“工厂党支部”。除此以外，报纸还有其他重大任务。“H·S 公司”定期发行一种公司的刊物《罐头俱乐部》。和其他公司一样，编辑里没有一个工人，投来的稿子全由职员随便处理，再经厂长过目，把不利于公司的文章删掉。今后《H·S 新闻》就得不断揭露这种御用杂志的欺骗报道、反宣传和资产阶级的说教，同它抗争，利用它来打自己的耳光。

因为投稿给《罐头俱乐部》可以用匿名，于是不能公开说的事情就不断写成稿子投来。

“有的稿子写得真够厉害的，几乎使人不敢相信工人竟会有这种想法！”担任编辑的职员说。

河田知道这当然不是撒谎。记得有一次，Y 港里开来了二十多艘帝国军舰。旗舰“陆奥”号上也举办一份该舰专用的报纸。这份报纸也象工厂里的御用杂志一样，在各种场合上加以利用。当编辑的士官说：“稿子来得很多，就是没有好稿子，得想办法填补空白，真太费事了。”又说：“这些丘八们写的东西简直不象话。”

河田曾经对石川说：“我听到这一消息时，身不由主地眼睛都发亮了。”又说：

“那是帝国的军舰呀，里面也有我们的人啦！真高兴。”

《H·S 新闻》必须把这些写“真够厉害”稿子的伙伴与写“太不象话”稿子的伙伴争取过来，哪怕是沙里淘金也好，必须象吸铁石那样从泥沙中吸住他们。

过了三个月，已经有四个人来参加女工的集会，比男工只少一个人。阿君和阿芳是她们的核心。因此，《H·S 新闻》不多不少地只印了九份。在开会的时候，铃木谈得非常有趣，使女工们一点也不感到无聊，大家都喜欢他。

“铃木最近积极得很哩！”河田说，接着又笑着加上一句：“是因为有女人参加的缘故吧！”

每增加一个伙伴，《新闻》就多印一份。来参加会的工人便把这张报纸传给他们要争取的另一个人。——白蚁不露声色地钻在里面，不知不觉之间已把屋柱啃空，等到发觉的时候，一座大楼就快倒塌了。《H·S 新闻》令人想起这样的白蚁。

“今后的运动不再是到街头撒传单或演讲了。”河田看到有些有觉悟的工人跃跃欲动时就再三告诫他们。“我们必须要有决心，把这张报纸办它五年。”

《H·S 新闻》登了一幅漫画，安部矶雄和总经理握手，另一只手在后面卡着工人的脖子。另一幅是狐狸正在开会，脸画得象狐狸的厂长、工长和职员围着一张大桌子，把马粪当工钱发给工人。这就是“工厂委员会”。“互助会”的基金和“健康保险金”用到哪里去了呀？为了谁的利益用掉了呀？——还有每次给工人们一点“奠仪”或生孩子的“贺礼”，都要叫工人写一张“领

谢”的条子，贴在食堂门口让大家看。——这些画都是嘲笑厂方的策略的。

这些漫画，每一张都叫以为公司真是“福特工厂”的工人大吃一惊。

十六

“真烦透了。你瞧，阿君和河田的行动有点怪哩！”

开会回来的时候，铃木不愉快地说。森本听了他的话，突然停住了脚步。——他打以前就知道在工厂里就有两个人跟阿君亲过嘴，不过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这种做法真象阿君的为人。然而，她却跟河田在一起！想到这里，仿佛感到脚跟突然陷到了地里。

“河田在这种事上确实是乱七八糟的。”

“……”

可是，实际上却是铃木爱上了阿君。他觉得自己得救的“最后希望”就是阿君。他已经把从警察那儿拿来的二百元钱随便花完了。他想到了自己悲惨的结局，心里非常着急，可是心里越是痛苦，越使他掉进了无底的深渊。——此刻，连“最后的希望”阿君也失去了。究竟为了什么自己在“会”上那样卖力呢？——事到如今，他才清清楚楚地感到自己真正的道路在哪儿。一到夜里，他做恶梦，出盗汗。

又过了四五天。

“阿芳一定是爱上什么人了！”阿君顽皮地笑着说。

“她相思病可害得真厉害，简直可笑极了。我就对她说，你

又不是什么千金小姐，见了月亮就触景生情，见了花又凭空落泪……你心里想什么就痛痛快快地说吧，心里想干什么就痛痛快快地干吧。”

“说得真象小君说的。”森本怅然地一笑。

“她这样下去，把‘工作’搞坏了可不得了啊！我就对她说，我替你去告诉那个人吧！你想要他亲你的嘴，就让他亲……这样一来，你干起‘工作’来就有劲了。可是她说，这样太害臊了……你瞧怎么办？”

阿君毫无忌憚地大声地说。森本突然想到：她这种说话的口气是不是从河田那里学来的。他感到痛苦。

“什么害臊不害臊，我看阿芳就是有点小姐气。”

森本想：阿君要是是个男子，也许就是河田。大家都曾经说过笑话，河田谈“恋爱”是和“工作”一个样。意思就是说，他即使恋爱的话，在感情上是不会乱来的，工作上就不用说了。

阿芳究竟爱上了谁，阿君到头没有说出来。

十七

这年夏天天气很热，可是到了秋天，不是暴雨就是冰雹接连下个不停，连这个海港城市都显得荒凉了。冬天又受了秋天的影响，天气好得出奇。可是，天气一好，也就不需要打扫积雪，工人们找不到工作，又得挨冻受饿。

此外，又加上政府的紧缩政策，码头工人的生活更是陷入了痛苦的深渊。“把头制度”、“对拆制度”这种手工业的剥削方法

就象一捆海带卷压在工人的背上，他们即使每天都能到码头上干活，可是经过几重剥削，到手的钱只剩下了一半。自从实行“对拆制度”以后，工头们不把“起货账”公布，任意对付，他们想给多少就多少。金菱公司在煤炭堆栈安装了装卸机以后，五十名扛煤的苦力一下子就失业了。

他们的老婆在家里再也坐不住了。可是，只要一坐到炉边，再也起不来了，一坐就是一整天，简直成了个什么事情也不会想的傻子。那末，起来到厨房里去吧，可是到了厨房，又忘了自己是做什么来的。心里没有着落，总不能老呆在一个地方。——这些娘们左不是，右不是，便向丈夫干活的运河马路上走去。

她们一直呆到傍晚，回家时，到把头那里打算借几个钱。

“别扯淡！”

把头只在门房里露了一下脸。

“你瞧这不景气的样子吧！首先是咱们这些人混不上饭吃啊！”

她们被把头这么说了一顿，仍把胳膊靠在门房口的扶手上，一声不吭，竟然忘掉了回家。

从“H·S工厂”的窗口越过混浊的运河望过去，看见乱哄哄的一群人——码头上闹事了。“Y工会”在这里钻来钻去进行活动。现在只要有人点头，罢工就会闹起来。工会的工作是在罢工闹起来以前，充分地建立起联络网和组织网。

“工厂代表会议”召开了紧急会议。在目前情况下，会议有两种意义。——工会方面知道，即使运输工人全部起来罢工，但Y市的“工厂工人”也和其他市镇一样，却会站到斗争外面，袖手旁观。因此，“工厂代表会议”就得尽一切力量把这次罢工发展成全市性的罢工。此外，“H·S工厂”最近也出现了不稳的

情况。

参加会议的有：四家铁工厂来了六个人，三家印刷工厂来了三个人，两家橡胶工厂来了四个人，他们都各自代表着厂里几十个人的意见。

其中有两个是森本当学徒工时常去的铁工厂中的伙伴。

“我们是老相识了……”

大家见了面就笑开了。

“工厂代表会议”能够具有这样的规模，这是河田他们半年来脚踏实地努力的结果。

整个“H·S公司”都在战战兢兢。职员也好，工人也好都没心思工作。原因是三田银行同日本第一流银行金菱银行合并了。政府在策动统制全国的金融机关，把它们都集中起来。这两家银行的合并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银行的规模愈来愈大，银行数愈来愈少。过去三田银行对“H·S公司”的支配权，现在当然原封不动地移到金菱银行手里。

可是，金菱银行原来就控制着“N·S制罐公司”和“T·S制罐公司”两家公司。但是，金菱系统的这两家公司在罐头制造上都比不上“H·S公司”。如果“H·S公司”跟这两家公司合并在一起的话，金菱就可以完全垄断日本的制罐业了。它的产品可以全国“统一化”，借此提高生产效率，统一改良和整顿制罐技术和工厂设备，裁减人员；特别是销售方面，可以防止过去那种无谓的杀价，制定垄断价格，任意攫取利润。——因此，金菱银行今后就不象过去三田银行那样只是“简单的支配”，而是积极地插手到业务中来，事事加以干涉。——这就是说，工人们最害怕的“产业合理化”就要直接地极其残酷地实行了。工厂里到处议论纷纷。可是事情比原来想象的还要复杂得多。

“这下可叫总经理、经理和厂长等人发了慌啦!”

笠原说。他为了移交工厂给新的银行，每夜在办公室里加班赶制文件。

“金菱要把自己系统的董事和其他重要职员安插进来，把这班家伙撵走。这样一来，可以看出这班家伙是格外脆弱的。——往后有热闹看了，家伙们正在死命地想办法。”

经常在头头们身旁工作的笠原，大体上也知道他们想的是什么办法。他们煽动工人，说什么金菱银行的手段太毒辣了，不顾工人的死活，降低工人生活水平，把号称“Y市的福特工厂”一变而为“Y市的猪仔馆”！让大家一致行动起来，借以保住这些头头们摇摇欲坠的地位。

“这种做法会使人上钩的。”笠原说。

“不过对手是金菱啊，总经理再有本事，也是小孩子和拳师打拳，哪里是他们的对手。你瞧，从今往后，不跟‘金融资本家’勾结的‘产业资本家’就慢慢地没落下去。这是他们惯用的杀手铜，象铃木辰记这样的大商行也是吃了这一铜而倒闭的。从这里可以看出金融资本称王称霸的过程。”

不仅如此，“H·S公司”做出来的罐头，大部分又是卖给它的母公司“日俄公司”，再由那里运往堪察加。由于苏联五年计划的成功，加上国内资本家的无谓竞争，使得“H·S公司”随时都受到威胁。渔区投标数的增减立刻就会影响到罐头的产量。——“H·S公司”为了加紧防范，不得不策动政府，煽起一股国民的“爱国心”和对苏联的敌忾心。

今年，有一个谣言说，俄国有组织地使用各种各样手段，蚕食日本的优良的渔区，于是“日俄公司”和“H·S公司”的股票价格一落千丈。

面对着“H·S公司”的这样情况，河田建议除了“工厂党支部”积极活动，利用“新闻”揭露和鼓动，发展新的党员以外，更应该进一步抓住当前工厂正在战战兢兢的动摇时机，让工人起来维护自己的地位和利益。为此，他建议必须努力掀起“工厂委员会”自主化的斗争。

工人如要有充分力量抵抗得住资本家的任何“攻势”，首先得使工厂全体工人步调一致。由于各个车间所采取的态度不同，往往会把事情搞糟。这是因为现在还没有一个“机关”可以使全体工人来讨论各种各样问题。要有这样的机关，就必须让“工厂委员会”自主化。现在的“工厂委员会”是由厂长和职员所指定的工头和随风倒的工人任意组成的。要使这个委员会成为替工人利益服务的机关，我们必须要求它由工人自己组织。——这个提案通过了，大家又花了很长时间来议定时间、方法和其他具体办法。

接着别的代表向会议作了情况报告。

会议一致决定，运输工人罢工的时候，在提出的要求中必须要列入一些项目能推动工厂工人的斗争。工厂党支部就把它同工厂中的独特的问题结合起来，全力进行宣传 and 鼓动。

开完会后，河田仰天躺下说道，“我已经三天没有合眼了。”

河田是警察特别追捕的对象。他来回地搬家，无时无刻不在躲避。同时他又到处和同志们联系，领导着工会和森本他们。在这不足二十万人口的小城市里，这样做工作危险性是很大的，几乎到了无法展开工作的地步。

十八

开完会后，一个一个往外走。森本穿过了热闹的市街，正要拐进 T 街的进口处时，后面有人“喂”的一声追上来，追到他的身旁。他想：“这下糟了！”一看原来是河田。

“我有事要到 T 街去一趟！”

森本突然产生一种预感。——河田是不是到阿君那里去？

河田一边走，一边很热烈地谈着自己的运动。他平时谈起话来都是这么热烈的，可是口气里却有一种独断独行不顾死活的味道。初次跟他见面的人，无意中会引起反感。可是森本听到河田热的地谈话时，便对自己干的工作经常感到一种不可思议的“安心”。他从他的口气里感到了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力量。

“你能把整个生命都献给这个工作吗？”河田问。

“能。”森本答道。

“说到献出生命的意义……”河田说着顿了一下，陷入了沉思。——路上还有人走，汽车的前灯不时把河田的脸切成明暗两半，“呜”的一声拐弯走了。

“献出生命就是把自己的一生贡献出来。”

脚底下，初春的残雪象粗砂糖一样发出沙啦沙啦的响声。

“当然，我们的工作不是闹着玩的，而且还需要象我们这样的人一个接一个从后面跟上来，把大家的力量都聚集起来才能弄出一个样子。这些道理虽然谁都懂得的……”

森本觉得有点奇怪，他为什么现在还这样郑重其事地说这

些话。

“《H·S 新闻》在这半年内总算搞到了现在这个程度完全是由于我们一丝不乱的‘组织’的力量。——然而，我们的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这个目的，就需要铁一般的‘组织’，还需要同志们自我牺牲的力量来推动和誓死保卫这个‘组织’……”

河田不象平时说话那样，说到这里又顿了一下。

“你懂吗？”

“懂。真奇怪，现在还说这些话干什么？……”

他这么一说，河田嘴里“哼”的一声笑了出来。

“所谓铁一般的组织，就是通过工厂党支部在工厂的工人中打下牢固的基础，建立站在工人最前列而斗争的党。——工人的党，除了共产党以外就没有别的了……是不是？”

可是这些话森本已经听腻了。因此他不耐烦地说：“那当然是罗！”

“去吃炒面吧！”

河田停住了脚步，眼睛往附近扫了一下，看见再过去一点有一家小店。两人就在那儿吃了炒面。——河田问了森本家里的情形，收入多少，有什么牵累？一面就把自己的情形讲给他听。

他谈起自己参加工人运动的动机；谈起他拿着铝管子和三个特务大打一场；谈起一个生活极端困难的可怜女人时常给他寄钱。这就是他唯一的女人。又谈起家里的母亲为了他得了心病，把身体也搞坏了。接着他又把《难道只有你有父母吗？》的一首诗念给森本听。森本听着听着，心里就紧了起来。平常是那么冷静的很少表露感情的河田，在念完这首诗后眼睛润湿了。森本还是第一次见到河田这样动感情。河田在工作时候，这种

感情是从来不表露出来的。

“工厂里没有问题吧？”河田问，他老是替森本的“脸”^①担心。

“有一点问题，因为时间长了。”

“唔。可是即使有一点儿问题也不好啊！”

“据公司里的笠原说，最近警察局特高科的人常到厂长那里去，不知道谈些什么？”

河田刚把火热的炒面上的煎鱼放到嘴里，一听见这话，立刻竖起眉头。

“厂长经常带一些陌生脸孔的人到厂里来，陪着他到车间参观，也许这些人就是特高警察。据阿君说，厂里有被资本家收买的走狗，把工人中的情况全部向他们报告。要是不知道这些人是佐伯的手下，碰到他们手里，那可就糟了。”

“……这可得小心啊！”

“《H·S新闻》他们大概也知道了，好象很头痛，他们到处在打听这张报纸是在哪儿印刷的，从哪儿进来的！”

“嘿！”

《H·S新闻》最初都是很严密地当面手交的。随着组织扩大，日趋巩固以后，便故意把它丢在工厂显眼的地方，或者小规模地散发。

“厂长说，这张报纸是工会搞的。《H·S新闻》第十六期上登载了总经理一年的详细收入和家庭生活，以及他一年中花在艺妓身上的钱，还有小老婆的事儿，这一期大受欢迎，终于一个一个地传开啦。许多女工说，要是这些事都是真的，过去简直被

① 这里的脸指的是森本的身份。

他那一身‘工人装束’欺骗了，大家都气得哭了。这些话听起来好象撒谎一样，可是却是真的……”

两人都大声地笑了起来。

“不管怎样，我们的《新闻》是细大不遗的，什么都给登出来，这下可叫那些家伙们无立足之地了。”

外面行人已稀落了。两个人小心地走着。快来到森本家的坡路上时，河田从口袋里掏出一包报纸来。

“你明天把它读完，读完后马上烧掉。”

森本接了过来。

“那么，我明天九点钟左右到你那儿去，你在家等着。”河田说罢，拐进了黑漆漆的小胡同。森本站住，听他的脚步声慢慢地消失在远处。

第二天，河田动员森本加入共产党。

十九

“H·S工厂”的支部每天开会，为了不出漏子，会上决定了各种严密的方法。河田也出席了会议。

用传单形式来散发群众性的报纸，为了使它能起作用，必须要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就是说必须选择在工厂委员会召开稍前，同时又是金菱银行决定“整顿”这个工厂的时候。

会议又决定了在散发传单以后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策略以及召开职工大会等问题。

这一回，总经理也想利用工人，因此它和一般罢工不同。总经理正在走向没落，所以斗争的对象不是总经理和厂长，而是抓

住这个全厂动荡不安的时机，争取建立团结工人的机关。另一方面，总经理他们也打算团结职工，在形式上两方面是一致的。那么，怎样把两种完全相反的力量在这一点上结合起来呢？

传单的纲要大体如下：

1 厂长从上而下指派的工厂委员，能起什么作用？我们要求由全体职工选举决定工厂委员。

2 过去工厂委员会提出的议案先经厂长过目后，然后只提出无关紧要的问题。这种不合理的事情我们难道能够容忍吗？应该不断提出有关工人真正日常利害的要求。

3 工厂委员会委员长由厂长担任，这样便不能作出有利于工人的决议。委员长应由全体委员中互选。

4 委员会决定的事也有被推翻掉的；厂内在修改重要章程时，从未提交给委员会讨论过，均由总经理和厂长任意决定。结果委员会只能讨论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这样，委员会比只有一块招牌还不如了。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欺骗手段。

5 厂里既有女工，委员会里也应有女工参加。

6 为了对付“金菱”残酷的“整顿”，反对虐待和解雇工人，唯一的力量就是掌握住自主化的工厂委员会，步调一致，团结全体职工，此外没有别的办法。

7 总经理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也许正在进行种种策动，决不要上他们的当。

8 市内橡胶公司、印刷公司、铁工厂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们向“H·S”伸出了同志般的手。

9 对码头上搬运夫的苦境不能隔岸观火。同样的命运等待着我们。我们应当和他们紧紧地携起手来共同奋斗……

从各个角落里传出来的谣言和臆测，象雪球似的越滚越大，毫不客气地扰乱着工人们，大伙儿都弄得七上八下沉不住气。一到休息时间，大伙儿都凑在一块儿，甚至连工长也参加进来了。

经常给厂长偷偷地做些小家俱的钳工车间里的工人，这回也公开被人骂开了。工人岂但不能去厂里做一点私活，就连拿一块铁或马口铁出去也要被开除的。

“对新厂长也这样？哈……哈……请多出把力吧！”

以前奉承上级、狐假虎威的家伙们都一个一个倒台了。他们一旦失去了支柱，就在群众中孤立起来。

“活该！”大伙儿都公开地骂起街来。

跟厂里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工长们，一个个面如土色，狼狈不堪。他们主张先召开职工大会研究对策。领头的就是佐伯一伙人。他们到处宣传：“此乃 H·S 危急存亡之秋，望诸君奋起战斗！”指望煽起职工们的“爱社心”^①。——他们只有在这种时候，才想起利用工人们。

中午休息的时候，女工们就在男工交头接耳的地方徘徊。

“怎么样啦？”

“男工和女工都要裁掉一半！”男工自暴自弃地嚷了一声。

二十

传单很周密地经由女工的手拿到工厂里来了。这是在女工们准备上夜班，回家较晚的时候，把传单一张一张塞进工人们挂在更衣室的上衣里。有十来个女工干净麻利地做完了这件工作。

第二天早上，森本在工厂门口按“时间卡”的时候，戴小帽的钳工车间的工长说：

^① 日本的公司叫“会社”。“爱社心”就是指爱自己的公司。

“出了大事啦!”

“多怕人的传单,一定和《新闻》是一个系统的!”

“嘿!”

“这次全部都发到了,到底是从哪儿弄进来的呢?这工厂越来越不象话了。”

工长是从鹤见地区的工厂转过来的“流动工人”,他瞧不起这里的工人,说他们是“乡下佬”懂得什么。钳工车间里的人都恨他。大伙儿说,要是发生罢工,不等搞总经理就先搞他,用起重机把他倒吊起来。“哼,等着瞧吧!”森本心里冷笑了一声。

整个工厂都在纷纷议论早报上登出来的金菱银行的态度和传单里所写的事情。森本一进厂里就感到这个气氛。他想:“这下成了!”在上班前的几分钟里,大伙儿都在机器旁边东一堆西一堆地谈论着传单的事。

“事到如今,这件事看来还是头一个问题哩!”

森本在人丛外边听到了这句话。

他刚走进制罐部,就被站在第一列冲床旁边的阿君发现了。她立刻走过来,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说:

“得啦!大家都说工厂委员会应该采取选举制有道理。可是你们那边的那个老家伙,那个秃头的老顽固却把大家手里的传单抢走了。”说罢,阿君就象男人似的走回去了。

无政府主义者武林正在卷边机旁加油。他突然抬起头来看了一眼。

“这是你干的吧……”他对森本说,“你这算什么?大家那么起哄,你却象厂长似的没事儿?”

森本吃了一惊,躲开他的锐锋。

“指导精神不同嘛!”

“是吗？你这种指导精神意思就是自己不吃飯也行，是吗？好极了。”

“对，你说得一点不错。”

森本之所以要到制罐部去看一看，为的是了解一下那些互相有血亲关系的工人們的动向。这件事他曾经特别告诉了阿君和其他同志們，叫他們注意。可是此刻还看不出动静来。

现在令人担心的是厂长先看出整个工厂的动向，扬言这关系到“H·S”整个利益，用某种形式“先发制人”地召开“工厂大会”。厂里的动态虽然很清楚，但不容忽视的是，工人們的兴奋并不是从工人自己的立场，从阶级觉悟而来，还是把它认作是“整个公司的大问题”。他发觉这很容易使工人上当。

翻砂车间里，在车轮的砂型旁边有三四个人站在一块儿说话，其中也有做木型的木匠。他把淌到嘴边上的鼻涕一次又一次地吸到鼻子里去。

“要是没有人下决心带头干，这些人是没有办法的。”

说话的是增野。以前他当学徒工的时候，有一次提着盛满铁水的铁桶，从熔炉到砂型那里去，一不小心被放在脚跟的木型绊了一交，把半片脸都烧烂了。脸上留下了怕人的伤痕。

“各车间里出一两个人怎么样？”

森本认准了他，这是“支部”的发展对象。

翻砂车间里的工人不论哪个脸上都有些伤疤，手上绑着绷带。这是因为往砂型里浇铁水的时候，水分急剧散发，同时溅起了铁浆的水花把工人們都烧伤了。

锻压车间里，耳朵有点聋的北川老大爷一见到森本就说道：

“真的象传单里所说的那样会发生什么事情吗？阿森啊！不那么干一下，看来是不行了。”

“是嘛，那样的话，老大爷你也可以放心了。”

北川老大爷耳朵聋，只瞅着他，一面歪起头，脸上露出似笑非笑的样子。

干铆钉活的山上说：“干啊！”——他是“工厂党支部”的一个同志。他的胳膊稍稍一动，上臂的肌肉就鼓起来，身体很结实。

“钳工车间怎么样？”

“那还用说，当然是‘总店’罗！”

“‘总店’这两个字说得好，别让人家抢先呵！”山上笑着说。

“我倒愿意叫人家抢先。”

钳工车间尽是熟练工人，对于金菱银行的接管，并不会直接影响到。它不象制罐部那样随时可以换人，这是它有利的地方。但最重要的是以森本为中心的“党支部”就在这里，因此这里是比较巩固的。

一个拿着粉笔在钻床上画圆圈的伙伴瞥见了森本，眯着眼睛一笑。他把沾满粉笔灰的手在工作服的屁股上擦一擦，问森本：

“‘纸’呢？”

“今天早晨就撒出去了，咱们得抢先一步。”

站在车床、龙门刨床、铣床边的工人们都含着笑容朝这边看。他们一只脚搭在机器上，正在喷着口水谈论着金菱的“政策”。铣床上还夹着从昨天起开始切削的齿轮。

在车床旁边的空地方，堆积着齿轮、车轴、铆好的烟筒和铁板等。在刚装配好的机器上新涂的红油漆气味，冲着鼻子扑来。

上班的汽笛响彻波浪形的屋顶天花板。工厂里只留下两个工长，其余大概都到办公室去了。——大伙儿跟往常一样，汽笛

响过后，没有立刻去开动机器。

传送带哒哒地往前推进，机器的响声好象从地里冒出来似的越来越大，淹没了人们高声的谈话声。车轴和传送带一搭上，机器仿佛突然活了起来，齿轮啃着齿轮，圆筒呼呼地转动着。空罐头隔着一定的间隔，从传送带上送过来，传送带好象电影片似的从这个机器向那个机器移动。手推车每次往铁板台上运来大张大张马口铁时，铁板亮晃晃的把天花板、墙壁和机器都照射出来，比利刃照得还要清楚。在制罐部里做工的女工们一边把罐头盖聚拢来过数，一边唱着歌。歌声在机器轰隆轰隆的间歇中响亮着。天花板上的铁梁支撑着机器，微微地抖动。

“那个什么《新闻》是替共产党宣传的，对不？”工长反剪着双手，在机器与机器中间踱来踱去，说道。

“不知道。”

被他问的工人爱理不理地顶了回去，不由地怔了一下。他是“党支部”一员，每当《H·S 新闻》上漫画很多的时候，他就把它贴在机器上。

“幕后一定有共产党，一定有。”

“要是那就是共产党，我看共产党倒尽说些有道理的事情。”

“所以说，这才可怕哩！”

“所以说，这张报纸不一定有什么幕后才是真的哩，是不是？”他说着笑将起来。

上班已经快二十分钟了。——正干着活的工人的背脊被人轻轻地敲了一下。

“这传单不知是从哪儿弄进来的？”

那人把一张小纸头麻利地塞进工人的口袋里。这时恰好有两个工长在车间里。

下班后请全体到食堂集合，讨论“工厂委员会”的选举制度。
危机已经迫近！团结起来保卫我们自己。

“看完后传给别人，可不要传给靠不住的家伙。”

“嗨！到底是来了。”

就在这同一时候，在模具车间里，在翻砂车间里，在卷筒车间里，在制罐车间里，在油漆车间里，在制箱车间里，在装箱室里，同样的纸片也正在用同样的方式在工人中传递着。

工长们边走边说，一个个从办公室回来了。在车间里看着机器的工长一看见他们，就慌慌张张地凑上前去，他们站在车间角落里说着话。工人们一面干着活，一面斜着眼睛狠狠地扫了他们一眼。

起重机工长从钳工车间的监望室的玻璃门中慌慌张张地奔了出来。原来是正在砂轮上磨着活儿的斋藤从旁边车床工人的手中接过一张纸片，塞进了口袋，正好被工长看见了。工人们神经突然紧张起来。大家感到要出什么事了，一齐朝右边看，盯住那个工长。

“喂！”

一只粗大的手抓住斋藤的肩膀。斋藤转过身来，显得很沉着。

“什么事啊？”斋藤慢条斯理地说，一只手迅速地伸进口袋，把那张纸片揉碎，掏出来踩在脚底下。

“就是那张纸头！”工长急得团团转。

“纸头？”

车间的砂地上浸透了水。斋藤的足尖擦着纸头，一边说：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你这混蛋！”

可是，工长也拿他没有办法，只得懊丧地看了看踩烂了的纸片，说道：

“你这混蛋，你倒对付得真好！畜生！”

放下活儿看热闹的工人们心里想：“活该！”

“你等着瞧吧！快把你吊在起重机上了！”

工长扑了个空，不好意思地摇着肩膀回去了。工人们从四面八方盯住他看，尽情地嘲弄他。

“王——八——旦！”

正在铣床上铣着车轴沟的一个伙伴把手掌围在嘴边成喇叭形，从后面向他作了一个鬼脸，惹得大伙“哗”的一声笑起来。工长急忙转过身来，对着车间扫了一眼。大伙儿又一本正经地绷着脸，摆弄着机器。可是在另一个角落里，不知谁忍不住了，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真可恶的东西！”

工长踢开玻璃门，气势汹汹地进去了。

“当心自己的脑袋吧！混蛋！”

中午休息的时候，森本和四个伙伴坐在一起，再一次周密地研究一下策略。

“女工方面怎么样？”

“从策略上来说……”

“是啊！……”

在离开很远的对面角落里，阿君正和伙伴们使劲地说着话。她脸上的表情落落大方，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把她的性格表露无遗。森本感到没法向她诉说自己的心情，突然觉得一阵空虚。吃完饭后，阿君端着碗走到森本他们跟前。

“怎么样？”森本问道。

“有四分之一的人参加。也没有人表示反对，女工们是头一次参加这种事啊！”

“唔。”

“我再加把劲吧！”

“好！那么拜托了。”

“阿森，这回你得拚着‘饭碗’干啊！‘饭碗’打破了，大伙儿养活你。”阿君爽朗地笑起来，一边向放碗的台子走去。

“那些‘大人物’怎么样啦？”

森本问伙伴们。

“办公室当然还不知道这个‘工厂大会’是怎么回事，他们正在研究对策。刚才杂役说，总经理坐着汽车来了，好象是厂长打电话请来的。可是总经理正晕头转向地到处乱窜，看来还有比工厂更大的问题，顾不上这儿啦。”

“这正是我们打中了要害。”

更衣室刚好在临时会场的“食堂”隔壁，都在二楼，上下楼梯只有一个。——工人回家时必须跑上楼去，穿过食堂去换衣服，再从楼梯上走下来。这一个偶然的地利给森本他们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就是说不到食堂里去参加会，就怎么也回不得家。——他们派一两个在工人中有威信的“党支部”同志站在楼梯口劝留工人。

不赞成开会的工人和女工们暂时都在楼下车间里，有的在机器旁边，有的在角落里，嘴里嘟嘟哝哝，来回踱来踱去。他们要想回家，可是此刻走不了。这些多半都是年老的和有老婆的工人。女工们东一堆，西一堆伫立在那里。他们不去开会倒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或者觉得干这种事象是不

守本分，所以踌躇不决。

“不是商量罢工，是请你们选举委员，就这么一件事。”

森本挨个儿解释给他们听。有的人说：

“既然就这么一件事，那么也该跟厂方心平气和地谈呀！”

“我们这样做，不是很心平气和的吗？又不是跟公司吵架，请你们都去参加吧！”女工们被阿君、阿芳一说，五六个人挤成一团，拥上了楼梯。

工长们见事情不妙，都跑到办公室去了，因此没有人来阻挡。

食堂里，出乎意料之外挤进了三分之二以上的工人。但差不多的人都是关心“公司的存亡”才来参加的。要是事前不估计到这一点，就会把事情搞糟。这些“福特”的工人如果不是因为关心“公司的存亡”就不会来这许多人了。问题是如何紧紧地抓住他们这个心理，强有力鼓动他们，把他们的方向扭转过来。

这时候，从晦暗的车间中闪过来几个人影子，原来是厂里在各重要的地方布置的纠察队。

“阿森，佐伯那些家伙们在材料仓库里不知商量些什么，而且都穿着柔道服。”

“佐伯！？”

森本顿时变了脸色。——这些家伙要动武了！这念头在森本的脑子里一闪。他从来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

“好！把钳工车间里的小伙子都集合到这儿来，咱们也别再磨磨蹭蹭了，快开始吧！”

森本走上楼梯。将近五百个工人的喧嚷声、脚步声和搬动椅子的声音响成一片，形成一股巨大的压力迎面压过来。预先准备好的鼓动演说象一股洪流从人群穿过去。老远一听，那字

字句句都吸引着工人们注意。象潮水一样的群众力量被鼓动起来了。最重要的是通过这次演说把关心“公司存亡”的工人们争取过来了。——森本感到体内的血液从未象今天这样沸腾过。他想到今后必须完成的重大任务，全身不由地颤抖起来。他仰了仰头，咬紧牙关，可是全身还是不停地发抖，他内心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恐怖。他想：此刻要是河田在身边该有多好，哪怕他在旁边站站，也会给自己增添一份力量。

一个熟识的工人回头向他笑了一笑，仿佛说——“好好地干吧！”

食堂里水汀的热气和人们的气味混在一起迎面扑来，十分难闻。穿着满身油垢的工作服的工人，肩靠着肩，脸并着脸，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有的胳膊叉在胸前，有的托着腮帮，眼睛盯住演说的人。这些来自不同车间的工人不知不觉地和自己车间的伙伴坐在一起。无政府主义者武林的一个同伙绷着脸，显得很别扭的样子，倚着板壁站在最后面。

靠左边的女工们发觉大家的视线都集中到她们身上，局促不安地象一堆死水似的挤在一块儿。过去，公司里无论举行什么会，都不让女工参加。今天她们第一次觉得自己的地位提高了，心里很高兴。

此刻在讲台上讲话的是翻砂车间的增野。“我的半边脸孔是怎样变得象鬼一样的？”他正在说他自己的事。他讲话时摇晃着身子，一张口，那张红烂了的脸就歪扭过来，真象一个鬼。——人群中有人在窃窃私语。

“他这张脸真可怕！”间或还夹杂着轻轻的笑声。可是增野充满着热情的演说把这些声音都压下去了。

“我们每天干活都冒着危险。你们看到我这张脸也许会发

笑。可是我这个可怜人幸亏只烧掉了这张脸。为了一天不到两元钱的工资，我们却不得不连命都拚掉。在制罐部里做洋铁罐子的伙伴们中，我知道有多少人没有手指头。——没有指头的人！大家想想，这个制罐厂据说还是日本首屈一指的。可是遇到这种情况，公司叫我们怎么办，我们就得怎么办。我们没有别的办法。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保护自己利益的组织，难道不是吗？”

增野更加有劲地说下去。

“金菱银行什么样啦，产业合理化又是怎么样啦，那些噜噜嗦嗦的道理我是不懂的。我只知道咱们工人有一半以上要被裁掉，要降低工资，还要更加拚死拚活地干活，大老板们还要更加发财！”

他找了一下喝水的杯子。

“那么……”

可是杯子里没有水。他接不下话头，突然一下兴奋，又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这回他自己也忘了说到什么地方，只见无数的脸在他眼前重叠在一起，歪歪扭扭，摇来晃去；这些脸好像在叫喊什么。他弄得没有办法，只好把最后的话大声叫出来。

“我说一说工厂委员会的事。我们必须把那些家伙们随意操纵的委员会拿到自己手里来。第一步就是选举委员。我们希望全体工人团结起来，为达到这个目的而斗争。——我都说了些什么呀！？”

最后这句话好象是自言自语，又好象不是，可是大家都听见了，“哗”地一声笑了起来。

“懂啦懂啦！”不知谁还故意鼓起掌来。

阿君来到森本背后。她蓦地触了一下他的背。阿君兴奋的

时候半边面颊老是涨得通红。

“你把耳朵凑过来，我跟你说……”

“唔，什么事？”

“我说，我叫阿芳上台讲话啦。”

“阿芳？”

那个“漂白的孤儿”讲话？说话直来直去的河田管阿芳叫作“漂白的孤儿”。——她脸上的皮肤干燥而无血色，肩膀又窄，老是象冻得发抖似的。她不爱说话。除了深思熟虑的话以外，经常是不声不响的。每逢她和阿君站在一块儿时，就给阿君比下去了，显得寒碜。

“老实人往往出人意外地干起别人不敢干的事。我当然可以上去讲，可是大家都知道我会说这些话的，因此，不会使人感动。可是阿芳一上去，大家都会吓一跳，效果百分之百，所以硬把她推上去了。”

阿君狡猾地笑起来，紧闭着的红嘴唇贴在他耳朵边。

人们都等待着，看下一个谁上台来讲话。果然出人意料之外，从那边角落里走出来的不是个“女”的吗？大家都屏住了气。——一看，原来是阿芳。会场上喧嚷打破了暂时被压下去的沉默。

“是她吗？”

阿芳双脚摇摇晃晃地踏上了讲台，脸稍稍偏向女工们。她规规矩矩地垂下两手，低着头站在讲台上。——脸色都青了。

“在这么多男人面前，这个女人也太脸皮厚了。”——森本听见旁边的一个涂漆车间的工人说。

阿芳就这么头也不抬说了起来。因为声音小，大家都听不见，于是众人停止了说话，用手掌挡在耳朵后面，身子稍稍往前

探出。

“光上这个讲台，不知要下多大的决心……也许我太放肆了……可是我再也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反正总得有人先站出来放肆，不然我们怎么办呀？……”

“是那个老实巴交的阿芳吗？”

她说一句停一下，这时候大家你插一句，我插一句。

“喂，你看怎么样？”阿君问森本。

“我看行。”

“我们和大伙儿一起工作以后，自己觉得自己变了。”阿君说。

“……我们经常受到男工和公司方面的歧视……”——阿芳的话不时被人打断。

“作为一个女人，能来到这种地方，能这样上台讲话，在这个工厂还是第一次……我们要求大伙儿一个不剩地团结在一起，互相帮助，希望诸位也……”

阿芳刚走下讲台，只听见大伙儿“哗”的一声欢呼起来，随即响起了一阵掌声。掌声持续了很长时间。正如阿君所说，在男工中引起出乎意料之外的反响。

“你说得太温和了。”阿君对阿芳说。

“可是阿芳能这样说，就很了不起啦。说得很好，我都掉了眼泪了。”

“是吗？”

阿君也擦了擦自己的眼睛。

“去吧！快去给她打打气。”

阿君朝着女工们的方向走去。阿芳正被大伙儿团团围住，她心里激动得再也不能自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有一个伙伴走过来对森本说：

“我看还不能高枕无忧，我转了一下，到会的还是关心‘公司存亡’的人居多。”

“可是他们既然聚集到这儿来，就会随大流卷进运动里去。我看问题不大。”

“不过，我认为得抓住这个时机，使运动取得成功。往后就得一个一个把他们硬拉进来。”

接着是各车间的代表顺次上台讲了话。这些人全部都是“党支部”的成员。每个人都抛出了火一般热烈的词句，把公司方面借口“公司存亡”，企图出卖全体职工的阴谋彻底揭露出来。工人中就象丛林迎着急风一样动摇起来。森本暗暗吃了一惊。台上讲话的人一个接着一个毫不留情地揭露厂方的阴谋，他们的讲话一浪高过一浪把对方的话压住了。

电灯亮了。薄暗里，工人们象一团团的灰色的疙瘩，宽阔的肩膀一个挨着一个，此起彼伏，在这一瞬间大伙儿都活跃起来。

“瞧！电灯亮啦！”不知谁喊了一声。

这一句没有什么意义的话，立刻使大家的情绪高昂起来。

团结起来，现在是时候了！

突然间，四五个人跺着脚唱起歌来。经常到酒吧间去喝酒的工人都会唱这支歌。此刻他们很自然地顺口唱了出来。大家一齐都朝他们看，唱歌的人们似乎有点害臊，第二支歌显得有点乱，可是粗壮而不整齐的歌声仍然在继续下去。

胆小鬼，要滚就快滚吧！

森本最后一个上台，他已无须说什么了，只是将早就准备好

的“决议书”和“要求书”加以说明，取得大家同意。这一切行动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河田他们策划好的。

森本还没有说完，只听得楼梯下一阵激烈的争吵声。——工人们一脚把凳子踢开，他们已经形成一个集体，一窝蜂拥到狭小的楼梯口。

“谁敢捣乱，干掉他！”

这时，楼下的争论象是被压下去了。一个在楼梯下放哨的工人慌慌张张地跑上楼来。

“佐伯那班家伙说要上楼来。正在争执不下的时候，总经理、厂长、工长也来了。怎么办？”

“好！”森本斩钉截铁地说，“只让总经理和厂长上来，绝对不让工长和佐伯那班家伙上来。”

“对，就这样办！”

究竟谁得手，谁不得手，全要看这回了。

厂长先上来，跟着总经理也上来了。厂长紧闭着嘴唇，绷着脸，因为紧张，脸上的肌肉在微微抖动。但总经理却满面笑容，和颜悦色地向工人们打招呼。他老是和和气气地，难怪一部分女工和男工都受他蒙蔽了。森本早就看清楚总经理心里怀的鬼胎，觉得必须马上先下手！在大家将要采取行动的时候，先下手为强，要是让总经理先开口，那就等于把这次会议拱手让位给总经理了。

于是，他在全体工人面前，先明明确确地把到现在为止的经过叙述了一遍，再报告全体一致通过了“工厂委员会”的委员选举制，接着提出了“决议书”和“要求书”。刚一说完，几个人带头鼓起掌来。这是预先计划好的。五百人的掌声虽然有些乱，总算也跟着响了起来。森本心里有点不踏实，不知道会议会发展

成什么样子。然而，掌声响彻了低矮的铅皮屋顶，摇撼了玻璃窗。它的余音使得总经理那小个儿的身体，象落叶一般失去了依靠，只有厂长站在他的一边。

总经理显然着慌了。他手里拿着“要求书”，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办。——本来，他到食堂来以前，心里还抱着一线明朗的希望。他相信自己长期以来给工人造成“Y市福特工厂”的那种过分的温情，不至于一摧就垮的。即使受一小部分“忘恩的”煽动家的鼓劲，工人们的热劲也许有几分减低，但只要自己一在那儿出现，全体工人“立刻”就会象雪崩一样跑到自己的脚下来。可是，此刻竟然弄得这么惨，难道这是真的吗？而且大家还一齐鼓掌！别的且不说，总经理最受不了的是觉得自己被出卖了，心里不是滋味。更坏的是他现在成了两面受敌。一方面是自己的地位已经动摇了。这已经够他丧胆了。而今是“金融资本家”的天下，“产业资本家”不得不趋向没落的悲哀使他痛入骨髓。另一方面，今年俄国对日本蟹工船实行报复，俄国的渔船还要侵入到堪察加的优良渔区来。这也是明摆着的事实。

厂长看到情况不妙，终于开了口：

“总之，这是一个重大问题，总经理有话对全体工人们讲……其他事情先放一放……”

“不，先等一下！”

涂漆车间里的一个党员从森本后面斩钉截铁地说：“今天的会是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召集起来的。你们……”

他激动得话在喉咙里卡住了。森本接着说下去。

“你们不能随随便便……”

他站在总经理和厂长跟前，而且相隔不到三尺面对面地说话，这还是第一次。他的脸涨得通红，好几次弄得不知所措。本

来，他平时就是一个在角落里默默无闻光知道干活的工人，甚至连总经理的脸都没见过。此刻一见到总经理，就感到他威严十足。可是今天这个“默默无闻”的工人却把厂长说得无言以对。

“首先请你们确确实实地答复。”

“先答应我们的要求，以后再谈。”

拥集在食堂里的工人们中，不知谁这样吆喝了一声。用这种口气对上级说话，在这工厂里是十分罕见的。他们聚集在一起，无意之中就产生一种力量。他们说话时就象在说别人的事，满不在乎。

厂长和森本互相怒目以对，厂长心里想：这些工人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马上在这里答应似乎有点困难，总得给我一点考虑的时间呀！”

总经理终于开口了。他这种谈话的方式和他的一套工作服，是“H·S 工厂”一向引为值得夸耀的事。

“考虑的时间？这决议是合情合理的，还有什么可考虑的？”

“可是，我们也有我们的难处……”

森本觉得必须再顶他一下。

“在目前这样朝不保夕的困难的时候，象我们这样顾了今天顾不了明天的工人们已经被逼得走投无路了。我们只有死守这个工厂委员会啦，刚才已经有不少工人上台讲了话。假如这个要求通不过，那么我们工人不惜发动罢工来争取它付诸实现。当然罗，我们并不希望罢工……”

罢工，在目前，总经理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堪察加六千六百万只罐头的订货怎么办？……

“……”

职工们都屏住了呼吸。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森本觉得也必须先下手为强。

“此外，还有‘金菱’来接管的事，我们觉得也有必要跟总经理商量商量。”

总经理突然抬起头来。森本不由地笑了一笑，但立刻毫不留情地追逼下去。

“这一切问题要等待厂方接受我们的要求书以后，在章程上明明白白地作了修改，大家才互相可以商量……否则，我们这方面太吃亏了。”

“……”

总经理很早以前就拿定主意要充分利用这个“职工大会”为自己服务。他要全体职工作出决议，拥护自己，反对“金菱”另派新的总经理。他又让工人自己捐钱，组织一个职工“上京请愿团”，到东京遍访有关方面，进行活动。特别是这次事件并不只关系到他个人，这一点对他是很有利的。他对别人可以说：你们瞧，不是连工人们都自发地举行集会了吗？因此，当工长向他报告工人正在开会时，他不但不象他们慌慌张张，反而浮上了会心的微笑。他说：工人们这样意气用事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他完全可以打电话叫警察来。可是他并没有这么办。——然而，此刻总经理明明白白看到自己对工人的估计完全失算了。他想不到工人竟然会来这一手。他们后面一定有人！难道“Y市的福特”就是这样脆弱，不堪一击吗？这些工人真是莫名其妙。这回可是货真价实地上当了，一切都已经晚了。

“那末，让我考虑两三天，怎么样？……”

总经理自己也感到软弱得可怜。

“两三天？可是‘金菱’能等我们两三天吗？”

“.....”

森本拿出了胜败在此一举的“杀手锏”来了。

“.....”

五百个工人竖起了耳朵只等总经理的一句话。原来站在总经理一边的工人，还有认为参加这个会参加错了的工人，此刻都汇合在一起了。五百个工人只有一个呼吸！

“.....”

站在最后一排的一个工人用脚跟跺地板，喊道：“明天下班以前给我们答复.....”

工人们象波涛一样鼓动起来了，接着响起轰隆轰隆的响声，简直要把食堂抬起来似的。工人们齐声高呼“万岁！”

森本的视线越过人丛的肩膀，瞥了阿君一眼，阿君正热泪盈眶，一只手紧紧捂住胸口正在向他凝视。

二十一

河田等急了吧？河田在那“二楼”上一定是坐立不安，焦急地等待着的吧！可是，森本不知道怎样把今天的这一大胜仗告诉给他？打哪儿说起呢？阿君也是一样。

他们两人要向河田报告情况，决定对总经理的答复采取如何对策后，又得马上回去，到一个同志家里去赴×××会。他们每次到“二楼”去时，都要先在门口走过两次，看看四周的情况。——此刻，两人在马路对面的黑暗角落里一边走，一边朝二楼张望。电灯亮着，但没有人影。楼下洋货店里，熟识的老板娘在账台上向外眺望，——她似乎已发觉了他们，脸轻轻地摆动

一下。

老板娘挥了挥手，仿佛驱散着眼跟前的烟雾。这就是“别来，别来”的暗号。

“奇怪！”

他们不敢站住，只得从店门口走了过去。走了一段重又折回到原处。他们得注意四周的情况。

“阿君，你装着顾客的样子到店里去买点手纸看看！”

“好。真奇怪！照理这地方决不会被发现的！”

阿君小跑着走进灯光明亮的洋货店。森本在稍远一点空地上墙边等着她。过了一会儿，他看见阿君从店里走出来。

“怎么样？”

“好象出了事啦！”

阿君喘着气。

“老板娘不敢出声讲话，看样子好象里边有人守着哩。她找钱给我的时候，推了我一把，意思叫我快走，快走。”

一股冷气掠过他的背脊。假如是在白天，阿君也许就看出他的脸苍白得跟泥土一样了。此刻他简直不象打败总经理的森本。

“唔，怎么回事呢？也许是罢工的事被发觉了。”他的舌头不知不觉发起粘来。

“不管怎么回事，反正这一带很危险。”

他们绕过灯火通明的大马路，到开会的伙伴家去转了一下。两人怕他们担心，也不提刚才的事。屋子里已经有两三个人来了，大家都很兴奋，精神百倍地叫叫嚷嚷。森本忽然担心起自己的家，喉头立刻发干，一连两次跑到厨房里去喝水。

他说了一声等一会再来，就出去了。

“你的脸色很难看，现在是紧要关头，要当心啊！”伙伴很关切地对他说。

阿君也一块儿走了出来。他完全不象刚才那样有说有笑，一声不吭，直往前走。

“我觉得铃木这人很怪！”

阿君不知在想些什么，突然这样说。她好象走着路不说话很难受似的。

“这个人尽说些怪话……什么阿君你跟河田亲过嘴了，跟我也亲一个嘛！……他一喝醉酒，瞪着眼睛怪可怕。再说，我真讨厌他。他好象发生误会了。也许我这个人很容易引起别人的误会……不过，我呢，自从参加这个工作以后，过去那种无聊的事我都摔开了。我已经没有那份心思啦，你说奇怪不奇怪。还有阿芳，你知道她日思夜想的对象是谁，原来还是河田。可是她自己还没有对河田说……”

森本怔了一下，慌张得连他自己也觉得奇怪。这难道是真的吗？这样说来，他想起河田曾经说过，他有一个生活极端困难的可怜的女人，是他唯一的女人。

“不光是铃木，男人嘛……都是这样……”

阿君说着又象平时那样淘气地噗嗤一声笑了。

“不过，你和其他人有些不一样……”

“那是因为……”

森本自己也不知道是哪一股子劲，滑出了这句话。可是他觉得此刻再不说，那就永远别想说了。他一本正经地低声地说：

“那是因为我真正爱你啊！……”

“你说什么呀？你这个人真可笑！”森本刚一说完，立刻就想到阿君会不会用她毫无顾忌的爽朗的笑声把他这句有点肉麻的

话一扫而去，他的脸立刻涨得通红。——可是，阿君却默不作声。两人从此不再交谈，别别扭扭地往前走。

来到桥上时，他记起一件事。——他让阿君先走，自己把衣服口袋全部检查一遍。在里边口袋里掏出一本薄薄的折成四折的小册子，折过的地方已经破烂了。这是从河田那儿拿来的必须烧毁的文件。他把它撕成极小极小的碎片丢到河里。碎纸片在黑暗中显得雪白，飘飘荡荡地落到一片死水的河面上。他隔一会丢一点，分作好几次丢下去——丢着丢着，他感到放心了。

阿君靠在商店橱窗的厚玻璃跟前等着他。他仍然一声不吭。

来到分别的地方，两人停下脚步来。这时，森本第一次握住了阿君的手。

“打起精神来！再加一把劲，加劲干！用我们自己的力量也可以使‘Y市的福特’停止转动的。”

阿君低着头，不看他的脸，却用力地握他的手。

森本刚一推开家门，就吃了一惊。他虽然什么也没看见，可是在这种时候，他们这种人立刻会闪过一种直感，就象闪电一样。——格拉一声纸门拉开了。两个陌生的便衣警察站在那里。他想：糟了。这种事他还是第一次经历过。——可是到了这样危险关头，他却奇怪地心里一点也不着慌。

“是哪一位？”

“哼！”

便衣警察冷笑了一下。

“署里来的。”

他默默地跨进屋子，父亲不在，大概还没有回来。

“啊！你——”

母亲吓得面如土色坐在一旁。可怜的母亲大概在他们等着抓他的时候，还给他们沏了茶，桌上放着一盘“南部薄脆饼”和两只茶碗。他一看见这些东西，心里象刀割似的，对再也说不出话来的母亲说：

“妈妈，没有什么，马上就会回来的。”

便衣警察把他的上衣口袋全部搜查一遍。家里也全都搜查过了，东西弄得乱七八糟。

那个矮胖胖的便衣警察在土间里系着鞋带，一边说：“没有想到这种地方也有这种不稳分子。”

从警察的话中，他听出他们有点出乎意料之外，似乎不应该在这种地方发现他。过去，他一直信守河田的指示，从来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下落。难道这是河田说的吗？这绝对不可能。那末，其中一定有别的原因。

母亲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他觉得自己再要说些什么，她就会哭的。

“我去去就来！”

他就这样被带走了。

二十二

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被关进这臭气冲天的拘留所，怎么也睡不着。这是一间单身监房。

他在混浊的空气中背靠着板壁坐着。——各种各样的想法

一个接着一个从他脑海中闪过。但奇怪的是他并不感到恐怖。头脑似乎越来越清醒。

天快亮了，但还是黑沉沉的。他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好象梦见了阿君。身上一阵发冷。他把下颏贴着前胸，弓着背。

笃、笃、笃……笃……

他竖起耳朵听，却分不清这声音是从哪儿传来的。再听，声音又中断了。他屏住呼吸，耳朵嗡嗡响，仿佛一切东西都冻住了。

笃、笃、笃……笃……

他把耳朵贴在板壁上。——声音是从隔壁传来的。可是分不清是什么声音。他本能地小心地向外张望，然后，捏起拳头在板壁上“笃、笃、笃”敲了三下。——那边的声音停止了。这样敲行吗？他心里突然一怔。暂时间，双方都保持着沉默。

笃、笃、笃……

对方又敲了起来。这次敲的地方跟刚才不一样，他向着响声的地方走去。从那里漏进来一丝亮光。原来拘留所里经常都有这样情况，以前关进来的人每一个都把板缝打开一点，那地方的木板已被剥掉一块，开出了一个小洞了。——凑巧的是这个洞口在监房尽里边。他下了决心，在同一地方笃笃敲了两下。

从洞口传来低微的声音。

他把身子慢慢地往下滑，让耳朵刚好贴住那个洞口。

“你……”

声音听不清楚，他把耳朵的位置换了好几次。

“你是谁？”

“是谁？”——可是对方又是谁呢？他把嘴巴贴住洞口。

“你是谁？”他问道，接着又换过耳朵贴到洞口上。对方不说

话了。接着用稍大的声音重复了一遍：

“你是谁？”

哎呀！这不是河田的声音吗？他的血立刻沸腾起来。他小心地张望一下狱门外面，然后又贴着嘴说：

“是河田吗？”

对方似乎吃了一惊。

“你是谁？”

“森！”

“是阿森吗？”

对方听懂了，他全身的神经都集中到耳朵上。

“身……”

“身？”

“身体好吗？”

“啊！好！好！”

“……”

对方说些什么，听不清。

“听不清楚，声音大些。”

“工——”

“工厂，唔。”

“没问题吧！”

“唔，进行得很顺利。”

“以后……”

“以后吗？”

“怎么样了？”

“没问题。”

“那末……”

“怎么？”

“不要泄气。”

“嗯！”

“永远……”

“永远？”

“对，永远鼓起精神……”

“懂了！”

虽然在这样不自由的谈话中，他也感到河田仍跟平时一样，他心头一阵热，喉咙嘶哑了。

“谁……”

“嗯。”

“伙伴……”

“火盘……”他拚命把耳朵贴近。

“不，伙伴。”

“喔，伙伴。”

“叛……”

“盼……”

河田的话听不清楚，可是他心头一怔。

“叛变了？”他不由地高声说起来。

“真的？”

“真的。”

他不知不觉地捏紧拳头，掌心里直冒汗。

“不应？”

“唔，不应。”

“不应该被……”

“什么？什么？”

“不应该被发觉的事都被……”

“不应该被发觉……”

“都被……”

“都被……”

“发觉了！”

“……”

“事件……”

“事件？……唔。”

“事件……”

“唔，懂了！”

“是×××××！”

“果然是他！”

果然是他吗？他心里象刀绞一样痛苦。

“到……”

“嗯？”

“到底……”

“嗯。”

“坚持到底！”

“懂了。”

“那个……”

这时走廊上传来一阵皮鞋声响，他吓了一跳，跳起身来。

果然是皮鞋声。对面那一头突然一阵骚乱。

原来，警察为了掩人耳目，也把铃木抓了进来，可是他在拘留所享受着特别待遇。此刻天亮时巡逻警察发现他上吊自杀了。

第二天，“H·S 工厂”工人们按照预定计划，取得了“工厂委员会”自主化。当然，总经理在承诺中也还保留着下一步的诡计，但总算取得了第一步胜利。下一步就是货真价实的斗争，为了早作准备，必须巩固已有的立足点。——这是森本留给他们的任务。

阿君想，那夜把她和森本结合起来的第一次握手，简直是两人的诀别。想到这里，她心里难过极了。——可是，她懂得在他回来以前自己应该做的工作。

阿君回到厂里，把事情告诉了阿芳。阿芳擦了擦眼睛。

“别哭！别哭呀！”

阿君把手搭在她瘦削的肩上。阿芳正在想着河田。

春天快到了。象粗砂糖一样的雪粒在脚底下嚓啦嚓啦地响。

(1930 年 2 月 24 日)

转折时期的人

李长信译

本篇原名《転形期の人々》，一至五章发表于1931年《那普》杂志十、十一月号，六至十一章连载于1932年《无产阶级文学》杂志一至四月号。作者原打算写成一部长篇小说，把这十一章作为它的序篇。但是，自1932年4月之后，作者转入了极端困难的地下斗争，1933年2月被日本反动政府杀害，因此未能完成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

译文根据1956年青木书店文库本译出。

—

港水一片碧绿，深不见底，下面是岩石质。火成岩的山岗重重叠叠紧靠在港湾的后面。——小樽市的街道沿着山腰起伏，横躺在海岸上长长地延伸着。到了环抱港口的两座山角尽头时便开山截崖，向山谷里发展。街上的房屋一层高似一层往上发展，形成阶梯。在街上许多意想不到的地方，红色断层就象可怜的肉条一般裸露出来。但不到一个月的工夫，地面又被垫得平平整整的，造起还散发着香味的新木头房子来；那里变成可以登高远眺、空气清新的高台。——一处树木繁茂、深色瓦顶的住宅区建成了。

站在驶进港口的汽艇上望去，葱茏的树林和到处裸露着红色断层的阶梯形海港街道，好看极了。最底层有海关、货仓、运河和高大的轮船公司，是一条海岸大街；往上有银行、公司、大商店，是一条大厦街；再往上有咖啡馆、饮食店和夜市，是一条五光十色的游览街；更上一层，有公园和体育场，一片郁郁苍苍，一直通向山上的住宅区。这一层层街道的灯光，各自浓淡不同，看得真真切切。万家灯火又原样地倒映在黑黝黝的港水中，闪闪烁烁地晃动着。

甲板上的船员们侧耳细听，大街上的汽车声，和穿行在一排排房屋下面，在山崖间奔驰的火车声，越过海面传进他们的耳鼓。有时夏季的夜晚，甚至可以听到明亮的柏油路上人流的脚步声。

住在山岗上的人家，只消坐在走廊上，就可以隔着在漫长的冬季里被风雪浸黑的、各种高低起伏的屋顶，一眼望到港口。进港轮船的投锚声和起锚声，如同在耳边一般，听得清清楚楚。黄昏时分，防波堤象摆在那里的一双旧卫生筷子^①，它的缺口处——海港入口两侧的顶端，设有红、绿两座灯塔，每隔一定时间，就见它轮流地一明一灭。每次灯塔一亮，红的和绿的光柱忽地在苍茫的海面上拖起长长的尾巴。

北风从西伯利亚直接吹来，港水激起波涛，家家户户的门窗吹得哗啦啦响，扬起漫天的灰尘，径直吹向高台的住宅区。但那里有茂密的树林把风给挡住，是吹不到的。

码头上的海关、混凝土建筑的高层货仓和罐头制造公司的周围开有运河，形成“第一号填海造地”和“第二号填海造地”，到处架设的桁构式桥梁，把它们给连接起来了。汽艇砰、砰、砰……吐着烟圈，在桥下川流不息地进进出出。被煤灰、垃圾和面包屑污染的河水翻腾着泡沫，散发出一股半腐臭的气味。

运河岸边，带有各种标记的货仓和保税库都敞开笨重的铁门，驳船正在那里直接装卸货物。靠岸的许多带有帆索的渔船、机动船、驳船、帆船和舢板排成一大列，船帮互相摩擦着，碰撞着。遇有小火轮和驳船驶过，涡轮桨掀起的浪头冲击着聚集在岸边的船只，把它们猛烈地颠簸起来。

那里有几十个码头工人一字排开，从颤巍巍的跳板上走过；有的背大米，有的背杂粮，出入在昏暗的仓库门口。岸上把大福饼、馅面包、汽水摆在木箱上叫卖的女摊贩，被来往的工人调戏着，而她也不甘示弱地在反唇相讥。

① 日本人使用的一种木筷，两支粘连一起，上有裂口，用时撕开。

一只生了锈的铁锚连着一一条比大人胳膊粗的铁链丢在地上，不料，铁锚后面有一个身穿号衣的男人，仰面朝天地张着嘴巴睡在那里。

海关监视哨下面，是专供旅客和船员上下的栈桥，小码头直向港口伸进去。每当轮船驶入港口，船员登岸的时候，土娼们便靠着栏杆，一边望着海面一边慢条斯理地游荡。——夏天的夜晚，这些脖子后面耷拉着燕尾儿的女人，都一个个摇着团扇来到这里。

临海铁路的火车直通填海造地；肮脏的货车穿过乌黑的煤堆、木材场和木料场，经常来回地调动，发出闹人的响声。附近一带堆积着麻袋，象战壕上的沙包一样，里面装的是从北海道腹地运来的青豌豆、小豆和大豆。小型老式机车噗哧、噗哧地喷着白色蒸气，牵引着大型铁制运煤车往高架栈桥的陡坡爬行，看去渺小得很。无论什么轮船都要在栈桥下靠岸。煤从那里的一个漏筒中倾泻到轮船的煤舱里，它的声音越过海面一直传到栈桥。

一过五点钟，在有高楼大厦和银行的街道上，挤满了从各种楼房里涌现出来的人群。他们从那里穿过一层比一层高的阶梯形街道向山上走去。码头工人和工场工人向街道的两端走去。穿梭般来往的汽艇发出急促的砰、砰声，轮船上敲打的铜锣声，起锚时的铁链声，工人们的吆喊声，煤车挂钩时的碰撞声，堆卸木材、铁板和铁轨时震得大地咕咚咕咚的响声，船帮相互摩擦的咯吱咯吱声……这一切都好象被潮湿、盐腥的晚风吸去了似的，逐渐低沉淡薄了。——电灯开始眨起眼儿，夜幕降临了。

市区中心明晃晃的电灯，照耀得如同白昼。但街道的东西尽头，到了夜晚就象黑魑魑的深山幽谷一般。稀疏的灯光是那

样的昏黄、暗淡。——原来这里是远离市中心的偏僻地区，住的是清一色工人。有人问住在这里的工人：“你是啥行道？”他们都不讲自己的职业，只回答说：“我住手宫街。”因此，街上的人们生怕别人看到他走过这条界限——从山上凿开的这条路到手宫街去。

虽然同属小樽市，可是住在手宫街的人去市里时，都说“到小樽去”，或者说“进城去”。

穿过手宫街有一条河，两岸隆起，两边的房子是面对面盖的。家家住的都是煤烟熏黑了的连檐房，都是一个式样，顺着台阶排得整整齐齐的。不过越往下走，每家的房子就越杂乱，龌龊的小屋子乱糟糟地聚在一起，拥挤不堪。

河下游一条比较宽敞的街道有一家电影院。那附近的“公共市场”有集市。路边挤满小摊子。他们在空啤酒箱上铺起门板，上面摆着鲜鱼、青菜、咸菜、糖煮豆和酱小鱼等。走江湖的商人也夹在里面做生意。这一带总是湿漉漉的。一到下午三、四点钟，各家的妇女都提着篮子来了。她们中间，有的用带子把婴儿绑在背上，有的手拉着娃娃，有的袒着胸赤露出沉甸甸的大奶子……在小摊前你拥我挤，唧唧喳喳的一片嘈杂声。

小贩气急败坏地敲打着木板，各自在那里吆喊：

“喂，减价啦！大减价罗。买点吧！这么便宜还不买呀！”

卖香蕉的摊贩，用缠在手上的手巾擦着汗水，也不甘示弱地叫得更高。背在背上的孩子挣扎着又哭又闹。呼唤伙伴的声音，脚被人踏痛时的叫喊声……混在一起，乱成一团。人们身上的汗臭味、烂水果的酸臭味、咸菜味、腥气味……搅在一起，臭气熏天。人们回到家中，那股气味还附在潮湿的衣服上，久久不能消失。

从这里穿过两条街往下走，是一排排用石头或混凝土修建的货仓。在附近装卸杂粮时，地上撒落一些豆子，妇女们都背着口袋，拿着小筐箩和短柄笊帚去拾。货仓和货仓之间冷冷清清，长满纤细柔软的野草。深夜里，警察带着手电来这小路上巡逻，因为下夜班的男女工人经常走进这幽暗的地方。

过了货仓便是工场，建港造地的运河就夹在工场的中间。工场的大烟囱喷出的烟尘，污染了运河的水；一缕缕低垂下来的浓烟从手宫街家家户户的屋顶掠过，熏黑了屋顶，街道也灰蒙蒙的。烟尘还从所有的窗缝往住家的屋子里钻。在路旁和潮湿的巷子里玩耍的孩子，他们的鼻孔也都是黑的。桥头和各条大街拐角栽的树，伸手一摸树叶，连指头都沾得漆黑。这条街上的许多人家都没有钟表，全凭工场的汽笛声掐算时间办事。在街上游玩的孩子忽地竖起耳朵一听，说道：“哎，爸爸快回来啦！”

从市场那里不停地往下走，过了河向右走二、三百米远的地方，有几百家“暗门子”，一个挨一个地密集在形形色色的小巷里。门前挂着“随意小吃”的门帘，在昏暗的屋内空地上站着女人，在跟过路的男人打招呼。夹在“暗门子”中间的下等“酒吧间”只把门面粉刷一下，看去好象镶进去似的。乌七八糟的留声机的喧嚣声涌向街头。船员们乘舢舨一上岸就奔这里来。这儿的女人听见汽笛响，单凭声音的高低或不同的鸣叫声，就知道什么船进了港，什么船出港了。这些女人都是北海道内地的农民姑娘，和沿海一带的小渔户女儿，粗壮的胳膊，紫红的皮肤，说起话来很鲁莽。在这条街的入口处，开设几家药房、洋货铺和杂货店。每个铺子都大摆特摆“出售避孕套”的广告。

虽说同是一条手宫街，但住的也不完全一样。在现代化大工厂做工的工人，住着比较干净整齐的房子，有的还带个小院，里

面种着两三棵树。有职位的职工就单独住一幢房子，而且是盖在可以四下眺望的好地方。甚至在地方工厂和稍大一点的铁匠铺做工的工人，也都住着舒服的连檐房。可是，那些码头工人、搬运工人和打短工的房子，都是见缝插针盖起的，密密麻麻地挤在潮湿曲折的小巷里。因此，两家板墙之间，只有一线天空，比衣带还窄。大白天也得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挑着路走。到了夏天，家家燃起蚊香，妇女们身穿饱经洗晒的汗衫和衬裙，男人们只穿一条裤衩或系着一块兜裆布，把凉椅搬到路旁，手拿着团扇去外面乘凉。屋子里热得人实在呆不下去。

街上有面对工人开设的小商店，有摆着五、六把破旧木椅子的面食铺，有挂着白布门帘的冷食店；还有杂货铺——老板娘裸露着大奶子，怀里抱着婴儿就坐在铺子的门口。——这街上的许多人都喜欢买馅面包吃，喝“碗酒”。

整个手宫街是在一条慢坡上。往上约走三百米，再向右拐进去，便是朝鲜人住的地段。那里住的朝鲜人都是做短工、土工和脚行的。房子杂乱无章，满街臭气熏天。孩子们就坐在道旁的土地上玩耍。一发现陌生人走过，他们就停止游戏，一群群地尾随在后边。一个长着浅红胡髭的彪形大汉，常常躺在家门前的土台上张着嘴巴睡觉。这一带不时发生吵架斗殴的事情。双方各拉一帮就混战起来。不论在码头上装卸货物或做土工，他们的工钱都比日本人低，而且干多长时间都干，所以资本家愿意雇用他们。因此，他们和日本人的关系搞坏了。

另外，这条街上还到处有一些破旧的三层楼房，表面上看去是庞然大物，可是几十扇简陋的窗子却糟得很，歪歪扭扭的，摇摇欲坠。无论穷到什么地步，也不管是在怎样偏僻的小巷里，能住上一家一户房子的还算不错呢。但是，住在这庞然大物里的

几十家住户和几十个单身汉，都是更次一等的人了。在这样建筑物里，所有走廊上的地板都象干瘪鱿鱼一样，全是坑坑洼洼的，走在上面咯吱咯吱的响声使人大吃一惊。楼梯是歪扭的，上面粘着一层黑亮黑亮的油泥。若有人在二楼或三楼的走廊上一跑，整个房子就震得直颤悠。——从不同的房间里传出孩子哭、老婆叫的声音。一出现吵架斗殴的事情，也不管是男的、女的，还是孩子，就一拥而出。

这些破旧的庞大建筑物，大都以富贵人家的名字命名，叫什么“山田大楼”“岩城大楼”“大山大楼”等等。既不是大楼又为什么叫“××大楼”呢？没有人知道。

其中的“岩城大楼”，坐落在开凿出来的山道附近。

——龙吉一家就住在这栋大楼的底层。

二

龙吉跟父母从秋田乡下出来，大约是在他七、八岁的时候。那一年正是冬天，津轻海峡的海面上波浪滔天，一片昏暗。他（详细情况不清楚）只记得，在那恶浪滚滚的苍茫大海中，自己不知吐过多少次黄色的苦水。——他看见什么叫火车，什么叫坐轮船（当时叫火轮）……也是从这次出门才开始知道的。

他是个大脑袋扁鼻子的孩子。又晕火车，又晕轮船，他一直愁眉苦脸地抓着妈妈的袖筒，好象挂在上面似的。不过，一路上看见的听到的都感到顶稀罕，所以给他留下久久不能忘怀的愉快的记忆。自己跟着家人为啥要坐火车又要坐轮船呢，他一点也不明白，只觉得很好玩，甚至还以为要到一个快乐的地方去……

在秋田乡下儿时的情形，龙吉现在记不十分清楚了。只是在做某件事时，本来丝毫没有去联想它，可是，往事忽地浮现在眼前——那件事好象在哪儿见过似的。不错，小时候是有过这件事，他想起来了。这不过是极其偶然的现象而已。倘若是特意去回忆儿时的事情，那可就很不容易了。

然而，一回忆起来，当年他自己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观看翻斗车运土的情景，倒是经常出现在眼前——翻斗车上载满土，从陡坡上煞着闸奔驰而来；车上站着两个人一伙的男人和女人，男的一只脚踏在挡土的框板上，身体在拚命向后挺着扳闸。铁轨铺得极不规格，车子沿着危险的悬崖边缘摇摇摆摆地绕行。翻斗车运来的土，一车车从崖角上倒进下面的山谷里。——为了修筑通往此地的铁路，要把这山谷填平，因此成立了土工组。农民光靠种水田和旱地已维持不了生活，都来到这里做外工。

今非昔比了，农民在家中搞副业，做点穿的戴的和生活用品已经混不下去。这类物品以低廉的价格从城镇在向农村大量倒流。从前靠搞副业勉强糊口的农民，现在都抱着胳膊闲起来。人们不顾重利盘剥，都先借点钱到北海道的鲭鱼场去。这样村里人越走越多。龙吉的村子里，管这叫做“卖雇工”。这些人二月底离开村子，直到五月节前后才能回来。不去渔场的人就到山上砍伐木材往外运。七、八月份，正是农忙季节，但他们也还是得支撑着身体出外做日工。

龙吉的父母也是庄稼人，他们下地干活的情况，他已经没有印象了。不过，他只记得这么一件事——自己的平头顶大脑壳曝晒在火辣辣的太阳下，独自站在劈开岩石露出红色断层的、热气蒸腾的山崖旁，看着爸爸妈妈拉起翻斗车的车闸，带着一阵风从

身边飞驰而过的情景。现在想起来，真是个奇妙的记忆。

父亲黑红的脸上粘满泥土，一道道的汗水往下淌，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父亲就用衬衫的袖筒擦汗，神色紧张地拚命煞车。这个时候，父亲见了龙吉还是笑着向他说了一句什么话。一遇到这种情况，龙吉就吓得一楞，唯恐在那一瞬间，爸爸妈妈搭的翻斗车一个筋斗从崖角上栽下去。虽说他是个孩子，可那时的心里却怦怦地跳着。他想：爸爸妈妈不对自己笑也没关系嘛。

一天，奶奶把做好的便饭装进搪瓷饭盒里，又用包袱皮包了起来，龙吉带着它向翻斗车行驶的山路上爬去。这个活儿每天都是他来做。天气炎热，他把衣襟撩起掖在腰带里，露着葫芦形的小鸡头，一面得意地吹着那时刚刚学会，但还不够熟练的口哨，一面在悬崖的崖角上绕行。突然，龙吉的肩膀好象给人一把抓住，他努着小嘴停下脚步。——猛然间，觉得有一辆拐弯过来的翻斗车倾斜了。刹那间，只见一侧的车轮脱离轨道，响起空转声。接着，一眨眼的工夫，翻斗车就栽到铁轨那一边悬崖里不见了。就在这一眨眼工夫，龙吉连“啊”的一声也没来得及喊出来，只是努着小嘴站在那里。等看不见翻斗车的时候，他这才啊、啊、啊……地喊叫着跑过去。他以为那是爸爸妈妈的翻斗车呢。——等两三辆车子驶过去，爸爸妈妈才驾着车子驶来。他们看见他咧着嘴要哭的样子跑来的时候，便向他挥了挥手。龙吉顿时感到四肢无力，瘫软地坐在地上。——他心里从来没有象这样踏实过。

扣在翻斗车和泥土下面死去的人，男的是个土工，跟他搭伙的女人是邻村农民的老婆。从撕裂的印花布内裙下面露出折弯的大腿，已变成紫青色，有一半还埋在土里。一见到那只向相反方向拧过去的大腿，好象自己的腿也被拧弯了似的，神经质地感到一阵疼痛。

“喂，走开走开！”

杠夫头不断地驱赶着围拢来的人群。那正是换班的时候，给孩子吃奶的女人用围裙底襟堵着自己的嘴，从人们的肩膀中间往里偷看；也有的人不住地吐着唾沫。——一个手拿铁锹的土工赶来，他是挖掘尸体的。

“不是叫你们走开么！”

杠夫头真的发起脾气来了。

龙吉悄悄地夹在人群中间。每次铁锹挖进土里时，尸体就象活了似的，紫青的大腿还一动一动的。在那一瞬间，龙吉感到头晕目眩起来。

“阿作的家里可怎么办呀。阿芳就是干活，也还是混不上吃喝呢！”

“这回就别想锄草，收割啦。”

“唉。”

“真倒霉，越穷越见鬼！这话一点不错。我们穷人真是……”

从村里来做工的人们一面被驱赶着，一面嘴里嘟哝着。

吃午饭时，龙吉心里还在嘀咕着那只被拧弯的紫青色大腿，虽然是个孩子，可是心情却感到十分沉重。但不知为什么，爸爸妈妈要比往常的情绪好。吃过饭，妈妈把龙吉搂在怀里，用盘坐着的腿叉夹住，一股汗气的面颊贴在他的脸蛋上不停地摩擦。龙吉缩着脖子怪不耐烦的。可是妈妈仍旧把他搂在怀里，一面亲着他的脸儿，一面说道：

“真是妈妈的好宝贝，多乖呀！”

等吃过饭，龙吉便忘记那只拧弯了的紫青的大腿，又在摆弄着泥土玩起来了。

他的父母一直干到黄昏时才收工。夕阳映红了暮云，向西沉去。那里的地势高，落日显得很低。龙吉在父母的前前后后，挥舞着竹竿，时而向半空中抽打着，时而砍倒路旁的青草，竹竿发出呼呼的响声，三个人一起走下山坡。他们刚一绕过悬崖角，就看见咯吱咯吱响的担架正从看守的小屋里抬出来。人们围拢在一起，乱哄哄地互相谈论着。

父亲一看，便把头扭在一旁吐了一口唾沫，妈妈用围裙堵住了嘴。

“你看，今天没落在咱头上，还算顺当！”父亲说。

龙吉忽地想起今天爸爸妈妈的情绪好，原来是因为这件事。

“说，你想吃什么？——糖块儿、馅面包、肉桂糖……你想吃什么？”

父亲粘满泥土的硬梆梆的手心里，握着刚领到的五毛银洋，对龙吉这样说。

也不知道是在这以前，还是在这以后发生的事情。——一个秋天的傍晚。

龙吉伸直两腿，坐在幽暗的屋里铺着席子的地上，大拇指钩着稻草，学编草鞋玩儿，嘴里还吹着不太熟练的口哨。洋油灯的光亮照不到他那里，周围昏暗暗的。铺在马棚里的稻草发散出的蒸闷气味，从后门冲进屋来。有时还传来马的鼻息声和马蹄咕咚咕咚踢板墙的声音——那是一个寂静冷清的夜晚。

一直在外面编草袋子的妈妈，这时来到了土间里。她浑身满是稻草末，头上和眉毛上粘着一层雪白的米糠。妈妈从土间向昏暗的厨房里探进头去，用手捧着水咕噜咕噜地喝了几口，随后和父亲一起，又从外面把很多潮乎乎、沉甸甸的空草袋搬进屋里。

搬完以后，父亲坐在地炉旁，装上一袋旱烟抽起来。他在手掌上晃动着烟灰的余烬，不住地寻思着，呆一会儿再抽上一口。

这期间，母亲在靠近厨房的土间上归拢着稻草末，把它堆成了一堆。

“我说，孩子他爸！”

她催促了一下。父亲挺起腰板，说道：

“阿龙，把油灯拿过来！”

母亲把稻草堆点燃。她和父亲提着又湿又沉的草袋两端在火上烘烤。龙吉小心翼翼地两手往前擎着油灯照着。他心想：这是干啥呢？每当稻草熊熊燃起的时候，在昏暗的空地上就浮现出爸爸妈妈的红彤彤的面孔。

“妈妈，这是干啥——”

龙吉从遮在自己面前的油灯下方窥视着问道。

母亲的脸上陡然现出一副严厉的神色，但没有吭声。

“差不多了吧？”

她对父亲说。

爸爸把草袋子翻过来，看了看表面干燥的程度。

这时，只听后门咕咚一声，爸爸妈妈吓了一跳，一同回过头去。

“是马！”龙吉说。

“是吗？”

爸爸说着，仍在侧着耳朵静听。

“嗯，是马。”

接着，又继续查看草袋。

“妈妈，这是干啥？”

龙吉又问了一句。妈妈突然大声叱责道：

“住口！你知道什么。”

查看完草袋，又开始往里面装米。

妈妈把升插进席子上的米堆里，撮起满满一升，然后用手沙沙地把面上刮平。

“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

一边不住地数着，一边往草袋里装。

堆放米的席子有两张，各堆着两种不同质量的稻米。最先往里装好米，装了一半之后，又秤上一些比较黑的米装进去，上面再装上好米。

妈妈装完以后，爸爸就赶紧用草绳捆起来。大约装好五袋米的时候，松了劲的钟慢慢地敲了八下。妈妈一伸腰，脊梁骨发出喀吧喀吧的响声。

“好，完事啦……”

席子上的米，还剩下很多。

“剩下多少？”

爸爸一只脚踩在草袋上打捆，嘴里咬着草绳，不清不楚地问道。妈妈捧着米往下沙沙地倒着，反复好几遍，说道：

“噢，有一斗哩。”

妈妈弄得胸前、面颊和包着的头上一片雪白。

“有一斗？……谢天谢地！对山代老爷来说，这斗米算个啥，可是咱们就……”

“……！！”

妈妈又沙沙地拂弄着席子上剩下来的稻米。

第二天清早，爸爸换上衣服，把米装在手推车上轱辘轱辘地推走了。妈妈在门口停了一会儿，然后回到屋里来。——龙吉是从墙角处瞧见的，至今还记得。

大概在龙吉一家要来北海道的前不久，农家们刚收割完庄稼，还有一段时间才进入过冬准备，因此，稍微富有的人家都组织起“结香社”——老太太们四五个人结成一伙，到庙里去拜佛进香，还要在那附近一带住宿。这样小型的庙会到处都开始了。一到这个时节，人们一心想着玩乐。龙吉逛庙会回来晚了，他半睡半醒地偎依在哥哥的身旁；当走过昏黑的林间小路时，突然听见一声喊叫，草丛里窸窣作响，在一阵忙乱的脚步声中，有一个人跑掉了。这时龙吉吓了一跳，急忙睁开眼睛抓住了哥哥的手。刹那间，好象是女人的衣裙在黑暗中飘动了一下。这情景一直浮现在他的眼前。

龙吉的爸爸和妈妈就盼望着这个季节到来。在入冬以前，他俩每天清早都带上抹着黄酱的饭团到“野地”去。龙吉也在后面跟着。“野地”是荒地的意思。这是他很久以后才知道的。原来龙吉一家光靠租种山代老爷那一点土地是无论如何也维持不了生活的，所以才把山代老爷那块无法开垦而荒芜的地也免费租来，讲妥由他家把全是石头的下洼地包下，直到打下粮食还可白种两年，以后每年向山代老爷再缴纳低租。这个活儿只有在农闲期来干。

那时候，他们一大早就出去下地，有的人家还在睡觉，有的好象刚刚准备早饭，从草房屋顶的所有空隙里，从门口和土墙上凿开一扇斜歪的窗子里，都往外冒出烟来。炊烟象晨雾般，在清晨的空气中缓缓飘动，再向空中冉冉升去。

一家女主人把空汽油桶改成的洋炉子搬到后门，正蹲在炉子跟前拢火。看到龙吉他们在街上走，她便挺腰站起来。

“哟！瞧您……真行！”

于是，爸爸用诙谐的口吻说，

“哎，想发一笔大财嘛。”

“……不干”

“我家他爸还睡呢。真的……您够可以的呀！”

爸爸听她一说这个，便把手摆了一摆。

“得啦，还是你们家里好过。我们不在这个时候干咋行呢！”

清晨起来哄小孙子的老太婆，背上背着一丝不挂的孙子，晃动着身体在街上踱来踱去。

龙吉的两颊和耳朵给早晨的寒气冻得通红，他不住地吹着还不很熟练的口哨，兴高采烈地跟在后面走。

到“野地”去要二十多分钟。河边地凹凸不平，遍地是圆石子。开始先把石子捡起来，然后扑通扑通往河里扔。龙吉也帮着干。他朝河里尽量向老远老远的地方抛去，觉得怪好玩的。有时用力过猛，身子一歪就摔了个屁股蹲儿，惹得爸爸妈妈笑起来。

石子差不多扔完了，这时便开始用手和锄头除草。接着往下锄地时，常常咯噔一声锄头碰在土里的石头上，刃儿就给崩下一块。在薄薄的一层黑土下面，看样子还有许多石头。

一天早上，任凭妈妈怎么叫，爸爸就是不起来。最后妈妈把被窝给揭开就走出去了。爸爸一声不响地坐起半个身子，又把被子盖上。隔一会儿，妈妈走了进来。

“你这个人，真是——”

她大声嚷着。

“你是去不去呀？还干不干呢？到底怎么办？”

父亲把头埋在被子里，说道：

“不干了。”

“……！！”

母亲很扫兴，说不出话来，只是直挺挺地站在那里。

“不干?……”

她自言自语地重复着。

“哎!”

“已经下了这么大的力气啦。你这个人呀，就是没常性!到明年，不就能贴补上一点么!”

父亲还是把头埋在被子里。

“那里怎么着也不行，全是石头。——白搭工!”

母亲还想要说什么，但一气之下走开了。

后来情况如何，龙吉已记不得了。但他却依旧跟着爸爸妈妈到“野地”里去。快要耕种那块土地的时候，爸爸从山代老爷家借了一匹瘦得耷拉着脑袋的马。当时，还没有现在这匹马呢。他们早出晚归时，都是爸爸牵着缰绳，把龙吉驮在马背上。

那里靠近去镇上的大道，可以看见从镇上回来的村里人。他们的脸和手被太阳晒得黑红，而身上却穿戴着新帽子、新衣服和木屐，看去很不相称。孩子手里拿着大人给买的各种各样轻气球在往回走。龙吉呆呆地站在那里望着，这时爸爸突然恶狠狠地把他的衣袖往后一拉，严声厉色地说道：

“看什么!”

自从来小樽以后，龙吉偶然想起“野地”的事情，还曾经问过妈妈。

“啊——啊……”

待了一会儿，妈妈才说：

“因为要到此地来……简直是白白地给山代老爷开了一块地。”

“若是到了现在，那里的庄稼就够交地租的啦……”

也不知道是在开始耕种“野地”的那年冬天，还是在第二年

冬天，这件事龙吉记不清楚了。

龙吉在木屐下面安上竹板，出去滑雪，肚子饿极了，手背冻得又红又肿象螃蟹钳子似地耷拉着回到家中。这时已经夕阳西下。一进门，龙吉突然停下脚步。不知为什么，他觉得屋子里变了样。

爸爸和妈妈坐在昏暗的挂灯下一动不动。大地炉里，树根只剩下灰烬，眼看火就要熄灭。龙吉走进屋来，爸爸和妈妈连理也不理他。一种令人莫名其妙的冷冰冰的感觉，从他的脚下一下子凉上来，这倒不只是因为火快要熄灭的缘故。

爸爸慢吞吞地拿起旱烟袋，半天才抽上一口烟。每当他身子一动，从土间弯过去，映在墙上的影子也跟着歪歪扭扭地摇晃。

龙吉在阴暗的土间里叫了一声“妈妈！”母亲一楞，两眼直勾勾地向昏暗的土间张望。那种惊慌失措的样子，就象干了什么坏事被人发现似的。

龙吉一个人吃饭的时候，爸爸和妈妈还是照老样子坐在那里不动，一言不发。他大口大口地把饭往喉咙里塞，饭吃得很不舒服。吃过饭，妈妈就把睡在隔壁屋的小妹妹给他背在背上，叫他到外面去玩一会儿来。妈妈的口气也和往常不同，非常严厉。如若是往常，龙吉早就说“我不干！”跟妈妈耍脾气，坐下来不走了。说也奇怪，这一次，他却被妈妈的声音给镇住，乖乖儿地背着妹妹到外面去了。小妹妹的手和脚耷拉着在睡觉，他感到比平素沉得多。扎在他胸前的十字带，勒得脖子直发胀。他吃力地摇晃着身体，又来到大家在滑雪玩的土坡上。

大约有一个钟头，龙吉回来了。屋里空荡荡的，挂灯下扔着两个行李，爸爸拿麻绳在捆其中的一个。他一只脚踏在行李上，绳子用力一扣紧，行李就咯吱咯吱地响。妈妈把头探进壁橱里，

拚命地在向外拉一件东西。

“再去玩一会儿来！”

爸爸嘴里衔着麻绳，瞪了龙吉一眼。

他一撇小嘴，快要哭了出来。带子紧紧勒着肩膀，他感到一阵阵疼痛，好象小乌龟一般在向前探着脖子，不时地停下脚步把小妹妹往上颠一颠，好不容易才背回家来了。他再也走不动了，一进屋子，就扑通一声和妹妹一起摔倒在地。妹妹给惊醒，马上哭起来。但是，爸爸和妈妈再也没说什么。

后来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龙吉被妈妈推醒。天色好象已经很晚了。他刚从睡梦中醒来，身上冷得发抖，懵懵懂懂地东倒西歪；妈妈硬给他穿上斗篷和稻草做的雪鞋。

“喂，你醒一醒！”

龙吉困得很，心里顶不耐烦，哭哭啼啼地说：

“到哪儿去呀？”

他睡得迷迷糊糊的，本来该往门口去，可是摸不着头脑，却向厨房蹒跚走去。

“糊涂啦！是这边！”

爸爸一把抓住他的肩膀。

砂棱棱又细又干的雪花被风一吹，斜着落了下来。爸爸背着行李，上面披起大衣，头上戴一顶圆顶帽。妈妈背着小妹妹。关门时，父亲问道：

“门可要关上啦？……”

“关呗！”

妈妈小声地说着，嘘唏地抽了一下鼻子。爸爸又到后门转了一趟，马上回来了。

“都弄好了！……”

“.....”

爸爸走在前面，龙吉在中间，妈妈在最后。天气冷得厉害，稻草鞋踏在雪地上，发出象玻璃破碎的声音。寒风迎面吹来时，雪花直往脸上扑打。不久，脸上就觉得火辣辣的。

一路上渺无人迹，四周一片漆黑。家家户户都已进入梦乡，不见一线光亮。只在眼前一两寸的地方看到雪花在飘落。好半天，爸爸妈妈没说一句话。只听见三个人踏在冷冰冰的雪地上发出来的咯吱咯吱的响声。他们的步子有时不知不觉地一致起来，有时又不知不觉地打乱了。龙吉看着父亲的两只轮流向前移动的脚步，想跟他说话，可是又有些害怕，始终不敢开腔。

在黑暗中，龙吉不晓得这是一个坡路。等来到这附近，身上感到热乎乎的，雪花扑打在面颊上，马上化成了水，挺舒服的。风吹得厉害了。这时，他忽然竖起来耳朵。

就在他的右侧——有时听着好象从地底下发出来的——时而传来一阵呜呜的咆哮声。隔了一会儿，又呜呜地咆哮起来。龙吉突然从身后把父亲抱住。

“我怕！”

父亲吃惊地停下脚步。

“怎么啦？”

“有妖怪！”

他用尽力气拚命抓住爸爸的大衣。

“妖怪？”

“你听……那呜呜声！”

父亲一听就明白过来，仿佛说：“这也值得大惊小怪的！”

“那个吗？……你真傻。那是矢馆岭，是风吹过树林的声音！”

妈妈在后面也笑了，抚摸着他的头。

“龙啊，别怕。那没有什么。”

三个人又继续往前走。龙吉虽然知道那是风吹过树林的声音，可是当他听到呜呜的吼声时，还是在抓着父亲的大衣。他老是觉得故事书里的那个血盆大口的黑老道变得越来越大，铺天盖地而来，眼看一口就要把小龙吉给吞掉。他好象想起来似的，反复地说：

“尽骗人！那就是妖怪！”

来到有火车站的街上时，那呜呜的声音仍在龙吉的耳边作响。这里的街道上，家家关门闭户，人们还在静静地睡觉呢。只有雪花在空荡荡的昏黑的街上吹过。

爸爸妈妈带着他从秋田乡下“夜奔”的这件事，是在很久很久以后龙吉进入商业中学时才知道的。

日俄战争结束以后，市面朝相反的方向发展而萧条起来了。去各城镇的人，都因遭到失败重返农村。他们为讨好地主，相互间竞争得非常激烈。地主也就乘机抬高佃租。当然，那时还没有农会一类的组织，佃户们不知该怎样才好。因地租是按米的重量核算，所以，他们就借此机会把稻草用水浸湿，编起比普通卖的要厚实些的草袋子，或者掺杂一些次米。有人认为怎么干也缴不上地租，那是因为活儿干的不到家，所以不管身体如何，就去拚死拚活地开荒地。——人们都是这样想方设法糊口。他们最多也只能做到这一点。

为什么要“夜奔”，爸爸妈妈从来未曾讲过，所以龙吉不大清楚。原来是因为“纳粮”那一天，他家弄虚作假的米，当众被彻底揭穿了；又因为拖欠佃租，所以地主就说，有的是人租地，你请走吧。村里的其他佃户明知道龙吉一家是乘夜逃走的，可是都装作不知道的样子。

这样，龙吉一家才渡过津轻海峡，来到了小樽。

三

虽然来到北海道，可是一家的生活并没有好转。

那时，父亲由于过去劳累过度，心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不过，这是龙吉后来才知道的。庄稼活儿再干不下去了。——他弯着身子，在冰冷的稻田里要呆好几个钟头才上来，浮肿的脸上溅满污泥，一副青紫色的面孔，好象变了另一个人似的。

他回到家中，连水淋淋的草鞋也不脱，就仰卧在一进门的地方，让急促的呼吸平静下来。

“龙啊！你摸摸这儿……”

说着，他使用又粗又硬的手抓住龙吉的小手，把它放在自己的左侧胸部下面。

“懂吗？你看，扑通扑通地跳呢！”

龙吉好象要摸一个什么可怕的东西似的，胆怯怯地把手伸过去，因为跳动得太厉害了，他觉得父亲的心直往上蹿，所以不由得把手又撤了回来。

“这是啥呀？……爸爸的怀里有钟吗？”

“钟？瞎说！”

爸爸把浮肿的脸一歪，笑了。

龙吉父亲的身体本来不算坏，心脏完全是干活儿过力给搞垮的。父亲死的时候，龙吉见那瘦骨嶙峋的尸体，才知道他那只皮包骨的手掌比脑袋还要宽大。父亲是村子里干活儿的能手。

“你爸是个天生干活的大好人！”这是妈妈的口头语。不仅

是妈妈的口头语，就连左邻右舍和亲戚们也都这样说。

然而，象父亲这样能干的人，却没有安身之地。那么，又为什么那样不辞辛苦地劳动呢？母亲说：

“再怎么干，也不能人人都发财的呀。这也得碰运气……”

龙吉的父亲原是投奔在小樽开面包工厂的哥哥来的。在哥哥的关照下，父亲在手宫街开设一家小铺子，卖“馅面包”“粗点心”“洋画片”“轻气球”“飞弹”^①“肉桂糖”和“汽水”等。那里虽然也是手宫街，但已经是市郊，即使天气一直是晴朗的，街上也是湿漉漉的。许多阴暗的小巷纵横交错，象蜘蛛网一样。脸儿肮脏的孩子们拿着木棒，一面拨弄着阴沟里的水，一面大声喊叫着，在附近叭哒叭哒地乱跑。孩子们成群结队，不晓得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家家的房屋又小又暗，屋里潮湿得很，孩子们谁也不呆在家里。外面下小雨，他们也淋着光头和肩膀在外面跑着玩。再说，回到家中也没人，因为父母都出外做工，孩子们在外面玩惯了。

孩子们跟家里要一两分钱，就到龙吉家的铺子去买“飞弹”。然后两三个人排在一起，把弹子往板墙上一弹，看谁蹦的远就算谁赢。

龙吉说的是秋田土话，大伙都不找他玩。他一说话不是人家逗他，就是学他，所以，他总是哭着回去。在学校也一样。高年级的学生故意走上前来问：“谁讲秋田话。”一发现龙吉在操场的角落上没精打采地呆呆站着，大伙就围拢来起哄。无论别人怎样捉弄他，他就是执拗地不吭一声。

但等到把龙吉逼急了，他就哭起来，不由自主地喊一声：

① 一种小孩玩的弹子，类似弹球儿。

“别烦啦!”

“别烦啦!? 说啦,说啦! 到底说出来啦!”

大伙乐得一齐跳起来。

“别烦啦!”

“别烦啦,这是啥意思?”

这时,一个常常欺侮龙吉的大个子,头上长着“火包”(头上的脓包)的同班同学就说:

“告诉你吧。那是这个意思——不要闹啦!”

大伙哄然大笑。

从那以后,“别烦啦”“别烦啦”这句话,就在校内传开了。

龙吉不愿意上学。起初,他还是装模作样地去上学,其实,他爬到后山玩了一天,在看那里的土工们开采石头。土工们在高高的山崖上挥动着洋镐劳动,有时洋镐的长尖上还闪一下亮光。

他看了几次爆破。先是闻到一股导火线的臭味,突然岩角往上一冒,接着砰的一声,砂石土块便纷纷落在地上。

最后,他和一个年轻的杠夫头交上了朋友。这使他感到十分奇怪,竟然会有人跟自己相好。——逃学的事给父亲知道了。因为,学校的女教师来家访了。父亲听说以后,脸上显出非常难过的神色。这使龙吉简直莫名其妙。第二天,父亲领着龙吉上学去了。当天,他在下课时间到操场一看,父亲穿着草鞋还站在那里,只是在向他这边望着。其实父亲并没回去,而是一直呆在那里。第三天,父亲又跟着龙吉上学去了。

父亲一生过着悲惨的生活。他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学习很好的龙吉身上,至少也要把他一个人培养成材。父亲不晓得小龙吉为啥假装上学,而实际上是在逃学。可是,当他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犹如晴天里一声霹雳,对父亲来说,这个打击真是非同小

可。不但如此，父亲为了送龙吉上学读书，还不知吃了多少苦哩。

每天清晨刚蒙蒙亮的时候，父亲就背起货匣子，穿着草鞋，到小樽市中心的面包工厂去采购“馅面包”“代用面包”和“咸面包”。本来这是由厂子给送到家的，但自己去上货，可以在批发中多给两三个。这要按时赶回来，好卖给上班的工人和上学的学生。就拿下雨天来说，早上天气很冷，父亲过去在水田干活时受的风寒就要发作，腰痛起来。

快到中午时，父亲担起两个四面镶着玻璃的货匣子，里面有两三层隔板，上面摆着大福饼和面包，到土工做活儿的地方去叫卖。若是下雨天，那里还没盖起工房的时候，他就到海关旁边有栈桥的广场去。他整天在道旁饱受灰尘的扑打，累得精疲力尽才回来。

龙吉的姐姐在火山灰公司里做活。她在烟雾溟濛的火山灰中工作，是要把嘴和鼻子用手巾围起来的。——姐姐回到家来，唯恐衣服溅上水，便赤露着上身，花很长时间洗头上雪一般的火山灰。姐姐是一个皮肤白净的漂亮女子。一天，龙吉偶然发现姐姐的右肩上发青，肿起一块。这在姐姐的白净皮肉上，怪叫人心疼的。

龙吉从身后问道：

“姐姐，那是什么？”

姐姐在洗头发，起初没有理会龙吉说的话。“你瞧！”他说着就用手摸了摸。

姐姐一楞，回过头去，脸色马上变了。她赶紧把胳膊伸进袖筒里挡住。龙吉被搞得很尴尬，呆呆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后来才知道，姐姐是在火山灰公司挑洋灰桶。这样也就使他记起一件事来。当时姐姐每次从工厂回家，不是跨过门槛，而

是用手把每条腿架过去，才勉强进到屋里来的。

那时，妹妹在上学，但一回到家来，就拿着筐子到火山灰公司后面堆得象山一般的煤渣堆里去拣煤核。她在煤渣堆里挖一挖，就可以找到焦炭样的东西。一到冬天，就烧这种焦炭。这时就把洋铁桶周围开成许多小洞，用它作炉子。可是这种焦炭燃烧时冒出的蓝火，是有毒的，弄得满屋子烟气腾腾，呛得鼻孔难受。

姐姐和妹妹是这样地劳动。但是，除此之外，家里不论办什么事情，父亲都是打发姐姐和妹妹去，不使唤龙吉。

“龙啊！你是爸爸的‘心肝’呀！”

姐姐累得不耐烦的时候，就这样对他说。“心肝”就是宝贝儿的意思。——父亲盼望龙吉努力学习。可是沉默寡言的父亲，对此没吐露过一句。不过，父亲的这种心情，龙吉是理解的。

龙吉上六年级的时候，父亲象有什么心事似的，几乎每天都要到开面包工厂的伯父家去，每次回来都很迟。晚上，当龙吉把饭桌擦干净，在上面做功课的时候，回到家来的父亲便和母亲悄悄地谈论很长时间。

一天，老师在作文课的剩余时间对大家说：

“你们中间能升学的人，举起手来！”

于是，同学们有的面面相觑，有的回过头去往后看。有四五个人犹犹豫豫地涨红着脸，但又有些洋洋得意的样子，纷纷把手举起。“再举高些！”老师说着挺了挺腰，一、二、三、四地数起来。大家都很羡慕，立刻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报升学的学生，都不是学习成绩很好的。龙吉心想：这样的学生能考入上级学校吗？

休息时间，教员室来人叫龙吉。他想：又出什么事了。教员

室来叫人，总是没有好事的。他战战兢兢地推开沉重的门走进去。

任课的老师背靠着火炉在吸纸烟。龙吉窥伺着老师的脸色，一声不响地站在他面前。

“你家里……穷吗？”

老师一见他就问道。

“……！？”

这完全出乎龙吉的意料之外。他说不出话来，用指头摆弄着衣服的下襟。

“是吗？……很穷吗？”

他点了点头。

“是啊。象你这样聪明的孩子不能升学，是很可惜的。你回去跟家里谈谈。我也走一趟，去见一见你爸爸……”

龙吉从来没考虑过升学的问题。因此，刚才那些要升学的人举手的时候，他并没有象其他学生那样感到羡慕。可是，现在给老师这么一提，他意外地感到又有些迫不及待了。他心想：上级学校并不是那些努力学习，成绩优秀的人进的，而是比自己学习劲头差两三倍，脑子又笨，成绩又坏的人进的。这是什么道理呢？

那一天，他匆匆忙忙回到家里。父亲不在。他从外面扑通扑通地跑进来，突然间闯到妈妈跟前，话也说得快，没头没脑的，于是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傍晚，父亲担着空货匣子从土工们的劳动“工地”回来了。他一听到龙吉升学的事，就说：“我每天到你伯父那儿去，就是为了这件事。”原来父亲一心一意想让龙吉升学，他是到伯父家求情的。

又过了两三天，放学以后，学生们吵吵嚷嚷地从学校走出来。这时有人喊了一声：

“大村的爸爸来啦！在那儿呢。”

一看，爸爸背着装馅面包和大福饼的货匣子，穿着草鞋靠在学校的大门旁边站着呢。当时龙吉在众人面前，臊得脸通红。

父亲在打扮差不多相同的学生中间发现了龙吉，满是皱纹的脸上露出笑容来，径直地快步赶上去。这时的货匣子给摇动得咯达咯达直响，把龙吉羞得无地自容。

“成啦！成啦！”

父亲急促地颤动着因牙齿脱落而松弛的嘴唇说。成啦？此刻，龙吉正为了父亲而感到羞愧难当，哪里还听得进去这些呢。——学生们上下打量了一番他父亲的那身装束，便各自走开了。

“成啦！龙啊，你能升学啦！”

父亲和伯父好不容易才商量妥。他等不及龙吉回家，又因为要赶到工地去，所以，等回去再告诉他，就得到晚上了。回想起来，在父亲五十多年的悲惨生涯中，象这样高兴的事，恐怕一次也没有过。可是，真的一刻也等不了吗？父亲也曾这样想过：龙吉在学校见到自己会感到害羞的。但是，即使这样，也还是想尽早地告诉他……

龙吉放慢脚步跟在父亲后面走。他边走边想：我这成什么人了。他抑制不住内心的不安，情不自禁地哭了。他没有哭出声，只是肩膀一动一动地抽噎着向前走。

父亲唠唠叨叨在说什么。他从来没见过父亲说过这么多话。走了一会儿，父亲才发现自己一个人在说话，于是猛地回过头来。

“你怎么啦？龙啊。——喂，怎么啦？”

他给父亲一问，突然放声哭起来。而且，不住地撩起父亲那带汗气味的短褂下摆去擦眼泪。

关于升学(那是商业学校)的事，是附加条件的。——龙吉要住在伯父家里，从学校回来得跟着职工一起在面包厂帮工。一面上学一面做工，这是很吃力的。有时让他用大竹板搅拌大锅里的“酵子”，有时捣土豆，有时还要和面——两只胳膊插进去深得没了肩膀，弄得浑身上下一片雪白。在早晨上学之前，他还要坐着卡车去送面包。卡车不去的地方，便用大车载着货匣子送到零售店去。——龙吉一到学校，坐在椅子上净打瞌睡，怎么也支撑不住。因为是别人给拿钱上学，所以必须争取一个好成绩。不但如此，在伯父家总得时时刻刻赔小心，大伙对他也都冷眼相待。

到了面临考试的时候，龙吉认真地考虑过好多次，总想从伯父家中逃走。

事情发生在顶麻烦的一次考试的前一天。因为看笔记，他到工厂迟了一步。那正是工厂最忙的时候，陆续不断出炉的面包要不停地装箱。恰巧父亲也来了。他背着货匣子，穿着草鞋，在工厂旁边的“取货台”处等候领取面包。职工们肩并肩，热得满头大汗，脸上油光锃亮的。龙吉和平常一样，便插到他们中间去帮忙。这时，工长正用长柄竹板从炉膛里往外撤烤着面包的铁板。他恶狠狠瞪了龙吉一眼。工长以熟练的动作将铁板在竹板上一转就抛出手，只见铁板唰地一下平落在他的跟前，旁边的职工赶紧用蘸着蜜糖的刷子涂了一下铁板上的面包，随后用很厚的破撮布抓住铁板的边缘，把烤得黄灿灿的面包扣在席子上。

——正在这时，龙吉只觉得眼睛、耳朵、鼻子嗡地一声，接着自己不知道抓住了什么，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把自己给抓住，一下仰面朝天倒在石板铺的空地上。他哎哟一声，捂着脸想站起来。

“你这个吃闲饭的东西！”

工长的长柄竹板又横着打来。他一只手撑着地，身子摇晃了一下。这时，龙吉晕晕忽忽的，疼痛还是小事，只是父亲目睹这一情景时的难以忍受的痛苦，在一刹那间刺痛了他的心！

“你干嘛？”

他只说了一句话。

“恬不知耻的家伙，还问呢！到一边吃闲饭去，这么晚干啥来！”

“……”

龙吉受这一番屈辱，使他浑身打颤。但他又怎能顶嘴呢。——自己寄人篱下，没话可说。

龙吉的父亲一动也不动，直挺挺地站在那里，最后一言未发。面包出了炉，爸爸一声不响地装满三匣子就回去了。

当天夜晚，龙吉睡觉时用被子埋着头，白天一直在忍受着的屈辱感情，顿时涌上了心头。他咯吱咯吱地咬着被里子，眼泪簌簌地流出来。

“听见了……听见了……”——他睡下后不知过了多久，只听见脑后的里屋里，好象是女佣人在答话。龙吉突然清醒过来。

“听见了，这就起来……”

果然是女佣人。他昂起头来，泪水沾湿了的被里和枕头使面颊感到冷冰冰的。随后响起一阵喀达喀达的声音，大概是女佣人起来去开门。这一定是来客人了。——龙吉没把它放在心上，又枕上头翻了一个身。

女佣人打开外面的房门……突然，龙吉的母亲和姐姐在喊叫，女佣人扑通扑通跑进来。——他不由得在褥子上坐起来。

“你爸爸……你爸爸！”

他没有把话听完，就已经明白了。

面色惨白的姐姐提着一盏还在点着的灯笼随后走进来。睡在后屋的伯父听见动静也起来了。

姐姐说话十分紧张，结结巴巴象小孩子学话一样不清不白的。

“爸爸怎么啦？”

龙吉把姐姐的肩膀一把抓住。

“被火车……爸爸被火车……”

姐姐只把话说到这里，便瘫软地倒在龙吉身上，哇地一声痛哭起来。

夜里十点钟左右，父亲说洗澡去，就在从手宫车站岔向临海铁路进入填海造地的路上给压死了。那是在铁路道口附近有很多货仓的一个拐角处。当龙吉和伯父等人来到那里时，父亲的尸体已经用席子盖着，就躺在离铁轨不远的低矮的野草旁边。有五六个人站在那里，有警察，也有车站上的人。

每当火车通过时，机车上的前灯照得附近亮通通的，可是，龙吉每次都把眼睛闭上。天气并不冷，但他身上却不住地战抖。

“……火车在拐弯的一刹那，就在那附近……”一个机车上火夫模样的男人，用手指着货仓和货仓之间的地方说。“象有一个人站在那儿，但看不太清楚。正在这时，就觉得眼前有个东西一闪……那声音真难听，咯吱的一声！……”

有人向一旁吐了几口唾沫。

警察还没有验尸，说是明天才能领回。大家一面站着说话，一

面等警医到来。龙吉没有跟母亲和姐姐说一句话。

“说不定铁轨上还粘着一两根指头呢。这要等天亮才晓得的……”

说话的人象是站岗的巡警。

聚光灯一般的小光圈，照在货仓对面的洋铁板墙上，摇摇晃晃地闪现出各种影象。不料一个拿着煤气手提灯的车站巡警从拐角走过来。

“怎么回事？”

煤气灯的光圈在席子上晃动了两下。接着，在一片漆黑中，照亮了每一个人的面孔，随即又消失了。

“压死人啦。”

“嗨，又是一起！”

巡警再次把煤气灯对准席子。——龙吉心里不由地在想：现在，躺在席子下面的父亲已经是和平常完全不同的两个人了，好象他离开自己很远很远似的……几次想改变这个念头，可是老摆脱不了。不仅如此，就连姐姐、母亲、巡警以及围绕他身边的一切，都仿佛在向身后不停地退去，又觉得有人在自己的身旁说话，就在这一瞬间，龙吉不省人事了。——当时，他得的是脑贫血……

父亲的尸体是用门板赶制成的担架抬的。天将破晓，流水一般的冷空气，在没有行人的街道上和家家户户房屋之间浮动。龙吉和妈妈跟着担架在后面走。担架被父亲的遗体压得咯吱咯吱响。

母亲用手巾捂着脸，肩膀一抖一抖地哽咽着。当来到父亲每天清早背着货匣子到面包工厂去的山道时，母亲号啕大哭起来。

“他爹呀，这儿就是你每天走的路哇！”

她对着门板上父亲的尸体说。

龙吉想起穿着草鞋从这条路走过的父亲，就如同在眼前一般。

道路从这里开始是平缓的慢坡。抬担架的人停下来换了换肩。往前走了一会儿，便路过盖有土工棚的工地。出早班的土工们扛着洋镐，推着空翻斗车，正向开凿的山崖下面弯弯曲曲地爬去。大家回转头来望着担架，象似在说什么。

“他爹呀，你记得么，这就是你每天来卖面包的工地呀！”

母亲没有能把话说完，因为语尾颤抖着，已经泣不成声了。抬着担架前面杠子的一位年轻的亲戚，在悄悄地揩着眼泪。

过了工地便是下坡路，离家很近了。附近已经开门的人家吃了一惊，都跑上前来。妈妈这时头也没抬。

小妹妹和亲戚们一起站在家门口，她一看见担架便迎头跑过去。

“他爹呀，瞧，到家啦！这是咱们的家！”

说着，母亲也不怕当众人的面，就在进门搁担架的旁边恸哭起来。

从那以后，龙吉再也没登伯父家的工厂大门。

父亲的惨死，顿时使他懂得很多事情。——龙吉停学了。虽然还想继续上学，可是一离开伯父家，生活就立刻成了问题。因此，他便到第二号填海造地的中岛铁工厂做工去了。

他们正是在那个时候搬到“岩城大楼”来住的。家中还留下一些器皿，母亲就在那里开了一爿小小的粗点心铺。母亲骤然间苍老了……

四

岩城大楼闹起房租问题。

“大家别忘了，明天晚上到楼下集合！”

住在三楼的古山（一到这时，总要拉他出来），在楼梯扶手旁用吃过酒的沙哑声喊叫着。这时正是晚上九点钟左右，房客们大都回到家里来了。

这里一有点什么事情，大家都象古山这样大声呼喊。

岩城大楼里歪歪扭扭、咯吱咯吱响的楼梯，架在楼的中间，一直通到三楼。到二楼和三楼去的楼梯是岔开着。楼梯不仅咯吱咯吱响，而且楼梯的衬板到处都剥落了。女人们都不愿意在这里上上下下，又没有扶手，不留神摔一跤，那可就危险了。因此，住在三楼的人有事要找一楼的人都是通过窗子——伸出大半个身子向下大声呼叫：

“楼下糖铺的老板娘！”

这样反复呼唤两声，就会听见下面哗啦一声，玻璃窗子打开了。从许多并排的窗户里蓦地探出糖铺老板娘的头来，扭着身子向三楼上望着，这样就把事情办了。

若是对方住在楼的另一面，便来到走廊上抓住栏杆，弯腰朝下面窥视着呼唤。那喊声传遍家家户户的每个角落。住在这里的人都是大嗓门。

“这跟每一家都有利害关系，不能偷懒，都得来开会！”

古山从三楼的栏杆旁又喊了一声。他一面往自己屋子走，

一面嘟嘟哝哝地自言自语：“都是个人主义者，真不好办……”

“嘿，还是你来的早！”

龙吉一进屋，古山就说了一句。他背靠着墙壁，穿着西服裤子的两条腿在铺席上伸着，故意吸上一口纸烟，一边向对面的墙上呼呼地喷着，一边在看书。

古山每天外出的时候，都从龙吉家的铺子里买上两盒蝙蝠牌香烟。龙吉若是没有书看，就到古山那儿去借，所以，在这座楼里，彼此相处得很亲热。住在龙吉家隔壁的第二家是管房子的平贺老头。他对龙吉家说，古山每天到铺子里来买两盒蝙蝠烟，是因为看中了龙吉的姐姐，所以要他当心。——“反正，那些流氓记者没一个好东西！而且，他还是个酒鬼呢！”

大川家的“老爹”比龙吉晚进屋一步。他在港街的三号工地当搬运工。大川老爹的衣着总是那样齐楚，可是同他那晒黑了的两只硬梆梆的手、脖子和脸儿很不谐调。他只在前面留起的头发上抹一层厚厚的润发油，一进屋就使他俩闻着扑鼻的香味。在货仓干活时，他穿的是短褂，借助钩子扛杂粮和豆饼，但是，一参加“集会”便要如此打扮一番。他懂得不少令人费解的词句，而且还把穿插在文章里的“shi”和“su”、“chi”和“tsu”、“i”和“e”几个不同的音，完全不分地读。不论在什么样的“集会”上，他总爱夸夸其谈，话比谁都多；说一句港街的粗俗话——“嘛事”，随后就冒出一句文雅的词儿——“诚如您所说”。老爹顶欢喜“聚会”（这是“老爹”的叫法）。每逢开这样的会，他便事先安排好回家洗澡的时间，提前收工。而且，他还喜欢在这样的场所听别人讲话，不管谁说什么，他都是一面点头一面听着。所以，他总比别人早到。

“咦，今天古山先生没带‘酒味儿’呀！”

大川老爹从衣袖里掏出敷岛牌纸烟，太阳晒得黑黑的脸儿一笑，露出来洁白的牙齿。

“对，有重大问题时，我是不喝酒的。”

“可是，听说大石内藏之助^①遇有重大问题时，仍然要喝得醉醺醺的哩。”

“重大问题”一词，大川老爹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心里感到美滋滋的。

“您真是见多识广啊！”

古山说。

“老爹是不是在扛货物的时候学的这些掌故呢？”

龙吉笑嘻嘻地打趣他。

“人家用功嘛。”

古山溜了一眼龙吉，哈哈地笑起来。

老爹听对方这样一说，他高兴极了，于是也跟着大声笑起来，说：

“反正每天晚上都会听到古山先生在自言自语！”

古山每天早上十点多钟便夹着红皮包出去，准是夜里过了十二点才醉醺醺地回来。岩城大楼一到晚上八、九点钟差不多就静悄悄的了，因为多半是工人，夜里睡的早。他一回来，就踉踉跄跄地上楼，嘴里还时常自言自语，不知嘟哝些什么，迳直爬上三楼。这是每个房间的人都知道的。人们听到他的脚步声，大都是在睡醒一觉的时候，所以都说：“啊，古山先生又喝醉了回来……”

① 即大石良雄，日本元禄时代赤穗浪人的首领。

“自言自语里没有捅出什么秘密来吧？”

古山张开五个指头，咯吱咯吱地搔弄着头上的长发。

“这……很难说，或许讲出了大村姐姐！”

“咦，你说什么？”

古山把伸出去的两只腿收回来，又撇着腿偏身坐在那里。这次用不同于刚才的目光来回打量着龙吉和大川老爹两个人。——恰好就在这个时候，倒是龙吉羞得面红耳赤，生起大川老爹的气来。

“老爹，你听谁说的？是不是兜售平贺老头的那一套？”

他象在工厂里一样，说话的语气生硬得很。他在厂子讲话，总是要压过传送带、车床、汽锤，还有制罐车间铆铆钉时发出的响声，所以有时一开口，嗓音之大连自己也要吃一惊。

“开句玩笑么！……不过你姐姐长的倒是怪叫人爱的，谁不想去买盒烟，买块糖呢！”

龙吉正要搭腔，门开了。

“别开玩笑，大川老爹。”

他只说了这一句，便把头扭过去。

古山一言未发，他把偏身坐着的两只腿又伸出去，闭起眼睛，深深吸一口纸烟朝向对面的墙上喷去。

这时候走进来四五个人。

其中有泽井太太，她和女儿俩住一起，而且母女二人同在出口豌豆的选豆工厂做工。——她轻轻捂着嘴，不让那染铁浆的黑牙齿露出来，说：

“方才平贺老大爷在屋外对我说：老婆子，今晚的会还是不去的好。俺跟他大声嚷道：为啥不去，再涨房租，姑娘和我就只好当窑姐儿啦！”

“那怕啥？”

大川老爹笑着，又问道：“你们娘俩当了窑姐儿，那色鬼老头儿会头一个去玩的！”

“不错，不错！”

一起走进来的老金点点头。——他每天打着鼓，手里拿着许多小国旗，有时还作怪相儿拉洋片给人看，到处叫卖麦芽糖。他身量高大，扁平脸。他本来另外有个名字，因为长得很象中国人，所以大家都叫他老金，老金。

“别看那老头儿，干那个事蛮在行！”

不久以前，老金曾看见平贺老头半夜两点钟，从二楼犄角的一间屋子里偷偷走出来。那里住着一个矮个子的暗娼。老金每月赚钱多的时候也去那里，所以他很清楚。大楼里管那个女人叫“犄角娘”。——老头子一出屋，那女人便把纸榻扇开一会儿，好让过道亮堂点。因为她背着灯光，看不清是个啥模样，只见一只手掩着前襟，是个女人的身影。老头子出来走了几步，然后轻轻把手一挥，那女人便悄悄关上纸榻扇。老头子来到楼梯前停下脚步。再一看，他小心翼翼地趴伏在楼梯板上，不晓得是在干啥。——原来，他是在爬着从上面一步一步地往下滑呢。

起初，老金以为那老家伙还有一手，可是再一看他那爬行的样子，立刻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寒战。

爬到楼梯中间，老头子的衣服下襟卷了上去，赤露出来的小腿和大腿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肉皮象干瘪的梨皮，没一点光润。后来下襟又卷上去，毕竟是六十岁的老头子，屁股又小又尖……那样子实在令人作呕。——老金急忙回到自己的房间，往纸篓里吐了几口唾沫。

“真是个好奸巨滑的家伙！”

老金从袖筒取出一张叠成四折的漆黑手纸，把烟蒂丢在上面。——老金常去请龙吉画洋片上的堀部安兵卫^①之类的画片，还在他那儿练给人们看，逗得大伙哄堂大笑。

八点钟一过，来开会的陆陆续续到齐了。——这楼里的住户脏得很，就连手宫街都把岩城大楼的“岩城”去掉，改叫成臭虫楼。这些人聚在一起，每个人带来的特有气味和他们身上的热气搅混一块，弄得满屋子的人闷得慌。

大川老爹和龙吉站起来，把通往隔壁房间的纸榻扇取掉了。他们是利用空屋子开会的，湿漉漉的铺席发出一股霉烂时的怪味儿。摘下纸榻扇门，屋内宽敞了。人们自然而然地三三两两坐在一起。新搬来的住户熟人少，他们单独坐在一块。

“今晚到会的好多呀！”老爹望着大伙的脸儿说，“早知如此，就该喝上一盅再来！”

龙吉对老爹有些憎恶的样子，瞥了他一眼。当大川老爹准备在集会上高谈阔论的时候，一定要干上一杯冷酒才来的。这样平素记不起的词儿会滔滔不绝地脱口而出，甚至连自己也为之大吃一惊。

“喂，我说……”古山凑近龙吉的耳边说，“来这么多人开会，都是因为要谈房租问题。不然，五个人里未必会来一个。哪怕是一文钱也好，如果他们得不到实惠，谁也搬不动他们的。……不过，再反过来一想，在这一点上，也正说明工人和穷人确实是步调一致的。我是这样个想法……”

走进来的人都向古山打个招呼。大楼里一发生什么“事件”（这里经常闹事），都来请古山解决。他看上去很懒似的，但他总

① 堀部安兵卫是日本德川时代的剑客。

是出头替人家谈判。尽管事情千头万绪，可是他却懂得怎样去评理，而使问题得到圆满解决。一次，平贺曾经这样说：“若不是这个流氓记者，那件事情就没法办了。”从那以后，大楼里的人出于对古山的尊敬，便去掉“流氓”两个字，管他叫新闻记者了。在大楼里的人们眼中，象“新闻记者”这样的人，是决不肯和他们住在一起的。

龙吉要去厕所，来到了走廊上。这时，恰巧在手宫街一家小工厂做工的斋藤和辻两个人，神气十足地歪戴着便帽，毫不在乎地响着脚步从二楼走下来。

“喂——”

龙吉从下面问道。

“你去吗？”

辻说着，嘴唇里露出来紫色牙龈，发出只有贪玩的年轻人才懂得的会心的微笑。——“好玩极啦！”

“到哪儿去？”

——龙吉曾经跟斋藤和辻出去玩过两三次。

“嗯？这回去的地方谁都不知道！你说呢，斋藤。”

斋藤身穿一件白色宽条纹的短上衣，好象今天刚穿上似的。他一个劲往下抻着下摆说：

“我也不知道是啥地方！”

“你们别叫人着急啦！”龙吉笑着说。——他也给吸引住了。

“一道去吧？我们厂子原来有个漂亮的女工，后来她不干了。人也不知到哪儿去啦。不料，最近发现她在一家酒吧间当上了女招待！她唱的‘枯草曲’^①好听着呢！”

① 枯草的原文是“枯薄”。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不景气时期流行全国的歌曲。

龙吉寻思一会儿，把下巴颏朝上面的房间一挑，意思说：“今晚不是开那个会吗？”

“那个呀？”

身材短小的辻一晃肩膀，轻蔑地说：

“那种事让老头儿们去做好啦！”

“那样的事会有个交涉人去管的，肯定里面有一个……”

龙吉一听，立刻对那个会感到厌烦起来。他问道：

“有钱吗？”

“多着呢！”

斋藤说着，露出牙龈嘻嘻一笑，蓦地把自己的左臂伸到龙吉眼前。

“呃？”

龙吉感到莫名其妙。

“你瞧腕子上——，我把表当啦。”

手腕上只留下表带儿的痕迹。

“怎么样！”

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你的那份儿也足够了。走吧？”

龙吉望着他俩的脸，说道：

“好，在门口稍等一等——”

说完，便匆忙地到厕所去了。龙吉的心里立刻轻快起来。一旦决定要同他们玩去，连小便都起急，老觉得尿不完。但是，怎么借口逃脱这个会呢？就说工厂里来了人，有急事非去不可。——他认为这样说会自然一些。

他从厕所出来，象小孩一样连蹦带跳地跑回屋里。刚一进门，古山便从里面朝着他说：

“喂，小伙子！今天开会的记录要拜托你啦。记一下大意就可以，到时跟那老家伙交涉，是很需要这个的。拜托拜托。”

因为事出意外，他不由自主地含糊糊说：

“啊，是……”

龙吉被逼着说出这句话来，再不好找借口了。他认为事后再提出来，实在是勉强得很，而且人家一听就知道是瞪着眼睛编假话。

他出去把等候他的朋友打发走，又回来坐下。自己觉得象突然参加一个生疏的会一样，好半天也适应不过来……

住在一楼北屋的鞋匠在人们的后面靠墙坐着，不时眯起眼睛，忽地脑袋一耷拉，吃惊地睁开眼往四周张望了一番……马上又眯起眼睛，反复了几次。虽然他是在打瞌睡，可是一只手却伸进胸脯里，用另一只手托着胳膊肘，把那手推向脊背，不停地来回摸爬着的虱子。因为他反复这样搞，所以坐在一旁用小烟袋吸着烟丝的“拣豆”婆子阿兼就猛地撞了他一下。

鞋匠吓了一跳，把手从怀里抽出来，两手合在一起。他发现撞他的是拣豆婆子阿兼，说道：

“这是啥暗号？——是不是叫我晚上到你屋子去？”

“嗯，是吗？瞧你多寒伧！虱子会不会掉在这左近呀？”

“虱子？顶好当心你屁股底下别掉进啥东西去！”

“你胡说些什么。我又不是十七大八的姑娘。”

“喂，你，你每天的收入很可观吧？”

在一旁搭腔的是河西。他是个中年男子，在一家小铁工厂——其实和铁匠铺没多大差别——工作，手上有两三个残废的指头，吃力地拿着一根蝙蝠牌香烟吸着。他抽烟有个毛病，每次把纸烟往嘴边送时，不等烟熏到他，脸儿就先皱一皱。

“拣不来多少的。近来连从草袋里漏出来的豆子也都不景气了，真叫人怕得慌。”

拣豆子的女人，三个人一伙五个人一群组成一组，每天在港口装卸杂粮的货仓附近来回徘徊，瞧见路面上有掉下来的豆子，就用短柄笤帚扫到小筐箩里，然后再把它倒进背上的口袋里。过后，吹去豆子里面的灰土，拿到专门收购的批发店去卖点钱。

“本来卖不多少钱，可是老头儿出去做活儿，自己也得干点啥才好。咱比不上人家有钱的阔太太。”

另外，这些女人不光是半公开地拣豆子，还跑到造船厂里偷偷摸摸地把不准拿出来的铁屑、铜片和铁丝等拣出来卖给废品商。因此，住在岩城大楼的女人，也有被警察给带走的。这对阿兼来说是常事。——单靠拣豆子是搞不到多少钱的。

阿兼从派出所一回来，就怒冲冲地大喊大叫：

“真是欺侮人！警察和这个世道都是穷人的死对头！”

“这么点乱铁丝儿有啥了不起，扔在那儿还不是烂掉！他们拿这一星半点的东西根本不当一回事儿。他们不吭声也就算了，可是看见人家拣起来，他们就哇啦哇啦地叫！他们牙缝里的东西，就够咱们活三天啦！”

有一次，阿兼被派出所拘留了两天。放出来之后，她说这太气人了，所以还跑到古山那里诉说过这件事呢。

“近来手头太紧了。我打算让老婆也干点什么，所以就想到你们那一行……”

一个中年工人象被烟熏了似地皱着眉头，深思熟虑地说。

“对！那比闲着强，多少能贴补家点。”

仔细一看，这个人不仅指甲，连手上都有许多处烫的伤疤。——他就是河西。河西深思着停顿了一下，又说：

“不过话说回来……那也得干……”

“对呀!”

鞋匠从旁插了一句。

“住口! 你懂得啥!”

阿兼象男人一般向鞋匠大吼了一声。因为她们在码头上转来转去,说话和腔调都和男人一样。

“干也没啥了不起的。”

阿兼对河西说。

然后,她捏弄着烟丝,又说:

“饿肚子,啥都得干……”

阿兼说完以后,再不作声了。

她每逢到集会或到“摇会”去,最后总是满不在乎地盘着腿坐在那里^①。在岩城大楼里要有人一本正经地说:“学一学阿兼吧”,那意思就是:“请盘腿宽坐吧”。不过,此刻阿兼还没有盘腿。

鞋匠给阿兼吼了一声,心里老大不高兴,于是便把身子移到旁边的另一堆人的中间去。他在岩城大楼里的穷人中,生活是最苦的。但是用他的话说:“别瞧我这个样子,也是阔气过的。”他在岩城大楼旁边的空地上铺着席子,总是一边修鞋,一边小声唱着“新内”^②或风流小调。他唱的和街道工厂的斋藤、辻他们坐在窗台上,哇啦哇啦满不在乎地唱着从小咖啡馆学来的小曲儿完全不同。他的声音是那么淡雅,调子是那样合拍,即使配上

① 日本人在正规场合或谈重要的问题,讲究跪坐,在众人面前盘腿而坐或把两腿叠在一边横坐着,是失礼的。

② “新内”是日本谣曲净琉璃的一种,多以男女爱情为主题,歌词艳丽,曲子清婉动人。

三弦也不会走板的。可是，他在人面前却从来不唱。就是每逢一到集会，他总是打瞌睡，不打瞌睡时，便把手从胸口伸进去摸虱子。谁也料想不到一个鞋匠会唱出那样的歌曲来。

或许是因为和管房子的平贺情投意合的缘故，他时常到老头那里谈个不休。

“我一天平均花过一百块钱，玩了一个多月。提起我那个时候，就是穿皮鞋也一次没用自己的指头去碰过，真的一次也没有过。”

弯着脊背的平贺老头子，一听他说到这里，总要问上一句：“你说什么，怎么回事？”

其实，这类话老头子不止听过一次，但每当鞋匠说到这里，他总要重复地问一句。也许是说习惯了，鞋匠能把说了几遍的话一字不差地复述出来。这样老头子便把眼睛一闭，不停地点头说：

“嗯，嗯。”

看去，他那样子象在嘴里不住地咀嚼着什么。

“可是，一旦落魄干点啥营生呢——修皮鞋！真象佛爷说的，这是因果报应，心里头急得很哩。”

“说得对，说得对。”

平贺老头子没牙齿，听来好象是说“斯得得，斯得得。”

鞋匠凑近旁边那一堆人中间，不再摸虱子了。他背靠着墙，伸出两条腿打起瞌睡来，因为，他的身边是一伙朝鲜人。鞋匠在岩城大楼里逢人便低声下气地打躬问好，几乎使人大吃一惊。可是，一遇到朝鲜人就忽地（似乎想叫对方知道是他故意来这一手）把脑袋一扭，端起肩膀走过去。管房的平贺老头子，也是专门把二楼划出几间屋子租给朝鲜人的。现在住着三家朝鲜

人，一家姓李，是单身汉，身材矮小，他无一处不象日本人；一家带着眷属，姓洪，有四十多岁，嘴巴上有几根胡须，老是半张着；还有一家姓阳的，在夕张煤矿干过七年矿工，脸色象感冒一般又黄又肿，眼睛有些怕人。岩城大楼里，每天都有朝鲜人拿着肮脏的包袱皮，领着象袋鼠一样怀里揣着孩子的老婆来租房子。平贺划出去的那几间房子若是住满房客，即使有别的空房，也回答说“都住满了”，把他们打发走。看上去，那些冷飕飕样子的朝鲜人，尽管平贺老头子多次说没有空房，可是，他们仍在楼里到处窥视。有时还嘀咕着什么，就是不走。小樽市内有三千多朝鲜人，都拥挤在手宫街及其附近地区。小樽市内最爱雇用朝鲜人，若按利用他们的低工资发财致富的工商业公会副会长的话说，朝鲜人是“小樽的虱子”！

“今天‘劳联’的人到工地去了……”

挤在人堆里的小李悄悄地说。老洪照例半张着薄薄的嘴唇，仔细一看，胡须红扑扑的；他脸上现出好象听见又好像没听见的样子，两手交叉在怀里，不时地颠动着盘腿而坐的膝盖。

“说些啥？”

老阳口里衔着烟嘴儿，一支朝日牌香烟在晃动，好象吊在嘴角上似地问道。他也是盘腿而坐，只是两手交叉着插在大腿里，眼睛滴溜溜乱转。

“‘劳联’认为朝鲜人的问题是个赘瘤。”

小李的用词比日本人都雅。再瞧老阳和老洪，似乎有些听不懂，于是他又用朝鲜话说了几遍。这时对方才好象明白过来。

“唔！”

老阳摇了摇头，烟蒂一下子落在铺席上。他用大手掌在上面一抹，就把它给弄灭。老洪毫无表情地呆呆看着。

“据说，在码头上工作的‘劳联’工人们到工会去作了汇报——对朝鲜人不采取明确的对策，他们就要饿死了。另一方面，工地的工头就乘机拉他们退出工会，说什么只要退会，就解雇朝鲜人而雇用他们。今天来的人也说，理由很简单，必须把朝鲜工人提高到和日本工人一样的水平，因此，朝鲜人必须和日本工人团结起来。如果争取到和日本工人同样的工资，那问题也就解决了。可是，他发牢骚说，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很不好办。”

小李逐渐放低声音说，不住地往上撩着垂到脸上的长头发。他一面看着对方，一面夹杂一些朝鲜话说明。小李的朝鲜话反而说得不流畅，为了使对方明白，他费了半天劲。

“夕张煤矿也是一样。”

老阳说“夕张煤矿”，吐字不清。“夕张煤矿虽然没有工会，也一个样。日本人都讨厌咱们！”

他最后一句说得语气很重，突然打着手势用朝鲜话很快地说起来。鞋匠一愣，脊背离开了墙壁。

“老是说不好办、不好办，就是到啥时候也是不好办。日本工人不好办，而工资又那么低，住的地方比马棚还要脏的朝鲜工人也是不好办么。若说办法，只有一个，虽然不是一下能办到，但也是非办不可的！”——这是他用朝鲜话说的意思。

小李生怕有人听懂，神经质地向四周张望了一下，随后用朝鲜话叫老阳小点声音。

迟到的人都聚集在一进门的地方，有的紧紧挤在一处抱着小腿坐着，有的扭扭捏捏好不容易把腿弯了下来。这些人的工作要干到很晚的时候才能收工。他们到家吃过饭就来了。其中有一个青年，刚搬来两三天，方方正正的下巴，粗粗的眉毛，一个人坐在最后面吸着纸烟。他翻了几页膝盖上的杂志，又把它合拢在

一起。

两间打通了的房子里，早已烟雾腾腾。龙吉和古山站起来，把那歪歪扭扭满是灰尘的玻璃窗子好不容易打开了。

“老爹，来一下。”龙吉叫了一声。

“我穿着一身新衣服，怎好——”老爹皱着眉头，没站起来。

古山边开着窗子边对龙吉说：

“喂，大村！你看嘛，来开会的年轻人就是不多。”

“是呀……”

龙吉回头一望——“不过，要谈起什么房钱、租钱来，或许认为那是爸爸妈妈的事，都不敢出头啦。”

“这可不对！从小就自食其力的穷人，和那些靠爹娘养活的少爷、小姐可不能一样，这是个关系到切身利益的大问题呀。首先你就是这样嘛。对不？”

龙吉不由得一愣，暗想幸好刚才没出去。

“如果大楼里住的都是中年人或老年人也就罢了，不是也有不少的年轻光棍儿么！若是青年人带个头，把因循苟安的中年人和有妻儿老小的人都带动起来，那该有多好！”

“开始吧？”

在海面上做工的搬运工人，从门口大声对古山说。

“还是开吧！”

“开吧！明天一早，大家还要去干活的。”

刚才说话的搬运工，在向谁发问似地说：

“平贺先生今天来吗？”

“这个？……”

“他来听一听好……”

用铁浆染黑牙齿的泽井太太用手捂着嘴说：“那敢情好啦！”

平贺先生说，他根本不知道你们要开会。岩城老爷说过，要是来一场大地震都把你们压成‘煎饼’去见阎王，到那时再给你们修房子，瞧着吧。怎么，你们不服气……”

没等她说完，大家乱哄哄地笑起来。

“那为什么要涨房钱呢？”

大川老爹要把别人压倒似的大声说：

“咱们出房钱不就为的是让房东修理房子么！该交的房租，我们都交了，而且是相当昂贵的。可是，对这座快要倒塌的，象垃圾箱一样的房子却一直不管，这明明是房东的责任！”

大川老爹十分得意，因为他顶喜欢用“昂贵”这一类字眼。这回自己又是脱口而出，没费一点力气。会场上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到他身上，所以他感到高兴极了。

“一点也不错，真是欺侮人！”

阿兼把跪坐着的腿松了下来。这表示她要“盘腿宽坐”了。

“说的对！”

大家都随着大川老爹说。

“请谁去叫平贺先生来好不好？”

知道那件事情底细的老金独自笑嘻嘻地说。

这时，鞋匠睁开了眼睛，可是却皱着眉头说道：

“那没有必要……”

“什么？”

阿兼用胳膊肘猛地撞他一下：“你呀，你干脆打瞌睡摸虱子去好啦。”

“对，叫他来听听……”

老阳对伸着两只腿的古山说。因为他是朝鲜人，大家都在瞧他们一伙人。

“是的，这很有必要。咱们在这儿谈的，既没有秘密，也没有圈套，与其大伙儿自己来决定，倒不如面对面地说他一个心服口服。”

坐在门口的码头搬运工，朝着朝鲜人这边说道：

“别瞧他在这儿跟我们挺神气的，等见了岩城老爷就活象木槌捣米，一个劲儿地点头哈腰。”

老金笑了。

“这一路人都是这样！”

“好吧，那就叫他来。”

蹲在门口的码头搬运工改换了一下姿势，隔着众人的头顶向古山望去。

“那好，就请立石君去叫一声……”

“我去啦！”码头搬运工说着，便向过道走去。有些人都说他骄傲，其实一点也不骄傲，而且很懂事。这在他们的伙伴中也是罕见的。他的意志非常顽强，在海面当搬运工，老是干危险的活儿。入冬前，港湾里经常起风浪，加上轮船急着启航，有时木材要一直装到半夜。这时的工作顶危险了。船不停地摆动，人们只靠一盏手提灯的亮光，下到几百尺深的船舱里，在海水浸湿了的滑溜溜的木材上走来走去；头上隆隆的起重机把木材垂下来，他们就用长柄钩子钩住，往舱里装。长柄钩把钢缆的吊结一拉，木材便滚落下来，咕咚咕咚震得船舱直响。立石亲眼见到一个在身边干活的伙伴，只因脚步稍微向前滑出去半步，就把他砸成一堆肉泥了。

装圆木或方木是先把它们编成筏子，拢到轮船的腹部来，然后再用起重机吊起一两根；起重机咯吱咯吱往上一绞钢缆，木材便离开水面，腾空而起，海水从木材上哗啦一声就抖落下去。

因为是在半夜里赶任务，有时发现钢缆有些歪扭，也不去调整，就让它那样子下去。虽然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不过，有一次方木料刚好吊到船舱上面就从钢缆上脱落下来了。那真是一眨眼的工夫，方木料就发出可怕的声音落在几百尺深的船底。因为反作用，钢缆卷成一个圆圈圈向空中弹去。那时幸好舱底下一个人也没有，大家都呆若木鸡一般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们算是拣了一条命。立石也在场。不过他们谁也没说一句话，只是面面相觑，又看了看自己的手和脚，然后又稍微动了一下。他们好象是在检查自己的手、脚是否出了问题。最顶层的甲板上立刻骚动起来，好象有人慌慌张张地在往下面跑。

立石和五个伙伴加入小樽联合劳动工会，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工会里，立石是一个“坚强可靠的人”。现在，他和伙伴们都到会了。

立石马上回来了。

“老头子要来。”

“好极了，真有意思！”

“女青年怎么一个没有来呀？”

大川老爹扬起脸来扫视着大家。

“年轻人哪里肯呀！不到我这个年纪……”

泽井太太用手捂着嘴，看着阿兼说。

“大伙都盼着那个‘犄角娘’来吧！”

老金说着，自己嘿、嘿、嘿地笑起来。大家也哄然大笑。

“老金真有点太那个啦！”

集会上的紧张气氛立刻消失，彼此融成一片，亲热起来。

“还有两位罐头工厂的女工哩。会上没有女人谈话就不带劲儿。有没有热心人士去叫一下？”

古山一说出口，有点不大好意思，用手咯吱咯吱地搔弄着头发。

“对，谁去呀？”

“两个女工都是独立生活的，和其他的姑娘们不一样，房租问题跟她们有直接关系。算啦，别再开玩笑，还是让她们来吧。”

古山补充了一句。

“对，看看谁有福气。”

立石说着，挨个儿把大家看了一眼，随后说：“这还是得年轻人去才好……中岛铁工厂的小哥怎样？”

大家都瞧着龙吉。羞得他面红耳赤。大川老爹用大拇指一下一下撞着他的肋骨。

“脸儿红什么，够多讨人喜欢！”

“不光是女的，看来没到会还有不少呢。今后的市面越来越萧条了。这类问题会接连不断发生的。从现在起，大家就得养成通力合作的习惯。今天没来开会的人是怎样个想法，我不知道，不论是减房租也好，叫他少算点也好，这么个小事要单枪匹马各行其是，那也是办不成的。是不是……”

说着，古山便用和善的，男人中少见的长睫毛眼睛瞧着龙吉：“是不是请大村君把他们拉出来？”

“拉出来！……”

大川老爹嘻嘻地笑了。他想：这个词儿一定是选举时用的。我要记牢，日后也要用上一用。

龙吉板着面孔，站起他那高大的身躯。

“不用一个个挨家找，还是来个岩城式儿——站在楼梯旁叫一声就行啦。”

“哟，别瞧大村哥的身量大，还是个娃子哩！”

阿兼盘着腿，絮絮叨叨地开大村的玩笑。“娃子”是小孩的意思。

“别这样，还是挨家挨户地走访吧。说不定会碰到美事儿呢！”

老金在后面又嘿、嘿地笑起来。

龙吉刚好走出去，驼着背的平贺老头就进到屋来。

“啊，对不起。”

一直在噼噼喳喳说话的人们，忽然停下来，好象在那里来回爬动的“寄居虾”遇到外敌一般，立刻把身体缩到壳里。——来这儿开会的每一个人，月月都得吃平贺老头子催讨房租的苦头。

老头子在一进门的地方坐下来，他身旁的人挪动着身子给让出一块地方。这倒不是因为老头子不是自己一伙的人，或者说他是敌人，而是在这些人的思想上仍然有给这样人让座的意思。但是，再看老头子脱离大家一个人孤零零坐在那儿的时候，大家都渐渐意识到老头子在这个会上确是一个“局外人”。

“喂，开始吧！”

走廊上传来龙吉的喊叫声。

大家动来动去重新坐好。

五

“关于房租问题，听起来可能都不认为是个大问题，但这对我们住在岩城大楼的人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大事。”

古山的讲话和平时不同，是郑重其事的。大川老爹在一旁

专心倾听着有没有新奇的词句和道理。

“不错！”

卖糖的老金说着，瞥了平贺老头子一眼。

“象我这样做一两分钱小买卖的，直接关系到吃饭的问题。”

这时，老头子弯着腰，胳膊肘支撑在大腿上，两手托腮，闭着眼睛。

“今天到会的人很多。这次不比过去的那两次会，只单纯要求修理便所和漏雨地方的局部性问题。因此，希望大家先决定今晚的会如何进行，并按什么程序进行。——应如何进行呢？”

古山的这番话没人听懂。

“应如何进行……”

大家七嘴八舌地谈论起来。

“要说如何进行，这个问题很简单——对岩城先生的要求是答应还是不答应不就可以了嘛。”

“对呀！”

“不，那还不成。不答应又该怎么办？这必须决定下来。”

古山说。

“嗯，不错。”

“等一等！”

一个新搬来的下颏方方正正的青年，坐在最后面大声说。

“大家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讲话怎行，我认为要规定一个办法。”

他一字一句慢条斯理地说。好象每句话打上“。”“、”一样，说得非常准确。

“我认为要这样——会上要决定一个人作主席或者议长，叫什么都没关系。想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的人，应该一一取得

主席的同意再讲，不要随便说话。”

大家望着这个陌生的，下颏方方正正硬得好象什么都咬得动似的青年。古山也大吃了一惊。

“我认为当主席的要制止与本题无关的发言，对各种意见应当加以取舍，使会议有条不紊地进行。”

海上搬运工立石目不转睛地俯视着这个人。他觉得刚才还翻阅杂志的矮胖子，突然间竟说出这样的话来。——立石惊讶的并不是这件事，而是忽然想起介绍他加入工会的人，在一般谈话中象口头语一样，经常说“议长！”“无异议！”这是外国语吗？他曾问过是什么意思。那人说：“现在流行这句话。”立石心想：这个矮胖子是谁呢？

“那就这样一个个举手，现在是该我讲话的意思罗……哎，真是怪事儿！”

“这象学校里的学生！”

阿兼拿着扁平的小烟袋模仿举手的样子，说：

“我、我、我……这样说，对吧！”

于是，哄堂大笑。

“这样吵吵嚷嚷的可不成，要紧的话一句也没说呢！所以那个办法是很有必要的。”

古山提高嗓音说。对先决定选议长再开会，是他最近从书里看到的。他之所以这样说，是想在这个会上用一用。他从未想到岩城大楼里有人和自己一样也知道这件事。无疑地，这一定是“左翼”（这个词也是人们最近才开始用）的人。这时，古山好象发现了同路人一样，感到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深厚感情，所以向对面尽头处的那个人望去。可是那个方下颏的人却漫不经心地翻弄着大腿上的那本杂志，并不理睬古山。

“还是决定机长好。”

老李把议长说成了“机长”。

“对，不是一两个人发言，应当这样办！”

温厚善良的河西，坐在那里一直一言不发，而现在象经过深思熟虑似的慢吞吞地说。他有个毛病，不衔着香烟也要皱着眉头。阿兼曾经说过，河西自从生活困难以来，愁得他脑筋都不好用了。

大家一致赞成推个议长。

“那末让谁当议长呢？”

古山说。

“那就是你呗！”

大川老爹用大拇指触着古山的肋骨说。

“只有古山先生啦！”

立石粗声粗气地一说，就决定古山当议长。古山把伸出去的两条腿缩回来，重新坐好，用弯成笏子形的五个指头咯吱咯吱搔着脑袋。

“我实在是头一次……”

“谁都没当过。”

立石又大声说。——无论在哪儿，他总是用大嗓门说话，因此，人们都认为他傲慢。

“议长！”

尽头上有人轻轻举起手来。

“唔。”

古山心里一慌，张口结舌地回答了一声。

“这个问题，我认为很简单……”

一看，还是那个方下颏的人。

“我们既然付房租，房东就有义务马上给修理这样臭垃圾箱似的房子。因修理房子就要涨房租，太不合理了。相反的，这个时候我们还想要求岩城（没有称先生）落房租呢。——落两成房租，立刻给修理岩城大楼。我认为可以在这两个问题上展开讨论，不知大家有什么意见。”

一字一句讲得清清楚楚，不论谈话的方式或措词，岩城大楼里的人还是头一次听到。因此，他讲完话，大家呆呆地沉默了半晌。——大川老爹不住地点头，对那种谈话的方式很佩服。“问题是……”这样堂皇的说法，他非常喜欢。方下颏说完，若无其事地又翻弄起大腿上的那本杂志。

古山知道他那种谈话方式，和最近一个朋友叫自己读的那本费解的书（只选读了几处）完全相同。但是，这种谈话方式，可能对住在岩城大楼里的人是很不合适的。——一看，不仅阿兼和泽井的管家婆，就连每个男人也都面面相觑。

“后面那位的意见是这样，现在的房租很贵，面对这个情况，大家就应该让岩城落两成房租，同时还要让他给修理房子。——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交不起房租嘛！大家觉得怎么样？”

古山没费气力又把这句话重新说了一遍，会上紧张的情绪马上缓和了。大家又噼噼啪啪谈论起来。

“若是能办到的话，那可就再好没有了！”

“租钱要得太多吧！”

泽井的管家婆隔着两三个人望着阿兼，说道：

“当平贺先生您面说，我真为房租钱发愁！若是落两成，十元钱收八元就能省出个粮食钱来！那该多好啊！”

朝鲜人单独在一起议论起来。

“我们干活，工钱比日本人低，任何时候都低。可是房钱却

和日本人一样，这不成。房钱也要便宜些才好。”

老阳说话时，急得他两只手在嘴巴前乱抓挠。

“老阳说的很对。我们是站在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广大立场。然而朝鲜人在我们中间，生活的确是悲惨的。问题是……”

说到这里，大川老爹有些手忙脚乱了。“问题是……”由于这句话用得过早，下面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也不知该怎说才好。

“不过让房东落两成房租还要求给修房子，那有点太可怜了。哪怕是不涨房租，只要求给修理房子就行，不知大家意见怎样。我想……这样比较稳妥。”

说这话的是鞋匠。

这时，平贺老头微睁两眼，晃动了一下身子。

“请大家等一等！不要随便说话。”

古山制止了大家的谈话。

“现在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说是房租不动，要求给修房子。怎么样……这两种意见哪个好，请大家发表意见。”

“鞋匠说的倒也在理儿……”

河西这一回是把手掌放在自己的头顶上，深思着慢声慢语地说。

“嗯——，那也有道理！”

这一回大家纷纷倾向于这个意见。

正当这时，两个青年女子，为了不引起人们的注意悄悄走到门口，坐在方下颏的紧背后。

“议长！在这个场合提出落两成房租，岩城房东是不是太可怜的问题，我认为是错误的。其实，事情并非如此。落两成房租是否合理，我认为这应该从我们的实际生活来考虑。如果……”

方下颏用杂志搔着头，晃动了一下左肩，说：

“如果说房东太可怜，那么和我们天天愁吃愁穿的人相比，他过的是什么样生活呢？首先，我们看一看他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吧。他是住在有臭虫的，一下雨就漏的湿漉漉的房子里吗？他干过那浑身弄得乌黑的背煤的活儿吗？他干过那脊梁都要压断的背豆饼和青豌豆袋的活儿吗？他在雾气腾腾的灰尘里选过豆子吗？在货仓之间来回地拣豆子，这种遭人白眼的活儿，他干过吗？没干过！哪样也没干过！那么岩城的生活能比我们还惨吗？恰恰相反，他的房子很讲究，在市中心。他不知道什么叫漏雨。他吃的饭菜，我们从未见识过。而且，他那金迷纸醉的生活，我们是都不懂的。这一切全是靠收我们房租剥削来的钱生活的。现在，我们要求他立刻落两成房租和修理房子的理由就在这里……”

“同意！”

大川老爹喜形于色，大声地说。他是否同意那年轻人说的道理，自己也不知道。不过，那一字一句使得他越听越入迷。

“不错，你这么一说，也是有道理的……”

河西说着，脸上露出一种那是理所当然的神情。方才偏袒房东而提出相反意见的鞋匠，靠着那边的墙上，溜了河西一眼，接着便把手插到怀里去。

“刚才那位——”

阿兼说着，向方下颏那边瞧了瞧，“那位大哥哥说的都是实情呀。我们这样没学问的人虽然不太懂……不过做起来，怕是岩城先生不会轻易答应的。”

“阿兼，你等等！看来，大家基本上都同意后边那一位的意见。不妨这样定下了。可是我们得事先把话讲清楚：一旦定下来，即使是下刀子，我们也不怕。要团结起来朝这个方向前进，必

须再慎重考虑一下才能作决定。……那么，这个问题落实之后，下面就讨论该怎办。”

“那就这样决定吧！”大家说。“若是落两成，可就省不少钱！”

本来立石是最赞成的，可是被身旁那个素不相识的矮胖子斩钉截铁地一说，自己心里顿时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反感。因此，他一声没吭。

“好，就这样决定吧。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古山说着，看了看大伙。立石突然举起手来，说道：

“议——”他有些腼腆。“这么办好不好？在这个会上决定四、五个强而有力的代表，要他们一方面和大楼里的人保持联系，一方面跟房东交涉，决不许出现落后的人和叛徒……”

“有道理！”

“就这样，就这样！”

“立石，你可是啥都懂得！”

鞋匠说着，把手从怀里抽出来，露出一副和他自己说话的声调完全不同的冷酷面孔。

“岩城先生若不答应，咱们都搬出去吗？”

阿兼颠着盘坐的腿笑了。

“那可不对！”

立石伸着脖子说。

“阿兼，那可不对！那样做就输了。假若岩城先生不答应，我们就要一直坚持住在这里，一文钱也不交。离开这里一步那就输了。所以……”立石思索了一下，然后若无其事的样子很快地说：“事情若闹大了，我们就请工会来帮忙！”

平贺老头象一只卧在脚炉上的猫，一直弓着腰，闭着

眼睛。——这时，猛地挺起身子来。

“我是给人家看管这幢房子的。听你们这样说，假使闹到工会去，我就要报告警察。房租问题，希望大家在这个楼里和和平平地解决。”

警察！大家一听就象被镇住似的，一言不发。泽井的管家婆，看看立石又看看古山，看看古山又看看平贺，她脸上露出为难的样子。

“平贺先生，这要看岩城先生怎样对待我们了。我们并不想把事情闹大！”

立石接着又说了一句。这样大家心里才踏实了。下一步要确定代表，可是会场情况和方才不同，人们话到嘴边象被卡住似的，发言很不踊跃。彼此拉扯着衣袖互相推让才说一两句。看样子都是战战兢兢的，唯恐自己当上代表。

为啥会突然出现这种现象，古山心里十分清楚。许多来这里开会的人，他们要说的各种各样的话和想法，在那每一瞬间就象被浮云的阴影遮住一般。眼看着“警察”二字，住在岩城大楼里的人们心情便暗淡起来。

“不论怎么说，代表首先应该是古山先生。还有大川老爹……还有立石……还有——”

老金瞧着每一个人面孔继续说：“最好还得有一位妇女，对吧？”

大川老爹听到有人提自己，显出不耐烦的样子，低下头抠起脚指甲来。

“我很希望后边那位新搬来的人，也参加进来……”

古山是指方下颏说的。

“那好哇！”

大家知道再不会轮到自己的头上，谈话立刻活跃起来。

古山看了看表，已经九点半了。

“时间不早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各项事情，由这里推选出来的代表们研究之后就立即执行。这样可以吧？”

后面有人说：

“无异议。”

大家有的伸胳膊，有的打哈欠，立刻吵吵嚷嚷地站起来。立石一看，说“无异议”的人还是方下颏。

“您最近搬来的吧，贵姓？”

立石推开站在旁边的鞋匠，跟这人攀谈起来。

“岛田。”

方下颏看也不看他，冷冷地说。

后进来的两个年轻女子，夹在站起来的人群里向阿兼说：

“叫我们来我们就来啦……”

“真是的，你们俩活象个木头人。会上该谈谈嘛。”

阿兼说了她们一句。

一个身材短小，眼窝深陷，窄窄的脸儿，气色也甚好的可爱的女子，隔着人们肩膀不住地盯着龙吉。

高个儿的女子说：

“藤子，咱们回去睡吧。明儿还有夜班呢！”

说着拉起她的手。

大家从屋里走出来。

“哎，头痛得很！都是纸烟熏的！”

大川老爹在老金的身后，一边拍打着自己的脑袋，一边摇晃着说：

“明天来家喝一杯好吗？”

没人跟平贺老头说话，他弓着脊背摇来晃去，一个人嘟嘟囔囔在门口寻摸拖鞋。

“喂，大爷。”

鞋匠把他那双被践踏了的拖鞋拿过来。

“噢，是鞋匠！多谢多谢！”

老头说话很少这么亲热。

“今天，‘犄角娘’来了够多带劲儿。这没有一点意思……”

说着，老金撞了一下泽井的管家婆。

“老金，你可真够呛，又露出本性来啦！”

“近来妈妈不寂寞吗？若是那个的话……”

“呸！”

老金身后猛然间被泽井的管家婆拍了一巴掌。

老金嘿、嘿地笑起来。

古山从屋里最后出来，用不太高兴的语调问龙吉：

“怎么你连句话都不说呢？”

龙吉低头咬着嘴唇，没有回答。最后，只说了一句：

“明天从工厂回到您那儿去玩……”

“噢？”

古山望着龙吉，说：“是么，我等着你。近来有一本书，是一个叫福本^①的人写的，人们都在争论……好，我等着你。”

方下颯岛田正上二楼，这时古山随后追过去。

龙吉在阴暗的过道上往回走，背后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龙哥！”

① 即福本和夫，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期间，在日本共产党内产生以福本和夫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

他停下来回头一看，原来是藤子追赶来。

六

第二天早晨，龙吉比往常来的迟了一些。

这样的集会看来是无所谓的，可是龙吉他们回到房间都感到精疲力尽。这和在工厂里硬顶着干夜班回来时不同，而是心焦意乱，精神上感到很累。

龙吉捺一下记时器，来到办公室的玻璃门前。这时厂里的人正聚在那里吵嚷着。

“哦。”

龙吉把手放到油亮的便帽上，说：

“出什么事啦？”

“嗯。”

最近才由学徒工转正的千叶，笑嘻嘻地说：

“翻天——覆地的——大事呀！”

一看，聚在一起的全是上年纪的老师傅。

“失火啦……”

“失火？昨晚上吗？”

龙吉听到说失火，就象有一种预感似的。

“是啊，社长家邻居的隔壁失火了。你昨晚上到失火现场去了吗？”

千叶的这句话似乎含有言外之意。他两只手插进裤兜往上提了一下裤子。

龙吉转过头来含糊其词地说：

“啊。”

千叶溜了龙吉一眼，说：

“那就很成问题罗。听说社长大发雷霆。他还说，咱们厂顶多去了两三个人，其他厂子的人反倒及时赶到，帮了很大的忙呢。”

龙吉昨晚开会回来，刚躺下就失火了。他跑上三楼的空屋向窗外看去，好象是社长的家。究竟是跑去看看还是睡觉呢？……他在那里呆呆地站了半天。正在观望的工夫，火势就下去了，火光映红的天空渐渐暗起来。而且早晨还要早起，所以他就没有去。虽然打定了主意，可是在下楼的时候，仍然有些放心不下。

“……………”

千叶象藐视人似的冷冷一笑：“头儿们都慌了，正在研究处理善后问题呢。说什么处理善后问题很有必要，真叫人骇怕！”

千叶比谁都懦弱，可是有时疯狂起来就厉害得很，简直象要咬人一般。他说话有个毛病，总是摇晃着身体，往上提裤子。

龙吉把漏菜汤的破饭盒放在更衣室的架子上，换上沾满油污的、领子冷冰冰的工作服。他打了个寒战，便下到厂房去了。往常这个时候，工人们都在守着机器工作，可是今天工长都去办公室不在现场，所以大家到处一帮一伙地议论着失火的事。只有脸上冷得起鸡皮疙瘩的学徒工拖着木底草鞋到处走动，手拿长嘴油壶和机器油壶往每个机器上浇油。

中岛铁工厂，宽十二丈，长约三十六丈，是一座钢骨结构、铅板铺顶的工厂。屋脊上装有五个一排蘑菇状的通风筒，在半空中不时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钳工部和车工部几乎占去大半个工厂，冶炼车间和翻砂车间各占其余的二分之一。钳工车间和

车工部门口突出的一块，是三面镶着玻璃窗的监工室兼办公室。

工厂的棚顶上架着铁梁，上面悬着滑车的起重机，几条铁链从上面垂下来。棚顶的一面是狭长的二楼，那里是木工部。一捺马达的电钮，总轴就转动起来，支撑它的铁梁也跟着巍巍颤动。各种宽窄不同、速度不同的传送带，象人体的动脉网连接着下面的每部机器。如果总轴发生故障或需要浇油的时候，必须从木工部的二楼铁梁上走过去。

学徒工庄司用长嘴油壶咯吱咯吱地往龙吉的车床上浇油。龙吉问他：

“你昨晚到失火的现场去了吗？”

庄司的薄嘴唇，冷得直哆嗦，瞧着龙吉，沉默了一会儿，说：“去了给涨工钱吗？大村。”

龙吉觉得他曲解了自己的话。本来他希望多有几个人没去，而且盼着有人跟他说：“谁肯去呀！”这样也好稳一稳自己的心。——龙吉的为人也有这样一面。

他觉得庄司这人很讨厌，便向积存平板台的地方走去。庄司无论对谁总是冷言冷语地顶撞人，所以没人喜欢他，因此一直当学徒工。但在学徒当中却很有威信。有些事学徒工只好忍气吞声，唯有庄司能为大家针锋相对地去反抗。可能因为境遇太坏，性情乖僻，有些冷酷，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他在学徒工中间总是孤零零的。

曾跑到失火现场去救火的福原，在平板台那儿谈论着当时救火的情形。他正讲到兴头上，指手划脚起来，围观的五六个人脸上明显地流露出厌恶的神情。只去了两三个人，福原一定给社长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大家很羡慕，另一方面，令人想不通的是，“身为工人”何必去巴结社长呢，这样的家伙没人瞧得起

他。

“我从电影院出来就看到失火了。一看方向正是社长家，心想：见鬼去吧！他要想让我们去救火，平常就得待我们好一点，到时不用说，我们就跑去了。——我想到这儿就没有去！”

靠在龙吉身旁的渡边这样说，是在故意讽刺福原。

“对！”

“社长那家伙太自私了，总是想方设法剥削！”

平常没有很好考虑这个问题的人，也都由于对福原的嫉妒，才说出这样的话来。

眼看要升工长的福原，脸上露出讨厌的神色，点上纸烟，向旁边喷了一口，闪烁其词地说：

“可是……灾难临头时是不分彼此的呀……”

“不分彼此？”

渡边直截了当地说。这时，他不再象平常那样沉默寡言了。接着，福原说：

“是呀，这样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工作啦！”

这话莫名其妙得很，逗得人们哄然大笑。

聚集在办公室前面的工长们，嘴里嘟哝着进了厂房。一般职工倒无所谓，工长不赶去救火很可能被免职！（工长们暗自思量）因此，他们显得非常不高兴。

“喂，今天头们的气儿可不顺，当心点！”

大伙眼睛看着工长就散开来，回到各自的工作台去。

这时，响起洪亮的汽笛声，震得铅板屋顶直响。

翻砂车间和冶炼车间在一幢房子里，正好是背靠背。打开熔炉口添进焦炭和铁块时，整个车间照得红通通的。

“若到失火现场去，正对咱们的路子。”

“哼，所以咱们浑身都是烫伤嘛！”

山形的体格健壮，他拄着铁锹站在熔炉旁边弄得很脏。鼻子底下蹭两下，嘴巴和两颧就沾上煤灰，好象一撇胡须。

“正是跟老婆睡得香甜的时候！”

山形说着，嘿嘿地笑起来。

“这也不光是你一个人！”

北川低头低脑地说。他拿着铁桶，站在熔炉小出口的前面等料，脸和胳膊满是烫伤。

“如果给加薪早就跑去救火啦！谁还顾得上老婆呢。”

往熔炉里送风的鼓风机，在角落上发出催人欲睡的嗡嗡声。

“没想到社长是那样愚蠢，人家没去就责骂，这象话吗？还不是他没有人缘！”

“一意孤行的人是不懂得这个道理的！”

山形嘻嘻地笑着，不住地咯哒咯哒磕打着两个鞋后跟儿。

北川沉默一会儿，说：

“是啊！社长这家伙若在翻砂车间就得每天喊：失火啦！失火啦！”

每当山形用铁锹打开熔炉门往里添焦炭和铁块时，他那橡树一般硬梆梆的胳膊上就隆起一块肉瘤。

厂房里的空地上，有几处翻好的不差分毫的几何形砂模。——学徒工收拾完木模和铁屑，在往过道上撒水。

“可以吗？”

北川拿着铁桶向学徒工大声问道。

“可以啦！”

北川用手巾包住脸，只露出两只眼睛，把铁桶靠在熔炉小出

口的下面。

山形用铁锹拨拉开挂钩，取下涂着粘土的挡砖。一霎时叭的一声，白光闪闪，钢花四溅，铁水发出一股焦臭气味流进铁桶。从学徒工那边望去，北川就象站在火花里一动不动，清楚地看到他的胸脯、胳膊和肩膀上的一块块肌肉在动弹。

“堵上！”

“好啦！”

山形用砖堵住铁水，噼噼啪啪地迸着碎屑。北川拿起铁桶往直径三呎的滑车砂模里浇铸，烫得砂子冒着紫烟，连同水蒸气一起把北川的脸给蒙住，呛得他转过头来吸了一口气。

浇完铁水，北川向旁边一蹿，在深深地吸气，因为他憋了半天了。这时他说：

“我的肺快烂得差不多啦。”

山形笑嘻嘻地说：

“你现在才知道啊？”

山形到中岛铁工厂只有一年，和大家不太熟悉。人们知道他在“内地”做过不少工作，但具体工作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他人缘好，大家都是“老山”“老山”地叫他。或许因为他和车工渡边住在同一方向，两个人经常一道回家。渡边挨着龙吉的车床工作，他俩年龄又相仿，所以有时也和龙吉一起回去。当老山从后面赶来时，渡边就和龙吉分手，而和老山一同回去。

“北川，你是想拿肺来换一天两块三毛钱的工钱吗？”

老山说着，又往熔炉里添着焦炭和铁块。

“可不是么！……最近我考虑了，想早些洗手不干……去开个小铺子！”

这时北川拿着空铁桶回来了。

老山哈哈笑起来，说：

“那太好啦！活着能干个小买卖就很不错啦。”

翻砂车间的棚顶横梁上吊着手动的起重机，链子上挂着铁罐，把它移到炉口，铁水便从大出口流进罐内，然后吊起来再移到大砂模处浇铸。

“喂，老山，起吊吧？”

吉本爬上横梁朝下喊。

“呃，这就开始？”

老山用铁锹咣咣地敲打着熔炉。

“来吧！”

吉本跟对面横梁上的伙伴打个招呼，开始推动起重机。起重机下面有滑车附在轨道上。他俩一边瞧着下面烟熏火烤中来往工作的人，一边“哎嘿、哎嘿……”地推起来。从上往下看，砂模好象外国某公园的设计图。铁罐摇摇晃晃挨近熔炉，老山、北川和学徒工用铁锹拢住铁罐使它靠近炉口。

年纪大的北川象打夯女人一样，配合动作唱起一两句小曲来。

哎——梳洗呀，打扮呀，

隔壁的好姑娘！

哎唉，哎唉哟……

“好啦！”

大伙用铁锹把铁罐推到熔炉大出口下面，老山从下往上咣咣地敲打开挂钩——四溅的火花落在大家的头上。

“好买卖！劈头盖脑地浇下来，可就……”接着配上街头流行的小调唱道：“那时呀，小命就要见阎王……”

“定价两块三毛钱？”

“两块三？可是咱们的小命就值一块一！”

不料，一起用锹捺着铁罐的徒工搭了腔，人们顿时哄然大笑。锹头下面的铁罐，也跟着晃动起来。

“喂！真要浇啦！”

山形管浇铸，他的脸在粘糊糊的铁水照射下，变成了赤面獠牙的妖怪。

铁水的热气，使汗水从沾满砂土、煤烟的脏脸上和胸前不停地往下淌。每个人都穿着衬衫用袖子擦汗。而且，一掀开炉门，焦炭之类燃烧时放出的毒气，熏得人鼻孔火辣辣痛。

溢出来的铁水，常常落在脚下。一遇到潮湿的地面，吱啦一声轱辘轱辘滚成个圆球儿。这个活儿，不管谁干也都得受点烫伤。北川有一种论调：“翻砂车间全都是烫伤活儿，没听说女人爱上干这一行的。有老婆的人还好，让小伙子干，实在太可怜了。”

铁罐装满，大家就撤去铁锹。

“若是社长干这活儿，我们就得每天登门探望病号啦。”

火花溅在老山的胳膊上热辣辣的，痛得他用舌头舔着，他那乌漆墨黑的面孔都变了样。

“说真的，这场火并没烧着……”

有人接下去小声说。

“来，干嘛！”

北川抬头朝棚顶说。

铁罐里装满铁水，要依次往一排砂模里浇灌。起重机到了指定地点，一打舵轮，链子哗啦哗啦垂下来。下面的人摘掉挂钩，铁罐就自动倾斜过来。大家时而大声嚷着，时而哼着小曲工作，但思想上都是聚精会神的，不敢有半点疏忽。

工作中间，北川大爷几次跑到一个角落手捧着水咕嘟咕嘟地喝了一顿。

这活儿又热又出汗，还叫人提心吊胆的。收工后，累得人精疲力尽。翻砂车间和冶炼车间的工人，他们的性情要比车工和钳工车间工人暴躁得多，身体看去挺结实，但仔细一瞧，脸色很坏，眼球都是混浊的。

木工手拿木模从钳工车间上面陡立的铁梯子走下来，耳朵夹着一支铅笔，衣袋露出半截折叠尺。车间里只有木工身穿短上衣。

木工在门口说：

“听说厂长今天要召集大伙训话……”

“喂！”

山形从身后撞了一下渡边的肩膀。——渡边把“坯料”（铁棒）夹在车床上，对准旋刀削轴呢。吱、吱、吱……旋刀前面眼看着卷起铁屑，露出冷冰冰银灰色的光滑面。渡边不时地用卡尺量直径，同时还用毛笔刷蘸饱机油往铁棒上涂抹……

渡边的短粗脖子一扭，回头看了看。接着卸下传送带，看见山形时，他脸上露出那种沉默寡言的人所特有的亲切表情，说：

“瞧，你的脸多脏呀！”

从翻砂车间到这里来，就象刚从矿井上来的矿工一样，脏得很显眼。

“这儿不是你们翻砂车间里衣冠楚楚的名士们来的地方！”

渡边说着笑了起来。

“别瞎说——”

山形把漆黑的手装作往对方的脸上抹去，接着向工长那里

丢个眼色。工长不象平常那样唠唠叨叨地来回转了。两三个人凑在一起，神色显得很紧张。山形急促地轻声说：

“今晚七点。——我差点忘了。”

窃窃私语般地说完，手指摸着削过的轴面，又放开喉咙说：

“还不成。这象砂纸一样，粗糙得很呢！”

“哼，是你老山的指头粗糙吧！别搞错了！”

“要讲指头，咱们可就是半斤八两啦！”

只要有空暇，山形没事也爱到渡边这里来。渡边在龙吉车床的旁边工作，年龄也相仿，小学毕业以后就进了铁工厂。他不甚喜欢开玩笑，可是，他象寡言少语的人常有的那样，一说句玩笑便与众不同，总带有一种幽默感。他一直在机器旁边生活，身体没长高倒是先长宽了。腿也比龙吉短，有点罗圈腿。虽然他俩的境遇都很苦，但他在生活中，不象龙吉那样遇事谨小慎微，看人颜色行事。因此，比起龙吉来，他给人以不拘小节的迟钝感觉。龙吉不喜欢这样的人，然而渡边的这种性格却适合在“工厂”。龙吉不同，他虽然中途辍学，但仍有进取心，身上还带着一些和这里格格不入的学生味道。中岛铁工厂的人出于对龙吉的尊敬心情，开玩笑时称他为“学者”。他做事认真，在校时学习好，对事物的理解力也强，所以厂里的人遇到不认识的字和不懂的事情，都去向龙吉请教。

说也奇怪，渡边近来跟龙吉好象很亲热。但龙吉从旁观察，倒是觉得渡边和山形之间有一种共性的东西在促使他们和睦相处。

龙吉进厂后，主要跟渡边学徒。渡边话语不多，但很热情，教的好，一听就懂。当龙吉的活儿接二连三堆起来，时间又紧迫，手腕僵硬得象根铁棍，实在顶不住的时候，他就头晕脑胀地

蹲在那儿一动不动。即使在这个时候，渡边的表情比机器还冷漠，仍一板一眼地处理他的活儿。——他同样毫无表情地用准确的动作帮助龙吉。这且不说，龙吉操作时，在入刀的手法上，开头和煞尾的劲头不均，车出的活儿总是粗细不匀。再看渡边车的，个个儿都一样。龙吉觉得：这不单纯是熟练程度问题，甚至在铁活儿上，也明显地反映出性格上的不同。

“头儿来了！”

渡边轻轻说。

“咦，学者怎么啦？”

对方黑糊糊的脸上，两只滴溜溜转的眼睛令人望而生畏，手揉着鼻子下面。

“.....”

渡边没作声，摇了摇头。

“？”

“还有不懂的地方.....”

龙吉说。

“是吗？”

这时，山形向走近身边的工长微微一笑，回翻砂车间去了。

这位傲慢的伊势田工长，不知为啥，对渡边疼爱极了。不论出啥事，从不责备他。因此，一看见渡边就说：“你干活麻利点儿。再麻利点儿就好啦！”

“工长这家伙粘粘糊糊的，要当心！——想要和你搞同性爱呢！”

大家觉得这话真逗。

“怎会看中我这样的人？”——渡边有些难为情。

渡边不愿再听“你干活儿得麻利点儿”这句话，拔下旋刀就

走到砂轮旁边，挂上皮带，圆圆的砂轮风驰电掣一般转动起来。吱、吱、吱……旋刀上火花四射。砂轮常常迸出碎屑伤人的眼睛。

厂内工人中，工资最高的岸本，在砂轮旁的平台上，手里拿着圆规一面用粉笔画图样，一面在和前来看画图样的酒肉朋友谈论他在咖啡馆和银行职员为女招待争风的事情。

“那娘们儿真混帐！”

岸本好象宿酒未醒似地发出嘶哑的声音。

“这也是因为我吃醉才骂她。——你讨厌我是工人，那商专毕业的也好，大学毕业的也好，若说几何、高等数学比我强，我倒想领教领教。不错，我是工人。他们的工资是否比我多，还是个问题哩！咱每天拿四大块，是个阔佬。——她叫我臭骂一顿。”

“那些蠢材的月薪，怎能和咱爷们比！”

显然，这是对方在奉承岸本，因为他经常尾随着岸本要他请客。岸本在下班临走前，呆在盥漱室的时间要比别人长一倍，每天用保险刀刮脸，香皂洗头，整整齐齐地扎上领带，挂上崭新的硬领。他说：“在咖啡馆只有银行职员、公司职员最吃得开，太不公道的。”所以，他每天晚上打扮成银行职员或公司职员的模样去逛。

“我和你们不同，手很柔软，一个老茧也没有，只要说话留神，怎么也瞧不出是个工人来！”

这是一次岸本在盥漱室一面仰头扎领带，一面看着渡边粗笨的手时说的。他认为人家管他叫工人比自己被踢进阴沟里还耻辱。

渡边从未主动地跟岸本搭过话。——岸本发现他左手戴一枚金戒指，便不时探头探脑地向黄灿灿的戒指投以羡慕的眼光，

作出谄媚的笑脸。

“你昨晚去救火了吗？”

“没去。”

岸本一问，渡边板起面孔这样回答说。

“没去？……我可去啦。这时候什么事儿都得撂下，非去不可。这是为日后着想啊！”

渡边停止磨刀，回到车床前。

身旁的龙吉耸着肩膀，探着身紧挨车床，嘴角露着舌尖，抿着嘴拚命地削轴。他挂上传送带，转动摇轮，瞄准尺寸在入刀。一寸直径的轴，要削五百根。削完一根，龙吉就扬起右手晃动几下，再捶一捶肩膀。恰好这时看见渡边，龙吉的眼睛露出笑意。渡边心想，这是吃不消了。

几天来，夜班已把他们组装起的新型铣床安好，工长们试车去了。工人们边谈边干，工作也松懈了。但经常落后的龙吉却在拚命干，一句闲话也顾不得说。

在一旁的学徒工庄司，遇到一台齿轮不灵咯哒咯哒直响的车床，他就怒气冲冲粗暴地使用。

“这工厂太有趣了！一有火灾全厂都跟着战战兢兢的！”

上野从厕所回来，一面说着一面摇着头走去。

中岛铁工厂有两三个工人是从小工厂转来的。他们经常受到伊势田的责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过于拘谨，所以在工作中很自卑。上野是从斋藤、辻他们那个大野田工厂来的，脸色象患肺病似的苍白，小脑袋总象冷的打颤。

上野觉得不是自己的工厂，所以谈任何事情都无顾虑。午休时，和大家说：

“这里的工厂比较大，所以还逍遥自在。小工厂最近总闹

罢工。”

他的小脑袋频频摇动，看来是未老先衰。他说的每一个字，仿佛用晃脑袋往上打“重点”似的。

“我到这儿来，还没见过有人往工厂里贴传单呢。可是我们大野田工厂，这是常有的事。一听说要支援码头工人罢工，厂里的工人都多多少少凑一点钱送去！”

这事顶新奇，中岛铁工厂的工人听了，都很感兴趣。这样的消息对龙吉常常有一股吸引力。他从早上七点一直被迫干到下午五点，连到盥漱室蹲一下都很吃力。他甚至感到有一天自己的身体会彻底垮的。厂里无论是谁，在盥漱室脱光上身一看，就会发现每个人身体都有些畸形。车五百根轴！从早到晚老是重复同样的动作！一天一块八毛钱！扣去假日，每月也就将近四十五块钱！根本养活不了全家。

“听说俄国的工人好得很！一天只干七小时的工作。”

不知道上野是从哪儿听来的，他也说过这样的话。提起劳动时间，是关系到每个人的事情，所以大家“嗨”地一声，把两只眼睛都瞪圆了。

“可是，干七小时的工作能生活吗？”

“是呀！够呛吧？若是七小时的话，下午两点就能回去了。那可……”

“是这样——”

上野接过话头，脑袋比平常晃得更厉害了。他说：“人家没有啥也不干站在屋里就赚钱的什么社长、厂长之类的人，所以生活是不成问题的！”

一次，上野经常讲的这番话传到厂长耳朵里，他险些被送回大野田工厂去。从此，他便闭口不谈这些事情，好象变了一

个人。

“上野最近连头也不晃啦!”

渡边说完笑了。

快到中午的时候,下达一个通知,说厂长要讲话,休息时间大家到饭厅集合。

“糟糕,休息时间又吹了!”

“一失火就得赶快爬起来,瞧瞧南边的天空!真要命,真要命!”

伊势田工长朝着他最得意的渡边走来。

“去通知冶炼车间一声。”

渡边无奈只好独自一笑,到冶炼车间去了。

“你说甚么? 甚么——?”

炉里喷起的火焰映红冈山赤露着的半边肩膀。他掌着铁钳在砧台上一面用锤子有节奏地敲打,一面喊着,没有理睬渡边。汗水顺着毛茸茸的胸脯往下淌,炉火一照整个胸脯红彤彤的。

两个徒工轮流踮着脚挺直腰,利用反作用从身后把大锤抡圆,照准火红的铁块,伴着有趣的节奏狠狠砸下去。

“忙着哪,等等!”

这个车间的人,性情都很粗暴。他们说:“同样是跟铁打交道,但我们不能象你们那样斯斯文文地干!”

旁边在焊接大烟筒。小炉里炽热的焦炭堆中插着蘑菇形的铆钉,大铁钳把它夹起扔过来,熟练地接住以后就哒哒哒……铆起来,发出机关枪一般的声音,震得耳朵里,嘴里嗡嗡直响。

“怎么样,你偶尔来听一听这美妙的音乐会解困的。”

手拿大铁钳的须田说着,眼睛充满和他那强悍的身体不相

称的和蔼的微笑。——“如果你愿意的话，就请你欣赏一下汽锤声好啦。它是我们这里的大王啊！”

光是响声倒不要紧，焦炭和煤烟呛得喉咙直痛。尽管炉台上方倒扣着漏斗形烟筒，可是大家的鼻孔、嘴和耳朵仍旧熏得漆黑，吐出来的唾沫和痰老是黑的。冶炼车间的工长们一回到家里就爱吃茼蒿菜，据说可以排除肠胃里的尘埃，但并不灵，因为这个厂子进进出出的工人比其他任何一个工厂都频繁。原以为某人是歇班了，谁料想他早已退厂了。有个人面色苍白，头上缠着手帕，说是去医院的归途来到厂里看一看；因为他气喘，慢慢吞吞地边说着话，边用手摸一摸他在厂子时用过的铁砧，拿一拿锤柄，在厂子里四下张望一番就回去了。后来很久不见他来，原来是死了。冶炼车间的人说，身体越结实越容易得肺病。因而，这里的人得肺病，都是因为茼蒿菜不灵，身体健壮的关系！

渡边把厂长要训话的事告诉给手拿大铁钳的须田便回来了。

在伸进钳工车间三面是玻璃窗的监工室兼办公室里，各种各样的人匆忙地出出进进。再一看，龙吉和刚才一样，还在抿着嘴咬着舌尖削轴呢。

七

冗长的训话完毕，饭后只剩十几分钟的休息时间。——冬天即将到来，大家都珍惜午休那么一会的晒太阳时间。可是，大家盼望的这段时间却被砍掉了。

“该死的火警，它把人可害苦啦！”

庄司和千叶走到铁丝围着的草坪上，投掷海绵做成的球玩起来。渡边和山形来到停满汽艇和驳船的运河岸边，靠着工厂的混凝土墙抱着腿坐在那里。温柔和煦的阳光照射在油糊糊满是灰尘的身上感到暖烘烘的。山形象平常一样，忙叨叨地揉着鼻子下面，在听别人说话……渡边从自己的鼾睡声中惊醒过来。

厂子里的工人差不多都聚集在这里。钢材用涂有一层油的厚苫布罩住，苫布上面印有红色的⊕字。有一个来装卸驳船上货物的工人象“大”字一样睡在那里。运河对岸的仓库二楼是“选豆工厂”，许多头裹毛巾的女工，脸儿对着窗户排列在一起，好象朝这边说什么。中岛铁工厂的工人同她们在大声逗弄。

汽艇拖着满载木材的驳船，嘤、嘤、嘤……尽情地吐着烟圈，翻腾着运河的污水驶进码头。驳船撒开绳索，汽艇往后一倒就开走了。

在厂子里，工人的装束和周围环境混在一起并不觉得怎样，但到了明亮地方，他们才发现自己的衣着脏得异常显眼。

“你这家伙就爱打瞌睡……我这么想——”

山形在鼻子下面揉了揉，用另一种语调说：

“尽管是运动初期，可是我反对工会以运输工人为主就容易搞的说法，而把大工厂的组织给往后拖……北海道还是落后啊！”

渡边微睁两眼，默默地听着。

“工会里有个叫旗塚的，还没有露面。那家伙很可靠……”

说到这里，山形的语调又变了。渡边将头埋在竖起的两膝中间，依旧微睁着双眼，说：

“以后给你介绍介绍……”

不知为什么，他很少说“给你”两字。

“喂，渡边和大村在吗？”

伊势田工长两手插进裤兜里走过来。这时渡边才把头抬起。

“讨厌，又是‘你得麻利点儿干’了……”

“真是莫大的信任。”

山形说着，嘿嘿地笑起来。

“喂，渡边！情人找你呢！”

不知是哪儿传来的这句话，大家听了哄然大笑。

午休过后，决定由大村和渡边去社长家处理火灾的善后工作。

“一有这种事，准是落在我头上！”

山形拍了一下渡边的肩膀，渡边觉得很难为情。

可是龙吉心里却感到美滋滋的，因为得不到信任的一般工人是不会被派去干这个活的。

一踏进社长公馆大门，龙吉“嗨”地说了一声。

阶梯形的层层街道——海滨大街有杂乱无章的漆黑煤厂、仓库、海关和一湾死水的运河；大厦街有银行、大商店；可供游人散步的大街有咖啡馆、吃茶店；一片郁郁葱葱的地方有学校和公园等。——社长公馆是在最幽静的山上。茂密的林荫道上鸦雀无声，十分寂静。大村和渡边一面爬坡，一面倾听篱笆深处传来叮咚叮咚清脆悦耳的钢琴声。

“趁这个时候吸一吸新鲜空气吧！”——渡边说着，便阴沉着脸，解开胸前一个钮扣，向后挺了挺腰。

走进社长公馆大门，有许多小树林，不知往哪儿走好，两人踌躇了一会儿。身穿西装的男孩和一个穿着西式披肩的女孩，

跟一只长着漂亮的皮毛，耳朵竖起象狼一般的狗，在宽阔的庭院里追逐着。

活儿很简单，并不是处理火灾的善后问题，而是把过冬用的纸桶扇从库房取出装在正堂屋门上，给客厅和各种卧室安装火炉和烟筒。

从库房往外搬火炉、烟筒和门板时，男孩、女孩和狗停止了玩耍，以奇异的目光看着他俩工作，狗在渡边身旁嗅来嗅去。太太不时地走出来。当太太跟龙吉说话时，他的脸涨得通红，很紧张。太太年轻貌美，对他俩用“劳驾……”或是“请您……”这类话。渡边和在工厂干活时一样，脸阴沉着没半点笑容，做起活来动作熟练，比龙吉利落得多。

安装时，两个人脱下鞋子刚要进屋，太太便说：

“哎哟，脚！”

渡边并不觉得脏，瞧了瞧自己的脚掌，直挺挺站在那儿。这时，女佣人拿来拧好的干净抹布，两个人只好把脚擦了一下。

明亮的走廊映射着庭院的绿荫，从这里走过去便来到大客厅。角落里摆着一张长沙发，坐下去可以埋下半截身子，还有一把安乐椅。大厅当中横着一张可容十五六个人的大台桌，四周摆着椅子。壁上挂着带框的油画和珍贵的西洋瓷盘作装饰。色彩谐调的壁纸，在透过高贵窗帘的阳光照射下，室内显得那样柔和雅静。除在西洋画或照片上以外，龙吉和渡边还是第一次亲眼见到这样的客厅。女佣人见他俩站着不动，噗嗤一声笑着走开了。

大客厅的右角门和明亮的凉台相通，社长靠在门旁的一把藤椅上，边喝红茶边和客人谈话。——这里可以看见狼一般的狗在宽阔的庭院跑来跑去。院子里还放着漂亮的台桌和藤椅，而且还有只能在公园才能看到的秋千和滑梯。

两个人是在大客厅里安装和渡边身量一般高的烧无烟煤的德国式火炉。

过了一会儿，孩子们跑进来，说：“阿妈，我要吃点心！”

龙吉一面干活儿，一面悄悄重复着女孩子说的“阿一妈”两字。“阿妈”的称呼，他还是第一次听到。

“要给的，请洗手去。”

妈妈跟自己的孩子讲这样恭敬的话！这出乎他意料之外。这在他看来，妈妈会数落孩子的。——孩子们马上到客厅角落的“盥漱室”，把“H”“C”之中的“C”拧开放出水来，又各自从衣袋里取出漂亮的手帕擦了手，然后他们规规矩矩坐在椅子上吃起点心来。女孩子还把手帕打开来铺在自己的膝盖上。

社长用剪刀剪去雪茄烟头，点上火，本来知道他俩来了，可是没有理睬他们。他身穿一套大岛绸外褂悠然自得地坐着。

女佣人向凉台小步跑去，离很远就鞠了一躬，说：

“您的电话……”

社长没搭腔，站了起来，走过客厅看了看渡边和龙吉什么都没说。

“什么？说清楚些！我听不懂！”

远处传来社长大声接电话的声音。

“不管！他太放肆了。我遭火灾时竟然装不知道！”

说到这里，社长啪的一声挂上话筒，立刻返回来。回走的时候，再没有看他俩一眼。龙吉心中暗想，社长平素还不错，看来是昨晚失火的心事太重了。

大客厅安装完毕，又来到书斋。这里比眼熟的漂亮的大客厅还要好，不禁大吃一惊。书房里有带着沉甸甸穗子的窗帘、双层窗户、摆满壁橱的书籍、沙发、装潢考究的台灯、毛茸茸的地

毯、带有雕刻的金座钟……这回没人告诉龙吉，可是他却在门口悄悄看了一下自己的脚掌。

“怎么样？大村龙吉。”

渡边自从进了公馆，第一次听他开口。但是，他仍然阴沉着脸。

“真好啊……”

龙吉叹息似地说。渡边瞥了他一眼。

“在这样地方学习多好啊！”

说着，龙吉悄悄抚摸着金座钟，回忆起自己把书放在面包工厂的案台上，一边和面，一边看书的情景。

渡边又看了龙吉一眼。

“大村龙吉，一看见这样的地方，你就想到学习？……”

渡边刚要说下去，这时太太走进来，他不再言语了。

“这里的活儿完了，请休息一下吧！茶已经沏好了。”

龙吉心里一慌，涨红着脸说了声“是”。

忽然，从远处的房间里传来钢琴声。好象是孩子弹的，音阶还有些辨不清。在这渺无声息、宽阔寂静的深宅大院里听到琴音，竟然使他俩感到置身于完全陌生的另外一个世界。

“真是不一样啊！大村龙吉。”

渡边看着台上的火炉底座说。

“啊！……”

随后，渡边又换了一种语调。

“比岩城大楼怎样？”

说着，嘿嘿地笑起来。

龙吉象陶醉了一般，心里在想着别的事，没有搭腔。有时仿佛想起来似的，只是反复地说：

“真是不一样啊!”

女佣人来请他们,于是,两个人便跟在后面喝茶去了。尽头是一间有许多窗子凸出去的豁亮的洋房——儿童室。孩子们有的靠近中间的桌子看书,有的在摆弄玩具。钢琴声是从旁边的房间传出来的。——龙吉想起了手宫街密密层层房屋,和全家人挤在一间屋子里的情景。来到了大客厅,茶盘上已摆好两个带盖的茶碗,他俩都不曾用过这样的茶碗喝茶。

“请到这边洗手吧!”

女佣人拿着崭新的毛巾带两个人到盥漱室去了。龙吉看了看自己的那双长满老茧的手,渗入皮肤的油泥和铁臭味是怎么也洗不掉的。

凉台上的客人又换了。他们正围着桌子打麻将,太太也参加了进去。这一回社长不住地开玩笑,逗得大家直乐。虽然渡边和龙吉都知道这叫麻将,但是看到玩这东西,他俩还是第一次。据报纸登载,东京近来也颇为流行。——社长他们是不是总在过晌玩弄这个东西呢。

“工厂快下班了,现在正是看钟点的时候呀!……”

龙吉象到别人家去玩耍的小孩一样,情不自禁地说。于是,工厂的情景——削铁的车床,咕咚咕咚震天响的汽锤声,煤烟弥漫的厂房里阵阵的机油味儿,又一下浮上他的脑海。——“真是不一样啊!”

安装完毕,离开社长公馆时,已将近四点钟了。算来才三个多钟头,可是他俩象呆了五个、十个钟头一样,时间过得很长。两个人从公馆出来的瞬间,不约而同地“啊——”了一声,深深吐出一口气,捶了捶自己的肩膀,向后挺了挺脖子。随后,一面往坡下走,一面又重新回头看了看社长公馆。——两个人一句话也

没说就走了。

渡边走在路上，心情依然十分激动。他觉得脑子有些昏沉沉的，好象吃醉酒一般。

“怎么样？大村龙吉。我仿佛刚从敌人的本部参观回来似的！”

渡边望着龙吉，意味深长地说。

“真是不一样啊！”

龙吉仍旧在重复着他说过的这句话。如何表达自己的感受，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渡边说“敌人的本部”几个字，原来以为会象子弹一般射出去，从龙吉那里得到反响！然而，却毫无反应。他觉得龙吉已经懂这个意思，所以就没再吭声。

从一层一层的街道往下走，每一层街道都看得一清二楚，它们和山上各自不同。当来到工厂前面时，这才松了一口气，觉得唯有在这里，才能用憨直的语言尽情大声疾呼，手脚才能得到自由舒展。

“啊，大村先生！”

学徒工庄司跑到龙吉面前，猛地把手搭在他的肩上，说：

“井上被……被毁掉啦！”

他的喉咙哽塞住，用手指着今天试车的铣床前面那块空地。空地上铺着四五尺见方的新砂子。渡边站在那儿呆若木鸡一般，说：

“怎么回事？”

“从那儿——”

这回庄司用手指向架着主轴上的铁梁。

“他上去修皮带被毁掉了！”

起初，井上的脚被夹住，突然咯吱一声，下面干活儿的人吃惊地抬头一看，井上的身子在皮带和传动轮中间被搅得稀烂，象撕裂的破布一样在打转。眨眼间，井上大腿以上的半截身子从上面倒栽葱掉下来，变成了一堆紫黑色的肉块。——看到眼前的这种情况，人们吓呆了，一动也不动。在井上的身子落地的刹那间，还微微动弹了几下。他好象要说什么，但听不清楚。后来就象死鸡一样扭过头去。

大家忘记关掉机器。

皮带上不时往下滴着血，仍在冷酷无情地叭哒、叭哒……旋转着。这时，机器才被人们关掉。后来，用临时做的担架，才好歹把井上送进医院。——托起井上将冷的身体时，空地的砂子上聚下一摊地图般的血污。触摸到血迹的工人们，紧张得面如白纸。他们用担架抬走井上的身体时，仿佛自己的身子也和井上一样，感到毛骨悚然。

井上被抬走后，用铁锹铲去地面上的血迹，铺上一层新土。皮带上仍粘着碎肉。

工人们一言不发。平时，机器的轰鸣声震耳欲聋，激起洋铁板屋顶的回响。现在，全厂却寂静无声，工人们就好象在深水底下，不声不响地移动着。

现场清理完毕时，大家方才意识到出了事，马上七嘴八舌地大声谈论起来。

龙吉和渡边听到这消息，脸色立刻变得刷白。——社长在电话上说的每个字，如同大字标题一样，浮现在脑海。放下话筒，随即边打麻将边大开玩笑的社长的侧脸，历历在目。工作熟练的井上之所以丧命，是因为他赶到失火现场给社长家帮忙，通夜没有睡觉的缘故！

渡边的表情比平时更严厉了。

“怎么样？大村龙吉。”

他和平常一样，是指名道姓地叫龙吉。

龙吉感到自己所面对的现实一下子土崩瓦解了。

山形慢吞吞地走来。

工人在资本家面前，处在什么地位？——处在井上的地位，渡边说。

所以，工人必须认识到“自己是工人！”

老实说，渡边这句话的意思，龙吉今天才开始明白过来。

龙吉浑身还在颤抖。

他觉得自己的经历和父亲的死，使他懂得了很多事情。然而，再仔细推究，那只不过是一种“我不服输”的心情罢了。他认为，我虽然中途辍学，但自己脑子并不笨，这怎能在阔少面前认输呢！而是因为父亲、母亲和自己的这一家人生活太悲惨了。他深知个中滋味，所以思想上无时不在这样考虑：我要摆脱这个环境，争口气给你们瞧瞧！

所以，岩城大楼的古山，只要一见到龙吉就是满口的“工人！”好象是世界上只有“工人”，而且说“工人”是最可贵的。到底这意味着什么呢？他不理解。而且，这对想尽快地从“工人”行列摆脱出去的龙吉来说，简直是莫名其妙的。

不仅古山，现在渡边说话也都流露出这样的口气——身为工人是最值得自豪的。

龙吉的求知欲非常强烈，他很喜欢到知识丰富的古山那里去玩。古山一提起“工人”来，他就默不作声。在房租问题上，他是强打精神出席的。他以为这么一点房钱，自己还是有办法交

得出来的。

——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他现在明白这个道理了。

“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浑身沾满机油、弯着腰劳动的世界，一个是站在剥削地位，有大客厅和书房的世界！……”

渡边有个习惯，遇事感情越激动，说话时就越一字一句地放慢。——这句话，使龙吉想起刚才看到的大客厅和书房。

当井上血肉模糊地掉下来，象死鸡一样扭着脖子的时候，社长却拿自己的“火灾”和工人的“性命”来计较得失，一面打着麻将，一面若无其事地大开玩笑，这绝非作为一个“道德问题”所能解决的。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毫无共同之处，本质上是敌我关系。因此，我们必须从这一点去看问题。——渡边这么一说，龙吉才恍然大悟。

“真可怕呀！”

龙吉忽地感到惊恐不安，忙着向自己的左右看了一下。

“真可怕呀！”

山形急促地揉着鼻子下边，意味深长地望着龙吉。随后，又望着渡边说道：“如果我们把井上事件看成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无动于衷，那就大错特错啦！”

工人们聚在一处，谈论起井上生前的一些事情。

“咱们一起去陪灵吧。”

有人提了一句，大伙异口同声地说：

“这不是外人的事情。走吧！真的！”

“社长嗔怪我们没跑去救火，甚至还叫工长训我们，那若是烧到工人头上呢……”

后面有个人说话了。但他说这番话怯声怯气的，到后来就含糊不清了。

大家突然沉默起来。

龙吉偷看渡边一眼——他觉得自己是了解情况的，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讲出来。可是到了紧要关头，他又失掉了勇气！

这时，只见渡边稍微晃动一下肩膀，说道：

“我和大村龙吉今天到社长家去了，所以情况很了解——”

工人们目睹井上的惨死，情绪异常激动。渡边的这番话，给他们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渡边说话时，总是在克制自己的激昂的情绪，这样反而更加有力量。龙吉感到他的讲话有一种魅力在吸引着自己，他目不转睛地望着渡边。

渡边说完，大家半天没有作声。

冶炼车间的老师傅叹息了一声。

“唉，井上太可怜啦！死不瞑目啊！”

“他被机器绞住的前不久，还谈救火的事情呢。井上说，社长还大大表扬了他一番呢！”

“是么，这可吃不消！”

有人捂着脸说。

“今天早上，不是有人还袒护老板说，灾难临头不分彼此嘛。”

渡边膘了一眼就要提升工长的福原。

“算啦，再怎么，这也不是局外人的事情！”

“可不是么。”

“井上有老婆吗？”

一个上了岁数的车工，自己深有感触地问道。

“老婆孩儿都没有，还算造化！”

“没有，也是怪可怜的！”

身后有人气冲冲地顶了一句。

“该会有妈妈和弟弟、妹妹呀！”

“是呀，太可怜啦！”

“那么到底给多少钱？”

一看，说话的人原来是山形。他两只眼睛东张西望的，急促地揉着鼻子下面。

“就是这个问题！”

两三个人异口同声地说。这种说法，好象是要先听一听旁人的意见怎办。——大家默默无言，似乎都在彼此窥测着对方的心意。

“非得让他多出钱不可！”

感情容易冲动的千叶，颤动着薄薄的嘴唇，高声说。

“井上是为老板赚钱丧的命，就是养活他家一辈子，也是理所当然的！”

庄司听了顶高兴，乐得他把木底草鞋弄得咯哒咯哒直响。他巴不得发生一些特殊事件。

“能多出钱吗？”

“不是能不能多出钱的问题，而是要让他多出钱的。工人也好，劳动者也好，这是一条人命啊，人命！”

千叶一口气说完。

山形在后面说：

“不然，咱们怎能安心工作呢？对吧！”

“是呀！”

千叶觉得这正中下怀，于是在一旁帮腔说。

“如果这次事件给日后造成一个坏的先例，那问题就严重了。咱们非坚持不可！”

冶炼车间的老师傅，他从自己的肩膀一直看到胳膊，说：

“真的，我那活儿也够险的！”

龙吉发现他们中间充满这样一种思想，用渡边那句费解的话说：这就是“工人的觉悟”。他并没认为这就是觉悟。但他明白一个道理，其所以使大家有这样一个觉悟，正是由于他们处于工人的地位。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

话虽如此，但渡边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车间里开始昏暗起来。把好端端的一个人象绞肉一样给嚼碎的皮带，在薄暗中凝视着下面，而罩着帆布的车床、刨床和钻床，在地面上好象吓得蜷缩着身体，憋住一口气似的。

“今后一个人也不能再出事儿。走，咱们到井上家去！”

龙吉决定跟随着渡边、山形和怒气未消的庄司等人到井上家去。

他忽然记起昨晚散会后，约好罐头工厂的藤子到市郊的电影院去看大河内传次郎演的电影。可是，他以为即使得罪了她，也是无可奈何的。——这和往常的龙吉可大不一样了。

他想：今天回家，一定先把种种事情告诉给古山。

八

中岛铁工厂的旁边是一座桁构式桥梁，它把第一号填海造地和第二号填海造地给连接起来了。走过这座桥，是一处煤厂，那里堆放着黑压压的一片煤，好象冈峦起伏的山脉一般。小樽市的背后是夕张、美唄和几春别等几个大矿山，小型的陈旧机车牵引着几十辆大型铁皮运煤车，在铁路上不停地来来往往。大型铁皮运煤车象蜈蚣一样被机车一直推到逼近码头旁边的煤台

上。苦力们拿着铁锹，在严冬即将到来的刺骨寒风中，抱起肩膀蜷曲着身子坐在煤车上，浑身沾满乌黑的煤粉，远远望去，好象乌鸦落在上面。车子开到指定的地点，打开煤车槽帮的挂钩，煤象雪崩一样倾泻在台子下面，天空腾起黑蒙蒙的煤粉。有时坐在煤车上的苦力，一失脚就象蚂蚁掉进沙窝里一样，跟着煤一起滚落到台子下面。伙伴们慌忙地从煤车上跳下来，就从煤堆里往出挖。这工夫，有的就被煤粉给呛死。从临海铁道干线向煤台子岔出去几十条支线，象扇形一样展开来。

每逢驳船靠拢码头，几百个“脚力”裸露着半截身子，在颤巍巍的跳板上担着煤篓，川流不息地走动。小樽市的人，管担煤的日工叫做“脚力”。因为几百个肮脏的苦力都靠脚力挑煤，所以给起了这样一个名字。他们用扁担挑，两头挂着篓子，里面装着煤，只消一拽篓子旁边的麻绳，篓子便翻过去，哗啦一声就把煤倒出去。监工站在跳板的渡口处，每挑一次就发给挑夫一个牌子。他们做完活儿，都要凭牌子领钱。几百个“脚力”都想多挑一次，所以在死劲儿干。

哎嗨、哎嗨、哎嗨……

在他们的号子声中，扁担被压得咯吱咯吱地响。

“怎么装这么点儿！”

监工递牌子时，眼睛往篓子里一瞥，大声吼叫着。

那些挑不惯的人，不到中午肩膀就磨破了皮，步子配合得不好，腰杆子又挺不直，总是低着头一步一步向前蹭。掌锹的伙伴见他可怜，就给少装一点。工资是计件的，所以人人你追我赶往返在煤仓和驳船之间。那光景犹如杀气腾腾的战场，慌慌乱乱的。其中还夹杂着临时的女工。有小孩的妇女不能把孩子丢在家里，就在工地旁边铺上一块席子，让孩子坐在那里玩儿玩具。

孩子一哭，母亲便把煤篓和扁担一齐扔下，膝盖着地跪在地上，敞开怀喂孩子奶。过后，又赶忙挑起篓子进到人群里去。

三井、三菱和住友^①三家的煤炭堆放场是挨着的。挑煤的“脚力”有五百多人。许多小贩担着带玻璃罩的食品匣子赶来卖大福饼、馅面包和汽水。因为劳动剧烈，大福饼和馅面包卖的很快。

“啊……真累！”

老李离开劳动行列来到小贩这里，买了一瓶汽水，用中指（大拇指太粗）把瓶口里的玻璃球往下一捅，仰面接住喷出来的汽水，咕嘟咕嘟一气喝光。在这些“脚力”中间，有不少人是住在岩城大楼里的。轮船临出港之前，因急着上煤，所以需要很多的临时工。

“哦！”

中岛铁工厂的工人陆陆续续穿过桁构式桥梁走过来。老李发现龙吉也在里面，于是，他举起长胳膊来。老李的长胳膊和那双大手，在大楼里也是出名的。他说，总让朝鲜人比日本人多干一倍的活儿，所以胳膊就自然而然地长长了。

“这就回去吗？……”

老李瞪圆眼睛看着龙吉，再用肮脏的手背擦着喝过汽水的嘴巴。

“不，今天要迟一些。出事啦……”

龙吉说。

“方才从这里过去一个担架，是中岛铁工厂的吧。——出了伤号？”

“嗯。”

岩城大楼里的房客们挑着煤篓，一个个走上前来问道：“嗨，

^① 均日本垄断资本集团。

这就回去啦？”

“瞧，真够自在的！现在就回去啦。”

里面有人轻蔑地冒出这么一句不三不四的话。

“甚么？”

山形说着，急促地揉着鼻子下面——“糊涂蛋，你搞错了时间还在说闲话！现在不是五点了么！”

渡边见山形真的急了，觉得很好笑。

为了同一般的工人区别开来，街上的人都管在“中岛铁工厂”、“北海道罐头公司”等大工厂劳动的工人叫“职工先生”。谁也不把“职工先生”当工人看待。一提起工人来，指的是那些挑煤的“脚力”，或者装卸木材、杂粮的码头工人和苦力。职工的工钱高，活儿也比工人干净，时间是从早晨七点到下午五点。装卸工不同，不仅劳动剧烈，时间长达十二、三个小时，而且半数以上是日工，还不一定每天都有活儿干。

每天到下班时间，当中岛铁工厂的工人沿着运河的柏油路往回走时，“脚力”和码头工人都要撂下活儿歇口气儿，在瞧着他们。一见到这种情况，他们就想起自己还得再干两个钟头……罐头工厂和中岛铁工厂的工人中间，也有这样的人，他们仿佛在说：“对不起，我们和你们可不能划等号！”对那些还在工地劳动的人理也不理就往回走。

就连在清一色工人居住的“手宫街”里的杂货铺和粮店，他们对罐头工厂和中岛铁工厂的职工，和对小厂子的“学徒工”、码头工人以及“脚力”的看法，也是有明显差别的——“赊购”的限度都不一样。

“虽然把时间搞错还说闲话……但我看不单纯是这个问题。”

渡边把浓眉毛一挑，对山形说。

“工地时常闹罢工，可是厂里的工人却认为事不关己，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面孔。”

山形晃动一下细高的身子，象小孩一样害羞起来。

“话说回来，厂子里的工人过的是部长一样的生活吗？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不过比起‘脚力’的工作稍许体面些罢了！”

“喂，大村……”

老李放下篓子和扁担，用流利的日语说：“我想跟你说一件事儿……”

渡边他们先走开了。在席子上玩耍的孩子们冷得聚集在一起，两只小手缩到袖筒里，眼睛追随着挑煤篓的妈妈们的背影。妈妈一来到面前，就“妈、妈、妈……”地鼓起肮脏的面颊看着。龙吉由于方才的刺激，身体不由得感到疲倦，于是就在席子边上坐了下来。

“你瞧……”

老李指着三井和三菱的工地说。从这里望去，挑煤的短工们忙忙碌碌地来往，好象无数的蚂蚁一般。

“嗯？”

“这回三井和三菱在那边安装有传送带的装煤机啦。喏，那边码头上不是有个象起重机一样的东西么。”

“嗯。”

“在那儿，他们修一条坑道，直通煤场的下面，先把煤倒在很宽的传送带上运出去，然后就可以从那一台象起重机似的顶端，哗啦一下直接装进驳船……”

龙吉一面听老李说，一面吃惊地望着对方。他的谈吐，简直不象是一个平素呆呆地张着嘴巴的朝鲜人。

“嗯。”

“工地办公室的旁边不是有个棚子么。那里就是安装动力机的地方。三菱的机器已经从昨天到港的龙田号轮船上卸下来了，光是这儿的三百个‘脚力’都得要喝西北风！”

脚力们吆喊着，正在发狠地挑着煤小步跑着。

“三百人！……”

“机器一开动，只消在入口处有几个人往下推煤，驳船上有四五个人把煤摊平就解决了。因为这是明摆着的事情，所以连工地主任的脾气都大起来了……”

“……不过，这里还不会有问题吧？”

对方在拚命地讲，但龙吉以为这和自己关系不大，只含含糊糊地应付了一句。

“不！”老李吃惊地望着他。

“多余下来的人数足有四百人，眼看年关又来到，所以都要拥到这儿来！这样，头儿就要更加盛气凌人了，还要往下大砍工钱哩！现在已露出这个苗头来啦。”

“……！”

龙吉听了这番话，不知不觉的脸红了。港湾工人是在极其苛刻的条件下被迫劳动的，所以参加工会的人很多。他认为老李可能是一个会员……

“妈、妈！”

坐在席子上的小孩儿又饿又冷，实在顶不住了，鼻涕象一撇胡髭粘在颧颊上，歪着脑袋哭起来。

“等一等，马上就完！啊，好宝贝！”

母亲心中一面算计着挣的钱，一面又赶紧跑了过去。每当母亲从眼前走过时，席子上的女孩儿就“妈、妈！”地叫着。

“好孩子，乖乖！还有一回，真的再挑一回就完啦。你好好儿地看着！”

夹杂在粗野的男人中间挑煤，不是一件容易事。每挑完一次，母亲们就气喘吁吁的，肩膀随着一上一下地动弹。她们的眼睛上火，由于过度的劳累，整个面孔都显得僵硬。龙吉一见到席子上的孩子，就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在土工棚子里饿着肚皮等候推翻斗车的爸爸、妈妈回来的情景。

他身上带着一毛五分钱，从快要收摊的小贩那里买了三块大福饼分给了孩子们。孩子们一下愣住了，起初看了看大福饼，又看了看龙吉，把身子缩了回去。

“你妈妈就回来啦。吃着这个等一等！”

龙吉这么一说，孩子们才怯生生地伸出小手来。

等他们把饼拿到手里，转眼间嘴里就塞得满满的，吧嗒着嘴儿吃的直响，唯恐被别人给抢去。不过那两只小眼睛却还在警惕着，一个劲儿往上翻着看龙吉。

“喔唷，您费心啦！”

母亲从一旁走过时，向龙吉道一声谢。

虽然老李嘴上没说啥，可是脸上却流露出一种好感。他又继续说：

“因此……”

这时，他把扁担挑起。

“大家都在商量办法……希望能得到中岛铁工厂的支援……”

说到这儿，他便把话煞住，望着龙吉。

“我很想跟古山先生谈一谈……”

这时，在那边一面站着说话，一面等着龙吉的渡边等人在招

呼他。

“哦……”

从来没有人向龙吉提出过这类事情。他搔着耳朵沉默了一会儿。

“他们和我是一起的，等跟他们研究一下。”

“好，拜托了。”

老李向渡边他们望去，把手举到褶皱不堪的便帽遮阳上敬了一个礼。

旁边煤场的煤装完了，大家把牌子摆在席子上数着。——工地上不直接给兑换现金，因为把头在脚力和公司之间还要索取扣头。人们为一天的生活所迫，眼睁睁地明知道吃亏，还是得把牌子交给把头。

冬天即将到来，干脚力的妇女们常常把煤块悄悄地藏在围裙下面带回家去。在大楼里住的人，都是半夜三更来偷煤。龙吉的母亲自从他爸爸死后，也干过几次。龙吉一问到厨房角落的煤是哪儿来的，母亲便象孩子似的慌张起来。然而，阿兼大婶却是明目张胆地搞，她说：“不够用的人到有富余的地方去拿，又有啥不好呀！”

本来阿兼大婶是住在岩城大楼的寡妇。有一次，她偷煤被看守发现，说是要把她送交警察，在威逼之下，她终于把肉体交给那个看守了。后来风声传开，再无法住下去，她就从大楼里搬走了。——一到年关，这类事层出不穷……

龙吉随后赶到，他把老李的那番话跟渡边说了。

“嗯……”

渡边点着头：“姓李？是木子李，对吧？”

他叮问了几遍。

“他就住在大楼里的。……不定哪天非找你大村龙吉不可的。”

走过煤场就是货栈。每个货栈都敞着大门，里面黑洞洞的。肩上披着四角垫布，手拿铁钩的一些工人，在那里进进出出。货栈前划有一条“倒车线”，五六个苦力缓缓地推着一辆货车过来。正是青豌豆、大豆和扁豆等大量“上市季节”，虽然已经日没昏黑了，可是他们还在劳动。

从货栈一侧走过去便是一块空场，两三个短工正追逐着腰间系着印花布围裙的女人，在调戏她。山形一见，喊道：

“嘿！嘿！”

“你这家伙！”

跑来搂抱女人的苦力，被噼啪噼啪地打了几记耳光。苦力一面挨着打，还一面嘻嘻地笑，没有撒手。女的在工人怀里挣扎着。这时，又过来一个人，他把手伸向她的胳肢窝下面……

“哎哟！”女人真地放开喉咙叫起来。大伙这才停止逗弄。——女的整理着敞开了的衣服，用男人一般的嘶哑嗓音骂道：

“色鬼！”

苦力们喘吁吁的，在渡边等人面前有些难为情，勉强一笑，很不自然地对同伙说：

“走，去喝一杯！”

“码头工人简直象种马！”

年轻的庄司脸上露出厌恶的神色。

“庄司，你也想当种马了吧。你……成人了吗？”山形笑嘻嘻地说。这句话是别有用意的。

庄司没作声。山形又说：

“嗨，真没想到庄司这样可爱！”

渡边听了，噗嗤一笑。

“庄司，你每个月去几趟？两次，还是一次？”

山形说起下流话来，和谈正经事情时完全是两个人。他说下流话，在翻砂车间是大王。他总模仿伊势田工长的腔调——“你麻利点儿就好啦！”——对渡边说：“你会说那话儿就好啦！”要依山形的看法，等渡边会说那话儿的时候，他就变得“更伟大”了。比起别人来，山形办事没准主意，可是要认真起来，他比渡边等人还要偏激。

大家都有这个感觉，渡边和龙吉比山形单纯，而且有的地方象个孩子。现在，他们要到井上家去，龙吉根本没心思随和着他说。

渡边没有理睬山形，沿着一座座货栈走过去。附近地上撒落一些杂粮，飞来很多麻雀。

在苦力们背杂粮的旁边，幄幄不堪的拣豆子的妇女们，手里拿着小筐箩和短柄笞帚站在那里。当选豆工厂的女工们成群结队回家时，苦力们立刻在“劳动号子”里填进即兴的词儿唱起来。

哎，那边走的娘子啊，

多么招人爱哟。

大大的屁股呀，

诶、呀、嘿。

其中也有吹口哨的。工作累得他们死命喊叫。

“给你们看好啦！”

女工们用身子互相碰撞着，咯咯地笑了起来。

没有活儿干的苦力，手提装着大瓷饭盒的包袱，张着满口胡髭的嘴巴，五六个人一起在桥边上站着。一个卖苹果和柿子的

女摊贩，缩着身子向满是灰尘的地面上瞧着。有人从她眼前走过时，这才象想起来似的吆喊说：

“买点苹果，柿子吧？”

旁边一个乞丐模样的男人，坐在地上敞着怀捉虱子呢。

海关那里，印有“富士制纸”商标的圆筒形新闻用纸，正一个一个在柏油路上滚动着往驳船里装。监工的跟在一旁，为一点小事在呶呶不休地责骂工人。

“笨蛋！饭吃到哪儿去啦！”

这些码头工人的现场分工很细，每个工地都有一个“把头制度”。工钱规定为每天工作（称为卸货额）的几成，但在发放实际工资之前，早已被把头巧立名目给剋扣去了。而且，按照工作性质，究竟自己一天搞了多少卸货额，工人本身也不知道。把头就利用这一点，不公开发表卸货额的真实情况。因此，尽管工人们觉得活儿干得比昨天多，可是临走领工钱的时候，却比心里盘算的数目要少得多，实在是太苛刻了。等提心吊胆地去问把头，他要么给你讲一大堆根本无法理解的计算方法，要么就说行市有涨有落。——一提起行市来，他就罗列许多难懂的“术语”，这时，大家只好唯唯诺诺地返回去。到头来，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我认为小樽市的事首先该从这个港口闹起来！”

一直在跟庄司说下流话的山形，好象想起甚么似的，突然急促地揉着鼻子，这样说。——山形的为人正是这样。

山形这句突如其来的话，使龙吉忽地想起刚才老李说的事情。

井上家离龙吉父亲生前开的粗点心铺很近。虽然同是在手

宫街，但自从龙吉搬走以后，他一次也不曾来过这里。所以，当他路过这条街道时，不由地唤起他自己已经忘却了的记忆。——招牌上的字形，路口上带着“伤痕”和泥巴的邮筒，堆积着木料的空场，一条条小巷和那昏暗的景象等等，都闪现在眼前。这一切对他都有活生生的意义。龙吉回忆起来那一日天刚破晓，只见一片雾气飘浮在空中的寒冷的清早，他跟在父亲的担架后面，从这条街走过的情景。——方才井上的担架也是在这条街上抬过去的。他总觉得吱咯吱咯响的担架声，仍在这一带回荡着。

在离井上家不远的地方，山形也严肃起来，变得沉默寡言了。

本来要绕三个弯子才能来到井上家，可是一进阴暗的小巷，就迎面扑来灵前的香火味儿，再闻不见平日阴沟里发散出来的臭气了。

左邻右舍的老妈妈们打着布带^①，赤露出粗胳膊，忙忙叨叨地在井上家出来进去，把小巷里铺着的木板踏得咯哒咯哒响。井上家的电灯比往常亮多了；门全都敞开来，从门口就看到佛龕前上供的苹果和点心。屋子里挤满厂子里的人。

井上的母亲五十多岁，矮个儿，稀薄的头发，看去已经年老体衰。不知为啥，她讲话老是歪着头，眼睛一眨一眨的。——原来眼睛哭红，肿了起来。山形弯腰施了一礼，说了几句哀悼的话。不料想他说的是那样得体、老练。

母亲看见山形身后的渡边，手里握着油污的便帽站在那里，忽地号啕大哭起来。

“真难怪您伤心！真是难怪啊！”

① 日本妇女穿和服工作时，为操作方便起见，常用布带在前后心打成十字股，把袖子吊起来。

山形理解她的心情，于是就解劝老人家。

“他是个孝子呀！”

井上的母亲说起儿子提工资快，厂长对他的评价好，等等。过去，渡边和山形跟井上的感情并不很好。只要是与工厂有关的，不管遇到什么不合理的事情，井上从来不讲一句话，而是拚命干。在发生火警时，跑去救火的人中，他是最卖力气的。

“多亏各位帮忙！方才伊势田先生给送来了三十元香钱。”

井上母亲谈起话来，常常显得六神无主，颠三倒四的。帮忙的人在厨房里，有时她也跑进去，其实没有啥事，回到屋中又象在寻觅什么似的，茫然地向四周张望。不论谁招呼她，总是呆呆地发楞。

“啥事？”

一看不对头，她就象受了惊吓一样站起来。龙吉回忆起父亲被抬回家时，自己的母亲也和她一样。

一个四岁左右的女孩，看见来了这许多人，乐得她蹦蹦跳跳的。

“大哥哥呢？”

渡边问她。

“那、那。”

她用手指着佛龕说。

“怎么啦？”

“觉觉。”

这时，六岁模样的男孩儿在一旁说：

“撒谎！”

他说大哥哥死了，但是跟妹妹说觉觉同样是无动于衷的。这个男孩儿是最讨井上喜爱的小弟弟。井上曾说过，“无论如

何，我也不叫他当工人。”

“死了吗？”

“嗯，死了才睡下的。”

“是么，是死了才睡下的吗？什么时候起来？”

男孩儿沉默一会，说：“不知道。”这时女孩儿跟渡边亲热地说：

“妈妈说，大哥哥没脚——”

妈妈一听，说：

“瞧，这孩子在说些什么呀！”

她猛地拽了一下女孩儿的衣袖。

龙吉一看，山形在悄悄地擦着眼泪呢。——他性情急躁，可是有时还嬉皮笑脸地跟人说下流话，这反而使人感到和他的为人十分相称。山形觉得龙吉已发现他在抹眼泪，于是便和平常一样急促地揉起鼻子来了。

井上家里很象他这个人，收拾得干净利落。炉旁的钥匙和小工具都是完整的一套，好象是他利用厂子里的工作空暇时间做的。——井上母亲不厌其详地一个一个讲给渡边他们听。

渡边等人临走时，井上母亲又突然慌张起来。然后，象下了决心似的，说道：

“是这样——”

渡边一面穿起肥大的鞋子，一面回过头去。

“我们收到三十元香钱，真不知道该怎样感谢才好……是这样……”

说到这里躊躇了一会儿。——“往后家里剩下的全是这样小的……反正他都是给厂子里干活儿才出这个事儿……是这样，本来不知道能给多少钱！我是怕……”

井上母亲说得结结巴巴，拖泥带水的。接着又赶紧补充了一句：

“三十元是一大笔钱，这个恩德，我永远也忘不了！”

——果然不出所料！渡边心里想。

“事情是这样——”

渡边说。

“公司毕竟是公司，不管你怎样为它效劳，一旦不顶用了，是连理也不理你的。我们这些人也很难说，保不住会和井上君一样的。我们都有父母和儿女，一想到将来，总觉得非让他们多拿出一些钱来不可……”

井上母亲半张着嘴，突然直勾勾地望着渡边的胖脸，说：

“那就拜托您了！……”

厂子里的人陆陆续续赶来。井上母亲又把对渡边等人说的这番话，重复地讲给他们听。

在小巷里走路，不踏稳阴沟上的木板，暗处的污水就要溅到身上。——山形“哎哟！”一声，用手背擦了一下自己的腮颊。

从到井上家，龙吉一言未发。不知为什么，他心里老是平静不下来。他们走出小巷，冰冷而干燥的夜风，忽地从脚下吹上来。

龙吉一面走，一面将自己父亲的事，和家里过去的情况都讲给渡边听了。这类事情，龙吉很少跟外人谈。正在谈着的时候，父亲穿着草鞋站在学校门口的样子，父亲一声不响地背着面包匣子回去的心情，又活生生地浮现在脑海中。走在渡边另一侧的山形，马上转到龙吉身旁，“嗯、嗯”不住地听他讲。

“一点不错！”

渡边象打句点一般地说。

“我以为工人在这个世界上，要么象大村龙吉的父亲，最后自己毁掉，要么象井上安三一样，为了那些家伙遭到杀身之祸……再不就是……”

渡边溜了山形一眼，说：

“再不就是为彻底改变和自己一样的所有工人们的生活，而豁出性命去干。——我以为只有这三条路。”

“管它哪一条……”——山形又用他平常那种逗趣的口吻说了一句，但立即闭上了嘴。

“是呀，只有这三条路。”

渡边一面走，一面踢着脚下的石子。石子停下来又踢出去，一连踢了三脚。最后一脚，石子向侧面飞去，落在流经道路中间的小河里。三个人一声不响，但心里都很激动。

“喂！”

迎面走来两三个学生，突然喊了一声。

“大村君！”

其中一个人亲昵地说。原来是商专的学生。

龙吉的肩膀好象被人突然一把扭住，他这才从激动的情绪中清醒过来。——那人是他在商业学校时的同学。他大概是今年考入商专的，制服和钮扣还新着呢。

龙吉立刻涨红了脸。当他记起来的时候，本能地把自己的身子隐藏在山形的背后。

“我还住在那个老地方。你一定来玩啊。我还有事跟你商量哪。”

对方的腋下夹着装满了书的帆布手提包，他往上提了提，看去是那样和蔼可亲。

龙吉胡乱地说了几句。后来问道：

“学校怎样？”

“学校？——无聊极了！”

他冷淡地说。

“……？”

可是他说的这句话，龙吉觉得是一句反话，没有作声。——突然，对他们产生一种强烈的憎恶感。

“改天我去找你好啦……”

这个同学叫佐佐木，直到龙吉突然辍学之前，他俩非常要好。可是，龙吉想到自己家是在岩城大楼卖糖块、洋画和卖弹子的“粗点心铺”，所以连忙说：

“不，我去找你吧。”

和他们分手以后，渡边说：“唔，原来大村龙吉还有这样的同学……”

只因遇到佐佐木等人，所以龙吉思想上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混乱。他中途停止学习时，学校里有一位商科大学毕业的年轻教师，正在讲授福田德三的《国民经济讲话》。不知为什么，他只对经济学感兴趣，而对其他课程几乎都不喜欢。但商专的经济学课时最多，而且还有一位写过《囚禁中的经济学》的著名学者大西猪之介。龙吉想，佐佐木等人真幸福啊。佐佐木的经济学也学得很好。

过一会儿，他却又说：

“他们算得了什么！”

他说的和想的，完全是两回事。——“还不是啃老家儿！”

龙吉认为：正如渡边所说，“我们”要走我们的路。然而，在他的这种想法后面，心情上反而感到很沉重，自己觉得不如他

们。后来，他不再说话了。

在回家的路上，渡边和山形是同一个方向，到了分手的地方时，渡边说：

“大村龙吉，跟我们再走一段路吧？”

那里是小樽市的工人街和非工人街的交界处，是一条从开凿的山豁口往上斜过去的路。这时，小孩们手拿木棒还在那里跑着玩呢。工地上的工人和身穿号坎儿衣服的日工，脑袋耷拉在胸前，两手交叉在怀里，正弓着背往回走。路上的行人乱纷纷的。

走到中途，渡边停下脚步，指着从那里拐进去的小巷，说道：

“右边的二层楼就是工会！——就是敞着玻璃窗子的那个。”

工会？

龙吉只听人家说过，这还是第一次见到。

“噢！”

龙吉说着，不由得向四外张望了一下。他想，说不定会被警察给盯上的。

“从前面走过去好吗？”

“这？”

龙吉含含糊糊地说着在看庄司。庄司每次说话，总要颤动几下他那非常滑稽的薄嘴唇。龙吉想起今早上因失火的事，庄司说话触到了他的痛处。因此，他说：

“装作不知道的样子走过去得啦……”

老山默默地看着龙吉。

那是极普通的房子，这有点出乎龙吉的预料。楼下的进口处是一块比较阴暗，但还算宽敞的空地。许多的鞋子、胶底袜和

草鞋乱丢在地面上。在破旧的纸榻扇上，横七竖八地贴着各种画，有的象赤面鬼的一只弯弯的胳膊，有的象工厂里的铁锤和齿轮。从半开着的纸榻扇那里，可以看到一个面黄肌瘦，长头发的男人，叉开腿站在半截煤油桶做的火盆前一面取暖，一面大声说话。他一只手往后拢着垂在额前的头发，一面高谈阔论。因为隔着玻璃门，听不见说的是什么。

二楼上点着明亮的电灯，和楼下一比很不相称。那里好象有许多人在集会，从敞开的窗子里一股脑儿地传出来各种说话的声音。

不知为什么，那个工会里的人不断用手往后拢着垂在额前的头发。这给龙吉留下很深的印象。再一点，他们的气色都很难看。他下意识地这样想：工会的人要么象岩城大楼的立石那样是个身强力壮的人，要么象山形那样的人，都是令人望而生畏，“勇不可当”（他懂得这个词）的人物。

龙吉一提起这件事，渡边抿着嘴嘿嘿地乐。

九

古山临回屋子之前，先往大村家的粗点心铺里望了一眼。

在摆着糖块、馅面包的货匣子后面，龙吉的姐姐扭着头坐在那里，雪白的脖子后面还留着燕尾儿，好象在瞧着一本摆在腿上的书。

“龙吉君回来了吗？”

京子在埋着头，当她扬起头时，看上去脸儿红扑扑的。

“哟，是古山先生。不晓得为什么，他还没回来呢！”

长睫毛的眼睛往下一落，一根根的睫毛在白净的脸皮儿上看得清清楚楚的。接着，在那一瞬间，一双滴溜溜转的黑眼珠含着笑意，望着古山：

“您怎么啦？”

说也奇怪，古山腼腆起来，不由得脸红了。

“今天您还好！”

“呃，你说是那个。怎么你也来挖苦我！今天我一点酒味儿也没有哩。”

“还是这样好！”

京子的目光避开对方，一本正经地说。

“那是怕你讨厌呀……”

古山开玩笑地说，向她瞥了一眼。随后，他把手插到裤兜里，说：

“蝙蝠。”

说完，他想起平贺老头子的话来，独自脸红了。

京子马上（和往常一样）拿出两盒蝙蝠牌香烟，放在小柜台上。

“龙吉回来，请你告诉他到我那儿去一趟。”

“他说要到您那儿去？”

“嗯。”

“是吗？”

京子有些莫名其妙的样子。

“二楼罐头厂的藤子，刚才隔一会儿就来铺子张望一下！我还以为他们俩约好去看电影呢！——近几天龙吉老是心神不定的，真奇怪！”

最后一句，好象在自言自语似的。

“怕是春心初动了!”

古山和平常一样,又开起玩笑来。他想起来一件事,觉得大村一定是从不同于一般的生活环境——学校里出来的。虽说出身是工人,可是已沾染上知识分子的思想。——“这种看法很可能是正确的。”他一面咯吱咯吱踏着楼梯往上走,一面这样想……

古山是早稻田大学出身。

在学生时代,有一件事给他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当时,在离他住的公寓一百多米远的地方,有一座小小的橡胶厂。此处是他早晚必经之路。那一带总散发着胶皮的臭味。他乍搬到那里时,常常感到呕心,尤其吃饭时,更使人受不了。

在那附近遇到从身边走过的人,总会闻到他们身上那股胶皮味,所以立刻知道他们是在那个厂子里工作。

工厂的围墙不甚高,从门前走过时,可以看到工厂内部的一角。机器上挂着皮带的大飞轮,不停地旋转着。车间里“胶粉”(他认为可能是这类东西)弥漫,干活的人都用毛巾蒙住嘴,把结子打在脑后。入秋,一到“节期”,厂子就在门口的大牌子“东洋橡胶工厂”旁边,每年照例挂起“招募临时女工”的木牌。古山到神田街去寻找旧书,晚上十点多钟回来的时候,工厂里依然灯火通明,机器在隆隆地转动。

天晴气朗时,在厂房的平屋顶上晾着几百双长筒胶靴。系着围裙,用手巾扎起头发的女工们,不时地爬到屋顶上摆靴子,每隔一定时间就翻弄一遍。

“喂,看见大腿喽!”

穿着木底草鞋的男工在下面调戏说。

可是附近的人谁也不把这个厂子叫做“橡胶厂”，而称它为“魔鬼厂”，因为这样叫更容易使人明白。——到了战争时期，这个厂子是制造军用品的指定工厂，有定额补助金，经营上没有多大困难。然而，对待职工却苛刻极了。职工中有四分之三是学徒工，厂方勒令他们住在工厂后面的空房里。每月只发三元钱工资，而且一天让他们干十三个小时都无动于衷。那些住在家里来往上班的职工，也休想领到规定的工资。这且不说，对一些细小的事情，厂主也都要横加干涉，呶呶不休地训斥。徒工们一出点差错，就从三元钱的津贴中扣去一两毛钱作为罚款。因此，每个人都是小细脖子，灰溜溜的颜色，皮肤粗糙得很，看上去象劣质胶皮一样。

工厂对面是一家粗点心铺，小职工们利用十分、二十分钟的休息时间，到那里去买两三分钱的东西吃。有时粗点心铺的主人也不忍心看下去，到时多给添上一点儿。古山住的那家公寓里的女主人也说：“厂主的心太狠了！”她袒护着工人们，经常说：“街公所应当管一管这件事呀！”住在厂子里的徒工中，时常有人逃跑。如果被捉了回去，听说就要吃苦头，把他们关进象北海道内地开荒的工人住的“猪仔馆”里。有好几个人深夜路过工厂后面时，听到徒工挨拷打的声音。这决不是谣言。

“魔鬼厂”终于发生罢工了。大家在厂里摆好阵势，寸步不离。住在家里的职工也困守在里面。他们下了决心，即使外面无法送进食物，不吃不喝也要坚持下去。用今天的话来，这叫“饥饿罢工”。他们当时这样做，并不知道还有这种罢工方式。因为大家都明白，即便是干活儿，照这样子下去也得丧命，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街里的人都同情职工们的罢工。在一般的情况

下，这是罕见的。因此，工厂一撒出去传单，街里的人就争着看。他们听说罢工团占了上风，就象自己的事情一般非常高兴。

古山放心不下的时候，就装作若无其事的模样到工厂前面去看看。工厂对面的粗点心铺是罢工支援团的办事处。厂子的前后门布满警察，他们把帽带扣在下颏上，打着黑裹腿^①，在那一带不停地踱来踱去。有好几次，古山被那些警察用怀疑的眼光给盯上了。

工厂里的工人，已经绝食两天了。他们为了达到目的，拒绝接受外面送来的食物。古山想起这件事就流泪。他觉得这是个“人道”问题。可是，自己又无能为力，所以感到坐卧不安。

劳资纠纷开始以来，正好过了七天，突然传来一阵凄惨的叫声。古山从二楼跑下来到了大街上，只听家家户户哗啦哗啦地开门，附近的人都从屋子里闯出来。古山一溜烟向工厂跑去。

恰好在工厂门前，罢工团和警察展开一场激烈的混战。附近商店全部熄掉电灯。——下颏扣着帽带的警察和职工扭打在一起。再一看，职工的身体在半空中划个弧形……古山不禁一惊，把眼睛闭起来，只听扑通一声闷响，那人的身体被摔倒在地。职工哼了一声，向后退一步，随即瘫软下来，动也不动了。另一个职工被躺在地上的人一绊，仰面倒退了几步，等转过头来，脸一下擦在铺着碎石子的路面上。穿着带铁掌的皮靴在人身上践踏，人群乱成一团。

薄薄的围墙哗啦一声倒塌了。就在这时，传来“哎呀”的喊声。古山第一次听见人发出那样凄惨的喊叫声。一顶变了形的警帽飞落在他的脚下。

^① 这是日本警察决心采取行动时的装束。

黑暗中，忽地警察连刀带鞘一起，朝向对面一个人的耳朵、鼻子斜着砍去！瞬间，只听“啊”地怪叫了一声，那人的面孔简直是实际生活中见不到的，象噩梦一般的场面深深印在他的脑海。

有人投了一块石头，路灯哗啦一声被砸得粉碎。四周顿时一片漆黑。随后响起一片叫喊声。人们的脚下发出玻璃片被踏碎时的咯吱咯吱声。一听这个响声，古山就象碎玻璃扎在他的脚上似的，神经一下受刺激，一直麻到脑袋。

街上的人们老远围着，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这时，一辆卡车鸣起消防车一样的警笛，在大街上转着大弯飞驶而来。一看，卡车上密密层层地载满警察。一个个帽带扣在下颏上，腰佩刺刀，不等车子停稳就纷纷跳下。

——真是惨不忍睹！职工们有的浑身血淋淋的；有的从肩膀到屁股赤露着，他们被揪住手脚往卡车里丢；有的在地面上被横拉直拽地拖着走；有的仍在反抗，但他们被包围在当心，不是挨皮鞋踢，就是被踩在脚下践踏。这些职工好象吞了毒药的狗作最后挣扎一般，举着双手，身体转动两下又一头栽倒地下。——转眼间，装满一卡车。

“瞧什么！”

古山被警察猛地一推，牙齿碰在身旁一个人的肩头上。他捂着嘴，两只腿不由得绊在一起，歪着身子跌倒在地……

古山每谈到橡胶厂发生的这桩事，总要说：“自从那次事件以后，我才喝起酒来的。”他不明白世道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因此，他对这个社会完全失去信心。学校的同学见他这样，就说：“古山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啦。”在他开始喝起酒来的时候，曾阅读了各种书籍。但他越看书就越喝酒，因为痛感自己应当有所作为，可是到头来却一事无成。古山就这样一直混到毕业。

他大学毕业后，在桦太的一个城镇上当了一名报社的记者。此地是个“起运港”，从原始森林采伐出来的木材都要由这里外运，所以人口的三分之二是苦力。新闻记者的工作逍遥自在，每天可以坐在火炉前叉着腿聊天儿。严冬到来，人们的眉毛上都一根根挂满白霜。——古山就这样度过了两个冬天。他的酒量也见长了。每当雪花飞舞的时候，他便穿起皮大衣到简易房里面的酒馆去。室内火炉烧得很热，连烟筒都是通红的。大家喝的都是外国烈性酒。

第二年的七月，正当起货船从国内驶来的时候，因停发工资问题，工地上发生了劳资纠纷。虽然是十七、八个人的小规模罢工，可是从此开始，别的工地也有两三处在闹罢工。——这出乎古山的意料，他又记起已经忘却了的学生时代的强烈印象。他那给酒麻醉了的情感又复活了。

古山缩短睡眠时间，经常在罢工团和警察之间奔走，将采访来的事实真相刊登在报纸上。当地还有一家报纸，它站在竞争的立场上，专报道对现场工头和警察有利的消息。然而，自罢工开始以后，古山这方面的报纸却畅销起来。这要归功于他的报道。罢工团也写信来致谢。——古山明白：只要真实地反映情况，就是对罢工团的支持。这一点，他感到很有意思。

一天，他和往常一样，为了及时发稿，匆匆忙忙带着采访来的消息回来。一进门，看见火炉前坐着一个穿胶靴的男人，他又开腿在跟社长谈话。这个人转过头恶狠狠瞪了古山一眼。

“喂，这下子糟了！”

社长对他说着，脸上露出怯懦的神色。

霎时间，古山预感到事情不妙。

“……？”

那个人从上衣的内兜里掏出一张名片。他一看，霍地脸色变了。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的事情。

“您是受过教育的，希望在报道时要注意……”

警察讲话如此客气，却使他出乎意料。

从那天起，他写的消息都要先由社长过目。劳资纠纷开始以来，古山好象把酒给忘掉似的，一口也没沾过，可是现在又喝起来了。

“你——说，现在社会讲正义、人道吗？咦，你——说！”

古山一吃醉酒，也不管是谁，抓住人家就发泄他的闷气。在他经常去的那家酒馆里，有人一说：“瞧，‘你——说’又来了。”——那指的就是他。

罢工团给报社发来一封“抗议书”，抗议他们突然改变态度。由于报纸的背叛，罢工团完全陷入困境。每逢他去罢工团的时候，都要解释一番，可是装卸工中有一个从东京来的学生模样的青年，当面对古山说：“你是一个叛徒！”第二天，他再去的时候，门上贴出一张纸条——“拒绝××记者采访”。

后来过了两三天，报社便把他解雇了。他对自己完全丧失信心，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虽有好心却没得好报。他“怀着一颗破碎的心”避开人们的耳目，悄悄离开住了两年，而且已经习惯了的桦太的小城镇，来到小樽市。

古山为了糊口，在一家“人寿保险公司”当跑外的营业员。他搬到岩城大楼来，又是那以后两年的事情。不过他随身夹着折叠皮包，是因他干外勤的关系。他一吃醉酒就说：“我是个堕落的人”，或者“我是无政府主义者”，但是，在内心里，却捺耐不住他那片刻也不能这样混下去的焦灼情绪。古山就是在这时知道“马克思”的名字。有一次，刚从德国回来的一位被人们推崇备至的

才子——经济学家大西猪之介在街上的公会堂讲演，他才第一次在会上听到这个名字。那位著名的青年学者说“卡尔尔·马尔克思”“卡尔尔·马尔克思”。

起初，他还以为“马尔克思”是“马尔萨斯”的印刷错误，或者发音上的错误呢。他每天跑旧书店去搜集马克思的论著。这成了他的一种乐趣。可是转了一天，在小樽市书店里只能寻觅到一两本马克思的书籍。在他看到的某一本书上，意外地发现“马、克、思”几个正楷字^①，不禁吃了一惊。在日本人的著述中，他把山川均、堺利彦写的小册子反复读了多次。这样，他才认识到，自己以前顶多是一个“多情善感”的人道主义者。他不是站在无产阶级之中，而是在一旁指手画脚，乱加评论，因此才发生“那样的事”。——“我过去是一个非常善意的旁观者。但是，一个旁观者，善意也罢，恶意也罢，这对无产阶级斗争来说，只能是一块绊脚石！”

他搬到全是工人居住的岩城大楼来，就是为了要置身于他们之中，不再做无产阶级的“局外人”。而且，他还接受了小樽联合工会调查部的工作，从事各种经济调查。因为他另有职业，所以不能作为正式成员参加工会工作。不消说，他是有个想法的——自己将来必须改变这种摇摆不定的态度，专心致志搞工会工作。

他的酒一直没能戒掉。吃醉时还是“你——说”“你——说”的不离口。——“有没有一个月挣五十块钱的女人给我做老婆？”这倒是他的心里话。他想：若有这样一个老婆，自己就可以投身在工会运动中了。

^① 日本字母一般两种写法，一为片假名(楷书)，一为平假名(草书)。此处指片假名。

他是人寿保险公司跑外勤的。在工作中，他发现薪水阶层里读马克思书籍的大有人在。所以他心里想：组织一个“资本论”或“帝国主义论”之类的研究会好不好呢。倘若在这个活动中出现优秀分子，可以介绍他去工会工作。因此，开完“房租”会，古山便去找方下颏的男子谈话。

一问姓名，那个男子和对立石说的一样，只回答两个字：“岛田”。

古山上前说了许多话，但他的脸上冷冰冰的，不爱搭理人。古山感到很恼火。

岛田说，他是札幌北海道帝大的学生。

“得便到我那儿坐坐？”

古山把自己住的房间告诉给岛田，可是对方板着面孔，说：“实在没时间。”

虽然两个人站在那儿谈话，可是岛田却在古山的眼前一页一页地翻弄着杂志。他并不是真看。古山一瞧，原来那是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于是，他抖起精神来，说：

“我有一本福本的书！”

“读过吗？”

对方还是很冷淡地问他。

“没有呢……”

岛田听他一说，把身子向左边一扭就转过脸去，几乎连左肩都看不见了。

古山不知道该怎样去接近才好。

最后，古山在他的那种态度面前给镇住，感到实在抬不起头来。——有一个曾在工会调查部工作过的人向他诉苦说：近来在工会的集会上，年轻人就冷不防地给你提出一些无法答复的大

道理，真叫人头痛。此刻，古山在年纪比他小的这个学生面前，似乎感到有同样的压力。

但从岛田的态度来看，他很可能与“学联”有关系，因此，他又把肚子里的火气压下去了。

古山一面上楼，一面想：过两天我去找岛田好好谈一谈。

这时，脖子围着毛围巾，围巾的一头甩在身背后的藤子从楼上急匆匆地走下来。

“喂！”

古山停下脚步，叉开大腿站在她前面。

“慌慌张张地到哪儿去？”

“不知道！”

她长得象外国人，下颏有点向外翘。——她用下颏压着围巾，从古山身旁灵巧地躲闪过去。

“哈哈！是不是等着的人儿还没有来？”

古山想起了龙吉，微微地一笑。刹那间，她把眼珠滴溜一转，好象打了个“？”，紧跟着她便观颜察色起来，在揣摸对方的心意。立刻又说道：

“不知道！”

她咚咚地下楼去了。

古山的房间是略微向外凸出去的，小樽港尽收眼底。停泊在港口的轮船桅杆上的绿灯和船尾上的红灯有好些个都亮了；灯光映照在黑魑魑的海面上，拖起长长的尾巴。蜈蚣一般的高架栈桥，从码头左侧黑压压地伸展出去。船上似乎还在装货，起重机好象想起来似的，隔一会就哗啦哗啦地响一阵，那声音如同在耳边一样。

他把装着“人寿保险”的说明书、小册子和利息计算表的折叠皮包往桌上一丢，好象才明白过来：他不能老是这样混日子。对他来说，岛田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魅力。虽然跟岛田谈话，他心里总憋着一股火，可是他又是一想，看来岛田办事果断，有坚定的信心。这一点和他在学生时代截然不同。

“在家吗？”

“啊……”

这时，古山正在苦思冥想，心不在焉地答应了一声。

龙吉慢吞吞地走进来。

十

约定的时间是“星期五晚九点”。——佐佐木为了和札幌帝大的岛田联系，向岩城大楼走去。

由于地点的关系，他和岛田的联系总是在晚上。而且不从正门进去，是绕过肮脏的小巷，从后门出入。他从鞋匠住的屋子旁边上了二楼。

佐佐木刚要进岛田的房间，这时从三楼走下来一个人。他抬头一看，对方吃惊地停下了脚步。

“噢！”

佐佐木认出来了。

他没想到会在这儿碰上龙吉。但是，龙吉更感到诧异。在商专上学的人到岩城大楼来做什么呢，真叫人猜不透！

“啊，好久不见，方才在路上是头一次碰到你。没想到咱们在这儿又……怪事儿！你住这儿？”

龙吉点了点头。

“我常到这儿来，可一点都不晓得。你住哪儿？”

“楼下的粗点心铺……”

一提粗点心铺，龙吉有点不好意思。

“啊，在拐角上。好！下次去看你。”

龙吉刚想说：“我那里脏得很。”突然又停下来。他用眼睛往岛田的屋子一溜，说：

“去那儿吗？”

“嗯。”

“……”

他忽然想到：既然去岛田那儿，那么这个老同学很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者”了。这个词儿是他刚才从古山那里听到的。

但是，佐佐木在学校时，确实是个富家子弟。当时一面在面包厂干活儿，一面上学的龙吉，曾多次羡慕过佐佐木。

龙吉不知不觉地又产生方才那种反感……

岛田把电灯拉到角落上，正在看列宁的《怎么办》。

“你遇到了熟人？”

岛田把《怎么办》往桌子旁边一推，扭过头来。

“嗯，遇到商业学校时代的一个同学……叫大村。”

“啊，我认识他，在中岛铁工厂工作。”

佐佐木放下帽子和帆布书包，瞧了一眼《怎么办》，说：

“一百二十……三页，看得真快！这还了得！”

“打××的地方太多，招架不住了。你有德文译本吧，下次带来借我看看。——那个大村要设法吸收进来。不管怎说，这里的工会在工厂里的工作还开展得很不够……”

“把他吸收进来，没问题！”

岛田面带笑容，说：

“昨天晚上，我们这里发生了一件有趣味的事——为了房租问题召开了全楼大会。看来集体生活往往会出现一些有趣的事情。——有个叫古山的……”

“是个酒鬼吧？我了解一些。”

“是么……怎样个人？”

“和工会有点关系，总之，是个折衷主义者。”

岛田把方下颏往下一低。

“是吧。他对最近的方向转变问题，还没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认识它。——你说他和工会有点关系，是什么关系？”

“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是和工会里的旧人有些来往。”

“嗯，正因为是旧人才有问题嘛。昨天，我站着跟他说了几句话……和那样人要彻底断决关系！”

“你说的也对……”

佐佐木从提包里把带来的纸条掏出来。

“咱们研究吧？”

岩城大楼里已鸦雀无声。三楼上的婴儿刚一啼哭，就听见有人打开纸榻扇门，叭哒叭哒地从走廊上跑过去。沾满灰尘的昏黄电灯，只在它下面的四周投下一小块暗淡的光圈。楼梯旁和两侧一片漆黑。

“时间不早了，小点声！”

“嗯。会员呢？”

“我那里是……”

佐佐木让他把灯往近处移动一下，将纸条拿到眼睛跟前。

“三个人。”

“嗯。——以前我就想对你说，你们那里必须从两方面制定出特殊方针。其中一点，就是年限问题。三年……”

佐佐木舔着笔记本上原来带着的小铅笔，目不转睛地望着岛田。

“你看，你们那里的会员总共才有二十人，其中三年级的十六人，二年级的……”

“三个人。”

“那么，一年级的只有一个人。问题是三年级学生眼看就要毕业，因考虑就业问题，现在他们人心惶惶，哪里会顾得上搞运动呢。说是有二十人，但实际上你们的力量却很薄弱！”

佐佐木不住地舔着铅笔。

“虽然注意到新生，可是要吸收他们成为我们的会员，无论如何也得到二年级。不过，能在二年级的时候把他们吸收进来就算不错了。事实上，总得到三年级才行。可是，等到了三年级，就业问题又来了……”

“嗯，我明白。”

“另外一点，就是你们和高中的学生不同。你们一毕业，都立刻变成靠工资生活的人，这和其他学校的学生比起来，在意识形态上是有很大差别的。因为，你们现在既是学生，同时也具有工资生活者的那种卑躬屈节的思想意识。高中生要上大学，这方面有延长的可能性；可是你们那里的学生一旦变成薪水阶层的人，那就很可能到此为止，再没有发展前途了！”

“是的。尽管我们学校有‘反对军训运动’的革命传统，可是发展组织的速度缓慢，动员加入工会的效率不高，也都和这种情况有关系……”

“我认为应该从这样一个新的角度看问题，重新树立对

策。”

“那就抓紧这个问题。——三名新会员，也是三年级两名，一年级一名。”

岛田把它记在自己的小本上。

“还有呢？”

“还有建立研究会的内部机构问题。我们要重新调整会员，把每个人编在各个专门部门里。”

“嗯。”

岛田慎重地点着头。

“过去的活动之所以死气沉沉，原因在于仅仅以两三个负责人为中心，漫无目的地召开研究会。这一点，我们已经作了彻底的自我批评。后来，我们成立了各专门部，把全体会员都编到里面去，使每个会员一定要在他所属的那一部门领导下参加一项具体工作。我们就是通过这些部门的各自活动来加强整个研究会的活动的。”

“再小点声！——嗯，那是必要的！”

佐佐木听岛田一说，缩了一下脖子。

“你知道，过去我们有一种倾向：所有的工作都推给优秀的会员去做。这回我们定了一条原则，尽可能一人担任一项工作。”

“嗯……组织机构呢？”

岛田皱了皱眉头——“有哪些机构？”

“有组织部、教育部……”

“组织部情况？”

“负责人是‘大胡子’，认识吧？下分三个组——三年级组、二年级组、一年级组。教育部是领导研究会的。它确定学习文

件,指定讨论题,负责人是秃子。”

“是那个光瓢儿吗?”

“嗯。其次是和工会,还有和你们接头的联络组。这个组很重要,由我负责……”

“嗯。”

“另外是掌管《无产者新闻》《马克思主义》^①的分发和收款的,由三浦负责。——我的担子总算轻了些,今后的工作会多干一点的。”

“不过,你要知道——”

岛田仍旧一字一句象打标点一般,用慎重的语气说:“原则上,这样重新调整是正确的,但对于最近无产阶级运动方向的转变问题,有的人还缺乏明确的认识。这时候,把工作机械地加以分工,我想还是很危险的。问题是要从具体的实际出发,特别是教育部让秃子去抓,会不会出问题?那家伙还有不少的资产阶级思想残余没有肃清呢。”

“——不过,这类问题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是有可能得到解决的……特别是三浦。”

“你这种看法肯定是机会主义!列宁也说过的,如果认为我们和秃子之间仅仅是只言片语的小小分歧,这种思想就意味着要使我们整个运动遭到不可弥补的损失。”

“……”

和平常一样,岛田的理论严紧得很,是滴水不漏。佐佐木沉默了一会儿。但是,总觉得有的地方还认识不上去。他想:是不是自己头脑里还有机会主义的残余呢。——可是他认为,只要秃

^① 《马克思主义》是日本共产党一九二四年五月创刊的理论杂志。

子多看一些福本的书，在实际工作中肯担任文件学习的负责人，那么，他那不够全面的见解（佐佐木始终认为秃子的见解不够全面，不是意见上的分歧）是可以克服的。他想在岛田面前再说一下，但不知为什么，心里有些胆怯。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实践。理论斗争在现阶段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此。”

岛田一点不动表情地说。

“关于你的报告，我还有一点要说的，那就是和工会的关系。——这不单纯是跟工会的联系问题，我们应当立即参加到工会的书记处里去。为了同工会内部的山川主义^①和工会主义倾向——那种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相提并论，或机械地给结合在一起，或迫使工会内部的左翼取消它的先锋作用等思想——彻底决裂，我们必须掌握书记处的领导权。札幌已经付诸实现了，而小樽工会受山川主义教育的工人多，要做到这一点还有困难，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必须火速进行。”

佐佐木的心里很清楚：每次来这里，岛田都给他新的指示。

“关于这一点，在《怎么办》里写的很明确……”

岛田说着，便把书翻开。他挑着画红铅笔道儿的部分念给佐佐木听。内容是关于工人自发的经济斗争和“我们”有目的地进行领导的重要性问题。

“着手太晚啦！”

佐佐木咯哧咯哧地直挠头。

“现在和工会的哪个人联系？”

“旗冢。”

① 山川主义是日本共产党成立初期以山川均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主张经济主义。

“是那个小‘杆菌’吧？”

“是的。”

“可靠吧？”

“百分之百！他不会讲演，在公开场所不露面，就象小说中出现的共产党人一样。”

“那么……”

岛田翻弄着大腿上的那本《怎么办》的书页，稍微思考了一下，说：

“你和旗冢研究一下，工会的书记要由我们的优秀会员把牢！”

“嗯，明白了。就这么办。”

“还有呢？”

“还有关于最近小樽和札幌即将成立的左翼艺术团体的领导问题，和召开包括弘前高中在内的东北、北海道的‘学联’地方代表会议的那件事。”

“嗯，我同意！”

岛田把这记入小本子里。

两个人直到晚上十一点才研究完联络的细节。

佐佐木打了个大哈欠，把各种印刷品和书籍收藏到帆布提包里。每当佐佐木会见岛田时，总感到岛田的那种独特性格给他以很大的压力。例如说，他就从来没有听到过岛田谈工作以外的事情。开会时不消说，就是随便聊天时，他也和开会时完全一样。这对还有一些浮躁的佐佐木来说，确是感到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压力的。

商专的“学联”一开完会，他们就开始闲扯一些常去的那家吃茶店的女招待，要不就说一些淫荡话。这已经成了通例了。

佐佐木也喜欢跟他们乱扯。按照“学联”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不准饮酒，不准嫖女人；一切私生活必须服从工作上的生活。但开会时，总有人喝的红着脸儿来，也有去会女朋友而迟到的。有的人在集会上或朋友之间，装出一副工人的模样，但背地里却过着非常奢侈的生活。虽然佐佐木对此有所认识，但自己仍不能摆脱出来。甚至有时也偷偷地承认，自己是跟着同流合污了。——然而，这些对岛田来说都是不可想象的，他一样也不沾边。

集会上一出现反对意见，佐佐木总是立刻急躁起来，压不住心头的火气。于是，他就把自己要说的和盘托出。岛田不论问题多么错综复杂，他说话的声调和速度始终如一，而且只简单说一句：“那是机会主义！”或者“需要彻底决裂！”这一点，他也打算向岛田学习。在开会处理问题上，佐佐木甚至觉得他有“超”人的能力。岛田是否参加会议，这对会议开得好坏有直接关系。

有一次，佐佐木把自己对岛田的看法跟北海道大学的一个学生谈过（此人后来与岛田对立而被“学联”淘汰），他突然冷笑说：“说起岛田来，大家都受他骗了！”这个人对佐佐木还说：开会时，别人迟到了，都笑呵呵地说“啊，对不起！”或是“哎，有点事来晚了。”可是，岛田在这样的场合，总是装出一副假正经的哭丧脸，一声不响地走进会场，悄悄地坐下来参加讨论。这一来，都使人无话可说。尤其是在哪儿喝了酒来的时候，他就要耍这一招。再说，别人是同“学联”的朋友一道去咖啡店才捅出漏子，可是岛田却另有他的那一伙朋友，所以他的事人们却无从知道。

然而，说这话的学生本人，因在会上闹得乌烟瘴气，以致使“学联”在管理上成问题，所以他被岛田警告过多次。特别是那个学生企图找岛田的岔子要批判他，这在佐佐木看来，就如同怀疑马克思、列宁和福本和夫等人的著作中有错误一样，那是根本

办不到的。

佐佐木夹着提包站起来。他还想打个哈欠，可是突然又咽了下去。在岛田面前，自己也都感到莫名其妙，竟变成一个谨小慎微的人了。

“好，再见。下一次是七日的九点，对吧？”

“啊。”

岛田就坐在那里哼了一句。他和往常一样，既不站起来，也不瞧他一眼。

当初，他对岛田的这种态度很恼火，以为“这家伙真傲慢！”但过一些时候，他才知道岛田的这个态度不是因为傲慢引起来的。——当进行一项新的组织工作时，一切不必要的东西都应该从日常生活中砍掉，事实上工作性质就是这样。岛田的这种做法，不久便在整个“学联”内部蔚然成风，这就是一个明证。但一开始，佐佐木等人感到非常别扭。有几次，他和朋友们在街上走，到了分手的地方又有些依依难舍，于是又往回溜达。特别是开完会以后，他很想找岛田聊聊。

“去喝点茶吧？”

他这样提心吊胆地邀请岛田。可是岛田连头也不回，说：

“我失陪了！”

他二话没说，就匆匆走开。

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往往觉得有的人难对付。——佐佐木认为岛田就是这样的人。佐佐木在忙着搞“学联”的组织工作时，他在无意识中也感到自己逐渐变得跟岛田一样了。

说来也奇怪，只单单这一件事情，他不知不觉地对从前“难以对付”的岛田就产生一种微妙的亲切感。

有一次，他们在学习福本和夫的《社会的构成=转变的过

程》时，岛田突然对坐在身旁的佐佐木说：

“喂，我到东京的话，很想去见一见福本，哪怕谈几句话也好。”

他吃惊地看着岛田。这话简直不象是岛田说的。——但岛田说完，好象又改变了主意，立刻恢复了他那阴沉沉的冰冷面孔。

因为问题急待解决，佐佐木从岛田那里出来，就想马上去找工会的旗冢。但时间太晚，他决定改在明天，不去上学了。

手宫街上的行人稀稀落落，早已是夜阑人静的时候。有时只看到几个喝得醉醺醺的船员从专为工人开的妓院那边转过来。佐佐木边走边吹着似是而非的国际歌口哨。这是他从东京回来的学生那里才学到的。他的脚步声在街道两旁的房屋中间响起回音。

在商专没成立“学联”以前，有一个仅有四、五个人的“政治研究会”小组。佐佐木是其中的成员之一。——商专和其他学校一样，学生们也到新从国外回来的青年教授那里去问长问短。当佐佐木到刚从德国回来的专攻经济学的高杉教授那里去的时候，教授提到德国学生对“社会问题”十分感兴趣，于是校内纷纷成立这类研究会。从此，商专才开始成立了“政治研究会”。

可是，正当这时，世界大战后的经济走向反面，爆发了经济危机。尤其日本受“关东大地震”^①的影响，所以大罢工接连不断地发生。这些事件不能不引起学生们的关心。这表现在他们热衷于“社会学”“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诸如亚当·斯密、李嘉图的古典学派，以及波耶姆·巴别尔克、卡尔·蒙哥等奥地利学派的讲义，都满足不了学生们的要求。因为光靠这类讲义上的知

① 一九二三年，东京和横滨一带发生强烈的地震，同时引起海啸，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极大的损失，死亡和下落不明者在十四万人以上。

识,就连每天报纸上第三版的社会消息都无法理解。——学生们在学校里都就近看起河上肇^①的《社会问题研究》来。上经济学课的时间,大家向先生提出许许多多的问题。

佐佐木的一个同学(现在是“学联”的会员)从一家旧书店找到一本《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本,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读完。佐佐木到他的公寓去拜访时,见那本小册子上写满黑压压的注解,他念了几段给佐佐木听了。但是他自己也看不太懂是什么意思。佐佐木也不明白说的是什么。可是,两个人在翻看的时候,都感到异常的兴奋。

有一次,佐佐木和那个同学一道在街上边走边说:

“马克思一方面说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崩溃,进入另一个社会——无产阶级的社会,可是同时又在‘宣言’的最后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佐佐木身旁的同学听了,立刻满不在乎地说:

“这说明在作为一个学者的马克思和作为一个革命家的马克思之间是有矛盾的呀!”

佐佐木针对他的这句话,说道:

“‘全世界的’这几个字是非有不可的。我倒是觉得马克思的人情味就在这儿。”

——现在回想起来,都感到十分羞愧。当时,大家都是半斤八两。

以高杉教授为中心成立的“政治研究会”,其直接动机是从早稻田大学因“反对军事训练”而发生的流血事件开始的。这一事件的重要意义,在于使人们认识一个问题,即学校是现实社会

^① 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决不能脱离现实社会而单独存在。但佐佐木等人必须首先从自学开始。最初学习的文件是高杉教授从国外带回来的《共产党宣言》和《国家与革命》（列宁著）。每星期五晚上都集中在高杉先生的家里，一共有五个人。高杉教授并不很懂。佐佐木等人不明白的地方，同样也是先生不懂的地方，所以学习进度很慢，象小虫子爬一样。

寒冷的夜晚，研究会的学习完了以后，大家便从很长一段山坡路走下来，到了街上一边吹着热气，一边吃“砂锅面”。每逢这个季节，此地的“砂锅面”是最应时可口的。“德国大学休息室的黑板上，都是光明正大地写出通知——今天几点几分在第几教室召开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真叫人羡慕！”

他们都象屠格涅夫小说中热情奔放的俄国青年一样，在深夜里还在谈论着工人运动和革命。这对他们有那么一股魅力，谈论起来有永远说不完的话。

从那以后，佐佐木在街上一走，就觉得“工人”特别显眼。放学回家时，他经常绕到码头那里，在防波堤、填海造地、煤厂和海关等地看一看。从工厂门前走过时，就在那里停一下脚步，听一听轰隆轰隆转动的机器声。——他听说在商业学校时代曾和自己争名次的大村到铁工厂去工作，这时忽地闪过一个念头，想要去拜访他。

一九二四年的夏天，有两名帝大的学生从东京赶来和他们“政治研究会”取联系。那时的研究会已扩大了不少，发展了十四、五名会员。

其中一个戴黑色宽边化学眼镜，脸型和眼镜显得很匀称的洒脱学生，见面就问：这里有“工会”吗？

佐佐木忸怩地说：

“没有……”

好象乡下学生一般羞红着脸。

自从帝大学生来了以后，佐佐木他们的“政治研究会”发生了急剧变化。——过去，你们只是按照指定的学习文件依次逐段地读，然后每人发表一通自己的意见就了事。然而，我们之所以要掌握各种知识，这完全是作为行动指南的需要，决非单纯为了“博学多闻”。那个学生特别强调“行动”两个字。

临走时，他对佐佐木说：

“这样的一个城市是不能没有工会的。工会的组成工作，研究会就必须带头！”

佐佐木考虑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他找高杉教授去了。先生说：这件事学生难以胜任，不是分内的事。他顺路征求了每个会员的意见，赞成的只有两三个人。佐佐木本人在帝大学生和研究会会员之间象钟摆一样来回动摇。可是，他那懦弱的、优柔寡断的性格，在反复磨练当中，自己得到了锻炼，思想认识上逐渐明确了。

工会问题表面化以后，迄今有十五个人的研究会成员陆续不断地减少，最后只剩下六个人。到后来，高杉教授也不肯露面了。那时佐佐木的情绪委实有些低落。可是帝大学生却若无其事地说：“这是脱皮嘛！”“这不正是蛇往大长的明证么！”

他们几个人都请了假，来到佐佐木家听候差遣。这几个人的脸和手弄得漆黑，在刻印传单。东京来的两个学生动作异常敏捷，很快就把工作处理完，随后用油印机印刷“声讨书”。说起油印机来，研究会里没一个人会用，甚至有的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机器(?)的。

乱糟糟地摆满一屋子，几乎没有立足之地，大家就坐在里面咬着面包。吃过饭又马上投入工作。

“列宁说，从事革命活动要比写革命的书痛快得多哩！”

帝大的学生一面工作，一面这样说。

他们定好日期，就各自分头在小樽市的码头一带张贴传单（当时可以公开贴传单）。

所有的演讲全由帝大学生承担，会场定在叁^①货栈二楼。研究会的会员从前一天就开始到各工地去动员。

那一天的演讲会顶稀奇。从上午开始，每当工地休息就给成群结队来的工人讲一遍；同样的内容左一遍右一遍一直讲到傍晚。另一方面，当时每个会员是一刻不停地到处拉工人的。——帝大学生讲得口干舌燥，嘶哑着嗓音笑着说，昼夜演讲了十几场。佐佐木等人连续搞了三天这样的演讲会。

这个活动收效很大。码头工人听完报告就来找佐佐木他们。

小樽成立劳动工会的第一次筹备会，就是以这些人为发起人，一切由“政治研究会”从中斡旋而召开的。——直到后来，小樽方面的工会发展是一帆风顺的。

帝大学生大约呆了一个月就回去了。他们一面整理行囊，一面翻着厚厚的底稿给佐佐木看。

——这是他翻译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一书的稿子。

“我正在翻译，好极了！恩格斯不愧为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理论家。”

这个学生叫“松山幡也”，名字很别致。后来他才知道，另外一个学生不是东京帝大的学生，而是札幌北海道帝大的学生。——

① “叁”是货栈的标记。

他就是现在的岛田。

松山等人一开始就是带着组织任务来到小樽的。他们在建立工会的同时，也是为进一步加强正在全国的大学和高中建立“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工作，以便在全国范围内把它们统一联合起来。

其后，“政治研究会”改为“社会科学研究会”。从此，研究会便进入一个新时期，它的性质和以前截然不同了。——过去每个会员对这样的运动总是抱着一种“憧憬”的心情，如今他们已经不再抛头露面了，而是开始积极迅速地投入实际行动中去了。后来佐佐木遇到学习文件中不明的地方，也常常去请教高杉教授。

“最近如何？搞得不错吧……”

先生每次见他，总是这样冷清清地问。

第二年秋天，那是学校每年照例举行“射击演习”的时候。

三百多名学生潮水般地冲到梯田上。这时，军事教官（陆军少校）下达命令：“正前方约一千公尺处，发现朝鲜暴徒在市内纵火，大肆掠夺……”——大家一面往上冲，一面咋喳咋喳拉枪栓上子弹。忽然后面有五、六个人停下脚步。

“喂，等一等！朝鲜暴徒？！”

“是呀！什么朝鲜暴徒！”

“这是人道问题！”

平日反对军训的人，把枪托竖立在地上。

佐佐木等人猛然间大声喊道：

“喂，按这样侮辱性的命令行动，是我们学生的耻辱！不干！不干！”

大家慌乱起来，一阵喧哗，队伍就散了。关东大地震时，因散布无中生有的流言蜚语，屠杀朝鲜人，大家还记忆犹新。

四、五十个三年级的学生各自提着步枪又折回来，去到后面找少校。——带头的是佐佐木。态度暧昧的学生目送着他们，又缓缓地往梯田上爬去。

预备役少校变了颜色，说：

“这仅仅是个假想，没别的意思。”

佐佐木等要求取消这项命令，并希望他当众“检讨”。少校坚持说，这种无关紧要的小事，不要斤斤计较。

“什么小事！信口开河！”

“也许你以为是小事一件，可它却意味着严重的社会问题！”

佐佐木这样跟他明讲。

“你们是社会主义者吗？”

教官露出厌恶的神色。他把军刀靠在右肩上，跟在冲刺中的学生后面赶去。

当天夜晚，“社会科学研究会”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并立刻作出如下决定：

一、要通过“学生社会科学联合会”把它作为一个全国性的问题来对待。

二、要求小樽劳动工会站出来说话——这是整个无产阶级的问题。

小樽市内的朝鲜工人很多，一些人已经被组织到工会里来了。

联系工作由佐佐木负责。不过，工会是否肯站出来，在这个问题上，佐佐木还有些放心不下。组织部的旗冢听他一说，便立刻说：“干。”

“吸收朝鲜工人入工会是本市的当务之急，可是，他们和日本工人总闹对立。——这正是一个好机会！”

第二天，工会的传单《告全市工人和朝鲜同志书》一齐贴了出去。

“学联”为防止出问题，在平常不甚惹人注目的会员的公寓设下“本部”，研究对策。当天夜晚，大家油印了一整夜。

学校里撒传单，报纸上用大字标题登出来。——学校当局慌了手脚，没料想问题会闹到这个地步。但问题并未到此结束。没过两天，东京各大学的“学联”代表就闯到教育部去了。发生在北海道一隅之地的事件，竟扩大到全国。

佐佐木等人已作好被开除的思想准备，高举“反对军训！”“坚决反对学校法西斯化！”的标语牌，同校方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学校里钻进了许多便衣。休息时，休息室里如有四、五个人聚在一起，便衣就一定凑过来。——佐佐木等为达到最后目的，决心实行同盟罢课。但面临就业问题的商专学生，都顾虑重重，动不起来，而外面的工会和东京方面的运动反而走在前头。自从这次事件以后，“学联”会员有显著增加。

东京的学生秘密来到这里支援他们。过去有些流于形式的全国性的统一和串连，现在已变得有实际意义了。正如过去帝大学生到来之后，使佐佐木等人的研究会发生质的飞跃一样，今天陆续不断地秘密来到这里的學生，又用理论把他们武装起来了。——那个大脑袋、小眼睛、剃着光头、说话有时口吃的学生告诉他们说：不了解最近运动发展的新阶段，特别是“革命知识分子”所肩负的任务，那么研究会的工作就会寸步难行。

工人阶级光依靠自己的力量，顶多不过具有工联主义的意识。但社会主义学说，是在受资产阶级教育的代表人物——马

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知识分子所完成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理论中诞生的，并由这些人进行传播而带给无产阶级的。因此，社会主义意识，不是从工人阶级中间自发产生的。这是列宁的正确观点。因此，我们学生应该时时刻刻站在工人的最前头，去进行指导。——小眼睛的学生这样说。他说话着急，总是忙忙叨叨的，所以更口吃了。

即使不讲这些革命道理，远离中央的小樽学生，对东京来人的讲话也是百听不厌的。他们讲的内容使佐佐木等人霍然感到心明眼亮起来，这如同脸上蒙的那块遮眼布被揭开了似的。

现在佐佐木等人的工作，反而受原来由他们“研究会”帮助成立起来的工会推动了。他们知道研究会必须要为实践服务，但究竟应该怎样做，他们还不明白。不过，这个令人深信不疑的新理论，顿时使学联的活动生气勃勃起来。

佐佐木等人终于取得“反对军训运动”的最后胜利。学校当局向社会作了检讨，取消了“朝鲜暴徒”之类的字样。这次运动，和这之前以及后来的所谓“学生事件”迥然不同：这是工会第一次把学校内部的问题作为自己的问题而展开最积极的斗争。结果，在“实践过程”中确实加强了工会和学联活动的作用。

小眼睛的口吃学生临走时，佐佐木等两三个人准备了咖啡和面包，悄悄为他饯行。火炉烤得他脸上发热，说道：

“我呀，还很会写小说呢。这话不可对外人说……”

他孩子般地一笑，又说：

“我来这里发现一个材料，高兴极了。”

这个学生回东京时，不知怎的被人跟踪上，在上野车站一下车就被逮捕，直接送到警察厅去了。

这样，研究会再一次转变了方向。——大家受了“理论是指

导行动”的启示，对理论的关心高涨起来。大家认为，研究会应该是对工会进行理论指导的地方，而且必须向这方面努力。

这是开始创办《无产者新闻》的时候。

由于研究会和工会的接触比过去密切了，学生们的日常生活什么都跟工人们的生活相比较。其结果，研究会里出现一种极端“清教主义”^①的风气。

有些人家庭虽然很富裕，却故意穿得破衣烂衫；有制服不穿，却另买一套浅绿色的工人服穿着来开会。大家还把过去抽的各种牌儿的纸烟丢开，换成了蝙蝠牌。——蝙蝠牌最工人化！

这些倾向是和追求纯理论的倾向共存的。集会上不消说，就是在外边闲走的时候，大家也不轻易讲话。一句鸡毛蒜皮的话，也要用显微镜放大一千倍，把它看成是天大的问题给您驳回去。他们并不是从全局出发谈大问题，而只是注意一个一个地抠细微末节，对一些小地方，他们的神经是异常敏感的。他们认为，这和下面的一句名言相呼应——“……党内斗争给党以力量和生气，而党本身的模糊不清，界限不明，则是党的软弱的最大明证；党是靠清洗自己而巩固的……”^②

自从“反对军训运动”以后，九州大学也发生了同样的事件。与此同时，劳动总同盟分裂为左右两派，成立了“评议会”，创办了《无产者新闻》，出版后大量流入学生中间。京都又发生了所

① 清教主义起源于英国，通常指刻苦朴素，反对奢侈生活而言。

② 拉萨尔一八五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给马克思的信。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220页，人民出版社版。

谓“京大事件”^①。而且不论其中的哪一件，都是学校问题和工人问题错综交织在一起的，无任何区别。这一点加强了学生和社会的关系。

世界大战后，全世界的慢性经济危机日益加深，日本当然也不例外。尤其加上关东大地震的影响，小资产阶级发生了动摇，这一点显得特别突出。家庭汇款中断的学生陆续出现。同时，摆在大家面前的还有就业难的问题。

这些都使学生趋向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后来，“学联”会员大量增加，超过了四十人。然而，另一方面，有些人认为汹涌澎湃的“社会科学热潮”很时髦，也参加了进来。

正当这时，小樽工会面临着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要么归属总同盟，要么归属评议会，二者必居其一。山元谦三从评议会赶来了。在第一次共产党事件^②中，他连坐过，是工人出身的无产阶级战士，在作鼓动性的讲演方面很著名。他那一双和蔼可亲而又敏锐的眼睛也很有名。大家出自尊敬和热爱的心情，都是“山谦”“山谦”地称呼这位无产阶级战士。佐佐木请山谦到“学联”来，举行了以他为中心的座谈会。

当天晚上，到会的学生近五十人。一间八铺席的和一间六铺席的房间被打通，里面的人挤得水泄不通。山谦进屋时，他细心地环视一番在座的学生。大家特别局促，都用力端着肩膀直

① 一九二四年九月，日本学生社会科学联合会第一次大会在东京举行，当时有四十六个学校参加，会议决定了行动的方针。从此，学生运动日益高涨。此次大会，主要是反对军事训练运动和反对治安维持法运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日本反动政府借口以京都帝国大学学生为中心的运动违反治安维持法，逮捕了大批学生，引起有名的京大事件。

② 一九二三年六月，日本政府第一次逮捕了许多日共领导干部，其中有德田球一、野坂参三、市川正一、渡边政之辅等人。

挺挺坐着。

主席致词后，山谦突然说：

“其实，我今晚有急事，必须马上去，不能讲话。最好改在明天晚上……”

接着欠起身子，又说道：

“临走之前，我想讲一句：诸位都是想要立即站在阶级运动的前面进行斗争的人，不过这个运动决不是三心二意就能搞成的，希望你们做好思想准备。”

说完，用他那独特的两只眼睛扫视一番。接着，他谈起自己在第一次共产党事件中被逮捕后遭到警察拷问的一些情况。——警察骂他：“象你这样的国贼给你来一个‘运往俄国的行李’吧！”说着，就用细麻绳把他五花大绑，在房梁上吊了两天。

“运往俄国的行李”是警察对付与共产党有关的人的一种酷刑。他终于嘴唇发白，昏迷过去。

“从此，我对他们这些统治阶级的仇恨和斗争心加强了百倍。但这对我们搞运动的人来说，这一类的拷打是一定少不了的。所以，诸位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山谦说完这些便回去了。

第二天，到会的会员急剧地减少，总共不满三十人。山谦一进门立刻向屋里环视一番，然后微微一笑。随后，他对这三十来人以极大的热情讲了许多话。

佐佐木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把这件事告诉给岛田。岛田一声不响地听他讲完，连笑也不笑，说：

“山谦是个伟大的鼓动家，但现阶段他还没有真正抓住理论上的指导任务。这表现在他对革命知识分子的旗手作用评价过

低。从这个意义上说，山谦多少有些机会主义！”

自从山谦讲话过后，会员虽然减少，可是大家的思想准备却和以前不同了。

那一年的年底，东京的一个大学同学给佐佐木寄来一个小包。打开一看，原来是福本和夫的《社会的形成＝变革的过程》。

你别的工作可缓办，但本书内容务必立即争取吃透。你必须把握住从自发的工人运动向政治斗争发展的这一辩证法的发展转化的意义，以便同那些对现阶段意义不理解，结果屈服在自然长入说法下的经济主义者、群众的尾巴主义者作残酷的斗争。

目前，在东京作为一个革命的学生或工人，不读这部书是不可想象的；许多的研究会不开会学习来全面理解这部书，也是不可想象的……

附信中所用的字眼和奇妙的措词从来没有听说过。

什么“把握”“现阶段”“经过的过程”“经济主义者”“尾巴主义者”“争取”……等等，这一大堆词儿使佐佐木大吃一惊。文章中还到处滥用“——”（破折号）。这意思他不十分懂，于是便拿到岛田那里。

岛田看他拿来那本书，根本没有理睬，笑着说：

“这些词儿，以前我经常说，你想不起来啦！”

“北海道落后啊。我早就知道！”

岛田说，下次必须用福本的书作为学习文件。

后来遇到工会的人，他们都在看福本写的这本书，而且笑着说：

“不读这玩意儿，就要‘经过’没落的‘过程’呀！”

“听说就连东京的女学生们都在腋下夹着福本的这本书！”

而且工会的人还说，“组织政党”的问题是运动的中心，这是转移到政治斗争的一种表现，最近就有可能成立无产阶级政党。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是学联，就是工会中过去勤勤恳恳工作的那些人，不知不觉都靠边站了。那些对新方向的转换能在“理论上”夸夸其谈的人都抛头露面了。——只有通过“理论斗争”（这个词是从这时开始使用的），无产阶级的阵营才会巩固。这种思想压倒了一切。“政治研究会”最顺应时代的潮流。佐佐木等人将制帽换成便帽，去参加工会的各种集会。集会上，他们的意见总是占支配地位。起初，老工会工人眼睁睁地瞧着这些“陌生的”学生，听他们讲那些莫名其妙的意见。后来，他们就发起牢骚来了。

工会里的年轻人，自然向佐佐木这边靠拢，而且还参加研究会之类的活动，一些新的指导性意见，都是从这里吸取过去的。因此过去专靠威信推动工会工作的工人出身的委员长，就慢慢地按照组织部、书记处里年轻人的意见行事了。当他觉察到的时候，早已变成“挂名”的委员长了。

为了恢复自己的实际地位，他就拚命发表积极的意见；但越发表意见，他就越不受重视。委员长一看势头不对，就反其道而行之——执拗地提出自己不同的意见去驳斥他们。

“委员长掉进山川主义的泥坑了！这算不上一回事！”

“而且委员长近来大腹便便的，那就是干部蜕化变质的兆头！”

工会内部情况发生急剧变化。各种专门部挑选部员时，根本不按过去的老规定办事，凡对新理论哪怕是有一点怀疑的人，就毫不留情地给撤换掉。因为“只有保持自己的纯洁才能巩固”，

所以，一直在工作的同志都遭到排挤而心怀不满。但这是“结合之前的分离”，要想坚强地结合在一起，就得硬着心肠清洗不纯分子！若不残酷地（这个词也开始用起来）进行清洗，那就是极其恶劣的机会主义，其结果就意味着这个运动有崩溃的危险。

他们的口号是“转向政治斗争！”对此不理解的人，不论是在工会或是在学联，都被赶出去了。接着，和政党问题紧紧关联在一起的培养“职业革命家”的问题又出现了。东京的急进学生们，都在为此积极地工作。日本最缺少职业革命家，如不培养一批把整个一生无条件地献身革命运动的人，新阶段的运动就无法得到充分的巩固。

佐佐木等人就是把他们自己看成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并以此为自豪而在工作着。他每次从各种联系和集会上回来都很晚，一进屋，就坐在桌子上瞧着眼前那张手里握着便帽，探着身子大声演讲的列宁照片。

“我也是这样的了！”

工会新的领导力量虽然转移到组织部和书记处的年轻会员身上，但尚未组织起来。正如岛田所说，“组织政党”是日本工人运动划时代的大事。为争取彻底的胜利，首先必须加强工会的书记处。

佐佐木从岩城大楼回来的第二天晚上，他赶紧到旗冢那里去交代这件事情。

十一

工会的旗冢是个敦实的小矮胖子，身高不过四尺九寸。“学

联”的人都管他叫“杆菌”。但这位“杆菌”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呢。可是工会里都称他为“旗冢先生”。工会里加上“先生”两个字称呼的，只有上年纪的委员长源先生和这位旗冢。

提起“源先生”来，小樽市里是尽人皆知的。他是工人出身，体格魁伟，穿一件称身的灯芯绒衣服，仪表堂堂。要说用浅显易懂的语言作鼓动性的演讲，除他而外就再没有别人了。每当他从防波堤或工地上工人集中的地方走过时，干活的人必定要取下缠在头上的毛巾向他致意。——但在这方面，旗冢却是默默无闻的，几乎没有人知道。

旗冢是在函馆的市营电车公司闹罢工时被解雇的，后来才到了小樽。那时，他第一次登台讲过话。讲台是上去了，可是没讲几句，就把自己要说的给忘掉了；就是讲话，方言也很重，咬字不清。他这样一声不响地站在那儿呆了好半天，怎么也接不上下句。听众叫嚷起来——“滚下来！”“退下去！”但他纹丝不动，既不挠头搔耳，也不脸红心跳，就象在台上扎下根一般。

喧喧嚷嚷的听众，一下给楞住，这时会场方才平静一些，可是旗冢仍旧一言不发。主席忍不住就在纸条上写下“别讲了”三个字，递到讲台桌前面。他看也不看。

“怎么搞的，混帐！”

台下又是一阵喧哗，破口大骂起来。听众都说他是个大笨蛋。工会会员从后台出来，在他耳边喳喳了几句，可是他象个铅灌的玩偶一般，一动不动。这一次大家都惊呆了。

他在台上这样地站着，足有五分钟之久。后来他用沉着的声音说：

“我实在想不起来，忘了。到此结束。”

然后慢步走下讲台。

顿时哄堂大笑，听众鼓起掌来。

当时委员长源先生说：“这家伙真厉害。我发现了一员干将！”（他自己经常这么说）

从那以后，讲台上或其他公开场所，再不见旗冢露面了。因此，小樽市里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一旦闹起劳资纠纷，和资本家面对面谈判的时候，也不晓得他是哪儿来的那一股拚劲，死死咬住对方寸步不让。有时资本家雇来打手，或者搬警察来恫吓，其他谈判委员便吓得面无人色，都想溜之大吉，而这位四尺九寸却屹然不动。他讲演不行，但一到谈判，他一句跟一句直顶得对方哑口无言。

再譬如说，人们已经知道劳资纠纷要注定惨败，只好罢手的时候，也出现过这类事情。旗冢又一次使源先生大为震惊。

有一次，工地发生了小罢工。斗争进行了一个月，人们对胜利不再抱有希望，最后决定解散罢工团。就在那一天，罢工团和工会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时间是早晨九点钟。

会上先报告了以前谈判的经过，接着提议马上停止罢工——“我们有待卷土重来，如今只好忍痛解散”。罢工团和工会都通过……可是旗冢嚷道：

“主席，我不同意！”

源先生面有难色，说：

“要知道，除你之外，其他十八个人都同意了，所以就决定这样……”

旗冢好象没听见似的，说：

“如果十八个人的意见全错了，那又怎么办？何况的确又是错误的！”

“你们看该怎么办？”

源先生跟大家商议。

“反正这也是无可奈何。既有意见，可以提嘛。”

有人这样说。

旗冢发了言：大家完全是在作失败的考虑，所以一见失败就要收。但我们在没有彻底失败之前，决不能算失败。他强调说：我们还大有“推进”的余地。

“这简直是乱弹琴！”

大家马上喊叫起来。

“已经失败，再也无能为力了，所以才这样干！”

但他仍坚持说：现在是即将失败，但尚未失败。要说已经失败，那是在为我们的懦弱打掩护。

会议僵持到晌午。为了他一个人，大家吃过饭后又继续开会。但争论还是围绕着这一点兜圈子。最后连相信旗冢的委员长源先生也生起他的气来。

“再谈也是来回兜圈子，各不相让。现在决定停止讨论，进行表决！”

于是十八个人说：“同意！”“同意！”

“在这个问题上，是你们十八个人让兜圈子！”

旗冢这么一说，他们可就吃不消了。

“你这个家伙！”

“叫你发言，你就信口开河！蛮不讲理的，不是你是谁！”

罢工团的人顿时吵嚷起来，还说要打旗冢。

“旗冢，你别随便胡说！”

源先生也大声痛斥他。——这对旗冢还是头一次。

但旗冢和从前在讲台上那次一样，根本无动于衷。

“无论谁说什么，让兜圈子的是那十八个人！……”

“他妈的，还说！”

有个人忽地站起来，但给另外一个人拦住。

“因为……”

他依然用沉着的声音，慢条斯理地说：

“因为胜败绝不是彼此谈一谈就解决问题的。你们看，十八个人没有一个人敢说：好，那就让我们站起来血战到底。这就是个最好的明证嘛。”

大家被他这一股气势所压倒，会议又照旧开下去。这次进一步把难以再重整旗鼓的主客观条件从另外几个方面提出来了。结果还是兜圈子。本来一两个钟头就可以结束的会议，一直拖到夜晚。人们累得精疲力尽，唯有旗冢面无倦色。——不得已每个人叫了一碗荞麦面条，又接着开会。大家嘀嘀咕咕满腹的牢骚，而且这类事情是过去所没有过的。除旗冢之外，其他人是边吃面条边琢磨对策。旗冢却毫不介意，一个人在那儿细嚼慢咽。

继续开会时，主席源先生劈头第一句就提议：既然坚持到现在，可否考虑再延长两三天呢？旗冢默默地听着。这可能就是吃着面条想出来的对策。会上，那些顽固派接着说：“坚持要那么干，就延长呗！”

旗冢说：那好极了。不过罢工团绝不能和资本家进行单独谈判，同时希望会上决定他为工会的代表。这一下正击中他们的要害，会场上立刻开始吵嚷起来。原来他们是想先在会上蒙混过关，到时候就马上解散罢工团。

然而，旗冢的主张是合情合理的，因此他们无隙可乘。会议就加上这两条决议，八点钟就结束了。旗冢单枪匹马坚持了十一个钟头。由于旗冢顽强地坚持这次罢工，所以后来第五天，终

于取得了胜利。

自从发生这件事以后，工会里就流行起“十一个钟头”这个词来。“旗冢”变成了“旗冢先生”。学联送给旗冢一个绰号——“杆菌”，不仅是因为他身高四尺九寸，也是与这件事有关的。

旗冢的父亲是函馆造船公司的职工。他小学六年级毕业后，当了两年市政府的工友，后来到市电车公司去工作。在第四个年头上，因要求“提高工资三成”和贴补解雇的费用问题而闹起罢工来了。十九岁的旗冢是那次罢工的主谋。结果以惨败而告终，他最后被解雇了。父亲流着眼泪对从警察署回来的儿子旗冢说：“你别在我跟前，滚开！”

旗冢在工会里可大不一样，是个沉默寡言，顶和气的人。每逢向工会会员交代工作时，都是说：“请你做某某事情。”这在平日讲话也是气势汹汹的人们中间，可以说是难以想象的；而对那些知道旗冢在紧要关头时的表现的人来说，更是无法理解的。

市里的人都以为源先生是工会的“鼓动家”“工会的活招牌”或是工会的源先生，但到了工会里面一看，源先生的影子就很淡薄了。工会工作无一不是按旗冢的意图行事的。——警察方面也知道源先生徒具虚名，归根结底是一个“传声筒”，因此他们对旗冢开始监视了。

旗冢和两三个工会会员住在工会的二楼。

每次集会总是很晚才结束。大家纷纷站起来的时候，屋子扔的满是纸屑和蝙蝠牌的烟头，弄得乱糟糟的几乎没有插脚的地方。席子到处都被磨破，越清扫灰尘越大。——大伙就睡在这里。铺的那一层薄褥子硬得象木板，躺下去冰冷得跟睡在石头上一样。

“这完全是人在暖着褥子!”

他们睡觉是两只腿蜷曲着，膝盖顶着肚皮，身子缩成一小团。睡衣往嘴巴前面一拉，衣领上的那股污垢和汗气味儿好象奶臭一般，酸溜溜的。可是天一冷还是得把它蒙在头上睡。褥子本来一个星期要晒一次，因为大家工作忙，大半都给忘记了；又兼白天四处奔跑，弄得两只脚和身上脏得很，就这样衣服也不脱，一回来倒头便睡，真是吃不消。

有人被拘留后放出来，说：

“拘留所的毯子都比这好多啦!”

大家笑了。

住在工会里，不但睡觉没有一定时间，而且再怎么累，自己也睡不了一个舒坦觉。何况屋子又很脏，天长日久无形中身体都受到影响。他们面色苍白，脸是浮肿的。

再加上他们一天有时吃一顿，有时吃两顿，或者好歹吃点什么凑合着，这样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营养不良。

有集会时，就让会员们每人出一二分钱作为工会的晚饭基金，对付着买一点小葱和大酱回来。开会好办，不开会，在这里住的同伴就得各自物色对象，分头到工会会员家中去吃饭。

住在这里的学生出身的会员，不到一个月就害软脚病回家乡去了。

只有旗冢却毫不在乎。每日吃上一顿饭，连上几天别人就大发牢骚，可旗冢却不然。他就象一日三餐似的，不是草拟议案，就是发消息，要么就是出外和下面的片儿会联系。

“只有四尺九寸么，身体当然不会受到影响的!”

其他常委中，也有的人和学联的学生特约好的，到时去那里吃饭。

一次，佐佐木到办事处和旗冢联系工作时，见旗冢穿着大衣，站在二楼的角落吃饭呢。一看，他好象光在吃饭，没有菜。佐佐木问道：

“有啥好吃的？”

“嗯？”

旗冢瞧着他，然后用筷子指着放在架子上的小口袋，说：

“喏，那不是。”

“什么呀？”

“盐。”

“盐——？”

“嗯。”

旗冢不时地倒换着两只脚站着，下颏蠕动着，在用心地嚼着饭。他象吃山珍海馐一样津津有味。住在工会里的人，也不管是工人出身的，还是其他什么人，对伙食人人有“意见”，但唯有旗冢例外。

有人对他讲：今天“晚饭断炊啦”，他就“嗯”的一声，象饱餐过后一般，悠然自得地到外面办事去了。

住在岩城大楼的那位多情善感的立石，听到这件事以后，说：“哎呀，我们有五个月没交工会费啦！”于是第二天就拚命地四下奔跑，把由他负责的工会费从会员处收上来，去交给办事处了。

有一次，委员会开到末了时，旗冢针对工会负责干部的“两重生活”（这是他的用词）提出意见。——不仅很少见他粗嗓门喊叫，而且说起话来要比别的工会工作人员斯文得多。无论何时，他讲话总要事前考虑好可能发生的三、四个相反的意见，然后再说出来。所以他谈问题时，说话和蔼，能够打动每个人的心。

旗冢把两只手插到盘腿而坐的腿叉里，不时摇晃着身子，说道：我们要永远置身于工人的团结力量之中进行艰苦的工作。例如，我们每日三餐，就是工人给拿出来的血汗钱，这是很可贵的。看来似乎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可是，另一方面，我们要使工人们认识到：这是工人自己让我们站在阶级利益的最前头的。同时，就我们自己来说，这不是从外处来这里作客，而是要激发起我们同他们的牢固的连带关系和齐心合力的战斗精神。

人们听旗冢这么一说，那些过去跟学生一起厮混的人立刻沉默了。

我们是靠收上来的会费吃饭的。有了这种思想准备，自然就会在工作态度上表现出来，绝不可能出现“磨洋工”的拖拉现象。但是，如果借口每天吃不饱就轻易地寻觅“藏身之地”，那就是放弃通过收会费来加强团结力量的组织活动。这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生活和行动的彻底无产阶级化的思想感情上会制造出“裂痕”来。——这就是旗冢所说的“两重生活”。自从他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工会的风气就变了。

旗冢从佐佐木那里借来书，在工作的余暇就躺在七嘴八舌聊天的伙伴身旁若无其事地看起来。工会里有个叫加藤的人，他斗争性很强，颇受会员们的信任。但他和旗冢的性格却截然不同，端着两只肩膀，说话急得很，而且尖酸刻薄，大家送他一个绰号“疯狗”。他看书时，是悄悄到工会会员家里去，读书很刻苦。在工会里，都称加藤为“理论家”，而没人这样称呼旗冢。任何细小的问题，他一解释就把自己阅读过的和学习到的全部知识和盘托出。

旗冢几乎每看五、六行就有人找他谈话，或者商量事情，所以一篇论文要看很久，脑子里拉拉杂杂记得不完整。而且，他只

读过小学，还有些拿不准。一遇到难懂的地方，他总是一边咬着指头，一边思索着。文章内容再复杂，都是他每天工作中碰到的问题，所以他能很快把握住论文的“主旨”。

雄辩家加藤在集会上讲话，语言“象列宁一样辛辣”，任何时候都是条理分明，一清二楚的。一接触理论问题，旗冢经常被压得说不出一句话来。因此，会上讨论的事项多半按加藤的意见行事。可是，当讨论过三、四个议题之后，旗冢好象忽然想起来似的，说道：“方才加藤的意见错了……”结果，会上的决定被推翻。

旗冢说：

“要和加藤的理论一刀一枪地对着干是顶麻烦的。他是这样跟你讲理论——他看一双鞋做的如何，不是从整体的好坏出发，而是翻弄过来摆弄过去，哪怕有一点点小毛病，便认为整双鞋子就是要不得的。真伤脑筋。”

本来一两句话就能解决的小问题，加藤也得象理论家一样，先推敲一番才放心。工会的人说：一听加藤讲话，就知道他是小题大作。旗冢则恰恰相反，无论多么复杂的问题，他用通俗易懂的三言两语就可以解决。旗冢闲谈时和他在委员会上发言时完全一样，所以给人一个印象——不管怎样难以理解的、错综复杂的道理，就“象我们这样的老粗”也听得懂。

旗冢经常出席与自己无关的一些工人集会。其他人偶而有点自由支配时间，不是去洗澡，就是去理发。旗冢倘若没人拉他去，一两个月都会忘记的。

——他以为自己的意见之所以常常是正确的，而且工人听了可以马上理解，决不是因为自己伟大，或头脑聪明，而是自己比任何人都清楚工人人们的实际想法。

总同盟和评议会分裂时，就出现了小樽工会究竟倒向哪边的问题。

工会每天收到两三封来自双方的各种宣言、传单和声明书。常务委员中有的和本部的人熟识，他经常接到对方给他个人的来信，说明他们哪一方面是正确的。

工会每天把双方的宣言、传单和声明书摆出来，逐一进行分析讨论。在内容上并无多大差别，所不同的是某一方的措词比较有力量，如此而已。

“总同盟方面，看来还有不少的大人物哩！”

“象铃木文治、松冈驹吉……”

在码头和工地干活儿的工人提着空饭盒走过来，看着那些人的名字说：

“总同盟里有大人物，可能错不了！”

这个问题一发生，加藤足有一、两天“销声匿迹”躲起来了。他把传单、宣言、声明书和杂志等统统收拢一起带走了。接着，他又突然出现。这时他找旗冢谈，谁到办事处来就跟谁谈。他不仅要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别人，而且一谈起来，那些似乎懂得的，不料又糊涂起来，因为在谈话中间，他又有进一步的想了。

他和过去一样，死抠传单上的字眼儿。一个码头工人听他讲了好半天，问道：

“加藤先生，那样分成两派，对我们在码头上干活儿的会怎样呢？”

于是加藤回过头来，又从传单的批评开始谈。

旗冢在一旁听着。他了解在码头干活儿的工会会员，他们既不懂理论，也不明白什么叫运动的左翼和右翼，只知道从最实际的问题出发。滑稽的是加藤受文字上的理论束缚，在牵着工

人的鼻子兜圈子；而他自己呢，又是被接二连三来到的传单和声明书牵着鼻子打转转。加藤还认真起来。他越说就显得话越多，而且也就越脱离实际。而码头工人又什么也不懂，开口就要和自己的实际联系起来。旗冢把这两种情况一比较，不禁暗自欢喜。他嗤笑着，心想：

“正是这样！正是这样！”

小樽工会何去何从，眼看到了必须表态的阶段了。事到如今，不料困难重重。一九二四、二五年的工会，十之八九还具有职业工会的性质。工会利用这一点大量吸收工人入会。所以，工会内部有相当多的干部抱着这样的想法——倘若工会搞成“战斗的工会”就糟了，工人们肯定要离开的。

“工人是世界上最讲究现实的。如果入工会无利可图，不能安定地生活，那他又为什么要入工会呢。有些人就搞不通这一点……”

说这话的人是真木。他年纪不大，可是善于和资本家谈判。一提到钱，他总要在委员会上嘤嘤不休地争执。其实，他说“工人是最讲究现实的……”这句话，毋宁说他表现得最突出。——这话是他加在工人身上的！

在他的思想深处，认为若把工会的“战斗化”搞过头，他自己和资本家的谈判就不得心应手了。所谓善于跟资本家谈判，是说他与旗冢、加藤不同，不是自始至终坚持推行“非”妥协的办法，最后争取到更多的钱，而是总善于在资本家面前暗示他们，他要压罢工团，好跟资方妥协，以便从中偷偷捞一把。所以，过分的“战斗化”对他来说是个大问题。

真木借口说，工人中间有“互助工会”的想法——参加工会可以得到一定的实惠——用来维护自己的立场。

旗冢最清楚真木的这一套惯用手法。真木开口一讲这次事情，他马上就看穿真木的本意，问道：

“真木，你见到东京寄来的传单和声明书了吗？”

真木眯起眼睛看着旗冢，哼了一声：

“嗯。”

“根据目前形势，如果工会慢慢停留在‘职业工会’或‘互助工会’的水平上，反而会使工人的生活难以得到安全的保障。你认为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呢——”

旗冢用指头捺着“评议会”发来的传单上的这个词句，向对方推过去。

但是，从真木的角度来看，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他才死抱着这一点不放的。真木老婆在工会的妇女部工作，没有其他进钱的路子，可是两个人的生活却非常宽裕，所以工会里也有人在说闲话。

其他人思想认识上还不明确，没有从这一点去考虑问题。不过，从最近的斗争情况看，总是对这个“地方性的”（不和中央取得紧密联系要求领导）不死不活的职业工会抱着怀疑的态度。

“老是跟资本家讨价还价，无产阶级运动搞得很好么？但是，如果马上变成‘左翼’的工会，警察就要监视起来，镇压也就要临头了。如果不考虑这一点，那么工会就要垮掉的。”

教育部的小川说。当他讲到“老是跟资本家讨价还价”时，有意地看了真木一眼。大家基本上都同意小川的意见。

旗冢到各个工地仔细了解了一番，工人们的实际想法，他都了如指掌。月月缴纳工会费（这对拿那一丁点儿计日工资的人来说，是一笔巨款），可是相形之下，工会没有真正给他们带头办事。这一点工人很有意见。相反地，工会的人首先考虑的是

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劳资纠纷时能多争取到一文钱就是胜利。这说明什么问题呢？与其这样，倒不如把精力用在多发展一两个会员上，这岂不更好吗？他们还说：“经济越来越不景气，要趁这个时候搞一下！”然而工会的人却安于现状，不肯动！工人们不晓得到底是为什么，都开始发起牢骚来了。

旗冢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这完全是由于工会落后于觉悟高涨的工人引起的。他赶紧对加藤说了。可是加藤却若无其事地说：这是下面的群众“随便云云”。他没有把旗冢的意见放在心上。不过后来他也说：“我考虑了一下，那是我错了。”

单凭东京寄来的传单和声明书，旗冢是不了解对方情况的。但他认为，分裂成右翼和左翼的根本原因是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蜕化的干部们（如真木之流）落后于觉悟高涨的工人，他们为了把自己合理化，所以就要求那些觉悟非常落后的工人按兵不动；另一方面，是要和工人们站在一起，并带领工人向他们要积极前进的方向永远斗争下去。

旗冢准备对片儿（小樽的街道是东西向的一条长街，两头是工人街。片儿分为西部、中部、南部三个地区）中有威信的会员作思想工作——通过早在反对降低工资运动中就已经出现过的各种不同倾向，用浅显易懂的事例到处游说，要大家支持小樽工会加入“评议会”。

正在这时，工会接到总同盟本部的通知，说松田马吉要来。旗冢决定把情况摸清楚以后再说。

“松田马吉来了！”

这位著名的工人运动家是北海道某大“兵工厂”出身的工人。他是大家公认的一个大蜕化变质干部，但是势力却很大。他

来到工会就说：这次的分裂完全是评议会方面策动的。在日本这样组织效率低下的国家，那样干是阶级的叛徒。他们的领导根本不是“工人运动家”，而是将工人绑赴警察机关的“共产主义者”，且不可掉以轻心，上当受骗。

旗冢一面把当时各种情况和“评议会”方面寄来的传单、声明书一一对照着，一面向松田马吉提出询问。——面对这样一个久经大敌的松田马吉，竟使这位“十一个钟头”也渐渐感到心虚了。但他却始终认为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必须使今后的工会方针更加具有战斗性，因此研究对策是当务之急。

加藤一开始就以丧失斗志的口吻说：“再怎么，对手是松田马吉呀！”接着又说：

“真木简直变成松田马吉的传声筒了，到处大喊大叫！”

旗冢咬着指甲，不时地翻起眼皮望着加藤，说：

“我想往评议会反映，说松田马吉来了。我们光听他一面之词，根本不了解事情的真相，所以希望赶快派人来。”

“嗯……但评议会是否有人敢跟松田马吉交手呢？”

于是，旗冢说：

“你少说蠢话！”

旗冢从来没有跟加藤这样开口讲话过。

“提起东京的‘南葛^①工人’或‘南葛精神’来，那是最富有斗争性的工人的代名词。它那光荣传统，也是培育优秀工人接班人的象征。现在，我们要么向左靠拢，要么向右堕落，仅仅是一步之差。它既会在今后五年或十年间给小樽工人运动带来崛起的传统，也会给它带来不亚于‘南葛精神’的光荣传统。——我们

① 南葛，指东京的南葛饰区而言。这里是工厂地带，革命工人运动的中心。

就是站在可以在二者之间进行抉择的十字路口上。”

可是两天以后，评议会的山元谦三突然赶来。加藤以为是旗冢后来给评议会发去电报了。其实，这完全出乎旗冢的意料之外。松田马吉听说山元谦三来到时，用加藤的话来形容，松田是“陡然色变”。

山元的到来，并非偶然。评议会分裂后，立即开始了全国性的组织活动。委员会知道松田马吉动身去北海道，所以制定了紧急对策。作为一个组织者，需要具有政治手腕，以便和松田马吉交锋。委员会决定派遣“渡政”^①去。可是，这时刚巧渡政以前在京滨地方曾经接触过的工场发生了罢工，无法抽身前往。——新的人选难产，委员会陷入困境。

“既然如此，那就非我不成啦！”

这时，山元谦三挺身而出。

后来这件事传为“佳话”。每逢谈起此事，旗冢就重复山元谦三的话“既然如此，那就非我不成啦！”又说这句话很象山元的为人。

旗冢立刻将过去的情况对山谦讲了。他那两只灵活的眼神，不时地向他闪射出光芒，在听着旗冢说话。然后，他说：

“我早就料到他会这样说的。你的看法绝对正确！”

“在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人们往往会看成是松田马吉和我山元两个人在较量胜负的问题。首先，问题的争论要从这方面展开来，那就是看谁能真正回答出码头上和工地上的工人在想什么。这一问题辩论清楚了，我们的组织也就扩大了。——这

① 渡政是渡边政之辅（1899—1928）的爱称。他是战前日本共产党的优秀领袖之一，金属工人，德田球一的亲密战友，曾任党的总书记。在日本工会运动史上，有卓越的贡献。一九二八年于我国台湾被日本警察机关暗杀。

个原则，你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

松田马吉有多伟大，旗冢不得而知，但是他感到山元确实很接近自己这一方面。他觉得松田比起山元来可差得太远了！

当时，工会决定在街上的小电影院举办“松田马吉”的讲演会，并且也让山元到会进行辩论演说。这时，山元就动员旗冢和加藤一定要把他安排在松田马吉的后面出场。——松田马吉似乎没有把演讲的顺序放在心上。

顺序确定后，山元笑着对旗冢说：

“我胜利了！”

因为讲演会是由“松田马吉”和“山元谦三”参加发表辩论演说的，所以听众拥挤得水泄不通。山元把松田的讲演详细地记录下来，随后便登上了讲台。可是当他走上讲台时，比松田上台时的掌声少。山元心想：“你们等着瞧吧！”没过多大工夫，他的演讲越到后面越精采，不断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山元对松田马吉讲演中的每句话，从各种不同角度颠过来倒过去地作了分析，把它全部推翻。这个总同盟的蜕化变质干部的嘴脸——阶级的叛徒被批判得体无完肤。

讲演会一结束，松田马吉立刻回东京去了。山元谦三装作与他一路同行的样子，可是又留下来不走了。

“真正的组织工作要从现在开始。我们不把讲演会所取得的成果巩固下来，那是无济于事的。”

后来，山谦逗留了一个月的光景。他和旗冢等人一起在小樽市四下奔走。

旗冢说的“光荣传统”就这样在小樽的工人中扎下根。

如今，旗冢等人又面临一个新的“政党组织”问题……

作者附记

“序篇”到此结束。这是全篇最少的部分，只不过作品中各类人物大致齐全而已。

这部小说预定按以下顺序写下去——“上篇”是福本主义的抬头，“中篇”是小樽的总罢工，“下篇”是从福本主义的没落到“三·一五”，因此要连载一年以上。为尽快整理出一册出版，先到此告一段落。

(1930年10月)

沼 尾 村

李 德 纯 译

本篇原名《沼尻村》，发表于1931年《改造》杂志四、五月号。译文根据1954年岩波书店文库本译出。

富美刚在厕所蹲下，就觉得眼前那块涂满了字的墙板，马上要向自己倾倒过来似的，顿时感到一阵发黑，于是把手向旁一扶……。

她尽量把脚朝里迈，弓着身子回到操作台。

“怎么了？小富，——脸色可太难看呀！”

富美刚坐好，旁边的吉枝，边干着活，边把她那胖得卷起了几道涡旋的下颏，扭向这边来。隆隆的机器声中，只见她那两片薄嘴唇在一张一合地动着：

“这回……怎么啦，好象挺厉害的！”

“……工头那个兔崽子，两眼直盯这边呢！疼吗？”

“小肚子发胀，——手脚发冷……”

富美戴上手指头已破的湿得粘糊糊的手套^①，把手伸向传送带选煤块了。

“那可不好呀！”

“这回那玩意儿流的可真多，往常昨天就没了，可现在还有。”

“噫，谁来到这个地方，都会变成这样的，因为活太重了！”

选煤厂的楼上，并列着五排铁皮传送带，两边各坐三名妇女，她们把煤块中间的石块和还没有成煤的东西，以及有时会混

^① 原文为“军手”，是日本军队使用的一种白手套。

杂在里面的哑炮挑出来。煤是经过浇水传送过来的。特别是如果把哑炮放过去，混在煤块里一起卖了出去，用户放在炉子里燃烧势必爆炸，会造成严重事故。这样，将影响公司的信誉。因此，选煤这项工作，要求是相当严格的。按规定，发现一个哑炮奖两角钱。

因为煤块浇过水，所以手套很快就弄湿，手套的指头不到一个星期就要破，而手套又是自备的。每个人的手都皴裂，肿得紫黑。天一冷，不仅手指感觉麻木，而且，如果不用另一只手来掰它的话，这只手的指头怎样也不能伸动自如了。

同时，只要机器不停，一分钟也离不开操作台。午饭是轮流换班去吃十分钟到十五分钟。公司方面说，这种活不过是伸伸手就干得了的“轻活”，不需要什么休息，因而，规定从上午七点到下午五点，一直坐着不许走动。所以，女工上厕所，解完了手也要蹲一会儿，逐字看墙上那些乱涂的字，借机会休息一下。

但是，上厕所的时间稍长了一些，回来后工头就嚷起来了：

“你这个混蛋，是蹲在茅房里，一边看字一边××的吧！”

工头故意提高嗓门，好让大家都听到。

不久，公司规定：每天只准上厕所两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天冷时上午去两次，但必须请假。遇到请假时，工头的厚嘴唇就要噉起来了（因此吉枝她们管他叫“章鱼”）。

“过来了！”

吉枝急忙坐好，不停挥动两手。

“喂！”工头从背后捅了一下富美的肩膀，厚嘴唇就象要吹什么东西似地噉了起来，“总是那么进进出出的，还能出活吗？——得扣你的工资！”

富美缩了缩挨捅的肩膀：“对不起……”

“说句对不起，是对付不过去的！”

“因为有……病……”富美只说了这么一句。

“有病？——在这个穷年头，可不能他妈的给病号老爷开工资呀！”

“……”

她两眼紧盯着选煤的双手，一声不吭。——工头又继续说了些什么。她虽然面红耳赤，但也鼓起勇气说出：

“那个……是例假……”

说完后，头晕眼花，把自己的手都看成两只、三只，最后眼前一片模糊了。

“象小富这么胆小怕事怎么行！”

工头走后，吉枝大声说道，并朝工头的背影吐了吐舌头。

“章鱼这个狗入的！”

要说那挥刀杀人的是武士①

在另一排，和吉枝她们背靠背坐着的美津唱起来了。

“杀人的‘的’字和武士的‘士’字，再稍微唱长一点。”

静江在旁边这么说着，就亲自唱给她听，然后说：“是这样的！”

为何切不断那缠绵的依恋

……

静江、美津和吉枝，她们都是一个村的。

① 当时流行的电影《日本武士》（根据群司次郎正的同名小说改编）的主题歌，由西条八十作词。

“不会唱了，回头你给咱写在纸上吧。嗯，阿静。”

工头向那边走去了，他抽冷子从侧面打了雪子一记耳光。雪子是邻村的，她坐在紧挨窗户那一排，选煤时她看着看着就打起盹来。她在挨了巴掌的那一瞬间，还慌里慌张向四周张望了一下，然后默默无言地低下了头。挨了巴掌的那边脸，分外的红，从远处都能看得一清二楚。然而，她却连捂都不捂一下。——雪子今年十六岁，不只脸色苍白，而且长得也矮小，平时总象冻着似的，身子直发抖。

最近这两三年，选煤厂一再强调“控制煤的供应”，活少了，大批大批地裁人。近来，不知什么缘故，突然忙起来了。由于人手减少，这股忙劲很明显地压在每个女工的头上。——“可能因为打起来了，市面活跃起来。一打仗煤可是顶重要的罗！”矿山的人都这么说。

“若是这样，活可就比较过去忙多了，工钱也该涨呀！”

性格倔强的吉枝，首先嘟哝起来了。其他人唯恐被人听见，向四周望了望。不到一个星期，大家就亲眼看到两个伙伴，因为活重，当场倒了下来。晕倒了的女工，只被送往值班室躺了一下，并没有请大夫来。

“王八蛋，又在欺负人了。章鱼！”

吉枝望着雪子，抡起长柄铁锤，朝那块大煤块砸下去，就好象打在工头的脑门上一样。

后面的静江和美津，都突然停下了一直在唱着的“挥刀杀人的……”，变得严肃起来。

好象才听到机器的隆隆声似的，只有这声音是那样的突出。

从吉枝的座位，透过被煤烟和煤灰熏得象地图似的玻璃窗，可以看到倒班下井的矿工，在用砖盖的矿灯仓库那儿，按顺序领

灯。从这里望去，那些浑身污黑、背着工具袋的矿工，就象一群密集着的乌鸦。他们一个个脸儿浮肿，毫无光泽；看东西时好象被什么晃着似的，眯缝着眼睛。——其中许多人，是吉枝同村出外做工的。今年的收成很坏，令人束手无策。即使地主不惜工本，尽施好肥，并精心管理，也只有六成年景。秧插下去以后，天气一直很坏，虽说是立秋，但已经出现得穿夹袄的冷天。有时阴雨持续一周，稻子和豆子都淋得一塌糊涂，天一放晴，各种害虫又蜂拥而至。佃农施的是便宜和勉强凑合用的肥料，他们的庄稼抵抗力弱，一下子就全完了。大米、麦子和青豌豆降价了，唯独肥料始终不跌价，佃农买不起好肥。——佃农们都说：“都是因为三井一家在垄断着价格的缘故！”

无论害虫如何横行霸道，佃农们也只能干瞪眼瞧着，根本买不起杀虫药。唯独地主的地里却撒上了杀虫药。这样，虫子就全部跑到佃农的地里来了。佃农的收成充其量也不过三成。这么一来，不仅缴不起地租，就连迫在眉睫的冬天，也很难维持一两个月。这是“三十几年来没有过的事！”——于是把农活交给老年人，有劳动力的年轻人都出外做工去了。

由于连年的经济萧条，即使出外找活，外面的活也不是那么多。相反，以前到东京、小樽或札幌等地干活的人，在那里也同样是“无法谋生”，几乎每天都有个把人回村里来的。

不久前，吉枝的哥哥也两手空空，转回家来。他出去了两三年，音信全无。现在因为混不下去，就回来了。——然而，他当初所以要离村，归根结蒂，还不是因为在农村无法生活。而现在农村比那时还要糟，他是出于“万不得已”才又回来的。

寄宿在麻纺厂、豆制品厂和炼乳厂劳动的妇女，只带着一个柳条包回来的也日渐增多。

“假如大伙在村里都能混上吃的，倒象是又回到以往那样高兴的时候了！”吉枝的母亲迎接回来的儿子，这么说着。

虽说是农民，但如今不做农活以外的事，就活不下去。——在二里以外快车也停站的镇子上，因为有木材厂和砖厂，村里的人都赶着马车去那里找活干。但是，农民的马干一天就累垮了。因为平时不喂好饲料，根本无法拉三尺见方的木料。

郁秋别煤矿离吉枝和富美子她们的沼尾村三里左右，对附近各村来说，那里是最能“赚钱”的地方。

直到三、四年前，郁秋别煤矿还是用马来拉煤车的。因此，沼尾的佃农们在农闲季节，都套着马前去劳动。但自从改用卷扬机拉车后，就干不成这个活了。这么一来，剩下的只有些零星的杂活和井下的活。而这些活，由正式矿工来做，不仅绰绰有余，甚至还要裁员，因此根本无法挤进去。但是，由于临时工的工资低，公司反而欢迎佃农来做工。——吉枝的哥哥要吉回村后，每天都往煤矿白跑一趟。在一个月后，好不容易才找到了日薪一块一角钱的工作。据他说，在东京混不上吃喝的时候，曾经做过挖沟的小工，因而下半身冻得不能动弹。这次他找到的又是从来没有干过的井下的活，打完夜班回来，就骤然显著地消瘦下去了。即使如此，也比富美的哥哥一郎（和要吉是小学以来的朋友）胜强百倍。一郎至今尚未找到工作，只好同他父亲一起，到没活可干的大田去转转。

吉枝从窗户往下看，在领矿灯的污秽人群中寻找她哥哥。她哥哥稍微有点弯腰，是一眼就可以认得出来的。但是，今天她却觉得每个人都象她哥哥。

人们领完矿灯，三五成群地吸起烟来，因为从下井到上井共十个小时，是不能吸烟的。天色渐晚，只有烟头的火光，星星点

点，时隐时现……。倒班的矿工集合起来的时候，选煤厂的汽笛也差不多马上就要响了，因此，女工不时从窗口向那里张望。选煤厂因为怕影响工作效率，是不挂挂钟的。

汽笛一响，机器的隆隆声逐渐低落，传送带也松缓下来了。——女工们走下操作台，都松了一口气。但下楼梯时，如果不用一只手扶着墙壁支撑一下身体，那发肿的膝盖就要直颤抖，几乎要摔倒。若是勉强弯膝盖，肿起来的那块肉，就发出咯吱咯吱好象要裂开似的可怕的声音。——吉枝她们首先奔向厕所，解决憋了半天的事，也等不及前面的人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跑到男厕所，背朝外地蹲了下来。

女工们或者是互相招呼同村的人，或者是约好互相等着，走到门口放饭盒、围巾和木屐的地方去。

那天，大家正要走出去，恰好碰上工头和一个年轻男子站在门口。那个年轻男子腋下挟着个沉重的包袱。他从里面掏出传单，一张一张地递给已经出来的女工。女工们不知如何是好，两眼望着工头。

工头吸着烟，在那儿走来走去，然后噘着嘴很不高兴地说道：

“回到家里好好看看！”

女工们拿着传单，络绎不绝地走出去。那些坐在由小型机车拖往专用线去的“奥泰赛”（大型铁制煤车）上面的搬运工，就用煤铲敲着货车的车帮，取笑她们。

选煤厂的传送带穿过专用线的上方，把选好的煤直接运往象牌楼那样耸立着的“煤塔”上贮存起来。“奥泰赛”开到这下面来，就打开漏斗，煤块正好从正上方落下来。装满后，径直运往小樽和室兰的码头去。在这所牌楼盖好之前，原来装车是使用

很多工人的……。

“什么传单？”

即使跳着看，有许多地方还是看不懂。

“好象是什么……”

天色已晚，富美边走边把传单凑到眼前：

“国，家……多，事之，秋……。写的是战争的事哩，嗯，小枝。”

“啊。”

吉枝两手一揉传单，用它擤了鼻涕。鼻子两旁沾上了墨迹。

“听说有一天章鱼那家伙，从后面追上了撒传单的人，还把他揪到警察那里去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富美自言自语地说。

“凡我国民，值此之际，切勿流于轻佻、浮华……”

不知是哪一个，在后面操着小学生的腔调，念着传单。最后说：

“说什么呀，太深了，看不懂……”

传单末尾署名：“郁秋别青年团”。

她们拐到下坡的路口时，眼前只见坐落在四面环山的洼地中有如缸底一般的郁秋别市区，已经是万家灯火，交映辉煌。

大冷天从这里还要走二里路才能到家，想到这里，吉枝忽然感到一天的疲劳和饥饿。

二

从快车停站的城镇到沼尾村，通有长途汽车。

那些安装着破旧不堪、积满灰尘车篷的汽车，稍微加快速度，车厢就剧烈地嘎吱嘎吱乱响，仿佛马上就要散架子似的。汽车前端插着一面三角红旗，上面写着“沼尾长途”几个字。候车室是借用沿途村镇的山货铺和药房，长途汽车开到那里就按起喇叭。如果有乘客，这些铺子门前就竖起一面红信号旗。

长途汽车一天往返六次。家里没有挂钟的乡下人和下地劳动的农民，看见尘埃滚滚奔驰在大道上的长途汽车就说：“噢，现在三点了。”他们就是这样来判断时间的。

司机是三四年前来自东京、四十开外、喜欢喝酒的桧田“大叔”（村里人都这样叫他），和家住在沼尾前面一个村子、很快就要接受征兵体检的伊藤“大哥”。一路上没有他们不认识的人。夜晚，遇见村里人骑自行车迎面而来，他们就特地关上一盏车灯，同时，从车里大声打个招呼。村里若出现陌生人，那一定也是他们两个首先发现。——第一个发现兼一郎和要吉回村的，也是这两位司机。“大叔”有些醉意，把着方向盘说：

“呵，你老兄也回来了。世道可真是变得莫名其妙了。——就是回来了，还不是一筹莫展哪，可大伙还是往回跑。”

长途汽车响着喇叭，开出了火车站的镇子，一望无际的石狩平原展现眼前。只有在右边，远远可以看见一片低矮的山脊，很象是矿山的连山。兼一郎已经有三年没有见过这一带的风光了，但一切仍然如此亲切。然而，他更加感兴趣的，是那一块熟悉的稻田。他透过镶着业已发黄、有几处已经破了的化学玻璃车窗眺望着。他四处张望，并三番五次揉眼睛。

“我说，这些地不是够呛吗？”

兼一郎不知不觉地同司机“大叔”搭起话来。

“嘿，看到了吧。——真够呛啊！”

“嗯，——到处都这样？”

“唉，是啊。除了德山老爷、井上老爷和浜田老爷的地以外……”

井上和浜田是这儿附近的大地主。

“喂，老兄，汽车虽然照旧从这村到那村开来开去，可是，村里已经没什么人再坐它了。你会吃惊吧！——都是靠步行啊。这会儿，大家得靠两条腿哪。坐车的都是老兄这样的和外地来的！”

“原来如此！……”

上了年纪的司机不吱声了。半晌，他问：

“老兄，我说，那个什么，带几个钱回来的吧？……”

“看样子象吗？”兼一郎笑了，“若是那样，就谢天谢地了！”

“都是一样！……”司机若有所悟，频频点头。“要吉也是一个钱没拿回来……”

“要吉君也回来了？嘿，变样了吧？”

“哼，腰包里也只不过是揣两个铜板，就神气起来了。大家都说他和从前变了个样儿。他呀，不怎么样！”

兼一郎笑着问道：“那，你看我怎样？”

“你老兄嘛……”司机搔了搔头，稍停顿了一下。“你老兄……”

本来是开玩笑问的，但司机却沉思起来，然后说，“你老兄，在学校是功课呱呱叫的主儿，我分外担心……”

“……？”

兼一郎有些慌了，他向反光镜里看了一下司机的脸：因为搔头，帽子已经歪到脑后，还有那张和蔼可亲的红脸，都显得很自然。

从大街往里走两三百米，就是兼一郎的家。

他边走边掐下自家地里的几颗稻穗，放在手里掂着。干巴巴的，没有分量。嚼在嘴里，根本就没有稻粒。——他用门牙仔细地嚼着，歪了几下脑袋。

从外面刚进入房间，因为从窗户照进来的阳光很少，室内一片漆黑。他稍停住步，揉了揉眼睛。脚下的母鸡咕咕地叫着，在找食吃。土间一直通到后门，右边是厨房，左边是堂屋。好象都下地去了，家中空荡无人。

两眼已经能适应室内的黑暗了。室内一切如故。只是那露在天棚下面的房梁和火炉的吊钩^①，烟熏火燎得比从前还漆黑晶亮。母鸡已经跑到厨房那个潮湿的角落里啄着米粒。

这时，在铺着草席的堂屋深处，有个人在动。兼一郎觉得有些奇怪，转过身来看了一看。

“啊，那不是奶奶吗？”

“……？”

祖母佝着腰坐在那里。她浑身上下象一团烂布头那么脏。她因为眼睛不顶用，错误地朝着另外方向看了看，并竖起了耳朵。

“我是兼，——回来了……”

“兼？什么，是兼回来了吗？”

祖母一个劲地动着她那没有牙齿、松弛了的嘴唇，眼看着泪水簌簌地流下。

“回来了，太好了，太好了！”

① 日本室内炕席中间有一凹洞，其中镶一长方形火炉，烧炭。上面有一吊钩挂在房梁上，高低可以自由调整，用来烧茶做饭。

说着，就在草席上挪了挪身子。接着又说：

“可是，……那，你，看过地了吗？……”她稍停顿了一会。“你爹顶可怜了，真可怜！”

那只遍体脏毛、瘦骨嶙嶙、怀胎的母猫，在炉旁不慌不忙地伸了个懒腰，就嗖地跳到潮湿的地下去了。

“爹，在地里？”

“没，下地又顶什么用？越下工夫侍弄，就越吃亏！——哦，他每天都到镇上去找活儿干。富美好歹总算上了郁秋别，富美那丫头也够可怜啦！”

天色渐晚，眼睛不顶用的祖母，踉踉跄跄地走向厨房。她在后面的库房里装满一篓土豆，然后到炉旁削皮。祖母的眼睛虽然不好，但她削起土豆来，却又利索又快。

“晚上就吃土豆饼啦。没米了……”

她自言自语，那没有牙齿、松弛了的嘴唇在不断地嚅动着。

“我也来削吧，奶奶！”

兼一郎不知不觉地说起了家乡话。

“用不着啦。”

“我来吧！”

兼一郎说完，就把手伸到竹篓里。很久没有坐在祖母的身旁了，已经忘却了的祖母身上的那股味儿，扑鼻而来。那很象是奶味。——然而，当初他在家的時候，祖母一年也只洗一次澡。祖母自从不能再到地里劳动以后，成天坐在堂屋的一个角落里，剪接那些烂布头。几年后，草席上她经常坐着的那块地方，已经浸渍成一个圆圆的脏印。祖母时常坐着坐着就小便失禁了。冬天，在沼尾村，除了地主，没有一个农民洗澡。他们只是夏天，在河里洗个澡，顺使用力把身子搓几下。人们认为，只有妓女才经

常洗澡哩。

祖母削完土豆皮，刚要站起来，兼一郎就先站了起来说：

“奶奶，我来。”

他把竹簍放在桶上，然后取来擦菜板，开始一个一个地擦削过皮的土豆。

“别把手擦了！”

“嗯？虽说是好久没干农活了，可是手皮比土豆还厚着哪。”兼一郎笑着说。

削过皮的土豆溜滑精光，经常会把手擦着的。

祖母不知道孙子在很长一段时间到哪里去了，现在却在这里给她擦土豆。她聚精会神地倾听孙子擦土豆的声音。

“到东京去啦？”过了一会儿，祖母这样问道。

“嗯。”

“到处都一样吧？”

“啊。……什么都干过。”

“噢，是这样的。”祖母稍许歪着头说，“你奶奶呀，打你走后，眼睛就一天一天坏下去，现在连你的脸都看不大清楚了。”

“您说眼睛坏了啊。可是，我并没有瘦……还棒着呐。”

他望着祖母那细长的脖子说道。于是，心中一阵难过。

“哎呀，好疼！”兼一郎不知不觉把手擦了。

“看，擦了吧！”

“唔，没什么！”他舔了舔手指说道。

“你看你，还是奶奶来吧。”

“行啊。”

他擦着土豆，发现周围已经变得昏黑了。

“电灯怎么还不来？”

“电灯吗？”

祖母象是要拂散烟雾似的，在眼前摆了摆手。

“叫人家掐断了。用煤油灯了，现在还用不着点灯吧。你呆在城里，眼睛还不惯，才念叨黑。……在沼尾，点得起电灯的也不过那么六七家。”

“是嘛！”

“你爹回来以前是不点灯的。”

兼一郎不由地深深倒吸了一口气，然后不再吭声了。在黑暗中，只听见沙、沙、沙——擦土豆的声音。土豆擦好了以后，就放在手心里攥，淀粉就掉到下面的桶里沉淀起来。

“一干这个，就完全想起从前了，奶奶！”兼一郎把攥好了的土豆，放到一块布里，一边往外挤水一边说道。

“啊——，是啊！”

“好了，掺什么呢？”

“掺点饭吧，还有点剩饭。”祖母又挪了一下身子。

“好吧，奶奶。我来！”

他把挤干了水的土豆放到磁盆里，掺上吃剩的冷饭，然后用木棍把它捣碎。这时，祖母在火炉的吊钩上挂起了一口大锅，做起汤来。兼一郎把东西都和弄好了，就笨手笨脚地抻成丸子放进锅里去。

“你爹和富美就要回来了。兼儿呀，奶奶已经三天没吃饭了……”

“三天？……”

“唉——，穷人不能长寿啊！你奶奶光会吃，什么活也干不了喽……我不能不替你爹着想啊！”

兼一郎借着大炉子的火苗，看到奶奶的眼皮下面不时闪闪

发光。他默不作声地从磁盆里取出捣碎的土豆，放在手里，一个一个地抻成丸子……。

“你回来了，奶奶不知道放了多大的心呢……”

说到这儿，又咕囔起她的嘴了。

过了一忽儿，祖母歪了歪脑袋，那松弛了的嘴唇颤动着：

“狗叫了，也许你爹回来了？……”

三

兼一郎和吉枝的哥哥要吉，是小学时代的朋友。虽说是朋友，但由于要吉家庭是拥有五町步耕地的自耕农，农忙时还雇几名长工和妇女，据说每年在镇上的银行里，都存有二百元“现款”，因此，他同耕地不满二町的穷佃农（在北海道，仅拥有二町左右耕地的佃农，是难于餬口的）的兼一郎，并不是非常亲密的。

在学校，家境富裕的自耕农，和拥有二三町步左右土地的自耕农兼佃农的孩子们，在称呼上自然都带着个“哥”字，而兼一郎则被喊作“小兼子”或“兼头”。本来，这些都是在家里叫着的，但竟原封不动地搬到学校来了。

不仅如此，连有没有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系在带子上随时用来揩鼻子的手帕，也成为要吉们和兼一郎他们的一种差异。兼一郎他们拖着两条黄浓鼻涕，上修身^①等课时，还一点一点往嘴里吸，用舌头舔着。这东西粘乎乎的，有一定咸味，味道还不错。同时，贫农的孩子们无一例外地都是“癩皮疮”。

① 当时日本学校中灌输军国主义思想的政治课。

癩疮癩疮

在那里

谁要是把他扶起

他就把疮传给你

贫农的孩子们，每天在学校都是这样的受欺侮。所谓“癩皮疮”，指的是脸和头上生疮和疮痂的孩子。这支歌的意思是，虽然想扶他一把，但他反而把疮传染给人了。

霪雨连绵的一个傍晚，兼他们聚拢在屋檐下打闹，这时有人问他：

“你长大干什么？”

“我啊，我把癩疮传给地主老财！”兼回答说，“这样，他们的狗崽子也就长疮了！”

他有过这么一段记忆。

但在兼一郎他们长到十七、八岁的时候，要吉家把地抵押给拓殖银行，从拓殖银行借了为期十余年的分期偿还贷款，因而处于每年必须两次偿还本息的困境。最后，终于卖掉三町步的土地。类似情况，仅在沼尾一地就有五六户之多。银行把通过拍卖陆续夺来的土地，移交给其直属的“地产公司”，然后采取如下的方法进行经营：或者是重新雇用佃户，或者是使以前的自耕农在原地沦为佃农。仅凭沼尾村自耕农本身的力量，想同拥有二千万日元资金、发行一亿元债券的半官半民的拓殖银行相抗衡，是无能为力的。

不仅如此，甚至连拥有一百町步土地的大地主德山，也使用贷款的方法蚕食自耕农的土地。特别是对那些毗邻自己土地的自耕农，更是不动声色地采取这样的手段：不是在秋天当他们出

售农作物时，百般压价，就是在他们告贷时，先慷慨借钱，后无情催逼，无法还债就迅速将其土地予以拍卖。在沼尾村，佃农反而是同情自耕农的。人们说：“瞧，那家肯定维持不到两年！”那家自耕农果然就在第二年下降为佃农了。

这些农民没落为佃农或自耕农兼佃农以后，就决不再参加一直在参加着的各种集会了。而且，他们在德山或其他几个地主的面前，突然卑躬屈膝到令人发笑的地步。但是，他们丝毫也没有与贫农变得亲密一些。“这也真难怪他们！”佃农们都能体谅他们的心情。“全农”^①沼尾分会派人到要吉家里，劝他们参加农会。要吉的父亲，坐在炉旁一直默不作声听着。突然手里拿着根火筷子，站起来大声嚷道：

“不管我怎么破落，也别那么看扁了我！！”

接着他又叱喝：“混账东西，还不赶快给我滚开！”

分会的人狼狈离去。

沼尾村在这四五年内变化很大。

兼一郎以为要吉在东京见多识广，也许会有所变化，于是抱着这样的希望去找他。

要吉家里的人，刚从地里回来，正摆着一大碗黄萝卜咸菜，在那里喝茶。借住在要吉家中的一位女教员吉井泷，也坐在那儿。吉井是要吉家的亲戚。

要吉是夜班，正准备去郁秋别。

“咱们村也热闹起来了！因为大家都带回来了新知识啊。”

要吉伸出两腿，往上缠裹腿，笑了起来。

^① “全日本农民协会”的简称，战前领导日本农民运动的主要组织。

他喜欢说“我呀”“你呀”的，兼一郎也是在回村后好久，才第一次使用你和我这个词。

要吉的父亲已白发斑斑。他听着两个年轻人，用他听不惯的语言讲话，不时地闭着眼睛，“嗯嗯”地点头。

要吉的脸虽浮肿发黄，但肩膀肌肉隆起，精神抖擞。

“我呀，走南闯北的，这回非在村里轰轰烈烈地干它一场不可，要使咱村也有所变化。到时候，倒要找你商量商量。”

“什么事？”

兼一郎一问，要吉就眼望天花板，笑了起来。

“时机尚未成熟呐！”

他忽然紧锁双眉。坐在一旁的吉井老师瞟了他一眼。

“你听了也许要吓一跳，鄙人曾在‘全协’^①任过事，也给麻生久^②作过弟子，还当过民政党^③的帮闲呢。几经辗转，不过是歌德的浮士德^④般的人物罢了。”

说到“全协”两字时，他特意加强了语气。——说着，他又昂首笑了起来。然后走到土间，从黑暗的角落里推出了自行车。

“你见过‘全农’的山馆吗？”

① 日本工会全国协议会的简称，于一九二八年末建成。

② 麻生久(1891—1940)，日本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九三一年七月，他领导的“全国大众党”同“新劳农党”合并，成立“全国劳农大众党”后，充任该党总书记。

③ 民政党，即立宪民政党，一九二七年二月成立，一九四〇年八月解散，是日本资产阶级的政党。

④ 歌德(1794—1832)，德国诗人。浮士德是他的代表作诗剧《浮士德》的主人公。歌德通过浮士德反映出欧洲从文艺复兴到十八世纪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进步思想，描写浮士德为寻求生命的意义，曾经历过爱情、艺术、政治等阶段和变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把投身于改造自然、争取自由看作是人生的最终目的。

“没有!……”

“那家伙是个蜕化分子!”

“是吗?……”

“那些禁锢在大金融资本家的枷锁下、饥寒交迫的农民的革命力量,将把那些家伙抛在一边,而走到前面去!”

——本来,要吉并不是那么一副讲话的神气。兼一郎猛地想起了开长途汽车的大叔说过的话来。

“喂,要吉,你,是不是成了一个什么社会主义者那个玩意儿了?”

父亲睁大眼睛望着要吉。

“社会主义者?!——你说谁?平时吹得天花乱坠,关键时刻就夹着尾巴溜之大吉,我才不学这样的共产党呢!”要吉在话里充满了侮辱之意,恶狠狠地说着。

“可是,村子小啊,你得小心点!你是不是在瞎咧咧什么社会主义者之类的话?”

“嘿,将来就晓得了。——凭共产党和全协,是决不能解决这个社会的不安的。”

要吉把饭盒捆在自行车后面,点亮了灯笼。

“以后再详细谈吧。——”

说着,他就向黢黑的屋外走去了。

“我替他担心哪!……”要吉走后,父亲自言自语地说着,“尽异想天开,这也都是因为穷,穷得叫人抬不起头来!……”

坐在那里一直闷声不响,只听别人说话的吉井老师,对兼一郎说:

“他,无论干什么都是没干上几天,就总写信来说什么‘小生对人生前途又复失望矣。’要吉他就是……”

兼一郎因为还不大了解吉井老师，只好保持缄默。

“这是今天让六年级学生写的作文，请你看看。写这些事呢。”

吉井老师从中选出四五篇，拿给兼一郎看。

“……家中吃的东西也只有土豆和南瓜了。昨天第一次吃米饭。我在旁边看妈妈做饭，嗓子眼直发痒（痒得慌），唾沫就象开水那样直往上翻滚。总觉得一口就咽进肚里去怪可惜的，因此，在嘴里嚼来嚼去……”

——写得太好了，老师也不觉洒下了同情泪。

吉井老师用红笔在旁边加了如上的批语。

“……父亲说，拚着不吃饭，也要替我缴学费。但是，家中已没有分文。我不好向父亲提学费的事。假如因为缴不起学费就不能念书了，那该多么令人伤心啊。如果村公所和衙门能替我们出学费，又该多么好啊……”

同样内容的还有两三篇。吉井老师在类似句子下边批的不是“·”，而是“°”。同时还写着批语：不无道理，老师也要想一想。

“……我写这些是感到害羞的；因为只吃南瓜，我顶不愿意上体育课了。老师，请您取消体育课吧。上课时，眼睛发晕，一动就出汗。也跑不动……”

有两个学生写体育课的事。

“我总以为，同学们上体育课不积极，是因为它没有意思的缘故。因此，才安排孩子们做各种游戏，但这也不行。于是，我就以为，他们不象是喜欢打打闹闹的孩子了，觉得很纳闷……”

吉井老师讲到这里，突然停了下来。她从喉咙里发出几乎使人听不到的咽唾沫的声音。

“近来缺课的很多。月初的星期五是缴学费的日子，到那天，有一半学生突然不来了！”

“在我小时候也有这种事！……”兼一郎想起来了，这么说着。

“可是，最近可厉害着哪！因为缴学费的情况很糟，校长每月都被传到村公所去，因此，校长就在修身课或者是早会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讲学费问题。我和花崎老师还访问学生家庭，但他们并不是本来有钱而赖着不缴的。不好办哪！……这是我给了一百分的一篇作文，请你看看这段！”

她说着，从最下面抽出了一篇。

“……老师说，大家都按期缴学费，学校就会办好，日本的国家也会得到发展。但是，老师，请您别生气，我父亲说这是扯谎。父亲、母亲和姐姐，去年劳动一年，一段地才打五包大米。父亲喝着酒说：喂，小子，替我算算有多少。我出声地数着一包两包，数完后父亲说，了不起，了不起，大声笑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叫我再数一遍。第二天早晨，我到土间一看，堆积如山的米包只剩下了一半。我问父亲米到哪儿去了，原来高高兴兴的父亲，现在却板起难看的面孔。因为我们租德山老爷的地，那些米都搬到他家里去了。再过一天，早上爬起来一看，只剩五六包了。据说缴衙门的钱和买肥料付了一半，就变成如今这个样子了。德山老爷什么活也不干，就拿走了我家五十包大米。衙门也从我们这里拿走钱。父亲说，假如没有这些蛮不讲理的事，是能缴学费的。父亲生气地说，衙门应当从德山老爷那儿多拿些钱，然后再从其中拨出一部分，给我们做学费。我们这么穷，还要我们缴学费，而德山老爷却依然故我。是不是因为老师不敢得罪德山老爷，才教我们谎话呢……”

“是让学生在家庭里写的作文吗？”兼一郎看完作文后问道。

“不，是在课堂上。”

“你的圈点却不怎么样！”兼一郎用兴奋的眼光瞅着对方。

“哦！怎么的？”她的脸马上泛起了认真的神情。

“看样子这个也要变‘红’呢！是不是和‘全农’那群不务正业的人来往了？”要吉的父亲不是看着吉井，而是看着兼一郎说道。

“开玩笑！身为教员还……嗯！”

吉井老师顿时大笑起来了。

四

时节不过刚刚九月初，有时连续三四天出现大冷天，不穿冬天的大衣就冻得直发抖。又软又干的稻秆，已经有几处发黑，而且从那里折断了。——往常，稻田里沉甸甸的稻穗，秋风一吹，宛如波涛滚滚。如今，稻穗直挺挺地立着，发出窸窸窣窣又干又轻的声音。

“唉——哎，真叫人伤脑筋啊！”

兼一郎的父亲走向炉旁，一坐下就沉思起来。这个时候坐在堂屋角落里的祖母，就顿时坐立不安。

“我说兼哪，我作了什么孽，干嘛活得这么长呢！”

祖母在每天干活的父亲和富美面前，说话总是瞻前顾后的，只对兼一郎才敢絮叨这些。

“奶奶，您虽然活了这么大年纪，可并没作什么孽啊。”

“不是啊，不是啊！”

祖母嘟囔着，慢慢蹭移到一个角落里去。——“这是什么世

道！啊，兼。我打十六七岁一直干到七十，可没歇过一天呐。谁知老了，竟落到这步田地！”

“是啊，都是这个世道搞的啊。您想想，就是拼死地干，一大半还不是叫地主夺走！……”

兼一郎故意说得让坐在炉旁把脑袋耷拉在胸前的父亲也能够听得见。

“就说这回吧，德山准不会答应你少缴一合^①地租！虽然他自己连一棵苗也没有侍弄过。照这样下去，咱们庄稼人还有出头的日子吗？”

祖母因为耳聋，不时“啊——？”“啊——？”地追问。这时，兼一郎就放大嗓门。

“太吵啦！”

父亲倏地大声说了一句，慢吞吞地站起来，向屋外走去。过了一会儿，在后门响起了他吭吭擤鼻涕的声音。

祖母团着身子趴在那里，“咦，咦”放声哭了起来。年近八十老太婆的哭声是令人难受的。

“哎——你爹可怜呐，你爹可怜呐！”祖母边哭边重复这句话。

父亲为了利用秋收前的空闲时间找点活干，天天往镇上跑，但什么工作也找不到。全家只靠富美一个人的工资（一天不过四五角钱）勉强度日。现在就已经找不到什么工作，入冬以后，在北海道就更难找上了。秋收一忙起来，根本无法出外做“挣钱”的活了。而且，稻子的收成最多估计也只有三成，只能在现在打点主意。父亲急得团团转。另一方面，富美由于还没有适应选

① “合”为容量单位，一合约〇·一八公升。

煤厂的紧张劳动，加上那里的空气被煤烟弄得很脏，她的身体已相当虚弱了。最近这一段是勉强支持着去上班的。她走完黑森森的二里路回到家后，总是把背靠在那扇凿穿泥墙打开的窗子旁边，坐下来喘好一会儿气。祖母瞧见这种情景，就蹑手蹑脚地挪向角落里，屏声息气，弯着背一动不动。但是，有时，在富美到家之前，祖母就把土豆埋在炉灰里，或从庙里把红豆饭^①用纸包着拿回家来。“富美呀，好晚啊！冷吧！瞧，奶奶替你埋着土豆呢！吃吧，好吃着呐！”说着就从炉灰里扒出土豆，用嘴呼呼地吹了吹，拿给富美吃。或者说：“喂，富美呀，奶奶今天特意从庙里给你带回了红豆饭！我连兼都没给，替你收着呐！”这样哄富美。而且每说完一句话，就嘻嘻地笑着。

吉枝经常在晚饭后，打着写着“太”字的灯笼，来约富美一起去参加农会妇女部的集会。可富美总是累得精疲力尽，拒绝说：

“实在不行啦，小枝。若是去，明天可就爬不起来喽……”

吉枝望着富美那张没有血色的脸，说道：

“唔，是啊。可是，最近咱们什么会也没参加，听说妇女部变得很不对头呢。山馆的老婆和她爷们狼狈为奸，随心所欲地摆布妇女部。都是因为咱们没去……”

精力旺盛的吉枝说着：“那么，我一个人去啦！”就点起了灯笼。

“全农”沼尾分会从创建时起，就有妇女部，那是分会委员长山馆的妻子奔走的结果。山馆是拥有一町步左右的自耕农，父亲去世前，曾在札幌读书，是村里“才智双全”和“人品高尚”的人

^① 按照日本的风俗习惯，在节日或喜庆日子，吃用红小豆煮的米饭，取其红色，表示吉利。

物。在各村很难组织起来的妇女部，在沼尾因为听说由山馆的妻子出面搞，佃户们都是男的参加了农会，就让自己的老婆加入妇女部。而山馆的妻子则认为，她组织妇女部是为了加强“人品高尚”的丈夫的势力，扩大他的地盘。不仅如此，她甚至认为，连“农会”也是为自己丈夫建立起来的。

山馆同意建立“全农”分会，并带头干，是有原因的。同那些凡事唯地主马首是瞻的佃农不同，有那么一两町步地的人们，处处受大地主的压迫，处境是最困难的。他们仅仅因为不想失去这一町步左右的地，便咬着牙去借钱，而且借债有增无已。他想要改变一下这种处境。因此，他企图通过组织农会，把人数众多的佃农拉到自己一边来，必要时和地主拚一下。就这样，在沼尾全村三百户人家中，有八十户加入了农会分会，其中自耕农占相当大的比例。

沼尾村从来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激烈斗争。一些小问题，全靠山馆通情达理的交涉和高尚的人品等优越条件，得到了有利的解决。但在有车站的镇上开设门面很大的山货铺的吉田堂，突然收回了租给一个叫山村的贫农的地。因为吉田堂的一个亲戚，无论如何也要用这块地，所以就把山村撵走。由于山村迟迟未给吉田堂缴地租，而且还背着油盐酱醋的债，腰杆不硬。沼尾村的人买日用品大都是赊账，他们怕吉田堂比怕地主还厉害。山村从被收回土地那天起，家里就揭不开锅了。他虽然没加入农会，但走投无路，只好去央告农会了。当时山馆去旭川的北联，不在家。由留在家中的一名书记出面，同吉田堂办交涉，但一开口就被吉田堂拒绝回来了。山村的妻子听到结果如此，不知今后如何是好，于是当晚抱着最小的四岁女孩，跳下正用水泵往灌溉渠里抽水的桃内川自杀了。深更半夜发现了用铅

笔写的遗书，才知道此事。

村中的贫农犹如自家的妻子跳河似的，哄动起来，人人手提灯笼跑了出来。在黑压压的星空下，团团灯火，闪烁不定地向下游移动着。

“这可了不得，等于是吉田堂亲手杀死了娘儿俩！”

“什么等于，就是他杀的！”

农民群情激昂，多次把灯笼向河边照去，水中的鱼儿吓得扑通扑通乱跳，这声音令人毛骨悚然。这是一个寒夜，人们冻得浑身颤抖。

山村妻子的尸体是兼一郎父亲在离沼尾村一里以外桃内川下游的木板桥下发现的。她脸朝上地漂浮着。兼一郎的父亲借着朦胧的灯光突然发现时，不由得吓了一大跳。他拚命地跑上悬崖，摇晃着灯笼，大声喊叫起来。在茫茫的一片黑暗中，灯笼划着清晰的大圆圈。兼一郎的父亲“喂——哎！喂——哎！！”地大声吆喝。

佃农们聚拢过来，蜂拥地向河边跑过去。他们挥舞着的灯笼，交映水中，乱成一团。

“唉——哎！可怜哪！”

“孩子怎样了？”

不知是谁在后面这么说着，人们立刻喧闹起来。

“是啊，是啊！”

“是背着呀！”

五六位老人卷起裤腿，下河把尸首拖到岸边。河水腾起了几道波纹，尸首飞快地被拖了过来。在一旁看着的佃农们都捂着嘴啜泣，没有人说一句话。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一人开口，众人随声应和。妇女们扭过脸来，摸着鼻涕。

“好惨哪！”

有人用灯笼照着背上孩子的脸。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小脸可真招人喜欢啊！……”

说着，就马上把灯笼挪开，抽抽嗒嗒地撩起袖子抹眼泪。

“这可以说是吉田堂杀死的。既然已经来到了这儿，再折回沼尾也是一样远的路，还不如现在去找吉田堂，把他捅醒，叫他看看这副情景！”

“对，对！就这么着！”

一直憋在人们心中的悲痛，顷刻之间就转化为愤怒。佃农们把尸首放在门板上，摇晃着灯笼，向镇上走去。

吉田堂的老板吓得脸色发白，跑进派出所。兼一郎的父亲和农会的年轻人，同警察争论起来，结果被扣押一夜。这反而火上加油，沼尾的佃农们几乎全部都站到山村这边来，决定以农会为先导，同吉田堂进行斗争。他们每次组成队伍来到车站的镇子上，都和警察发生冲突。警察整天轮流守在吉田堂，进行戒备。每次冲突都有佃农被警察逮捕。

从旭川匆匆赶回来的山馆，大吃一惊。他说，可不必这么胡闹，谈谈就能解决。于是，他打算解散斗争队伍。因此，山馆回来后，形势反而不利了。佃农们不耐烦了，对山馆开始流露出不满情绪。他们把山馆抛在一边，在农会组织部那位年轻而精力充沛的河原田的领导下，终于把斗争进行到最后，取得了胜利。

通过这次事件，山馆和书记抱成一团，企图以破坏农会纪律为名，把在佃农中间迅速提高了威信、只有自己一大半年纪的河

原田开除出去。山馆的妻子，虽然从前认为河原田是位作风正派、有作为的年轻人，但由于丈夫反对，也就认为河原田肯定是个“流氓”，从而支持自己的丈夫了。然而，佃农们是不答应这样做的。他们说：“不管怎样，山馆先生做的太过分了。河原田君同山馆先生相比，人可能穷得多，但在这次事件中，全村不知蒙他多少帮助。”

过去一直风平浪静的“全农”，从此分裂为两派——山馆派和河原田派，开始闹不团结了。山馆派仍以自耕农兼佃农，以及年老的佃农占多数。河原田这边，多是年轻的佃农和家虽住在沼尾，但把仅有的佃地交给女人和孩子耕种，自己跑到附近城镇、山村和堪察加去打短工或割稻子的农民。然而，河原田派还没有完全掌握“全农青年部”。

自从发生两派的对立以后，妇女部很快消沉下去。剩下的四五个人，都站在山馆妻子一边，成了山馆派。但更重要的是，现在同妇女部创建时的情况不同，由于大批妇女离家到小樽、札幌或煤矿做工，人数日渐减少，象吉枝和富美等即使回来，也几乎没有时间去参加活动，因此，妇女部已成为有名无实的了。

然而，吉枝不能听任山馆派随心所欲地摆布妇女部。特别是借住在她家的吉井老师，对农会的关心程度，时时使她感到惊讶。老师静悄悄地告诉吉枝说：“象山馆这号人，叫作蜕化分子！”从此，好强的吉枝认为，不能再让这些“蜕化分子”来控制妇女部了。

然而，山馆却认为，自己在农会工作中，无时不在关心佃农的利益，一心只想绝不让佃农吃亏或受苦，但他却搞不清在那次事件以后，为什么大多数佃农离开了自己。山馆想要开除河原田，其真正意图倒不是为了加强自己的势力，而是认为采取象河

原田那种过激的领导方法，只能强迫佃农作无谓的牺牲。他是认真地为农会的前途担心的。所以当听到有人叫他“蜕化分子”，他感到非常意外，弄得不知所措，目瞪口呆。

曾经在“全农”山梨县分会短期工作过的河原田说，象山馆这样的蜕化分子是蜕化分子中最危险的蜕化分子。如果他干脆露骨地施展他那套蜕化变质的伎俩，事情倒也简单。但山馆的主导思想就是那些到底还拥有一两町步“私人”土地的农民思想——在关键时刻就动摇妥协的思想。无论如何不会站到不仅没有土地，就连佃耕权都受到威胁，因而态度坚定的贫农的立场上来。这是中农的立场。山馆不自觉地就站到这个立场上来。但不好办的是，他却认为这是对于全体农民来说，也是正确的立场。据河原田说，当然这种人有时也会站到贫农的立场上来，但当不得不进行流血斗争的时候，就必然会投靠到地主方面去，或者实行妥协，或者完全脱离斗争行列。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他在许多贫农中间还享有威信，反而更糟了。

例证是：一发生事，总是只有十一二个农会会员按照河原田的意见行动，而且他们多数念叨不久前的山村事件的恩情而共同行动的。真正了解山馆，并了解河原田，因而同河原田共同行动的，充其量也不过区区四人罢了。农民一旦信任了一个人，就很难舍弃他的。

山馆四十开外，腰骨有些向前弯曲，是一个谦虚的人。在他去农会会员家中进行访问时，人们总是拿出一年只用两三次的座垫来，到土间把它掸干净，然后才请他坐。而且都是让他坐在“上座”。当他离开要去邻家时，主人无论如何也要叫自己的老婆孩子，替他拿衣服和皮包送他去。人们就是这样对待他的……。

吉枝点好灯笼走到外面，兼一郎也跟着出去小便。他低声

对吉枝说：

“请转告河原田君，请他明天晚上来一下……”

他把嘴刚一凑近吉枝耳旁，一股年轻女人的清香，扑鼻而来。顿时，他感到自己的心好象在扑通扑通地跳动，在黑暗中有些着慌了。

兼一郎在东京时，曾在“全协”系统的“日本金属工会”工作过。那是他到东京第三个年头的事。他在那里，经过努力，已经担任相当重要的工作了。但在东京工作和在地方不同，是要花车马费的。而且，他的收入勉强够他一个人吃饭，因此，他粗茶淡饭，有时还要缺一顿。长此以往，终于把身体搞垮，病倒了。

他决心回到北海道自己的村子来。他想，到处都应当有工作可做。沼尾村还没有成立“全农”的青年部。北海道的大部分地区都是这种情况，“全农”几乎全部为“全国劳农大众党”所控制，作为该党革命反对派中心势力的青年部还没有成立起来，当然和“全国会议”^①也还没有取得联系。然而，在北海道，拥有几百町步和几千町步土地的大地主为数很多，其中大都是住在小樽、札幌或东京等地的不在农村的地主。特别是住在东京的地主，不是伯爵，就是侯爵，或者是贵族院议员，大部分还是兼营银行或大工厂的资本家。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对地主的斗争，如果不同城市中的工人共同行动，密切配合，就不能取得胜利。但是，北海道的农民运动和日本其他地区相比，是相当落后的。正是因为这个地区的运动，还处于启蒙的状态，所以兼一郎才下决心回来的。

① “全日本农民协会”（简称“全农”）于一九三一年脱离左派而向右转，于是左派另成立“全日本农民全国会议”（简称“全国会议”）。

此外，北海道庞大的煤矿，也是兼一郎所关心的地方。九州煤矿的产量已在走下坡路，北海道的煤矿就更加有其特殊的重要意义。煤是带动一切工业的所谓“血液”。假如北海道的三大煤矿突然停工，那末，这就意味着全日本的工厂的机器全部停止转动。曾经在北海道领导过“四·一六”^①斗争的森本，一开口就说：只埋头于搞小樽和札幌那些无足轻重的斗争，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组织十个这样的斗争，还不如发动一个煤矿斗争，效果百倍，而且尤其必要。我们经常说，要把经济斗争引导到政治斗争上来，这并不是象炼金术那样改变一个斗争。只要在煤矿或重要大工厂，或在交通运输部门发动一次大规模斗争，这本身就已经是政治斗争了。这是森本一再重复的意见。然而，他还没具体进行这件工作就被捕了。

兼一郎在“金属工会”工作时，从在北海道“十二月一日事件”中幸免被捕而逃到东京的同志那里了解到：在三大煤矿之一的郁秋别煤矿，煞费苦心发展起来的《无产者新闻》的读者，还有三人没有被捕。——郁秋别煤矿距沼尾村不过三里，村里很多人到那儿做临时工。没有比这再好的条件了。于是，兼一郎回来了。他带回了组织关系。他还没有被警察列入黑名单，这是一个有利条件。

兼一郎一想到这次回家，分文没有带回，心中就感到有些内疚。但想到自己重任在身，立刻又精神抖擞起来。他回来后，一直采取慎重态度，尽可能从各方面进行调查研究。在“全农”分会，他虽然很快就了解到河原田很可靠，但也尽量避免去农会，避免同他直接接触。兼一郎还假装和要吉一起去找临时工的活

^① 日本统治阶级为加紧发动侵略战争，于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六日在全国范围内残酷镇压革命力量。革命人民并未屈服，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斗争。

儿，到郁秋别煤矿做了一番调查。剩下的《第二无产者新闻》的读者：一个是毕业于秋田矿业专科学校，现在在煤质化学研究所作技术员；一个是年轻的矿工；另一个是住在郁秋别城镇的爱好文学的青年。

他在矿山了解到：青年团在战争即将爆发时，立即公开活跃起来，而且，最近似乎与复员军人勾结在一起，制订了各种计划；青年团成员中的百分之六十是矿工，其影响相当大，等等。公司方面把这些团体作为它的“御用团体”——当作打手，来公开加强劳动强度，因此，组织工会似乎是很艰苦的了。但是，通过对各方面情况的分析，他觉察到，事实并不完全如此。

他确定个日子，骑自行车到郁秋别去。他总是先到办事处的传达室，问问有没有什么活儿可做，然后才去找他的伙伴。他听说，要吉好象同当地青年团的工作有联系！似乎以青年团作为大本营，策划着什么新的行动。兼一郎这才彻底弄清楚了，不久前要吉谈话的含意所在。

“令兄现在做什么呢？”

吉枝从选煤厂回来后，总是到兼一郎家里休息一会儿。

“我哥哥？他总喜欢强词夺理的……”

“他那个理是从哪儿贩来的？”兼一郎撇嘴笑着说。

“谁知道。哥哥最近好象和大人物来往呢。什么校长啦，训练所的平贺先生啦，等等的……好象变成反动派啦！”吉枝说着就笑了起来。

兼一郎心想：他们终于要动手了。

要吉在去郁秋别的途中，曾多次向兼一郎谈了他的想法。——最近，农村之所以陷入如此极其雕零的状态，其原因在于：使用机器进行生产的城市工业和基本上处于手工业生产的

农业之间，存在着差别，因而农村受着城市的压迫。而这种压迫又来自一两个大金融资本家。他特别提到硫酸铵化肥问题。因此，我们农民必须同这些大资本家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农民并不象共产党和“全协”一伙所想象的那样，恰恰相反，他们死抱住土地问题不放，畏缩不前，不愿摆脱日本旧有的封建传统，这种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因此，要吉（如他自己所说的）积多年经验，似乎认识到：在日本，必须为把作威作福的大资本家的全部财产收归国有而斗争。然而，共产主义者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鼓吹什么工农联盟的必要性，实际上是企图巧妙地把农民变为他们的垫脚石，但农民是不会轻易就上圈套的，因为农民和工人是截然不同的！

兼一郎在听要吉这样讲的时候，心里就曾想：咱们两人同样都上小学，同样参加农业生产，又同样去东京找工作，但两人却如此迥然不同，这真是耐人寻味的事。——这是否因为要吉家的土地虽然迟早也避免不了要卖给人家，但究竟还有那么二町步土地。与此相反，地无一垅的兼一郎，去到城市，参加了工人运动的实践，就体会到，工人和农民，不仅不象要吉所说的那样，存在着什么显著的不同，相反，在遭受残酷剥削这一点上，是完全一样的。当然，农民和地主开展“流血”的激烈斗争，其最高目标不过是为了夺回“租佃权”。就这一点而言，农民当然是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的。兼一郎认为，正是在这个时候，需要教育农民懂得：必须同工人联合起来，把××××^①转变为××××

① 这篇小说在当时，为了避免反动政府检查制度的限制，争取公开发表，有许多地方有意做了某些删节，或用打叉的符号作为缺字，四章以后尤甚。后来，曾由日本的“小林多喜二全集编辑委员会”复原了许多字句，但还有一些没有能复原。

斗争，把所有土地变为××××所有，这对农民反而是非常有利的。他认为，这种斗争如果不同工人联合起来，势必成为不可能，说什么工人把农民作为垫脚石等等，纯粹是弥天大“谎”。

要吉和兼一郎都使用“农民”这个词汇，要吉却是站在中农的立场来使用它的，而兼一郎则是站在连猫脑门那丁点大的土地都没有的贫农的立场来使用的。他们之间的区别就是从这儿产生的。但兼一郎出于谨慎，并没有把自己这种想法告诉要吉。

然而，假如要吉事实上已同青年训练所、青年团和复员军人等串通一气，开始了策划活动的话，那末，对此是不能置之不理的。特别是，他们显然将乘日本军队入侵中国东北，战争即将爆发的时机，在“国家总动员”、“保卫祖国”的名义下，转移开对地主的斗争，破坏“全农”的组织。甚至形势一紧张，山馆委员长就会被要吉拉过去，这种危险性是充分存在的。

今年秋天，佃农们的土地平均只有三成收成（有的地区甚至完全没有收成），是二十年来没有过的歉收。由地租问题引起斗争，势在必然。兼一郎认为，必须抓紧这次斗争的机会，把青年部建立起来。他同河原田取得联系，动员伙伴们利用工作余暇，无一遗漏地走访了沼尾村的农民。

“喂，我说，河原田！真的，这回该怎么办哪！我们这里连三成都打不到哩……”

过去一听说是农会的人就敬而远之的农民，眼前摊上了歉收，就唉声叹气地走上前来问道：“该怎么办才好。”

由于河原田等人经常前来打气，因此，人们开始有些盼望他们的到来了。

“最近可是不太看见山馆先生了……”

佃农们到处流露着不满的情绪。

他们奔走于各村之间，倾听佃农们的意见，并据此写成传单，向四处散发。

兼一郎的父亲戴上眼镜，拿起了传单，慢条斯理地念出声来，并且点头说：

“对，对！——就是这码子事！”

他还说：“河原田也变得能干起来了啊！”

兼一郎进一步计划，把他在东京工作时开始组织、因为回家而没有搞起来的“俱乐部”，在村里建立起来。他准备借谁家的一间屋子，在里面摆些象棋、围棋和书籍之类，人人都可以自由进出。然后，利用这个地方，在农会会员中发展自己人。河原田听完兼一郎的这个计划后说：“怎么搞的，我怎么始终没有想到这件事！”他表示赞成地说：“这样做好！这样做好！”于是进而决定，把《文学新闻》^①和《东京朝日新闻》也摆在那儿。这种办法在农村是尤其必要的。村里的小伙子们，在日子过得稍微有些顺溜时，就暗中积蓄几个零钱，到车站镇子上的下等咖啡馆和妓院去。但现在不行了。在不景气的年月里，村里处女的风气也给搞坏了。有人说：“搞正经人家姑娘一个钱儿也不用花呢！”在前边一小绺头发上抹着厚厚一层头油的年轻人，专在夜里伏击那些很晚从镇上回来的妇女。这些都是生活穷困所造成的，年轻人想在这些地方发泄他们的苦闷。但是，如果成立了俱乐部，就能把这类年轻人吸引过来。

沼尾村只有五六户人家订阅报纸，而且大部分是有地产的人家，又不好向他们借，人们只能间接地听到一些社会上的消息。过去，人们只要知道哪户容易走动的人家有了报纸，便都在

① 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的机关报，一九三一年十月创刊。

晚饭后聚拢到那里去。因此，单凭“俱乐部”有报纸这一条，就肯定会把人吸引过来。即使那些不愿去农会的人，也会来的。河原田等人决定经常轮流在那里值班，用拉家常的办法，使农民接近自己。

不久，河原田在他那张紫糖脸上露着洁白的牙齿笑着说：

“我一直不会下象棋，借这个机会也学会了。”

“有人看《文学新闻》吗？”兼一郎问道。

“哦，有人摆出一副可笑的面孔看《文学新闻》。看完了，又不声不响地把它放在一旁。”

“嗯。”

“还有人说：又好懂又有意思，才三分钱，我们要买。已经有两三个人买报啦。”

“是吗？”兼一郎也笑了。

他同河原田等人取得了联系，开始有组织地开展工作。

五

“爹，一段才打六斗，怎么办？”

“哎——呀……”

兼一郎的父亲在前面五六间^①远的地方，直起腰来。兼一郎已经有三四年没干农活了，他和父亲是同时开始干的，但眼看就落在后面了。虽然戴着手套，但稍一大意，手就让稻子割破，火辣辣地疼，有些受不了。镰刀不是经常挂在旁边一棵稻子上，

^① 日本长度单位，一间合一·一八一八米。

就是动不动碰着膝盖，很危险。因此，他不敢放手大胆割。不到一会儿工夫，他的腰就疼得直不起来了。

“就算他德山是铁石心肠，看到这副光景，还不少收几个租子呀。”

父亲用胳膊抹了抹脸。

“您说他会少收啊？他要是少收几个，爹就打算缴啦？”

“……”

“您看那块地，顶多能打四斗！”

父亲没有搭理，左右开弓，擤着鼻涕。兼一郎想了想问道：

“村公所的吉冈，刚才说了些什么？”

“吉冈？哦，他说什么上头为了救济这次歉收，拨了六百几十万块钱，另外，还拨款给土木建筑和修整耕地用哩。这么一来，就用不着担心了……”

父亲好象有些信不过，最后几句话说得含混不清。

“哼，对咱们根本就无济于事！他的意思是叫我们缴地租。真有两下子！”

“哦，德山家的延先生也是这么说呢。”

“瞧！他们早就算计好了。”

兼一郎呸地吐口唾沫。他觉得气喘，口中发粘。

“大叫什么歉收啊歉收的，地主还不是借机会捞一把。如果再要缴税，缴肥料费，这就等于咱们老百姓为了把自己饿死才种稻子嘛！”

“唉——是啊！”

兼一郎一边瞅着父亲，一边加重语气地说道：

“农会在干嘛呢？”

“唉——是啊……”

“农会要开会吧。如果不全部免缴地租和一笔勾销欠款，农民就会因为歉收，全死在路旁了！”

父亲听他这么一说，立即骂声“混账……”

父亲象猛然想起了似的，又弯下腰去，熟练地刷刷割起稻子来了。——

晌午过后，兼一郎正在场院钉晒稻子用的木架，河原田骑着自行车过来，若无其事地同他搭起话：

“今天，听镇上小报记者说，这次拨救济款，是怕农民因为歉收起暴动，是用来蒙蔽农民的！”

“对。明天的会和印刷品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也参加。”

“你也去？这当然求之不得，可是行吗？……还有，也是打小报那儿听来的，好象要吉他们终于要成立日本生产党^①的支部了……”河原田小声说道。

“听小枝说过。咱们应抢先一步，如果晚走一步，这就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哦！”

河原田说着，他那道粗眉毛就从两边拧向一起了。

办完了事，河原田大声向在那边割稻子的兼一郎的父亲喊道：

“老爹，明天晚上到山馆家开会啊！”

夜里，兼一郎在回家途中，到“俱乐部”转了一下。虽然正到处都在秋收大忙，但战争爆发后，为了了解报纸报道的战争消

^① 地主的暴力组织。

息，五六个佃农，把镰刀别在腰上，也不脱草鞋，把身子斜歪在土间炕席的边沿上，听人读报。

“要是拿不下满洲来，这个小小的日本，就很难维持下去喽！”

那位读报的人，学着从前的老人，故意撇腔拉调地读着，还时常嘶嘶地抽气。

“隔壁的山本君，一到镇上，就到那家叫芳华楼的中国馆子去吃中国面。以后可不能再让他这样做了！”

在角落里抽烟的佃农，一本正经地问：“是中国面吗？”然后又自己回答了自己：“是啊！”这些人中间，有刚从军队复员回来的佃农。

兼一郎故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插嘴说道：

“满洲那地方可真叫冷。所以，听说兵也都是从东北^①和北海道这些冷地方派去的。听说邻村砂田村，有三个人已经接到了待命出发的命令了！”

大家瞟了兼一郎一眼，蓦地都不言声了。和服兵役有关系的人，脸孔都稍许变了颜色。一个叫今村的年轻佃农，平时总喜欢半开玩笑而又带点煽动性的谈论战争。这时他问道：

“小兼，当真这样？”

接着，他低声说：“象我这样的，很可能是头一个了。”

最近，在地里把割好的成捆稻子，抱向畦埂晒稻架上摊开的时候，一天之内就听到卖号外的人响着铃铛跑两三趟。孩子们煞有介事地跟在后边乱跑。每次佃农们都是挺直腰站在地里，目送他到看不见影子为止。

① 日本的东北地方，包括福岛、宫城、青森等县。

兼一郎听说，吉井老师为了“慰问金”的事，同校长吵起来了。校长让吉井老师把村公所送来的二寸见方的“慰问袋”发给学生，用它来募捐。袋子上面写着：“为了慰问在严寒的满洲作战的士兵，捐献一分两分钱吧”。

吉井老师说，面临这种歉收局面，根本就谈不上缴什么慰问金。她心想，她是无法把袋子交给孩子们的。因为这些孩子中午带不上饭盒，也吃不上早点，已经请求取消体育课了。

“你说根本谈不上什么慰问，这是什么话！”校长忿忿地说道，“现在不正是日本国民，无例外地捐献一两分钱，用实际行动来显示国家总动员的时候吗？！”

吉井老师心里想：一切悉听尊便。

校长把全体学生都集合起来，谈战争问题。因为讲的是打仗的事，小同学们都听得特别起劲。但当最后谈到了“慰问金”，学生们的态度骤然改变，哇啦哇啦嘈杂起来了。

第二天，只有十来个学生拿来了里面放了钱（哪怕是块儿八毛）的袋子，吉井老师把袋子交给了校长。

“怎么，才十几个人？”

校长怔疑地一忽儿看看慰问袋，一忽儿又看看吉井老师的脸，然后说：

“这多丢脸，怎么好意思拿到村公所去！”

然而，农民们却希望战争爆发。他们以为打起仗来，首先市面就会繁荣起来，大米和小豆等都要涨价。同时，还想，满洲地大物博，不付分文就可以搞到几千亩地。因为大家都挤在如此狭窄的日本国土上，争争吵吵，所以才都穷了。假如把满洲据为日本所有，大批地去人，日子就不知要松快多少呢。仿佛那么一来，佃农们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拈来足以安居乐业的土地似的。

人们都把他们从前从内地移居北海道来时，曾经抱过的同样幻想忘得一干二净了。

农会散发的传单，详细地写着：战争是大地主和大资本家为了××××××××发动起来的，而且通过战争，对我们工人和贫农实行各种××××××××。但是，还没有人懂得其中的道理呢。

四五天后，村公所对在郁秋别煤矿做工的神田和到镇上碾米厂工作的石山两人，发出了“禁止外出命令”。神田和石山都是每天去做小工，借以勉强糊口的。

“对老爹您来说，这实在是一件伤脑筋的事！但是，事关全村的名誉，也只好死了这条心吧！”

村公所的勤杂工送来了那张命令。神田的父亲由于突如其来，惊呆在堂屋门口了。勤杂工也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只能这么说着。儿子在郁秋别上班，还没有回来。

“你这里虽然也困难，但石山那里，除了老婆，还拉扯着个娃娃呐！……唉！……”

勤杂工这么说着，扑楞扑楞地晃着脑袋。

当人们知道对神田他们两人发出“禁止外出命令”后，整个村庄都骚然起来了。要吉公开出面进行活动。他表示，不论是为了摆脱目前这种极端不景气的局面，还是为了在更加牢固的基础上重建日本，这次战争都是必要的。因此，所有人都必须为此而团结一致。于是，他在青年团的集会上和复员军人之间奔走，为神田和石山的家属募款。

但是，同服兵役多少有些关系的人们，都开始提心吊胆了。特别是，这些人几乎都是自己一个人做工勉强养活一家人，如果当了兵，留在家里的人，第二天的生活就马上成问题。这村有三

个人正在旭川师里当兵。在他们入伍时，开欢送宴会，还打着旗子到车站送行，但被夺走了两年劳动力的家属，却过着惨不忍睹的生活。如今，人们把他们的家属也都给忘记了。不仅如此，由于这些家属生活困难，到人家家里走动的时候，总好讲些“别扭”话。因此，人们也同他们日渐疏远起来了。去当兵的人，从前在村子里的时候，为给地主创造地租而被迫天天劳动，在刚刚成为一名壮劳力时，却被抓进军队去了。说什么这是“为了国家”，哪有这种“为了国家”让全家都过着乞丐一般的生活的道理！这些家属一到播种和秋收季节，都跑到村公所去请求，作为特殊照顾，让自己的孩子回家一趟。不管怎样，总还能指望在两年后回来。然而，一打起仗来，唯一的劳动力就很可能被打死。

要吉们的青年团和村公所、学校等越是闹腾，那犹如铅一般沉重的阴影就越加压在佃农的心头，虽然暂时还没有表露出来。神田的小弟弟，平时同吉井老师就比较接近，有天哭着去找老师。父亲是关节炎，哥哥一旦应征，家里就没有人去“挣钱”了。神田的弟弟问老师：您不是教育我们，人和人之间不要打架吗？但为什么偏偏要打仗呢？这孩子几次三番对老师说：“老师，请您别让仗打起来啊。”

在发出“禁止外出命令”的两三天后，果然给神田送来了“红纸”^①。就在这一天，河原田等人带头，决定召开农会大会，讨论歉收对策。

山馆的家住在沼尾村北头。因为是自耕农，家里布置得比较整洁。

① 日本军队征兵入伍的通知单，因为使用红颜色的纸，故名“红纸”。

平时开会，到会的人数并不多；但由于眼下歉收，凡在农会拥有会籍的农民全都来了，这是不常见的。在黑黢黢的大街上，两三个灯笼摇晃着过去了。走过桃内川河滩，就听得见很晚还在洗马的哗哗声音。

“你好！上哪儿去？”

途中不断碰到从镇上回来的人。

“到农会开会去。今年的收成也不知是咋搞的！”

“唉，说的是啊！怎么办呢？求求你们给想些办法，改变一下这个处境吧！”

对方谈着收成的事走过去了。有人还说：“我也担心啊，不知农会能不能拿出什么办法来，我也想去参加会，看看！”

河原田等人同兼一郎磋商的结果，认为这次的事，即使看着不管，也会发展为全村性的问题。他们根据这种分析，向全村农民发出了号召书。号召书呼吁：不仅农会会员要到会，而且一切人都应参加大会。过去，在农会会员和非会员的佃农之间，甚至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敌对情绪。而且，在全村佃农中，没有加入农会的比率也是相当大的。无论是为了尽快消灭这个差距（这是兼一郎回沼尾村后，挂在嘴边反复说着的一句话），还是为了“争取农民的大多数”，只要做出最大的努力，在歉收这类问题上，是能够召集全村农民开一次所谓“农民大会”，和没有组织起来的佃农团结一致，成立争取完全免缴地租和勾销欠款的斗争委员会，在全村把斗争开展起来的。这次大会必须作到这一点，而且也能够作到这一点。这就是兼一郎的意见。

当前，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日趋困难，同资本家和地主的对立也愈来愈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经常地把大多数人团结在自己周围，在今后的斗争中就绝对不会取得胜利。兼一郎

之所以没有把工作局限于农会的狭小范围之内，而计划召开“农民大会”，以及成立“俱乐部”等等，无非是为了经常把没有参加农会的佃农们，团结到自己的周围来，并通过这些活动，大量地吸收他们参加农会。

佃农已经把山馆家里那间镶着大火炉的堂屋，和连着的另一间屋子，挤得水泄不通。没有加入农会的人，或者是站在土间，或者是呆在后面的地方。沼尾村派出所的警察和镇上派来的五六名警察，每隔一小时换一次班，轮流守在那里。山馆不知到哪里去了，现在还没有回来。因此，会等了好久还没有开起来。警察不时把佩剑弄得叮当乱响，经过佃农的身旁走出去。从来没有参加过农会“集会”的农民，听到这声音，就忐忑不安地朝那里瞅一眼。

“你老兄那儿，这次收成也不怎么样吧？”

“嗨，连三成都不到……”

“怎么样！最近我都懒得下地了。”

坐在炉旁那位四十开外的佃农，全身散发着刚刚割下来的稻秆的气息。

“真是的！要不是为了这个，庄稼人在这最要劲的关口，参加哪门子会！”

坐在窗旁那个把脑袋理成漂漂亮亮的二平头、但脸膛却晒得黑不溜秋的小伙子，不时把眼睛溜向坐在斜对面的吉枝那一边去。

“我说，那姐儿和她哥哥，到底是怎么搞的？”

“听说一回家就同要吉动手动脚地打架，可当真？”

“嗯——？你瞧，那姐儿，在咱村还数她顶俊呢！”

刚好这时，吉枝穿过人群，注意到这两个人一边贼头贼脑瞅

着她，一边说着什么。

河原田他们青年部(?)的人，深入到群众中去，留心地倾听人们的谈话，并且通俗地讲解有关歉收的事。去郁秋别煤矿做工的那些人，到的最迟。他们同佃农不同，弄得满身机油味，脸孔灰青浮肿。他们在每天割稻子晒得黝黑的农民中间，一眼就可以识别出来。

“还没开哪？”

“怎么搞的，山馆先生呢？咱们早上起得挺早的，不能早点开吗？”

“庄稼汉自古以来，就是起早摸黑的哟。”

这么一说，那一堆人就哄堂大笑起来。

“俺那里连南瓜都没收到什么！缴了租子，这一冬吃的还没着落呢！”

“土豆也不怎么样呀。可是，你看看德山老爷和平贺老爷的地，不打六成，少说也得打五成！还是他，稻种好，肥料也好……”

“今年打算省下租机器的一笔开销。可这么一来，好象又倒退到从前在内地那个时候的情况了。用长棒子脱粒，或者用磨来磨。”

“我们家也是一样哩。这么一来，身子骨可疼了！”

说着，他就舒展了一下身子。腰骨和背骨咯咯地响出了声音。

“喂，该开会啦，该开会啦！还磨蹭什么！”

有人在后面大声嚷着。连土间里也挤满了人。屋外虽已很冷，但室内却充满人们的热气，因此，把大门敞着不关。隔岸农民的牛在哞叫，这家屋后的牛也遥相呼应。

“山馆不在，河原田也行嘛。”

这时山馆正好揩着汗走进来。人们知道他来了，就立刻嘈杂起来。

“哎呀，来的太晚了，对不起！”

因为不全是农会的人，他才这么客气着。他一进堂屋，穿西装的警察就把他喊去，说些什么。他用毛巾一边揩脖颈，一边口中答着是是地听着。

“那末，‘全农’沼尾村分会大会现在正式开会了。”

佃农们打扫嗓门，咳嗽起来，正了正身子坐好。

当会议进入讨论歉收对策时，人们蓦地紧张起来。

山馆大致介绍了一下沼尾村的歉收情况，然后听取到会的人的各种意见。然而，佃农们却绷着面孔，一言不发。

坐在人堆里的一个青年部的人站了起来说：

“正象刚才说明的那样，一段地平均打六七斗。那末，现在我们假设，把一石的地租来个大幅度地减免，就算它是三斗吧，只靠剩下的三斗，能熬过这一冬吗？从前打二石，缴完地租还剩一石，靠它还顶不下来呢。想到这儿，这回无论如何，非得全部免缴地租不可……”

还没等他把话全说完，人们就吵嚷着说：“啊，全部减免！”
“全部减免！”

“提出全部减免，也许有人会吓一跳。但是，就算全部减免了，首先，大家伙靠那么五六斗就能对付过去了吗？此外，还得付肥料费和黄酱钱呢！”

会场稍趋平静后，佃农们提心吊胆地面面相觑。一位四十岁上下的佃农，嘴里叼着个旱烟袋，有点生气似地嘟囔着：

“在这儿开会的不都是庄稼人吗？谁还不知道这些个！”

说话的是兼一郎的父亲。他接着说：

“俺那儿有的地块连三成都打不到。俺家闺女虽说是上了郁秋别，但这一阵子咳喽咳喽地直咳嗽，外加上那小子也一个子儿没带就转游回来了。俺想，就是全部减免，欠的那些零七杂八的钱，今秋就是想还，连一分钱也还不起呀。”

因为老年人开了口，于是人们把抑压在心里好久的那股子情绪，一下子都爆发出来了。

“说的是啊，就连借的钱也都还不起啊！”

“或者是拖一年，或者是干脆勾销，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不管怎么着，勾销，未免想的太美了吧。”

“怎么能说想的太美？咱们这些人不就是因为没钱，才明明知道吉田堂在牟取暴利，但还是不得不用他那高价肥料，地主也……”

“说的对！就是这么回事！”

还没有等他把话说完，人们就从旁打断了他的话。

“说什么禁止出口的黄金^①，一打起仗来就会上涨，市面也会跟着繁荣起来，但真正涨起来的还不是肥料、农具、黄酱和酱油吗？——米价涨倒是涨了，但那是咱们把大米卖出去以后的事。从今以后会尽让咱们买贵东西呀！过去也是如此。咱们欠人家的钱不都是这么借来的吗？勾销欠款是理所当然的事！”

讲话的是河原田的伙伴。

“听说吉田堂，由于刚才所说的什么解除黄金的禁令，又是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日本政府面临金融危机，通货膨胀，在一九一七年九月，追随美国，实行禁止黄金出口，企图以此稳定经济。但结果反而使得日本的商品价格提高。

什么禁止的，春天卖剩下的肥料，自然地涨了百分之三十的价钱，赚了不少钱。如果真是这么回事，傻瓜蛋还是咱们这些不得不买那些肥料的人啦！”

经他这么一说，大家想：的确如此。

“同时，一打起来，税金也得多起来！”

兼一郎在旁观察，觉察到：多少有些土地和为了贴补生活而佃地的人，还是不主动开口。把地留给老婆孩子种、本人去做临时工的人，和不满一两町步（北海道和内地的佃农，租的地大小是不同的）的人，把话送到了点子上。刚开始，大家听到警察佩剑的声音，讲讲就突然中断话头，但到后来，那些如果不做出某些决定、从第二天起首先吃饭就成问题的佃农，都变得郑重其事。会场的气氛急速高涨起来。

吉枝由于兴奋，脸上现出微微红晕，不时地朝河原田和兼一郎那边望去。

“好吧，看样子大家把意见都发表完了……”

河原田说着，摇晃了一下身子。

“诸位都看到了，参加今天大会的，非农会的人比农会的人还要多，可以说，今天的会变成了全沼尾村的‘佃农大会’了。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得出来，歉收问题不只是农会的事。再说，免缴地租也好，勾销欠款也好，事实上，假如没有全村所有佃农团结一致的斗争，单靠农会，无论如何也是不会取得胜利的。因此，我看我们最好借这个机会，加入农会的就不用说了，从一般佃农中间也选出几名代表，为这个关系到我们所有人的死活问题而进行斗争。大家看怎么样？”

吉枝立刻横眉竖目，环扫了一下人们的脸孔。

人们都发出了“嗯——？”的一声，然后开始讨论这样做到底

好不好。兼一郎的面部表情似乎也很严肃！

“好不好呢？”

蹲在兼一郎旁边的那位没有加入农会的佃农，一边揉着粘在手心裂口上（因为割稻子裂了口子）的饭粒，一边这么问着。

“如今也只能这么着！”兼一郎无法控制他的兴奋心情，不觉用力地这么说着。

“如果咱们都在这时候犹豫起来，哪管是歉收，他还是毫不留情地叫你缴租子，欠钱不还款就扣大米，那才叫够呛呢。”河原田再加一把火。

那些没有加入农会的人，最初多少还表现有些踌躇，但思前想后，除此而外，无路可走。大家的想法都倾向到这边来了……

这时，一直没开口，时常紧闭双目，仰脸朝天的山馆开腔了：

“我的意见，还是比较稳重一些好。这么干很象是暴动……”

兼一郎和河原田顿时刷地变了脸色。吉枝也不觉竖起了她一边的眉毛。

山馆一开口（不是别人，而是山馆），大家都想听听他到底要说些什么，都静了下来。

“现在，日本军队正在那严寒的满洲艰苦作战。我认为，这个时候我们国民在国内，不要这样起哄。当然，只是这么说几句，乍一听，好象对于眼看着就要饿死的佃农的生活不关心似的。实际上……”

山馆讲到这里，又仰脸朝天，闭上了眼睛。

“实际上，我们之中可能有人已经听说了，政府为了救济歉收，光是北海道一地，就拿出了六百几十万块钱来，准备兴办土木建筑事业。同时，也正象报纸上所说的那样，在东京和其他地方正在开始募捐了。不仅如此，令人感激的是，天皇还要赏赐钱

呢。因此，我个人认为，现在是不是先把这笔钱用起来，尽量干得稳当一些比较好。地主方面，这次也还是相当慎重的。因此，我们通过讲道理的交涉，肯定会得到圆满的解决。至于对策，希望大家交给农会来考虑。怎么样？”

狗杂种！被收买过去了！河原田这么想着：山馆被警察、村公所和要吉他们给“吓倒”了，“笼络”了！

“委员长刚才的发言，听起来似乎头头是道，但我认为是非常错误的！”河原田不觉发急了，声音很严厉。

山馆把身子转向他那边去：“什么地方错了？！”

“首先，说什么要发各种救济款，过去也有过这方面的先例，我们贫农每个人到底能摊上几个，这，大伙儿都是一清二楚的。因此，过去一次也没有救济过。再说，上边搞的土木建筑事业，将会借着权势，想方设法叫大家去干苦差事，这也是很清楚的。而且，就连这个也不过是搞上那么个把礼拜十来天，糊弄一下而已。如果以为这样就能熬过今冬，那是瞎扯淡！不仅如此……”

河原田由于按捺不住愈来愈强烈的愤怒，常常口吃。

“不仅如此，地主们一定把发救济款这件事作为最好的借口，逼着缴大量的地租，或者是查封咱们的东西，或者事先同衙门联系好，作为还债，把救济款抢走。这也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实际上，在内地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不，不仅如此……”

他的嘴唇在颤抖。

“不仅如此，地主们还同青年团、复员军人勾结在一起，拚命叫喊什么战争啦，战争啦，企图把人们的注意力都转移到这方面来，来糊弄过去。战争打起来了，日子不但不会好过，物价反而会更加上涨。听说神田和石山，今天都接到了动员令。这样棒

的劳动力被征去当兵了，今年冬天……”

“逮捕！”

便衣警察一喊，警察立即扑向河原田。一名警察从后面抱住了河原田，用力掐他的脖子。接着，他的脚被另一名警察下了个绊，马上倒翻在地。他一边受着这样的袭击，一边在叫喊着。于是警察用鞋底钉着钉子的皮鞋狠狠地踩他。

人们都站了起来。

这时，镇上青年团的十五六个人，拿着棍棒或手杖，由门口闯了进来。在这一瞬间，兼一郎才觉察到：一切都是有计划的他认为失败了！

吉枝脸色灰白，痉挛着。她紧紧拽住了兼一郎。当他们正朝后门跑去的时候，吉枝“啊！”地叫了一声，惊呆得站住了。兼一郎问：

“嗯？”

“啊，哥哥在那儿！”

这时，灯泡砰的一声被打破了。

酒酣耳热，开始轮流出节目了。从前在军队呆过的校长，摸着胡须，唱起了《这就是祖国的》这支歌曲。每当唱完一段，他就一定摇着头，自言自语地加上一句：“嘿，大喜啊……”，然后继续唱下去。

神田和石山穿着复员军人会分会长替他们两人准备的不合身的礼服，低着头眼睛朝下，拘谨地蜷缩双膝，坐在那里。前来参加宴会的青年团员，从镇上来的村长和村里的人，刚开始还同他们两个说些正经话，等喝醉以后，就把他们两个丢在一旁，三三两两围坐一起，随心所欲地高谈阔论起来。同时大口喝起酒

来。妇女们在堂屋和厨房之间进进出出。

只有时钟在滴嗒滴嗒地响着。

校长一个人还在那里摇头晃脑，不时地一面唱歌一面说：“嘿，大喜呀！”

校长捋了一下他那些干草般的胡须，睁开了蒙眬的醉眼，向四周横扫了一下。当他发现神田的父亲，紧挨着自己身边，闷声不响，把酒杯直往嘴里送，就说：

“我说，神田！光荣得很哩！你是本村最幸福的人啊。这种报效国家的机会是很难得的哟。是不，神田！”

接着，他把酒壶高举到太阳穴旁边摇着，大声叫嚷，“喂，怎么没酒了？”

“哦，真的！承蒙诸位这样欢送……”

“这是怎么说的！喂，神田君和石山君，你们也听着！我说，以后的事你们都不必惦着！都由我们去想办法！复员军人、青年团和地主老爷们都会照看的！”

校长一个人在大声说着。

没有喝多少酒，干坐在那里的两个人，鞠躬说：

“那末，就拜托了……”

石山的年轻妻子，把婴儿放在膝上，坐在人们的后面，不时用手背揩眼睛。她想：象现在这样热热闹闹的时候还好，但散席后，自己一家子人该如何的灰心丧气啊。当她望着那从未穿过礼服、而现在穿着别人的礼服坐在那里的丈夫，就觉得：孩子他爹心里可能比自己还哭得厉害吧。孩子他爹，与其说是惦记孩子，感到和自己的妻子难舍难分，不如说是在担心，从明天起两

个人的日子到底怎么过下去呢？……

“喂，喂，提起精神来！”

地主福田老爷那位退隐在家的老太爷，看到这副情景，招呼着石山的妻子。

“眼泪可不吉利呀！不吉利哟！”

石山的妻子赶紧擦了擦眼睛。

这时，要吉一伙人咕咚咕咚地走了进来，宴会马上热闹起来了。他们好象已经在什么地方喝过酒了，口口声声地叫喊着：“我们刚收拾过卖国贼！”他们闯进山馆的家，但警察却没有把他们抓走。

人们从四面八方把酒盅递向石山、神田以及他们的父亲。不大工夫，神田的父亲就烂醉如泥。一直郁郁寡欢的父亲，现在好象完全变了一个人——突然喧闹起来了。

“太高兴啦，太高兴啦！这样很好！”

校长拍着膝盖，然后抱住神田父亲的肩膀。

要吉一伙人放声大唱“欢呼声中上战场”^①。有关节炎的父亲，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弯着腰，滑稽地挥动两手。神田瞅了一眼后，不作声地又把眼睛朝下。

“嘿，嘿！”神田的父亲用手打着拍子，口中喊着“真棒，真棒！”哈哈大笑起来。

“咱那小子是光荣地出征了！别看我这副德行，年轻时嗓门还不错呢。来一段怎么样？”

大家齐声鼓掌。

“可是，我也只会唱‘秋田小调’^②呀，行吗？”

① 过去日本送军人上前线的军歌，此为其中一句。

② 秋田是日本东北地方的一个城市，秋田小调是该地的民间小调。

“好，好！”

站在厨房干活的妇女们，也把手搭在布带上，跪在堂屋门框上听着。

坂田山上，
虾和泥鳅，
摔起跤来了噢——

“好好！”

“哎，喘不过气来啦。”

虾为什么弯着腰哪，
因为它和泥鳅摔了跤哟，
被人家摔个仰巴叉嗽，
——就把腰摔弯喽！

“呀勒唏呼嘿呼嘿，嘿！”

最后，大家都打着拍子，齐声加上一句。妇女们咯咯地捧腹大笑不止。

神田的父亲又站了起来，“嘿，嘿！”地喊着，弯着腰，用滑稽的姿势摇摆着手。接着又哈哈……大笑起来。他一边笑着一边在原地附近打转。大家也都喝得酩酊大醉，也跟着一齐哈哈地笑了起来。

一直由着嗓门拚命哈哈……大笑着的神田的父亲，一边滑稽地摇手弯腰，一边打着隔，咯咯地耸肩，突然放声大哭起来了。最初，大家还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反而笑得更欢了。然而，马上就发觉他并不是在开玩笑。

人们都惊呆得默不作声。于是，全屋顿时鸦雀无声。

神田的父亲仍然在屋中间，如同耍猴戏的猴子似的，照旧团团转游，还在呜呜地哭着。人们好象都忘记了要说些什么，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

吉井老师听到这哭声，好象有什么东西突然从背后泼过来似的，不觉捂住了脸。

“哎，哎，哎——”

校长第一个抱住了正在团团转着的神田的父亲。

六

必须马上采取对策。河原田一两天之内也可能回不来。兼一郎叫吉枝带来青年部的两名伙伴，然后就匆忙追过了路上三五成群走回家去的农民。虽然这两天夜里很冷，但那吹在兴奋得通红面颊上的冷风，却使他感到很惬意。

他一直担心可能要发生的事，却没料到如此迅速而有计划地来到了。然而也好，这样倒是一目了然了。他看清了：有些人平时把自己乔装打扮成如何站在佃农一边的样子，但一到节骨眼上，就突然变样了。只是，如果对今晚被搞得一塌糊涂的集会置之不理，就会挫伤好不容易才调动起来的佃农的积极性，而使他们变得畏缩起来。兼一郎下定决心，即使今晚搞个通宵，也要把隐藏在捣乱会场幕后的真相揭露出来，以便使那些被搞得糊里糊涂的佃农们，明确今后的出路。同时向他们指出：如果现在不马上行动，今后将寸步难行。

在一起碰头的那三个人（吉枝也参加了），都同意这样做。其中一人，从耳朵到下颏的皮肤都擦破了，因为他一下子被推倒

在土间的地面上头。

兼一郎在写“稿”。伙伴宫本坐在一旁，立即把它刻到蜡纸上。水原在和油墨，准备印刷。

屋外一片寂静。因为过于宁静，无论如何小心翼翼，油印机还是哐当——哐当……地响着回音。因此，吉枝去到外面，围绕屋四周巡视了一圈。她兴奋异常。当她把下巴往里一收，静谧的黑夜里，响起了牙齿嘎吱碰撞的声音。她竖着耳朵注意周围的动静，蹲下来小便。

她悄悄走进屋来。兼一郎的父亲和祖母睡在有火炉的堂屋里，吉枝跨过他们的身上回来了。富美因为身体不好，最近两三天住在郁秋别的熟人家中，从那儿直接上班。

“没事吧？”兼一郎望着走进来的吉枝，轻声问道。

“没事！”

“哦……”兼一郎说，“小枝，农民家睡得太晚，人家要奇怪的，请你把那件棉袍挂在窗户上。”

她把团在墙角的棉袍取了过来，寻找窗上的钉子。从脏得发亮的领襟里散发出酸不溜的男人的汗味。

兼一郎写完一点，就低声念给他们三个听，把难懂的和讲空洞理论的地方改掉。然后交给刻蜡版的宫本。宫本立刻刷刷……地忙着刻到蜡纸上去。

“我说，要吉象今天这样对待佃农和穷临时工，还管自己叫社会主义者，他不觉得可笑吗？”兼一郎舔着铅笔说。

吉枝不知不觉地低下了头。

“可是那个山馆，他和要吉不同，他没有勾结青年团、衙门和警察，相反，他还以为自己是搞农民运动的社会主义者哩。但从今天发生的事来看，这两种类型不同的社会主义者的步调却是

那样一致，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太复杂了！农民简直不大容易识别他们之间的区别，真的！”

宫本用铁笔咯吱咯吱地搔头皮。

“通过这回的事就能识别了。地主们一定会趁着这个乱劲逼租子，或者把救济款作为诱饵，来骗取租子。这么一来，农民就该啃树根了。到那时就懂罗。”

“那当然……”

兼一郎一边写稿子，——当他需要停下来想一想时，他就断断续续地说话。

“我啊，在东京和工厂联系时，发生过一两次罢工。工人的日薪有多有少，年纪有老有少，但最多也不过是在劲头上有些不同罢了。但是，农民呢，因为和土地紧密相联，想法就各有不同了。正因为留恋土地，就是斗争性最强的贫农，在节骨眼上也还会发生动摇哪！”——

“确实这样！自从听老兼讲一些事以后，我就留心观察，也就开了窍。刚才，河原田讲话时，不就是这样的吗？”

“对。所以，在农村，大家对山馆和要吉那些人讲的话都感到很害怕。我们首先必须在群众中，把山馆这些人孤立起来。”

“完全正确！”

“最近的《农民斗争》，几乎是每隔一行就写着：要同法西斯分子、社会法西斯分子进行斗争哪。眼前，要吉已经变成法西斯分子了。至于山馆，今天晚上再清楚不过了，他就是个社会法西斯分子！”

“这些词倒是都懂，但对自己身边的这帮鬼东西，却麻痹大意了！”

手里握着油辊的水原，逗趣地说。然而，他说完话后，似乎深有感触，咬着嘴唇。

吉枝一边把印好的传单，一张一张地弄整齐，一边听着他们讲的各种事，心情很沉重。一想到把今天的会搞成了那个样子，而重大责任却在于自己的哥哥，就不知所措了。兼一郎在这件事上没有对自己说什么，正因为如此，她更加感到问题的严重性。

“我怎么办才好呢？”吉枝头也不抬，砰地冒出了这么一句来。她心里很不是滋味！

“嗯？”三人不约而同地瞅着她。

“哥哥干了那样的事，我没脸见人呐！……”

“就为了这个？”兼一郎笑了笑，漫不经心地说道，“小枝，可得比旁人更加把劲地来搞这个工作呀！”

其他两人也说：“是啊！”

兼一郎接着说：“这篇文章怎么样？是不是有点罗嗦？”

接着，又开始继续念稿子。

吉枝摸不着头脑。她不觉睁大眼睛凝视那位兼一郎。于是，她猛然为自己一直想不开而羞愧了。同时，她平时虽然觉得兼一郎有些令人不可捉摸，现在倒对他越发产生了连自己都感到莫名其妙的信任。

“农民想，打起仗来就好了，真的如此吗？说什么市面会繁荣起来，事实上繁荣了吗？首先写这些事。其次，再把神田和石山的事也写进去。不得不把唯一的劳动力也送走的家属，真的希望战争吗？使我们从明天起就流浪街头的战争，能说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吗？如果以为这只是神田和石山两个人的事，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个地方要写黑体字才行哪。……总之，从以上这些

例子就可以看出，战争并不是为咱们穷人打起来的，而是因为资本家和地主们在国内无止境地进行剥削，实在没有什么油水可榨了，就进一步想把弱小的××××据为己有，继续进行剥削。为了这个目的，就把大批工人和农民×××××。因此，必须使农民懂得，农民的这种极端的贫穷，决不是和战争不相干的。而这次发生的事，正是促使一无所知的农民醒悟过来的极好机会。”

“在喊万岁！万岁！虚张声势的时候还行，但——这象是昏昏沉沉喝醉了似的……”

“我们现在撒传单，在一片叫嚷战争声中，人们或许不以为然。但就象老子责打儿子，或者象喝冷酒那样，以后的作用可大着哪。”

“对！但是，再也没有比战争这件事，更难打通农民思想的了。”

夜色更浓。油印机重复着有规律的响声，催人欲睡。睡在隔壁房间的父亲，不时咯吱咯吱地咬牙。

“最后，宫本漫画画的不错，你画一张山馆和太田要吉，同警察和地主德山他们手牵手搞得很亲热的画吧。”兼一郎说着。

宫本手里握着铁笔，用拳头捶着发木了的右肩说：“这，太好了！”

每天清晨，都是满地白霜。

辽阔的石狩平原洒满了朝阳，闪闪发光。一群寻不着食的乌鸦落在村里。

冬天即将到来，沼尾村的佃农们，要开始准备过冬了。但是，冬初头两个月，谁家的粮食也不够吃。然而，农民象败下阵

来的牛一样，一动也不动了。兼一郎他们接二连三散发的传单，到处和要吉他们“现在是团结一致共赴国难的时候了！”的宣传，发生冲突。同时，警察也为了传单的事，在到处搜捕宫本和水原。因为兼一郎还没被注意，他们两个就藏在兼一郎家的里屋，有时也躲在邻村，继续工作。传单和指示都通过留在农会的年轻书记，很快就散发出去了。当他们请吉井老师替他们进行联系时，出乎意外地她欣然接受了。她说：“这样，我才觉得，多象是赎回了一些我犯的罪似的。”因为，她为自己在学校讲那些违背自己良心的话，正在痛苦和烦恼。

谁也搞不清楚，每个人到底能拿到多少救济款，为救济而拨出的土木建筑费又到底有多少。但地主却已经开始把这些作为诱饵，挨户催租子了。而且，地主还大肆散布关于歉收的风声，用以抬高米价，然后再把米卖出去。沼尾村的佃农后来才知道，地主们还去北海道公署请过愿，诉说他们如何困难，并请求哪怕是走一下形式也好，最好能够发点救济款，以便他们能够收到地租。人们还进一步听说，当他们的要求被拒绝后，他们甚至还威胁说：“瞧吧，发生了暴动怎么办！”

佃农们发觉自己上当受骗了。这才醒悟到，当时河原田被警察带走，原来是为了“我们”。不仅如此，警察也在搜捕和河原田一道工作的宫本和水原，他们现在藏在什么地方，也不清楚。然而，佃农们通过经常收到的传单（《消息》），认识到：“他们处境无论如何困难，也总是一心想着我们。”佃农们拿出了一年戴不了几次的花镜，慢慢地出声读着《消息》。

（那时，我们若是冲向村公所或德山老爷家去就好了！）

报纸每天都在连篇累牍地报道着“歉收”的消息。然而，人们都在想：地租就那样轻而易举地被讨走了。要是能有这笔钱，

这一冬总还能对付熬过去的。用不着说，收成只有三至五成，当然是歉收，但只要能把地租全免了，吃饭总是不会成问题的。传单上写着：“他们卖力宣传什么歉收，企图要我们佃农相信：目前的悲惨局面是自然条件和气候造成的。我们切勿上当受骗啊！”人们读了以后，都认为说的很对。

这段时间，山馆也到各处游说：“完全如此。然而，满洲是我们日本的生命线呀。假如能把那地方拿下来，我们现在的贫穷情况就自然会变好起来。所以，我们在国内闹事，是不大老好的。”但是，最近，佃农们由于目前的穷困处境，终于对“人品高尚”的山馆也开始不满。

至于要吉，他则说什么目前国家的“经济困难”，已经到达不是用简单方法就可以得到解决的地步了。“全协”也好，“全农”也好，“劳农大众党”也好，根本就没有实行自己所作的诺言，这就是最明显的证明。依靠左派政党是不行的。我们必须打倒横征暴敛的金融资本家，由国家来管理全部生产，这样才能安定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因此，那些害怕“全农”的佃农们，和稍微有点土地而又随时受德山等欺侮的农民都洗耳恭听要吉的意见。

一到大雪天，人们都坐卧不安起来。北海道的冬天是漫长的。农民因为没有大米，而尽吃土豆和南瓜，连手掌都变得焦黄了。稍微干一点力气活，立刻就出汗，上气不接下气。然而，就连土豆和南瓜也很有限了！不仅如此，拨下来的救济款，果然不出所料，都被充任村议会议员的地主、镇上的肥料批发商和山货铺等，预先采取措施，把它作为欠款的抵押，硬给扣下了。但是，警察和复员军人分会，以“正赶上这个年头”（实际上是怕万一出事）为理由，居中斡旋，每个人总算领到了一点钱。平均一个人领到七块钱。其中，也有人以欠款超过五年为理由，全部被扣了

下来。

夜里，贫穷的佃农们，打着灯笼，来到设有农会办公室的山馆家里。人们心里都想，即使是干坐在家里一步也不走动，只要一下雪，还是同样得饿死。与其如此，还不如现在就冲向村公所，或者是冲向德山那堆满粮食的仓库去。山馆拿不出什么办法来，只是重复那不知说了多少遍的一句话：“士兵在前方岂止受这样的苦啊。”因为始终没有结果，最后，佃农们终于当着山馆的面说：“若是老河现在在这儿，肯定会替我们想办法的。”

正在这个时候，郁秋别煤矿在年底解雇了工人……

煤矿公司根据各公司之间的协定，对出煤量实行一定的限制。目的是为了抬高市场上的煤价和防止贮存煤造成耗损。但是，冬季来临之前总是很忙的，所以这时总要适当增加一些人的。今年刚巧碰上战争，这段时间比起往年反而是更长了。所以这次解雇，给沼尾村的打击，比上次被完全骗走地租还要大。因为到郁秋别煤矿做工，挣块儿八毛的，对因歉收而走投无路的佃农，和没有佃到地的临时工来说，是唯一的生活来源。正是因为有这个郁秋别煤矿，所以，过去无论景况如何紧迫，也还是认为车到山前必有路的。如今算完了。

从前，没有把从煤矿挣来的钱看得怎么了不起。现在，对于儿女们的零用钱也卡得很紧。如今，在村里是手无分文就寸步难行。而且，这次还给没有粮食的家里平空添了空口吃闲饭的人。

祖母一看到富美的身体已彻底垮了、弯着腰回到家里来的样子，就躲在黝暗的墙角，啜啜地哭起来。

“兼一郎！”

父亲坐在炉旁，头也不抬，厉声地喊着。兼一郎正在准备这

次事件的传单。

“我呀，总想你干的都是为了咱们穷庄稼人，一直也就没有吭过声。可是——可是，你搞得也太不象话了！”

富美灰青着脸，从后面的厕所回来，靠墙坐下，呼吸很困难。

“老爹，所以这次啊，我们也要干了，咱们都冲向郁秋别去吧！”来帮忙搞传单的吉枝，看到兼一郎的父亲和往常不同，有点惊讶，来回看着他们俩说，“今天，我们从郁秋别回来的路上，大家商量了一下，决定带上爹娘和兄弟，一起去谈判！”

父亲听了没言声，把火筷子插进炉灰里去。

“唉，奶奶！娘死在好年头，倒是享福了！……”富美悄悄别转身子，闭上了眼睛。

父亲几次象拨浪鼓似地摇头，然后说：

“就冲你们干的这些个，根本改善不了农民的生活。干的不好，农民还会给警察逮去，或者是受伤！我们干脆到要吉那边去算了！……”

吉枝的脸色刷地一下子就变了，她的嗓子不由得哽塞了。她说：

“我哥哥呀，他成了警察的走狗咧！领着津贴呐！为了这个，我才常到这里来的。您说的是什么呢，这个老爷子！”

当晚，人们聚齐后，吉枝首先提出了兼一郎父亲的事来：

“我是这么想的，并不只老兼一家有这种想法呐！”

宫本听了以后说：

“哦，危险性肯定是存在的。可是，据我了解，和这相反，很多人都说：明天不管怎样，也要让被裁了的姑娘和小伙子，站在队伍的最前边，冲向郁秋别去。咱们把村里的警钟也给它敲起来。”

兼一郎听完各种汇报后，和平时一样沉着地说道：

“这个，首先，我们了解到，不管是哪种情况都说明，如今农民已经被逼得无路可走了。也正因为是被逼到这一步田地，所以才产生诸如此类的各式各样的想法。因此，事情要根据明天我们能不能抢先一步，能不能带头冲在前面，来决定这股好不容易才发动起来的、不折不扣的革命力量，是向我们这边靠拢，还是投向要吉和山馆那伙反动派的怀抱中去。”

“就是这样！”

“从实质上说，上次的农民大会是成功的。但当会议要成立完全免缴地租和勾销欠款委员会，眼看把许多没有组织起来的佃农，就要影响过来的时候，结果变成了那么一种惨败的局面。我们必须汲取这次经验教训！当时开会，心里确实没有个明确的想法，那次的惨败就是由这种错误和弱点造成的。”

“还是这么看才正确哩。”平时不大开口的水原开了腔。

“嗯，首先，由于我们估计山馆多少还是接近我们的，因此，没有能够同他进行彻底的斗争。可怕啊，农民今天这个样子，就是这个错误造成的啊。这次，我们必须从自己的正确立场出发，排除万难，实行独立自主的领导。否则，就不会取得胜利。这是我们的切身体会啊！”

宫本边和着油印机的油墨，边说道：“大伙最近似乎也明白过来了。因为咱们这边的人，打那以后明显增多起来了。都公开亮出了自己是反对派的身份。明天一定会进行得很顺利的！”

兼一郎非常重视这次去郁秋别的示威游行。无论是为了发展壮大郁秋别煤矿的“全协”（由于同要吉一伙直接有关系的青年团等进行恶毒的宣传，这个组织没有发展起来），还是为了通过这种关系，以做临时工的农民为桥梁，使人们都认识到，镇上

的工人和农民必须并肩战斗，这次游行是非常重要的。他已经打算好了，准备乘这次机会，把他离开东京时，指示他建立的“农村工会”的架子，首先在从沼尾村到郁秋别煤矿做临时工的农民中间搭起来。在矿山的组织，其后没有什么进展，因而也可能失败。但是沼尾村出去的临时工，这次一定会认识到，建立自己的工会的必要性。

“一定能够搞起来！……”水原把手从前胸伸向后背，咯吱咯吱地搔痒。

“这回发生了这样的事，说不定也许会进行得很顺利呐！”因为是令人深有感触的事，所以，吉枝这么说着。

“和农会有什么不同呢？”宫本深思熟虑地问道。

“最近出现了奇怪的现象，地无寸垅的农民，以及尽出外做工或者打短工不务农的农民，不是越来越多了吗？这样，农民到头来都慢慢变得和工人一样喽。”

“……？”

几个人都拚命想搞清楚兼一郎这句话的意思，把眼睛盯着他。

“都说工人和农民不携起手来，世道就不会真地好起来，眼前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嘛。这决不是出于什么灵机一动，也不是因为这样做比较好办。因此，如果建立了那些农民的工会——哦，也就是农村工会喽，那，它不就成了把去镇上做工的工人，和自己村的农会，连接在一起的桥梁了吗！对小枝她们来说，这就不是什么大道理了，她们一听就懂，因为她们在郁秋别嘛……”

吉枝听后，象晃了眼似的，眨巴着她的眼睛。

“嗯，是不是这样？”兼一郎用村里的土话叮问大家，“所以说，这次的示威游行，意义重大着呐！”

宫本和水原，目前隐蔽在邻村农会会员的家里。所以，最近同那里基础较弱的农会的联系，也变得很顺利了。因此，从这村也将尽量动员一些人去。

为了避免明天在半路上受到阻挠，决定人们分散出村。

“今天我去农会，老山在那里。他说工藤啦，栗原的伍市——认识他吧，就是住在河对面的那一位——还有中田家的小与，他们常常送土豆和蝙蝠牌来，说是请交给宫本和水原呐！”

“——?!”宫本不知不觉望着吉枝的脸。

“——真是使人哭笑不得啊!”水原故意开玩笑似地说着。为了掩饰自己涌向心头的感激，他不住地摇晃膝盖，笑了笑。

“可是，听说在他们每次送东西去的时候，山馆那个娘们儿，总是毫不留情地骂宫本和水原哩。什么间谍啦，卖国贼啦，叛徒啦，什么象他们那样的家伙，最好让警察给抓起来才好呐，等等!”

兼一郎笑了笑说：“出乎意料，她倒是讲的真话!”

“最好把这些都给它一条一条地写成新闻。可是，那个娘们儿现在却在到处发牢骚呐。说什么慢慢地谁也不去山馆那儿玩了；水原他们甩开了山馆，好象在什么地方偷偷摸摸地搞鬼咧……很危险呐!”

“是危险。这不是和警察一模一样了吗?”

“是一样哩。他们不象要吉那样明确地说：我就是这样。正因为如此，才更可怕哩!”

宫本和水原决定不要回去的太迟。把每个人有关动员的工作都安排好了后就散了。

“我去山上、佐藤、金吾和安公的家，然后就象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嗨，我怎么忘了，老兼今天不是还要去郁秋别吗，好

象要吉也去了，可得当心啊。”宫本蹲在黢暗的土间，一边穿胶鞋，一边这么说着。

“是吗？我注意些好了。怎么样，你那里，这样行吗？”

“呃，没问题。”

宫本朝后门走去。他把手刚搭在板门上，好象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把身子扭转过来，然后说：

“那个……无论发生什么事，老兼，你可不能让他们抓去啊！”

“嗯！”兼一郎不由得抑制着他那翻腾着的感情，小声地应着，点了点头。

大家散去后，兼一郎开始做去郁秋别的准备工作。他去郁秋别，是为了同那边的同志进行联系，并送去明天要散发的传单。因为人家还不认得他的容貌，他去是比较方便的。他想：如果要吉也去了，他就必须做好足够的准备。

吉枝问一直坐在炉旁的兼一郎的父亲：“老爹明天准备干嘛呢？”

“家里有不能动弹的奶奶，有已经不值一个大钱的富美，再加上兼一郎……就这么着，这一冬怎么办！明天我也得去……”

“去哪儿？上我哥哥那儿？”

“去郁秋别呗！”

“郁秋别？”

吉枝想，太好啦！于是，她霎时热泪盈眶了。太好了！她不知不觉地把那噙满着泪水的眼睛朝兼一郎看去。

他也兴奋异常。但和吉枝的眼光碰在一处时，他的心就慌乱起来，急忙地侧过脸去。

“这样行吗？”兼一郎背起了那个外面只露着萝卜，里面藏着

传单的包袱。

吉枝故意摆着夸张的姿势，一边上下左右地瞧着，一边说道：“真象！真象！”

“怎么样？小富。”

妹妹躺在被窝里，用她那没有神采的眼睛看了看哥哥，不由得笑了。随即又痛苦地皱起了眉头。

“现在，矿上因为解雇，形势不稳，监视得很严，可不能从泽田村进去。虽然要绕远点，还是从沼别进去好些呐。”

“顺着火车道往右拐，就绕出大道了吧？”

“对。”

“知道了。小枝是找山村、小角、吉井老师，还有那谁吧？你们都一起走吧，因为和妇女在一块更安全些。”兼一郎说到最后那一句，有些不大好意思。

吉枝敏捷地把一切都准备妥当了：“那末，小富，明天来接你啊，行吗？”

富美摇了摇头，对她笑了笑。

来到外面，寒气袭人，不觉浑身直打哆嗦。

黑夜的星空，是那么清澈、高阔，也充满了寒意。兼一郎推着自行车，和吉枝并肩走着。握着车把的手立刻就冻僵了。他一面把手轮流地放在下颏暖着，一面走着。

刚才在家里还那么兴高采烈高谈阔论的吉枝，在只剩下他们两个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反而默不作声了。

“我呀……”到了大道没走多远，吉枝心情沉痛地说，“我连一天也不想再和哥哥住在一块了……身子好象都要腐烂了呐！”

“那也是。要不，干脆搬到我那儿去吧，就象送上门的媳妇那样！”兼一郎说完就放声大笑了起来。

“呃！”以后，吉枝更是好久不再言声，默默地走着。

“生气啦？”

兼一郎又开玩笑，并端详着她的脸。但吉枝没有搭理他。

当他一想起马上就要做的工作，就浑身是劲，好象有些按捺不住了，兴奋得连自己都莫名其妙了。

“我呀……”

“——嗯？”

“没想到老兼原来还是能干这种事的人呐……”她如同自言自语，声音很低。

“嗯？”

“搞这样的运动——”

“我算松了一口气！我还当你要说，没想到我是个开这种玩笑的家伙呐，吓了我一跳！”

“我呀……”

“又是‘我呀’吗？”兼一郎故意逗她。

“不知道！”吉枝说完这一句，就再也不吱声了。

就这样又走了一忽儿，他问：

“送上门的媳妇这件事怎么办？”

“……”

吉枝没有答复。

往前再走四町就是座桥，吉枝到那儿要往右拐。在那儿就要分手了。兼一郎站住说：“可别出什么差错啊，知道了吧！”

这时，他又恢复了平时开会时说话的口气了。

“嗯，那，你也要当心些！”

她在黑处抬起了的脸，分外白皙。

“好。——小枝！你看那边是灯光吧……”

吉枝若无其事地向他说的方向看去。这时，兼一郎突然扳着她的肩膀，匆匆朝她面颊吻了一下。

“嘘！”吉枝闪开身子，捂着面颊。

兼一郎笑着抽冷子跳上了自行车。

“我一定加油干！”

在黑暗中，他自己的脸也烧得通红，拚命蹬着车子。过了忽儿，他回头一看，吉枝还站在原地，在为他送行呢。他朝吉枝招了招手。

郁秋别煤矿的火光，把远方黑黢黢的天空映照得微红……

（《沼尾村》第一部）

（1932年3月8日）

为党生活的人

卞立强译

本篇原名《党生活者》。小说在作者死后发表于1933年《中央公论》杂志四、五月号，当时因怕遭到反动政府禁止，书名改用《转换时代》。译文根据1953年青木书店文库本译出。

我正在盥洗室里洗脸，窗外接连响起了一片脚步声。这里面有穿木底草履的声音，也有穿鞋子的声音。还夹杂着大声的谈话声。看来是第二车间放工回家的工人们正好打窗子底下经过。

“还没有走？”

这时须山从背后走过来，对我这么说。他是第二车间的。我转过满是肥皂泡沫的脸，冲着他皱了皱眉头。——因为我早就跟须山说好了，要互相避免一块儿从工厂里回家；否则让别人看在眼里，将来万一出了事，牺牲的就不只是一个人。可是须山却经常不守信约，而且还乐呵呵地笑着说：“嗨！别发那么大脾气嘛！”不管怎么说，须山确实是一个性格开朗、惹人喜爱、叫人没法生气的家伙，所以每当这样的時候，我也只好苦笑一笑。可是现在是这样一个时期，我只得给他一个脸色看看；再说今天已经约定好了，马上还要领一个新同志到一家卖年糕小豆汤的铺子里去。……但我忽然发现须山的脸可不是平常那种逗人好笑的样子。当时我一下子就意识到只有从事我们这种工作的人才会有的那种“预感”。——于是我回答他说：“嗯，马上就走。”三下两下就把脸洗完了。

须山见我明白了他的意思，马上改换了腔调，在我的背后说：“怎么样？去喝杯麒麟^①吧！”这句话倒是有点象平常须山

① “麒麟”是啤酒的牌子名称。

的口气。可是我马上觉得，这话里有点儿做作，包含着一种不寻常的东西。

须山到底还是须山。一出厂子，他就走在我的前面，离开我有三四丈远。从厂子上电车道，一边是国营电车的路基，另一边是一溜排商店，中间是一条狭窄的小道。在路旁第二根电线杆子下面，站着一个便衣特务，朝我们这边瞅着。他那种似看非看的样子，实在叫人讨厌。我赶快和后面走上来的五六个人走在一起，一边说着话，一边提高警惕，用左眼梢留神着特务。那特务也似乎对他这种每天例行公事感到腻味了，露出一副厌倦的无所谓的神气。最近，他们每天就是这样监视着工人的上下工。须山好象故意耍弄特务似的，慢腾腾地迈着八字步，从他身边擦过。我一看就明白了他的意思，心里觉得很好笑。

走到电车道上人多的地方，我追上了须山。他一边揉着鼻子，一边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朝四周看了看，然后跟我说：“事情有点儿奇怪……”我看着须山的嘴角，他接着说：“上田跟胡子的线断了。……”

“什么时候？”我问。

“昨天。”

“有预备线①没有？”我明知胡子是一个没有必要留“预备线”的人，但我还是这样问了。

“据说有。”

据须山说，昨天的联络是为了一件特别重要的工作，要是耽搁一天的话，就会出很大的问题。所以他们俩前天在S河、M街

① 地下工作者在进行接头联系时，往往在约定某个时间和地点外，还规定另一个时间和地点作为“预备线”，以防万一在第一个时间和地点联系不上时，就按第二个时间、地点进行联系。

和 A 桥三个电车站之间的街头走过的时候，决定把这条街的“从这儿到那儿”作为碰头的地点；奇怪的是胡子竟担心“万一出了问题不好办”，因此路上他又主动指定一家比较安全的咖啡馆，说是街上见不着，二十分钟后就到那家咖啡馆里去，而且在临分手的时候还互相对了表。这位被我们叫作胡子的同志，是我们最高领导机关的一位重要的负责人。过去他搞过近千次的联络（全部都是街头联络），其中他只迟到过两次。干我们这样的工作，这本来算不了什么，但象他这样的同志却是很少有的。再说这两次迟到，一次是因为双方理会错了时间，而他还是准时去了；另一次是因为到了约会的那天下午，他还不知道自己的表出了毛病。要是其他的同志，即使一两次不到，问题还不那么严重；现在是胡子没有来，而且连预备地点也没有来，这简直叫我们不敢相信。

“今天怎么办？”我问须山。

“上田说再到昨天的地点去一次。”

“几点？”

“七点。另外，去咖啡馆是七点二十分。不过，这情况我感到很担心，所以已经和上田约好八点半碰次头。”

我算了算今天晚上自己的时间说：“那末，你九点和我见一次面。”

我们当场决定了会面的地点就分手了。临分手的时候，须山说：“胡子要是被捕了，咱就自首去！”这当然是说着玩的，可是叫人感到他简直是在说真的。我骂了他一声“混蛋”，但他说这种话的心情我是充分理解的。因为胡子在我们同志之间非常受信任，我们把他看作是力量的源泉；说他好象是我们的灯塔，也丝毫不算过分。事实上如果没有了胡子，我们简直就没有了着

落，首先连第二天的工作就不知道怎么干。当然，果真到了那种地步，也没有办法，工作还是能够坚持搞下去的。我一边走着，心里一边在想：他要是没有被捕就好了。

半路上我路过一家卖糖果的小铺子，买了一盒森永牛奶糖^①，拿着它朝家里走去。房东家的男孩子正和邻近的孩子们站在一架自动出糖果的机器前面。最近开始风行这样的机器。你放进一分铜板，按一下把手，机器里的弹丸就会跳进一个小槽，随着弹丸跳进的小槽不同，下面小孔里出来的糖果也不一样。因为花一分钱说不定能得到一分钱以上的东西，街头上每一架机器的面前都围拢着许多孩子。孩子们都瞪大着眼睛，使劲地歪着嘴，在按着机器的把手。

我哗啦哗啦地掏着口袋，摸出两个一分的铜板给了房东的孩子。这孩子起初还缩了缩手，很快就流露出满脸的高兴。看来这孩子大概一直是站在后面看着别的孩子玩。我把刚才买来的牛奶糖也塞在孩子的口袋里，然后就回家了。

我必须赶在八点以前，把今天工厂里发生的事情写成稿子，供明天撒的传单用。已经约好稿子要在八点交给和我碰头的S。我从壁橱里拿出装着各种文件的皮包，打开了皮包上的锁。

厂子的情况是这样：我们的仓田工厂原来是一个二百来人的金属工厂；战争^②开始以后，又招收了六百名临时工。我、须山和伊藤（女同志）等同志都是那时候顶着别人的名字打进去的。一个二百名正式工的厂子，一下子招了六百名临时工，可以想象活儿增加的多么急。仓田工厂原来是制造电线的，战争开

① “森永”是牛奶糖的牌子名称。

② 指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战争。

始以后停止了电线生产，开始制造防毒面具、降落伞和飞艇外壳。最近这些活儿已经告一段落，传说六百名临时工中要裁去四百来人，所以厂子里最近尽谈论这件事。当大伙儿嚷着“要裁人了！”“要裁人了！”就有人说：“工厂里的临时工，压根儿就不存在什么裁人不裁人，现在反倒是比原来讲好的期限延长，多干了半个多月。”事实上确比原来讲好的期限多干了半个多月活，可是这期间尽是火烧眉毛的活儿，实在叫人受不了。拿女工来说，从早上八点一直干到晚上九点，加上夜班也只挣一块零八分钱；从下午六点到九点是一小时八分钱，而吃晚饭所花的二十分钟到三十分钟的时间，工厂还特意为此作了精打细算，从夜班费里扣去两分到三分钱。吃晚饭的时候，我说：“看来工厂大概认为职工这类人不吃饭也可以干活吧！”跟我一块儿干活的一个临时工说：“噢，是这么一回事！……”这句话说的很俏皮，把大伙儿都逗乐了。工厂每天发放工资，把每个女工的八分钱工资零头，用一个五分的铜板加上三个一分的铜板，一份一份地发给将近四百名女工。这当然很费事，六点钟下工，为了排队领工资，甚至要等到七点。大伙儿在队伍里急得直嚷嚷：“真叫人可恨！把八分改成一毛，该省多少事呀；要不咱们吃点亏，八分改成五分得啦！”“有钱人爱财如命的牛脾气，真是咱们想象不到的。”

可是工厂却放出了空气，说是解雇临时工时，要给每人发十块钱。本来就是临时工，早就说好了可以一个子儿不付；现在又说要发钱，理由似乎是大伙儿都干的不错。这消息究竟有几分可靠，大家不是没有怀疑；可是不管怎么说，这儿一歇工，又要有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所以也就不自觉地对它抱起指望来了。但是，连吃晚饭的时间也要从工资里扣除两三分钱；为了把一分的大铜板三个三个地排成堆，可以满不在乎地让几百人等上一

个多小时。这样的工厂怎么可能会给六百来口人每人拿出十块钱（是十块大洋呀！）呢？！放出要发十块钱的空气，显然是包藏着工厂方面的阴谋诡计。这肯定是一种手段，放出这样的空气，目的是在解雇前防止工人波动，在决斗的关键时刻进行欺骗。

今天厂子里都在谈论这件事，我决定把最近发生的情况写进明天要带进工厂的传单上去。大前天，大伙儿都纷纷议论要缩短发放工资时间的事。前天带进厂里的传单，就因为及时反映了这件事（尽管是这么一件小事），在工人里面获得了好评。

我盘腿坐在桌前写起来。过不了一会儿，楼下的房东大婶上楼来了。她对我说：“刚才孩子让您破费了。谢谢您啦。”她带着从来没有过的笑容，向我道了谢，又下楼去了。干我们这样工作的人，在任何无关紧要的小事上，都要注意使自己跟“普通人”一样；最忌讳的是让房东觉得你这个人有点和常人不同，或者怀疑你是干什么的。现在正在监狱里坚持斗争的 H 同志，他所受到过的严密追捕，我们简直无法跟他相比，饭馆、咖啡馆、理发店、澡堂这一类地方到处都张贴着他的照片。他为了能在这样的追捕中进行活动，有一次竟带了房东到帝国剧院去看戏。我们还必须学会跟“普通人”说一些毫无意思的闲话，学会讨人喜欢的应酬话。不过一到这种场合，我是最差劲的了，简直就没办法。虽然近来多少习惯了一点。……

我对大婶说：“啊呀！那么一点东西，没什么。”说完之后，臊得满脸通红。还是不高明！

好不容易写了两张多稿纸。白天干了一天活，写起来确实不是一件轻松事。勉强把揭露十块钱津贴的真相写完，时间已过了七点了。一写起稿子就出汗，中间我用手巾使劲地擦了好

几次脸。我把写好的稿子装进信封，在封皮上写上了一个胡诌的女人的名字，装着是一封情书的样子。七点四十分我离开家。我跟房东大婶说：“我散散步去。”平常大婶总是默不作声，今天却朝着我说：“您请吧。”果然发生了灵效！我苦笑着走到暗处。记得有一次，我和往常一样要出门的时候，大婶说：“你这个人爱出门呀！”我吃了一惊。事实上我是每晚都出去，人家要怀疑也是自然的。我心里扑通一跳，勉强笑着说：“因为，那个……”大婶笑着打圆场说：“因为还是年轻人吧！”我才明白大婶说的不是那个意思，这才定了心。

约定八点钟会面的地方是大街电车道里面的一条后街，那里有许多街道作坊，一路上有许多商店里的买卖人和前面留着一绺头发的手艺人。我一向注意尽量使自己的装扮和所要去的地方相适应。尽管不可能做的很周到，但这件事很要紧。我们要想避免被人家怀疑盘问，就一定要把自己打扮的整整齐齐。然而象今天这样的地方，时间又是八点了，要是穿着西装，甚至拿上手杖，那反而会惹人注目，效果更加不好。所以我只穿了一身干净的和服，随便地系了一条腰带，连帽子也没戴就出来了。

喜欢摇晃右肩膀的 S，从笔直的马路的那一头走过来。他认出了我，在一家商店的橱窗前停了停，然后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拐进小胡同里去了。我跟在他的后面，同样拐了个弯，于是在另一个拐角的地方，我们并肩走到一起了。

S 听我说了前天厂子里撒了传单后的情况，又问了问各种问题，然后说：“从厂子里大家经常关心的问题出发提问题固然好，不过缺乏的是进一步从政治上提出问题。”

我吃了一惊，看了看 S 的脸，感到确实是这样。我只是陶醉于传单博得了好评，而忘记了从更高的高度来看待这些问题。

S 接着说：“也就是说，现在连我们也在追随大家的自发情绪转了。所以要想使大家从对日常生活的不满来了解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还需要作特殊的、有计划的、而且是相当深入的努力。——让大家明白这一点，是完全必要……”

他说：为了纠正过去散发的很多反对战争传单中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现在反过来又犯了把问题局限于经济要求的错误。这种右的倾向是作了群众的尾巴，暂时获得了好评。因此对于这种“好评”也需要认真地加以分析。——我们一边走，一边谈着这些事情。

“说是要小心，如果象这回这样，牛头不对马嘴地乱来一气，那也没有任何好处。反而是倒退！过去我们就象是蒙着眼睛的马，只看到事物一个一个的片面。”S 这么说。

我们走了一会儿，进了一家咖啡馆。

“给你一封情书。”我这么说着，把稿子放在桌子下面的搁板上。

S 用鼻子“嗡嗡嗡”地哼着歌曲，一边留神着女招待，一边把稿子塞进了口袋。然后他问我说：“你那边和胡子（他按了按鼻子下面）没有接上头吧？”

我把在工厂回去的路上从须山那儿听到的情况告诉了 S。他故意用鼻子“嗡嗡嗡”地哼着歌曲，但集中注意听着对方说话。这是他一向的习惯。

“我这边约定是昨天六点，也断了。”

我一听这话，心里慌乱起来。

“是给抓住了吧？……”我嘴里这么说，而心里却希望他能说：“不，不会的。”

“嗯，……”S 考虑了一会儿说：“他可是一个小心谨慎的

人啊！”

我们约定，双方都要尽一切办法和胡子接上头，另外还商量了明天早晨如何把传单带进厂子，以后就分手了。

九点钟，见到须山的时候，我一看他的脸色，一切都明白了。不过也还不能说是完全绝望了。跟须山商量好，要想尽一切办法去查明胡子的下落。接着马上就分手了。——因为路上很危险，我们规定了除非是在自己的秘密住所附近联络，否则一过九点，就要停止一切活动。

和须山分手以后，我独自一个人往回走，不知道为什么，边走边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担心。感到胡子的事意外沉重地压在自己的心头上。只觉得膝头发软，连呼吸也感到紧迫。在正常环境中生活的人们，也许会认为我把这时候我的这种现象说的有几分夸张和虚假。可是我现在和外界的一切都被隔绝了，连私人多年的老朋友也完全断绝了往来，就是上一次澡堂也丝毫不能疏忽大意，而且一旦被捕，起码要蹲上六七年监狱。——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唯一的依靠只有同志。哪怕是失去一个同志，都会感到联系我们之间的感情是多么深厚。要是平常领导我们的同志，那就更是这样。以前我在一个反动工会里作为反对派进行合法活动的时候，尽管也发生过这种事，但还不至于这么严重。因为不管怎么说，那时候还有种种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冲淡了这种感觉。

太田早就在我的住处等着我。——我决定不让任何人知道我的秘密住所，只是在上级的许可下，告诉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太田）。这是因为在仓田工厂进行活动，怎么也要规定一个专人经常和我碰头。只是在外面联系，一有紧急的事情就来不及，

而且也不可能充分地把各种各样的问题说清楚。

太田是为明天带传单的事而来的。于是我把刚才和 S 商量的结果告诉了他，决定让他明早七点钟到国营电车 T 站的站台去，S 将去那里，亲手把传单交给他。

急事办完之后，我们闲谈了一会儿。我笑嘻嘻地说：“怎么样？闲扯一会儿吧。”太田笑了起来说：“拿手好戏又开场啦！”平常公事一办完，我差不多总是要兴致勃勃地说：“闲扯一会儿吧！”现在这就成了我的“拿手好戏”了。不过，原来我并不明白我为什么爱“闲扯”，最近我才发现了原因。——由于工作，我们几乎每天都和同志会面。但是这种会面，即使是在咖啡馆里也只谈公事，而且要尽量压低嗓门，不说废话；公事一完，马上就离开那里，尽快分手。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天天都是这样状况。当然，由于天天都是这样的生活状况，我已经清算了自己过去的生活方式，现在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但是这就象有些人长期蹲拘留所，有时简直象急病突然发作似的，馋着想吃某种“好吃的东西”。我的情况大概是这种单调生活的反作用，一见到同志，有时就借想“闲扯”的方式表现出来。可是过着正常生活的太田，竟认为我的这种心情只不过是过去特别散漫的性格的反映；象他这样可以在啤酒店里大喝啤酒的人，当然不可能理解我的这种心情，有时候竟然残酷地(!)一句闲话也不扯就回去了。

说要“闲扯”，太田把厂子里各种各样的女工品评了一番就回去了。我惊诧他什么时候知道了这么多女工的事。

“女工的恋爱方式，可不象资产阶级小姐那样扭扭捏捏，尽讲形式，她们是非常直接而具体，真叫人受不了。”他这么说。

“直接而具体”，这话真有意思，我们大笑了起来。……

二

仓田工厂里撒了一次公开由“党”署名的传单之后，早晚的上下工一下子紧张起来。时期是这样的时期，制造的产品又是这样的产品，厂方当然慌乱起来。有一天早晨，平常在我身旁干活的一个女工，“啊呀”地尖叫了一声跑了进来。原来在工厂大门的旁边有一个仓库，库门经常是敞开着，里面黑洞洞的。这个女工跟平常一样从那里经过时，一个头上蒙着黑衣服的“东西”在角落里蠕动。后来才知道那是门卫。由这件事也可以了解他们是怎样地惊慌。

战争开始以来，厂子里年轻的工人一批一批地上了前线；而另一方面，制造军需品的活儿又突然增多起来。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哪一家厂子都不得不开始雇用大批的工人。过去就是雇用一个人也要经过严格的审查，没有保人还不行。战争开始以后，他们不能这样做了。我们就是瞅准这个机会进来的。当然罗，在这样的情况下，雇进来也只算是临时工；而且从厂方的角度来看，以国家“非常时期”的名义来雇用大批临时工，比起雇用正式工，结果将有利于降低整个工人的工资。不过这对他们有利也有弊，因此才不得不干出这种愚蠢而又无耻的勾当，竟然让门卫头上蒙着黑衣服来对工人进行监视。

蒙黑衣服的事且不管它，暗中盯着我的是便衣特务。各个警察局都在传阅着我的照片。当然，我现在是化了装，但也不能疏忽大意。有一个同志，就因为警察局里有他一张十三年前照的照片，结果让一个从来未见过他的特务抓住了。有的同志劝

我彻底“转入地下”。这当然是再好不过了。但是根据过去的经验，在工厂外面去进行工人的组织工作，困难要增添百倍，而且得不到百分之一的效果；即使和工厂里的同志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情况也不会好到哪里。我们所谓的“转入地下”，不了解情况的人也许会认为是隐居起来，是单纯躲藏起来，四处逃窜。其实并不是这样。如果“转入地下”是这么一回事，倒不如老老实实地让他们抓住，一声不吭地呆在拘留所里，反而要痛快百倍。所谓“转入地下”，目的是为了掩蔽自己，避免敌人的攻击，这样就可以更加大胆、坚决地去进行斗争。当然，从便于工作或其他方面来说，我们还是希望合法地进行斗争。所以我跟太田他们说，要尽可能长期保住合法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转入地下”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我们决不是自己要转入地下，而是被他们逼着转入地下。……

在目前这样的状况下，我有在敌人的面前暴露自己的危险，早晚上下工对付便衣特务就很够呛。幸好最近站在那儿的特务经常是同一个家伙，有时老远一看是另外一个人，自己就要放慢脚步，重新把帽檐往下拉一拉，走近他之前，要弄清楚是不是自己所认识的特务。第一道关口通过之后，下面就是门卫老爷的检查。带传单进厂子的人一定不能在这里让他们抓住。太田一向是派女同志带传单。据太田说：“务必要放在女人的肚脐眼下面，这样最安全。”那些家伙似乎还没有无耻到连那种地方也要搜查的地步。

第二天早晨，一打开装工作服的箱子，传单果然放在里面。波涛似的感情象闪电一样传遍了全身。走进车间一看，旁边的一个女工正在念着传单。她象小学生似的，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着；碰到不认识的字，就用小指搔搔头。她一见我就问：“这会是

真的吗？”她是指关于发十块钱津贴的事。

我说：“不但是真的，而且是真得很啦！”

那女工就说：“真叫人可恨！”

在工厂里，我已经受到大伙儿的注意，认为我“好象是那种人”^①。不管有没有传单撒进厂里，只要是大伙儿纷纷议论厂子里的事，不管是大事小事，我总是要积极插进嘴去，想办法把大伙儿引向正确的方向。我们应当在平时就取得群众的信任，使大伙儿相信一旦有事，总是站在他们的前头斗争。所以我们必须要站在群众的前头，把大多数工人成批地争取到我们的一边来。以前在厂子里搞的是关门主义，是偷偷地把工人一个一个地吸收进我们的队伍。通过以后的实践，才明白这样的做法永远不可能使运动取得群众的基础。

离开工还有一点时间，大伙儿围在工作台前互相议论着。我正想走过去，工头跑进来说：“谁拿了传单交出来！”大家都无意识地把传单藏了起来。

“藏起来，对你们可没有好处！”工头对我旁边的一个女工说，“你快给拿出来！”

女工顺从地从衣带里把传单拿了出来。

“把这样危险的东西，当作宝贝这么藏起来。——有你这样的傻瓜吗？！”工头苦笑着这么说。

“不过，咱们厂子也太狠毒了。大叔！”

“所以嘛，所以我说传单就是不好嘛！”

“是吗？那末歇工的时候，真能发十块钱吗？”

这一下把工头问住了，他说：

① 指共产党员。

“这我哪知道，你问厂里去！”

“大叔，什么时候你不也说过要发吗！嗨，看来传单上说的还是真的呀！”

给女工这么一说，车间里的人全都笑了起来。

“啊哟啊哟！说的好呀！”不知是谁这么说。

工头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慌忙擦着鼻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怒气冲冲地出去了。——我们第三车间的人，这一下子可大声哄笑起来了。这件事虽小，可是这么一来，工头这小子忘了向其他的人收传单就溜掉了。

这天开工之后不到一小时，我听说太田从工厂里被抓走了。看来是带进传单的事给发觉了。

最要紧的是太田知道我的秘密住处。

他以前跟我说过，要是出了事，他只坚持三天。我问他三天是根据什么算出来的，他说大家都是这么说。那时候也说不出是什么原因，“坚持三天”好象已经变成了一个规律。我记得当时我们还继续开了一些玩笑，可是我突然感到太田什么地方有一种弱点。听到太田被捕的时候，首先闪现在我脑子里的就是这件事。

我认识的一个同志，和他同住的人被捕了，而他还满不在乎地住在原来的秘密住所里。我和其他的同志都劝他必须马上转移，而这个同志却露出满脸难以理解的神色。果然不出所料，第五天上秘密住所就遭到了袭击。当时这个同志从窗户里往外跳。跳是跳出去了，却把脚摔坏了。警察怕他半路上逃跑，把他脱得光光地给逮走了。他进了警察局的拘留所，一眼看到先前被捕的那个人，就大骂他是“混蛋！草包！”可是那家伙反而说，

我已经被捕了，你还稀里糊涂地不逃走，你才是“草包”哩。后来这个同志出来了的时候，我们跟他说：“可不是没有对你说过，你明明知道而麻痹大意给抓住了，这可是组织纪律问题罗！”而他反驳说：“那是因为那小子（先被捕的那个家伙）给说出来的。在敌人的面前，哪怕是吐出一个字，那才是组织纪律问题！”事实上这个同志在审讯中确实是什么也没说。对这个同志来说，他从来就没有考虑过自己要说出什么，所以也就没有想过别人会说出什么，因此才“稀里糊涂”地呆在秘密住所里不走。当时我比谁都感到这些话刺到了自己最痛的地方。我要别人从秘密住所里逃走，这就等于承认自己如果被捕，不出三四天也会供出秘密住所；等于自我供认有这种投降主义的情绪。而这种态度是和一个布尔什维克毫不相干的。这是一种起码的常识。从此以后，我们就给自己规定了一项任务，要以这个同志的态度作为尺子来衡量自己。可是现在面前摆着这么一个不可靠的太田，我可不能在秘密住所里装作“稀里糊涂”（尽管这是从好意来理解），我必须马上转移住处。

不管怎么说，我总觉得最好还是不要把秘密住所告诉任何人。曾经有过这样的事例——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同志，他把自己的住处告诉了七个人，让他们在自己的住处出入；而且这七个人当中，还不都是同志，有的甚至仅仅是“同情人”，结果这个好同志的秘密住所遭到了袭击。我们任何时候都要记住，我们是在夸称世界最完备的警察网的追捕中进行活动。

好在太田还不认识须山和伊藤芳。为了进行工作方便，我曾经打算要告诉太田，说这两个人是我们所信任的同志。但当时考虑到种种的后果，一来是防止在受到镇压时牵连的范围过大；另外也注意到单纯依靠某某某是自己人这种个人关系来进

行工作，是一种危险的简单化的做法，因此才作罢了。

从厂里放工回家的时候，我和须山、伊藤芳一起，在一家卖年糕小豆汤的铺子里作了紧急商谈。结果决定我马上（今天晚上）搬家；厂里情况未弄清之前暂不上工；另外和留下的同志保持更密切的联系，以后再采取第二步、第三步措施。过去有许多同志，就因为抱着“今天恐怕还不要紧”、“哪能会出这种事”的想法，结果出了大问题。我们三人协商好，以上三件事是作为工厂支部的决定，我一定要执行。然后须山从他刚领来的一天的工资中给了我八毛钱，伊藤给了我五毛钱。

须山又犯了他平时的老毛病，不知道他想起了什么，问我知不知道神田伯山^①的故事。我笑着说：“你又来啦！”据他说，神田伯山不论什么时候（一直到死为止）腰包里都要装上一百块钱现金，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也不花这笔钱。据说这是因为他认为，一个人说不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会突然碰上灾难，那时候，作为一个男子汉，如果仅仅因为身上没带钱而蒙受意想不到的耻辱，那简直受不了。

“同样的道理，如果因为没有钱、动不了身子而被他们抓住，那等于是对阶级的背叛！”须山这么说了之后，又补充了一句：“我们也应该学习他们从经验中得出的教训。”

须山的脑袋里装了这么多的玩意儿，简直就象一本剪报簿子。我和伊藤都大笑起来。

我粗心大意地拐进胡同口，朝我的住处走去。不过说实在的，这恐怕也很难说是我的粗心大意。首先，我压根儿也没有想

① 神田伯山（？—1873），江戸末期的著名说书艺人。后来，他的弟子也袭用他的名字。

到太田会这么快说出我的住处。我猛吃了一惊，呆呆地站在那儿。——二楼上我房间里的电灯亮着！而且我凭直觉感到房间里决不只有一个人，毫无疑问是有人在守候着我。可是，屋子里有许多东西我得要拿出来，有些东西不拿出来，明天的生活就会发生困难。但我知道这个“可是”要不得，马上改变了主意。

我一下子想不起有什么可去的地方。过去到处流转的生活，几乎把我认识的所有人家都利用遍了，这些地方早已不能再去住了。现在首先必须要离开这个地区。我奔上电车道，朝四周打量了一番，立即叫了一辆出租小汽车。但我并无目的地，只随便地说：“到S街，两毛钱！”

这时候，我忽然意识到我是直接从工厂里出来的，这一身服装跟出租小汽车很不相称。——我坐在车子里想了又想，仍然想不出主意，心中焦急万分。只有一个女人，过去帮我找过一两次躲藏的地方。如果去求这个女人，她一定会帮助我。她租了一家商店的三楼居住，在一家小商业公司里做事。她虽然对左翼运动抱有好感，但自己并不积极参与活动。女人的住处，我是知道的；但到一个独身女人那儿去，显然很不合适。过去有事的时候，我总是向公司里挂个电话，在电话里就把问题解决了。可是现在只剩下这个女人的地方可去了，我再也不能考虑很多了。于是我决心在S街下车，改乘了市营电车。

我尽可能找一个角落坐下，把两手放在膝盖上，然后装着若无其事地朝电车里扫视了一眼。幸好没有“可疑的家伙”。在我的旁边，有一个穿西服的好象是银行职员模样的人，正在看《东京朝日新闻》。我瞅了一眼，发现报纸第二版的中间有一条“搜捕仓田工厂赤色分子”的标题。我又瞅了好几眼，可是看不清本文。——我心情焦急不安，生平第一次感到电车跑得太慢了。

为了小心起见，我提前两站下了电车，然后走进一条小胡同，拐了两三个弯，朝女人的住处走去。因为是第一次来，走的又是小胡同，简直有点迷路了。店堂里有个老爷子，露出贴着膏药的肩膀，用手在上面拍打。我问楼上的笠原在不在家，他瞅了瞅我的脸，一句话也不言语。我稍微放大了声音又问了第二遍，他这才朝着镶着纸拉门那边的饭堂说了一句什么话。里面有人，透过门中腰上的玻璃，朝我这边瞅了瞅，带着怀疑的语调说：“啊呀，她出去啦！”

这一下子我可为难透了。我问什么时候回来，回答说不知道。我知道他们是怀疑我的模样（服装）。我一筹莫展，在那儿站了一会儿，可是没有办法，说了一声“九点钟再来看看”，就走出了店门。来到外面，抬头望了望三楼，楼上没有灯光，我忽然感到浑身没有一丝儿气力。

到有夜市的街上去翻了翻书，在棋摊子旁边相了相，又到咖啡馆里坐了坐，好容易混过了两个钟头，然后又转了回来。一拐进胡同口，就看到三楼的窗子是亮的。

我跟笠原简单地说明了情况，接着就问她有什么地方可住。可是，她所知道的地方，过去差不多都让我住过了；公司里虽然有两三个女朋友，但她们对我们的运动毫无理解，“而且都是单身”。笠原歪着脑袋拚命地想了又想，仍然想不出个地方。一看表，已经快十点了。过了十点还要在外面乱跑，那是最危险不过了；再说我还穿着这么一身工作服，那就更加危险了。笠原笑着说：要是女朋友，还有许多地方可以想办法，“可是你是个男人，实在没办法可想。”我也没有办法可想。然而要使自己不至于被捕，只剩下一条路可走，但要把它说出口，那是很需要勇气的。

“你这里怎么样？……”

我下决心说了出来。但连自己也感到脸红，再也说不下去了。——这在别人看来，也许认为太大胆了，可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

笠原的眼睛突然睁得大大的，盯视着我的脸，咽了一口气，接着满脸涨得通红，不知为什么，她好象有点慌乱的样子，把一直随便横坐着的两腿缩回来，改为用膝头跪坐着。

过了一会儿，她下了决心，跑到楼下去了。她跟房东说，住在S街的哥哥来了，要在这儿住一宿，因此来打个招呼。可是，说是哥哥，怎么想也叫人感到可疑。她虽然很朴素，但平常总是穿一身整洁的西服，留着流行的半长发。这样的人怎么会有一个穿着工人服的哥哥呢？！据说她这么一说，楼下的老太婆一句话没言语，从上到下一个劲地打量着带孩子气的笠原。笠原的脸上不禁紧张起来。对一个普通的女人来说，要留男人过夜，这确实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

事情这么一决定，两人不知怎么一下子拘谨起来，话也说不下去了。我向她借了铅笔和纸，伏在铺席上，制订起明天的计划：要立即递补上太田的缺；要把太田的被捕写进传单，让仓田工厂的全体职工都知道。我舔着铅笔，打着草稿，忽然想到女人是不会主动说出要睡觉的。于是我问她说：

“你每天什么时候睡觉？”

“一般大概是这个时候……”她这么回答说。

“那末睡吧。我的工作也告一段落了。”

我站起身，打了个呵欠。

只有一床褥子，她要把被子让给我，我硬是拒绝了，盖了一件棉袍就躺下了。熄灯之后，听到她走到屋角上，好象是在那儿

换睡衣。

我过去(自从离开自己的家以后),到处奔波流转,已经习惯于这样的睡法,而且马上就能进入梦乡。可是和女的睡在一个房间里,这还是头一次,实在很难睡得着。我稍微一迷糊,就作起梦来,但马上又惊醒了。就这么梦梦醒醒,醒醒梦梦,反反复复了好多次。尽是梦见被人们追赶着。做梦一般都是这样——想跑也跑不动,只是心里干着急,一旦意识到自己“啊呀啊呀”地叫起来的时候,一下子就惊醒了。稍微镇定下来,就觉得半边脑袋滴溜溜地发疼发沉。我感到好象一点没有睡过一样,不知道翻了多少身;而笠原一整夜好象没有翻过一次身,连动一动身子的声音也没有听到。我心里十分清楚,她是早就准备一夜不睡了。

不过,我总算是睡了一忽儿。一睁开眼睛,只见笠原的铺盖已经整整齐齐地叠在那儿,不见她的人,大概是到楼下做饭去了。不一会儿,笠原踏响着楼梯板上来了。她问我说:“睡着了吗?”我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只是“啊”地回答了一声。

笠原上班的时候,我和她一块儿离开了屋子。楼下的老太婆正在厨房里干活,见我们出来,她停下手里的活儿,一直看着我们走了好远。

“啊! ——”一走到外面,笠原大声地出了一口长气,就好象把昨天一夜的别扭一下子吐了出来。接着又轻轻地骂了一声,“臭老婆子!”

三

这天晚上和 S 碰头的时候,跟他谈起昨天晚上的事,他说这

样下去不行，于是给我筹措了租房子的钱。我已经找好了房子，决定等须山和伊藤给我弄来家具，马上就搬过去。起初我拿不定主意，不知道住在仓田工厂所在的地区内好不好。住在同一个地区，有相当大的危险性；可是，要是住到其他的地区去，交通费又发生困难。相比之下，当然还是其他的地区好，但是说不定警察以为我已经逃到其他的地区去了。所以我想趁其不备，来个将计就计，就住在原来的地区也未尝不可。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据说有个同志经常在江东^①一带活动，可他却故意放出风声，说自己在城西一带出没。另一位现在已经去苏联的同志，听到这个同志采取这样的战术，认为并不高明，他说要是他的话，自己在江东活动，就放出自己在江东的风声。由于我在这个地区还没有被特务认出，再说又从工厂里歇了工，经济上没有了来源，因此还是决定在原来的地区找个住处。

租房子最好还是租小商人家的楼上，如果房东是一对老夫妇，那就更好。这些人跟我们的工作没有什么关系，而且对楼上房客的行动，理解很有限。要是住在一个半吊子知识分子的家里，他们一看你进进出出的情况和房间里的摆设，马上就会锐敏地嗅出我们和“常人”不一样的味道。只是警察这些家伙要常常到小商人之类的家里来查户口，而且查起来又很不客气；相比之下，对待门第高的人家就不一样，该去两次的只去一次，去了也只问一问：“有事没有？”我这次找的住处是一户介于两者之间的人家。房东大婶子据说先前当过妓女，现在好象是什么人的外室。

须山和伊藤给我张罗来了一副行李，好容易才安定下来，我

^① 指东京隅田川东岸一带。

这才松了一口气。唯一不足的地方，是楼下还住着一个房客，所以我第一件事就要了解他是个什么人。我下楼到便所去，正好那个人不在，他的房间的纸拉门敞开着，我首先朝他的书架子上瞅了一眼。——每当我搬到一个新住处，如果有同住的房客，我首先就采取这个办法。因为一瞅书架子，马上就可以估量出这个人究竟是个什么人。——书架子上摆的都是一些很普通的书，大多是地理、历史之类，看来大概是哪个学校的教员。不过桌子上放了一本《日本文学全集》；我迅速地瞅了一眼，书是打开着的，正好翻到卷头，上面刊有片冈铁兵和叶山嘉树^①等人的照片。但是这种书只有这一本，别的好象没有。

在我们的同志当中，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好容易搬了一次家，可是却发现这家房东是在警察局里做事的。马上能发现房东的职业，那还算好的；而有时甚至过了一两个月还不清楚。因为我们是干这样工作的人，就连“您家先生是做什么的”这样简单的问题，也不能随便地问的。

我向大婶打听了澡堂在什么地方，就出去作第二步调查。我手里拿着毛巾和肥皂，慢慢悠悠地走着，首先注意地看了看每天要经过的路旁两边人家的门牌。走过了五六家，在拐角上有一家名牌上写着“警视厅巡警×××”。但这是一家大宅院的后门，还不用十分担心。从澡堂出来，我调查了一下这附近一带的胡同和岔道，就回来了。一般来说，这个地区（其他地区说不定也是这样）的特点，是工厂区和有钱人的住宅区交错地紧联在一起。这一带尽管和仓田工厂同属一个地区，但是一出拥挤的大街，就是幽闲清静的住宅区；而且好在走完一条清静的长长的大

^① 片冈铁兵(1894—1944)和叶山嘉树(1894—1945)，均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

路，马上紧接着就是热闹的大街，所以办完事回来，可以发现后面有没有人跟踪；出了家门马上可以走上热闹的大街，混进拥挤的人群。条件确实很好。

我那二楼房间的窗子紧挨着晒台，而且我发现一步就可以跨上邻居家的晒台，从那儿可以很容易地越过别人家的墙头。于是我准备买一双草鞋来放在晒台上，以便一打开窗子马上就可以穿上^①。麻烦的只是这一带人家简直就象《巴黎屋檐下》^②那样拥挤在一起，你稍一打开窗子，就有被周围五六户人家和租居在二楼上的房客们看到自己的危险。在没有弄清楚这些人家的职业之前，我只好呆在房间里，把四面窗子关得严严的。为了和房东拉拉闲话，我下楼去了。我想从闲谈里了解一下附近的情况。

一打听，住在附近的，有在法律事务所工作的事务员，三味弦^③的教师，他楼上住的是股票经纪人，还有“临时女佣会”^④的女工，其他七八家都是公司的职员，有一家是一一带的财主，家里备有钢琴。搬来的当天晚上，就了解了邻近的这么多情况，确实是很大的收获。除了那些多嘴多舌的“临时女佣会”的女工，恐怕应该说周围的环境还算是不错的。

不过，按过去的经验，还必须要准备一个另外的住处，以便秘密住所一旦遭到袭击，或者发现有可疑的迹象，马上能够有地方住。一个住所不管看起来是多么安全，但丝毫不意味着它永

① 日本人在室内不穿鞋子，这里说准备在晒台上放一双草鞋，是准备必要时穿上逃跑。

② 法国的一部影片的名字。

③ 三味弦是日本的一种乐器。

④ 是一种临时女佣的职业组织，某家临时有事需要帮忙，可通过该组织介绍女佣去工作，领取一定的报酬。

远安全。事实上很久以前我住过的一处地方，刚搬过去的第二天，我从澡堂回来，就发现住所的门前站着一个穿西装的家伙。那里只有一条道，我发现了他的时候，已经走到了跟前，没法再后退了。没有办法，我只好摇摆着身子，把湿毛巾挂到脑门上几乎要碰着眼睛的地方，嘴里吹着模糊记着的“我追求着幻影，在遥远遥远的地方……”的口哨，没有进住所就打门前过去了。穿西装的好似看了看我，但那种看法又令人感到有点不象是暗中监视人的样子。我走了一段，回头看了一看，那家伙还站在那儿，朝我这边望着。那天晚上我睡到一个同志的家里。这个同志很有经验。据他判断，第一，监视人不会是这种的样子；第二，刚搬去两三天，不可能预先没有经过任何调查就跑来监视。第二天派人一调查，果然没有什么事。不过，不管怎么说，为了能够及时对付突然降临的灾难，做好第二步的准备总是必要的。在下次出去联络的时候，我把这件事拜托了笠原。

工作很快就重新开展起来。伊藤芳最近表现特别积极，决定让她填补了太田的空缺。当强烈的镇压风暴刮起的时候，表现出积极性的人是不多的。她虽然是高中毕业生，由于长期不断地过着工厂生活（虽然一直到处流动），身上早已没有以前的那种学生气了。自从被迫转入地下以后，她一直是打入工厂活动，曾经被捕过好多次，而这恰好锻炼了她。一般人一转入地下，就进入街头活动，就会脱离现实的工人生活的气氛，而这个伊藤却正好走着相反的道路。伊藤每次被捕，警察总是把她母亲叫去，让母亲把她领回家。而母亲每次总是求她：“这次你可别出去了。”可是在家里呆不到半天，她又跑出去，潜入地下，开始活动。即使是这样，她母亲一接到警察局的通知，说她女儿被

捕了，要她上警察局去，她总是很高兴，在警察局里再三地道谢，把女儿领回来。大概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回家的时候，伊藤心里想，承担的工作越来越重要，今后恐怕不可能象过去那么容易地从警察局放出来了，因此很难得地和母亲一起去了一趟澡堂。这里面暗含着要和母亲告别的意思。据说母亲在澡堂里一眼看到自己女儿的光身子，一下子就瘫软地坐在地上。原来伊藤的身子因为多次受刑拷打，遍体都是青紫的伤斑。据伊藤说，从此以后，母亲突然对自己的女儿同情起来，而且慢慢地开始理解自己的女儿了。母亲气愤地说：“警察把我女儿折磨成这个样子，我再不向他们低头了！”以前伊藤交通费或生活费发生了困难，没有办法只好托人上母亲那儿去要钱，母亲总是说：要不回家就不给钱。可是打那次以后，要两块给四块，要五块给七八块，还叮嘱说：“不要惦记家！”母亲见人还这么说：“只不过为穷人干点事，就把一个无辜的姑娘打成这个样子。这肯定是警察方面不好！”假如连自己的母亲都不能争取到自己的一边来，那怎么能在工厂里把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伙伴组织起来呢？——如果说这话里包含着许多道理，那么象伊藤就是一个证明。她的那些争取群众的“办法”，确实叫我五体投地。她稍微有一点空闲，就跑到浅草①去看歌舞剧，看国产的电影，或者读无产阶级小说。而她在争取群众的时候，能马上把这些看过的东西拿来作为话题，巧妙地加以利用。（这是题外的话，她长着一副漂亮的面孔，很引人注目。男工们放工回家的时候，即使她不开口，也会有人拉着她到白木屋的分公司或松坂屋②去，给她买各色各样的东西。她对这样的机会，也能非常沉着地巧妙地加以利用。）

① 浅草是东京台东区内的一个闹市区。

② 白木屋和松坂屋均为东京的大百货公司的名称。

她是一个直率的姑娘，很能听取别人的意见，但是她对于通过自己过去几十次的经验所总结出来的工作方法，却象一块顽石似地坚持。现在正需要这样的女同志，尤其是仓田工厂八百名工人中百分之七十是女工，其意义就更大了。

除了仓田工厂的工作外，我还担任“地方委员会”的工作。胡子被捕的事，差不多是确实无疑了，我还必须承担他的一部分工作。工作一下子紧张起来。不过，秘密住所已经建立起来了，而且不必过工厂的生活了，所以我可以充裕地制定自己的日常生活计划，比以往更加精力充沛地去从事工作。

以前在工厂的时候，可以了解厂子里每天每天的“动态”，并且马上能反映到第二天的传单里去。现在这些工作都让须山和伊藤去负责了。起初我还担心脱离工厂会带来不良的后果。可是现在由于和须山他们在组织上保持密切的联系，不但没有浮在表面，有意义的是，离得远一点，反倒了解到须山和伊藤（也包括以前的我）只被眼面前的事吸引了全部的注意力，而不能进一步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事物。那时看起来好象观察的非常仔细，其实应该说是在一个固定的框框里坐井观天。当然，这还由于我担当了便于展望全局的“地方委员会”之类的工作。所以现在我体会到没有必要担心自己会漂浮在上面了。

我首先注意到一种倾向：在这样一个八百人的工厂里，仅有由四五个人组成的支部在拚命（确实是拚命！）地工作。当然，尽管说是四五个人，如果没有这四五个人的支部在拚命地工作，那就不可能把整个厂子推动起来。但是，这四五个人要想努力工作来推动全厂，就必须具体地来研究如何和厂子里的群众组织相结合（或者建立这样的组织，在里面活动）。如果不考虑这样做的具体计划，那就仍然只是这四五个人在唱独脚戏，就不会

有任何发展的可能。而实际上临时工中的女工们，认为她们好不容易互相认识了，马上又要四分五散，各奔东西，觉得“同舟过渡也是前生的缘分”，因此正准备建立一个临时工的“友谊会”之类的团体。临时工和正式工因工资和待遇的问题，关系不好，那是厂方故意制造的，而其中有些人也因“同病相怜，互相关照”而结成了朋友。尽管这只是少数一两个例子，但是，如果支部懂得怎样努力把这些自发的东西加以扩大和组织起来，并在里面（不是只在自己的四五个人当中）做工作，那末在最近即将有六百人要被解雇的时候，把全厂发动起来，也决不是不可能的。

尤其是仓田工厂是个制造防毒面具、降落伞和飞艇外壳的军需工厂。在战争时期，在这样的厂子进行组织工作的重要性，那是自不待说的了。从战争开始以来，我们就把组织工作的重点放在军需工厂（主要是金属和化学工厂）和交通运输企业（这是运输军队和军火的）来开展工作。这也是我和须山、太田、伊藤等人打进仓田工厂的原因。问题是我们都是临时工，不到半个月就要被解雇。我们必须在这期间让组织多少扎下一点根。因此就必须争取正式工。能争取到他们，即使我们被解雇了，也可以从外面和遗留下来的组织保持紧密的联系，顺利地继续开展工作。所以我们决定的方针是：不管在怎样小的问题上，都要让正式工和临时工经常接触，促进他们结合起来。而同时也要重视临时工的组织工作。因为他们这些人在被解雇之后，又要去寻找另外的工厂，进入不同的单位，是所谓的“种子”。所以从始至终决不能脱离每一个临时工。——在解雇之前的极短的时间内，我们必须要做好这些工作。

两三天之后，我和须山进行街头联络的时候，只见须山怪模

怪样地摆着胳膊从对面走过来。他这个人一有什么事情，总是要做出这副样子，就好象等不及见面之后慢慢地谈，而首先在动作上表现出来。我心里想：又出了什么事啦！我刚拐进路旁的一条小胡同，按规定本来是要再拐一条胡同，然后我们才走在一起，而须山却小跑着赶上来，从背后叫了我一声说：“太田来信啦！”

我心里想：果然不出所料。

据说信是在拘留所里托一个流氓捎出来的。从仓田工厂一走上电车道，那一带都是“花街柳巷”；夹着电车道两旁的小胡同里，是一排排带有圆形小窗的妓院。一到晚上，这儿就成了夜市，热闹非常。在这一带横行霸道的是一些叫做“某某”帮的某某把头（流氓）。而有个译名叫作“疯子”的流氓，曾经因威胁罪而被N警察局抓了起来，偶然和太田关在一个牢房。当这个“疯子”流氓放出来的时候，太田就托他把这封信交给了我们所认识的T。

据信里说，警察正在加紧追捕我，甚至还知道我戴的是宽边眼镜；还说象我这种角色，只要稍微花点钱，马上就能把我抓到，因此希望我要特别注意。

听到这些话，我说：“恰恰相反，因为是太田把什么都说了，我才受到警察的追捕。”

须山也笑着说：“是呀，特务竟然知道你戴没戴宽边眼镜。他们没有见过你，那怎么会知道呀？！”

我们认为太田写这封信完全是为了给自己的行为辩解。要紧的是我们想知道太田在警察局里究竟供认了些什么，供认到什么程度。我们必须根据这些立即制定对付的办法。我认为太田这么一来，肯定很快就会放出来，对于这种家伙一定要十分

注意。

不过，太田是在干活的时候被抓走的。就凭这一点也给厂子里带来了不小的波动。大家了解到以前为他们带传单进来的原来就是太田，对他产生了一种亲切的感情。而且还明白了以前动辄就被工头说成是“豺狼虎豹”、说成是“卖国贼”的“可怕”的共产党，原来竟是太田；原来以为共产党是在自己看不见的遥远的地方，现在明白了原来就是每天跟自己一起拿熨斗熨降落伞的太田。——这些事太出乎意外了，大伙儿都感到吃惊。伊藤芳立即抓住这个“太田事件”，在工人中这么宣传说：“太田经常关心咱们女工的事，现在他给抓走了，咱们应该用工厂部分工人的名义，到警察局给他送点什么东西吧！”于是募集了一些现款和物品。大约有七个人出了钱，其中还有个据说是喜欢太田的女工。伊藤芳从太田的事谈到传单，谈到工厂的活儿，终于争取了七八个女工。她根据自己长期工厂生活的经验，懂得提出什么样的问题，群众就会跟上来；再说降落伞车间几乎全是女工，而太田在那儿是颇得“好评”的。她也巧妙地抓住了这一点。她从这八个人当中挑了几个比较积极的女工，打出“仓田工厂部分女工”的名义，上警察局去给太田送东西。送的东西有裤衩、衬衣、夹袄、带子、手巾和手纸，另外还有一块钱现款。警察局让这个拿东西的女工稍等了一会儿，然后有个警察跑出来说，太田感谢大家的盛情，但他有顾虑，不能接受这些东西，因此要她们带回去。这个女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和其他同去的四五个女工把这些东西又带回来了。而伊藤自己过去关押在警察局里的时候，曾经被警察耍弄过这种骗人的鬼把戏，因此她又跑到警察局去了一次，硬把这些东西留在那儿。可是，后来她从须山那儿听到太田的情况，简直把她气坏了。

象太田这种家伙，说不定会以为自己的变节和卑躬屈膝只是他个人的事，却不知道会给许多工人的心灵上带来了多大的阴影。他是个自私自利的人，是个投降主义分子，是叛徒。他要是说出了警察还不知道的我的部署和今后的行动计划，我和仓田工厂的同志们今后要进行的工作，将会困难十倍。——我们就是这样，不仅从敌人那儿，而且还要遭到自己内部的“蜕化分子”的交叉火力的攻击。那天我的交通费不够，只好走着回去。一路上我的神经显得异常敏感，碰到的每个人，都觉得好象是特务。我不断地回头注意着身后。特务们想要抓住我，一定会根据太田的口供在这个地区严密戒备的。据胡子说（他以前对我说过），他们抓住咱们一个人，就可以领到五十块钱。他们在这种诱饵的引诱下，一定在千方百计地搜捕我。——不过，我又想到，我这么心神不定，是很危险的。我可不能被他们抓住！于是我走进一家卖小豆年糕汤的铺子，让心情慢慢地平静下来，然后才回了家。

我们是没有任何所谓的退路的。我们的整个生命都献给了党的工作。这跟做公开工作的人是不一样的。在这种状况下碰上了这样的背叛行为，我们的整个身心都感到愤怒和憎恨。现在，我们没有可以称之为“私人生活”的东西，所以我们是用整个生命的感情（如果可以使用这样的语言的话）来愤怒，来憎恨。

也许我是气糊涂了。平常出入寓所，我总是要正正经经地给房东大婶打个招呼。而这次我连这个也忘了，就直接跑上楼去了。一坐到桌子面前，就脱口骂了一声“混蛋！”

在这以后，连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跟笠原突然亲近起来了。凡是托她的事，不论是什么事，她都一一地满足了我的要

求。由于太田叛变了，我决定最近搬到别的地区去。但我自己不能到处去找房子，因此拜托了笠原。这时我就想到和笠原同居为了踏踏实实地长期把地下工作坚持下去，这样做也有好处。

一个单身汉住在别人的家里，不到哪儿去工作，而且每天一到晚上就外出，——单凭这一点就足够人家怀疑了。以前在工厂里做工的时候，问题还不大，而现在一个晚上平均有三四次联络，尤其是有的时候中间还有一个来小时的空隙，又不能在外面逛荡，只好先回家，然后再出来。这时候，房东大婶马上就露出一副怀疑的脸色来。大婶的那副疑心的脸色，就好似说：这家伙靠什么吃饭呀？警察来查户口的时候，她要是说出是这么一种情况，马上就有被发觉的危险。

笠原在公司里工作，早晨定时上班，要是能跟她同居，即使人家看着我好象整天游游逛逛，也会说我是靠老婆的薪水过日子。社会上总是只信任有固定职业的人。因此我就问笠原能不能跟我住到一起。她一听这话，突然睁大着眼睛直瞪瞪地看着我，但是什么话也没说。过了一会儿，我催她回答我，她还是不言语。那天她终于什么也没说就回去了。

第二次跟笠原见面的时候，她从来没有过那样毕恭毕敬地跪坐在我的面前。她紧缩肩头，两手放在膝头上，身子僵直着，那样子实在是拘谨极了。回想在她那儿过夜的第二天早晨，刚一步跨出门外，她就用一种爽朗的男人腔调大声地说：“啊——，臭老婆子！”而现在这种女人气一点儿也看不到了。我奇异地看着她。

我们谈了各种事情。但是话头一断，她就显得局促不安起来。我们俩都回避上次的谈话，尽量把它往后拖。事情谈完之

后，我终于提起那件事，她说她是下定了决心才来的。

在这以后，我和笠原很快就一起搬到新的住处去了。那儿离仓田工厂虽然稍微远一点，但须山和伊藤还有着可以公开坐电车、走路的“身分”，因此就让他们上我这儿来。这样既能够节省交通费，也减少了路上的危险。

四

须山有事到我这儿来，经常顺便上我母亲那里去一趟。他跟我母亲说我身体很好，又把母亲的情况告诉我。

我离开自己的家的时候，是非常突然的，连自己唯一的母亲都来不及把情况说清楚，就被迫转入了地下。那天晚上六点钟左右，我跟往常一样出去联络。当时我虽然也是从事“非法”的活动，但是以一个黄色工会的会员的身分，利用一切合法的场合，作为工会内部的反对派来积极进行活动。那天六点钟跟我碰头的那位同志对我说，和我一块儿工作的F突然被捕了，被捕的原因虽然还不清楚，但我是直接和他发生联系的，必须马上转入地下。我一下子愣住了。如果因F的关系而知道了我的情况，那就不仅仅是黄色工会的革命反对派的问题，还会牵涉到“老头子”^①的关系。我说我想回家去一趟，收拾收拾，准备一下再转入地下。我以为这么一点余裕的时间总还会有的。而那位同志（他就是胡子）却说：

“开玩笑也得看时候呀！”

^① 对党的上级领导称呼的隐语。

他说话的语气好象是开玩笑，但是他要我一定不能回家，整理东西可以托别人去做，即使只穿着身上那套衣服也要走。他还笑着说：“这可不是学生旅行啊！”胡子是个很难得的同志，他能够把最坚决果断的意见用亲切的语气说出来。他还举了一些例子，说有个转入地下的同志，因为实在无处可去，就以为“今天晚上大概不要紧吧”，于是又回到自己的家里去住，结果第二天一早就被抓住了；还有个同志虽然充分地考虑到搜捕的危险，但因为要处理一些重要的事情，结果一出门就给抓走了。他不说为什么不能这么做，碰到这样的情况，只是举一些适当的事例。看来他是经历过各种各样生活，这方面的经验是相当丰富的。

我向胡子借了他身上仅有的五块钱，匆匆忙忙跑到一个朋友的夫妇家里。后来听说警视厅和S警察局的四个特务果然在第二天早晨就跑到我家里来抓我了。我母亲什么也不知道，大吃一惊，告诉他们说我昨天晚上出去之后就一直没回来；其中一个好象是“头头”的家伙，说我大概是闻风逃跑了。

从此以后我就一直没有回过家。须山带着我的消息去看望我母亲的时候，母亲就好象自己的儿子回来了似的，把须山让进屋里坐下，端上茶，然后就目不转睛地瞅着他的脸。须山给瞅得不好意思，一个劲地搔着脑袋。须山谈起我离家以后的情况，中间稍一停顿，母亲就催着说：“以后呢？以后呢？”母亲长期夜里睡不好觉，弄得眼泡浮肿，眼囊下垂，两个腮帮子瘦削了下去，颈脖子又细又干，脑袋在脖子上战战兢兢地来回晃动，乍看起来，简直叫人感到就要掉下来似的。

据说最后母亲问须山说：“还要多少日子安治^①才能回来

^① 作品中主人公“我”的名字。

呀？”这一下子可把须山问住了。多少日子？！眼瞅着母亲那摇摇晃晃的小脑袋，须山怎么也无法把真话说出来，他说：“嗯，不会太长吧……”

以前我多次被抓进警察局，在拘留所里度过好多个“二十九天”。母亲对这些当然是习惯了。尤其是前年蹲了八个月的监狱，母亲在这期间还给我往监狱里送过东西。由于这些情况，母亲反而对我所从事的活动慢慢地理解了。她只是不明白我这次为什么不跟往常一样，老老实实地让警察抓去；担心我到处逃跑，将来的后果会更加不好。

在以往的日子里，我也许太使母亲伤心了。而我最后还是用自己的破釜沉舟的行动来对待了母亲。我意识到六十岁的老母亲正在向我的心情靠近，可以看出她内心经历的痛苦的斗争，比我们投身于革命运动还要困难百倍。我的母亲原来是一个贫苦的农民，连小学也没有上过。可是，在我还没离开家的时候，她却学习起字母来了。曾经有过这样的事，她戴着花镜，弓着背，把脚伸进熏笼里，膝上放着一块小薄板，把我用过的废稿纸收集在一起，在稿纸的背面，用铅笔练习着写字。我笑着说：“妈，你打算干啥呀？”她说前年我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就因为自己一个大字不会写，没有给我去过一封信，“唯有这件事感到过意不去。”加上我出狱以后，母亲也看出我越发深入地投身于运动了。她觉得这么一来，今后肯定还要被抓走；再说，即使不抓我的话，那次我是被保释出狱的，刑期一判决下来，总归我还是要进监狱的；为了准备我蹲监狱时给我写信，母亲就开始学习认字了。在我转入地下之前不久，母亲写的字虽然又大又不整齐，但是还能够辨认的出来，这使我大为惊异。——而这次据说母亲问须山说：“能不能见一面呢？”须山回答说还是不见为好，母

亲就说：“那末，连信也不能写罗。”我从须山那儿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想到母亲说这些话的心情，心里感到很难受。

须山从我家临走的时候，母亲把我的夹袄、衬衣、裤衩和袜子交给了他，然后还要他等一会儿，自己跑到厨房里去了。在厨房里忙活了好一阵，须山正奇怪老太太在忙什么，母亲拿着五个煮鸡蛋走出来了，嘱咐须山跟我说，鸡蛋一毛钱可买三四个，一定要挑新鲜的多吃点。我和须山、伊藤他们把这些煮鸡蛋分吃了。须山笑着说：“喂，伊藤，咱们吃一个就得啦，要不老太太以后该恨咱们罗。”伊藤装着不懂他的意思，偷偷地擦着眼睛。

以后须山顺便又上我家去的时候，我决心要他明确地告诉我母亲，说我是四年五年也回不了家的；还要他跟我母亲说，我回不了家并不是因为我从事革命运动，而是有钱人的走狗——警察不让我回家；所以不应该恨我，而要痛恨这个是非颠倒的社会。我觉得与其含含糊糊，还不如让母亲明确地知道，反倒会产生一种抵抗的力量。另外，还有这样的事，我认识的一些同志，他们被警察抓去之后，人家说他们跟共产党有关系，家里的妻子和母亲就说，我的丈夫、我的儿子不会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或者说这是捏造的，是因为“要加个罪名”，才说他是共产党。如果真是这样，那就等于是这些同志的家属亲口说出了共产党专干“见不得人的事”，对共产党就可以随意加个罪名。我母亲虽然六十岁了，但我认为她是不会这样想的，也不会这么说的。我的母亲过去五十多年的生活是在贫困的深渊里度过来的，如果把道理给她讲清楚，我想她是能够理解的。

据须山说，我母亲默默地听着这些话。但她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说她今年六十了，一旦有病，说不定今天明天就会死，在

临死的时候，我能不能回来一次。须山没想到她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我听了之后，要须山给她说，就是那时候也不能回去。

“这样的话，我说不出口！”须山露出为难的神色说。

我并不是没有想到这对母亲是残酷的，但是我想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应当让母亲通过这一切的事实，对统治阶级终生感到仇恨（事实上母亲的一生确实是这样）。因此我一再嘱咐须山，要他反复地给母亲讲清楚，我不能给她养老送终，那也完全是统治阶级造成的。——可是，后来我再次和须山见面的时候，心情仍然无法平静。

“怎么样？”我问须山说。

“按你说的那么说了呀。——”

须山说我母亲最近似乎瘦了一点，脸色也有点发青；她问须山只见一面行不行。

我突然想起了渡政^①。据说渡政转入地下以后，他的母亲（这位老母亲现在已经不只是渡政个人的母亲，而且也是整个无产阶级的母亲）问同志们说：“跟阿政再也见不上了吗？”同志们说：“见不上了。”我把这些事告诉了须山。

“这个我明白。不把你的地址告诉她，找个什么地方跟她会一面吧！”

实际上须山见到我母亲的那种样子，内心里早已被感化了。

“可是，那帮特务正在到处找我，不这么做已经够危险的了，万一要是出了事，……”

不过，我到底还是被须山说服了。决定多加小心，约定在一

^① 参看本书第607页注。

个我们平常不去的地方，由须山用汽车把我母亲接去。我按时来到了这家小饭馆子。母亲在桌子的对面，远离着桌边，拘拘束束地坐在那儿，脸色显得相当忧郁。我一见母亲穿着出门的最好衣服，心里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感情。

我们并没有谈多少话。母亲从桌子下面取出一个包袱，从包袱里拿出香蕉、枇杷，另外还有“煮鸡蛋”。须山很快就回去了。临走时，母亲把鸡蛋、香蕉硬塞到他的手里。

过了一会儿，母亲慢慢地谈开了。她说：“你比在家的时候好象胖了一点。我这就放心了。”母亲还说她最近几乎每天都要做梦，梦见我非常瘦弱，被警察抓住了，在警察局里受“折磨”（母亲总是把拷打说成折磨）；每天都是从这样的恶梦里惊醒过来。

母亲还谈到茨城县的我的姐夫，说他今后要来照顾她，要我放心去工作。母亲既然提起这些事，我就把以前托须山向母亲说的话，又亲口说了一遍。母亲笑了笑说：“我明白！”

在谈话的中间，我注意到母亲有点心神不定，好象沉不下心似的，说话也吞吞吐吐，不能尽情地把话说完。——后来，母亲终于说出了原因。她说没有见到我之前，想得她坐卧不安；一旦见到了我，又担心在见面的时候，我被人家抓走，心里七上八下的，心想还是赶快回去吧。怪不得母亲不时地注意着别的桌子上来的客人，一有客人进来，她就直朝那边瞅着说：“那个客人好象不要紧吧！”进来另外一个客人，她又说：“那个人相貌很凶。”而我往往反而不知不觉地用在家时那样的大声说话。这时，母亲就提醒我把声音放低些。她说，与其见到我这么提心吊胆，还不如不见我，知道我平安地在工作就行了。

母亲临回去的时候说，她今年已经六十岁了，虽然还想活上二十年，活到八十岁；但是，现在毕竟是六十岁的人了，说不定明

天就会死；我要是得到她死的消息，说不定还会跑回家一趟；那样做是很危险的，因此决心不让我知道她死的消息。对于一个普通的常人来说，恐怕再没有比临死的时候见不到自己的亲人更大的事了，更何况是一个六十岁的老母亲呢！母亲向我表示了这么大的决心，使我万分地感动。我默默地说不出一句话。我除了沉默又能说什么呢！

走出饭馆的时候，母亲在我的身后说：“我可以一个人回去了，你小心点，回去吧。”接着，突然担心地说：“你那个肩膀就是有毛病。……认识你的人，从背后也能一下子认出你。你得把摇着肩膀走路的毛病改掉才好……”

“噢，大家都这么说哩。”

“就是嘛，一下子就能认出来！”

一直到分别的时候，母亲还自言自语似地说了好几遍“一下子就能认出来”。

从此以后，我把过去留下来的个人生活的最后的退路——和亲生母亲的关系彻底切断了。在今后多少年内，只要新的世界不到来（我们正在为着这个新世界的到来而战斗），我跟母亲将不能生活在一起了！

正在这时候，胡子来信了。

胡子最初在 T 警察局只呆了五天，以后转到 K 警察局，在那里给关了二十九天。有一个朝鲜工人，曾经和胡子同住过一个牢房，由他把这封信捎到须山和伊藤他们常去的 T 那里，这样才了解到胡子的消息。信上写着他是在秘密住所里被捕的，但原因至今不明；还说，要重建自己的队伍，决不能“急躁、冒进，不

能简单从事”。在“急躁、冒进”和“简单从事”这几个字的下面，还特别打了个圆圈。

看了这封信，我和须山、伊藤都觉得自己没做什么工作，还谈不上“急躁”、“冒进”，感到很惭愧。

胡子的家里有父母和兄弟。他还通过他的家给我来了信（用的是仅在我们中间称呼的名字）。胡子在这封信里说，他准备给敌人创造一个“交白卷的审讯记录”，对一切的讯问，只用“不知道”三个字顶过去。看了这封信，我们都说：“太田这小子给咱们带来的一肚子气，这一下子都出了。”

我们坚定地相信，不管出现什么样的叛徒和机会主义者，一条又红又粗的正确路线始终还是鲜明地贯穿在我们当中。

胡子平时经常给我们说，什么也不说，这是咱们的铁的纪律；让咱们说点什么，这是敌人的规律。面对敌人的审讯，哪怕说了一句，这就违背了咱们的纪律，屈服于敌人的规律。对于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当然不能屈服于敌人的规律，而必须遵守咱们的铁的纪律。现在，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到了这一点。

“阿芳，有一个叫肖瓦洛夫的人，你知道吗？”须山问伊藤说。

“马克思主义者呗！”

“又要翻开你的剪报簿了吧！”我笑着说。

“据说肖瓦洛夫被捕的时候，坚持了七个月，一句话没有回答。他还这么说呢——对一个平凡的人来说，最好的办法是学咱那个坚持七个月的战术，不做任何供述。”

伊藤一听这话就说：“咱们有个女同志，敌人明明知道她的姓名和籍贯，可是她就连这一点也不说，一直坚持到底，最后还是放出来了。这件事前些时候还编成无产阶级戏剧来演呢。——

她可是比肖瓦洛夫还肖瓦洛夫！”

她就好象在说自己的事情，弄得须山有点尴尬，一个劲地搔脑袋。

于是，我们决定把“作为一个平凡的人”，对敌人的审讯一言不答，作为我们这次支部会议的决议付诸实行；另外还决定这个决议不仅要在我们的支部执行，还要呈报给上级机关，使它成为全党的决议。

从以后送到 T 那儿的信里知道，胡子又由 K 警察局转押到 O 警察局；在那里，一连三天从早到晚，七八条汉子不停地对他进行拷打追问；他的两手被绑在背后，吊在审讯室的天花板上，下面由拷问的人用竹剑殴打他；晕过去就灌凉水，翻来覆去折腾了他好几十次，但是，他仍然一句话也没有说。

看了这封信，伊藤说：“真叫人可恨呀！”她自己就有两三次在警察局连短裤衩都被剥去了，弄得赤身裸体，警察就用竹剑的尖子朝她的身上到处乱戳。

这些同志们的英勇斗争，使我们振奋起来。每当有些工作非当天完成不可，但自己又困得不行，直想睡，这时候想到狱中的同志，就忍耐着坚持下去。一想起狱中的同志，困一点又算得了什么！——现在狱中的同志怎么样了呢？正在遭到拷打吧？一想到这些，就决心把工作坚持干完。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这样地和狱中同志们的生活直接联系在一起了。狱中和狱外虽然不同，但是在向统治阶级进行斗争这一点上，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五

伊藤在临时工里争取了八九个人。——仓田工厂要解雇六百名临时工的消息，越来越确实了；自从共产党撒了传单之后，谁的眼里都看的很清楚，那十块钱津贴厂方也是不会给的。这种不安的情绪，正好适应了我们的方针，象友谊会之类的小团体，比预想要容易得多地组织了起来。

女工们从厂子里放工回来，肚子都饿得瘪瘪的，伊藤、辻和佐佐木她们（辻和佐佐木是我们争取到的一伙人当中品质最好的）就拉着大伙儿一块上小点心铺子或小面铺子。大家站着干了一天活，累得精疲力竭，都尽挑好吃的吃；加上这一天第一次听不到机器的轰鸣声，大家都高声地谈笑起来，简直想把这一天的话儿一下子统统倒出来。

伊藤她们一向是这么做工作的：伊藤在大伙儿当中，已经被人们叫做“那种人”了，所以她在小点心铺子里说一些“那一类的话”^①，也并不显得怎么不自然。辻和佐佐木担任“敲边鼓”的角儿，一到跟大伙儿在一起，就故意给伊藤提出种种的话题，有时甚至说些反动话，好让伊藤就这些话题发挥一通。起初互相配合的不够好，往往在同一个问题上翻来覆去地兜圈子；有时险些露出了马脚，暴露出她们是串通一气，弄得她们捏了一把冷汗。在这样的時候，谈完话，走出小点心铺子，三个人都发现自己出了一身大汗。不过，这么做过一两次，很快就配合的很巧妙了。

① 指革命的道理。

“敲边鼓”的人要是敲得好，甚至能把那些没有任何想法，只是想交个朋友而跟着来的女工，顺利地争取过来。所以担当“敲边鼓”角儿的人，必须要清楚地了解那些觉悟不高的普通女工内心里存在着什么样的想法或偏见。

女工们一凑到一起，所谈的不外乎是谁和谁的关系暧昧，谁和谁有没有勾搭上这一类的话题。伊藤来和我联络的时候，跟我谈过这样一件事：防毒面具车间的一个正式工吉村，给降落伞车间的女工小绢写了一封情书，情书上写着：“想找个清静的地方，跟您细细地谈谈。”女工们一出工厂，就嘁嘁喳喳地谈论这件事，坐在小面铺子里也尽谈这件事。说是小绢接到这封情书之后，脸上搽的香粉陡然增多了起来，还把小圆镜子系上一个纽子，挂在衣带上，一边干活，一边不停地照镜子。有一个机灵的女工叫阿繁，她说小绢跟她谈心时诉苦说：“说是想找个清静的地方，细细地谈谈，可是工厂里整天这么丁丁当当的，上完夜班往家走，已经是九十点钟了，人累得象一摊泥；再说那人七点来钟就下工，又不能走到一起。”听了这些话，不知谁说了一声：“真可怜呀！”于是“敲边鼓”的佐佐木赶紧接着说：“咱们真是连和爱人说句贴心话儿都办不到呀！”接着大伙儿七嘴八舌地说：“是呀！”“真是这样！”

“想说句贴心的话儿吧，首先劳动时间这么长，就办不到；再说，有时还想两个人去看看电影哩！……”

大伙儿都笑起来，说：“这是大实话！”

“而且每天挣这么点钱，那也不行哟！”

“是呀！劳动时间不减少，工钱不增加，恋爱也谈不成！”

“工厂实在是太刻薄了！”

“咱们那儿的工头，今天还跟咱们这么嚷嚷呢：你们知道不

知道，现在是什么时期呀？是战争时期！你们应该把自己看成是军队的一部分，要豁出性命好好地干活！战争稍微一扩大，就要你们跟当兵的一样，发一点点饷金，也要照样地干活。这就是为国效劳。——这个秃头的兔崽子就是这么说的。”

这些话使伊藤也感到吃了一惊。伊藤还没有意识到，话题就已经从恋爱而转到工厂待遇的问题上了。这时候，连“敲边鼓”的也傻了眼。以后的谈话，丝毫没有牵强地、自然而然地转到攻击工厂的做法了。

我从伊藤那里听到这些话，感到确实是这样。自从战争开始以来，到处都在残酷地增加劳动强度。女工们虽然和男工干的是同样的劳动（甚至比男工还要重），但她们所受的剥削在迅速地加重。在现在的情况下，如果不解决经济问题，确实是连“谈恋爱”都办不到。即使没听到大家所说的这些话，我也是感觉到了这一点。

伊藤最近想带这些女工去看点有意义的戏，但大伙儿一直想看浅草的歌舞剧或片冈千惠藏^①的戏，所以伊藤、辻和佐佐木决定用“敲边鼓”的办法，做点宣传鼓动工作，让她们去看左翼剧场的戏。

听了伊藤汇报之后，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要吸收男工参加这个集团，这只要跟须山联系一下，不会有什么困难，哪怕有一个男工参加，大家的劲头就会不一样；另一点，这个集团不能尽是临时工，要让正式工参加进来；我觉得这一点最为重要。伊藤也同意了我的看法。

另外，我们过去带进工厂的传单总有点工厂小报的味道。

① 片冈千惠藏(1904—)，又名植木正义。当时的著名电影演员。

为了对付对六百名临时工的解雇，我们决定停止这样的做法，把传单和工厂小报分开，各自独立起来。

我让须山考虑考虑工厂小报的名字，他抽动着鼻子说：“就叫《降落伞之恋》，怎么样？”

工厂小报最后决定用《防毒面具》的名称来出。因为我现在不在厂子里做活，决定由我从S那儿接过小报的编辑工作。我把伊藤和须山送到我手头的报告收拢在一起，根据这些报告写成稿子，送到油印的地方；伊藤一清早就到负责油印的联络员那儿去取。我和须山、伊藤每天保持联系，了解工厂小报的影响，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并把它立即反映到下一期的《防毒面具》的编辑工作中去。

听了伊藤和须山的汇报，知道厂方也在时时刻刻策划对付我们的办法。现在他们对发十块钱津贴和解雇的事只字不提，令人很感不安。这显然是在为下阶段策划什么阴谋。不用说，可以想象这种阴谋的目的，是既不发十块钱津贴，又能巧妙地把临时工强行解雇掉。但是，如果不清楚地了解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阴谋，并在群众的面前揭露它，那还是不行的。假如仍然按过去的老办法行事，群众就会离开我们。我们的战术必须准确地适应敌人的那种资产阶级的狡诈的战术。回顾我们过去失败的教训，一开始总是我们压倒了敌人，但是，敌人一旦摸透了我们的做法，就会出其不意地来袭击我们；而我们却不留意敌人究竟要怎么干，死抱住老办法干下去，这样，敌人的阴谋就会得逞，就会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把我们打倒。

伊藤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她说：“最近的情况有点儿怪！”但是她不知道怪在什么地方。

第二天须山拿来了一张纸片。纸片上写着：

布告

由于大家的勤奋努力，本厂的事业进展十分顺利。对此，我和大家一起感到高兴。大家都知道，战争决不是仅靠士兵所能进行的，如果大家不努力进行制造防毒面具、降落伞和飞艇外壳的工作，我国就决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工作中如有某些困难，希望我们能以士兵在战斗中冒着枪林弹雨、英勇奋战的精神和决心，加以克服。

为促进大家的决心，将进此忠告。

厂长

“咱们的工作进入了第二阶段啦！”须山说。

工厂按原来的规定，等工作到一定阶段，就把六百名临时工解雇。而现在据说要改变方针，准备挑选二百来名工作成绩优秀的临时工升为正式工，因此希望大家努力干活。并且已经在工厂里到处放出了这样的风声。

我和须山这一下子才明白了。他们放出这样的“风声”，显然是一种阴谋，一方面是为了在实行解雇之前，破坏工人进行有组织的反抗；另一方面利用这个“布告”，散布“也许能提升为正式工”的幻想，诱骗临时工为他们卖命干活，进一步加强剥削。

须山为了揭露事情的真相，他把布告给抄来了。经过研究，我们明白了工厂的第二阶段的策略。

我和须山、伊藤每天都保持联系。但光靠这样的联系，还不能商定出精密细致的措施，因此约定每星期有一次三个人在一起“坐坐”（坐下来讨论）。地点由伊藤去找。须山和伊藤的身份是“合法的”，没有什么问题；而我要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呆上两三个小时，那就相当的危险，因此要特别小心注意。我们规定了这样的办法，我跟伊藤在街头联络时，问清楚地点，察看一下周围的情况，感到确实安全时，才让她和须山先去，然后我抄另外

一条道到那儿去。我到那儿去也不是直接走进去，而是要先看一看某一个约定的地方，如果没有有什么异常的情况，伊藤就会预先在那儿做好一个安全“记号”。

一天晚上，由于白天晒热的柏油路的蒸发，风中带着暖烘烘的热气。我带着要交给须山和伊藤的《旗》（机关报）和宣传小册子，走出门去。我们约定这天晚上在一起“坐坐”。走到半路上，看到街角上站着两个警察；走到另一个街角上，那儿又站着三个警察。我感到情况不妙，心里琢磨着，我身上还带着东西呢，今天的会怎么办。我一边这么想，一边迟迟疑疑地往前走。走到派出所的前面，那儿又站着两三个警察，令人吃惊的是他们都把帽带紧扣在下巴颏底下。我要是中途往回走，显然不妥当；没有办法，只好继续往前走，但脚步有点犹豫起来。这时，派出所前面的一个警察好似已经注意到我，做出一副就要朝我这边走来的样子。——我马上装着有点迷路的样子，把帽子拿在手里，迎上前去问道：“请问这儿是 S 街吗？还是……”

警察用讨厌的眼光在我的身上扫了一眼，说：“是 S 街。”

“啊，谢谢您啦！”

我朝 S 街走去。走了不一会儿，我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回头瞅了一下，刚才注意过我的那个警察已经背转过身子，跟另外两个警察在谈话。我敲了敲掖在衣服里面的《旗》和宣传小册子，心里暗暗地骂道：“兔崽子！该感到可惜吧，白白地把五十块赏钱放过去了！”

我担心万一会出事情，就直接回家了。第二天早晨一看报，才知道原来是出了一件杀人案子，我们往往因为一些别的事件而遭到连累；敌人也常常利用这类事件来搞什么“抓共党”。现在每逢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就吹嘘一番，说是“得到了意外的副

产品”。这句话就足以证明他们所搞的阴谋。据 S 说,外国的杂志上说,日本没有夜晚外出走路的自由,没有在咖啡馆里畅谈而不受警宪无理盘查的自由。事实确实是如此。而他们这样做,目的是在于向我们进攻。

我平常很留心报纸,早晚出去,事先都要调查一下我要去的那些地方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特别是有关捕获过去在逃的杀人犯或强盗之类的报道,我总是要从头到尾阅读一遍。当时,我不仅自己订了报纸,还让笠原给我买来各种各样的报纸,我都要仔细阅读。有一次,有一段关于一个隐藏了七年之久的犯人的报道,我感到从中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每天早晨来的报纸,我首先就是从这一类的报道读起。

我现在跟和我一起从事地下工作的 S、N 等人,订了一个“五年不被捕计划”,开展社会主义竞赛。五年计划要争取实行六年、七年;年头愈长,成绩就愈大。所以我们提出的口号是“五年计划六年完成!”因此,我们的日常行动就不能依赖于偶然性,而应该立足于科学的考虑来开展我们的活动。笠原经常从旧书店里买来《新青年》^①叫我看,我不知不觉地有时也认真地读起侦探小说来了。

第二天,我去进行定期联络时,须山一见我就说:“放心了!放心了!”我从来没有失过约,他以为我一定是被捕了;他说没有见到我之前,想的尽是一些不吉利的事,弄得心神恍惚。我谈了昨天险些遭到牵累的事,接着笑着说:“我不是说过吗?五年计划要六年完成嘛!”

“话是那么说,可是……”

^① 当时专载侦探小说的杂志。

昨天因为我受杀人案的连累，没有能够去“坐坐”，今天须山又为此作好了准备。地点是伊藤的住处。这一两天她就要搬离那儿，因此决定使用她的住处。那儿同住的有七八个房客，条件不太好。说好我要小便的话，就使用伊藤生病时买来的尿盆，而不要到楼下的厕所去。上厕所碰上同住的房客，如果正好又是个熟人，那就麻烦了。

“转过脸去！”我跟他们俩这么说，走到屋角里，用那个玻璃尿盆解了手。伊藤耸动着肩头，哧哧地笑。

“好臊！”须山装模作样地捂着鼻子这么说。

“麒麟牌的生啤酒！”我一边把尿盆推到墙角里，一边这么说着，把他们俩逗得哈哈大笑。

看来仓田工厂就要发动最后的攻势了。这从伊藤的汇报中也可以看的出来。据说跟伊藤在一块儿做活的一个缝降落伞的女工，正在看我们早晨带进厂子里去的第三期《防毒面具》，一个四五天前新调到车间里来的男工，猛地把小报夺过去，还把这个女工揍了一顿。过去带进《防毒面具》或传单，大伙儿只是提防着工头，对同伴们并不注意，因而放松了警惕。伊藤看到这种情况，感到事情有点怪，就去调查这个男工。后来她从一个清洁女工那里了解到，这个男工是本地区青年团的团员，又是在乡军人，是战争开始以后特别雇进来的，以后注意观察了这个家伙，在第一车间和第二车间好象都有他的同党；有时在工作时间也离开工作台，跑到别的车间去；再一注意，工头看到这种情况也从来不说什么；另外，最近还发现他跟仓田工厂里的大众党系统的“僚友会”（这个组织以前就存在，但没有开展过任何活动）的清川、热田那些家伙好象也有往来。

令人奇怪的是，过去一直默默无闻的“僚友会”，最近也慢慢

地活跃起来；其次，不知道从哪儿放出了风声，说现在国家处在非常时期，本厂工人负有重大责任，应当比其他产业的工人更加自爱自重，更加紧张地干活，因此仓田工厂里服过兵役的人应当成立一个在乡军人分会，据说厂长等人都表示赞成。看来这些话大概是那些特别雇来的家伙放出来的，一两个僚友会的家伙明确表示要给予协助。事情很清楚，厂方要是出面来干这种事，效果不会大，因此玩弄阴谋，好象这是从职工中自发搞起来的。

我问须山说：“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他说他那里还没有明显的表现；但他想了一想，说最近在午休的时候，有些家伙跑来跑去，到处大谈特谈战争的问题。他说听了伊藤刚才的汇报得到了启发，以前他以为午休的时候，大伙儿谈谈战争，谈谈经济行情，只不过是把从什么地方听来的消息或自己的朴素的想法，作一番渲染，以显示显示自己，或者说一些泄气的话。而现在仔细一想，事情并不这么简单，看来是有人在那里有计划地到处进行煽动。——由此可以看出，敌人已经全面出击，这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

我们要战胜敌人，就必须对敌情有一个正确的、科学的认识。现在，敌人懂得了，单凭自己从上面来压制职工已经不行了，光靠便衣警察来监视工人的上下工也不够了，因此又想出了第三套办法，认为必须从职工的内部来阻止我们组织的深入发展。看来正因为是要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僚友会”才活跃起来，才企图在工厂里扩大青年团和在乡军人分会这一类的组织。因为这里是工厂，而且是军需品工厂，它具备着易于建立这些组织的危险的条件。我们必须认识到，现在我们在三条战线上同敌人的势力遭遇了。

据须山说，敌人现在在工厂里大肆宣扬战争的办法，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只是说什么要“忠君爱国”呀，什么中国佬可恨，非把他们打倒不可呀，而是说这次战争跟以前的战争不一样，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三井、三菱这些大资本家在占领的地区建立大工厂，而是为了无产阶级找出路；说什么打下了满洲，把资本家排除出去，由我们自己建立一个王国，内地的失业者就可以大批大批地进入满洲，这样就可以逐渐地使日本没有一个失业的人，俄国就没有一个失业的，我们也应该跟它一样；因此说，这次的战争是无产阶级的战争，我们的力量虽然微薄，但应当根据战争所规定的每一个部署努力地干活。

僚友会的清川和热田说，这次的战争归根结蒂是为了大资本家在殖民地进行新的剥削；在午休的时间，同在乡军人及青年团的职工展开了辩论。不过，清川又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次的战争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好处。比如金属和化学之类的军需品工厂，增添多少工人也显得不够用，出现了空前的盛况；还说从所谓“战争股票”的猛涨来看也可以得到证明，帝国火药公司的股票原来是四元，现在是九元，提高了一倍多；石川岛造船厂的股票由五元增加到二十五元；造子弹用的铈的市场价格，由以前的二十元左右涨到现在的一百元左右；另外象德国，人们都以为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败涂地，其实象克虏伯钢铁厂却比平时获得了十倍的纯利（这些大概都是从什么地方听来的），所以我们的生活也可以沾战争的光而得到好处，一概地反对战争不划算，应当尽量地来利用战争。——这就是他们的观点。尽管最初他们跟青年团、在乡军人争论不休，但一谈到这儿，彼此的意见就不知不觉地一致了。

从午休时间工人们谈论的情况来看，他们听了青年团所说

的“满洲王国”之类的话，感到简直象做梦一样，不知道是相信好，还是不相信好，最多也只是觉得，如果真能实现，那倒也不错。不过对清川这些人的话，临时工们倒是赞同的。他们认为：要是去打仗的话，不是白白地送死，就是变成个残废，即使最后能成立个“满洲王国”吧，但也弄不清楚它会不会真地给自己带来好处；可是，话又说回来，到底还是因为有了战争，自己总算从长期的失业中找到了职业；所以，尽管干的是临时工，拿不到津贴，还要被强迫加班加点，和正式工干的是同样的活，只因为是临时工，工资却要少的多，心里感到不满意，但是，到底还是得到了一点战争的好处。

象清川这些家伙，本来是标榜所谓“为了工人的利益”的政党——大众党的一员，而现在他们连这一点起码的招牌都忘掉了，简直就象个资本家，居然关心起股票的价格，一心想从中获得好处。可是他的这些论调，却巧妙地抓住了有些职工（尤其是临时工）只顾眼前利益的心理。

伊藤说，她自己和她的那些伙伴，想要在群众的面前揭穿这些论调的老底，让女工们正确地了解事情的真相，可是一到实际做的时候，就很不得手，不能对他们进行有力的反驳，“恨得牙痒痒的，就是没有办法。”我感到伊藤说的是实话。我们清楚地了解这次战争的本质是什么，但是不能以此为满足，因为我们在密切结合群众的日常生活来解释战争的本质，使群众都能心悦诚服，这一点做得很不够。列宁就说过，就连一些革命的工会，也往往会在战争的问题上犯错误。更何况现在清川和热田这些家伙正在极力把水搅浑，把问题弄得更加模糊，所以就越发困难了。

工厂最近几乎每天都要把下班的时间由五点延长到六点，

甚至七点，而且多干活也不增发工资。临时工们虽然嘀嘀咕咕地有意见，但又担心不干的话，以后说不定转不成正式工，只好留下来干。可是要干到六点的话，不带饭来吃是不行的，饭钱又没有出处。这么一来，干活延长到六点，一天的工钱反而减少了；这种做法，尽管没说要降低工钱，实际上是降低了。大伙儿都说这是“欺侮人”，感到很愤慨；伊藤所在的降落伞车间，要工人们留下来加班到六点，她们就说：“不给我们出饭钱就不干！”

不仅这样，最近在劳动时间方面，虽说同样是干十小时，可是劳动强度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因为抱着也许能升为正式工的指望，大家的活儿眼看着大大地加紧了；以前还可以边干活边跟旁边的人说说话，还可以象小绢那样，在衣带上挂个小镜子，不时地拿起来照照。而现在连用袖子擦擦汗的工夫也没有了。象降落伞车间是使用电熨斗，大家浑身都被汗水湿透了，大颗大颗的汗珠，扑嗒扑嗒地滴在铺开的降落伞上。从生产量上可以推算出来，工厂赚的钱要比以前多百分之四十，可是发给工人的工钱仍然照旧。这对于实际在干活的职工来说，那是非常清楚的，可是大家一谈到自己的生活，仍然是战争归战争、干活归干活，把它们割裂开来考虑。他们不了解，劳动中日益加重的残酷性，都是来源于战争。所以，只要让他们懂得把这两方面问题结合起来考虑，大伙儿凭直觉也能识破清川和青年团的谬论。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明确了支部应该把新的斗争的重点放在什么地方。要想杜绝清川、热田这些家伙在临时工中散布的影响，就得要大家在僚友会里提出“反对加强劳动强度”、“提高工资”和“改善待遇”等问题。这么一来，他们就会提出种种的谬论，到最后，他们决不会站到这一斗争的前列，反而要拉群众

的后腿。那末，我们就立即抓住这一点，在群众的面前，揭露他们不是站在工人的一边。我们还决定要在《防毒面具》上，重新提出工厂里的法西斯分子和社会法西斯分子的问题，不断地对他们进行揭露。把这作为支部会议的决议。

“这么看来，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战，就要到来了！”须山一边用火柴一张接一张地烧着乱划着字的纸片，一边这么说。

“对！要战胜他们，就得要有科学的正确的方针，要有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把这种方针贯彻到底的决心。法西斯分子要是蠢动，咱们就跟他们拚命！”

我这么一说，须山就笑着说：“对我们来说，工厂不是城堡，而是战场！”

“这又是谁的典故？”

“我自己的！”

后来，我参加党的地方委员会的组织部会议，听到一个汇报说，在国营N军火工厂，用荷枪佩剑的宪兵来监视还嫌不够，还让宪兵穿上工人服混进了各个重要的车间。那里的支部最近被破坏了，原因就是由于不明底细，而向“穿着工人服的宪兵”做了工作。这样的“工人”表面上都故意装着很有觉悟的样子，所以特别危险。仓田工厂本来不是军火工厂，目前还没有派宪兵来。但是应该考虑到，事态再发展下去，宪兵也不是不会来的。

六

一看表，还只有九点，于是决定闲聊一会儿，我们都把身子横躺了下来。我一看伊藤的梳妆台，那比笠原的梳妆台要漂亮的多了，连黄的、红的、绿的胭脂香粉都样样齐全，我就说了一句：“啊哟哟，可不得了！”

伊藤明白了我的意思，站起来说：“讨厌鬼！”

“伊藤搽上红的、绿的、黄的胭脂香粉，摇身一变，天天晚上玩弄各种迷人的手腕呢。”须山笑着说，“你看，那儿有那么多三越^①、松坂屋的包装纸，全都是进贡来的，真是幸福的人儿呀！”

在工厂里，只要是稍微能看上眼的漂亮的女工，工头、各部门的主管人和一块儿干活的男工，一般都会给她们买礼品，带她们上松坂屋，或者一块儿上小点心铺请她们客。伊藤对那些看来有培养前途的普通职工，只要他们一邀请，伊藤就跟他们出去，当然她自己愿意主动地邀请他们。所以她总是把脸蛋儿打扮得漂漂亮亮地才去上工。而男工的情况也是一样，只要是穿着还干净整齐、相貌长的还不错，就会象太田所说的那样，“直接而具体地”被女工们缠上了。

“你最近怎么样？”我问须山。

须山摸着下巴，笑嘻嘻地说：“一向运气不佳！”

“小芳还没有？……”我两手托着腮，没有转过脸，只用眼睛看着伊藤，这么问道。

“什么？”伊藤反问了一句。但她很快就明白了我的意思，眼

^① 东京的大百货公司的名称。

睛在一刹那间流露出一种表情，马上又恢复了平静，回答我说：“早着呢！”

“说是要等革命成功以后再谈呢！据说是因为咱们这些男同志，一旦结了婚，尽管是马克思主义者，三千多年的旧意识仍然会发作，也会把咱们的阿芳当作奴隶来看待啊！”须山笑着说。

“须山在作自我坦白呢！”伊藤几乎是带着冷冰冰的表情在说话。

“是没有碰到好的同志吧。”我看着伊藤这么说。

“你看我怎么样？”须山骨碌一下抬起上半个身子说。

“太不相配了！”我说。

“谁不相配？我吗？”须山嬉皮笑脸地说。

“这小子，真不要脸！还以为自己挺美呢！”

我们三个人都放声大笑起来。——我把我们周围的同志都想了一遍，感到能配得上伊藤、和她一起生活的也确实不多。如果真是她看得上的对象，那一定是一个很优秀的同志；这么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互相帮助，为党工作，那该是多么理想啊！——我跟伊藤一直是这样在一起工作过来的，但我从来没有把伊藤当作这个问题的对象考虑过。当然，这也说明了伊藤一向是非常严肃的，所以也就自然地在我的思想上反映出来。

“我负责给你找一个好样的！”我用开玩笑的语气对她这么说，但也包含着我的真心。这时，伊藤用一种苦涩的神情看了我一眼。

回去的时候，我到大街上雇了一辆出租汽车。车子好象是要抄近道，转了好多条黑暗的街道，突然开进一条热闹的明亮的大街。我赶忙装做有点醉了的样子，把帽子盖在额头上。

“到哪儿了？”

一问，说是银座^①。我想这一下可糟了。这种繁华的场所是很不好对付的。可是我又不能说，只好装作没事的样子，把帽子又往下拉了一点。但是我又想，我不是好几个月没有见过银座了吗？！掰着指头一算，有四个月没见了。我不时地抬眼看看大街的两旁，这一带跟我从前从这儿走过的时候大大地不一样了。我不知不觉地贪婪地看得入了神。以前我也曾经产生过和这类似的感情。那是前年蹲监狱的时候，因为要出庭受预审，我被戴上了手铐，装上监狱的囚车，在开往法院的途中，我从镶着铁格子的车窗中，看到了半年未见的新宿^②的熙熙攘攘的人群。那时候，我真想把每一座建筑物、每一块招牌、每一辆汽车，乃至拥挤的人群中的每个人都看个仔细；我非常留意，希望能从人群中看到一个熟悉的同志。记得后来回到监狱的单身牢房时，眼睛酸溜溜地痛了一两天。

车子开到第四条街的十字路口，电铃滴铃铃地响起来，对面电杆上的红灯亮了。我坐的车子只好在停车线前停了下来。各种各样的行人立即川流不息地从车窗外拥过去。有的人还朝车子里瞅了瞅。我的心里七上八下的。为了万一出事好逃跑，我用手握着另一边车门的把手，把脑袋耷拉到胸前。过了一会儿，电铃又滴铃铃地响了。我这才松了一口气，放松了握着车门的手。

看到无数个漫步的行人川流不息地走过去，我就想到自己的生活中根本没有漫步这回事。对我来说，既不允许随便到外面去蹓跶，就连在屋子里也不能轻易地打开窗子，让外人看到我的脸。在这一点上，我跟关在拘留所或单身牢房里的同志们没有

① 东京的一条繁华大街。

② 东京的一个繁华区。

什么两样。而在某种意义上比这些同志更加难受，因为我可以随便外出走走，但必须要竭力加以抑制。

我是有了自觉，感到非这么做不可，所以还算好一些。而跟我一块儿生活的笠原，看来是很难适应这样的生活。她有时还是想跟我一块儿到外面走走，可是这根本办不到，她就显得有点烦躁不安了。再说她白天上完班回家来，我总是老早就出去了，跟我碰不到一起。因为我是白天呆在家里，只是利用晚上出去。所以连一块儿坐在屋子里的机会都很少。这样的状况继续了一两个月，眼看着笠原一天比一天不高兴起来。她似乎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极力克制着自己，可是日子一长，就受不了了，朝我的身上发泄起来。一个完全不能过私人生活的人，跟一个有大部分私人生活的人生活在一起，确实是一件苦恼的事。

“自从跟你在一起，没见你一个晚上呆在家里，没有一次带我出去散过步！”

笠原终于说出了这样明显的糊涂话。

为了缩短我们之间的距离，我曾经想过也让笠原参加我们的工作，而且也试着这么做了好几次。可是，自从跟她一块儿生活之后，我发觉她不是适合做这样工作的人。她是一个感情脆弱、缺乏毅力的女人。我跟笠原说过：“你是个气象台！”为了一点点琐碎的小事情，她就犯急躁，或者相反，动辄就跟你怄闷气。这样性格的人，根本不可能干我们这样的工作。

当然罗，她一天的大半时间，是在打字员这样一种脱离工人生活的工作中消磨掉的，回到家里还要做饭，逢到星期天什么的又要赶着洗两个人衣服，很少有空闲，生活的负担重，确实是够可怜的。可是，她自己没有从这儿摆脱出来的勇气，甚至连这种愿望也没有。我想帮着她这么做，她就是不跟着来。

我半路上下了汽车，走了两站地，然后趑进小胡同，回到了家里。笠原脸色苍白，没精打采，横着腿坐在屋子里。她一见到我就说：“我被人家裁了！”

这太突然了，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呆呆地站在那儿看着她。

——其实笠原并没有干过什么事，而公司里却在议论她是赤色分子，于是主任就跑去找她原来的房东（也是她的保证人），发现她早就不住在那儿了。我的住处是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的，所以她把自己的住处仍说是以前的地方。这么一来，公司方面就更加感到可疑了，赶快把她解雇了。

最近以来，我一直是靠笠原的薪水来付房租和零零碎碎的日用杂费，这样才勉强把生活维持了下来，没有使工作受到妨碍。所以她的解雇，确实是一个相当大的打击。本来公司决定要解雇一个人，起码得要向它要一笔相当可观的退职金。可是，因为我是从事非法的活动，就没法去硬要；实际上，公司的主任早就暗中安下了钉子，说没有把笠原送到警察的手里，就已经算是便宜了她，还是希望她老老实实地自动退职吧。

我们立即面临极大的困难。糟糕的是楼下房东大婶很快就会知道。如果得不到房东的很好信任，单凭这一点，就会被人们怀疑。这么一来，就不仅是糟糕不糟糕的问题，而是非常危险了。所以无论如何首先得付房租。而付了房租，剩下只有两三块钱了。两三块钱很快就会花光。笠原每天跑出去找工作。我一天平均要出去四次，以前坐车去的地方，现在我决定改为步行了。所以每进行一次街头联络，前后要多费三四十分钟，有的地方来回一趟要花两个小时，工作效率眼看着大大降低了。我向同志们发起了“募捐”，见到一个同志就苦笑着说：“当不成须山

的‘神田伯山’了！”要他们给我五分、一毛。须山和伊藤很为我担心，他们说自己是过着合法的生活，没有钱关系不大，而且还可以向别人借，因此从每天的工资里拿出五毛一块的给我花。我感到不能随便地花这些钱，只用于联系工作的交通费，吃饭方面就尽量节约。茄子很便宜，五分钱可以买二三十个，把它塞进楼下房东大婶的糠酱里，早晨、中午和晚上的三顿饭，就靠这种酱茄子凑合过去。接连吃了三天，身体马上就受到了影响，一上楼梯就气喘、出汗，感到吃不消。

尽管肚子饿，身子发软，可是每天吃的是老一套，弄得一点食欲也没有了。后来就用开水泡上饭，使劲地闭上眼睛，稀里糊涂硬往嘴里扒。有饭吃还算不错呢，有时候只在早上吃一顿饭，晚上要进行三次街头联络，而且没有钱坐车，必须要步行着来回，自己感到确实够惨的。有一次，心里想，见到那个同志，总会吃上一顿面包吧，于是抱着指望去了，结果却大大地失望了。那个同志感到很过意不去，说他现在就去见M，也许他会拿出面包钱，要我一块儿去试试。我饿得实在受不了，加上M又是熟人，就决定跟着一块儿去了。在M那儿，我吃上了奶油和面包。M笑着说：“为了吃一块面包，你这样一个大人物，居然大大咧咧地跑到我这儿来了，要是给抓住了，那可不得了啊！”我说：“抓住了，我第一句话就说：给我面包！”说完我也笑了。——不过，我也感到这样继续下去，确实很不妙。为了踏踏实实、专心致志地把工作长期坚持下去，不遭逮捕，这么冒冒失失地蛮干是不行的。

我下了决心，要采取最后的手段。这天，我回到家里，鼓起勇气跟笠原商量，她能不能上咖啡馆去当女招待。她最近由于每天到处去找工作，弄得疲累不堪，情绪很不好。她一听我的话，突然扭转过身子，露出一副厌烦的、阴沉沉的脸色。我简直

不敢看她了，而她就这么一动不动，顽强地一声不吭。我没有办法，也只好不说话了。

“你又说是为了革命工作吧?!……”笠原并不看我，反而冷静地低声地这么说。接着，也不等我回答，却突然尖声地喊着：“当妓女也行呀!”

正因为笠原平时总是不愿跟我走，所以她把自己所做的一切都看作是为我的牺牲。如果说牺牲，那我几乎是把自己的全部生活都牺牲了。每当跟须山、伊藤他们碰头之后往回走的时候，想到他们是回到普通的世界、普通的自由的生活里去，而自己仍然要回到一点不能疏忽，丝毫不能随便的生活里去，心中不免要产生一些感慨。而且要是一旦被捕的话，就会有四五年的监狱生活在等待着。不过，这些牺牲，要跟千百万工人、贫农在每天的生活中所作的牺牲比较起来，那简直是微不足道。我从自己的父母当了二十多年的贫苦农民尝尽痛苦的生活中，可以切身地体会到这一点。所以我认为自己的牺牲，是为了解放千百万工农，避免他们付出必不可少的巨大牺牲。

可是，笠原还不能真正领会这个道理，更糟糕的是她把什么事都看成是“为我牺牲”。她说：“你是个了不起的人，象我这样一个糊涂虫，就应该为你牺牲!”——可是，我是一个根本没有个人生活的“我”，所以事情很清楚，为这样的一个人而牺牲，那是意味着什么。我是组织的一员，保卫组织就是我们的工作，就是解放整个无产阶级的工作，我有义务要把这一工作进行到底。所以我必须要十分保重我自己。这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伟大，也不是因为我是什么英雄。——笠原只知道个人生活，所以她只能用个人的尺度来衡量别人。

我跟笠原仔细地说了这个道理，她默默地听着。这天晚上，

她以后一句话也没说，很快就睡了。

七

晚上，给《防毒面具》写稿子，整理准备提交地方委员会的报告，又读了积压下来的、由负责发行的同志转来的宣传小册子和资料，弄得很晚，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十点来钟。我好象猛地一惊，睁开了眼睛，——我对楼下有人来这类事，是十分敏感的；这一点，连我自己也感到惊奇。——抬起身子注意一听，果然是来了警察，是来查户口的。我早就把自己的籍贯、姓名等等都写好了，交给了大婶，免得在这时候把自己叫出去。警察正在仔仔细细、追根盘底地询问大婶的家庭，简直就象审问犯人一样。我感到情况有点不对头，一边把装着文件的皮包上了锁，不声不响地开始换衣服，一边竖起耳朵听着。——“有房客吗？”警察问。“有。”……大婶又回到了饭堂，好象是把我写的纸条交给了警察。

“这上面没有写以前住的地方呀。”……“是夫妇吗？”“是什么时候登的记^①，还是没有登记，这一点没写清楚。”大婶说了些什么。“丈夫不工作吗？”……“现在在家吗？”——我想：果然来啦！只听大婶回答说：“现在出去了。”我这才松了一口气，马上就想到：还是把仅有的钱都掏出来付了房租做对了。“那末，回头再给我仔细问一问。记住！”警察这么说了之后，好象就要走了。我心里想：“好啦！好啦！”又重新坐到被子上，又听警察一

① 这里指正式的结婚登记。

边开门一边说：“最近赤色分子常常租人家的房子住，你可要当心！……”我心里扑通了一下。“啊？”大婶反问了一声。警察好象又说了两句什么话。大概大婶还不懂得什么叫“赤色分子”吧。

通过这样的盘查，我感到这不是一件寻常的事。这一天，出外联络回来，在附近的一条街上，看到一个警察捧着户口册子走进一家小铺子；而在同一条街上隔不多远，又有两个警察拿着户口册子从一条胡同里走出来。和S会面的时候，我提起早晨查户口的事，他说现在全市好象在挨户调查出租房子的人家，要我千万小心注意。我从这种大张旗鼓的调查中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敌人过去不知有多少次说我们党已经垮了，已经被连根拔掉了；在他们的大报纸上大登特登这一类的消息，极力想让不明真相的工人相信他们的那一套，企图切断党对群众的影响。可是，就在他们这么大肆宣传之后不久，党还在到处活动。不管他们怎样进行欺骗，也是没有什么效果的。现在，在这个战争时期，尤其是面临象“国际劳动节”或八月一日的“国际反战日”之类的重大节日，他们总是要千方百计地想把党的力量连根铲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正使出全部气力，把他们所掌握的全部国家权力来一个总动员。他们造谣诽谤，嘴上蔑视党，把党不看在眼里，可是事实正好相反，这表明了党是他们最强大的敌人。据说某个外国报纸把日本的党称作“小而有战斗性的党”。S（他跟须山不一样，须山很熟悉“神田伯山”之类的典故，他很了解这方面的情况）跟我谈起这个问题时说：“这个小而有战斗性的党可是一个巨大的力量，它站在对等的地位，不，超过了对等的地位，在同一个国家政权对抗！”他说：比我们要庞大几百倍的敌人，正在拚命地想把我们这个“小而有战斗性的党”连根拔掉，所

以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应当带着这种“自豪感”来进行工作；他还说：“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自豪感。”这时，我们都非常兴奋。为了把这种自豪感坚持到底，我们就决不能让他们逮住。

在这样的情况下，住在出租的房子里是极其危险的。我和须山、伊藤还指望仓田工厂在五一节那天有所行动。结合六百名临时工解雇的问题，只要我们努一把力，这还是很有可能的。现在如果就被敌人抓去，那简直就等于是对阶级的背叛。据说S最近在枕头边放了一根粗大的手杖和一双草鞋睡觉。我早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打算在晒台上放一双草鞋，但是还没有实行。这次在路上买了一双带回了家。

跟须山一见面，我才知道“搜捕赤色分子”的活动并不只是在工厂外面进行。事情是这样——我去进行街头联络，只见须山满脸包着绷带，一瘸一拐地从对面走过来，我吃了一惊。他说是“挨打了！”不时地按着包着绷带的脸。他说他伤口发痛，一直考虑是出来还是不出来，但想到现在是这样的时期，联络一断就会引起麻烦，因此还是勉强地来了。我们决定不在外面走动了，进了一家小点心铺子。

据说工厂方面单靠厂外的警察效果不大，于是请清川、热田的“僚友会”和在乡军人的青年团打进工人里面，企图从内部来“搜捕赤色分子”。可是，《防毒面具》和传单上连这件事也把它揭露出来了，这一下他们好象是着了慌。从两三天前，工厂就搞了一次所谓的“慰问金”的募捐。本来这类事早已过时了，仓田工厂搞它的目的，是想用它来在工厂里造成一种气氛，不让所谓的赤色分子有渗透进来的余地。由此可见，不论是所谓的“忠君爱国”也好，什么也好，如果对他们没利，他们是不会关心的。给工厂出这个坏点子的，据说就是那些在降落伞车间殴打拿了《防

毒面具》的女工、穿着工人服的在乡军人青年团员。

须山想抓住这个问题，使群众摆脱“僚友会”的清川和热田这些家伙的影响。伊藤对此也表示赞成。他们的那个工农大众党现在还标榜是为工人服务的政党，还打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旗号。而实际上它根本不是“为工人服务的政党”，只是口头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已。很有必要在群众的面前揭露这个问题。须山和伊藤已经加入了“僚友会”，是普通会员。无产阶级要揭露资产阶级的一切欺骗政策的本质，要反对战争。而要进行这样艰巨的工作，首先就必须同表面上装着是自己人、象“僚友会”的那些右倾机会主义者作斗争。须山就慰问金的问题，跑到清川那儿，向他建议是不是开一次“僚友会”的全体大会，同时又通过自己和伊藤结识的人，把募捐“慰问金”的问题在群众中散布出去。

到大会场上一看，想不到青年团的职工也来了。我们之所以重视“僚友会”，是因为那里面正式工多，临时工只是极少数。在伊藤和须山争取过来的工人当中，只有一两个正式工。尽管我们过去反复地强调争取正式工的重要性，但是做起来很困难，所以成绩不大。而“僚友会”里的人，除了两三个人之外，其余都是稀里糊涂地参加进去的。所以在他们的面前弄清楚是清川正确还是须山正确，就很有可能把这些人争取到我们这边来。

战争开始以来已经快半年了，而“僚友会”只开过一两次会。会员中间对这件事都有点不满。须山在群众的面前一开头就说：现在有这么多的工人农民被送上战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是这么被追赶着往前跑，而“僚友会”却从来没有认真地开过一次会，这简直是对阶级的背叛。他这么一说，就有五六个人一齐说：“完全同意……”这几个人这么说了之后，底下就嘀嘀咕咕

地议论起来。我和须山都有在反动工会里当“革命的反党派”的经验，对于这种喊过“完全同意”之后底下就嘀咕起来的情况是很了解的。所以我笑了，须山也笑了。可是他一笑就震动了伤口，赶忙用手捂着缠着绷带的脸，连声地叫着：“哎哟！哎哟！”在谈话中，须山还善于抓住别人的特征把它模仿出来。

谈到“慰问金”问题的时候，清川这么说：现在开到满洲去的士兵都是工人、农民，是我们的伙伴。所以从加强无产阶级的团结来看，给他们捐送慰问金，并没有什么不妥。大家都搓着自己的手指甲，默默地听着。清川接下去说：我们的同志在工厂里受资本家的剥削，现在又开到前线上，在敌人的枪弹下牺牲；而保护我们这些同志的只有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可以响应募捐慰问金的号召。——对清川这次的讲话，大伙儿似乎感到还有些道理，纷纷点着头。

伊藤一见这种情况，感到有些不妙，皱了皱眉头。

“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她发言说。

“僚友会”里有十四五女工，平常参加会的只有一两个人。这次由于伊藤邀集大家来，才算来了六个。而这对于“僚友会”却是罕见的事。至于女工在“僚友会”上发言，那更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所以大伙儿的眼光一下子都集中到伊藤的脸上了。

“听了清川的发言，似乎很有道理，不过，总觉得好象是在听陆军大臣的训话……”

大家哄的一下笑了起来。

“清川也好，谁也好，都很明白这次战争不是为咱们的，归根结蒂还是为了资本家。如果是为了咱们职工、失业的人或是贫苦农民在打仗，没有问题，咱们就是穿不上吃不上也应该把所有的钱拿出来当作慰问金捐献出去。可是，情况并不是这样呀。”

伊藤这么一说，青年团的工人就突然插嘴进来捣乱，于是须山也插了进去。他利用清川的话这么说：“我们工人在工厂里受剥削，资本家用不着我们的时候，就随意地把我们赶出去；一到战争，首先把我们拉去打仗，不论是什么情况，都是当资本家的牺牲品。所以要出慰问金，应该由他们去出！”

须山这么一说，大伙儿的脸上露出一副“这话也有道理”的神情。

“让我们出慰问金，这是阴谋诡计，目的是要我们相信：战争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全体国民。”

这时，伊藤又接过须山的话，说了“红色慰问袋”的事，谈了战争开始以来大伙儿的生活没有任何改善等等。这么一来，清川这帮人已经没有还手的余地了。清川作为“僚友会头目”的那种威严已经在群众的面前给打下去了。至于青年团的家伙们更是无能为力了。但是，如果认为这样就会万事大吉，那将是大错特错。因为这些社会法西斯分子的本质，不是在群众的面前而是在群众的背后来演他们真正的好戏。

在开完会回去的路上，两三个青年团的家伙对须山说：“你小子是共产党！你过来！”一进小胡同，就猛地扑过来，把须山狠揍了一通。

“他们是三个人，没有法子，挨了一顿穷打！”须山说着笑了起来。

须山决定通过伊藤，立即把他们这种卑鄙懦弱的行为告诉给昨天参加大会的“僚友会”的成员。因为这将最好不过地说明谁是谁非。

跟须山见面之后一个小时，我又见了伊藤，她说工人们都很关心地打听为什么会因慰问金的事而打了起来，所以趁着谈打

架的事，恰恰可以给大家说明慰问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因此她非常高兴。——以前我们总觉得未能够让群众充分了解慰问金的问题，感到放心不下，而现在正当大家被活儿累得够呛的时候，又要他们出钱，所以不必讲许多大道理，群众就说：“这简直是要我们的命！”结果，完全出乎意料，募捐以失败而告终了。伊藤告诉我说：从厂子里的情况来看，须山自从挨打之后，威信一下子增高了；工人们知道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立即对他产生了一种感激的心情；但是另一方面，工头开始注意起须山来了，说不定会出危险。

“这次募捐慰问金，说不定是工厂故意干的，好从职工中发现赤色分子。……你说呢？”伊藤这么问我。

我说确实是这样。

于是，她说：“我们有点上当了……”

我感到伊藤和平时有点不一样。

“这不对！”我说，“尽管是这样，但咱们在几十个工人的面前，表明了谁是谁非；同时在‘僚友会’的内部，造成了我们的影响。只要我们继续扩大这种影响，并从组织上加以保证，就会取得很好的成果。不付出一点代价，是不可能成就事业的。在最后的关键时刻，这一切肯定会起作用的。”

伊藤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一边说：“我明白了！对！我明白了！”一边带着她那特有的深思的眼色，接连地点着头。

我开玩笑地说：“最后笑的才是真正的笑，现在暂时让须山哭丧着脸吧！”

伊藤也笑了。

她接着给我谈了她带着自己小组的人去筑地小剧场①看戏

① 是当时日本专演进步话剧的剧院。

的事。任何一个女工，一说戏就只知道歌舞伎^①（虽然她们自己并未看过）或者水谷八重子^②，而这次工人呀女工呀居然也出现在舞台上，“闹闹嚷嚷”，看来真叫她们吃惊不小。据说看完戏之后，大家都说：“这不是戏呀！”伊藤就问：“那是什么呀？”她们说：“是真事情呀！”再问她们：“有意思吗？”大伙儿说：“啊！怎么说呢……”——不过，看来她们是受了很大的震动，据说以后还经常谈起筑地小剧场。有一个矮个子、平常跟伊藤要好的女工，人们叫她小君。她说：“人家一说我是女工，我就感到寒伦。可是，那个戏里面，一说是女工，还骄傲的了不得呢。我觉得有点不真实。”但是，她想了一想，又说：“要是真的罢工，我也能挺起胸膛大干一下。可是，听到左邻右舍说我是女工，还是感到寒伦！”

据说问她们想不想什么时候再去看一次，大多数人说还想去一次。原因是那个戏里面，有一个跟她们家（所谓家，是指她们自己的车间）的工头很相似的家伙，被大伙儿狠狠地整了一通。

伊藤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说：横竖要被人家裁掉，乖乖地干活也指望不到津贴，咱们干脆象那个戏里那样，大家一块儿来它一次罢工，治一治工头怎么样？伊藤这么一说，大家嘻嘻地笑了起来。

“嗯！……”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说，“来它一下，也挺有意思呀！”于是噼噼喳喳地商谈起怎样治工头的办法，最后说出的办法，不知不觉地竟和筑地小剧场的戏里的一样。

由于伊藤的影响，“僚友会”的三个女工加入了她们的那个小组。这三个人多少呼吸过一些正式工会的空气，伊藤她们平

① 日本的古典戏剧。

② 水谷八重子（1905—），日本著名的话剧演员，日本艺术院会员。

时故意避讳说的一些新词儿，她们却满不在乎地说个不停。这样一来，和其他人的关系就造成了一些隔阂。这三个女工还有点“摆老资格”，常常摆出一副很熟悉“革命运动”的架势。伊藤现在正抓住一切机会来搞好她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伊藤笑着说：“事情可不象小说里写的那样顺利啊！”

我和伊藤商定了“坐坐”的日期，由伊藤去找地点。越来越有必要决定最后的对策了。

“你还是在吃茄子吗？”伊藤一边站起来，一边这么问我。

“唉！”我笑着说，“托它的福，两个膝盖骨都发软了！”

伊藤把手伸进衣带里，掏出一个折成四方的小小的纸包。我以为是汇报，看了看她的脸，就把它装进了衣袋。

回到住处，掏出来一看，原来是用薄薄的手纸包着一张五元的钞票。

八

笠原终于进了一家小咖啡馆。决定上这种地方去，确实是够惨的。从事革命运动的人，为了生活而去进咖啡馆，不能不说是一件可怕的事。这样的同志尽管自己怎么想振作起来，但很快还是垮下去。“环境气氛”对我们的重要性，如同水对鱼一样。一个女同志不论她是为了个人的生活，还是由于男女一块儿从事活动，为了避免双方都垮掉，到咖啡馆里去当女招待，其结果，同样都是很危险的。更何况是笠原，她从来没有受过革命工作的锻炼，自己就会很快地朝下坡路滑下去。这是明摆着的事。——可是，她自己既没有把全部身心投入革命运动的决心，

而我这一方面又处在必须坚决保卫我们组织的关键时刻，所以不能有任何伤感的情绪。

最初，笠原是从家里到咖啡馆去上班。由于工作很累，又不习惯，晚上很晚带着一副疲劳、不快的神色回到家里，把手提包一扔，横着腿往那儿一坐，软瘫瘫地耷拉着两个肩膀，连话也懒得说。过了一会儿，她什么话也不说，把两条腿往我的面前一伸。

我感到莫名其妙，瞅了瞅笠原的脸。一摸她的腿，腿肿得上下一般粗，已经分不清膝头和脚踝了。她试着在铺席上把腿弯了弯，膝头上的肉发出咯咯的响声，听起来真叫人难受。

“一整天都得站着。真受不了呀！”她说。

我给她说了某个纺织厂的事情。——这是我从伊藤那儿听来的。那儿的女工们整天站着干活，两条腿都站肿了，直打哆嗦，怎么也跟不上机器的转动，工头就在背后用皮靴踢着她们干活。我跟笠原说：不要把这种工作的痛苦，仅仅看成是自己个人的痛苦，是个人所能摆脱的痛苦；而应该联想到这是强加在整个无产阶级身上的痛苦。笠原听了我的话说：“你说的对！”

我把笠原娇小的身子抱在自己的怀里。我好久没有拥抱过她了。她闭上眼睛，在我的怀里一动不动。

以后，笠原又住进了咖啡馆。这家咖啡馆的老板是个女的，好象是什么人的姘头。据说是一个女人照顾不过来，希望笠原搬进店里去住，在店里吃饭，还照样发工钱。于是笠原跟房东说，要暂时回娘家去一下，就搬去住了。这个女主人可能念过高等师范或女子大学，英语说的很漂亮；她的情人不只一个，好象有三个，其中有大学教授，有著名的小说家，还有电影明星；她轮流地在外边过夜，早晨才回来。这女的一回来，连那些不堪入耳

的事情也要详尽地叙述一通，而且还要作一番比较，窘得笠原不知怎么办。女的谈完之后就睡大觉，一直睡到下午两三点。有时我早晨起来没有早饭，就跑到咖啡馆去。那里早晨很少有客人，笠原装作象是做自己吃的饭，其实却填饱了我的肚子。起初笠原还有点不愿意这么做，后来却说：“吃她一点饭也是应该的！”咖啡馆的厨房又小又乱，湿漉漉地直冒水气。我蹲在那儿，急急忙忙往嘴里大口地扒着饭。

“你这样子真好看呀！”笠原一边留神着楼上，一边看着我的样子，低声笑着说。

不过，笠原的环境确实是糟糕透了。女主人的生活是那个样子，到有女人的咖啡馆里来的客人，是不会只喝点咖啡就走的；很多家伙是专门来跟女人说混帐话的，你还得要一一地跟他们应付。我知道这些东西会慢慢地渗透到笠原的心里去，但我现在对笠原还没有完全绝望，一有机会，还给她送去各种书籍，尽量多给她谈谈各种事情，可是，她对各种事物比以前更加不起劲了，遇事都不愿多动脑筋了。

而我跟笠原这种联系也不能维持下去了。繁重的工作拖住了我，随着仓田工厂的形势愈来愈紧张，我到笠原那儿去，只是要点交通费，或者吃顿饭，几乎没有时间和她谈什么了。我感到笠原经常流露出寂寞的神情。不过，不管怎么说，我现在的日常活动，正是靠了笠原才能顺利地进行。从这一点来说，尽管她是那样的一种状况，但她毕竟还是承担了我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我跟笠原谈了我的这种看法，希望她明确地具有这样的觉悟，努力不使自己垮下去。

我渐渐地连去要交通费、吃饭的时间也没有了。先是三天去一次，后来是一星期一次，再后来是十天一次，去咖啡馆的次

数越来越少了。地方委员会、地区委员会以及工厂支部的工作都堆积在一起，有时一天要进行十二三次联络，早晨九点钟左右出去，一直要跑到晚上十点钟左右。回到住处，脖颈子硬得象一根棒子，脑袋象针刺似地发痛；好容易爬上了楼，就地趴在铺席上躺下了。最近这些日子来，我简直就不能仰面躺下舒舒服服地睡觉了；由于过度的疲劳，大概是身体的哪个部位出了毛病，就象身体孱弱的孩子一样，只能趴在那儿睡觉。我想起我父亲在秋田种地时的情景，他从地里回来，常常连沾满泥巴的草鞋也来不及脱，跨进门槛就趴在铺席上睡起午觉。父亲不顾身子，拚命地干活；由于地租太重，那些满是石头碴子的“赖地”，村里人谁也不愿插手耕种，而父亲租种的比谁都多，想从这里多少捞一点收获，来填补一下生活。父亲就是这样把心脏搞坏了。——现在当我不能不趴着身子睡觉的时候，不由得不想到自己慢慢地跟父亲有点差不多了。但父亲不是去向地主抗议，要他们减轻地租，而是搞垮自己的身子，想靠拚命地干活来摆脱地主的剥削。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我的情况和父亲不一样了。虽然我跟自己唯一的母亲断绝了往来，弟弟妹妹也不知道我的去向，如今连跟笠原同居的生活也牺牲掉了，而且连自己的身子也快被工作拖垮了。但是，这一切并不是象我父亲那样由于被迫着要更好地为地主资本家服务，而恰恰是为了反对地主资本家。

在我的身上，一丝一毫的个人生活都没有了。现在就连各个季节也成了我为党而生活的一部分。四季的花草、风景、蓝天和阴雨，在我看来都不是孤立的。天一下雨，我就高兴。因为出去联络可以打伞，人家就不容易看到我的脸。我希望夏天快地过去，倒并不是我讨厌夏天，而是因为夏天一来，衣服穿的少了，我那有特征的身段（让这种特征喂狗去吧！）会一下子让人家

识别出来。冬天一到,我就想:“好啊!又多活了一年了!又可以干工作啦!”只是东京的冬天过于明朗,对工作不方便。——自从转入这样的生活以来,我对季节不是不关心,反而非常敏感起来,敏感到几乎过去根本没有想象过。但这和前年在监狱里的时候,对季节的变化感到的那种特别的敏感,又有明显的不同。

这一切都是在无意识中形成的,是自己被迫所过的生活不知不觉地造成的。本来在我还没有遭到警察追捕的时候,尽管那时已献身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但还是有许多“自己的”生活。有时还和厂子里属于同一个工会的伙伴们(这个工会是社民党系统的反动工会,我是作为那里面的反对派在进行工作)在新宿、浅草之类的地方一边散步,一边聊闲话;虽然受到工厂支部严格的政治生活的限制,但是象合法生活中应有的“交际”,看看电影(最近我连是否有电影的存在都完全忘记了)以及饮食吃喝之类的事情,仍然占据了我相当的一部分生活。有时还由于这些个人生活而把支部的工作拖后了一两天;而且个人的荣誉感还不知不觉地在作怪,当可以提高自己荣誉的工作和支部的工作发生矛盾时,往往先着手干自己的工作。当然,这些毛病在以后的工作中还是得到了改正。但是作为一个党员,还不能说我是过着“二十四小时的政治生活”。不过,这不只是我个人的过错。一个人如果没有一定的生活环境,主观上的努力总是有限的。当我的一切私人的来往都遭到隔绝,置身于党的工作以外的一切个人欲望都受到抑制的生活之中,我才体会到过去怎么努力清算也很难做到的事情,却出乎意料地非常自然、非常容易地做到了。过去需要花一两年的努力才能做到的事,现在缩短到两三个月就可以实现了。最初开始过这种新的生活的时候,

就好象小时候跟人比赛谁能钻到水里呆的时间最长那样，也曾经感到过一种难以忍受的、说不出滋味的憋气。——当然罗，就是现在也不能说我已经经受了真正的困难的考验。喜欢引经据典的S（但他使用的典故和须山不一样），听我说要过“二十四小时的政治生活”，他就说：必须把自己锻炼成“一天工作二十八小时也不知道疲倦的人”。

最初我不太理解一天工作二十八小时这句话，可是当我一天不得不进行十二三次的联络时，我才懂得了这句话的含意。——一个人的生活，同时也是阶级的生活。起码从我的本心来说，我是愿意接近于这样的生活。

在仓田工厂，从放出可能把一些临时工改为正式工的风声来看，他们准备要加快和我们摊牌了。为了准备对付这一招，我们决定改组支部。从须山小组里挑出一人（是个年轻的正式工），从伊藤小组里挑出两人（其中一个正式工，一个是临时工），决定把这三个人推荐为新的支部成员，写了他们三人的“履历”，由我带到地方委员会，取得了上级的批准。接着又决定了计划部署，把支部的各个成员作了明确分工，让他们分别承担车间里的任务，在须山或伊藤万一出事时，后继的人立即按预定的新的部署投入战斗，不使工作有一天中断。须山或伊藤要是出了什么事，在工厂里马上就会知道，因此规定支部新的成员要立即到须山和我联络的地方去向我报告。我们之间的会晤就是斗争的司令部，所以不管有什么原因，如果联络断了，不争分夺秒地为恢复联络而拿出方针和措施，那就是对阶级的背叛。过去一有人被捕，联络就断了，使得工作不能顺利进行。——对此不采取任何措施，恰恰是出于一种机会主义的观点，好象根本不存在或完全没有预想到对我们的镇压。总有人可能被捕，这是很明显的

事，所以我们进行斗争，从一开始就必须要做好第二步、第三步的准备。

事实上自“僚友会”的殴斗之后，须山的处境已经非常危险。须山每天去上工，已做好了随时都会被捕的思想准备。因为是工厂，正当你在干活的时候，特务说一声“你来一下”，就算被捕了。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不过，现在发展组织的可能性是增大了，所以他还是坚持去上工。尽管很危险，但是另一方面，他获得了在车间里公开说话的一定的自由，群众也对他产生了信任。

快到月底了，看来工厂在三十号或三十一号就要实行解雇。他们口头上说是要把临时工改为正式工，但是至今仍然未见任何具体的行动，大家终于产生了怀疑。我们在《防毒面具》上揭露这是一种欺骗，其目的是利用这种欺骗手段，一方面提高劳动效率，另一方面是遏制大家的反抗。大家很快就明白了这个意思。可是，大多是临时工，一旦宣布了解雇，团结就会涣散。所以最近两三天内必须下决心采取行动。

我们一向在传单和小报上号召必须要反对战争。如果工人们一旦因解雇而起来斗争，那就会如列宁所教导的那样，工人们会以“童话般的速度”，懂得为什么必须要反对战争。尤其是在制造军需品的工厂，可以引起目的性很明确的斗争。——现在首先必须要发起斗争。

我下了最后的决心。

办法是让伊藤和须山影响下的同志和新的支部成员分别负责各个车间，同时举行“反对解雇”的车间集会。而为了使这次集会成功，得要须山在工厂里公开散发传单。——伊藤的那个“小点心铺子小组”里有个女工，她的哥哥是仓田工厂的职员。从

这个女工的嘴里了解到工厂不是在三十一号（他们故意让人以为是三十一号），而是在二十九号就要“先发制人”，全部解雇临时工。据说那时不仅有警察，可能还有军队出动。所以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在二十八号发起罢工，反过来给他们一个先下手为强。

须山最近可能有被捕的危险。据伊藤报告，她有两次看到便衣警察从工厂办公室里走出来，并且常在须山的第二车间门口跟工头站着说话。这都是最近一两天的事。自从太田被捕以后，厂子里又撒了两次党的传单和两次《防毒面具》。敌人正在盯着须山，这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再说，一提起“共产党”，人们就认为（统治阶级也是这么向他们灌输）好象是藏在“天上”、钻进“地下”、出没无常的神仙或鬼怪。其实共产党就是象须山这样受群众信任、在他们的身边并肩劳动的人。我们应当向大家明白地说明这个问题，使大家感到亲切和信任。——我之所以决心要让须山公开散发党的传单，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为了进行最后的战斗，即使没有须山，这个任务也必须由其他哪个同志来承担。光是采取隐蔽的办法，是动员不起来群众的。我们应当象蜘蛛结网那样发展秘密组织，然后发起公开的宣传鼓动。

为了商定最后的对策，我们决定在一起“坐坐”。在那里要提出我的这个方案，并作出决定。——可是一想到须山，我心里就难受得要命。撒一次党的传单被抓住，虽然根据各人的斗争经历判刑不一样，但起码要准备坐两三年到四五年的牢房。平时我迈出门一步就跟在屋子里完全两样，把一切空想和思考的问题统统都抛在一边，只是留心着四周走路（我对这已经相当习惯了）。而今天我动辄就想到须山。可是，我这么老是想着须山是很不好的。从须山来说，他如果能清楚地看到我们所面临的

形势，他也会理解到这样做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措施。如果说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无论如何必须要走这条路，除了这条路没有第二条路可走，那末，我们就不应该抛开工作而从这里产生任何其他想法——比如说，认为这样做是不是“太残酷”了啦、“太可怜”了啦等等。

话虽这么说，我在到达会面地点的路上，脑子里还不时地闪现须山那经常用一些突乎其来的典故逗我们发笑的面孔，心里感到很不好受。

地点是在须山过去的一个酒友的家里。这里以前我们已经用过三次。我在黑洞洞的外屋脱下木屐，把它夹在怀里，向楼上走去，只见一道斜射进来的光线，映出了须山的面孔。

伊藤靠在墙壁上，伸出两条腿横坐着，正在揉自己的脚。我一进来，她用手拢了拢垂下的头发，抬眼瞅了我一下。我跟她说：“上次谢谢您啦！”她并没有答话。伊藤在做工厂的群众工作时，总是要涂脂抹粉地打扮一番的，而参加支部的会议，因为没有必要，从来没有涂脂抹粉过。可是，今天一看，伊藤的脸蛋儿却打扮得从未有过的美丽。

“伊藤同志今天‘组织’了一个男的正式工，刚刚回来……”须山指着伊藤的脸，又开起玩笑来了。

平时这种时候，伊藤总是默不作声。今天不知为什么，她抬头望了一下我的脸。

会议开始以后，我特别注意须山照例所作的汇报。他根据上次支部会议的决定，已经在各个车间作了布置，准备举行集会。他说：从工厂的情况来看，最近两三天可能是关键的时刻，因此必须立即采取紧急措施。

伊藤接着补充说：上次向我汇报的裁人的事，表面好象要在

这个月的三十一号进行，实际上可能在二十九号就要动手。从接受的降落伞和防毒面具的定货量来估计，也正好和这个日期吻合。因此最迟必须要在迫在眼前的二十八号发起决定性的斗争。

大家的意见早已一致了，问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发起这一场决定性的斗争。须山考虑了一会儿说：“已经准备到这种地步了，群众的情绪也很高，剩下的问题是鼓动群众，一气把它干下去。”他停了一停，又接着说：“能不能一气干下去，是决定胜败的关键……”

“对！现在需要的是一个点火的人。——为了八百名工人！”伊藤的脸上流露出从未有过的兴奋。

“我，最近——尤其是最近这两天，心里真有点焦急。以前，我们虽然采取各种措施清算了福本主义时代的关门主义，但是它的流毒还是存在的。现在，在这个需要一鼓作气的关键时刻，不能和这个工厂进行坚决的斗争，恐怕就是这种流毒在作怪吧？！……”须山看了看我的脸，又说：“我认为，要是没有人在群众的面前公开地干它一下，这一场斗争是发动不起来的。这是从量变到质变嘛！——我想，这不能算是极左吧！您看呢？”须山好象有谁说他是“极左”似的，说这句话时，特别使上力气。

我认为要进行斗争，应当依靠“说服”，而不应该采取“主观武断”的办法。所以我没有说话，只是注意着问题是否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而讨论确实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了。尤其是伊藤和须山，他们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从大道理、而是从如何解决工厂里每时每刻的动向出发，所以一致地得出了正确的看法。这正是由于不脱离工人生活的缘故，我们在这里取得了理论与实践的巧妙的统一。

我跟须山说：把这说成是极左，那是卑鄙懦弱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对我们的污蔑，是为了掩盖他们在实践上的失败主义。须山说：“对！”

这时，我提出了我的方案。一刹那间，屋子里充满了一种被压抑般的紧张气氛。但这只是极短的一刹那间。

“我认为也是这样……”须山第一个打破了沉默，声音确实有点儿不自然。我看了须山一眼，他接着说：“这当然应该由我来干了。”

我点了点头。

伊藤的身子好象突然僵硬起来，只是用眼睛来回地望着我和须山。当我把眼光转向她的时候，她嘴里低声地说：“没有——意见……”

再一看须山，他盘腿坐在那儿，无意识地把面前一个蝙蝠牌香烟的空盒子撕成一片一片的。

事情作出了决定，突然出现了一阵短暂的寂静。于是刚才一直没有注意到的大街上来往行人杂乱的脚步声和不断喧叫着的夜市上摊贩的叫卖声，一下子传进了耳朵。

接着又讨论了具体的问题。——最近，他们发现由于疏忽了搜查女工身体，让传单和工厂小报《防毒面具》经女工的手带进了工厂，所以对女工的身体搜查突然严格起来。我们决定采取这样的办法：那天由伊藤全面负责，她穿上两腿用橡皮筋勒紧的短裤衩，传单就装进裤衩里带进厂；她早晨从S那儿拿到传单，立即到街上的公共厕所里，把传单塞进裤衩；进厂以后，按规定的时问，仍然利用厕所，把传单拿出来交给须山。我们还决定传单在午间休息时从屋顶上撒。

会议一结束，刚才一直压抑着的感情，突然一下子涌上了

心头。

“咱们恐怕要有一段长时间的分别了！”我跟须山这么说。

“我的朋友中有这么两个人。”须山说，“他们俩是很要好的朋友。一个因‘三·一五’给关了三年，另一个因第二年的‘四·一六’被判了四年。‘三·一五’的那个出来之后，去年十二月又被捕了，又判了三年。他本来是高高兴兴地等着‘四·一六’的那个出狱的，所以他在临入狱的时候说：咱跟他恐怕就是这么轮流着坐牢，再也见不着了。不过，他说这样也不错！……”

接着，他自己说：“这大概是我最后的一个典故了吧！”

我和伊藤不觉笑起来，但是我的脸紧绷着，简直象哭一样。

“不管出了什么事，只要咱们的组织牢靠地保存下来，斗争就能扎扎实实地继续下去，所以您可不能被他们抓住！——您要是被抓住了，那连我做的事情也白干了，变成无谓的牺牲了！”须山这么说。

我们决定按今天的决议进行准备，在二十六号的晚上再碰一次头。于是我说了一声“行啦！……”大家都站起身来。这时，我和须山都不由自主地站到屋子的中央，两人使劲地握起手来。须山忽然象孩子似的腼腆地跟我说：“啊呀，佐佐木^①的手这么瘦小呀！”

须山一边往外走，一边跟我谈到他担心今后恐怕再没有机会到我家去了，因此又到我家去了一趟。他说：“你的老妈妈不知怎么的，好象越来越瘦弱了。”

我本想说些什么话，但须山说的“越来越瘦弱了”这句话，猛

① 佐佐木是作品主人公“我”的姓。

地打动了我的心。从他这句话里，我感到母亲因担惊受怕而日益消瘦的矮小的身影就好象出现在我的眼前。——但是，我觉得不应该在这种时候说这样的话。我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只说了一句“是吗！……”底下的话就没说下去了。

跟须山分手以后，伊藤说她离下面的联络还有半个来小时，于是跟我散了一会儿步。我们商量了二十六号那天要给须山开个小会，让伊藤买点水果、点心带去。

伊藤平时走路的特点是迈着大步，摇摆着肩膀，就象一个男人一样。而今天不知怎么的，走在我的身旁却迈着小步，道道地地象个女人。临分别的时候，她让我“等一会儿”，自己走进一家小铺子。不一会儿，买了一包东西走出来。

“这个送给你……”她这么说着，就把东西递给我。我说：“这怎么行呀？！”她却硬把东西塞进我的手里。还说：“最近你的衬衫这么脏，那些家伙好象很注意这些地方啊！”

回到家里，打开那个小包，我忽然意识到自己把伊藤和笠原对比起来。她们同样都是女人，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把她们比较一下。现在跟伊藤一比，我才感到笠原离我是多么远啊！

——我已经十来天没有上笠原那儿去了……

九

仓田工厂的屋顶上，正准备建造第三车间。一到午间休息的时候，大家都跑到屋顶上，有的把整个身子躺在阳光下睡觉，有的聊天逗趣，有的玩着排球。这一天，初夏的阳光耀眼地照射在洋灰的地面上。须山把自己人布置在自己的周围，准备一旦

来抓他时好进行阻拦。

十二点三刻，须山猛地使出全身的力量，把传单一束接一束地抛向天空，大声地喊着：“坚决反对大批解雇！”“举行罢工！反对解雇！”……后面的话立刻被群众的声音遮盖了。红的黄的传单在阳光中闪耀着。传单刚一撒，大家一下子给愣住了，但立刻就喊叫着朝传单落下的地方拥去。其中还有几十个人，把拚命抢到的传单，又高高地向上抛去；这样一来，最初在一个地方撒的传单，一眨眼的工夫就分散到六百名职工的头上。——工厂好象已经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预先让守卫在屋顶上各个地方布了岗。守卫们一边声嘶力竭地叫喊：“喂！喂！不准拾传单！”一边硬往人群里挤。可是，早已看不出传单是谁撒的了。乍一看，好象所有的人都在撒传单。

守卫没有办法，只好把屋顶的狭窄的出口把了起来，想让人们一个一个地从这儿通过，好检查传单到底是谁撒的。可是这么做起来，一个小时也上不了班。当粗大的混凝土的烟囱上响起上班的汽笛声，大伙儿就手挽着手，嘴里“嗨嗨嗨嗨”地喊着，朝着狭窄的出口冲过去。这一来，守卫就再也招架不住了。——后来听伊藤说，她看着须山挤在人群里，不慌不忙、悠然自在地走下去了。

后来工头捋个儿问：“传单是谁撒的？”虽然有的人明明知道是须山撒的，可是谁也没有说。青年团的那些混蛋们恨得要命，气得了不得。当天，须山所在的第二车间和伊藤的降落伞车间，群众的情绪很高，选出了代表和其他车间联系，准备向工厂提出抗议。

下工的时候，须山和伊藤走在一起。须山说：“在这样的時候，咱们真应该哭一场呀！”他一会儿把头上的帽子扯来扯去，一

会儿一个劲地擦着自己的脸。

一路上，须山翻来覆去说了好多遍：“真没想到！”“真没想到！群众的支持真了不起啊！”

为了听取那天撒传单的情况，那天很晚我和伊藤还约定进行联系。但我根本没有想到须山也会跟着一块儿来了。当他跟在伊藤的后面进来时，我把他从头到脚看了两三遍。当我认清了他确实是须山时，我不觉站了起来。

我听他们说了详细经过。我也非常兴奋，我学着须山跟伊藤说话的腔调说：“在这样的時候，咱们也该喝它一瓶啤酒吧！”于是我们三个人喝了一瓶麒麟啤酒。

须山忍不住又开起玩笑来。他跟伊藤说：“以前的那种啤酒可有点儿气味啊！”我抓住须山的肩膀，笑着骂道：“你这小子！”

决定性的斗争还在于明天的奋战，我们对明天的准备工作又作了周密的研究。

第二天早晨，工人们去上工的时候，工厂给六百名临时工中的四百人，每人发两天的工资，拦在门口把他们解雇了。那些领了工资的女工们，茫然不知所措，在门前来回徘徊。派来的十五六个警察追着她们大声地嚷着：“回家去！回家去！”把她们撵了回去。

发工资的窗口边，出了一张很大的告示。上面写着：“原定二十九日结束工作，现改为本日。但本厂为照顾诸位工友，决定增发两天的工资，希能体会本厂的心意。另，今后如有新的工作，本厂承认诸位有优先录用权利。特此通知。”他们留下了二百名临时工，这里面有他们的阴谋，目的是要打乱我们的步骤。

被解雇的人当中，也有须山和伊藤。——在斗争的紧急关头，他们来了个先下手为强，把我们打倒在地。——须山和伊藤

简直是垂头丧气。我也是一样。不过，敌人终归是敌人，不是木头人儿。对于这种逆转的形势，我们不能听之任之，应该立即振作起来，吸取这次失败的教训，以利于今后的斗争。

虽说被他们撵散了，但正式工中还留下两个支部成员；被裁的工人，虽说要各自去谋求工作，各奔东西，但其中伊藤和须山的小组就将近十人，所以今后只要和他们保持联系，我们斗争的范围反而会迅速地扩大。

他们来了个先发制人，就满以为已经搞垮了我们的工作，其实这些先生们却没有料到，正是用他们自己的手传播了我们组织的种子！

现在，我和须山、伊藤更加抖擞精神，正在从事新的工作……（前篇完）

作者附记

这篇作品献给藏原惟人。

（1932年8月25日）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小林多喜二小说选 (上、下册)

作者 = 小林多喜二

页数 = 7 6 8

S S 号 = 1 1 1 7 4 7 3 0

出版日期 = 1 9 8 3 年 0 7 月 第 1 版

封面页	
前言页	
目录页	
译本序 & 刘振瀛	
防雪林 & 文洁若	译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 & 楼适夷	译
蟹工船 & 叶渭渠	译
在外地主 & 李芒	译
工厂党支部 & 金中	译
转折时期的人 & 李长信	译
沼尾村 & 李德纯	译
为党生活的人 & 卞立强	译
附录页	